# 甘肃史地考述

GANSU SHIDI KAOSHU

（下）

主编 张军利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 甘肃史地考述

GANSU SHIDI KAOSHU

（下）

主编 张军利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 《甘肃史地考述》

主　　编　　张军利

副 主 编　　钱　旭　　郝宗维　　李振宇

张占社　　薛方昱

# 当代论文选

# 目 录

## 当代论文选


论商周的羌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羌 …… 王俊杰 / 543
《禹贡》雍州西界黑水问题新探 …… 侯丕勋 / 567
放马滩地图地名问题研究 …… 雍际春 / 583
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 …… 张维华 / 603
甘肃河西水系的特征和演变 …… 冯绳武 / 617
西汉酒泉郡若干县城的调查与考证 …… 李并成 / 625
泾州地望新议
——论临泾、安定、泾州的历史演变 …… 祝世林 / 637
汉晋金城郡允街县方位考 …… 刘光华 / 645
河西地理略考 …… 郝树声 张德芳 / 651
古代河西的兴衰 …… 齐陈骏 / 675
两汉凉州畜牧业述论 …… 汪受宽 / 695
晚唐五代瓜州都河水道变迁与环境演变 …… 郑炳林 曹 红 / 717
唐诗地名"临洮"辨正 …… 刘 满 / 739
新玉门关考 …… 李正宇 / 749
街亭地名的历史演变 …… 李清凌 / 773
论河西地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 张克非 / 785
北宋时期中原通西域的几条道路的探索 …… 陈守忠 / 799
北宋御边政策调整略述 …… 刘建丽 / 811
试论明清时期河湟文化的特质与功能 …… 武 沐 王希隆 / 821

试论宋代西北屯田 …… 李　蔚 / 833
甘肃先秦农业考古概述 …… 何双全 / 847
瓜沙曹氏节度尚书曹仁贵史事钩沉 …… 马　德 / 859
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研究 …… 陈尚敏 / 871
北朝时期瓜州建置及其所属郡县考略 …… 李并成 / 887
豳地望考 …… 汪受宽 / 899
酒泉昆仑说的由来及其评价 …… 顾颉刚 / 911
玉门关阳关杂考 …… 向　达 / 921
敦煌史地杂考 …… 阎文儒 / 933
敦煌地理及历史沿革 …… 褚良才 / 957
锁阳城的历史演变 …… 王北辰 / 969
汉代河西与西域之间的相互关系 …… 王宗维 / 977

# 论商周的羌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羌

王俊杰

## 一、商周的羌

长期以来，史学界把商代的羌看作一个民族，并且把商代的羌同秦汉以后的羌看作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古老民族，这是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问题。

如众所知，《诗经·商颂》在歌颂商族先祖时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尚书·牧誓》篇记载周武王伐纣时参加联军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甲骨卜辞中有羌方、马羌、北羌和伐羌、获羌、以羌为牺牲、用羌耕牧狩猎等记录。无可置疑，商代确有羌的存在，而且商代的羌是不属于商族的一部分人。但是，问题就在于商代所谓的羌是不是一个民族。

笔者认为，商代所谓的羌并不是一个民族，它是当时以农业为主的商族对于以畜牧业为主的各个部落的泛称，是商人从生产特点、从经济类型上对商族以外的牧羊人的称呼。《说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应劭的《风俗通》也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可见，羌的原意是牧羊人，是以社会生产活动的主要特证对所有牧羊人的泛称，而不是作为一种人们共同体的专称。中国古代，中原的华夏族对于周围的非华夏人予以泛称，如蛮、夷、戎、狄，这是惯例。即使在秦汉以后也还仍然如此，例如对于匈奴称胡，鲜卑称东胡，西域称西胡，小月氏称湟中胡或义从胡，此外对北方的其他许多部落也往往称胡，甚至还有所谓杂胡。显然，胡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汉族对北方异族的泛称。汉代对分布于整个西南地区的所有部落称之

为西南夷，也不是说西南地区的夷都是一个民族。秦汉以后尚且如此，更何况在汉朝一千年前的商代，由于部落复杂，互相隔绝，联系不多，知识缺乏等原因，对那些不甚了解的牧羊人都笼统地以羌泛称，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当然，我们说商代的羌是游牧部落的泛称，并不排除某些游牧部落，或者由于以羊为图腾，或者由于所在的方位，或者由于某种特点，而以羌之名见称。因此，甲骨文中除了查泛称羌的纪录外，还有羌方、北羌、马羌，显然这是具体指的某一部落。不过，尽管如此，这些以羌之名见称的分处一方、互不往来的部落，仍然不能说成是一个民族。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后出现的人们共同体。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说："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①]这是因为，在原始社会的末期，两次社会大分工加速了氏族制的瓦解，为民族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在社会分工发生以前，一个氏族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自己居住的地区，有着极大的地方局限性。两次分工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交换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出现、奴隶的出现，氏族部落成员不再局限于原来的地区范围之内而混杂起来了。由于商业活动和职业的变换、分工，氏族成员很难召集在一起，氏族部落开始解体，其职能也为之而削弱。与此同时，各部落间的掠夺战争不但使亲属部落结成了联盟，而且也使被征服部落屈从于联盟，从而开始了各部落的融合，并使各部落的领土合并成为共同的领土，氏族部落制度终于瓦解了。可见，氏族部落瓦解的过程正是人们冲破氏族部落束缚，进入流动交往、混杂居住、广泛接触的过程，也正是这个过程使不同部落的人们摆脱了血缘关系，打破了地区局限，在互相交往和各种关系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特征，从而开始了由血缘和地方局限性的氏族部落向民族过渡，也开始了氏族部落制度向国家机器的转变。因此，民族和氏族部落有着俨然的区别，其重要的不同点即在于氏族部落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而民族则是打破了血缘纽带而以地域关系结成的人们共同体。一般地说，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

盟阶段才是由血缘关系向地域关系过渡的时期，也就是向民族过渡的起点。

商代的羌部落是否已经打破血缘关系开始进入地域性的结合？是否已经完成了这个过渡而形成一个民族？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夏商是中国由野蛮进入文明，由氏族部落发展成民族和国家的开端和早期。夏族和商族是中国最早形成的仅有的民族。在商代，由商王直接控制的地区也就是商族活动的中心地区，商王直接控制区的四周有商王所封的商族诸侯，他们控制的地方是商族分布的外缘和商族势力扩展的据点。在诸侯封地之外或诸侯封地之间，还有许许多多的氏族部落。他们同商朝的关系，有始终处于敌对状态的，有经过战争表示服属却仍保持其独立性的，也有曾被征服以后又判离的。总的说来，他们都是商族以外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的氏族部落。正由于此，商族对于他们，有的就直接称之为氏，如有熊氏、有仍氏、彭祖氏、南巢氏、骊山氏等等，或者就根据他们的特点结合他们所在的地方称之为某方，如虎方、驭方、人方、鬼方、祭方、土方、羌方等。当时像这样的氏族部落不知有多少。这些不可胜数的小部落分散错杂，彼此之间缺乏联系，而且社会经济文化落后于商族，还不可能形成民族，即以甲骨文中出现的羌部落而论，即有北羌、马羌、羌方之别。既然种落各自有别，也就足以说明他们尚未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况且就其地望来说，北羌显然是在商都以北的今河北、山西境内；马羌在什么地方不得而知；羌方应是周武王灭商时作为友邦参加联盟的羌人。《尚书·牧誓》篇说他们是“西土之人”。他们的活动地区约在今陕西西部甘肃境内。这些被称为羌的部落，且不说其他因素，仅就其地域相隔如此遥远来看，要说他们那时就能形成一个民族也是不可思议的。

也许有人会提出，今天世界上的某些角落还有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的部落，一般不是也把他们称为民族吗？那么从广义的民族来说，对于中国古代的氏族部落又为什么不能算作民族呢？不错，在近现代这个历史

时期，在世界各地的人类几乎都划分成不同民族，大家都承认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民族的条件下，对于个别尚处在原始社会而有自己特征的氏族部落，为了区别于其他民族而把他们也称为民族，说他们是原始民族，这是完全可以的。然而，在几千年前，在整个世界基本上还处在原始社会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只有个别民族开始形成，而氏族部落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在世界的居民还不是以民族划分的情况下，我们如果不顾民族的历史性而硬把古代的某些氏族部落说成是民族，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在实践上也必然会对历史进行曲解，给历史研究造成混乱，给民族研究带来种种困扰和纠纷。

民族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个民族形成以后，作为一个共同体它不会昙花一现地很快消散，即使发生了分化或融合于其他民族，也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氏族部落却不然，它随时可以依附于其他部落或民族，很快地消逝于无形无影之中。正因为如此，商代的北羌、马羌等部落虽在卜辞中一度出现，后来也就再无踪迹可寻了。至于卜辞中的羌方，如果说这个部落还继续存在，应该说是《尚书·牧誓》篇所讲的同周联盟灭商的羌人。即使如此，事实表明，他们也没有形成一个民族，而是注入了华夏族。

周武王灭商时有羌人参加，还有一个尊称为师尚父的姜太公。羌和姜本是同音的一个字。羌从羊从人；姜从羊从女，用以志姓。毫无疑义，姜太公就是羌的领袖。羌部落同周人分布的地区相距不远，他们之间关系密切。《诗经·鲁颂·闷宫》里说，周人的始祖后稷是羌女姜嫄所生。《诗经·大雅·绵》里说，周人的先祖古公亶父迁居周原，娶了“姜女”为妻，她就是周人子孙所称的太姜。此后，文王的祖父太王娶的是周姜，周武王娶的又是姜太公的女儿邑姜，可见羌周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商朝末年，由于羌部落与周人结为联盟互相合作，在伐纣灭商和东征叛乱的过程中姜太公又屡建殊勋，所以周初“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余各以次受封”。（《史记·周本纪》）接着，周王还授齐国以东方专征之权。《史记·齐太公世家》

载，周成王派召康公传达命令给太公说："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淮南），北至无棣（冀东），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从此，经西周春秋战国直到秦统一，齐国始终是东方最强大的诸侯国。不仅如此，从周朝分封诸侯来看，除了周的宗室姬姓子弟以外，也以姜姓之国为最多。据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所列的姜姓之国有齐、许、申、吕、纪、州、莱、向、鄑、历等共十个。无可置疑，西周以后姜姓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支持周王朝的基本力量，而且在历史上曾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是，在这里必须指出，进入中原以后的姜姓之国并没有在羌部落的基础上向形成一个民族的方向发展，恰巧相反，他们却是迅速地离散了部落，彻底接受了华夏文化、风俗习惯和礼仪制度，溶解于华夏族之中。因此，自西周起，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他们是否是华夏正宗，甚至齐桓公还被中原诸国推为盟主，以华夏族的领袖身份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华夏文化保卫者。

姜姓的申、吕二国位于今河南南阳一带，是西周在南方建置的重要屏藩和前进据点，也是西周在南方树立的模式和表率。当时，江汉流域还是荆蛮所居之地，与华夏异俗，文化不同，周王朝正是凭借了申、吕等国向南发，使华夏文化的影响在荆蛮地区日益扩大，最后终于使南方的荆楚也纳入华夏之中。因此，申、吕等国对西周疆域的开拓、华夏文化的传播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诗·大雅·荡之什·嵩高》中所颂扬的："维申及甫（即吕），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王命申伯，式是南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丕显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宪。"就是指的这一历史内容。此外，中国最早的成文刑律《吕刑》，据《尚书·吕刑》篇和《史记》的记载，都说是周穆王时由吕侯建议制订的。《尚书·吕刑》篇记载了吕刑制定的过程、刑律条目、审案方法和审案原则，并阐述了法度的重要、滥刑的危害等，这对中国法制的形成与发展是一大贡献，为中国文化史增添了重要的一页。上述种种事实说明。姜姓进入中原以后已彻底华夏化，从一个人们共同体来看，他们只能是华夏族而不再是有别于华夏的羌部落了。

除了进入中原的姜姓以外，殷周之际的羌部落中还有一部分人继续留在西北地区，仍然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经济文化状态，这一部分人被称为“姜氏之戎”。《国语·周语》说，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千亩是周王的籍田，距京不会很远，姜氏之戎在这里与周交锋，可以想见他们的活动范围不出汧陇以东关中西部一带。正是由于他们长期活动在这里，所以到了春秋时期秦国开始向东发展，姜氏之戎就首当其冲，终于被迫向东转移。而这时正在中原发展的晋国却乘机接纳了姜氏之戎，让他们住在晋国南鄙即今黄河以南的豫西一带。

关于姜氏之戎迁到中原以后的情况，《左传》襄公十四年（前559年）记载晋、吴两国在开会讨论伐楚问题时，随晋与会的戎子驹支同晋卿范宣子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一些问题。戎子驹支说：“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崤之师。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崤志也。岂敢离逿？”从这一段话里不难看出，姜戎自迁居晋国南境以后，与晋形成“不侵不叛之臣”的关系，遇有战争便追随晋国参加征战，建立了功勋，春秋时最有名的秦晋崤之战，就是姜戎与晋互为犄角通力合作大败秦军的。其次，姜戎在迁入中原以后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至晚在驹支时他们的领袖已取得了子爵的封号，表明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改变了他们作为戎狄而受到的歧视。此外，从这段话里还可以看到，晋国赐予姜戎的南鄙之田原是荒凉的地区，经“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才得到了开发，这说明姜戎进入中原以后开始垦辟土地进行耕稼，向着农业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转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驹支在回顾了他们同晋国的关系之后，还赋了《诗经·小雅·青蝇》篇中“恺弟君子，

无信谗言……”的诗句，借以讽劝范宣子不要发生误会。戎子驹支赋诗言志这一事实说明，姜氏之戎已有华夏文化的教养，他们在文化方面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不过，姜氏之戎和西周初年羌部落中进入中原的姜姓不同，姜氏之戎迁入中原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保留着自己的部落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他们自己的各种传统的习俗，因而不可能迅速消灭戎夏之间的差别，也就不像西周初年的诸姜那样，一进入中原很快就分解转化成华族。他们约至春秋末年才基本上融合于华夏族中，从此以后，再也看不到关于他们的记载了。

可能有人认为金文《鬲羌钟》《郑羌伯鬲》《羌伯毁》是西周和春秋前期还有其他一些羌人存在的线索或证据。但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认为鬲羌不是鬲部羌。鬲是姓氏：因为八个小钟上有铭文“鬲氏之钟”；至于这里的羌则是人名，因为羌可以读作壮、庄、将、匡。所以不能把羌作为鬲部的羌或鬲姓的羌。至于《郑羌伯鬲》，郭沫若认为郑羌伯即春秋初年的郑伯（郑庄公），也不是羌人。因此，这几种器物能否作为西周至春秋初期另有一部分羌人存在的依据，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证明。如果这几种青铜器的确与羌人有关，那么他们也只能是已经融合于华夏的羌人后裔，这只要看一看他们所取得的封爵和铸造的铜器，也就不难想象他们华化的程度了。

综上所述，可知商代的羌原是游牧部落的泛称，商朝末年虽然有个别游牧部落以羌为名而出现，但尚未发展成民族就发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随周灭商之后进入中原，成为华夏族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细胞；另一部分继续留在西北，到春秋时期也东迁进入中原，以后逐渐融合于华夏族。因此，商周的羌并未沿着由部落发展成民族的道路前进，而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先后注入于华夏之中。所以自春秋末年终战国时期，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们活动的踪影和迹象了。

在商代，除了从社会生产部门的特点上对西北方的游牧部落称之为羌以外，还因互相对立经常以兵戎相见的关系对分布于西、北方面不同地区的华夏族以外的各部落泛称为戎。戎本作戉。《说文》：“戉，兵也，

从戈甲。”段注:“兵者械也。”《风俗通》云:“西方曰戎。戎者,斩伐杀生,不得其中。戎者,凶也。”都说明戎的本义与战争有关。据此可以判断,商代之所以对西北方面不同文化的各部落统称为戎,就是因为当时他们经常同商族处于对立地位而以兵戎相见的缘故。

戎这个名称的出现,始于商代末年。《竹书纪年》载有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历伐西落鬼戎,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戎,后二年周人克余无之戎,太丁七年伐始乎、翳徒之戎。以上诸戎均在今山西境内。此外《史记·周本纪》还讲到与文王同时的有骊戎、犬戎等。这是分布在今陕西及陕甘交界一带的戎。

在中国古代的各个不同时期,戎的外缘是有所不同的,是随华夏势力的发展及其文化影响的扩大而发展变化的。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戎,指的都是在一定范围内同华夏族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非华夏族各部落。商朝以今河南中北部为中心,其势力所及,西北不出今之陕西,所接触和了解的也不过是邻近的一些部落。因此,商代的戎其外缘也只能是在与商族邻近的有限范围以内。在当时生产力低下、交通不便、互相隔绝以及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要同比较遥远的异域发生关系是难以想象的,如果设想把商代并不知道的部落都列入商代的戎,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随着华夏族的发展和活动范围的扩大,西周以后特别是春秋时期,一方面是靠近中原地区的诸戎日益融合于华夏,另一方面是又有一些较远的部落同华夏发生关系并以戎之名而出现,称之为戎的地域外缘也在向外扩展。西周时期所谓的戎主要是指今山西、陕西及陕甘宁边区华夏族以外的部落,如燕京戎、北戎、余无戎、条戎、犬戎、陆浑戎等,都是与华夏毗邻或犬牙交错的一些部落。

戎的外缘进一步向西北的陇右地区扩大,主要是春秋以后的事情。这与秦国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西周末年,犬戎与申侯等进攻镐京,杀死幽王,秦襄公出兵救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

国。(《史记·秦本纪》)秦国建立后,由于地处西戎的包围之中,从一开始就同诸戎进行了不断的战争。秦武公(前697~前677年)"伐邽、冀戎"。邽、冀在今甘肃天水、甘谷一带,这是秦国在陇右的西戎地区发展的第一步。此后,秦穆公(前659~前621年)任用降秦的戎人由余,根据由余了解的情况和提供的知识,在西戎地区展开了积极的活动,"益国十二""遂霸西戎"。(《秦本纪》)这是秦国势力向西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戎这个名称的使用范围扩大于陇右的新阶段。从此以后,洮河和黄河以东的陇右各部都基本上纳入戎人之列了。关于这一地区的戎,见于记载者主要是一些较大的部落集团,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较小部落分布其间。《史记·匈奴列传》在叙述春秋以后秦晋各地的诸戎时指出,他们"种落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很清楚,随着戎的外缘的扩大,包含的成分也愈来愈复杂了,他们并没有沿着共同的方向发展,相反地经春秋以至战国中期,陆续归并于秦,通过政治的结合、经济的联系和文化的影响,与中原的羌和戎一样走向了与华夏融合的道路。

综上所述,商周时期的羌是对西北方面诸游牧部落的泛称,而不是一个族名,在商代末年虽然也有个别部落以羌为名,但是伴随着西周灭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进入中原建立姜姓诸国,成了华夏族的组成部分;另一部分留在西北的姜氏之戎,到春秋时也迁入中原,并融合于华夏之中。因此,商周时期的羌部落已先后消逝,并未形成一个羌族。至于商周时期的戎,则是华夏族对于对立的非华夏各部落的泛称。当时被称为戎的各部落出于不同的渊源,分布于不同的地区,彼此隔绝,而且生活习俗以至语言各不相同,根本没有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条件。因此,商周的羌和戎都不是民族,也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 二、秦汉的羌

如前所述,商周时期的羌到春秋时已先后溶于华夏。然而,经战国到秦汉时期,时隔三百年之久,却又出现了大量的羌。这些羌是从哪里来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把他们同商周的羌联系起

来，认为秦汉的羌与商周的羌有脉络相通的源流关系。从此以后，人们一讲到秦汉以后的羌，就说他们是商周时期就已存在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笔者认为，把秦汉的羌与商周的羌连在一起是牵强附会的，必须重新加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范晔之前五百年，司马迁写《史记》除了在周武王灭商时提到一次羌人外，此后直到战国末年再未涉及一个羌字。《史记》中再次出现关于羌的记载是始皇二十六年秦统一时“地东至海及朝鲜，西至临洮羌中”。(《秦始皇本纪》)所谓羌中即羌人地区，犹如秦始皇命蒙恬北逐匈奴时新收复的地区称为新秦中一样，是指新的秦人地区。《史记》讲秦统一的疆域时说西与羌地接壤，也就说明了羌区过去不在秦的势力范围以内，同时也告诉我们羌中的羌人与战国以前的戎人不同。《史记》里的戎人很清楚是指那些先后归并于秦，基本融合于华夏，最后设置为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等地的华夏以外的人。

此外，《史记》里还有一些关于羌的记载，如：“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匈奴列传》)“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大宛传》)张骞“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奴匈所得”。(《大宛传》)武帝“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匈奴传》)“自大将军围单于之后，十四年而卒，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而方南诛南越，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卫将军骠骑传》)“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货殖列传》)这些记载明确地告诉我们，汉代所谓的羌中是指祁连山以南、黄河洮河以西之地。可见，汉代的羌人就是指这里的羌人。

西汉时期，羌汉之间不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各个方面都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汉武帝开河西，隔绝羌胡。元鼎六年(前112)先零诸羌合兵十万余，进攻令居、安故，围枹罕，汉廷出动十万大军，在郎中令徐自为和将军李息的率领下征服了西羌，并设置了负责羌人事务的护羌校尉。从此羌中成为汉政府直接统治的地区，实现了羌汉的统一。这

是司马迁壮年时亲见的一件国家大事，也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司马迁对于羌人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当然是完全了解的。司马迁写《史记》，目光四射，注意到了国内外各地区各民族，他写了《南越传》《东越传》《朝鲜传》，包括戎狄的《匈奴传》，包括氐人的《西南夷传》，还有远至中亚的《大宛传》，唯独对羌人没有立传，而且既没有把羌和戎写在一起，又没有像对于氐人那样把羌写入西南夷。这当然不会是司马迁的一时疏忽，也绝不是他认为羌人无关紧要不值得为之立传。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不写西羌传呢？

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最渊博的历史学家。他生于西汉前朝，上距战国不过几十年，他父亲和他本人先后担任太史令，当时“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他又有条件阅读皇家图书馆“石室金匮之书”，掌握了一般人难得的资料，他还侍从汉武帝任中书令之职，综览天下文书，对于全国各地各族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商周的羌与秦汉的羌名同而实异，他也了解秦汉的羌同战国的戎毫无关系，他看到秦汉的羌是长期与内地隔绝的羌中土著部落，只是由于这些羌部落与汉廷刚刚开始发生关系，他还不清楚他们的历史，甚至对他们的现状也很少了解。既然如此，那也就只好宁付阙如了。

东汉前期，班固写《汉书》，在《史记·大宛传》的基础上做了大量补充，增改为《西域传》，但仍然没有为羌立传。原因看来还是对部落分散无相长一的羌人难以弄清。东汉时期，羌汉关系已成为当时政治上的中心问题之一，羌汉战争几乎与东汉相始终。出于政治需要，明帝曾经“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南单于、西羌传……”（《史通·正史篇》）此后，东观撰史诸人对当时发生的羌汉战争继续作了记载，这就是陈寿在《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的评论中所说的“史汉著朝鲜、两越，东京撰录西羌”。《东观汉记》虽然撰有《西羌传》，但同时却另有《西戎传》，把羌与戎截然分开。三国时鱼豢撰《魏略》引用的《西戎传》就是出自《东观汉记》。这两部写当时历史的书都把西戎和西羌分开，各自立传，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戎”作为一个泛称，在各个不同

的历史时期有它不同的范围，基本上是逐渐由中原地区向外扩展的，鱼豢《魏略》中引的《西戎传》所谓的戎就比先秦的戎范围更大。《西戎传》中所写的戎首先是氐，说关陇一带之氐，“此盖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貎道者”。也就是说这里的氐人即战国时陇右一带的西戎。此外还有长期在武都阴平街左右的氐人也在这个戎传之中。《西戎传》中还包括有东汉时河西的贵虏、西域的婼羌、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以至于中亚各国和印度、大秦等，把中国西部及域外都列入了西戎。尽管“戎”的内容已如此之庞杂，但仍然未把“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的西羌列为西戎。可见，直到东汉三国时期，人们还不认为汉代的羌与先秦的戎有什么渊源关系。羌人的来历还是一个悬案。

直至南朝刘宋时期，范晔的《后汉书·西羌传》把先秦的羌与戎混同起来，又把秦汉以后的羌同战国时期的戎挂上了钩，从而使秦汉的羌与商周的羌上挂下连，编排了一个若明若暗的体系。这样，关于羌的来历问题似乎由他作出了解答。

范晔把商周时期的羌与戎混为一谈，这显然是错误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对商周时期的羌与戎进行剖析时已有论述，不再重复。至于把秦汉的羌同战国时期的戎挂起钩来，也是难以成立的。范晔的唯一根据是关于羌的始祖无弋爰剑出自于戎的传说。《后汉书·西羌传》说：“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前476~前443年）为秦所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俱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其后世世为豪。”根据这一条记载来说明羌出于戎，笔者认为是大成问题的。首先，“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对于无弋爰剑的来历说得就相当玄虚，单凭这个来历不明的人把羌与戎挂起钩来，显然是证据不足的。其次，即使无弋爰剑的确是一个戎人，他们夫妇二人“亡入三河间”，被诸羌“推以为豪”，也不能因此就改变了三河地区诸羌的来源。事情很清楚，无弋爰剑来到之前，诸羌就早已在三河地区繁衍生息，自成氏族部落。爰剑只能作为一个戎人而羌化，绝不能因为他的加入把已存

在的诸羌部落都变成戎人的后裔。而且即使无弋爰剑被某些部落作为始祖，也不能认为他就是河湟地区所有诸羌部落的始祖。两汉时期见于记载的“种羌”不下几十种之多，其中一部分固然是以无弋爰剑的子孙为豪酋的部落，但也还有许多部落与爰剑的子孙无关。所以，把爰剑说成是诸羌的始祖是站不住脚的。至于以无弋爰剑为中介，把羌与戎挂起钩来，进而使秦汉的羌与商周的羌上挂下连成为一系，显然是附会而又牵强的，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秦汉以后的羌同先秦的羌、戎并无任何渊源关系，他们是自古以来就居住在河湟一带的土著部落。从考古资料来看，多年来在青海省民和县的马厂、乐都的柳湾、大通的上孙家寨、贵南的尕马台、都兰的诺木洪、循化的阿哈特拉山等地都发现有距今三千年以前的人类文化遗址，而且这些文化遗存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化相比，有不同的特点。因此，无弋爰剑来到三河地区时的“诸羌”亦即后来秦汉时期的羌，应该是由三千多年前就活动在这里的人们繁衍发展而来的。只是由于战国以前他们同中原隔绝，华夏族对他们的情况很少了解，也就没有留下关于他们的历史记载。到秦汉时，虽已开始接触，但对他们的历史和内部情况却十分陌生，因而只有根据他们的游牧经济特点，对他们泛称为“羌”。生活在汉代的司马迁、班固等人是清楚这个情况的，所以他们没有被这个“羌”字迷惑，没有混淆羌与戎的界线，也没有把汉代的羌同商周的羌进行联系，而是把羌人的渊源作为疑问留了下来。而数百年后的范晔，由于年代久远，不了解这一情况，结果作出了错误的论断。

关于河湟地区羌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后汉书·西羌传》说：“河湟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这就是说，在战国初期这里的羌人主要从事于射猎，自无弋爰剑来到这里以后才知道了畜牧和农业种植，也就是说，羌人以游牧为主的社会生产活动是从这时开始的。

自战国至西汉初期，这些以游牧为生的羌人就其社会发展情况来看，基本上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部落阶段。《西羌传》说：“所

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殁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嫠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殖。不立君长，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豪酋，弱则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他禁令。”就是这一时期羌人社会情况的写照。这段记载里说：“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告诉了我们羌人是游牧部落。“以父名母姓为种号”，说明了羌人已由母系氏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不立君长，无相长一”，说明羌人部落内部还没有显著的阶级分化，基本上还维持着氏族公社制度。“杀人偿死，无他禁令”，说明还没有作为阶级压迫的法律，只有原始社会的习惯约束。但是，从“强则分种为豪酋，弱则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来看，显然是私有财产出现后，以战争为手段的掠夺邻人财富的一种现象。“父殁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嫠嫂”，也是财产私有制出现后为了把财产保持在本氏族以内的一种婚姻制度。这些情况又反映了羌人社会内部的变化，显示出原始公社制已处于开始解体的过程中。恩格斯在讲到希腊氏族制度瓦解的过程时说：“古代一部落反对别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陆上和海上的有系统的掠夺，以期掠得家畜、奴隶、财宝，把这种战争变为正常的职业。”[②] 诸羌各部落的互相劫略和攻击，正是恩格斯所说的氏族制度解体过程中的现象。西汉宣帝时，赵充国与羌作战，曾经宣布“诸羌犯法，能相捕斩，除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大男子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予之”。像这样对羌人以金钱为赏赐，以所捕虏的妻子和财物尽予之的办法，就是利用私有观念，以财富为诱饵的办法，这就更清楚地反映了这时羌人中私有财产和奴隶的出现，表明羌人原始公社制的开始解体。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畜群的积蓄为羌人提供了交换的产品，他们以自己的牲畜交换汉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史记·货殖列传》在写汉代商业交换情况时说“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就反映了羌汉之间有着频繁的交换关系。随着商业交换的发展，货币在羌人中开始流通。赵充国在与羌

人作战时以钱币为悬赏，且其数目之大是值得注意的。《西戎传》中还讲到迷唐“与烧何、当煎、当阗相结，以子女金银聘纳诸种”，也表明货币和贵金属已被羌人作为财富来看待了。羌汉间的经济交流则是对羌人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刺激因素，它使羌人的畜牧业和农业种植都有了显著的发展。如更始、赤眉之际，窦融进攻先零羌封何诸种，获得马牛羊万头，谷数万斛。东汉初年，马援、来歙打败金城郡的先零羌，获牛羊万余头，谷数十万斛。和帝永元五年（93 年）贯友破烧当种羌迷唐，收麦万斛。安帝时败先零于北地，“得牛马驴羊骆驼十余万头”，击烧当饥吾种羌，“掠马牛羊十万头”。此后每次战争中都有大量获得马牛羊的记载。这些情况表明，当时羌人的畜牧业和农业生产水平都有相当的提高。

随着经济的发展，已处在解体阶段的羌人原始公社制必然会进一步瓦解。但是，与汉人密迩相邻或内迁与汉人错居的羌人，不可能沿着一般社会发展的途径扩大奴隶制因素向奴隶制发展。因为羌人既已作为封建王朝的臣民，在汉政府统治下要想以掠夺奴隶为手段来发展奴隶制是行不通的，甚至买卖奴隶也会受到汉王朝法令的限制，这就阻塞了羌人走向奴隶制的去路，影响了羌人社会的常规发展。从另一方面说，汉政府也力图通过政治关系使羌人与封建统治联系起来，把羌人纳入封建体制之中。《后汉书·百官志》说：“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长皆有丞，比郡县。”《陇右金石录》中收集有羌王印、归义侯印等。汉王朝实行封羌酋为王、侯、君、长的办法，实际上就是要利用羌人原有的部落统治羌人，使部落组织转化为汉王朝的地方机构，使羌酋成为汉王朝的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羌人中的显贵就其为本族豪酋来说，仍有代表本部落共同要求的作用，就其为汉王朝的王、侯、君、长来说，又是汉朝统治者的代理人。这种双重身份的出现，似乎造成了羌人的阶级分化。不过，从羌人的生产发展水平和部落内部的阶级分化来看，毕竟还没有形成最终突破氏族部落制的充分条件。因此，尽管羌人成了汉王朝统治下的一部分，他们还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氏族部落组织，部落成员之间的关系基本未变，甚至那些被封为王、侯、君、长的酋豪，也仍然被他们看作本部

落的代表人物，而不是他们的统治者。

两汉时期，一方面由于羌人各部落间以掠夺财富为目的战争不断发生，一方面出于反对汉朝统治者的需要，诸羌部落中一些近亲或近邻的部落往往互相结合组成部落军事联盟。这是羌人由分散的部落开始走向联合的一个重要变化。《西羌传》说，烧当羌滇良“会附落杂种，乃从入大榆谷，掩击先零、卑湳，大破之，杀三千人，掠取财畜，夺居其地”。这就是在互相掠夺中以烧当羌为首的诸羌为反对先零、卑湳等羌而组成的部落联盟。武帝时，“北御匈奴，西逐诸戎，乃渡河湟筑令居塞……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宣帝“元康三年，先零乃与诸羌大共盟誓，将欲寇边”。这些都是诸羌为反抗西汉王朝而结成的部落联盟。东汉时期，羌汉间的战争接连不断，每次战争中诸羌都曾结合成规模大小不等的部落联盟，如章帝末年烧当羌迷唐“与烧何、当煎、当阗等相结……寇陇西塞”。安帝时先零羌与钟羌诸种及上郡西河诸杂种羌结合“寇钞三辅，断陇道”。烧当、烧何、当煎等及其他诸种联合“寇湟中攻金城”及武威。号多与当煎、勒姐及其他诸种“钞略武都”。诸如此类的联合非常频繁，我们不再一一列举。

诸羌出于反对汉朝统治这一共同目标而结成联盟，无疑这是由各自分离互相攻击的氏族部落向民族共同体过渡的第一步。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却很难实现向民族发展的过渡。首先，诸羌部落的联盟在比较强大的汉王朝面前总是以战争的失败而告终。这样短暂而不稳定的联盟很难为各部落的互相融合提供应有的条件。其次，失败后的诸羌部落，有的被迫内迁与汉人错居，有的远处边境各居一方，地域的分隔、联系的不密破坏了他们形成一个民族的重要条件。第三，汉代的诸羌部落繁多，种系复杂，再加以分布零散，受制于各郡县，因之他们不可能组成一个包括较多部落的联盟。前面所述的屡次联盟，就是以先零、烧当、钟羌等为中心，在不同地区由一部分羌部落所组成的联盟。也就是说，汉代诸羌多次出现的联盟只是一种局部的、单纯军事性的、低级阶

段的部落联盟，是出于一时紧急需要的联合，很不稳定，极易分裂。汉代诸羌的部落联盟还没有达到氏族制度下所能达到的最发达阶段，没有产生常设的部落首长会议，和具有特殊权力的军事首长，没有形成高级阶段的联盟。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说："部落联盟是与民族最近似的。"意即部落联盟使各部落形成结合，虽已近似于民族但还不等同于民族。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它还没有完成"从部落发展成民族和国家"的过程，而形成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汉代的羌基本上就是这样"近似"于民族而实际上还没有形成民族的一些部落。

或许有人认为，从血缘关系来看未始不可把诸羌作为一个民族来看待。诚然，从血统或种族上探讨民族是有参考价值的，而且在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原始阶段，这一因素的存在还是比较显而易见的。但是，有血统关系的人可以分化形成许多不同民族，一个民族又往往由不同血统的人组成。因而我们不能以血统来确定民族，恰巧相反，民族是打破了氏族部落血缘关系而出现的产物，所以即使诸羌部落有较近的血缘关系，也不能作为判断是否民族的依据。

也许还有人认为，从诸羌的经济类型来看，从共同以游牧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来看，似乎也可以看作一个民族。这样提出问题也是讲不通的。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曾经形成过各种不同的经济类型，如渔猎、畜牧、农业等。古代民族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自然条件差别不大的情况下，一般都属于同一经济类型。汉代诸羌以游牧经济为主，但与其同时的匈奴、鲜卑等也同样以游牧为业。同一种经济类型可以见之于许多民族，证明同一经济类型并不能作为划分民族的依据。更不要说，在羌人之中随着他们内迁以后，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有一些部落逐渐转向农业，其经济类型也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改变。因之，在诸羌之间其经济类型也有差别，甚至就某一部落来说，在先后不同时期其经济类型也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改变，有所不同。所以，用相同的经济类型来说明汉代的羌是一个民族也是讲不通的。

## 三、魏晋南北朝的羌

经过两汉时期的迁徙、流动、分化、结合，到了魏晋以后，羌人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即内迁关陇地区而与汉民错居杂处的羌；一部分是仍游牧于今青海、甘南原为羌人故居之地的羌。这两部分羌由于其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在向民族过渡中也经历着各不相同的进程，因而我们在对于他们进行研究时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分别加以考察。

内迁的羌，如果说在东汉时期曾经多次组成了不同规模的联盟，这是由分散向集中、由部落向民族发展的过渡时期，已经是“近似”于一个民族了。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是内迁的羌正在形成民族之际而又迅速融合于汉族的时期。

从东汉末到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激烈错综复杂的时期。这一时期，在各民族的频繁交往和矛盾斗争中，羌人作为相对的一方来说，就很自然地被其他民族看作一个共同体。与此同时，各部落的羌人在同汉、氐、匈奴、鲜卑等族的频繁接触和矛盾斗争中也会更深切地发现诸羌部落与其他民族的差异和诸羌部落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我们知道诸羌部落在语言、经济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方面是比较接近或基本相同的，然而当他们还处于与外界隔绝、自成一个小天地时，这些共同的因素对于他们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可是当他们同汉、匈等族错居杂处形成复杂的关系以后，他们面对的是同他们有显著差异的其他民族，这就促使他们发现自己的共同点从而意识到自己的共同特征。同时，在与其他民族的矛盾斗争中，诸羌部落也会发现他们的共同利害关系而增强互相凝聚的力量。这种共同的民族特征和共同的利害关系一旦为人们所意识，就必然随之而产生民族自我意识。魏晋以后，在复杂而激烈的民族斗争中，诸羌的民族自我意识终于形成了，这也就标志着诸羌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而开始形成了。

关于羌族的形成，从《晋书》里可以看到一些线索。《姚弋仲载记》说：“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也……烧当雄踞于洮罕之间，七世孙滇虞，汉中元末寇

扰西州，为杨虚侯马武所败，徙出塞。虞九世孙迁那率种人内附，汉朝嘉之，假冠军将军西羌校尉归顺王，处之于南安之赤亭（今甘肃陇西县境）。那玄孙柯回为魏镇西将军绥戎校尉西羌都督。回生弋仲……永嘉之乱，东徙榆眉，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自称护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刘曜之平陈安也，以弋仲为平西将军，封平襄公，邑之于陇上……（石）勒以弋仲行安西将军六夷左都督。……勒既死，季龙执权，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杰于关东。弋仲率步众数万迁于清河（河北广川县），拜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迁持节十郡六夷大都督、冠军大将军，……朝之大议靡不参决，公卿亦惮而推下之。……灭梁犊，以功加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进封西平郡公。冉闵之乱，弋仲率众讨闵……石祇僭号于襄国，以弋仲为右丞相，待以殊礼。……石氏已灭，中原无主……乃遣使请降（于晋）。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节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单于、封高陵郡公。”又，《姚襄载记》云：“襄字景国，弋仲之第五子也。……弋仲死……襄方规北引，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又，《姚苌载记》：“及襄死，苌率诸弟降于苻生，苻坚以苌为扬武将军，历左卫将军，陇东……扶风太守。……及坚寇晋，以苌为龙骧将军都督益梁州诸军事。”从上面的记载中不难看出，从汉末经三国的曹魏、匈奴的前赵、羯族的后赵、汉族的东晋及氐族的前秦，在这一系列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中，羌人姚氏都取得了重要的官职。之所以如此，显然是由于他们具有不可轻视的实力。这种实力就在于他们拥有已形成为羌族的那一部分人作为基本力量，也就是说在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内迁诸羌已经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并团结成一支共同一致的力量，作为羌人领袖的姚氏才能受到各个政权应有的重视。再从姚氏先后担任过的官职来看，大都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如西羌校尉、西羌都督、绥戎校尉、大单于等，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姚氏担任“六夷大都督”这一职位，说明羌已经是一个能与匈奴、鲜卑、乌丸、羯、氐等族相提并论的民族了。

还应当指出，在这个时期羌人开始自称为羌，也是诸羌形成羌族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汉代，诸羌都是以其部落名称而自称，如先零、烧当、

钟存、罕、汗等等，绝没有以“羌”自称的。而且，汉王朝在同他们发生关系时也是以其部落名称具体称之为某羌，即使在笼统而广泛地讲到他们时也还是称之为“诸羌”或“种羌”并没有把他们作为一个共同体来看待。但到这一时期情况就变了。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匈奴族刘氏以匈奴人聚居的并州为根据地建立与晋对抗的政权，而羌族领袖姚弋仲也在羌人分布的秦陇地区宣布独立，自称护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这说明原为烧当羌豪酋的姚氏已把羌人当做一个民族共同体，自己则以这个民族的领袖和代表人物而自居了。还有，后赵末年梁犊起义后，姚弋仲应召和石虎对话时说：“老羌请效死前锋，使一举而了。……汝看老羌堪破贼以不。”年老的姚弋仲以“老羌”自称而不再以烧当自称，这充分反映出“羌”已作为诸羌部落的共名，作为一个民族名称，被他们自己所承认。过去他们只有狭隘的部落共同体的观念，这时已把共同体扩大到诸羌，形成了超越部落的民族共同体观念，产生了民族自我意识。这种民族自我意识的产生，反映了内迁羌人由部落向民族发展的过程已基本完成。

民族并立、民族矛盾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推动了诸羌部落的凝聚与结合，促进了羌族的加速形成。民族间的纵横捭阖和复杂斗争又为各族上层人物提供了建立政权的机会和条件。淝水战争后以姚氏为首的后秦政权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以羌人为基本力量，并取得关陇地区一些汉人豪族和氐人酋帅的支持与合作而建立起来的。《晋书·姚苌载记》说：“西州豪族尹详、赵曜、王钦卢、牛双、狄广、张乾等率五万余家咸推苌为盟主。……苌乃从纬谋，以太元九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以天水尹详、南安庞演为左右长史，南安姚晃及（天水）尹纬为左右司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庞魏、任谦为从事中郎，姜训、阎遵为掾属，王据、焦世、蒋秀、尹延年、牛双、张乾为参军，王钦卢、姚方成、王破虏、杨难、尹嵩、裴骑、赵曜、狄广、党删等为帅。”从后秦政权建立时的这张名单来看，毫无疑问，后秦是以羌人姚氏为首并取得了羌、汉、氐各族豪帅的合作而建立起来的。

后秦是以姚氏为首的政权，但它又是各族上层统治者的联合政权。

后秦统治下的人民包括了汉、羌、氐、匈奴、鲜卑等许多民族，是一个包括多民族的政权而不是单一的羌族国家政权。在后秦这个多民族的王国之内，羌族在数量比例上是少数而不是占多数的民族，羌族在政治地位上是优越的，但在经济文化方面是比较落后的，特别是远为落后于汉族。因此，在后秦政权建立以后，就不能不在前秦的基础上从具体情况出发，适应客观现实，顺从大多数人的先进经济文化水平，全盘接受汉族人民行之已久的封建制度，大力推行封建的政治措施。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中像姚兴那样提倡儒学、奖励文教可以说是仅见的。正因为如此，也就必然对羌人发生深刻的影响，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涣散了羌族的内聚力量，使羌人迅速改变了自己的各种传统和特点，一步步沿着汉化的道路前进。后秦灭亡后，羌人失去了政治上的凭借，并遭到歧视和压迫，这也对他们的分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加上经历了拓跋魏时期的一系列民族同化政策的影响，结果自两汉以来内迁的羌最后都融合于汉人之中。到北朝末年，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们活动的踪迹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分布于今青海、甘南、川西北一带的羌，却与内迁诸羌大不相同。这一地区的羌由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及其社会经济的原有水平等原因，发展比较缓慢。特别是由于这一时期陇右河西诸割据政权对羌人的争夺、控制和割裂、隔离，严重地影响了羌人社会发展的进程，使诸羌长期处于部落分散缺乏联系的状态，始终未能从部落发展成民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许多政权都曾经不同程度地控制了一部分羌人，其中对诸羌部落影响最大的是长期雄踞于羌区的吐谷浑。鲜卑吐谷浑自十六国前期进入河湟流域直到唐初被灭，控制诸羌长达二百余年。过去一般人都认为吐谷浑以一千七百户（或作七百户）内迁到达河湟地区，同诸羌部落互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吐谷浑集团，建立了吐谷浑国，因而认为吐谷浑集团实际是一个羌人集团，名义上以鲜卑为首的吐谷浑国实际是以羌为主体的羌人之国。笔者认为对于吐谷浑这样理解和作出的论断是与事实不符的。的确，吐谷浑是以人数不多的鲜卑小部落同诸羌

部落互相结合发展而成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不应忽略吐谷浑曾经吸收了大量鲜卑人这一更为重要的事实。我们知道，鲜卑吐谷浑的发展和强大是十六国之末和进入南北朝以后的事情，也正是南凉和西秦等鲜卑政权灭亡以后的巩情。十六国后期，南凉灭亡后以秃发氏为首的鲜卑部落、西秦灭亡后以乞伏氏为中心的鲜卑部落，都有很大一部分退出羌区加入了吐谷浑。除此以外，还有游牧于青海湖以西的鲜卑乙弗部二万余部，在吐谷浑开始强大以后不再见于记载，唯一的可能就是加入吐谷浑，成为吐谷浑的组成部分了。有这样多的鲜卑人加入，毫无疑问，吐谷浑实际上应是一个鲜卑集团。吐谷浑从名实上都是指的鲜卑人而不是羌人，作为吐谷浑支柱和核心力量的是鲜卑人而不是羌人。也就是说，吐谷浑是由鲜卑人组成的国家而不是以羌人为主、代表羌人的国家政权。不仅如此，在吐谷浑统治时期，鲜卑诸部作为吐谷浑的基本势力与诸羌部落互相错居，实际上还起到了对于诸羌进行控制和隔离的作用，产生了阻止诸羌部落互相结合的作用。这恰巧就是南北朝时期在吐谷浑统治下诸羌长期处于部落分散“不相统摄”很难结合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原因之一。可见，吐谷浑的形成与发展，绝不意味着诸羌部落已形成了共同体。因此我们认为，这一时期吐谷浑直接控制的诸羌基本上还是一些孤立的部落，并没有形成一个羌族。

但是，在某些受吐谷浑控制时间较短，程度较轻以及与之毗邻地区的诸羌中情况毕竟有所不同，他们之中有一些开始组成部落联盟，向着结合成民族共同体迈出了第一步。北朝时期在今甘肃武都地区宕昌一带及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区出现的宕昌羌，就是诸羌部落联盟性质的一个集团。《魏书》卷一〇一传《宕昌》说：“其地自仇池以西，东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人二万余落。”又说：“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国无法令，又无徭役。唯战伐之时，乃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相往来。牧养牦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叔伯兄弟死者，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妻，俗无文字，但候草木荣落，记其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从上引记载来看，显然这个宕昌国

只是个军事性质的部落联盟。这一地区的部落虽然实行了军事的联盟，但还没有形成民族共同体，所以到北周时期一被击溃就各自分散，宕昌羌之名也就消逝于无影无迹之中。

在宕昌之南白水上游及川西北一带还有一个称为邓至的羌人集团。我们不清楚他们的具体情况，只知道其“土风习俗亦与宕昌同”。《魏书》虽为他立了传，但极为简略，看来最多不过是一个和宕昌类似而较小的部落联盟。

与羌有关的部落，在今青海省东南部的玉树一带与西藏、四川邻近的地区还有一个党项（以后逐渐向东移动进入川西北）。党项见于记载是北朝末年宕昌、邓至灭亡以后的事。《旧唐书·党项传》说：“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不相统一。”《新唐书》说，党项“无法令赋役”。很明显，到唐代还没有完全脱离部落阶段的党项在南北朝时期当然也不可能形成民族。

此外，南北朝末期还有许多零散的羌部落。《北史·附国传》说：“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召、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北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这些依附于吐谷浑或附国的小部落显然更落后、更分散、更谈不上是民族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河湟地区为中心的诸羌，不论从总体上说还是从某一地区某一部分来说，都还没有从部落发展成民族。过去一般人把这一时期这一地区以畜牧为业的羌人看作一个羌民族，显然是不妥当的。

最后，我们把本文中的主要论点概括如下：

（一）商周的羌是对诸游牧部落的泛称，不是一个族名，其中虽有个别部落以“羌”为名，但是经西周至春秋已完全融合于华夏，消逝于历史之中。

（二）“戎”与“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商周的戎主要是对与华夏族

为敌诸部落的泛称而不是一个民族。“戎”与“羌”不能混为一谈。

（三）秦汉的羌是汉代对河湟地区土著游牧部落的泛称。他们与商周的羌虽然同称为“羌”，但二者之间没有渊源关系。

（四）秦汉的羌处于军事部落联盟阶段，近似于民族而尚未形成民族。

（五）魏晋南北朝时期，内迁诸羌在民族矛盾尖锐激烈的历史条件下初步形成民族，但很快又融合于汉族。分布于河湟地区的诸羌因受鲜卑吐谷浑的控制，始终处于部落分散状态，未能完成从部落联盟向民族的过渡。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5页。

②《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04页。

作者：王俊杰，1915年出生，男，河南尉氏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 《禹贡》雍州西界黑水问题新探

侯丕勋

《禹贡》雍州西界黑水及其地理方位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来的一桩悬案。古今不少学者，虽在这个问题的探讨上付出了艰辛劳动，但尚未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综观古今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情况，大致是：唐代以前的学者，侧重用古典经义解释黑水，为求新异，穿凿附会，因而犯了任意附会历史的错误；唐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学者，侧重考订前人按古典经义对黑水所作的各种解释，并力求判定何说为是，故无创见闻世[①]；现今一些学者，则跟在唐以来学者之后亦步亦趋，分明囿于俗套而不能自拔。

笔者认为，为了对《禹贡》雍州西界黑水及其地理方位问题的研究有所助益，具体研究工作既不能拘泥于古典经义，也不能落入俗套，必须另辟蹊径，锐意创新。本着这一原则，笔者在前人研究和考古发掘工作的基础上，从中国古代疆域地理变迁角度，对黑水及其地理方位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提出了一些粗浅意见，现公之于众，求教识者。

## 一、雍州的得名及其西界黑水的方位

雍州因何而得名？这个问题，古今史家说法不一，据史籍所载，主要有四说：一曰壅水为泽说；二曰山水得名说；三曰“四山之地”说；四曰“阴气雍闭”说。

壅水为泽说认为，“雍”是水被壅塞而成的泽薮。《诗·周颂·振鹭》：“振鹭于飞，于彼西雝。”雝，即雍；雍，“泽也”[②]。《尔雅注疏》：“汧出不流。释曰渭水泉潜出停成汙池者名汧。”[③]《汉书·地理志》：汧山“北有蒲谷乡弦中谷，雍州弦蒲薮”[④]。《水经注》：汧水“出汧县之蒲谷乡，维中谷决为弦

蒲薮。尔雅曰，水决之泽为汧，汧之为名。”[5] 以上材料说明，雝、雍、汧三字虽异，但其含义基本相同，三者共指汧水所流经的弦中谷中因壅塞而形成的泽薮，这个泽薮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弦蒲薮。新版《辞海》“雍”的释文，却与此有所不同，它认为，雍是“渭水被壅而成的池沼”[6]。《辞海》此说，源出何处，经查尚未见到文证。可是，此说对雍的得名和雍的本义的看法同我们前引材料相一致，因而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雍”并非渭水干流被壅塞而成的“池沼”，而恰是渭水支流之一的汧水被壅塞而成的“泽薮”。至于雍州的名称，极有可能始源于此。

山水得名说认为，今陕西凤翔县西北有座雍山，雍水源出其下，雍州因此而得名。正如《禹贡易知编》所载：“今陕西凤翔府西北有雍山，雍水出焉，雍州之名以此。”[7] 可是，《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的记载却是：雍山在“凤翔府西北三十里。四面积高曰雍，又四面不见四方曰雍。春秋为雍地。山之名以此”。显然，这是说雍山得名于“雍地”，而“雍地”又得名于“四面积高”和“四面不见四方”。根据史籍所载，山水得名说不仅产生较晚，而且山与水本身的得名也不可信，同时，从壅水为泽说所依据的材料分析，“雍”无疑出现在先，而雍山、雍水得名于后。这就表明，雍州得名于雍山、雍水说不能成立。

“四山之地”说认为，“四面积高曰雍”[8]，“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9] “雍”在这里有遮蔽、壅塞之意，也就是说，被四面的山岳遮蔽、包围着的地方称为“雍”。那么，“四山之地”说所谓“雍”，究竟是指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四面积高曰雍”，是东汉应劭对《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雍县的释文；“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是唐房玄龄等所撰《晋书·地理志》中有关雍县的正文。很明显，这里的“雍”是指关中西部的雍汧盆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释凤翔府时也指出：“府居四山之中。”又说：“志云，府境四周，皆有高山，而中实平坦，春秋时谓之故雍。”[10] 显而易见，若从时间角度去考察，就可看出此说产生于秦汉之后。这说明《禹贡》雍州得名在先，“四山之地”说产生在后，因而，雍州得名于此说不可信。

“阴气雍闭”说认为，雍州地处“西北之位，阳所不及，阴气雍闭”[11]。

《禹贡易知编》引蔡传文说:“雍州,西北之位,阳所不及,阴气壅遏,故以为名。汉改雍州为梁(凉)州,以地处西方常寒凉也。”[12] 不难看出,此说所涉雍州范围,不但超出了关中西部雍汧盆地,而且超出了关中地区,甚至还包括了整个西北高原。如果从疆域地理变迁角度去分析,无疑这一说法所反映的历史情况大体同汉武帝败匈奴、设四郡、通西域之后西汉疆域状况相合。这就表明,“阴气雍阏”说产生的历史时代,不但比“雍”这一地名的出现晚千年以上,而且比《禹贡》成书的时代也晚约五百年左右。显然,以此说作为雍州的得名也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春秋时秦都为何称为“雍邑”?春秋以来,关中地区又何以称为“雍州”?我们知道,早在西周时,因汧水被壅塞而在弦中谷中形成了“西雝”,自此,“雍”作为一个地名开始出现。约到了西周末、春秋初,当人们意识到今雍汧地区四周有山,中部平坦,分明是一区四塞之地,犹如“西雝”一样也是因壅塞而成,因而认为此地地形也具有“雍”的特点。春秋初,平王东迁,赐岐丰以西之地与秦。当秦在此四塞之地中部的雍水岸上筑都城时,可能由于都城与“西雝”同在四塞之内,而“西雝”在当时又是一处令人神往之地,因此便慕其名、取其义,命名都城为“雍”,史称“雍邑”。此后,秦国的势力逐渐扩展到了整个关中地区。而关中地区的地形同雍汧地区的地形具有相同的特点,即四周高山,中部平坦,从而人们也就称关中地区为“雍”。正因为这样,所以在《禹贡》成书之时,便将关中地区定名为“雍州”。

春秋以后,史书称关中为雍州者屡见不鲜。《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13]。《晋书·地理志》:“周自武王克殷,都于丰镐,雍州为王畿。”[14]《读史方舆纪要》:“禹贡雍州地,周为王畿,东迁后属秦,始皇置内史郡。”[15] “周都丰镐,则雍州为王畿;东迁以后,乃为秦地,孝公作为咸阳,筑冀阙徙都之,谓之秦川,亦曰关中。”[16] 上述史籍所载清楚说明,春秋时代的雍州,作为地域名称确指关中地区无疑。既然《禹贡》雍州之域仅限于关中地区,那么同“西河[17]”相对的其西界“黑水”的地理方位必然在今陇山以东地区。至于历史上雍州的范围在另外一些

人们观念中的日益扩大，毫无疑问，那无非是受中国古代疆域变迁影响所致。

**二、《禹贡》成书时代的雍州西界**

在中国古代，人们曾把《禹贡》九州看做是禹治水之后的夏朝疆域、雍州是《禹贡》九州中地处西北方的一个州。根据这种观点，九州远离中原的四边，无疑也就成了夏朝疆域的边界，与“西河”相对的“黑水”，同样也就成了九州的西北方边界。

然而，笔者认为，在禹的时代，不但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的国家疆域，而且也不可能有以山川为标志的明确边界。以中原为中心的九州和远离中原的九州四边，只能是《禹贡》成书时代的中原华夏族疆域及华夏疆域同四周戎、狄、蛮、夷各古代少数民族活动区域之间的分界在古代地理学方面的反映。如果我们从疆域变迁角度去考察，也不难发现《禹贡》九州所反映的疆域状况同春秋末期中原华夏族疆域相吻合的现象。这就表明，《禹贡》九州同夏朝疆域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那么，《禹贡》究竟成书于何时？《禹贡》成书时代的雍州西界又位于何地？关于《禹贡》的成书时代，学术界向来说法分歧，仅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情况讲，有西周成书说、春秋成书说和战国成书说，其中以战国成书说较为流行。

辛树帜持《禹贡》西周成书说。他曾指出“禹贡成书年代，应在西周的文、武、周公、成、康全盛时代，下至穆王为止。它是当时的太史所录”[18]。我们知道，处于文、武、周公、成、康及至穆王时代，西周疆域的西北部边界，如以关中地区为中心来说，其西部基本上稳定在汧陇之地，北部基本上稳定在东起今陕西的旬邑、彬县、长武，西至今甘肃的灵台、泾川各县地方。如果我们把《禹贡》雍州西界黑水作为《禹贡》成书时代中国西北部边界时，虽然这段边界的地理方位是同上自文、武，下至周穆时代西周西北边界基本相合，但是，雍州的得名表明，《禹贡》成书于公元前677年秦德公都雍之后[19]。这时上距周穆王已在三个世纪以上，而《禹贡》所载赋制的通行要比这时还要晚，铁更没有在西周早期受到过重视[20]。这就

说明,《禹贡》在西周前期并未成书。

顾颉刚主张《禹贡》成书于战国,同时指出,《禹贡》"它是公元前第三世纪前期的作品,较秦始皇统一的时代约早六十年",并且还认为,《禹贡》"作者的地理知识仅限于公元前 280 年以前七国所达到的疆域[21]"。他又说,《禹贡》"把《山海经》净化了";《禹贡》的成书,"其时代必在战国越灭吴和秦灭蜀之后,其创作者为地理学家[22]"。顾颉刚先生在研究《禹贡》的成书年代时,虽然一方面重视了《禹贡》的内容,另一方面注意了《禹贡》九州与当时华夏族各政权疆域间的关系,可是他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即《禹贡》同《尚书》的关系问题。《禹贡》是《尚书》里的一篇,古往今来,人们对此从未有过异议,同时还一直公认为《尚书》所固有。在顾颉刚先生所认定的《禹贡》成书的公元前 280 年前后,《尚书》早已风行一时。这就表明,《禹贡》成书的年代要比这个年代还要早一些[23]。

王成组提出了"孔子编写《禹贡》"的观点。他还指出:《禹贡》"基本上是孔子依据春秋时代他所了解的地理范围和生产条件所写成的古文献",孔子把《禹贡》,"以春秋后期的历法装点成尧时代所颁定的一样","孔子编写《禹贡》,大约是在公元前 500 年前后。写成禹自己或禹时代作品的方式,竟推前十七个世纪以上"[24]。王成组先生从《禹贡》的内容,《春秋》所记秦、楚开拓巴蜀的历史,以及战国秦汉作品中有关舜、禹的传说等方面分析论证了《禹贡》产生的时代条件[25]。笔者认为,王成组先生关于《禹贡》成书年代的见解,其可信程度,远在其他各说之上。

既然如此,那么根据王成组先生关于《禹贡》出自孔子之手、成书于春秋末期的见解,我们如何去认识这一时期雍州的西界呢?我们前已说过,《禹贡》所载九州和远离中原的九州四边,只不过是当时华夏族政权的疆域及华夏族政权疆域同四周戎、狄、蛮、夷各族活动区域之间的边界在古代地理学方面的反映。基于这种认识,笔者以为要确定雍州西界的方位,必须首先要搞清楚春秋末期地处西北方的秦国的西北边界。

春秋初年,秦襄公因派兵护送周平王迁都雒邑有功,平王便把岐丰

以西之地赐予秦。此后，秦人便从秦谷（今甘肃清水县境）迁到平阳（今陕西郿县附近），至德公元年（前677年）又迁都雍邑（今陕西凤翔县南）。在春秋中期秦穆公时（前659~前625年），秦国的势力有了较大发展。正如秦孝公在求贤令中所说："昔我缪公，自岐丰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26]《史记·秦本纪》也说："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从以上记载，如何确定春秋末期秦国疆域呢？是否可以得出这时秦的疆域业已包括西戎十二国的千里之地呢？笔者认为，上述记载表明，秦是"霸"西戎。"霸"从秦国方面讲，就是秦在西戎十二国中称王称霸；从西戎各国方面讲，就是西戎十二国慑服于秦国的威势，听凭强秦任意摆布。《史记·匈奴列传》有关西戎八国"服"于秦和《史记·秦本纪》秦穆公东"服"强晋的记载，也说明西戎八国和强晋在秦的武力威胁下屈服了，而不是将它们的疆域并入了秦国。

秦国从穆公时代直到春秋末期，其西北部和西部边界，基本上与西周前期边界相一致，大体上还是在东起旬邑，中经彬县、长武、泾川、灵台各县，西至汧陇一线。这一边界维持了较长时间，直至战国后期的秦惠王之前，秦才开始对义渠之地"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27]。"秦昭王时……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28]这就充分表明，早在秦昭王之前的秦秋末期，从东起旬邑，西至汧陇一线的以北和以西地区，不属秦国疆域，而在华夏族的观念中仍是"化外"之地。

通过上面的分析，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从西周初年至春秋末年，特别是在春秋末年的《禹贡》成书时代，如果在东起旬邑，西至汧陇的这一地区真有一条"黑水"，那么我们把这条"黑水"确定为《禹贡》雍州西界，无疑是顺理成章的事。

**三、从出土文物判定《禹贡》雍州西界黑水**

《禹贡》雍州西界黑水及其地理方位的确定，不但有足资证明的文献资料，而且地下考古发掘也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1967年9月，在甘肃省灵台县西屯公社白草坡大队西周墓葬的发掘中，出土了一批在商周史研究上很有价值的铜器。这批铜器之所以有价值，主要是因为不少铜器上镌刻着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铭文。其中铭文与黑水有关的铜器共三件，铭文多达五条[29]。对五条铭文若予分析归类，就可发现实际上只是“潶伯作宝彝⿰阝尊”和“潶伯作宝⿰阝尊彝”这样两条文句完全相同的铭文。在这两条均为六个字的铭文之间，也无大的差别，若稍作比较，即可发现仅只是末尾“⿰阝尊”“彝”二字的位置相互颠倒而已。

那么，在这些重要的铜器铭文中，“潶伯”二字的含义是什么？“潶”是否确属《禹贡》雍州西界黑水？

顾野王《玉篇·水部》云：“潶，呼得切，水。”陈彭年《广韵·德韵》云：“潶，水名，在雍州。”伍德煦等同志在《灵台出土铜器铭文考释》（未刊稿）中指出：“潶即黑，亦即黑水。”“潶伯即黑水之伯，为黑水地区之统治者，以其濒黑水，故字类化加水作潶。”[30]魏怀珩、伍德煦同志在对上述铭文进行研究后指出：“估计‘潶伯’可能是此墓的主人。”还指出：“现在横贯灵台县境的达溪河，据《重修灵台县志》载：‘达溪河即县川之西河，自陕西陇县五马山发源而来，绕县城前而至邠县梁山入泾，邠志谓梁山黑水者即此。’白草坡正临近达溪河，潶伯即葬在这里，则白草坡一带很可能是他的采邑所在。周王把他封在这里，看来是为了加强对密人的监视和镇压。”“潶伯虽不一定是诸侯，从出土的铜器看，至少也是王室重臣，他的地位实际上和诸侯相似。”[31]

从上述文证和物证，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看法：（一）“潶伯”为黑水之伯，是黑水地区的统治者，约在西周初年分封在此，其职守在于监视和镇压当地密人，以维护西周西北部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二）今甘肃灵台县境之达溪河，在西周初年确曾以黑水为名。至于“潶”即今达溪河是否确属成书于春秋末期的《禹贡》雍州西界黑水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古代疆域地理变迁的有关资料中找到答案。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这条材料，虽然意在说明春秋时期晋、齐、楚、秦四国的大致疆

域范围，可是，它把秦国疆域同“雍州”相联系的做法，却为我们探讨春秋时期雍州西界黑水地理方位以很大启示。“秦因雍州之固”，若从疆域地理变迁角度来说，春秋时期秦国的疆域就是当时的雍州，而雍州即是当时的秦国疆域，二者的地理范围相等同。这也就是说，司马迁所谓“秦因雍州之固”的“雍州”，实际上就是指关中地区。以此说来，把历史上的“黑水”、今灵台县境的达溪河断定为《禹贡》雍州西界是确当的。

《周礼·职方氏》载：“正西曰雍州：其山曰岳，薮曰弦蒲，川曰泾、汧，其浸曰渭、洛；其利玉、石。”[32]颜师古对此注释道，岳“即吴岳也”（吴岳即吴山，亦即今陇山）；弦蒲“在汧县”；“泔在豳地”；“洛即漆、沮也，在冯翊[33]”。《周礼注疏》对颜氏尚未注释的“利”作了如下注疏：“雍州云，其利玉石，蓝田见有玉山，出玉石，以为利者也。”[34]那么，以上正文和注疏能说明什么问题呢？笔者以为，它说明《职方氏》雍州范围内的“山”“薮”“川”“浸”等的地理位置和“玉、石”的产地均在历史上的关中地区之内。换句话说，《周礼·职方氏》雍州的范围是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说雍州范围基本一致。很清楚，《周礼·职方氏》上述记载，从疆域地理学方面同样为我们断定今灵台县境达溪河是《禹贡》雍州西界黑水提供了一个佐证。

另外，泾水上游的其他一些支流，在历史上和现在，也有以“黑水”为名的[35]。可是，在《元和郡县图志》及其以前的文献中，这些泾水支流均未以“黑水”见称。可见这些“黑水”得名都很晚，因而达溪河以外的泾水其他支流也不可能成为《禹贡》雍州西界黑水。

**四、陇山以西诸黑水均非《禹贡》雍州西界黑水**

在历史上，位于陇山以西的中国西北地区，有若干条河流曾被称为“黑水”，并被认定为《禹贡》雍州西界，现今有一部分学者仍持这种观点。可是，事实上陇山以西中国西北地区诸黑水，均非《禹贡》雍州西界黑水。

《禹贡》本身，三处载有黑水：梁州章为“华阳、黑水惟梁州”；雍州章为“黑水、西河惟雍州”；导水章为“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那么，《禹贡》所载黑水，究竟是几条？是一条？两条？还是三条？这个问题，在历

史上说法同样很分歧[36]。

笔者认为,《禹贡》黑水,既不是一条,也不是三条,而是两条:一条是梁州章黑水,另一条是雍州章和导水章黑水。梁州章黑水位于华阳之西[37],而不在陇山以西。根据当地地理条件,梁州章黑水,不可能成为雍州西界。至于雍州章和导水章黑水是同一条黑水的问题,这是特别需要搞清楚的。

雍州西界黑水,前已论定其为今甘肃灵台县境之达溪河,这里不再重述。导水章黑水,古代不少注家认定在陇山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区。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笔者以为,这个问题一旦搞清楚导水章黑水的得名时代,就能得到完满回答。根据河西走廊的地理条件、在传说中的禹的时代,当地根本不可能洪水成灾,禹在当时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跋涉到那里去导水,更没有为那里的河流命名的必要性。后至《禹贡》成书的春秋末期,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对河西走廊及其以西地区的地理条件仍不甚了解,在那样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对远在河西走廊的河流确定名称,所以也就谈不上载入《禹贡》了。既然如此,那么河西走廊黑水究竟得名于何时呢?我们认为,它的得名时代应该是同当地其他绝大多数汉语地名的得名时代相一致。历史上河西走廊地名中,除祁连山名称外[38],几乎都是汉武帝败匈奴、设四郡、通西域时或此后命名、而黑水的得名也绝无例外。

鉴于以上原因,早在春秋末,《禹贡》作者笔下的导水章黑水,必不在河西走廊地区,而倒是极有可能在中原华夏农业民族与西北游牧民族活动区的交界地带。《禹贡》出自孔子之手、成书于春秋末期,这一时期中国西北方的农牧分界线大致在陇山地区。根据这点判断,导水章黑水的地理方位与雍州章黑水的地理方位有着明显的一致性。依据上述分析,导水章黑水和雍州章黑水不是两条水,而是一条水。唐代樊绰也曾指出:《禹贡》虽"三言黑水",但事实上"雍州及导川之黑水一也,梁州黑水又一也"[39]。以此说来,雍州章黑水的地理方位,也就是导水章黑水的地理方位。到了秦汉以后,有人才开始把《禹贡》雍州章和导水章黑水的地理

方位搬往河西走廊，并提出雍州和梁州西部黑水共界说。本来，汉武帝以后河西走廊黑水同《禹贡》雍州章和导水章黑水就没有什么事实上的联系，这不仅在于上述黑水同其名、异其地，而且得名时代也相差甚远。后来之所以变成这种情况，那完全是古代文人学者任意附会汉武帝以后中国一些统一王朝开拓西北疆域历史的结果。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黑水出张掖鸡山，南流经敦煌，过三危山，又南入南海。"[40] 颜师古注《汉书·理理志》时也沿袭了郦道元的说法。郦、颜二氏之说，很明显是拘泥于《禹贡》导水章"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的说法[41]。郦、颜二氏注文，除增加所谓黑水流经地区的"敦煌"一地名外，其余同导水章文字无大的区别。显然，郦、颜二氏都是把《禹贡》梁州、雍州和导水三章黑水释为一条，这条黑水发源于河西走廊的张掖鸡山，由北向南，纵贯中国西部地区，流经敦煌、三危山，最后流入南海即今印度洋。然而在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并未存在过这样一条纵贯南北、既是雍州西界又是梁州西界的黑水。就中国西部地区具体地理条件而言，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样一条河流。因为北起张掖，南至南海，二地之间横亘有祁连山脉和巴颜喀拉山脉，黑水根本无法通过。如果真有这样一条黑水，那它势必与夹在祁连、巴颜喀拉二山脉之间的黄河相交错，但历史上也并未存在过这样的河流。从此看来，黑水纵贯南北说不可信，而雍、梁二州西部黑水共界说也不能成立[42]。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由于郦、颜二氏对《禹贡》黑水的解释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所以他们笔下的黑水也同现存的中国西部水系的方位与流向大相径庭。仅就河西走廊地区水系来看，张掖地区的黑水，本发源于祁连山腹地，由东南向西北流经山丹、张掖，再向西北流入古居延泽，根本没有向南流经敦煌，也未过三危山。又如，今敦煌和三危山地区的河流流向，也与郦、颜二氏所说黑水大不相同。现这一地区河流，均发源于今青海省西北部，也从东南向西北流入今敦煌、安西县地，同样无向南流去的河流。这也说明，郦、颜二氏《禹贡》黑水纵贯南北说不可信，所以也谈不上作雍州西界了。

清俞正燮《癸巳类稿》说，唐李泰《括地志》：黑水"出伊吾县北百二

十里，东南流，绝三危山二千余里，至鄯州，又东南四百余里至河州入黄河”[43]。清末李慎儒《禹贡易知编》说：“唐魏王泰《括地泰》：‘黑水出伊州伊吾县北，东南流至鄯州，又东南至河州入黄河。’今此水上源为沙所壅塞，无可考，下流即大通河，历西宁府东边，南至河州入黄河，与《括地志》相合。”[44] 经查考《汉唐地理书钞·魏王泰括地志》，发现其载文虽与上述俞、李二氏所说有所不同[45]，但也表明，它同样是把今新疆东北部的伊吾（即哈密）黑水和和河湟地区的大通河认定为《禹贡》雍州西界黑水的。然而这一说法也是不可信的。这不只因为此说晚出，而且还同这一时代的其他有关记载截然不同。如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指出，伊吾属“《禹贡》九州之外，古戎地[46]”。在《禹贡》成书的春秋末期，中原华夏族疆域与西北戎、狄等古代少数民族的活动区域之间的分界尚在汧陇之地。伊吾黑水为雍州西界说明显有附会汉唐王朝开拓西北疆域历史的痕迹。至于伊吾黑水潜流二千余里重源鄯州说更不能成立。大通河流域，古代为西戎地，“春秋及秦、汉为羌胡所居[47]”，在西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置金城郡之前，大通河中下游地区已入汉朝疆域。历史上，虽有古人把置金城郡之前的大通河流域认定为“《禹贡》雍州之域”[48]，但实际上也是对汉武帝时期历史的附会。

考稽史书，甚至还有人认为，远在葱岭地区的叶尔羌河是《禹贡》雍州西界黑水[49]。这种说法更不可信。因为这种说法，同《禹贡》成书时代的中国疆域变迁毫不相干。无可否认，这种说法也是古代文人学者为了按照古代经义任意附会历史的一个例证，其目的只不过在于褒扬汉武帝及其以后一些帝王的文治武功罢了。

至于《穆天子传》所载有关黑水，也不可能成为《禹贡》雍州西界黑水。这除了《穆天子传》本身系伪作外，同时周穆王西征这一事件也是古代人依托出来的。如黄文弼先生在论及《穆天子传》所记见西王母事时说：“《穆天子传》所记见西王母事，乃战国时人追述秦穆公时，或以后时事，而依托于周穆王也。”[50] 黄文弼先生又转述法国沙畹的话说：“往朝西王母者非周穆王，实为秦穆公也。”[51] 足见，《穆天子传》所载陇山以西所

谓黑水也不可能成为《禹贡》雍州西界黑水。

总之，以古代文献资料和地下发掘实物资料为据，通过对中国古代疆域变迁的研究，使我们对《禹贡》雍州西界黑水及其地理方位问题有了崭新的认识和了解。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今甘肃灵台县境之达溪河是《禹贡》雍州西界黑水，而春秋时代的关中地区为《禹贡》雍州之域。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同样可以断定，今陇山以西甘肃、青海、新疆境内以至葱岭以西诸黑水，均非《禹贡》雍州西界黑水；而今灵台县达溪河一带以北、陇山以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亦不属《禹贡》雍州之域；古代众多史籍所载今陇山以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为"禹贡雍州之域"实属谬误。

**注释：**

①如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说："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互会，颇失其真。后之学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谬论，莫能寻其根本。"

②《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版，第594页。

③《尔雅注疏·释水》《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19页。

④《汉书·地理志》上。

⑤《水经注》卷八。据颜师古《汉书·地理志》注，"维"应为"弦"，"絃"亦为"弦"。

⑥《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360页。

⑦李慎儒：《禹贡易知编》卷九《雍州》，第1页。

⑧应劭注：《汉书·地理志》上。

⑨《晋书·地理志》上。

⑩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五《陕西四》。

⑪《晋书·地理志》上。

⑫李慎儒：《禹贡易知编》卷九《雍州》，第1页。

⑬《史记·秦始皇本纪》。

⑭《晋书·地理志》上。

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三《陕西二》。

⑯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二《陕西一》。

⑰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说,雍州"东距西河。西河即龙门之河也,在冀州西,故曰西河"。颜氏关于龙门附近黄河河段为《禹贡》雍州东界之说,向来被人们所信从,故认定为《禹贡》雍州东界比较确当。

⑱辛树帜:《禹贡新解》,农业出版社 1964 年,第 9 页。

⑲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五《陕西四》:"秦德公元年,初居雍,雍盖秦都也。"万国鼎《中国历史纪年表》:"甲辰 677 周釐王五年秦德公元年。"

⑳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4~6 页。

㉑顾颉刚:《禹贡(全文注释)》,载《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4 页。

㉒顾颉刚:《〈禹贡〉中的昆仑》《历史地理》创刊号。

㉓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4~6 页。

㉔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4~6 页。

㉕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4~6 页。

㉖《史记·秦本纪》。

㉗《史记·匈奴列传》。

㉘《史记·秦始皇本纪》。

㉙《文物》1972 年第 12 期第 8 页附图一三、一四、一七、一八。

㉚伍德煦缪文远彭静中《灵台出土铜器铭文考释》(未刊稿)。经伍德煦先生同意,有关论述在此引证,并予发表。

㉛魏怀珩、伍德煦:《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载《文物》1972 年第 12 期。

㉜转引自《汉书·地理志》上,中华书局 1962 年 6 月版,第 1540~1541 页。《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职方氏》文字与《汉书·地理志》略有不同,但文义完全一致。

㉝《汉书·地理志》上。

㉞《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62页。

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四《陕西三》;卷五七《陕西六》。

㊱李慎儒:《禹贡易知编》卷一一《导水》上,第5~15页。

㊲蔡传"梁州之境,东距华山之南,西距黑水"。转引自《禹贡易知编》卷八《梁州》,第1页。

㊳《史记·匈奴列传》匈奴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读史方舆纪要》:祁连山"甚高广,本名天山,匈奴呼天为祁连也"。《陕西一》卷五二,第2265页。

㊴转引自清俞正燮《癸巳类稿·黑水解》。

㊵转引自李慎儒《禹贡易知编》卷一《导水》上,第6页。现行《水经注》无此段文字,如顾颉刚先生指出:"《水经注》颇有散佚,此文为今本所无。"《历史地理》创刊号,第6页。

㊶《汉书·地理志》上:"黑水出张掖鸡山,西流至敦煌,过三危山,又南流而入于南海。"

㊷顾颉刚:《〈禹贡〉中的昆仑》,载《历史地理》创刊号。

㊸俞正燮:《癸巳类稿·黑水解》:"至敦煌,过三危山,又南流而入于南海。"

㊹李慎儒:《禹贡易知编》卷九《雍州》,第1页。

㊺王谟:《汉唐地理书钞·魏王泰括地志上》:"黑水源出伊吾县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十里而绝。"

㊻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91、1028页。

㊼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91、1028页。

㊽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91、1028页。

㊾《周穆王西征纪程》注云:"黑水,丁谦谓即今叶尔羌河。土人称为喀喇乌苏。喀喇言黑,乌苏言水,即黑水也。"《西北史地》,国立北平师范

大学,第18页注。

㊿黄文弼:《古西王母国考》《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113页。

51黄文弼:《古西王母国考》《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113页。

作者:侯丕勋,1938年出生,男,甘肃康乐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 放马滩地图地名问题研究

雍际春

## 一、“邽丘”溯源与邽县名称的演变

放马滩地图中有“邽丘”一名，竹简《墓主记》中亦有“邽丞”、“邽守”的记载，它们都与邽县有关。前者是邽县治所，后者当是邽县官员的称呼。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这是史料明确记载的中国设县之始。放马滩地图中“邽丘”注记和《墓主记》中“邽丞”“邽守”资料的发现，充分证明了春秋至战国时期邽县存在的历史事实。

邽县之设是秦人势力扩张、控制天水一带的产物，但邽县治地称“邽丘”却与秦人早期历史及其西迁活动密切关联。如前所述，今黄河中下游平原山东、河南一带在春秋战国前后，多以“丘”为地名或城名，而当地乃夏商之际东夷部族的故地。秦人族出东夷，以“少昊苗裔、伯益之后”自居。东夷部族有所谓“九夷”之称，畎夷即其一。人们一般认为秦人先祖即是东夷族中畎夷的一支。按畎夷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其族名又被写作混夷、昆夷、绲夷、犬夷，犬与畎相通，西周春秋时，宋国有“犬丘”，卫国亦有“犬丘”，前者地在今河南永城县，后者位于今山东曹县，此两“犬丘”即是“夏代时畎夷所留下之居址”[①]。夏商之际，商夷联军西进灭夏，畎夷随军西征进入关中，“入居邠岐之间”。今陕西兴平东南之“犬丘”一名，亦为西周时畎夷居地。秦人历史上的第一次西迁，发生于畎夷西征之时，即秦人作为畎夷的一支而迁入西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至商末，秦人首领中潏“在西戎，保西垂”。中潏下传八代至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

马大蕃息”。因此，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属，邑之秦”。秦人从此在天水地区逐步强大起来。非子所居犬丘已非今陕西兴平之犬丘。中潏所居“西垂”与非子所居“犬丘”实乃一地，包括非子所邑之秦，地均在今天水地区。《春秋》：隐公“八年春，宋公卫侯遇于垂”。《左传》解释说：“八年春，齐侯将平宋卫，有会期。宋公以币请于卫，请先相见。卫侯许之，故遇于犬丘。”杜预《集解》注曰：“犬丘，垂也，地有两名。”可知《春秋》之“垂”与《左传》之“犬丘”系一地而两名。因此，天水之“西垂”与“犬丘”地名的出现，是地名随部族活动而迁移的结果，也是秦人入居天水的标志。

由东方之犬丘，到关中之犬丘，再到天水之犬丘，这一地名的由东而西，反映了畎夷、秦人西迁的历史轨迹；也说明“西垂”“犬丘”之名，并非天水原有地名，而是随秦人西迁从东方带来的固有地名。西垂又称犬丘，犬丘又有西犬丘一名，这三个地名实乃一地，学术界已得到公认。西北地区地貌以山地高原为主，地名中少有以“丘”相称者，关中、天水“犬丘”一名的出现，是秦人西迁而带入的外来地名，或者说秦人入居天水后，对城、邑之名，仍保留了其在东方以“丘”相称的习惯，所以，当秦武公伐邽戎设邽县时，很自然地将邽县城治以“邽丘”相称，邽丘也就是邽城。所以，邽县治地以“邽丘”相称，并非出自偶然，亦非邽县治所建在小土山上，“邽丘”一名的真正来源与秦人早期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隐含着秦人部族经历、部族活动的种种信息；是秦人西迁后，在地名命名上仍保留东方语言习惯的反映，也是其西迁历史的一种曲折体现，是商周时期东方人以“丘”命名城邑居地的孑遗。

邽县约在战国以后改称上邽县。《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有上邽县，注曰：“史记故邽戎邑也。”陈直先生《汉书新证》：“善斋吉金录玺印中二页，有‘邽印’，当为秦代制作，盖秦代只称邽县，不称上邽。”[②]《史记·秦本纪》所载只称伐邽戎后“初县之”，按理在邽戎故地设县应为“邽县”，“邽印”的发现印证了这一点。放马滩地图是战国末年的作品，地图中邽只称“邽丘”，《墓主记》中也只称“邽丞”“邽守”，更进一步验证了战国末年以前邽县不称上邽县。西汉京兆尹有下邽县，《汉书·地理志》注云：

“应劭曰:秦武公伐邽戎,置有上邽,故加下。师古曰:取邽戎之人而来为此县。”下邽县也是秦时设县[③]。但史料中未见颜师古所谓“取邽戎之人而来为此县”的任何记载,不知何据?秦汉之际,周勃曾“破西丞,攻上邽”[④]。则知西汉之前邽县已改称上邽县。

上邽县西汉时属陇西郡,东汉时归汉阳郡。汉阳郡西汉时称天水郡,系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析陇西郡所置,郡治平襄(今甘肃通渭县西),东汉改治冀县(今甘肃甘谷县)。西晋又改汉阳为天水郡,泰始五年(269年)初置秦州,治冀城(今甘肃甘谷县)。太康三年(282年)罢秦州,七年复置秦州,秦州州治及天水郡治俱由冀城迁至上邽城。从此,上邽基本上一直为州、郡治所而成为天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其政区沿革与治地却时有变迁。北魏时,为避道武帝拓跋珪讳而改上邽县为上封县,后又废县为镇[⑤]。隋大业元年复为上邽县,属天水郡。唐开元二十二年因地震州治由上邽迁往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叶堡乡),天宝元年复还旧治,不久为吐蕃占据。大中三年,唐收复秦州等地,上邽又一次废县为镇,秦州及天水郡仍迁治成纪。北宋雍熙年间之后,秦州、天水郡、成纪县治所均由成纪(今秦安县)迁来上邽,但上邽县一名再未恢复,而代之以成纪县相称。此后,成纪、天水、秦州诸名迭相为用,“上邽”一名反而从此消失,成为历史地名。

**二、上邽县治地诸说辨正**

关于上邽县治地,最早见于记载的是郦道元《水经注》:

(渭水)又东过上邽县……渭水又东南出桥亭西,又南得藉水口,水出西山……藉水又东得毛泉谷水,又东径上邽城南……藉水即洋水也。北有濛水注焉,水出县西北邽山,翼带众流,积以成溪,东流南屈,径上邽县故城西,侧城南出上邽,故邽戎国也。秦武公十年伐邽,县之,旧天水郡治。五城相接,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龙出是湖,风雨随之,故汉武帝元鼎三年,改为天水郡。

耤河支流毛泉谷水即今天水市城区南得豹子沟水。濛水即今罗峪河,是耤河支流之一。它自西北向东南穿过天水市城区,南注耤河。北魏时,

今天水城区即有“上邽城”和“上邽故城”。按《水经注》记载，上邽城在豹子沟水注入耤河处的耤河北岸，罗峪河西边，而上邽故城则在罗峪河东岸。无疑《水经注》时代的上邽城就在今天水市城区位置上，“上邽故城”在上邽城之东，亦在今天水市城区，只是上邽城在今城区西部，“上邽故城”位居东部而已。但是，在此后的地志资料中，上邽县治地除了今天水市之外，尚有另外三处：

一是(秦)州东四十里说。《甘肃通志》：

上邽故城，在州东四十里，秦武公十年伐邽戎置县，汉曰上邽县。

《甘肃新通志》：

上邽故城，在州东四十里，秦武公十年伐邽置县，汉曰上邽，属陇西郡。

康熙版《秦州志》：

(秦州)城东四十五里曰邽山，即古上邽县治也，上邽南十五里为街口。

乾隆版《直隶秦州新志》：

上封故城，东四十里，其上有邽山，其外犹有敌台，若削壁然，有子城，城内外多瓦砾，时或掘得金银器。

上述地志均为清代所编，清代秦州治今天水市，上邽故城在秦州东40里，即今天水市北道区治地。

二是(秦)州西南六十里说。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上邽城，在州西六十里，古邽戎邑，秦武公十年伐邽戎置县，即此。汉曰上邽县，属陇西郡。

《大清一统志》：

上邽故城，在州西南，《史记》：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汉曰上邽县，属陇西郡。

此说一在州西，一在州西南，顾祖禹记载可能有误，当为州西南，容后再论。

三是清水县说。《旧唐书·地理志》：

武德四年，置邽州于清水，六年废邽州，以清水来属(秦州)。

《新唐书·地理志》所载与此同。《巩昌府志》：

秦武公伐邽戎，置上邽县，汉武帝更名为清水，属天水郡。隗嚣窃据，筑东西二城，东曰上邽，西曰西城，三国仍上邽。

《甘肃新通志》：

清水县东南三十里亦有邽山，唐武德四年暂立邦州于清水，盖因此山为名。

康熙《清水县志》：

前汉仍上邽，属天水郡，武帝更名清水。

乾隆《清水县志》：

上邽故城，封非子时所筑，在北二里原上，汉文帝时名上邽县。

北宋以来，清水县治未有变动，即治地一直是今清水县所在地。则此说即上邽城也就是今天的清水县城，或即县城北二里李崖村北的古城塬遗址。

上述三说，除第一说外，均为误记。先讨论天水西南再说。顾祖禹以为上邽城在秦州西 60 里，其所谓“州西”当为“州西南”之误。这与唐宋时始设天水县有关。“天水” 一名自汉武帝元鼎三年析陇西郡置天水郡后，曾长期为郡名而延续至唐宋时遂为县名。据《太平寰宇记》记载，秦州天水郡原领县五，北宋新置天水县和大潭县，上邽县被废县为镇，共领县六。该书又云：

秦州天水郡……禄山反，陷入吐蕃，大中三年八月，凤翔节度使李玭收复，今理于成纪县，原在州南一百里，今为雄武军节度使。

天水县，西七十里，管七乡，古县也。秦州记郡前有湖水，冬夏无增减，天水取此名县，唐末废。后唐长兴三年于南治县[镇]界置；县界无山，有水一派，北流入长道县界。

乐史撰《太平寰宇记》时，秦州治所尚在成纪县（今甘肃秦安县叶堡乡），但其对秦州各县方位及相距道里的论述，仍以原上邽城即今天水市为基点。从天水县内河流均“北[南]流入长道县界”一语可知，天水县位于上邽“西七十里”当为“西南七十里”之误。因为唐宋长道县在秦州治所上邽城南方而不在西边。

《方舆胜览》：

天水军……又置天水县，属秦州，徙治成纪而上邽废。唐末复置，石晋时，徙治赤砂川，即今之军治也。皇朝中兴，金陷秦州，分画南北界，而天水县属于我。始拔隶成州，金侵天水，徙治米谷寨，又徙治榆林，又徙兴州平，又以秦州之太平社、陇城之东阿社来属。及和议成，复归于天水。自承平时，议者欲升县为军，以尊表国姓，会兵兴乃寝。及敌骑西来，陕右百城尽陷，惟天水独存，议者以为当升为军。为四川宣抚使安丙奏乞天水县为军，仍置天水县，今领县一，治天水。

《大清一统志》：

天水故城，在州西南。唐初，析上邽置天水县，属秦州。《太平寰宇记》：在州西七十里，古县也，唐末废。后唐长兴三年，于南治镇置。《宋史·地理志》：绍兴初，秦州入于金，分置南北天水县，十三年隶成州。嘉定元年，升为天水军。九年，移于天水县旧治。……《通志》：天水废县，在州西南七十里，又天水军城，在州西南九十里。

《读史方舆纪要》：

成纪废县，今州治。……大中三年又移（秦州）于成纪，宋因之。南宋以后，始移天水军，治天水县。金置秦州于成纪。

《甘肃新通志》及州志等记载均相同，不再征引。唐代时析上邽县始置天水县，北宋至元初，天水县建置屡有变化，治地亦不固定。据上述记载可知，今天水市西南 70 里即为天水县故地，这里为今天水市天水镇所在地，人们习称“小天水”。由于天水县系由唐时上邽县析出，唐之后上邽县建置不复存在，上邽故城亦不以“上邽”相称，故天水城易为人们误当上邽故城，顾祖禹所记当属此例。

至于上邽城治清水一说，纯属误记，证据有二，一是唐初曾在清水县设邽州；二是五代后唐长兴元年清水县治曾侨置于上邽镇（今天水市治地）。后清水县治虽还治本县，但“上邽”一名也随之成为清水县城此后长期俗传的专称。如前引资料及论析可知，唐大中年间秦州收复后，上邽县未予恢复，而是废县为镇，秦州及天水郡治则迁治于成纪县。后

唐长兴元年，清水县侨置于上邽镇。《太平寰宇记》：

清水县……禄山乱，陷入吐蕃。至大中二年始收复，后唐长兴元年移置于上邽镇，即今理所也。

上邽废县……唐天宝末陷入吐蕃，大中初收复为镇，今为清水县理所。

所谓清水县理所移置于上邽镇，即是将清水县治所移至汉唐间所置之上邽县城，而现称为上邽镇。北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始于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而疆域政区沿革以雍熙四年（987 年）为断。则知清水县治自后唐长兴元年迁至上邽镇后，至北宋真宗雍熙年间尚未移回本县。按《读史方舆纪要》：

上邽城……宋省入成纪。

《大清一统志》：

上邽……大中三年收复，为上邽镇，属秦州（时州移治上邽）。五代后唐长兴元年，移清水县于此，宋复置成纪县，及秦州天水郡，雄武军节度，属陕西路。

上邽故城……大中三年，复徙治成纪。……宋志：秦州治成纪县，盖宋初移秦州来治，兼移成纪县于此也。

清水县……五代后唐长兴元年，县移治上邽，宋初还旧治。

秦安县……大中三年，复移州来治。……宋时州县俱移治上邽，此为秦州成纪县地。

成纪故城……城在今县北三十里，宋时移成纪之名于上邽，故县遂废。

从以上资料记载及相互间关系可知，宋初，清水县治从上邽镇还归本县城；秦州和天水郡治所自唐末至宋初一直在成纪县，不久州、郡、县（成纪）治俱迁入上邽镇，自成纪县治迁入上邽，上邽复为州、郡、县治所，但“上邽”一名为“成纪”所取代。于是，自汉唐以来长期沿用的“上邽”“成纪”县名，均从故地消失，而在新迁移地却继续保留了下来。汉唐成纪故县后来又设秦安县并沿用至今；原“成纪”一名则成为原上邽故县在宋

元时的县名;“上邽”一名则随清水县治回归本县而成为清水县城的专称,并为民间口碑相传,至今不改。宋初发生的这一地名变迁与转换,按《太平寰宇记》所载沿革资料,当发生于真宗雍熙年间之后。正是这一地名转换以及转变后地名的存废演变,既造成了相关政区地名沿革演变的混乱,也导致地志资料记载难免存在矛盾及错误之处。因而,“上邽”县治所在清水县说不足为信。

**三、邽丘、上邽治地的确定**

上邽城治秦州西南说与“清水说”均不可信。那么,其余两说即今天水市说和州东40里说是否可信呢?如前所论,上邽城自北魏至唐末治今天水市城区当属无疑;而且,在北魏之前,还有一段时间上邽城仍治今天水市城区。因为《水经注》除记有“上邽城”外,又有“上邽故城”一说,无疑为北魏以前即已存在的上邽城。此“故城”始建于何时,史无明文记载,但三国时代的上邽城却与此“故城”不在同一位置,亦即此“故城”当为三国以后的上邽城。三国时代及以前的上邽城就是“州东40里说”所指的上邽城,其位置就是今天水市北道区治地。为了便于区别,我们姑且将治地北道区的上邽城称为“上邽古城”,而将治地在今天水市城区的上邽城称为“上邽城”。

州东40里之上邽古城,应是自秦武公始设邽县,至秦汉时邽县改称上邽县的城治所在。这一最早的上邽古城,史籍中虽然没有留下其治地何在的明确记载,但在《三国志》《晋书》等正史中,却留下了一条至今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有关魏蜀争夺上邽古城的间接史料。虽然这仅是一条间接史料,但据魏蜀双方争夺上邽时的攻守形势、进军路线和据守地点分析,即可清楚地确定上邽古城的具体位置在今天水市之东40里的北道区所在地。

三国时期,魏蜀曾长期在陇右天水一带交战争锋,三国末年蜀汉延熙十八年(255年),姜维与曹魏雍州刺史王经激战于今洮河之西,魏军大败,史称:

(王)经众死者数万人,经退保狄道城,维围之。魏征西将军陈泰进

兵解围。维却往钟题。十九年春，维……与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誓不至，故维为魏大将邓艾所破于段谷，星散流离，死者其众[6]。

这次交战，史称“洮西之役”。狄道今为甘肃临洮，钟题位于今临洮县南洮河西岸。其时，双方在狄道、陇西（今甘肃陇西县南）、南安（今甘肃陇西县东南）、祁山（今甘肃礼县东）一线形成对峙。此线东北曹魏占有，此线西南蜀汉控制。洮西之役后，魏将邓艾分析双方力量对比和战守形势时认为：“洮西之败非小失也……彼有乘胜之势，我有虚弱之实一也；彼上下相习，五兵犀利，我将易兵新，器杖未复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陆军，劳逸不同三也；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各当有守，彼专为一，我分为四四也；彼南安、陇西因食羌谷，若趣祁山，麦熟千顷，为之悬饵五也。”[7]因而，魏军坚兵据守，以逸待劳，与姜维周旋。

当时，上邽为军事重镇，由曹魏所据。如陈泰于洮西之役解狄道之围后，曾“慰劳将士，前后遣还，更差城守，并治城垒，还屯上邽”[8]。邓艾解狄道之围后，亦曾“留屯上邽”，率领将士推行“区种之法”，屯田足食[9]。可知上邽乃曹魏经营陇右之大本营，自然它也是蜀汉必欲占有的要害。

洮河之役后，姜维欲乘胜东袭祁山，得知邓艾已有防备，且坚守不出，无机可乘。遂又从董亭至南安，在武城山双方形成对峙。姜维又夜渡渭河，向东奔袭上邽城，被邓艾大破于段谷。据载：

“（姜维）闻（邓）艾已有备，乃回，从董亭趣南安，艾据武城山以相持。维与艾争险不克，其夜渡渭东行，缘山趣上邽，艾与战于段谷，大破之。”[10]

董亭位于今甘肃武山县南部，武城山亦在今武山县西南。董亭与武城山前者偏东南，后者偏西北，俱在今渭河以南甘肃武山县南部。这条史料对蜀军的出兵地点、行军路线和方向都有明确交代，可知这次姜维奔袭上邽的进军路线是双方先在董亭、武城山南北间对峙争险，相持不下。然后姜维遂绕过魏军，北上偷渡渭河，沿渭北山地径向东进上邽，与邓艾在段谷相遇，姜维大败。蜀军是东行攻上邽，魏军自然只能出上邽西向阻击，双方激战于段谷。按魏军据守上邽和蜀兵东攻上邽的各自位

置与行军方向分析，上邽城在段谷之东，故蜀军未及上邽城，即在段谷为邓艾所败。据此，只要找到段谷的位置所在，上邽古城的方位与治地也就可以落实。

据《水经注》记载，耤水流经上邽城，“濛水”即罗峪河汇入耤水后，又东“得阳谷水，又东得宕谷水，并自南山北入于耤。耤水又东，合段谷水，水出西南马门溪，东北流，合耤水。耤水又东入于渭”。阳谷、宕谷二水，即是今龙王沟、沙垅水二小河[11]，均在今天水市城区以东，耤水再东流，段谷水自南入耤，它是耤水水系中注入耤水的最后一条支流。可知，段谷水位于北魏上邽城以东不远。《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

上邽县……段谷水，源出县东南山下。蜀将姜维，为邓艾破于段谷，星散流离，即此谷也。

由此可知，段谷水出自段谷，段谷即姜维与邓艾交战处，其位置在晋唐间上邽城东南。唐代段谷水又称“段谷泉”[12]，至清代，段谷水又名“段溪”，俗称“淮河峪水”，且三名混用。乾隆《秦州直隶新志·山水》：耤水“又东，淮河峪水自南入焉，疑即古段溪也”。《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前者称该水为段谷水，后则称段溪水。其所载内容与州志一致。

段谷水明清时称淮河峪水，今称罗家沟河，它源于天水市秦城区东南太阳山北麓，北流侧北道区二十里铺之西，然后入耤水。耤水再东流约10余华里即注入渭水。淮河峪水即罗家沟水为耤水下游最后一条支流，其流向与方位均与《水经注》所载段谷位置吻合。罗家沟入耤水处，正在今天水市与北道区治地的正中，两城分别相距20里处即是罗家沟河。

段谷水即今罗家沟河，与北道区治地相距20华里，则古上邽城与段谷相距不远，且段谷在西，古上邽城居东。这与姜维在今天水市武山县夜行渡渭，自渭北山地东进攻上邽，未及上邽城即被邓艾所败的方位均相符。如果《水经注》所载之上邽城，即晋唐间上邽城与三国时的上邽城治地相同，则姜维由西向东行军，就会先至上邽，再至其东的段谷，这显然与《三国志》所载段谷与上邽的位置和方位不符。且今天水市在渭河以南耤河谷地，而北道区位于渭河北岸阶地。姜维攻上邽，其进攻路

线不是直接由渭河之南的董亭沿近道径向东行，而是渡渭自渭河北岸东行，不惜绕道行军，也证明当时的古上邽城不在天水市而在北道区。至此，我们可以肯定，上邽县自设县至唐末县废，其城治前后有迁移，迁移时间当在魏晋之间。从秦武公设邽县，至秦汉时的上邽县，其城治在今天水市北道区所在地，前后历时约长达近千年之久；而自晋至唐之上邽城，治今天水市，历时亦有700余年。

上邽城由今北道区迁往天水市，既不见于《晋书》等史乘，亦不为唐宋以来地志资料见载，可能与漏记有关。从情理上讲，西晋泰始、太康年间设立秦州，并将秦州与天水郡治所均由冀城搬往上邽，上邽新城即治于今天水市，很可能就是在州郡治所改置时，重新选址而兴建的。史料、地志中所说的上邽城，大都是晋唐间的上邽城，而此前治今北道区的上邽故城治地，几乎无所记载，然其故城总有遗迹可寻，甚或其名在民间闾巷口碑相传，故在明清地方志中反而保存了对这一古城的记载，才不致使这一千年故城湮没无闻。而1986年发现的放马滩地图资料中，“邽丘”一名的重现和城治方位的标示，又为我们复原其准确位置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三国志》间接史料与放马滩地图中“邽丘”的位置，可以互证古上邽城的存在及其准确位置。

按第三章对放马滩地图水系地域的复原，“邽丘”位置在渭河北岸第一条支流即牛头河以西，渭河南岸第二条支流今耤河汇入渭河以下下段的渭河北岸，渭河北岸第二条支流今寺下河入渭至纳入耤水段的渭河东岸与寺下河以南之间的正中。按图上所绘，“邽丘”注记的方框与寺下河源头相连，而寺下河的流向亦与原图稍有出入，可知，地图与注记均有随意和不确切因素的存在。原图上“邽丘”注记距渭河北岸稍远，但这一带除渭河谷地较为平坦开阔之外，谷地之北即是黄土山地丘陵，不宜建城。因而，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存在，“邽丘”位置就只能设于渭河北岸阶地今北道区所在地。所以，原图所绘“邽丘”方位，与三国时代及其以前邽县（上邽）之城址完全一致。两相印证，古上邽城治地即是今北道区所在地，确切无疑。

至此，邽丘、邽县、上邽县之渊源、演变及其治地均已清楚，总结如下：

“丘”在先秦时代不仅指自然形成的小土山，而且也是经人工加筑的一种适于人类居住的“居丘”或台地，它的进一步发展就产生了中国取早的“城”。黄河中下游山东、河南等地东夷族人居地多有以“丘”相称的地名。秦人族出东夷，夏商之际随畎夷西迁至关中、天水，犬丘一名由东方而至关中再至天水，反映了秦人西迁过程中地名随之迁移的史实。天水境内西垂、犬丘、西犬丘诸名都是随秦人入居而从东方移植的名称，表明秦人在天水仍保留了东方地名命名的传统。邽县设立之后，在邽戎居地上兴起的县城，自然也就遵从东方地名命名的传统，以“丘”相称。邽县约在秦统一后改称上邽县，直至唐末，上邽作为县名和城名的历史被成纪、天水所取代。这期间，上邽县城治曾有迁移。秦自创设邽县至三国时代，邽县、上邽县治地不在今天水市，而在其东 40 里的今天水市北道区所在地，我们称其为古上邽城。三国以后至唐末，上邽城治地在今天水市。上邽城西迁至今天水市，可能与西晋将秦州、天水郡治迁至上邽有关。

**四、西垂、犬丘、西犬丘与西县考**

在放马滩地图中虽然没有西垂、犬丘、西犬丘与西县等名称与注记，但其所在地域均在地图绘制范围之内。何双全先生曾专门论及上述地名，认为秦自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后，秦在天水的辖地曾数易其名，有犬丘、西戎、西、西垂、西垂宫、邽县，加上地图中的“邽丘”，先后有 7 种称谓，实际指三处治所，即犬丘、西垂宫、邽县，它们分别为三个历史时期所建的城邑，即秦亭所在地；西垂宫是西周末春秋初期所建，最早为秦仲所居。前 756 年，文公住西垂，前 762 年正式修筑了城邑，史称西垂宫。位置在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邽县是春秋中期秦武公伐邽戎后所建。

上述观点，除邽县之外，多有不确。首先，所谓秦人在天水的辖地曾数易其名，先后有 7 种称谓就不准确，西戎乃是包括天水地区在内的西北地区的土著民族的通称，而非地名，这为学界所公认，无须赘述。其次，

将犬丘与秦亭等同，认为是一地，显误，容后详辨。第三，误将西垂宫作城邑，且认为犬丘与西垂不在一地，也是错误的。本节专就第三点作一考辨。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首领从中潏开始，“在西戎，保西垂”；至非子时“居犬丘”；而庄公进封西垂大夫，则“居其故西犬丘”；秦文公即为，又“居西垂宫”。西垂——犬丘——西犬丘，这是秦人在天水地区除了秦邑之外，三百多年间世居之地和国都所在。

这些地名是同地异名还是名异地亦不同呢？古今学者对此多有所论，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近人的考证来说，王国维先生最早对西垂、犬丘和西犬丘的关系作了辨析，认为“犬丘、西垂本一地，自庄公居犬丘号西垂大夫，后人因名西犬丘为西垂耳”[13]。徐中舒先生主张今天水西南的犬丘和陕西兴平的犬丘，秦人都曾居住过，是地名随部族而迁移的反映；天水西南的犬丘，又称西垂，也就是《史记集解》中引徐广所说的秦亭[14]。高亨先生认为秦庄公所居之犬丘，即今陕西兴平县东南的槐里城[15]。林剑鸣先生主张西垂是泛指西方边陲，而犬丘则指具体固定的地区，是一个较大的地名，其地望相当于秦之陇西郡，汉代又从陇西郡分出天水郡，所以，犬丘就在今天水境内[16]。段连勤先生肯定秦人自中潏至非子八代世居犬丘，犬丘即西垂，地在今天水西南[17]。何清谷先生认为庄公封为西垂大夫，则“西垂大夫应是以今甘肃天水市一带为食邑，治所在西犬丘，所以西犬丘又名西垂”[18]。杨东晨先生主张中潏所居西垂是今宝鸡以西地区，周初秦人遭到西周打击，迁往更西的天水地区，西垂一名也随之西移到天水地区，他们地居犬丘，为与陕西兴平的犬丘相区别，故称西犬丘[19]。类似以上这样的见解和争论还有不少。

学者们的争论虽然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犬丘、西犬丘与西垂同为一地。但要确定西垂即犬丘的具体地理位置，首先要辨明西垂属泛指天水地区还是天水地区境内的一个具体地名，以及西犬丘与关中犬丘的关系。我们认为西垂、犬丘与西犬丘是同一地名，且有具体地望；而西垂宫则是秦人建国后所修的宫殿名，襄公始国以西垂为都，西

垂宫自然也在这里。

《史记》除了《秦本纪》记载秦先祖居西垂之外，还在《秦始皇本纪》和《封禅书》两篇中，也有关于西垂的记载。前者说："至周之衰，秦人兴邑于西垂。"后者又说："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这清楚地表明西垂不是泛指区域或方位，而是有确切位置的地名。祝忠熹研究认为，周代凡说到大夫，如冠以地名的话，一般均是具体城邑，很少见有言地域方位的例子。上古记史笔法虽略，但极其重视部族活动的中心居邑，记载某王某君登位，必说他"居"在某处，可以有缺载，但凡言及居地的均系具体城邑，决无泛指[20]。这一观点很有道理。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篇末根据《秦纪》资料，附有秦襄公以来历代君主在位顺序及所发生的大事，亦有各位君主的居地和葬地。如春秋时期的秦国十七公中，注明居地的有十一公，而葬地则全部注明，这些居地和葬地都是具体地点，则其中的西垂、西垂宫自然不会例外，是具体地名无疑。

西垂不仅是具体地名，与犬丘同为一地，而且这两个名称之间还存在着固定的对应关系。原来"犬丘"和"垂"都是商周以来东夷及中原地区特有的地名，因为东方平原地带地多潮湿，河水经常泛滥，人们多选择"四方高中央下"之地即高而平的丘地居住，所以那里的地名多有丘字。据统计，在《春秋》和《左传》中东方以丘为名的地点多达40多处，如帝丘、商丘、葵丘、贝丘等。西周春秋时期东方的宋国与卫国都有"犬丘"这一地名，宋国犬丘在河南永城，卫国犬丘在今山东曹县，而且犬丘又叫做"垂"。如前所述，犬丘即垂，垂即犬丘，指的都是同一地方。上古时代部族迁移十分频繁，而其族名或原居地的地名随之作为新居住地地名的现象，在古代经常发生。段连勤先生认为秦族本是东方九夷中的畎夷，他们的居地"垂"又称"犬丘"。由山东曹县、河南永城县的犬丘，到陕西兴平、甘肃天水的犬丘，这正是畎夷包括秦人由中国东方迁移至西方所走过的足迹。今陕西兴平的犬丘，秦时称废丘，汉代改称槐里。西周懿王时因避犬戎进攻，还一度从镐京迁都于犬丘。周懿王约与非子之父大骆同时，若大骆、非子父子居今兴平之犬丘，则周懿王就不可能也人居犬

丘为临时国都。所以，今陕西兴平的犬丘，应是秦人在商末中潏入西垂之前，畎夷或秦人曾经居住过而留下的地名。由于秦人入居天水，位于他们一路西迁的最西边，所以便将定居天水的居地仍以“垂”或“犬丘”相称，只是名前又加上表示方位的“西”，而称西垂或西犬丘，以与以前所居住过的“垂”或“犬丘”加以区别。

《史记》记载说秦襄公“居西垂”，又说秦文公“居西垂宫”。这里透露出一个向来为人们所忽视的重要信息：秦襄公位列诸侯而建国时，虽仍以他们世代居住的犬丘为都城，但却进行了一番都城的扩建等一系列与建国相关的建设工作，如修建西畤祭祀远祖少昊即是一例。西垂宫当属开国建设活动的一个重要措施。《秦始皇本纪》说：“至周之衰，秦人兴邑于西垂。”这里所说的“周之衰”，显然是指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一事，而“兴邑于西垂”的秦人首领正是被周平王封为诸侯的秦襄公。所谓“兴邑”，也就是襄公因开国而对犬丘城的增修扩建。襄公立国仅四年即去世，西垂宫至襄公去世时尚未完全竣工，而文公即位后“居西垂宫”，说明在文公即为不久，这座新宫殿就已告竣。文公所居西垂宫，应是秦人因开国的需要而在犬丘城新修的宫殿，这同此后历代秦君继位后而居于都城内某一宫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如秦武公“居平阳封宫”，德公“居雍大郑宫”，宣公“居阳宫”等，都指的是历代秦君居住在都城内的具体宫殿。所以，人们习惯上把西垂宫与西垂、犬丘、西犬丘三名并列，看做是西垂这一地名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呼，显然是一种误解。因此，西垂宫是秦人开国之都西垂或犬丘城内的新修宫殿名，而不是城邑地名，只有西垂、犬丘和西犬丘三名，才是一地而异名的城邑地名。

分清了以上种种关系以后，西垂或犬丘城的具体位置才有可能确定。古人关于西垂位置的记载，都与秦汉时西县有关，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西垂在“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是也”。《史记正义》也认为西垂就是汉代西县。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认为西县城在秦州（今天水市）“西南百二十里，即所谓西犬丘也”。此外，《甘肃通志》《直隶秦州新志》《天水县志》以及王国维《秦公敦跋》、马非百《秦集史》、刘琳《华

阴国志校注》等，都主张西垂即西县，在天水西南一百二十里的观点。这些记载说明，西垂或西犬丘即后来的西县，而西县的具体位置则有天水西南九十里与一百二十里两说。

按西县的设立时间较早，至迟在战国已经设立。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著名秦器秦公簋，1919 年发现于天水西南，该器除了原铭文外，又在器与盖上各有秦汉间凿子各一行，器上刻字为“西元器一斗七升。八奉敦（簋）”10 字；盖上有“西一斗七升太半升、盖”9 字；刻文中的“西”即陇西郡西县。1971 年在湖南岳阳出土的一件战国时戈，上有“西工师曰”的铭文。王辉先生认为是在秦故都西所设的工室制造的。1978 年出土于宝鸡秦墓的“陇西郡戈”，上有“西工宰阉”等铭文，据考是秦昭王二十六年（前 281 年）所造[21]。出土于礼县的战国秦右库工师戈，铭文中也有“西工造”字样。在秦汉封泥资料中，也发现有“西采金印”，该印被认为“当为西县掌冶金（铜）之官”的印章[22]，这些铭文的“西”字即是指西县。李学勤先生《释（不其簋）铭》一文中也认为西是具体地名，即古时叫西垂的地方，也就是秦汉时代陇西郡的西县。秦汉之际，周勃“破西丞”，樊哙“别击西丞白水北”[23]的记载，也指的是西县之丞。这些考古和文献资料充分证明，早在秦汉前的战国时代，西县就已经设立了。

据《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有西县，“西，《禹贡》嶓冢山，西汉所出，南入广汉白水，东南至江州入江。过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莽曰西治”。《后汉书·郡国志》：“西，故属陇西。有嶓冢山，西汉水。”《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也有“嶓冢山在陇西西县，汉水所出也”的记载。上述记载，为确定西县位置提供了方位距离和山水走向，嶓冢山就是今天水市秦城区东南部的齐寿山。西汉水发源于嶓冢山西麓，上游称盐官河，大致由东向西流，在今礼县城以下转而南流，下游转向东南流入嘉陵江。《水经注·漾水注》：

“西汉水又西南，合杨廉川。水出西谷，众川泄流，合成一川，东南流径西县故城北。秦庄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与其大骆犬丘之地，为西垂大夫，亦西垂宫也，王莽之西治矣。”

郦道元这段话不仅明言西县、犬丘、西垂同为一地，而且指出西汉

水支流阳廉川流经“西县故城北”。这条杨廉川今名峁水河，它发源于天水市秦城区西部杨家寺乡芦子滩，呈西北向东南流入礼县东北部，注入西汉水上游盐关河。王国维曾说：“使西垂而系地名，则郦说无以易矣[28]。”康世荣先生经实地考察认为，犬丘（西垂）就位于今礼县红河岳家庄、费家庄一带。因为峁水河上源杨家寺一带分别有 10 条支流左右汇聚，中游的最大支流花石水，是由 7 条小流汇聚而成。峁水河的正流与支流花石水两水均为南流河，交汇于今红河镇东南，费家庄正北、六八图村西南，形成一广阔的三角形平缓地带。岳家庄、费家庄不仅是“众川泄流”，合成一川的水系，也符合“东流径西县故城北”的方位，两岸山势变得窄狭，直至石沟门。如果在岳家庄前面狭窄处筑堤堵水，峁水河即可倒流入庄，更符合东汉初吴汉、岑彭包围隗嚣“壅水灌西城”的地形[29]。康世荣先生的分析与《水经注》的记载是吻合的。祝忠熹先生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水经注》对西汉水上游盐关河支流汇入顺序与沿途地名的记载有错乱，并举例说上文言西县故城在西汉水支流杨廉川经域，下文又说西县故城即是西汉水主流盐关河所经的始昌县故城。而且，《水经注》应先介绍位处上流的祁山，却先介绍了祁山之西的建安水（今西和河）。由此认为《水经注》对西汉水这一段落的记载，“郦氏把握得并不十分准确”。祝先生经过大量的分析和旁证，最后认为在今礼县永兴附近，西汉水“又西经南岭、北岭中，上下有二城相对”，这二城，即是东汉初西城与附近的姊妹城“戎丘”的位置，因而，西县城即西垂应在今礼县永兴和长道附近[30]。

实际上，祝先生的论证和结论大有商榷之处。首先，西县城与戎丘城《水经注》有明确记载，都在西汉水支流杨廉川。其次，《水经注》虽在建安水后才介绍祁山，但这里只是对建安水汇入西汉水处之北形胜的总括介绍；而在记述建安水之前的上文，郦道元已按西汉水流向顺序记述了祁山：西汉水“又西南，兰皋水出西北五交谷，东南历祁山军，东南入汉水”。很清楚，祁山军即祁山，是按军事设置而介绍的，而建安水后所说的祁山是将西汉水北岸作为地貌介绍的。郦道元对祁山与建安水的论述顺序并未错乱。祝先生立论的实际根据是以近年礼县发现秦公墓的大堡子山为

坐标，将《水经注》所论杨廉川的西城与戎丘城搬到大堡子山附近的永兴和长道。这种结论虽然将秦公墓葬与西垂位置联系了起来，但毕竟以大胆的推测来落实尚未发现遗址的西垂城址，既无力否定《水经注》的记载，方法也是欠科学的。

大堡子山秦公墓地位于礼县永兴乡西边的平泉与文家之间，按古代君王墓葬多在都城附近的惯例，西垂位置可能在秦公墓地的附近，但这“附近”的范围应该有多大，距离有多远，恐难有确切的标准，按《水经注》所载西县所在的杨廉川（今峪山河）与永兴县的直线距离约在 40 华里，也不能说这个距离就一定在都城的“附近”以外。今礼县至天水一带，都曾是秦人长期活动的范围，只不过《水经注》记载的杨廉川谷地略显狭窄而已，正如徐卫民先生指出的，就地形地貌来看，作为都城而言，红河（峪水河）谷地没有今盐关上下的西汉川一带优越[27]。因此，史籍中关于西县城又是后来始昌城的记载就值得重视。

西县经秦、西汉后，西晋时“改置始昌县而县废”[28]。这是说西晋在原西县城新设始昌县，取代西县一名。《后汉书·隗嚣传》李贤注说：“西，县名，属汉阳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县西南。”《太平寰宇记》也说始昌城就是汉代的西县城，晋省西县而置始昌。按《水经注》的记载，杨廉川水（今峪山河）注入西汉水后，西汉水又西南经始昌峡而至始昌县故城，然而有“宕备水”（今西沟河）自南侧注入而至盐关镇。可见从今峪水河西汉水处至今盐关镇之间的西汉水谷地，正是始昌县城即西县城的大致位置所在。盐关以东正是今天水市秦城区（上邽）的西南方，两点间直线距离约 90 华里，实际公路里程约 120 华里；这里地形开阔，距礼县永兴也只有 30 华里，同时也与郦道元所注西县城的位置不远，郦氏即使注错西县城址，也不至相差到相隔七条河流数十里外的今固城河附近。因此，从方位、里程、地形和史料记载综合分析，西垂即西县城址就是西晋所设的始昌县故城，它的大致方位，确定在今礼县盐关镇以东，是比较可靠的。

**注释：**

①段连勤：《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族属问题》，载《人文杂志》1982年增刊《先秦史论文集》。

②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二版，第212页。

③史念海：《秦县考》，载《禹贡》第七卷第6、7期合刊。

④《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

⑤《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九《陇右道上》。

⑥《三国志》卷四四《蜀志·姜维传》。

⑦《三国志》卷二八《魏志·邓艾传》。

⑧《三国志》卷二二《魏志·陈泰传》。

⑨《晋书》卷四八《段灼传》。

⑩《三国志》卷二八《魏志·邓艾传》。

⑪光绪版《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一《沿革·山水》。

⑫《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

⑬王国维：《秦郡邑考》，《观堂集林》卷一二。

⑭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207页。

⑮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⑯林剑峰：《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33~34页。

⑰段连勤：《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族属问题》，载《人文杂志》1982《先秦史论文集》。

⑱何清谷：《嬴秦族西迁考》，载《秦文化论丛》第1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⑲杨东晨：《史记论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页。

⑳祝忠熹：《秦人早期都邑考》，载《陇右文博》1996年第1期。

㉑刘占成：《"陕西郡戈"考》，载《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4期。

㉒周晓陆：《西安出土秦封泥补续》，载《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

㉓《史记》卷五七《周勃世家》，卷九五《樊哙传》。

㉔王国维：《秦郡邑考》，《观堂集林》卷一二。

㉕康世荣:《礼县红河——秦先祖的发祥地》,载《礼县文史资料》第1辑。

㉖祝忠熹:《秦人早期都邑考》,载《陇右文博》1996年第1期。

㉗徐卫民:《天水附近秦都城考论》,载《天水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㉘《大清一统志》卷二七五。

作者:雍际春,1961年出生,男,甘肃清水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历史系教授。

# 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

张维华

汉河西四郡，原为月氏乌孙及西羌等部落杂处之地，其后匈奴势力日渐强大，取月氏乌孙之地而有之，南据祁连以与西羌相接，河西之地，始归其所有。武帝即位而后，累年征伐，匈奴顿挫。元狩二年，昆邪王以四万众来降，其故土河西之地，空无人居，其后汉取其地，列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以通西域诸国。此四郡建置之年代，《汉书》所载，前后未尽一致，而后之读史者，亦依违莫知所从。爰就管见所及，推论于后，幸为读史者之一助也。

关于河西四郡建置之年代，《汉书·武帝本纪》与《地理志》各异其说：

**一、《武帝本纪》**

（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

（元鼎六年）秋……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

**二、《地理志》**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

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

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

敦煌郡：武帝后元（下当脱一元字）年分酒泉置。

此《本纪》以武威酒泉为元狩二年所开，张掖敦煌为元鼎六年所开；而《地理志》则以张掖酒泉同为太初元年所开，武威为太初四年所开，敦

煌为后元元年所开；是不独开置之年代有异，即其开置先后之次第，亦有所不同。说者或谓《本纪》所载，为各郡初建时之年代，《志》之所载，为郡治城郭初置时之年代，此亦臆想。武威既建于元狩二年，而其地又独居东部，与内地隔河相接，不当郡治城郭之建置，反出张掖酒泉之后。且《志》于敦煌之建置，言于后元元年分酒泉置，明示是年为建郡之始，与郡治城郭之建置，似无涉也。固书记一代典制，时有忽略，州郡建置之年代，即其中之一。网罗一代史实，本非易事，拾遗补阙，乃后学之责，不必尽为前贤讳也。

首论酒泉武威之建置：《本纪》以酒泉武威同建于元狩二年，《地理志》则称酒泉建于太初元年，武威建于太初四年。齐召南主《本纪》之说，而以《地理志》之言为非，云："按《孝武纪》，元狩二年秋，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岂迟至太初四年乎？《志》与《纪》自相矛盾，自应以《纪》为实。"[①] 学人多宗其说。余意酒泉之建，不与武威同时，酒泉之建最先，武威之建最后，《纪》说实不足据。《史记·大宛传》称："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如酒泉与武威果于同时建置，史公决不能略武威不言，而独举酒泉。又《匈奴传》云："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绝胡与羌通之路。"亦不详武威之名。《卫将军骠骑列传》亦同此例，云："最骠骑将军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开河西酒泉之地。"史公记述西域及匈奴事，尚称详瞻，而河西初次建郡，亦一时国家大计所关，岂得有所轻忽！其略武威而不言，必非出于脱漏无疑。固书叙《张骞传》，取《大宛传》说，叙《霍去病传》，取《骠骑传》说，叙《匈奴传》，太始而前、悉取《史记》旧文，其论河西建郡事，亦只言酒泉，而未增武威之名。《西域传序》又明言酒泉之建，与武威、张掖、敦煌异时，云："汉兴，至于孝武，事政四夷，广武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食货志》又言酒泉与张掖并置，亦无武威之名，云："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

初置张掖、酒泉郡。”所云张掖与酒泉同时并置，固不足信，然其无武威之名，亦可足证河西最初建郡之时，武威实不在其列。《史记》既无武威、酒泉并建之文，固书又有异文可为旁证，未可斤斤于《本纪》元狩二年之文，而断言武威酒泉同建于是年也。

然则，酒泉、武威建于何年乎？余意《本纪》与《地理志》之说，均不足据，兹试分别论之：

酒泉之建，《地理志》言在太初元年，为时固属太迟，然《本纪》言在元狩二年，为时亦未免过早。《史记·大宛传》载张骞献结乌孙之策，有此数语：

其明年（元狩二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后二年（元狩四年），汉击走单于于漠北。是后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好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嗛肉蚩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使降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域。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匈奴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

张骞以连乌孙事说汉武，《史记》叙其事在元狩四年之后，推其时，当在元狩五年前后也。此时张骞所见河西地带之情形，为“故浑邪地空无人”。河西之地既空，故欲“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以行其断匈奴右臂之政策。夫元狩五年前后，河西故浑邪王地，尚空无人居，而欲招乌孙以居之，则此时必无建郡设县之事可知。且河西土地辽阔，汉王朝之势力尚未达到，欲裂土建郡，必当大量移民，方能保守其土。然余考昆邪王降汉后，移民之事，固为常有，然均不及河西之地。《史记·匈奴传》称：“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

人，号十万。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是此时所徙关东贫民，乃实之新秦中，即今河套之地，并未徙之河西地带。又《汉书·武帝本纪》云：“（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一年之内，徙民七十二万余口，其数不得谓不大，然亦未及河西之地。如元狩二年果有建郡之事，则移民之政令，即不发动于建郡之先，亦必发动于建郡以后数年之内。元狩三、四两年大量移民，均不及河西之地，则元狩二年建郡之说，实至可疑。

自张骞说武帝语，及元狩间移民之事论之，知元狩二年必无建郡之事，《本纪》之说，殆出之臆想。余考酒泉郡之建，当为元鼎初年之事，后于元狩二年建郡之说凡六七年。《史记·大宛传》叙酒泉建郡事，在张骞出使乌孙归还之后，云：“骞还到，拜为大行，列于九卿，岁余足。……自博望侯骞死后，匈奴闻汉通乌孙，怒欲击之……乌孙乃恐，使使献马。……初天子发易书，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史记》对于酒泉郡建置之年代，虽未言确属何年，然总在张骞自乌孙还，西北交通发展之际，故云：“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张骞拜为大行，《汉书·百官公卿表》列于元鼎二年，则其自乌孙还，便在是年无疑。骞归还后年余，西域诸国，如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置、扜罙等，骞所遣副使以往者，多遣使来朝。《大宛传》云：“其后岁余（骞自乌孙还后），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自此而后，使节往还，岁所常有。故知张骞还后一二年内，西北交通，顿形发展。于此可得而言者：（一）此时乌孙已明白表示不欲东还，在汉廷方面，对于昆邪王之故土，不能再任其废弃而不顾。（二）此时西北之交通线已开，葱岭以西诸国使臣，连续东来，汉廷欲维持此时已开之交通线，并供应外来使臣，亦有在河西建郡之必要。（三）当时汉通西域之愿望甚切，张骞初使乌孙时，即令其“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国”[②]。西域既通之后又多次遣使，

在此种热切愿望情形之下，对于通西域所必经由之河西地带，自不能有所忽视，而不积极经营建置。由此三事论之，知史公叙酒泉郡之开建，在张骞自乌孙归还之后，其言自属可信；而其确实建置之年代，虽不能作肯定之判断，大体论之，总在元鼎二、三年间也。

考酒泉郡之建置，后于昆邪王之归降者凡六七年，其中亦不无原因。元狩二年昆邪王降，匈奴之在河西者，并未完全绝迹，且时思恢复故土。故《大宛传》云："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既有匈奴候者，则知匈奴尚未有放弃此段领土之意；且匈奴外围之地，去此亦必不远，时有受侵袭之可能。汉时中国西部边境，武帝而前，以陇西为极边，逾河而西，便非汉之所有。河西狭长地带，南有羌，北有匈奴，其守不易，非有确实把握，与绝对需要，必不肯轻易在此立郡。此其迟迟建郡原因之一。汉自元朔二年卫青收复河南之地后，汉人之经营力，似集中朔方诸郡，而不暇顾及河西之地。《汉书·武帝本纪》称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朔三年秋，"罢西南夷，城朔方城"。《史记·匈奴传》称浑邪王降后，"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又称卫、霍两将军远击匈奴漠北之后，"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是汉在元朔、元狩中，集中全部力量，以经营新复河南之地，而西北水利之建设，土地之垦发，亦有此大盛。汉既以全部力量经营河南，对于河西之地，自不能同事并顾。此酒泉建郡迟缓原因之二。迨后河南之地经营略定，余力可以转及河西；匈奴亦因汉军北击，远徙漠北（指元狩四年事言），河西所受之威胁解除；而同时西北交通大盛，河西之地与汉王朝关系，转趋密切，故有建郡之事。酒泉郡之不建于元狩二年，而必建于元鼎二、三年间者，乃由当时历史所造成，固书未加深考，以为河西建郡，由于昆邪之来归，遂系于元狩二年，失之远矣。

酒泉建郡之年略定，兹再论武威。武威建郡，《汉书·武帝本纪》亦系于元狩二年，《地理志》系于太初四年，说者亦以《本纪》为是，实则二说均不可据。余考河西初置之郡，只有酒泉，而无武威，已详前文。《通

鉴·汉纪》记孝武元鼎二年事，谓武威自酒泉分置，云："乌孙王既不肯来还，汉乃于浑邪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后又分置武威郡，以绝匈奴与羌通之道。"温公此语，乃据《史记·大宛传》立说。其论酒泉郡之建置，虽稍嫌肯定，然实具卓识。至于言分置武威郡事，则不详所据，恐仍泥于班氏《本纪》之说，而略更换其面目耳。间尝细究武昭时事，深疑武威之建，为时甚后，非在武帝之世，而其置郡，亦不自酒泉分出，乃自张掖分出也。试伸述其义于下：

《汉书》昭帝始元六年《本纪》称金城郡之建置，云："秋七月……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各二县，置金城郡。"是金城郡之建置，为始元六年事。按汉郡国方位，天水、陇西二郡，居金城之东与南，武威一郡，居金城之西与北，而张掖郡又转在武威之西。天水、陇西、金城、武威境地相接，而金城郡居其中央，如武威果建于武帝之时，则始元六年建金城郡时，当云取天水陇西武威各二县，不能逾武威之境，而远在张掖境内，取其二县，使一郡之地，分散各地，不相联属也。《地理志》金城郡有县十三，曰：允吾、浩亹、令居、枝阳、金城、榆中、枹罕、白石、河关、破羌、安夷、允街、临羌。允吾在今甘肃皋兰县境，浩亹在今青海乐都县境，令居在今甘肃永登县境，枝阳亦在永登县境，金城在今皋兰县境，榆中在今甘肃榆中县境，枹罕在今甘肃临夏县境，白石、河关亦俱在临夏县境，破羌在乐都县境，安夷在今青海西宁县境，允街在永登县境，临羌在西宁县境，安夷在今青海西宁县境，允街在永登县境，临羌在西宁县境，核其故土，无一远在张掖者，如昭帝六年《本纪》之文非误载，则所言分张掖二县之地以置金城者，必是指武威东部之地而言；然不名武威而名张掖者，必是其时武威尚未建郡，张掖一郡兼有武威之地也。

上引一段史文，足以证明武威郡之建置，为时甚后之说，兹再就当时中国与匈奴之关系论之，以为坚强此说之根据。考河西四郡之地，今日称之曰甘肃走廊，论其自然形势，酒泉以北，有额济纳河北流入居延泽，地势平坦，水草饶足，匈奴南侵，多出此路。酒泉而东，即张掖郡属，其地界于两山之间，南有祁连，北有龙首，为甘肃走廊最狭窄之地带。龙首平均

高度，据今一般坊间地图所示，为二千公尺至三千公尺，最高处有达三千公尺至四千公尺者。东西蜿蜒，适当张掖一郡之外围。山势既是高峻，穿越自感困难，匈奴骑卒，奔驰不能如意，此一地带非其习常出入之所。张掖而东，为武威郡属，其自然形势，颇与酒泉以北之地形相似，北行河流，有白亭一水，发源南山，北入白亭海。此水流域，虽较额济纳河为狭短，然其四周，亦是旷阔平坦之地，兵马奔驰，无何阻碍，亦为匈奴南侵必经之地。酒泉武威，以地势论，均是匈奴侵扰汉边必经之地，汉欲保全西北交通，其屯戍要地，必在此二郡之北境。然据史书所载，当武昭之际，匈奴侵扰之地，与汉兵屯守之区，多以酒泉与张掖并举，未有言及武威者。窃意如武威果建于武帝之世，马、班叙述此时兵争地域决不容略武威之名而不举。此一点实值得吾人考虑者也。兹试略就当时史实，论之如下：

（一）《史记·大宛列传》述太初中伐大宛事，云："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汉书·李广利传》亦载此语。按居延、休屠为汉之二县，其地均为匈奴之故土，自元狩中匈奴势力北徙，汉始筑守其地，以保卫西北之交通。《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居延县，云都尉治；武威郡有休屠县，云北部都尉治；又别有休屠泽，云在武威县之东北。居延在张掖之西北，休屠则适值武威之北境，揆之地理形势，一居额济纳河流域，一在白亭河流域，均是匈奴南侵之路径，故汉置城守，设都尉以防之。休屠既居武威之北境，且为边守之重地，则汉发甲卒十八万戍边，武威必在其内，史公何以独举酒泉、张掖，而不名武威？岂非武威尚未置郡，而其领属尚归张掖统辖，故略之而不言乎！

（二）又《汉书·李陵列传》云："陵字少卿……武帝以为有广之风，使将八百骑，深入匈奴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不见虏还，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按练兵备胡，武威当在其列，此不言武威，其中必有原因。又云："（路）博德故伏波将军，亦羞为陵后距，奏言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禽也。"按此指天汉二年出击匈奴左贤王于天山事言。夫博德欲征调河西劲卒，与陵出击浚稽，似武威郡内之士卒，当在其

内，此只举酒泉、张掖，而无武威，亦属可疑之一点。前后所举两事，均足证明武威此时尚未立郡，如言当时记述，容有脱漏，或练兵征师，武威不在其列，实乃令人难以相信者。

（三）又《汉书·匈奴传》载昭帝时事云："明年，（依传文推之，当为元凤元年）单于使犁汗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翼可复得其地。时汉先得降者，闻其计，天子诏边警备。后无几，右贤王犁汗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得脱者数百人。"按《汉书·地理志》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二郡均是匈奴之故土。匈奴欲复故土，南来窥视汉边兵力，则其所窥视之地域，不当限于酒泉、张掖，武威亦当在内，何以武威之名亦未提及？

上列三点，已足说明武威建郡之年代，决非在元狩或元鼎中，如先儒所言。尝谓讨论武帝时事，当据《史记》之文，《史记》不言武威与酒泉并置，而固书附益之，必是出诸臆想，并非确有所据。学人推寻史文之源流，真伪即可辨析，未可泥于一家之说。

余考武威之名，最初见于《汉书·赵充国传》，其论用兵西羌之事，有此数语："……充国计以威信招降罕开（羌之一种）及劫掠者，解散虏谋，缴极乃击之。时上已发三辅太常徒弛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与武威、张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万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屯兵在武威、张掖、酒泉，万骑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马食……"

按汉用兵西羌，始自宣帝神爵元年，此时赵充国与辛武贤计议各郡士卒情形，武威俱在其列，知武威建郡，至迟在神爵元年之前。前论武威立郡之年代，最早不得在元凤元年，或始元六年之前，如所述各点。然则武威建郡一事，当求之于昭帝末年及宣帝初年，即元凤而后，神爵而前之十数年中也。班书疏略，不可详征，兹姑举其大略言之，以明前人之说未可尽信，至于确切之年代，书缺有间，未敢妄断。

次论张掖、敦煌之建置：张掖郡之建置，《汉书·武帝本纪》以为在元

鼎六年，《地理志》以为在太初元年。清儒考订旧文，多主《本纪》之说，齐召南云："按《孝武纪》武置酒泉于元狩二年，至元鼎六年，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俱不俟至太初年间也。《志》于张掖、酒泉，并云太初元年开，误也。酒泉与武威建郡同时，张掖稍在其后，如《志》所云，武威之置反在张掖之后矣。语见殿板《汉书》考证。"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亦有同此之主张，云："按《武帝纪》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郡置张掖、敦煌郡，敦煌为酒泉所分，则张掖必为武威所分矣。四郡之地，虽皆武帝所开，然先有酒泉、武威，而后有张掖、敦煌。以内外之词言之，武威、酒泉当云元狩二年开，张掖、敦煌当云元鼎六年分某郡置，不必言开也。昆邪来降，在元狩间，而《志》以为太初，张掖乃武威所分，而《志》以张掖属元年，武威属四年，皆误。"按齐、钱二氏论武威、酒泉之建置，仍依固书《武帝本纪》之文坚信其俱建于元狩二年之说，实多不合，已于上文驳证，但其论张掖、敦煌之建置，亦主《本纪》之说，以为皆是建于元鼎六年，考之史实，颇觉近似。考班氏言张掖建郡，亦有与《纪》文不合处，然不可为据。《食货志》有此一段，云："明年，南粤反，西羌侵边。天子为山东不澹，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士二十余万人击粤，发三河以西骑击羌。又数万渡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此言张掖与酒泉并置，且在最先。按南粤之反，为元鼎五年事，出师击羌，为元鼎六年事，至于渡河筑令居，置酒泉郡，据上文所考，均属以前之事，此文以河西初置郡邑，与伐南粤征西羌并叙，又以张掖建郡，与酒泉同列，以年代先后考之，均属不合。此乃班固略举当时史事，漫然书之，非有年代上之订正，读史者自未可据此以言张掖郡建置之年代。又《汉书·武帝本纪》称太初三年秋："又入张掖、酒泉杀都尉。"《匈奴传》亦称是年"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太初三年，既有匈奴侵入张掖，则张掖郡必先此而存在。然此条史料，仅足证明太初初年已有张掖郡之建立，尚未证明《地理志》太初元年建郡之说之不可据也。又考《汉书·李陵传》，其叙李陵教射酒泉、张掖，在贰师将军出征大宛之先，云："陵字少卿……善骑射……武帝以为有广之风……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数年，汉遣贰师将军伐

大宛，使陵将五校兵随后，行至塞，会贰师还，上赐陵书，陵留吏士，与轻骑五百出敦煌，至盐水，迎贰师还，复留屯张掖。”按李陵事迹，俱见《史记》与《汉书》，然《史记》言之甚略，《汉书》则言之甚详。盖史公因李陵事获罪，不敢毕言，自多删略；班书后出，不独无所忌讳，且旧事传闻，得之甚悉，故记载独详。上引一段史文，其言李陵率轻骑五百，出敦煌，迎贰师至盐水事，《史记》略而未载；然《李陵传》既多忌讳，自不可从，当以汉书为据。如从《汉书》之说，陵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敦煌，事在贰师将军出征大宛前数年，贰师出征大宛，始自太初元年，则李陵教射酒泉、张掖，必在元封三四年间也。陵以陇西名将李广之后，对于河西形势，当所谙悉，武帝命之练兵其地，自属可能。如李陵果在元封中练兵张掖，则张掖一郡，已在元封中存在。元封而前，即是元鼎，则《本纪》元鼎六年建郡之说为可据，而《地理志》之说误矣。《地理志》武威郡有武威、张掖二县，其有武威县本不足怪，犹金城郡之有金城县，敦煌郡之有敦煌县是也。然其县属，竟有张掖之名，而张掖郡反无之，则颇觉可疑。得非张掖原辖武威，其后因土地辽阔，析为二郡，武威居其东部，张掖居其西部，遂致原有张掖之名，留迹于武威境耶！事属可疑，书之以为小证。

至于敦煌之建郡，《地理志》言在后元元年，其说亦不足据。《汉书·刘屈氂传》述征和二年巫蛊事变，有此数语，云：“……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由此，知巫蛊事变发生时，凡属乘机劫略之吏士，皆徙敦煌郡；既徙敦煌郡，则敦煌郡必于此时存在矣。征和二年，先于后元元年者三年，《地理志》之说之不可据，显然可见。抑又考之，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十一章，《沿着古代中国长城发见的东西》称于中国长城极西尽头之大煎都，曾发现有太始元年年号之木简，又于附近某一碉楼，发现有太始三年年号之木简。按大煎都在疏勒河床终点之池沼地方，已入罗布泊尔范围之内，东去敦煌甚远。太始元年，汉人筑防，已越敦煌而远筑长城于此，为巩固边防之基础，似有于敦煌先期建郡之必要。又《史记·大宛传》论李广利伐大宛事，数言及敦煌之名，如：“往来二岁，还至敦煌。”“贰师恐，因留敦煌。”“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

人，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此所言之敦煌，必与酒泉、张掖同列，乃指郡言。又《汉书》武帝太初元年，《本纪》称：“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天下谪民西征大宛，蝗从东方飞至敦煌。”《五行志》及《史记·大宛传》亦同载此事。所言敦煌，亦指郡言。又《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效谷县下师古注云：“本鱼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按效谷为敦煌属县之一，元封六年，既有济南崔不意在此任鱼泽尉，又因教民力田，改名鱼泽为效谷，则敦煌建郡，必在其先。总计以上所举各例，知敦煌郡必不建于后元元年，而乃建于元封六年之先，则《地理志》之说之不可据，《帝纪》之说转足取信，可以明矣。先贤之说，未可轻信，亦未可诋毁，要在折中是非，以定从违，乃为学人应有之责焉。

根据以上所考，汉于河西建郡，最初只有酒泉一郡，盖因土地初辟，空旷辽阔，不能一时作充分之经营。推其性质，仅于军事与交通立一要点而已。其后匈奴远徙，威胁解除，如元鼎六年《本纪》所言：“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威胁既除，自有余力可以经营。且其时西北交通增繁，《史记·大宛传》云：“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着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交通增繁，地方亦随之发展，商贾往来，士民移徙，亦必与时俱增。又朔方营筑，与朝鲜、南越之讨平，亦均于元鼎六年以前完成，余力可以集中西北。总此一切，元鼎六年，酒泉而外，别建敦煌、张掖二郡，实属可能。至于武威一郡，此时尚未建立，其郡属乃为张掖所统辖也。余意固书《武纪》之文，乃取之《史记》，而经改纂，《地理志》之文，则取之汉末图籍，故二者互异。图籍晚出，对于年代之记载，或不免别有所指，而《武纪》既经改纂，自不免涉诸臆想，读史者必当分别观之。

上述汉河西四郡建置之年代既竟，不禁忆起一问题，实觉有附带说明之必要，即张骞说乌孙王昆莫，令其东还故土之问题是也。余始读旧人桑原骘藏所著《张骞西征考》，其论乌孙东方之故土，始据《史记·大宛

传》张骞说武帝“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浑邪之地”之语，断定浑邪王之地，即乌孙之故土。其后，又据《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之文，断定乌孙之故土，即汉之张掖郡地。余初以为汉河西建郡，始自元狩二年，张骞说武帝事，则在元狩四年以后，汉何以使建郡之地，招致乌孙东来以居之！因疑桑原之说，恐不足据。其后读先谦《汉书张骞传补注》，其引郭嵩焘语，亦有类似之见解，焘云：“《西域大月氏传》‘远去过宛西，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据此，则月氏乌孙在祁连敦煌间，月氏当近南，而乌孙稍北。月氏既并乌孙，又为匈奴所破，乃西踞塞地。昆莫攻破月氏，而踞其地，号乌孙。则所谓昆莫故地者，正指敦煌间地言之。《武纪》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来降，以其地置武威、酒泉郡。昆莫故地当在敦煌，时尚未置郡，故骞以为昆莫地空，可以招乌孙使居故地。……”是嵩焘亦以元狩二年初置酒泉武威郡，张骞招乌孙使居故地，当指敦煌地言，不当指酒泉、武威郡属言。按乌孙月氏东方之故土，《史记·大宛传》仅粗举大概，云“在敦煌祁连间”。至于此二部落所有确定之方位，则未明言。晚近东西学者，对此问题，多所讨论，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此一问题，超出本文范围之外，可以不论，但以元狩二年酒泉、武威建郡之说，而疑乌孙故土或在敦煌，或在他地，则属错误。即就嵩焘所言而论，彼以固书《武帝本纪》元狩二年建郡之文作据，以为此时敦煌尚未立郡，张骞招乌孙使居故土，必指此地而言，故断言敦煌为乌孙之故居。然元鼎六年《本纪》，明言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既言分置，则张掖、敦煌之地，必是原为武威、酒泉所辖；敦煌既原为酒泉所辖矣，何得云尚未立郡，招徕乌孙使之居乎？嵩焘之不能自完其说，乃因过信《汉书》武帝元狩二年《本纪》之说所致。倘推翻元狩二年建郡之文，如前文所述，则《宛传》所载张骞说武帝招乌孙语，可以完全嘹然无窒，怀疑之念，曲解之说，自无由发生。历史上某一问题，牵连之方面往往甚多，此其一例，故带论之。

**注释：**

①见殿版《汉书》。

②见《大宛传》。

作者：张维华，(1902~1987)，男，字西山，山东寿光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

# 甘肃河西水系的特征和演变

冯绳武

甘肃河西是中国西北干旱区域之一部分，面积近 27 万平方公里。河西在自然区划方面，包括河西走廊及其南面的祁连山地（又名南山）、阿尔金山地东段、苏干湖盆地与其北面的部分阿拉善高原及北山等六个自然区，全属中国内陆流域，且有大面积的无流区。地表广泛分布着高山、中低山、高原、盆地、沙漠、戈壁和点缀在沙漠戈壁间的小块绿洲区。

## 一、地理特征

各河流均发源于河西走廊南面的祁连山地，上游均在祁连山区，不少河流源出雪山冰川，源流众多而河道较稳定，流量主要靠季风降水而部分靠冰川融水补给。中游在走廊平地，因进入干旱区，流量反常，分支众多而愈流愈小，大部河流迅速消失在前山堆积的洪积扇、冲积扇一类戈壁滩内，形成潜流。较大河流才有下游，自然分支与人工渠道更多，改道频繁。在不同时期，常有不同位置与不同范围的一个或数个终端湖。不少终端湖在史前及历史时期，有很多位置游移及迅速变小而终趋消失的事实。

各河出山后，进入中游，常年有水的很少，大多数河道在夏、秋二季偶有洪流通过，其余各季只有干河道。在绿洲内外，常见不少灌溉渠道。在 1∶100000 地形图上有名称的走廊平地河流，共有 30 多条。

各河在南山北麓，均有大量砾石及沙土的扇形堆积。河流愈大，洪积、冲积扇也愈大。以疏勒河出昌马峡造成的大坝冲积扇最明显而典型，由扇尾的大坝至扇前缘的桥湾间，长 56 公里，海拔由 1850 米降至 1350

米，高差达500米的几十条等高线在1∶50000地形图上呈平行等距离的弧状排列，且有不同时期的新老河道，呈放射状均匀分布，与等高线相互垂直交织，宛如蛛网，也似地图上的经纬网格，扇缘西起唐代疏勒河故道所经的锁阳城废墟，东止今疏勒河（昌马河、又名巩昌河）道与东干渠末尾的三墩滩，长达125公里，总面积3260平方公里，除前缘泉水露头区支渠交错，构成玉门镇绿洲外，扇面大部为砾石戈壁滩。

各河在山前堆积的沙砾物质，即各类洪积、冲积扇联结成南山北麓的带状戈壁滩，南高北低，坡度很小。南山北麓的冲积扇，远大于走廊北山南麓的冲积扇，说明在新构造运动中的南山隆起量及其速度，远比北山为大。

不少大河在南山北麓造成冲积扇后，由于扇面前缘有隆起的低山阻隔，河道便在山前作直角转弯西流或东、西向分流，呈丁字形，如疏勒河在饮马场北山（1616米）与桥湾北部黑山（1525米）间是。有的先成河或在扇面摆动改道的河流，在扇缘低山隆起中，切成多条较长峡谷，出峡后，可再次造成几个规模不小而物质较细的冲积扇。如陶勒河（旧名托来河）出南山，造成巨大而物质较粗的冰沟冲积扇后，由于扇面前缘遇到黑山（2799米）和夹山（1478米）的阻挡，分别切割成断山峡与鸳鸯峡，出峡后再次造成广阔的峡口冲积扇与余塔冲积扇。由于后者物质较细而水源充足，在扇面上发育成金塔绿洲；前者物质较粗，仅在扇面前缘泉水露头而土层较厚区，同其右侧洪水河的冲积扇前缘泉水区联合，构成了酒泉绿洲。

各河中游，一般分为上、下两段或上、中、下三段，普通小河只有中游上段而无下段，出山后，在冲积扇面上经人工分为不少渠道支流，部分水量用于灌溉，部分水量则没入冲积扇内，变成潜水，仅在洪水期可循老河道进入扇缘的戈壁滩，汇为季节湖或汇入较大河流。中等河流的中游，往往在同一河道中分为上、下两段，性质截然不同，上段名山水河，下段是泉水河，现今地表径流，并不直接相连。较大河流的中游，分为上、中、下三段独特河流。最大河流如黑河中游，才常年有水，而其下游在正

义峡以北，现已成季节河了。

各河出山后，在洪水期有漫流现象，才造成广阔均匀的冲积扇，中水期则有较固定的河道，一般自然河道在冲积扇面上，常有左右摇摆的事实，从第四纪末至历史时期，各河道在扇面上普遍有向右偏转改道的趋势。因而在扇缘河道与低山间所切成的峡谷故道，也有逐渐向东迁移的事实。例如陶勒河在冰沟冲积扇面由西到东至少移动过四次，由扇缘北山的断山口至鸳鸯峡间的多条古河道可以证明。改道的自然原因，不外地转偏斜，新构造运动以致局部断层低山的隆起，泥石流堆积与洪水冲蚀等方面；而近期人类的生产活动所引起的河道改变，日益重要。如在清初修筑的昌马大坝，为疏勒河近 250 年来在大坝冲积扇面上改道东移至玉门镇以东的主要原因。

各河中游的自然河道与灌溉渠道都分支很多，而历史时期的变化也很大。各大河的中游河道湖与下游终端湖的位置迁移和水量、水质的变化更大。根据历史记载，河西走廊的大湖名称，从东部的猪野泽至西部的冥泽与盐泽（又名蒲昌海、坳泽、牢兰海或罗布泊）、不下十个，其具体位置与范围的变化都很大，只能从现今地势、海拔高度、湖积地层、盐渍、沼泽及盐碱滩等方面推论其轮廓。总的趋势是：各湖泊随着入湖河流水量的减少，水位由高变低，湖面由大变小，湖名与数目由少变多，水质由淡变咸。最后变为盐沼与盐碱滩，也有盐分较小而能垦为耕地的，如民勤湖区耕地是。根据现今各大河下游的盐池、盐碱滩、盐质沼泽地及风蚀土瘠等的带状存在，可知在不同时期的河流终端湖，不止一个，且有逐渐向后退缩的事实，即是愈早期的终端湖愈远，例疏勒河西支与党河早期的终端湖应是罗布泊。至 17 世纪末年，已向东退缩至哈拉池，清末退到今图的哈拉诺尔，而现今哈拉诺尔已干涸成盐碱滩。

河西各河湖变迁的原因，在史前及历史初期的自然水系时代，以自然原因为主。在冰后期的周期性气候变化中，晚近时期或值较干阶段，因之山地冰川普遍退缩，各河流量减少，加之风沙活跃，或由于局部的新构造运动，促进了河流改道与湖泊迁移，终致大部河流日趋萎缩。进入

历史时期的半自然水系时代，河道与湖泊的变迁原因，总的说来，早期是“三分人事七分天”，愈至晚近，人类生产活动所起的作用愈大，已转化为“七分人事三分天”，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少绿洲区，已由很多现代化渠道网代替了自然河道，已由不少新修水库，代替了天然湖泊，确已进入人工水系时代了。

河西各河流域及水系的近期变化特大，也很复杂。至今很难确定河西究有若干水系。目前一般自东至西，分为石羊河（谷水）、黑河（弱水或羌谷水）、疏勒河（籍端水或布隆吉河）及哈尔腾河四大水系。唯哈尔腾河水系及其终端湖的苏干湖（色尔腾海）盆地，分布在祁连山地西段与阿尔金山之间，实为柴达木盆地之一部分，海拔在3000米上下，属于高山荒漠草原带，而且可供农垦的土质平地较少。其余三个水系，均在河西走廊与阿拉善高原上。若就历史时期水系论，河西走廊应只有石羊河、黑河和党河三大水系。因为疏勒河是介于居延海和罗布泊两大内陆湖间的两栖河流，它早期的主流循昌马大坝冲积扇面西缘的一支，曾经过踏实盆地的河道湖，西纳踏实河与党河，流入罗布泊，实为塔里木河水系，同时疏勒河循大坝冲积扇东缘与前缘东流的几支会流，经过花海—金塔盆地的河道湖，东会陶勒河与黑河，北流入居延海，故应属黑河水系。清人全祖望早有“羌谷水（今黑河）、呼蚕水（今陶勒河）、籍端水（今疏勒河）、羌水四水皆出南羌中，皆弱水之支流入于居延者”之说[①]。近人包林（Birger Bohlin）及霍尔勒（Horner）经过实地考察，也均有疏勒河曾一度属于弱水（Edsen-gol）水系的结论[②]。近据1972年出版的“甘肃省河西走廊水文地质图”及1970年出版1∶100000“河西地形图”，知花海—金塔盆地的地表西高东低（1229米~1214米），地下水没有分水界。现今河西诸河互不相连而应属独立水系的，到处皆是。但从史前及历史时期各河中、下游相互关系及河道湖与终端湖的变迁等问题以及现代实测地形图知：河西早期只有党河肯定是内陆河流，疏勒河及其以东各河，均有可能曾属外流河，且在各河中游的冲积扇面上左右摆动改道时期均有过相互沟通的历史。

## 二、对河西水系演变的几点认识

综观河西诸河湖的演变过程极其复杂，这里仅就目前认识，提出下述几点粗浅看法，可能不正确，很多问题，尚待深入实地考察，才能解决。

河西诸大河，除党河从古是内流河外，疏勒河及其以东各河，在史前时期均有可能是外流河。例如疏勒河东支及黑河干流，可能曾向东北流入黑龙江；石羊河可能是黄河左岸一大支流。因第四纪冰后期气候的周期性变化，渐至干旱阶段，以致各河的流量减少，先后由外流河变成内流河。原来各河的下游河道湖，逐渐变成终端湖，开始积累了不少盐分。较老的终端湖，有的干涸成盐碱滩，有的变成盐湖。

黑河下游根据早期的水量、居延海盆地形势及现今水土的矿化度论，我们应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黑河（弱水）在第四纪以来直至史前时期，曾经和石羊河一带，可能同是外流河流域。而且黑河可能是黑龙江上源之一，当时的居延海是黑河的河道湖，而非终端湖。直到全新世干旱时期，黑河才变成内陆河，居延海变成终端湖了。理由如此：

从居延海盆地的现今形势看来，盆地拔海最低处，不在现今弱水终端湖的嘎顺诺尔（西居延海，922 米）一带，而在黑城废墟（950 米左右）以东的温图高勒（又名拐子湖）附近（910 米），在温图高勒以东盆地有一明显的长条状缺口，此一缺口的南北两侧，在 1：50000 万及 1：2500000 地图上均有 1000 米的等高线，向东北一直延伸到黑龙江上游的呼伦贝尔盆地。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制，在 1958 年出版的《中国地形图》（1：4000000）上看来，这两条 1000 米等高线的间距宽窄不等而狭长向北延伸，明显是一条古河道。在此古河道间，有不少条状的河道湖与盐沼、泽地断续分布，各湖的海拔高度自西南至东北，已有资料如下；（居延海 922 米—温图高勒 910 米—巴布拉海 881 米—乌兰呼（苏）海 776 米—呼伦池 539 米（其余详细资料、待查）。水流就下，这种地势落差和地貌、湖沼等条件，均使我们有此推论。

黑河就水量论，为河西第一大河，而居延海盆地现有土壤与湖泊的矿化度均不很高。它更不像罗布泊，自古就有“盐泽”之称，而且在“盐泽”的周

围有广阔的盐壳分布。居延海盆地北部从西汉就建立了居延县(即今黑城),已有灌溉农业发展,因之在今黑城附近的农垦渠道管理上,有"甲渠侯官"的设置。现今的额济纳旗,至1975年共有水浇地五万二千多亩,甚至目前的索果诺尔(东海)还属淡水湖,凡此皆可证明居延海应属晚近时期形成的内流湖。早期可能是黑河下游河道湖之一。由于东端有出口,所以未曾积累较多盐分,故在居延盆地少碱滩出现。颇似民勤湖区,至今不少地方尚宜农林牧的综合发展。

由此推论,再依居延海盆地目前的地势与较老湖泊的位置判断:史前时期黑河下游的老河道,很有可能从今双城至苇坑泉间转弯向东,由弱水下游干三角洲东缘洼地带经古日乃湖东侧现已被巴丹吉林沙漠覆盖的故道,沿乌兰套海东北流至温图高勒(拐子湖),再向东北经巴布拉海以至贝尔湖与呼伦湖作为黑龙江上源最长的一支流。上述各地的古日乃,是否为蒙语郭勒(汉语一河)的同音异译,套海为蒙语河湾。汉语拐子湖,也应为河道湖的俗称。

值得注意的是河西走廊各河中游,在其出山的冲积扇面上,与下流干三角洲上,均有向右偏转改道的历史事实。唯独弱水(黑河)下游近期却有向左转改道的迹象。主要原因,由于弱水下游为巴丹吉林沙漠的主要沙源制造厂,在当地盛行而强烈的西北风推动下,大量流沙堆高弱水右岸地面,以致在干三角洲上散流的弱水各支流自然被迫向左改道,而消失其外流故道;还有由于干三角洲东缘的察杭爱山及其北缘的洪果尔吉山的近期隆起;加之近期气候变干,弱水流量减少,也应是弱水由外流河变为内陆河,各支流在干三角洲上逐渐西移的原因之一。

弱水(黑河)在史前时期由外流河变为内陆河后,早期作为河道湖的古居延海,也就变成内陆终端湖了。此后湖床及湖水的盐分与日俱增。湖水在哪里存在的时间愈长,湖床遗址的盐分必然愈大,这是我们今天判断古湖位置的主要依据。

根据杨守敬编《水经注图》(1905)"弱水篇"推测绘出的古代"流沙居延泽"的轮廓,略似新月形,从弱水分支(由今狼心山以北开始)为东

河与西河分水处起，向东西两翼伸出两角，原是一个狭长的新月形湖，后来分为东海和西海两部分。如依据现今地势与盐碱滩地的分布，我们应修改“流沙居延泽”图，大致在汉居延县（今黑城）与今额济纳旗（达兰库布）两城镇东北部作与杨图“流沙居延泽”反方向的新月形长湖，即从汉至今，在不同时期的居延海，分为不少大、小不等的湖泊，游移转徙在汉居延泽示意图范围之内。

河西诸河，除疏勒河西支下游在哈拉池以西，由于接近最老内陆湖的盐泽（今罗布泊，现已干涸）而水土含盐量多，不宜垦殖外，其余诸大河下游，因是晚近变成的内流区，水土矿化度均低，大部宜于农垦及林牧业的综合发展。

诸河中游为河西走廊南侧（即南山北麓）堆积成大片砾石的戈壁滩（即各类冲积洪积扇）前缘，造成不少块美丽而富饶的绿洲，从古以来是发展河西的主要据点。

河西诸大河道，又为河西各大沙漠的加工厂与运输道。定向盛行的起沙风。只是承担了沙粒空运队的任务。因此石羊河。（又名沙河）中下游右岸（西北风下首）有腾格里沙漠的生成；黑河中游故道，名大沙河，下游右岸有巴丹吉林沙漠的生成；疏勒河下游左岸（东北风下首）有库木塔格（维语意为沙漠大山）的生成。

各河流的新老河道及大沙漠边缘山地的缺口，往往为大沙漠区部分流沙经起沙风搬运而溢出，侵入他区的要道。如黑河下游河道，介于金塔北山与金洞子山间的沙门子。介于大青山与狼娃山间的东小口子，均为巴丹吉林沙漠侵入河西走廊中、西段的要道；雅布赖山南端的梭梭门子，又为巴丹吉林流沙侵入民勤盆地的隘道。由于起沙风距地面不过4米，这类隘道可以工程措施防御。

各大河中游的绿洲，在历史时期由于灌溉农田的不断扩大，用水量日渐增多，乃使各河下游由常流水变成季节河，终致成了干河道，原来的河道湖，变成终端湖，最后变成盐湖或盐碱滩，正因中游农田用水量增大，而导致下游河道与湖泊加速干涸，地下水位降低，老河道的胡杨

林与各类灌丛植被逐渐枯萎，加强了当地的流沙活动与荒漠化，流沙又阻塞河道而促使河流改道。愈至近代，这种河湖变迁的人为原因，远远超过自然原因。

河西各河的地面径流，均来源于祁连山地的降水与由部分降水凝结而成的高山冰雪，而各河径流又为地下潜流，深层水，泉水及内陆湖泊的主要水源。目前由于未能充分合理地利用各河径流，灌溉中游绿洲的农田，从而在中下游大量打井、利用地下水，以致地下水位普遍降低，原来的泉水灌区迅速缩小，而改用山水河渠与井水灌溉，更使大部地面的植被日渐枯萎，加重荒漠化。应及时合理安排河西水资源的平衡利用，才能避免地理环境向不利方面迅速发展，而进一步受到自然的惩罚。

河西各大河的不少老河道，现今虽无地表径流，而地表土层较厚，地下潜流较丰，且多属淡水，新垦荒地，大可利用这类老河道。

历史时期河西各河中下游沿岸，有不少著名城郭荒废与湖泊消失的事实。主要原因由于河流改道，而河流改道的原因，愈至近代人的作用愈大。我们多次亲至河西，亲眼看到不少人工水库，代替了天然湖泊，不少现代化渠道和水泥管道，代替了自然河道与旧日渠道，不少新兴城市，建置在原来的戈壁滩上与现代渠道附近，数量远远超过几千年来荒废的少数城镇。

**注释：**

①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三，第 12 页。

②中瑞科学考察团报告之一。

作者：冯绳武，(1912~1991)，男，字士吾，甘肃秦安县人，兰州大学地理科学系教授。

# 西汉酒泉郡若干县城的调查与考证

李并成

《汉书·地理志》载,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开,领县九:禄福、表是、乐涫、天陈、玉门、会水、池头、绥弥、乾齐。这是酒泉地区有史以来最早的行政建置,这些县城也是本区最早设立的一批城镇。它们奠定了嗣后几千年来本区城镇发展演化的基础。因而搞清它们的位置,不仅对于汉代乃至后代这一地区历史面貌的研究极有必要,而且对于探讨整个西北绿洲地区城镇起源演变的规律及其环境变化亦甚有意义。对于这些县城的城址《汉书》未详,前人所做研究亦较少,且不免有所失误。笔者经过多次实地调查,并将文献资料与大量的考古材料结合起来,对这九县中前六县的城址予以考证。

**禄福** 为《汉书·地理志》所载酒泉郡首县,系郡治。《后汉书·郡国志》误作福禄县,《大清一统志》、清人吴卓信、王先谦等据东汉《曹全碑》《三国志·魏书·庞 陶传》及所引皇甫谧《列女传》等正之,认为改称福禄当自晋始。黄盛璋又依敦煌遗书于阗文《使河西记》之 Laha pum 的对音,考得唐代仍名禄福,禄福之名自汉迄唐沿而无改。敦煌市博物馆藏天宝初年《地志残卷》(敦博58号)亦作禄福。《汉书·地理志》载:"禄福,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知呼蚕水流经禄福县境。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徐松的《西域水道记》、陈澧的《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洪颐煊的《汉书水道疏证》等均考是水为讨赖河是之,今亦俗称北大河。该河源于祁连支脉陶勒南山,北流,经今酒泉市城西、城北,又东流、东北流,切穿夹山,在今金塔县东北注入黑河(汉之羌谷水)。可见汉禄福县位今酒泉市域。至于汉禄福县城,学界一直公认即隋唐时的肃州城,也即今天的酒

泉城。《西河旧事》载，禄福城“谢艾所筑”。查《晋书·张轨传》、谢艾为前凉张重华主薄，永乐二年（347年）功封福禄伯，继任酒泉太守。谢艾当在汉城故址上重新筑城。又据清《肃州志》《重修肃州新志》载，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指挥佥事裴成于旧城东城外展筑新城，“今日之鼓楼，即昔日之东门也”。鼓楼今仍存，屹酒泉市中心。如此看来古禄福城当位于今酒泉城的西半部，东半部则为明代新辟。又访之酒泉市博物馆刘兴义先生知，1954年拆除酒泉南城墙时发现墙中旧南门遗址（今军分区院内），当为谢艾晋城之南门，并由此测得晋城面积59.85万平方米。

禄福城位处北大河、洪水坝河洪积冲积扇缘泉水出露带西南侧，地势平衍，地表地下径流均很充盈，生产生活用水方便，具有发展农垦，置郡设县的优越条件。该城又地当贯通走廊平原的丝绸之路东西向主干道上，并且沿讨赖诃、黑河河谷北上又可直趋蒙古高原腹地，这条河谷水草地带遂每每成为匈奴南下的天然孔径。禄福正位居这东西、南北两条要道交汇点，在这里置县并立为郡治，具有交通、军事等方面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今酒泉城北2.5公里处讨赖河北岸崖下的赵家水磨还发现新石器遗址一处，其东西长约300米，灰层厚1米许，内涵丰富，属火烧沟文化类型。酒泉城关内外还分布着大量的汉代墓葬，以东关一带最为集中，仅明显的封土堆即达200座以上，墓区范围3平方公里许，大多为汉子母砖室墓，其中又专设儿童墓区一处。这些墓葬应为当年禄福县军民的遗冢。

**表是** 《后汉书·孝灵帝纪》载，光和三年（180年）秋“表是地震，涌水出”。李贤注：“表是，县，属酒泉郡，故城在今甘州张掖县西北也”。《通典》卷一七四亦云：“汉表是县故城在今（张掖）县西北。”唐张掖县即今张掖市，其西北当指今高台一带。《重修肃州新志·高台县》云：“表是故城，在县西，汉置，属酒泉郡。”《嘉庆重修一统志》、清人吴卓信的《汉书地理志补注》、钱坫的《新斠注地理志集释》、王先谦的《汉书补注》等亦持是说。即在今高台县城西约50公里的地方，即酒泉市屯升乡沙山村北15公里处的沙丘中恰可找到一座汉代城址，今俗名新墩子城。城垣已很残破，仅可看到残高1米~2米的夯土颓基，略呈方形，周长800米许。

东、南二垣各开一门，有瓮城。城内城周遍地散落汉代灰陶片，亦见铜箭镞、石磨、汉半两钱币等遗物。该城今日虽已环处沙漠之中，但于其周围吹扬灌丛沙丘之间仍可见成片的故耕地遗迹出露，特别是在该城北面、东北面、西北面宽约 8 公里的范围内弃耕地连片分布，皆遭风蚀，呈较规整的条、块排布，亦见渠道、地埂遗迹，其上亦零星散落陶片、石磨残片、铁镰残片等物。由此表明这里曾是一片农耕兴旺的绿洲。当年流灌这片绿洲的水源应为源于其南部祁连山的马营河，今天由于其中、上游地区的大量开垦灌溉河水仅流至沙山村，但该河故河道遗迹一直北伸至新墩子城下及其以北。新墩子城西距汉乐涫县城 30 公里，东距晋前凉张骏置建康郡亦 30 公里，同样位处贯通走廊东西的丝绸之路主干道，地理位置重要。据此新墩子城当为汉表是县城无疑。在该城西侧、南侧的洪积戈壁滩上还发现汉墓群 3 处，曾出土陶壶、陶仓、汉五铢钱、铜发簪等汉代文物。

另须提及，前引史料称光和三年表是发生地震，《后汉书·五行志》亦云，是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是）地八十余动，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顿，县易处，更筑城郭”。新墩子城废于是年地震。那么地震后的新县址又移往何处？至今亦是个未解之谜。笔者认为表是新县址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海乡的草沟井城恰可当之。该城位新墩子城南 6 公里，距离较近，易于搬迁重建，并且处南部上游地区，地势较高，摆脱了因地震涌水而出的沼泽地带，这个选择是合乎情理的。草沟井城墙垣犹存，南北 120 米许，东西 130 米，残高 5 米许，墙体较厚，底宽 10 米，顶宽 2.5 米，甚雄壮，当为防震特意加筑的。四角又筑角墩，门一，南开，宽 10 米，设瓮城。城内外散落五铢币及大量灰陶片、红陶片等，为汉至隋的遗物，而这又恰与表氏县沿延时期相同（该县废于隋代）。城附近又有古墓群 3处。由此可证草沟井城当为光和三年以后的表氏县城。

**乐涫**　刘兴义的《酒泉县下河清乡皇城遗址考》[①]考得汉乐涫县城即为皇城遗址。该城位酒泉城东南 50 公里，城址呈矩形，面积 298 米 × 351 米，残高 3 米 ~7 米，且四周埋藏着大面积的汉代墓葬。刘兴义考之有据，

言之成理，所得结论笔者完全赞同，不赘。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最近王北辰先生又撰《河西明海子故城考》一文[②]，则认为明海子故城为汉乐涫县城。王先生尽管列举了几条似有道理的论据，然而却不无疏误，同时又忽略了一些最能说明问题的史料，因而所得结论不免偏颇。对此不可不辨。

王北辰首先引用《汉书·地理志》"觻得：千金渠西至乐涫入泽中"的记载，认为千金渠所人的泽即明海子湖，汉乐涫县即湖旁明海子城。然而查明海子湖周围一带地势，海拔约 1400 米左右，其东 20 余公里的黑河河面的海拔则在 1330 米上下，较明海子湖低 70 米许，如此黑河的河水是无法引到明海子湖的，可证千金渠所入的泽非明子海湖。实际上上引千金渠的记载并非《汉书》原作，而是唐人颜师古对《汉书》的注文，唐时乐涫县易名福禄，其辖境包括汉乐涫、表是等县范围，师古的注文系泛指，并不表明千金渠流经乐涫城附近。

在赞同刘兴义先生考证结论基础上，笔者再补充几点看法。《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载："福禄县，中下。西至（肃）州一百里。本汉乐涫县，属酒泉郡"。《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亦云："福禄县，（肃州）东一百里……唐武德二年于乐涫古城置福禄县。"酒泉城东一百里正是今皇城遗址。《新唐书·地理志》又云："福禄，下。武德二年别置。东南百二十里有祁连戍，东北八十里有盐池。"《元和郡县图志》亦载："祁连戍，在（福禄）县东南一百二十里。盐池在县东北八十里，周回百姓仰给焉。"在今皇城东南 120 里许的高台县红崖子乡东大村恰可找到一座唐代故城址，俗称羊蹄鼓故城。该城基本方形，有内外两道城垣，内垣虽已残破但尚可连续，90 米×80 米，残高 2 米 ~7 米，唯西北角墩突兀，残高 10 米许，似原为瞭望台，门一北开，有瓮城。外垣残损严重，大段塌毁无存，残余部分多成高 0.5 米 ~1.5 米的颓垄，仅少数墙段高 3 米 ~5 米，亦方形，每边长 170 米许，门一亦北开，有瓮城。据当地退休干部丁鸿寿等介绍，以前城中遍布陶片、瓦片，并发现过汉、唐钱币。笔者实地考察中亦捡到了红、灰陶片。城周围还发现古墓。据之该城显系汉唐时期的古城址，很可能其外垣系汉城墙垣，唐代又新建内垣，并将外垣用作羊马城。该城南距祁连山仅 4

公里，且向南正对山中水关口，该口为通往祁连山区乃至青海高原的要径，地势险峻，口侧山顶上仍保留烽燧遗址一座，可见羊蹄鼓城当为昔日的军防要地，又位处祁连山下，在唐为祁连戍无疑。刘兴义将祁连戍考为今红崖堡，虽不确，但方位无大错。陶葆廉的《辛卯侍行记》卷五则将祁连戍定在酒泉清水堡，误。唐诗人岑参当年赴西域途中曾留下“昨夜宿祁连，今朝过酒泉”的诗句，祁连即指祁连戍，当时西行大道经此。又上引史料所云盐池正是今高台县西北盐池乡之盐池，其范围颇大，今东西长近 10 公里，南北宽 4 公里左右，自古以来就为邻近数县居民食盐的主要采掘地。该盐池西南距皇城遗址 37 公里，与上引史料之福禄东北 80 里的记载亦大体吻合，舍此盐池这一带别无他池可考。由祁连戍和盐池的地址即可推定皇城遗址为唐福禄县、汉乐涫县城址无误。《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三云乐涫故城在肃州东 250 里，清初梁份《秦边纪略》卷三云高台县即汉之乐涫县，《重修肃州新志·高台县》又云乐涫故城为高台县城西南四十里的骆驼城，皆误。

皇城遗址处丰乐河下游，水源允沛，沃野平畴，具有发展灌溉农业的优越条件，并且地当丝绸之路要道，实为设置县城的理想之地。在今皇城东北 5 公里处还发现新石器遗址一处，名下河清遗址，面积 4000平方米余，出土石斧、石锄、石手磨盘和磨棒、石凿、刮削器等遗物，属马厂类型。可知早自新石器时代这里即有人类的农业生产等活动。在今下河清乡北侧、南侧戈壁沙滩上以及皇城以东的大小淌沟两岸及两河间地带还遍布汉晋时期的墓群，1956 年在这里发掘汉墓 24 座，又清理汉代砖窑 5 座。由此亦可揆见汉代城址与汉墓群在地理分布上的密切关系。

**天陬**　《汉书》师古注：“此地有天陬阪，故以名。”阪即山坡、斜坂之谓，祁连山北麓浅山区由山区向走廊平原过渡，坡度很大，符合“阪”的特点，天陬阪当位于此山麓地带。天陬县的位置清人吕吴调阳《汉书地理志详解》考为在“玉门县北柳沟堡，陬同辰，天颠也，义同删丹”。清玉门县即今玉门镇，其北部的柳沟堡今为柳沟乡，这是处绿洲平原腹地，远离山区，平旷无阴，何来天陬坂？显然柳沟堡说误。近年新出的《玉门市

地名普查资料汇编》又认为，西汉天陬县到东汉改置为延寿县，因而延寿县地即原天陬县的所在，然而令为费解的是，尽管《后汉书·郡国志》中酒泉郡领县无天陬而新增延寿，但从史籍上根本找不到天陬改置为延寿的只字片语，二县之间并不存在前后相承的关系，亦不在同地。东汉新增延寿的位置笔者考为即今玉门市清泉乡骟马城。新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又云："天陬县，西汉置，治所在今甘肃玉门市东南，东汉废。"今玉门市即位祁连山麓，玉门市东南当指由玉门市沿祁连山麓向东南的今红卫林场、青头山、直到嘉峪关市的大小红泉一带。这里虽符合"阪"的地形特点，然而位处山麓洪积扇上部，地表砾面粗糙，发展农耕困难，根本不具备建立县城的自然条件，并且这一带无任何汉代故城址、古遗迹可考，因而此说亦不足取。

查今酒泉、玉门附近的祁连山麓地带，唯有玉门市昌马盆地具备建县置城的条件。该盆地位玉门市正西 60 余公里，为祁连山北麓浅山区一拗陷盆地，略呈方形，南北、东西各约 20 公里、昌马河（疏勒河上游）及其支流小昌马河从中流过。盆地内径流萦绕，土质细腴，成为这一带祁连山沿山地区唯一一块肥沃的绿洲，具有发展农牧业生产以及设置县城的优越条件。昌马之名得于清代，原有昌马湖，即因水肥草美宜于牧马而名。今天这里为玉门市昌马乡的所在。昌马盆地文物荟萃，古代遗存比比皆是。盆地南、北山崖上保存古代岩画 7 处，多为单线条凿刻而成，内容主要为羊、狗、狐、豹、驼及狩猎图等，考古工作者初步认为可能是羌族、月氏或匈奴族的早期文化遗存。可见早在汉代以前这里即有人类的生息活动。盆地以北的照壁山麓又保存石窟群一组，今仍存留早期塑像和五代、宋初的壁画。盆地北部的拱伯滩散落许多汉代陶片，亦见新石器时代的夹沙红陶，并在一水冲断崖上发现厚 0.1 米 ~0.5 米、南北延伸 300 米许的灰层，其间亦夹杂汉陶碎片。乡政府东面的荒滩上亦遍布红、灰各种陶片，并见成片的风蚀古弃耕地，其间还发现若干段夯土颓垄，当为昔日房宅或城垣的遗迹，惜已残破太甚，无法勾勒出其完貌。盆地北大坝的黑崖子上还有古墓群 1 处，俗称将军墓。清代在盆地又设

屯堡，名昌马堡子。可见昌马盆地为汉代乃至后代人类活动的频繁之地。昌马河谷又是沟通走廊平原与青藏高原的要径，军事地位显要，在这里筑城设县具有防范羌人北来、隔绝羌匈交联的作用，据此笔者认为天陇县当位于昌马盆地中，其城址很可能即乡政府东面荒滩上的颓垄，亦可能被清代筑昌马堡时所利用。《重修肃州新志·靖逆卫》云，靖逆卫（今玉门镇）"与酒泉天陇县接壤者也"。这一记载亦与上考结果相符，昌马盆地正位于清初靖逆卫之南，二者地界相连。

**玉门** 《汉书》师古注曰："阚骃云，汉罢玉门关屯，徒其人于此。"玉门县亦由此得名。《旧唐书·地理志》云："玉门军，在肃州西二百里，管兵五千二百人，马六百匹。"《通典》卷一七二亦如此记载。唐之玉门军即汉以来的玉门县，天宝十四年又改军置县。《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亦云玉门县位肃州西二百里，"本汉旧县也，属酒泉郡。《十三州志》云，玉门县置，长三百里，石门周匝，山间裁经二十里，众泉流入延兴"。《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则云："玉门县，中下。东至（肃）州二百二十里。本汉旧县，属酒泉郡。"所记里数与以上诸书略有出入。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序》又云"余疑玉门一县，正当酒泉出敦煌之孔道"，并认为后晋高居海的《使于阗记》所记出肃州后渡金河西二百里的玉门关"实即自汉迄今之玉门县也"。

赤金绿洲位祁连山与其北部的宽滩山之间，南北长约 18 公里，东西宽 15 公里，石油河流贯其间，祁连山山前洪积冲积扇扇缘泉水亦在这里出露，水草丰茂，地土沃饶，汉玉门县置于这一绿洲无疑。因为在这一带除赤金绿洲外，余皆洪积戈壁或剥蚀残山，根本无置县条件。赤金绿洲系一半封闭式的盆地绿洲，周围山丘环列，山洵石峡、石门广布。绿洲南部祁连山脉自东向西有白杨河石门、石油河石门、鸭儿峡、妖魔山安门、西牧场沟口、旱峡、安站口、昌马水峡口等，绿洲北部有赤峡、峡台，西部有沙山子红柳峡，正东 70 公里许又有黑山峡，正如《十三州志》所云："石门周匝。"这些石门石峡除石油河谷与白杨河谷较长外，余皆长 10 余公里许，故曰"裁经二十里"。石油、白杨二河汇纳沿途诸泉流，北流入于花海子，此海即汉晋时的延兴海。陈梦家《玉门关与玉门县》将延兴

海比定为赤金堡北 13 里的赤金湖，误。可见赤金绿洲一带的地理状况与《十三州志》所记颇吻合，汉玉门县确置于这里无疑。唐僧道宣《释迦方志》卷上记，蒲昌海（今罗布泊）东面少北“去玉门一千三百里”。赤金绿洲位罗布泊东 600 公里许（鸟道），若考虑到道路的迂曲起伏恰可与 1300 里之数合，亦证实了上考结论的正确。

据《玉门县志》《重修肃州新志》等的记载，清康熙年间在赤金绿洲设赤金卫，雍正五年改为赤金所，这里“原有旧城一座，高二丈二尺，根宽二丈六尺，顶宽七尺七寸，周围共一里一分零，没有正南门。于康熙五十六年在旧城西南连筑新城一座……周围一里二分零。开南、北二门，合新旧城周围共二里三分零”。原有的旧城可能即为汉唐玉门县城，或可能是在汉唐玉门县城的基础上构筑的。今新、旧二城犹有遗迹留存，名赤金堡，位赤金镇内。二城东西相连，东为旧城，略呈方形，仅遗东、西、北三面部分墙段，残高 0.5 米 ~3 米，镇小学位于城中；西为新城，长方形，亦存部分墙垣，残高 45 米。该城因处人烟稠密的乡镇，所受干扰破坏较重，今地面已无遗物可寻。

赤金绿洲自汉代以来就为重要的农垦屯田之地。出土于 T·46n 烽燧（斯坦因编号，位金塔县北部）的汉简云：“令玉门屯田吏高年垦田七项□□□刑十七人。”表明玉门县设屯田吏，有一套田官系统，并有驰刑徒等从事屯田。赤金又地当丝绸之路干道，自古以来就是酒泉连接敦煌，并进而西出西域的必经之地，赤金北沿石油河谷又可抵达花海绿洲，其交通地位重要。赤金镇东 20 公里的清泉乡即为著名的火烧沟文化遗址，其附近还分布着白土梁汉墓群和窑洞汉墓群。

**会水**　《汉书·地理志》载：“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又云会水县“北部都尉治偃（前）[泉]障，东部都尉治东部障”。师古注曰：“阚骃云众水所会，故曰会水。”呼蚕水已如前考即今讨赖河，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海”，即今黑河（弱水），会水县当位于讨赖河（北大河）汇入黑河处一带。《史记·夏本纪》索隐曰：“案《水经》云弱水出张掖删丹县，西北至酒泉会水县入合黎山腹。”合黎山今亦同名，为走廊北山的中

段，今临泽、高台、酒泉、金塔等县以北延伸的剥蚀残山属之。《水经注》卷四〇云："合离（黎）山在酒泉会水县东北。"标明了会水县与合黎山的相关位置。金塔县天仓乡以北 10 公里许黑河右岸的大湾城堡（汉肩水都尉府）所出汉简曰："出钱千三百□七，赋就人，会水宜禄里兰子房，一两。""……粟会水""到会水而不交难亭留待难。"（无出土地，甲附 4）。盖肩水与会水相邻，故有会水县的就人（佣）。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白亭海，在（酒泉）县东北一百四十里。一名会水，以众水所会，故曰会水。以北有白亭，故曰白亭海。方俗之间，河北得水便名为河，塞外有水便名为海。"酒泉东北 140 里正是今金塔县城东北 25 公里的县良种场东部及其以远的条湖一带，这里为一条东北——西南向斜长约 20 公里、宽 8 公里 ~12 公里的洼地，北大河故道从洼地北部穿过，洼地东北又与黑河河床相连。洼地中不仅地表径流可以注入，而且绿洲农田灌溉回归水亦排每每出露，今天虽北大河已无余流泄入，但仍见成片沼泽湖滩和已干涸的盐渍草甸分布，并且仍有大片的芦苇生长，还留下了条湖、芦草沙窝、野麻湾等地名。这片洼地无疑为唐白亭海之所在。此海实即北大河与黑河交汇处的河道湖，汉肩水都尉府位该湖东北 15 公里许。

这一湖沼地带以北系走廊北山山前洪积戈壁，以南则遍布半固定的白刺灌丛沙堆和柽柳灌丛沙堆，沙堆高约 2 米 ~4 米，并间有新月形沙丘和流动沙梁分布（今名东沙窝）。在这些沙堆的丘间上则散布着成片的弃耕地，遗迹清晰，地表形态表现为遭受风蚀的光板硬质地面，渠道、阡陌的残迹依稀可辨，并到处散落灰陶片、红陶片、碎砖块、石磨残件等遗物，甚至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刀、石锄、石纺轮、夹砂红陶片等亦屡屡出现，有些地段俯拾即是。由此表明今日沙浪滚滚满目苍荒的东沙窝，昔日曾是一片人类活动频繁的繁荣绿洲，其范围南北 30 公里 ~35 公里，东西 20 公里许。这片故绿洲垦区还残存着十余座故城遗址，计有：西三角城，小三角城、西古城、一堵城、三角城、下长城、破城、黄鸭墩城（银耳子城）、三个锅粒、下破城、北三角城、西窑破庄等。从其周围暴露

的大量遗物看它们均为汉代始建，大多废于唐代以前。城址附近不远多有汉墓群分布。并在这一带还可看到不少故陶窑遗址。

这些故城址大都规模较小，多呈方形，周长一般 50 米 ~200 米不等，仅破城（89 米 × 89 米）和西古城（80 米 × 200 米）较大。依汉代县城的通常规模，笔者认为西古城当为汉会水县城。该城位金塔乡五星二队西部，分东西二城，西城 80 米 × 90 米，东城 80 米 × 110 米，总面积 80 米 × 200 米。墙垣多已倾圮，残高 1.5 米 ~3 米许，许多地段仅见墙基，宽 7 米许，夯土版筑，夯层厚 0.1 米 ~0.3 米。城角 4 个角墩仍甚显著，残高 6 米许。北垣部分墙体被红柳沙堆壅压，沙堆高约 4 米，城西、城北亦多有沙堆侵入，城南、城东已被辟为农田、村舍。城内城周暴露有汉代灰陶片、碎砖块等物，亦见后代的陶片、瓷片等。该城东北 6 公里处为一较大的汉墓群区，城东、城南约 1.0 余公里范围内又为故绿洲耕地的集中分布带，城东 2 公里许还发现新石器遗址——渝树井遗址，地面暴露夹砂红陶、粗陶片等。西古城地当由酒泉沿北大河、黑河河谷通往蒙古高原腹地的要道，所处位置与上引诸史籍及汉简记载皆合，且规模又系东沙窝汉代诸城之最大者，应为汉代这一带最高政权机构——会水县的治所。至于其他诸多小城当为乡、里治所或军事驻所。

至于上云会水县境内的北部、东部二都尉，居延汉简亦曾提及。如“其一封居延都尉府章，诣酒泉北部都尉府”“乃以戊午宿酒泉北部[都尉]”等。又金塔县天仓乡北黑河右岸地湾城堡所出简有“东部北部塞”的记载，有可能即指酒泉郡东部和北部都尉所辖塞垣。据考古工作者的发掘研究，酒泉郡北部都尉辖有今玉门市花海东、疙瘩井北及其以东一些地区的塞墙，其东则为东部都尉边塞，该边塞经金塔县北一直东延至鼎新西，又接张掖郡肩水都尉肩水侯官塞[③]。笔者又进而认为北部都尉所治的偃泉障可能为今西坝乡西移村北 6 公里的石银子坊故城，东部都尉所治的东部障今大庄子乡东北约 20 公里的西窑破庄故城可当。

西汉酒泉郡禄福等 6 县城址考论如上。由此我们可以得识，这些城址的布局不是偶然的，它们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由特定的空间关系（自

然的、经济的、政治军事的等)所规定的。设县之处均是发展农业生产自然条件优越,特别是水资源较丰盈的地方,因为绿洲县城主要是在屯垦开发的基础上形成的,农业经济基础乃是制约其发展兴衰的主因之一。这些县城又都位于贯通走廊平原的丝绸之路东西大道沿线,或走廊平原沟通蒙古高原腹地的北大河、黑河河谷沿岸、或沟通青藏高原的昌马河谷盆地中,均具有重要的交通、军事等方面意义。汉武帝河西开边之主旨即在于切断匈奴右臂,打通东西交通孔道,屏卫边境安全。《史记·匈奴传》云置酒泉郡隔绝胡与羌之路,《大宛列传》又云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这些县城的分布格局表明,它们不单是绿洲土地开发范围的标志,反映了地理条件对绿洲开发的制约作用,更是汉朝将河西作为"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之基地来从事经营的政治战略在地理布局上的反映。上述县城附近往往分布新石器遗址和汉代墓群,因为不论是石器时代的原始公社抑或后代的文明社会,人们总是要选择一个地区中自然条件理想之处设置居民点,特别是大的居民点。根据新石器遗址和汉墓群的分布来考索汉代县城位址,或根据汉县城址来探查新石器遗址和汉墓群的布局,这对于考古工作以及城市起源的研究有参考意义,这些城址发展到今天,有的仍为城市或大的集镇所在地,有的则由于人为的或自然的原因引起的环境变化,早已深处沙漠之中。研究它们的兴废及其地理环境的历史变迁对于今天绿洲地区的开发整治、防沙治沙又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注释:**

①(载《敦煌学辑刊》1986 年第 2 期)

②(载《西北师大学报》,1990 年第 4 期)

③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

作者:李并成,1953 年出生,男,山西浑源人,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泾州地望新议

## ——论临泾、安定、泾州的历史演变

祝世林

泾州是历史上的关陇重镇，曾经在拱卫古都长安，屏障关中，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因为史籍对其地理方位记载简略，又存在一些矛盾，使得泾州、安定、临泾三者之间的关系长期混乱不清。现在见到的辞书、志书、历史地图以及对古籍的注释，多是笼统地把泾洲作为古安定，把现在的镇原县城作为古临泾，或者以为古临泾在今镇原南 50 里。笔者认为澄清各种不同观点，重新审定泾州地望，是研究平凉地方史的关键。

先引证《辞海》历史地理分册关于临泾的一段：

临泾、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甘肃省镇原南，西魏废。东汉、魏、晋为安定郡治所，北魏为泾州治所。隋大业十二年改秋谷县置。治所在今甘肃镇原。唐元和后置行原州治此，五代、宋、金为原州治所，蒙古并入镇原州。

这是迄今见到关于镇原县沿革最正确的记载。临泾的历史必须分为两段，后一段即隋代以后的临泾是清楚的，本文着重探讨前一段，即两汉至隋的临泾在何处。考查清楚前一段的临泾，与安定、泾州的关系就清楚了。

### 一、西汉安定县在镇原境临泾县不在茹河川

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 114 年）分北地郡置安定郡，治高平，辖 21县，其中有安定县与临泾县，《汉书·地理志》在二县下没有说明，也不见后人的注释。后汉已无安定县，安定郡领八县，郡治在临泾，其下仍无说明与

注释，说明两县的方位者始见于唐代的《元和郡县志》，在卷二、关内道三、泾州下记：

保定县、郭下、本汉安定县地，今临泾县安定故城是也。后汉省。后魏大统元年自高平城移今理，属安定郡。开皇三年罢郡，以县属泾州。至德二年改保定县。

临泾、上、东南至州九十里，隋大业元年于今县置秋谷县，取县内秋谷为名，十二年后复为临泾县，本朝因而不改。按有彭阳川，去彭阳县一百步。县界兼有汉安武，安定、彭阳、抚夷四县之地。

以上两条虽然文字简略，已清楚地记载了汉安定县在唐代的临泾县界。唐代的临泾县境包括汉代的安武、安定、彭阳、抚夷四县之地。至于汉临泾县在何处，却没有交代。

后来我们发现了一篇不太为史学界注意的文学名著——班彪的《北征赋》，这篇流传千古的文学作品却是研究这一带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更始时，班彪看到关中丧乱，欲避地凉州，取道高平，高平在长安西北，所以叫北征。《北征赋》记载了从长安到高平的沿途情况并系之以感慨，班彪北征所走的路线是，长安—云阳—甸邑—义渠—彭阳—安定—朝那—高平。下边引证与本文有关的几段：

释余马于彭阳兮，且弭而自思，日掩掩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寤旷怨之伤情兮，哀诗人之叹时，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剧蒙公之疲民兮，为疆秦乎筑怨……

此言，到彭阳（汉彭阳在茹河汇入蒲河的北岸）后，即沿茹河西行，越过安定县就看到了秦昭王所筑的长城，再沿秦长城西行就进入今彭阳县境了。所言山川形势与现在完全相符。

班彪是班固的父亲，《汉书》前期的作者，《北征赋》早于《汉书·地理志》，所记是亲身经过的历程。而且文学作品不同于地理志的记载。所记山川城郭是互相连接的。据此赋可以知道，西汉时在茹河川今镇原县境内只有两座古城，即彭阳县与安定县。证明西汉安定县不在今泾川境，而是在镇原县的茹河川附近，也证明临泾县不在茹河川。

结合看《元和郡县志》的记载应该是正确的，“今临泾县安定古城是也”，似乎《元和郡县志》写作的年代，安定故城尚完整存在。

本文涉及两个彭阳县：其一是两汉时的彭阳县，在今镇原东；另一是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彭阳县，在今镇原西，二者相距二百余里。

**二、东汉至北魏，安定、临泾为一地**

以州郡名称作为本州郡治所的名称是历史上的通例，如秦州治上邽，通名之为秦州，兰州治皋兰或五泉，通名之为兰州；近者如唐中叶以后至金代于平凉置渭州，通名之为渭州；以后的泾州治保定县，通名之为泾州，不说是保定县。西汉安定郡的治所在高平，东汉永建四年将安定郡的治所由高平移至临泾，而安定县废。但在史书上常常见到安定，实际上就是指安定郡的治所临泾，这不是很自然的么？

以下与安定有关的史实为例：

东汉建安十八年曹操破马超于潼关，追奔至安定，操使夏侯渊围之，阳秋以城降。此时无安定县，只能是安定郡的治所临泾。

东晋太兴二年黄石屠各路松多起兵于扶风新平，刘曜进攻草壁，陷之，松多奔陇城，进逼安定。同前，安定即临泾。

东晋太和三年前秦之苻双苻柳叛于苻坚，苻武据安定以应之。苻坚使王猛吕光讨之，苻武弃安定奔上邽。同前，安定即临泾。

安定在十六国时是岭北的军事重镇，苻秦升平四年（360年）分司隶置雍州于安定，太和五年（370年）省。后秦姚苌初起，据有安定才进攻长安，太元十二年（387年）姚苌徙秦州三万户于安定。以后姚苌与苻登相持皆以安定为根本，苌以太子姚兴驻守长安，于安定置行宫，坐镇安定指挥战争，在长安时少，在安定时多。苻登败后，隆安元年（397年）分岭北五郡为雍州，治安定。赫连勃勃与姚兴之争，后秦仍以重兵屯住安定。义熙三年（408年）勃勃与后秦将杨佛生战于安定北的青石原，斩俘5700人。义熙八年（413年）勃勃率三万骑攻安定，与后秦雍州刺史杨佛生又战于青石原，降其众45000、马3000匹。后秦将亡，征北将军姚恢弃安定，率安定镇户38000返回长安。勃勃以梁州刺史镇安定。大夏末年，赫连昌失

统万城，徙诸城民七万户于安定，欲都之。后又与北魏争夺安定，夏主赫连昌被俘于安定城下。最后，北魏太武帝亲征平凉，神䴥三年（430年）十月攻克安定，于临泾置泾州（以上散见《资治通鉴》）。

历史上这一连串的安定，是自东汉以来，以临泾为安定郡政治军事中心的继续，脉络是十分清楚的。由于临泾称安定由来已久，影响深刻，直到北魏于临泾置泾州后，仍然见到使用旧名，又使得泾州与安定名称使用混乱，实际上泾州、安定、临泾仍然是一地。特别是《魏书》《周书》有很多关于关陇起义的记载，如果把泾州与安定作为两地，一些行军作战的路线便无法解释。

**三、泾州古城存在的问题**

泾州古城坐落在泾河北岸，东南隔河距今泾川县城五里。背靠兼山，面临泾河，形势雄伟险要。有内外二城，外城的北面和西面还有遗址可寻；内城遗址明显，基本完整，唯南城垣因泾河北移已被淹没，西面与北面城垣基本完好，东面城垣已遭破坏，还有断续墙基可寻。内城呈正方形，东西南北各长七华里，周长二十八华里，面积相当于今泾川县城的十倍，是西北少有的大城。唐代诗人李商隐《安定城楼》诗，首句云："迢递高城百尺楼。"可以想见箭楼巍峨，雉堞高耸，昔日雄城的规模，真是据山川形胜，扼交通要道。《读史方舆纪要》评之云："山川环带，水陆流通，联络中外，翼带东西，诚关中之襟要也。"

古城北墙盘环于兼山之上，切悬崖为深涧，上面加筑墙垣，久经风雨侵蚀，现存残墙高约三米，顶宽二米左右，圆形夯窝、密集而坚实。夯土中遗物很少，且很单纯，仅见到汉代兰纹，雨点纹陶片，绳纹板瓦筒瓦和绳纹陶砖，未见其他遗物，与城西北角两座汉代烽火台夯筑方法十分相似。城内有商周时遗物和大量汉代瓦片堆积。新中国成立后省内外的文物工作者曾作过多次考察，都认为是汉城遗址。城内及城附近陆续出土商周以下各代遗物，其中重要者有："汉率善羌长"铜印一枚，新莽时"别部司马"铜印一枚，北魏永安三年"泾州之印"铜印一枚（一说是金代的承安三年），北周天和三年宝宁寺比丘慧明舍利石函一件，以及闻名

全国的唐代大云寺金银棺舍利石函等，出土的唐以后文物更多，因与本文无关不再列举。

根据对城垣的实际考察和大量出土文物分析，古城始建于西汉，大修于北周和唐，宋代也有所补修。更重要的是可以证明自西汉以下各代连续使用，未尝间断，直到明初。明洪武三年因泾河向北侵蚀，淹没南城，迁至泾河南的今城。

相传古城在商周之际为共国都城，文物工作者在城内的水泉寺和盘顶子作过多次考查，发现大片西周文化层，厚约一米，面积约六千平方米，如确系共国遗址，古城上限可推至周初或商代，如以周初计算，约有三千余年的历史。

这一西北少有而且保存基本完好的历史名城，却存在一段查不清的历史：如本文前段论证，西汉安定县在镇原县境，此城自西汉至北魏能是何城？退一步讲，按传统说法是西汉安定县城，但安定县已于东汉时废，自东汉至北魏中间四百余年又能是何城？而且也与古城连续使用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四、泾州古城应是历史上早期的临泾城**

清代学者提出前一段历史时期的临泾城在镇原南或东南 50 里，我们未能查到直接论证这一问题的文章，估计是他们从史料中见到古临泾与镇原城的地理方位不相符合，加以推断而提出的。我曾以镇原城作为园心，以 50 里为半径，在镇原南部与东南画一弧线，这一弧线经过的地方有：新城、杜寨、中原、党原、屯子等地，临泾乃四百余年这一带的军政中心，必有大量文化遗存，再以山川形势衡量，都不具备作为临泾的条件，证明清代学者是仅从史籍记载作出的判断，未能作现场考查，更不可能知道泾川县有这个不知历史地名的古泾州城址。我们据文献记载、出土文物、现场考察、综合分析、认为古泾州城的前身就是汉至北魏的临泾城，也就是从东汉历三国、晋、十六国、北魏、隋、唐、至北宋庆历三年，约（129 ~1043 年）九百余年的时间，此城都是这一带的军事政治中心。

以泾州作古临泾不仅是推论，而且可在历史文献上找到大量根据，

举以下数例：

《元和郡县志》记泾州：

《禹贡》雍州之域，春秋时属秦，至始皇分为三十六郡，属北地郡。

汉分北地郡置安定郡即此也。汉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按六郡安定即其一焉。后汉安帝永初五年徙其人于美阳，今武功县界美阳故城是也。至顺帝移今理，后魏太武帝于此置泾州，因水为名……

顺帝永建四年安定郡自美阳迁回，郡治由高平移至临泾，而《元和郡县志》记云“移今理”，今理即指唐代的泾州，又云“魏太武帝于此置泾州”，分明说唐代的泾州即是后汉顺帝时的临泾，也是北魏太武帝于临泾所置的泾州。稍前于元和志的《通典》对此未作详细记述，仅记“后魏太武帝置泾州，盖以泾水为名”。其意与和元志是一致的。成书于北宋初的《太平寰宇记》所记与元和志基本相同，节录如下：

……后汉永初五年徙其人于美阳以避羌寇，其郡寄治美阳即今雍州武功县界美阳故城是也。永建三（应为四）年移今所。《晋太康地志》云：安定郡领临泾、朝那、乌氏，鹑觚、阴密、西川六县，属雍州。及魏神䴥三年于此置泾州，盖因水为名……

“永建三年移今所”，今所应指宋代的泾州，而永建时所移的治所是临泾。“神䴥三年于此置泾州”，其意是后魏所置的泾州城就是宋代的泾州城。可知汉代的临泾、北魏置的泾州，与唐宋时的泾州是一个地方。

十六国北魏时在这一带发生的多次战争、几乎都可以说明安定与泾州的方位在现在的泾川。如北魏时万俟丑奴与崔延伯之战，《魏书·崔延伯传》记：“延伯既破秦贼，乃与宝寅率众会于安定，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军威甚盛。丑奴营于泾州西北七十里党原城……（延伯）伐木造大牌，内以铁锁相连，使强兵负之而趋，号牌城，乃自泾州沿原北上。”今党原城尚在，正是在古泾州城西北，由古城去党原正是沿原北上。除里程有出入外，方位地形完全相符。如果以为泾州在镇原，则无法解释。

再则，以上所引三段历史地理文献，皆记“因水为名”，古泾州南临泾水，名为临泾情通理顺，如以离泾水九十余里的镇原作临泾，总觉得

有些勉强。

**五、安定、临泾的历史演变**

下边探讨:原来名为临泾县,如何改为安定县?

由于史籍疏于记载,这是一个颇感棘手的问题。临泾县的建制曾一度中断,何时中断说法不一,《大清一统志》《隋书地理志考记》认为西魏后期,王仲荦的《北周地理志》认为北周时尚在。

清代学者徐文范的《东晋南北朝舆地表》提出了具体时间:"大统元年省临泾,析置安武县。"[①]这一未能查出原始出处的孤证却可以与前引《元和郡县志》的保定县条相印证:保定县条说:"后魏大统元年自高平城移今理"(见本文第一段),其意是安定县于大统元年移到泾州城内去的。很明显,如果临泾县不废,安定县是不可能搬到泾州城内去的。两条合并起来就是,西魏大统元年废临泾县,安定县从高平城移入泾州城内。

此条还可以与安武郡的建立联系起来:《隋书·地理志》安定郡朝那县下记:"西魏置安武郡及析置安武县,开皇三年郡县俱废入焉。"此条仅说时在西魏,未说明在西魏何时,与前条合在一起考虑,析置安武县应依《东晋南北朝舆地表》所提出的时间,与废临泾县同时,也在大统元年。大统元年(535年)是宇文泰统一关中陇右后的第一年,曾作过一次较大规模的行政区划调整,此地就发生了废临泾县,将安定县移至泾州城里,把临泾县原领的北部分为安武县,与西邻的朝那县[②],建立为安武郡,把原临泾县的南部划归安定县,临泾县地就被瓜分了。

临泾县于西魏太统元年(535年)废,至隋代大业十二年(616年)改秋谷县为临泾县,计中断建制81年。

西魏时今镇原县境内大部分为安武郡所占有,东部尚存在属西北地郡的彭阳县。隋代统一全国后于开皇大业时进行了两次全国性的区划大调整,开皇三年罢郡,于是废掉安武郡与安武县,将安武县并入朝那,此时今镇原县境内应有朝那彭阳二县。我们未能查到彭阳县东迁的具体时间,仅知开皇十八年改彭阳曰彭原,彭阳既已东迁,所以大业元年于彭阳川置秋谷县,十二年已至隋代末期才改秋谷为临泾,仅是使用旧名,已不临近

泾河了。此时西南部属朝那县，直到唐贞观元年才废朝那入临泾，基本形成了现在的疆域。

**注释：**

①《舆地表》卷八。

②此朝那县在今镇原县的西南部并占有泾川县的一部分，《魏书·地形志》记朝那县有党原城。

作者：祝世林，(1922~1999)，男，字宜竹，山东郓城人，平凉行署办公室原副主任、平凉行署地方志办公室顾问。

# 汉晋金城郡允街县方位考

刘光华

关于允街县，最早的记载是《汉书·地理志》金城郡条：

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户三万八千四百七十，口十四万九千六百四十八。县十三：允吾，乌亭逆水出参街谷，东至枝阳入湟。莽曰修远。浩亹，浩亹水出西塞外，东至允吾入湟水。莽曰兴武。令居，河水出西北塞外，至县西南，入郑伯津。莽曰罕虏。枝阳，金城，莽曰金屏。榆中，枹罕，白石，河关，破羌，宣帝神爵二年置。安夷、允街，宣帝神爵二年置。莽曰修远。临羌。……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

汉金城郡辖13县，大致在今兰州市和湟水、大夏河流域。允街县何在？《地理志》本注记载甚略，仅记其建置年代为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和王莽时改名为修远。若据允街"莽曰修远"，则允街与允吾（因"莽曰修远"）应为邻县。《汉书》以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篇》卷二曾对湟水流域金城郡辖县有较多的记载。兹摘引其中今兰州市境金城郡金城县以上的有关记载如下：

（河水）又东过金城允吾县北，金城郡治也。汉昭帝始元六年置，王莽之西海也。莽又更允吾县为修远县。河水径其南，不在其北，南有湟水出塞外……湟水又东南径小晋兴城北，故都尉治。阚骃曰，允吾县西四十里有小晋兴城。湟水又东与阁门河合，即浩亹河也。出西塞外，东入塞……浩亹河又东径浩亹县故城南……又东流注于湟水。故《地理志》曰：浩亹水东至允吾入湟水。湟水又东径允吾县北为郑伯津，与涧水合，水出令居县西北塞外，南流径其县故城西……又南径永登亭西……注郑伯津。湟水又东径允街县故城南，汉宣帝神爵二年置，王莽之修远亭也。

县有龙泉，出允街谷……下入湟水。湟水又东径枝阳县，逆水注之。水出允吾县之参街谷……又东南径广武城西……又东径枝阳县故城南，东南入于湟水。《地理志》曰，逆水出允吾东，至枝阳入湟。湟水又东流，注于金城河。

上引《水经注》文，记载湟水汇入金城河以上之金城郡诸县最为详细。湟水在今兰州市境共汇纳了三条河及一条泉，即流经浩亹县故城南的阎门河，流经令居县故城西的涧水，流经枝阳县和前凉广武县的逆水（即今庄浪河）；其中允街县在涧水和逆水汇入湟水之间的湟水北岸，境内有源于允街谷的龙泉，“下入于湟”。由于湟水“又东径允吾县北郑伯津”，则允吾县在湟水下游以南，与允街县隔河相望。

按《水经注》文，令居、允街故城的位置是落不实的。因为浩亹河（阎门河）至逆水间找不到一条叫涧水的河，这就架空了令居故城的位置；同样，也找不到发源于允街谷而下入于湟水的龙泉，因此允街故城的位置也被架空了。

20 世纪 70 年代出版的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第 22~23 图和 50~51 图，对今兰州市境内的汉代金城郡辖县的治所标注得十分明白。

据《地图集》，浩亹河流经浩亹县后入湟，与《水经注》同；《地图集》逆水流经令居、允街、枝阳，标令居于逆水上游；而允街因今庄浪河谷有龙泉驿地名，故《地图集》标其位置于逆水流域；枝阳被标在逆水下游。所以《地图集》之标注有三点不同于《水经注》文：涧水消失了，涧水即逆水，所以标令居于逆水上游；涧水与逆水汇入湟水之间某处的允街不存在，允街境之龙泉即今庄浪河谷之龙泉，故允街以今龙泉定位在庄浪河谷即逆水旁，所以今庄浪河谷除汉枝阳县外，还有令居、允街；逆水不汇入湟水，而是汇入金城河即今黄河。《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允街落实到今庄浪河谷之龙泉驿附近。

关于允街故城的位置还有一说，见 1963 年日本学者尾形勇在《史学杂志》第 72 编第 4 号发表的《关于汉代屯田的几个问题》一文。尾氏说：

《水经注》关于允街位置的记载是错误的，允街也可能位于湟水流域的西部。我之注意到这种可能性，是受到《汉书·地理志》关于各县的记载顺序的启示。《地理志》中关于金城郡各县记载的顺序，很可能是按一定规则排列的。具体说，允吾是诸水的汇合点，地理位置居中，在《地理志》中记在开头。浩亹、令居、枝阳作为位于湟水三条支流的三个县，集中在一起。然后记载湟水南岸，以允吾为基准，由近而远地排出金城、榆中、枹罕、白石、河关诸县，河关县是在河南，离允吾最远的县。再往下是从湟水边的破羌开始，也以允吾为基准，由近而远的向湟水上游伸展，依次记载安夷、临羌。这样，除了允街之外，其他十二县的记载顺序全都按一定的规则排列，而允街在《地理志》中则是排在破羌和安夷之间的。按照我的观点，即诸县的记载顺序都按一定的规则，那么允街也不可能是例外，它本来就应当位于破羌和安夷之间。

尾氏要说明的问题是：赵充国河湟屯田于神爵二年（前 60 年）停止后，按汉代先屯田，再建县、移民，开发边地的一般原则，势必要在屯田区设县。他认为破羌、允街不仅是在从临羌到浩亹的屯田区内，又都是于神爵二年（前 60 年）设县的。但《水经注》将允街列于浩亹之东，他认为是错误的，因为不符合《地理志》金城郡各县记载顺序的规则，所以说了上面引证的一段话。

笔者同意允街县不在逆水即今庄浪河谷这种说法，兹举证于后：

第一，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庄浪河谷有三个汉县：令居、允街、枝阳，在短短一百余华里的河谷设了三个县，无论如何是显得多了些。同时在新占领地区设县，辖区只能在河谷内，不可能向两侧发展，何况庄浪河两翼本为山区，至今仍交通不便。古代的边县地广人稀，所以不可能在百余里长的河谷地设三个县。

第二，三国时，曾从金城郡析置西平郡（汉浩亹县以西地区）；金城郡部分县为氐羌所屯，是废弃不治之地（如枹罕、河关、白石等）。当时金城郡辖榆中、金城、枝阳、令居、浩亹、允街六县。到了西晋，《晋书·地理志》记载金城郡辖榆中、允街、金城、白土、浩亹五县，令居、枝阳或被废

弃。但清人方恺对此曾提出异议："《魏书·地形志》河州金城郡有大夏县，注云，二汉属陇西，晋属晋兴。不言中废复置。《水经注·河水篇》曰：大夏水又东径大夏县故城南。《晋书·地道记》曰，县有禹庙。案后篇张氏分置晋兴郡，统大夏县。据《魏书》《水经注》两书，此县自汉至晋不改，是未立晋兴以前或属金城，或属陇西，中篇不应删去……又后篇张寔分金城之令居、枝阳二县又立永登县及广武郡，是令居、枝阳皆仍汉县之旧。又汉允吾县属金城郡，阚骃曰：允吾县西四十里有小晋兴城，疑晋仍汉旧，均不当删。"所以方恺认为，《晋书·地理志》不载之大夏、令居、枝阳、允吾等县，均为汉县，史书未言中废复置，当为自汉至晋不改之县。这说明《晋书》有失载之县，如金城郡令居、枝阳即是。此其一。《晋书·地理志》记张寔曾分金城之令居、枝阳二县又立永登县及广武郡，是令居、枝阳不仅是旧县，而且析置了永登，是逆水流域前凉广武郡的基本地区。请注意，《地图集》标允街在令居、枝阳之间。析令居、枝阳二县地立永登县，则永登县正当允街县之地，也说明允街县不在逆水流域，否则就只能是改允街县为永登县了。

第三，允街不在逆水流域，还有十六国诸凉、前秦、西秦等国金城郡、广武郡辖县可证明。《十六国疆域志》记载：

前凉　金城郡领六县：允吾　金城　榆中　允街　白土　浩亹
　　广武郡领五县：广武　令居　枝阳　永登　振武
前秦　金城郡领六县：允吾　金城　榆中　允街　白土　浩亹
　　广武郡领五县：广武　令居　枝阳　永登　振武
后凉　金城郡领六县：允吾　金城　榆中　允街　浩亹　盘夷
　　广武郡领五县：广武　令居　枝阳　永登　振武
后秦　金城郡领六县：金城　榆中　允街　浩亹　允吾
　　广武郡领五县：广武　令居　枝阳　永登　振武
西秦　金城郡领六县：允吾　榆中　允街　金城　白土　浩亹
　　广武郡领四县：广武　令居　枝阳　鹨武
南凉　金城郡领七县：允吾　金城　允固　白土　榆中　浩亹　盘夷

广武郡领五县:广武 令居 枝阳 振武 永登

北凉 金城郡领七县:允吾 榆中 允街 金城 白土 浩亹 盘夷

广武郡领五县:广武 令居 枝阳 永登 振武

以上引录资料中的县,允吾、允街、浩亹在湟水流域,金城、榆中、白土在黄河沿岸,而广武、令居、枝阳、永登、振武[③]均在逆水即今庄浪河沿岸,唯盘夷不详今地,或在湟水一带。由此可知,十六国时期金城郡各县均在河湟地区,而广武郡各县集中在逆水沿岸。故而用逆向考察法亦可证明,允街从汉至晋不在逆水流域,而在湟水流域。

湟水长达数百里,允街县是在浩亹县以东的湟水流域,还是在浩亹县以西的湟水流域?并未涉及到。按《水经注》文,允街县在湟水下游今兰州市红古川以北某地,其南则为允吾县,以湟水为界,一南一北,故而王莽时两县合并称修远县。尾形勇认为,赵充国屯田区在临羌到浩亹间,其间"有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者达两千顷以上。屯田停止后,汉王朝在临羌至浩亹间的屯田区置县,其年代如破羌、允街又均置于神爵二年(前60年),所以允街县应在浩亹以西,"应当位于破羌、安夷之间"。

尾氏的说法从逻辑上讲是正确的,但未必符合事实。因为《二十五史补编·三国郡县表附考证》载,东汉建安中曾析金城郡置西平郡,大体以浩亹水为界,其西为西平郡,其东金城郡。西平郡治西都(今青海西宁市),辖破羌(今乐都东)、安夷(今乐都西)、临羌(今湟源)、西都诸县。若允街县在破羌以西,当属西平郡,但西平郡无允街县。金城郡治榆中,辖金城、白土、浩亹、令居、允街、榆中诸县。若允街在破羌以西,则不会属金城郡。至于说允街县在临羌到浩亹间的赵充国屯田区内,那是毫无问题的。因为屯田区是从临羌县到浩亹县,浩亹县辖区包括湟水下游北岸,在浩亹县之东境置允街县,是不能排除允街县在屯田区之外的。所以允街县应在湟水下游北岸,与允吾县隔河相望,王莽时合而为修远县。我们虽落不实龙泉,但《水经注》关于允街方位的记载大致不误。

**注释：**

①《新校〈晋书地理志〉》凉州金城郡条。

②允固，或为允街之误。

③振武，据《读史方舆纪要》和《大清一统志·凉州府古迹》记载，应在庄浪河上游。

作者：刘光华，1935年出生，男，陕西西乡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河西地理略考

郝树声　张德芳

## 一

悬泉汉简中，有一枚详细记载河西若干地区驿置道里的简牍（以下简称“悬泉里程简”），恰与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出土的从长安到河西的里程简（以下简称“居延里程简”）相衔接，构成了一幅较为完整的从长安出发西到敦煌的里程表。对于研究两关以东丝绸之路的行进路线、两汉时期西北地方的驿传设置和详细里程，以及对今天河西一些汉代城堡遗址的考实，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简文是：

会松去鴈鸟六十五里、鴈鸟去小张掖六十里、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氐池去觻得五十四里、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

该简出自第二发掘区0214探方第一层。该探方出简1307枚，而第一层出简133枚，纪年简有西汉永始（3枚）、建平（2枚）、元始（10枚）和王莽居摄（1枚）四个年号。所记述的资料反映西汉末年成、哀和王莽时期的情况。简文分三栏，第一栏记述武威郡沿途各县里程，向西延及张掖郡的显美；第二栏记述张掖郡沿途各县里程，向西延及酒泉郡的表是；第三栏记述酒泉郡沿途各县驿置里程，向西延及敦煌郡的渊泉。每一栏内容连贯，相对独立。本节仅就第一栏简文所涉及内容作一些考述。

该栏所涉及的五座县城，依次为仓松、鴳鸟、小张掖、姑臧和显美。仓松即西汉苍松，或认为，西汉苍松县后汉改为仓松县。其实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中，“仓”“苍”二字是通用的。《诗·王风·黍离》“悠悠苍天”，《释文》“苍本亦作仓”；《史记·太史公自序》“张苍为章程”，《汉书·司马迁传》“苍”作“仓”；《汉书·严助传》“胶仓”，《艺文志》作“聊苍”。可见，简文中的“仓”“苍”是通假字。鴳鸟”当为“鸾鸟”。汉简文字中，为简便起见，一些笔画繁多的字往往被省略了一个或数个组成部分，鴳字当属此类情况，书写时省掉了上部的“言”和“糸”。小张掖，应为《汉书·地理志》所载武威郡属县张掖县，而非张掖郡。为使同张掖郡相区别，前面冠以“小”字，这在汉 简记载中不乏其例。上述五县，从乌鞘岭北坡开始，由东南而西北，横贯两汉武威郡全境。

关于两汉苍松、鸾鸟、张掖、姑臧、显美等县的具体位置，后世史家多有研究，但都聚讼纷纭，迄今未有定论。两千多年前所建城市，很难一一与今天 的故城遗址对应起来。尤其是那些当年建筑在绿洲农耕区的城市，今天除了继续沿用的以外，大多已荡然无存，如果一定要给两汉的每个县城指出一个今天的故城遗址，难免削足适履，张冠李戴。

居延、悬泉两处发现的里程简，属当时原始记载，简文清晰，里程确凿，精确到个位数。我们在此基础上，踏实上述五县城具体位置，或可较接近于真实。为叙述方便，本文将简文次序略加颠倒，以姑臧为坐标，依次东南而张掖，而鸾鸟，而苍松，西北而显美，逐一加以论述。

（一）姑臧

关于姑臧故城的位置，学界有三种说法：其一，在今武威城东北二里；其二，姑臧故城即今武威城西北 2 千米的金羊乡赵家磨村南的锁阳城；其三，即今武威城所在地。

第一种说法，最早见之于明代陈循等人所修《寰宇通志》。该书《陕西都指挥使司·古迹》载：“姑臧县城，在凉州卫城东北二里，汉置县，遗址尚存。” 其后，《明一统志》、清顺治《凉镇志》、清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都延用其说。但近世以来，在武威城东北 2 里一直未能找到姑臧

故城的遗迹遗物，况又缺乏早期文献依据，故此说可靠性令人怀疑，多为今人所不取。

第二种说法，见李并成所著《河西走廊历史地理》。书中认为，西汉姑臧故城即今武威市西北 2 千米的金羊乡赵家磨村南锁阳城，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东南迁至今天的武威市。主要依据有二：一是《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十七年五月，即公元 51 年）“北匈奴遣使诣武威乞和亲”，李贤注曰：“武威，郡，故城在今凉州姑臧县西北，故凉城是也。”二是《水经注·都野泽》：“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泽，泽水二源，东北流为一水，径姑臧县故城西，东北流，水侧有灵渊池。”两条材料均有“故城”一说，既然有“故城”，那么必有“新址”，因而当时的“新址”即沿用至今的武威城，而当时所指“故城”即为今城西北 2 千米处的锁阳城。

依此说法，尚有诸多疑点不能解释。首先，李贤的注文比较含糊，并未明言武威郡故城即为姑臧故城。依照常理，武威郡治如果是姑臧故城，下面的注文应是“姑臧故城是也”，相反却是，“故凉城是也”。这里就牵扯到“故凉城”即武威郡治是否一直在姑臧。如果不在姑臧，那么就如有些论者所言，武威郡治始治武威，即今民勤县东北，而后才迁至姑臧，那么注文中的“西北”，倒可能是“东北”之误。其次，如上所言，如果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姑臧县城已由西北 2 千米的锁阳城迁至今天的武威市，李贤注《后汉书》当应有所交代，不能光讲“故城”而不讲“新址”。再说，不论姑臧县城是否东迁，匈奴求和亲，自然应该到武威郡治姑臧，李贤在这里专门注出武威郡故城，似乎姑臧县虽迁，但郡治仍在故城，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第三，《水经注》征引王隐《晋书》“凉州有龙形，故曰卧龙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本匈奴所筑也”。

郦氏对此持肯定态度，即凉州城，也即姑臧城，最早是由匈奴所筑。所谓“故城”，当亦指此。说都野泽正源（即汉之谷水）流经姑臧县故城西，亦未尝不可。第四，匈奴所筑盖臧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依汉里计，1 里 =415.8 米（王莽货布尺和铜斛尺以及汉简常规尺寸），7 里=2910.6 米，3 里 =1247.4 米。而今天的赵家磨锁阳城遗址，位于赵家磨村北 200

米，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20米，南北宽90米，墙垣皆毁，仅存后代庙址2处。城址曾出土有灰陶片和汉砖，确系汉代遗物。但从规模和形制上看，两者相差甚远，不可能是西汉之姑臧城。

第三种说法，姑臧故城始终就在今武威市城范围之内。这一说法最早见之于《西河旧事》。其后王隐《晋书》、郦道元《水经注》、房玄龄等人所撰《晋书·张轨传》、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以及清人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均认为，后世姑臧城是在匈奴盖藏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的基础上整修而成，尤其是《嘉庆重修一统志》，将姑臧城由匈奴始筑，后经历代整修利用，一直到元代的建置沿革叙之甚详。今人梁新民《姑臧故城地理位置初探》[①]认为：东汉武威郡的官署遗址，前凉张氏"大城姑臧"的一些重要遗址以及后凉吕光时修筑的罗什寺及罗什寺塔均在武威城内。隋末李轨割据武威，又在原城基础上增筑外城，直到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年)，都指挥濮英又将原城"增高三尺，周减三里许"。说明武威城一直是历史上的姑臧城，并未迁治，只是历代修建的范围大小不同而已。笔者赞同这一看法。

(二)张掖

张掖县，前汉置，属武威郡，在今武威城南，后汉因之，曹魏废。由于相对于武威郡其他各县，张掖县设置时间较短，曹魏以后再未复置，因而早期史书有关张掖县的史实及沿革反映极少。后世一些史地著作中大都认为两汉时期的张掖县在武威城南，如乾隆《大清一统志》、王先谦《后汉书集解》、钱坫等《新斠注地理志集释》、汪士铎《汉志释地略》等。但问题在于在武威以南什么地方？说法不一：其一，在凉州以南二百里。《旧唐书·地理志》所记河西节度使所辖军镇有"张掖守捉，在凉州南二里，管兵五百人"，校勘记曰："《通鉴》卷二一五注'二里'作'二百里'。《新唐书·地理志》"凉州武威郡"下亦曰："南二百里有张掖守捉。"很明显地，《旧唐书·地理志》"二"后脱一"百"字。《通典》卷一七二云："张掖郡守捉，东去理所五百里，管兵六千三百人，马千匹。""三"恐为"五"之误。而《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亦云："张掖守捉，东去理所五百里，管兵六千

五百人，马一千匹。”校勘记云：此“五百里”，疑“五”为“二”之误，想把这两条记载与新、旧《唐书》的记载一致起来。其实，从驻防地点及管领兵马数额看，张掖守捉在唐代数百年间似有大的变动，或因后来防守吐蕃的需要而曾迁徙过。与汉代张掖县无涉。由于新、旧《唐书》的这一记载，后世一些史家都把两汉张掖县同唐代张掖守捉联系起来。清人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张掖”条下曰：“唐书地理志，凉州南二百里有张掖守捉，盖因旧县为名。”似乎两汉张掖县与唐代张掖守捉在一个地方。王先谦《汉书补注》、安维峻《甘肃全省新通志》卷一三《古迹》“张掖废县”条也都原文因袭。其二，即今武威市张羲堡。《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历史地名辞典》[2]持此说。其三，在武威县以北洪祥滩。王宗维《汉代河西四郡始设年代考》以及《秦汉之际河西的民族及其分布》[3]二文认为：“今武威县西北与永昌县交界处的洪祥滩，汉代墓葬建筑遗址很多，这里有个地名叫张羲，据云是因张羲沟得名，大概这就是汉代张掖县的遗址。”不难看出，不论是南二百里张掖守捉之说，还是今武威县张羲堡之说，抑或武威以北洪祥滩之说，都是从后世地名发音上来联想，缺乏直接根据。以上诸说，李并成的《河西走廊历史地理》一书辨之甚详。同时李书根据“居延里程简”中“循次到小张掖六十里”的记载，考定汉代循次县故城在今古浪县土门镇西 3 千米处的王家小庄附近。由此六十汉里（即今 25 千米）的张掖废县应为今武威王景寨故城。这一看法，把过去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但考之“悬泉里程简”的记述，仍不尽相合。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把“居延里程简[4]”引述如下：

长安至茂陵七十里、茂陵至茯置川五里、茯置至好止七十五里、好止至义置七十五里、月氏至乌氏五十里、乌氏至银泾阳五十里、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媪围至居延置九十里、居延置至至觻里九十里、觻里至循次九十里、循次至小张掖六十里、删丹至日勒八十里、日勒至钧耆置五十里、钧耆置至屋兰五十里、屋兰至垒池五十里。

四栏简文分别记述了从长安到河西、张掖郡氐池县的四段路程。其中第三栏记述的是由汉代媪围到武威郡张掖县的一段里程。看得出来，所记

里程的行走路线与“悬泉里程简”第一栏所记述的路线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从今天的靖远哈思堡渡河进入今景泰县境,绕过县境寿鹿山东麓,经古浪大景、土门一线进入今武威境内。而后者则是翻越乌鞘岭,经天祝、古浪到今武威境内。两条线殊途同归,均在汉张掖县会合。从“悬泉里程简”第一栏反映的情况看,其行走路线基本为今天兰新铁路和312国道的走向。依此方向,“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即今28千米。因而汉张掖县城的具体位置应在今武威市南谢河乡武家寨子一带。这里地处黄羊河(汉谷水上游)东岸,土地平衍,地势辽阔,比靠近汉塞的王景寨设县条件要好。而且就交通而论,不管是靖远一线,还是乌鞘岭一线在这里会合,地理条件亦更为适中。符合“居延里程简循次距小张掖六十里”(25千米)和“悬泉里程简”“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28千米)的记载。从姑臧到小张掖的里程要比小张掖到循次的里程远。如果王景寨故城为汉张掖废县,它与姑臧县的距离反近于其与循次县的距离。再说,从乌鞘岭一线到姑臧,如果绕道王景寨就显得迂回。相反,由靖远一带到姑臧,尤其是从循次(即今古浪土门镇以西)到今谢河武家寨子,却比较便捷。因而笔者认为,两汉张掖县故城应在今武威市南谢河乡武家寨子一带。这里西距韩佐乡五坝山汉墓12千米,1984年在五坝山3号汉墓出木牍有云:“张掖西乡定武里田升宁今归黄过所无留难也故为□□□。”[5]说明这里是汉代张掖县的西乡。由五坝山隔杂木河西望,就是著名的磨嘴子汉墓群。1959年至1972年先后四次在此清理发掘汉墓72座,出土陶器、木器、漆器、丝织品等许多珍贵文物。其中469枚“仪礼简”、王杖十简,1986年又出土过26枚“王杖诏令册”,很可能就是汉代张掖县境的遗物。

(三)鸾鸟

鸾鸟,《后汉书》李贤注:读曰雚爵,即“鹳雀”。前汉置县,属武威郡,后汉因,曹魏时废。鸾鸟县究治何处?后世史家大致亦有三种说法:一是武威西北说,二是永昌西南说,三是武威以南说。

武威西北说,最早见于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该书卷四〇“神乌县”下记曰:“本汉鸾鸟县,张天锡改置武兴县,后废。武德三年,又

于城内置神乌县，与姑臧分理，神乌理西，姑臧理东。”考前凉张氏武兴县，《大清一统志》“武兴故城”条下曰“晋永嘉五年，张轨以秦雍流人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统武兴、大城、焉支、襄武、晏然、新郭、平狄、司监等县。”可见，前凉武兴县和武兴郡都在武威西北。《旧唐书·地理志》：“神乌，汉鸾鸟县，属武威郡。后魏废。总章元年，复于汉武威城置武威县⑥。神龙元年改为神乌。于汉鸾鸟古城置嘉麟县。”《新唐书·地理志》：“神乌，武德三年置，贞观元年省。总章元年复置，曰武威，神龙元年复故名。嘉麟，神龙二年于故汉鸾鸟县城置，景龙元年省，先天二年复置。”这里就发生了如下错误：从词义上讲，神乌即鸾鸟。既然唐有神乌县，自然就是汉代鸾鸟县的延续。唐初虽将神乌置于武威城内，与姑臧各治东西，但于神龙二年（706年）又在武威西北置嘉麟县，那么嘉麟县所在就成了汉代鸾鸟县之所在。可见汉鸾鸟县具体位置在唐宋人著作中就已搞混乱了，以致在一些清人的著作中也沿袭了这一错误。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在“鸾鸟”下注曰：“宋祁曰，鸟，邵本作乌。段玉裁曰，宋有神乌县，乌是也。先谦曰，旧唐志、元和志皆作神鸟县，段说未审。后书桓纪注，鸾音翟。段颍传注，鸟音爵。旧唐志鸾鸟读曰鹳雀，唐于此置嘉麟县。若作乌，不能读为爵也。续志后汉因。”汪远孙的《汉书地理志校本》亦曰：“鸾鸟，段曰宋有神乌县，乌是也。”显然，他们已经完全把汉之鸾鸟和唐之神乌当做一回事了。注意的焦点已不是鸾鸟县治究在何处，而是“鸟”与“乌”的是与非了。其实，汉代鸾鸟县在曹魏时已废，时隔四百多年后，唐置神乌县，在时间和空间上绝非汉代之鸾鸟。两者除词义上相通外，再找不出其他的必然联系，正如《嘉庆重修一统志》所言：“按元和志，唐神乌本汉鸾鸟县，张天锡改置武兴县。旧唐志，鸾鸟县后魏废。神龙二年于故城置嘉麟县。今考武与、嘉麟皆在今县西北，恐皆误。”李并成的《河西走廊历史地理》将汉之鸾鸟指为今永昌县水源乡北地村以北的沙城子古城，该古城俗名“古城关”，基本位于武威城北，略偏西10度左右。北靠汉塞2千多米，塞外茫茫戈壁。古城与汉塞之间隔以西沟林场用以防风固沙，20年前古城周围还是一片荒芜，近些年城外城内被农民辟为耕地，打井灌溉，城址破

坏严重。肇者近些年多次去城址考察，从散布遗物看，确系汉唐故城，但从地理位置看，绝非汉代鸾鸟县城。

永昌西南说，最早发端于《读史方舆纪要》。其云："鸾鸟城在（永昌）卫西南……属凉州。"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因其说。乾隆、嘉庆两部《永昌县志》又加以引申，指出"依鸾鸟山故名，上房寨子即其遗址"。今编《永昌县地名资料》以及新修《永昌县志》亦载："鸾鸟县城遗址位于大河坝村上房寨子（今西大河水库西侧高地上）。距今县城约 70 千米。1968 年修建西大河水库时发现，1981 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旧说相沿，几成定论。实则亦为望文生义之臆说，并无确凿根据。今日西大河水库西侧遗址东距番和、骊靬遗址尚有相当距离，距今县城 100 多千米，正如李并成先生所说："武威郡在东，张掖郡在西，鸾鸟县属武威郡，其位置不可能在张掖郡所辖的番和县以西⑦。"

其实，封鸾鸟县具体位置最早亦最可靠的说法是武威以南说。《后汉书·段颎传》云："永康元年（167 年），当煎诸种复反，合四千余人，欲攻武威，段颎追击于鸾鸟，大破之，杀其渠帅，斩首三千余级，西羌于此弭定。"李贤注曰："鸟音爵，县名，属武威郡，故城在今凉州昌松县北也。"嗣后的《大清一统志》、钱坫等的《新斛注地理志集释》、汪士铎的《汉志释地略》以及今人编写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亦持此说。这一说法，基本确定了汉代鸾鸟县的大体方位，但具体位置还有待研究。

《汉书·西羌传》有一段记载："建光元年（121 年）……麻奴等又败武威、张掖郡兵于令居，因协将先零、沈氐诸种四千余户，缘山西走，寇武威。（马）贤追到鸾鸟，招引之，诸种降者数千，麻奴南还湟中。"这里，羌豪麻奴等在令居大败武威、张掖郡兵，准备北寇武威，汉将马贤追击之。麻奴等人的路线是"缘山西走"，而马贤则追击之鸾鸟而"招引之"，可见，鸾鸟的具体位置在祁连山余脉乌鞘岭的北面。这是最早反映鸾鸟县具体位置的信息。

"悬泉里程简""仓松去鴳鸟六十五里，鴳鸟去小张掖六十里"，提供了这三县的相对位置。

上文我们把汉张掖县的具体位置确定在今武威市南谢河乡的武家

寨子。汉鸾鸟县又当在武家寨子之南六十汉里(即25千米)。这里正南偏西10度左右25千米处为武威市中路乡,属山间地带,不仅由北至南进入此地要经过黄羊河峡谷地带,交通不便且与汉代苍松县不在交通线上,因而汉之鸾鸟县在此处的可能性极小。武家寨子以南偏东30度,正是古浪县北面的小桥堡一带,这里李并成考定为汉代苍松之所在。其实,按"悬泉里程简"的记载,这里当是鸾鸟县而不应是苍松县,汉之鸾鸟县舍此再无他求。

(四)苍松

汉代苍松县的具体位置,比较接近的说法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和陈沣的《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前者云:"苍松县,在(庄浪)卫西。汉县,属武威郡。后汉作苍松,晋因之。太和二年,凉张天锡击李俨于陇西,分遣前军向金城,自将屯苍松是也。志云,张氏置昌松郡,后凉吕光因郭馨之谶,改为东张掖郡。后魏复置昌松郡。后周郡废为昌松县,隋开皇初改县曰永世,后复曰昌松,属凉州。大业三年,李轨据河西,薛举遣将常仲兴击之,战于昌松,仲兴败没。唐亦曰昌松县,仍属凉州,乾元以后陷于吐蕃。宋时夏人置洪州于此,元废。"后者云:"(苍松)今甘肃古浪县安远堡,水出县南境山,北流至于县北境,出边汇为一小池。"考诸"悬泉里程简",鸾鸟县在今古浪以北小桥堡一带,那么,距小桥堡以南六十五汉里(即27千米),当在今天祝安远镇一带。《汉书·地埋志》载:"苍松,南山,松陕水所出也,北流徇次入海。"古松陕水即今古浪河。南有二源,一源自安远堡以南的乌鞘岭大柳树沟,一源自安远堡西南的青河,二源在安远堡西北相会,北流7千米,又有源于东南毛毛山的龙沟河在扎头村来会,再北流经古浪峡。唯安远镇一带四周多山,地势高亢,相对走廊各县,自然条件较差。1962年天祝藏族自治县设置于此,20世纪80年代迁至华藏寺。两汉苍松县,何由设置于此,尚待进一步探讨。

乾隆《甘肃通志》《嘉庆重一统志》《辛卯侍行记》《新斛注地理志集释》《汉志释地略》以及《甘肃通志稿》《重修古浪县志》、张澍的《凉州府志备考》都将汉之苍松指为古浪县西,盖相互因袭,未加细审容。古浪县

地处峡口地带，西翻数座大山 20 千米方为武威市张义、中路等山间谷地。张义、中路如上所论，交通不便，不处在中西交通在线。张义以东至古浪以西，山势陡峻，地理条件远不如安远镇一带平缓。至于《元和郡县图志》谓“昌松县，本汉苍松县，属武威郡。后凉置昌松郡，县属焉。隋开皇三年改昌松为永年县，后以重名，复为昌松。苍松故城，在县东北十里”，度之“悬泉里程简”，这“东北十里”之说，更是无法印证。

（五）显美

显美，前汉属张掖郡，后汉改属武威郡，地在张掖、武威二郡之间，故可改属。《三国志·魏书·张既传》：（黄初二年，221 年），凉州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文帝遣京兆尹张既代邹岐为凉州刺史，率军由金城渡河，潜由徇次出武威，“胡以为神，引还显美”。“既已据武威，遂前军显美，大破之，斩首获生以数万计，河西悉平。”从卢水胡退却路线和张既进军方向看，显美在凉州以西无疑。因此后世史家据此把显美确定在武威以西和永昌以东。

《大清一统志》《新斠注地理志集释》《汉志释地略》以及乾隆《甘肃通志》和民国《甘肃通志稿》均持此说。乾隆《永昌县志》还进一步指出：“显美城今名古城子，在县东北一里。”李并成考察了多座古城，认为地处武威市西约 20 千米的朵浪古城为汉显美城的可能性较大。但上述地区或距武威太近，或距永昌太近，均与“悬泉里程简”所记载的里距不合。根据该简记载，姑臧去显美七十五汉里（即 32 千米），由姑臧西北 32 千米处正是今天的丰乐堡一带。这里位于甘新大道必经之地，地处西营河出山口的洪积冲积带，东距朵浪古城 7 千米，而海拔比朵浪城低 10米。《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帝初闻胡决水灌显美，谓左右褚将曰：‘昔隗嚣灌略阳，而光武因其疲弊进兵破之。今胡决水灌显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这里，就地势而言，引水灌显美当言之不虚。

《汉书地理志详释》云：“显美，当为今宁远堡，在边外昌宁湖南水磨川东岸，直山丹东百里。后汉属武威郡。”该书虽名“详释”，实则“疏略殊甚，殽误实繁，与名不相符”。释郡县名义，就字面曲为解释，不通则假声

近之字附会之，再不通，则辗转通假附会之，甚而至于妄改郡县之名，加字以为训，谬误实多而不可凭信。这一点早为后人所诟詈。

总之，根据“悬泉里程简”的记述和有关文献的记载，汉之姑臧县治即今之武威县城，张掖县治当在今谢河乡武家寨子，鸾鸟县城当在今古浪县城以北之小桥堡一带，苍松县城当在今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安远镇，显美县城当在今武威西北之丰乐堡。

## 二

“悬泉里程简”涉及汉代河西地区的若干县、置，是研究丝绸之路走向和河西地区古城遗址的珍贵资料。上一节对悬泉里程简所涉及的汉代武威郡的若干地名进行考证，本节考证简文所涉及的汉代张掖郡若干城址及酒泉郡表是县地望。

简文第二栏原文是：

坚池去觻得五十四里、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

根据《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莽曰设屏。户二万四千三百五十二，口八万八千七自三十一。县十：觻得、昭武、删丹、氐池、屋兰、日勒、骊靬、番和、居延、显美（后属武威郡）。”十县中除番和、骊靬外，其余八县均有详细的里距资料在汉简中发现。其中《居延新简》有“删丹至日勒八十里，日勒至钧耆置五十里，钧耆置至屋兰五十里，屋兰至氐池五十里”[8]。所涉及删丹、日勒、钧耆置和屋兰等县的具体位置，李并成先生已著文作了详细研究[9]。居延县另当别论，因居延简的发现而材料最丰富。显美一县，笔者已在上节中作了考证，而本节所要研究的只限于悬泉里程简第二栏中所涉及的氐池、觻得、昭武、祁连置及表是。

（一）觻得

《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条下列县十，觻得为首县，说明当时的张掖

郡治在觻得。《汉书·霍去病传》载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攻祁连山,扬武乎觻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谓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注引郑氏曰:"觻,音鹿,张掖县也。"师古曰:"觻说非也。此觻得,匈奴中地名,而张掖县转取其名耳。"[10]"觻""觻"为同音字,汉隶中从鱼从角之字常可混用。如"鲜"作"鮮",见"鲁峻石壁残画像";"鳏"作"鰥"如"北海相景君铭""曹全碑"等[11]。吴卓信的《汉书地理志补注》云:"元和志:今甘州郭下张掖县,本汉觻得县。《西河旧事》云:此地本匈奴觻得王所居,因以名之。《大清一统志》:觻得故城在今甘州府张掖县西北。按觻得本匈奴地,为去病所取,乃置郡县,非取其名也,颜说误。"都说明早在河西建郡设县之前,"觻得"一地早已有之。汉觻得县治的具体地望,历来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汉代觻得县即今张掖城。清人钱坫、徐松的《新斠注地理志集释》和汪士铎的《汉志释地略》持此说[12]。另一种意见,吕吴调阳的《汉书地理志详释》认为,汉代觻得"在今镇夷堡边外羌谷水东"[13]。第三种意见,认为在今张掖市西北。上述三种意见中,第一种意见失之简单的比照对应,缺乏应有的根据和论证。认为汉之觻得为张掖郡治,今之张掖自然是汉之觻得,忽略了古今历史的发展演变。第二种意见出之吕吴调阳的《汉书地理志详释》,该书本身就是一部谬误百出、荒诞不经之作,不足信。如释"姑臧"云:"今凉州府治武威县。战被创曰臧,臧者不洁之名也。武始泽水自郡南分为二,夹郡北流而合,象姑臧也。武作母。始,女子初接于人也。"释"张掖"云:"今永昌县,或曰县东柔远骚,西接删丹。古谓于足胁皆曰掖。张掖,犹姑臧之意也。"释"休屠"云:"休当作羞,羞屠亦姑臧之意。"粗俗鄙陋可见之一斑。这一点,前贤多所诟病,认为该书"释汉志地理,疏略殊甚而殽误实繁,与名不相称"。释郡县名义,始则就字面曲为诠释,继则假声近之字附会之,再则辗转通假以附会之。辗转通假而其道仍穷,或别出心裁创为奇义,或析一名之两字各别为解,或妄改郡县之名强为之解。至若妄增地名之字以就吾说,义不可通加文以为训,则尤数见不鲜。可见这第二种意见是完全可以不予理睬的。

第三种意见，汉觻得县治在今张掖市治西北，为古今多数学者所认同，理由最为充分。最早李贤注《后汉书·明帝纪》曰：张掖，“故城在今甘州张掖县西北。”杜佑的《通典》卷一七四、《大清一统志》卷二六六、《甘肃新通志·舆地志·古迹》均持此说。那么在张掖西北何处，距离多远？《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记得比较具体：“张掖郡城，亦在今（张掖）县西北四十里，汉为郡之所。”汉唐以来，大多以300步为1里，但1尺的长度不一，两汉时1尺等于20多厘米，如新莽铜斛尺，1尺为23.1厘米，因以6尺为步，1步为1.386米，1里300步，等于415.8米。而唐代情况有别，1尺米30厘米左右，而1步则为5尺150厘米，则唐代1里等于450米左右[19]。《太平寰宇记》记载，汉张掖郡城即汉之觻得县治在今张掖西北四十里者，约等于18000米，18千米左右，正合此数。

今张掖西北17千米~18千米的西城驿沙窝，即明永乡下崖村，有黑水国故城。故城有南北2城。北城呈长方形，东西长254米，南北宽228米，城中位置在东经100°21'26"，北纬39°2'15"。南城在北城的西南方向，距北城2.5千米。平面亦呈长方形，东西长154米、南北宽129米。中心位置在东经100°20'30"，北纬39°2'。1945年，夏鼐和阎文儒先生曾到黑水国故城作过考古调查，并在周围发掘汉墓一座。阎先生在他的《河西考古杂记》（下）中认为：“以北古城及所掘汉墓言，此地即汉张掖郡治之觻得县。”又说：“此城之筑，最晚应起于汉，直至唐时仍未废[15]。”王北辰先生的《甘肃黑水国古城考》（《西北史地》1990年第2期）、谢继忠等的《西汉张掖郡治觻得考辨》（《张掖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吴正科的《汉张掖郡故城址及迁建时代考》（《西北史地》1994年第2期）、李并成[16]以及吴礽骧[17]等，亦一致认为今天的黑水国北古城即为汉代觻得县治之所在。

今张掖西北黑水国北古城城址，如上所说，呈长方形，东西长254米，南北宽228米，南墙辟门，竟宽4米。城墙黄土夯筑，基宽3.8米、顶宽3米，残高5.5米，夯层厚0.2米~0.25米。西南角有角墩，底边长9米，顶边长7.2米，残高7米。地表散见夹砂红、灰陶片及汉砖，并有明代

黑釉、豆绿釉、白釉及青花瓷片等。此城现在的形制为唐城规制，最初或为汉城，后又为明代利用，时间跨度较长。

在明永乡下崖村西 1 千米处，即黑水国南、北城址之间，有近千座汉代墓葬，新中国成立前曾被韩起功所部大量盗掘。今天地表封土大都夷为平地。从发掘清理过的 2 座砖室墓看，均为前后双室墓，前室覆斗顶，后室券顶。出土随葬品有陶仓、鸡窝、屋、井、灶等模型，用具有壶、罐、鼎、豆、簋、奁、盘、盆、勺及铜莲枝灯、铜镜、铜弩机、五铢钱等。这片汉墓的位置和规模，亦可有力地佐证汉觻得城址在今北古城的判断不误。

（二）氐池

氐池，汉简作“垔”，文献作“氐”，异体字。氐池县城的确切位置，清以前史无明载。《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注引《汉晋春秋》曰：“氐池县大柳谷口夜激波踊溢，其声如雷，晓而有苍石立水中，长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画之，为十三马，一牛，一鸟，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讨曹，适水中，甲寅’。帝恶其‘讨’也，使凿去为‘计’，以苍石窒之，宿昔而白石满焉。至晋初，其文愈明，马象皆焕彻如玉焉。”[18]此处“大柳谷口”，当为今民乐境内之扁都口。说明扁都口及其以北的地区属氐池之辖境无疑，但县城所在却无从判断。《晋书》卷一二九《载记·沮渠蒙逊传》云：“蒙逊闻男成死，泣告众曰：‘男成忠于段公，枉见屠害，诸君能高报仇乎？且州土兵乱，似非业所能济。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为陈、吴耳，而信谗多忌，枉害忠良，岂可安枕卧观，使百姓离于涂炭。’男成素有恩信，众皆愤泣而从之。比至氐池，众逾一万。”[19]《资治通鉴》将此事编入东晋安帝隆安五年（401 年）条。胡三省注云：“氐池县，汉属张掖郡，晋省，其地属唐甘州张掖县界。”[20]这是最早对氐池县具体地望的确指，但也仅此而已。清以来，史地之学大兴，对汉代氐池县的所在有了三种说法：一说在今张掖以东。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三甘肃镇条载：“氐池城在镇东，汉县，属张掖郡。后汉因之，晋省。”一说在山丹西南。《大清一统志》、徐松的《新斠注地里志集释》、汪士铎的《汉志释地略》、乾隆《甘肃通志》等记载持此说。其实这两种说法只是指出了大体方位，究在何处，并未

深究。真正指出具体位置的第三种说法是乾隆《甘州府志》。该志卷四山丹古迹条下云："氐池古城，城西南一百六十里，今洪水城。汉氐池，魏晋兰池，宋金山。"[21]其后，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22]光宣间安维峻的《甘肃全省新通志》和《山丹县志》因袭了上述说法。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中国历史地名词典》和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将其标注在今天的民乐县城，即清人所说的洪水城。

乾隆《甘州府志》将汉之氐池确指为当时的洪水城，不知根据何在。但从紧接着下面的记载"汉氐池，魏晋兰池，宋金山"看，记述的粗疏是显而易见的。晋时置西郡于删丹，分删丹置兰池、万岁、仙提，加删丹、日勒，共五县属之，而张掖郡仍有氐池、屋兰、永平、临泽四县，并时而立，历前凉、前秦、后凉而不改，所谓"汉氐池，魏晋兰池"之说不存在。此外，沮渠北凉有金山郡，北周有金山县，均在今山丹、民乐境，所谓"宋金山"，不知所指为何。可见，如此粗疏的记载，所言汉之氐池县治即清之洪水城一说，显然是无稽之谈。

居延新简出土后，今人借助新出之里程简，对汉代氐池县城的确切位置有了新的认识。李并成提出，汉之氐池县城当在今民乐县李寨乡菊花地[23]？悬泉汉简出土后，其中的里程简又引起了人们新的注意。吴礽骧著文认为，汉之氐池"西北距觻得 54 里。其方位当在羌谷水（今张掖河）河网带以东、弱水以南、今张掖市一带。氐池与觻得当以羌谷水为界。氐池县辖境，包括今张掖市东南部和民乐县境。西晋废氐池。东晋时，后凉复置。北魏再废。隋移张掖县治于张掖河东，县城或许是在汉氐池废址上，重建而成"[24]。这些看法已基本接近事实，但仍有继续讨论的必要。

悬泉里程简中"氐池去觻得五十四里"，相当于 22.45 千米。居延新简中"屋兰至氐池五十里"，当今 20.8 千米。另外 20 世纪 30 年代在金关和地湾出土的简中还有：

肩水侯官始安隧长公乘许宗，中功一，劳一岁十五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年卅六，长七尺二寸，觻得千秋里，家去官六百里。

肩水侯官并山隧长公乘司马成，中劳二岁八月十四日，能书会计，治官

民颇知律令，武，年卅二岁，长七尺五寸，觻得成汉里，家去官六百里。

肩水侯官执胡隧长公大夫奚路人，中劳三岁一月，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年卌七岁，长七尺五寸，氐池宜药里，家去官六百五十里。

从上引简文中，除氐池外，我们还能找到三个坐标点，即觻得、屋兰、肩水侯官（今地湾）。根据三个坐标点对氐池的记载，或可找到氐池的准确位置。上已述及，汉之觻得，即今张掖市治西北黑水国北古城，东南距张掖 18 千米，而觻得距氐池为 22.45 千米，因之氐池当今张掖市东南 2 千米左右梁家墩镇梁家墩村一带，位置在东经 100°28'、北纬 38°55' 的范围内。今梁家墩镇驻饮马桥，1953 年分别设置过梁家墩、迎恩、清凉寺、太和、三工等乡，1955 年合并为梁家墩、三工二乡，1958 年合建梁家墩人民公社，1983 年改公社为乡，近年又改乡为镇。梁家墩村就在该镇的西北 2 千米处，明清时有梁家堡，明以前旧址已毁废无考。

汉代屋兰县，意见比较一致，治今张掖城滩乡东古城，清代仁寿驿。从东古城到梁家墩，直线距雕 18 千米，实际路程当在 20 千米左右，而“屋兰至氐池五十里”，50 汉里为 20.8 千米，正合此里距。汉代的肩水侯官在今金塔县双城乡东北 25 千米处，东经 99°56'，北纬 40°35'。侯官以北不到 1 千米处即为肩水金关。从觻得即今黑水国北古城出发，沿黑河西北行，在高台境内穿越正义峡，折而东北至肩水侯官和肩水金关，约 250 千米，正合上引简“觻得千秋里”和“觻得成汉里”“家去官六百里”的记载。官指肩水侯官。上引地湾 179.4 号简所谓“氐池宜药里，家去官六百五十里”，说明宜药里当在氐池县城附近，亦与上文所判定的氐池县位置相合。

明清洪水城即今之民乐县城，西北距张掖市 65 千米，再到黑水国北古城 18 千米，共 83 千米，合汉里为 200 里，近乎原距离四倍。可见汉之氐池城绝不可能在今之民乐县城，而只能是张掖市东南郊梁家墩之地。

（三）昭武

昭武一地，汉以前本为月氏地。月氏为匈奴所迫西迁而进入中亚，后再迁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建立了大夏和贵霜王回。而散落在中亚一

带的部落到南北朝隋唐时有昭武九姓。《北史》《隋书》和新旧《唐书》均有记载，汉之昭武县就是在月氏昭武城的基础上修筑并沿用了原来的名称。《隋书·西域传》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然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25]此所谓"祁连山北昭武城"，当为汉代建县筑城之处。《后汉书·梁慬传》载，永初元年（107年），朝廷罢西域都护。二年（108年）春，都护段禧、骑都尉赵博和副校尉梁慬还至敦煌，"会众羌反叛，朝廷大发兵西击之，逆诏慬留为诸军援。慬至张掖日勒。羌诸种万余人攻亭侯，杀掠吏人。慬进兵击，大破之，乘胜追至昭武。"李贤注昭武曰："县名，属张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张掖县西北也。"[26]清人的史地著作如徐松的《新斠注地里志集释》、汪士铎的《汉志释地略》《大清一统志》和《甘肃通志》等对昭武故城的记载，一仍章怀太子之旧，或云在甘州府西北，或云在张掖县西北，都只点明了大体方位，而未指出具体地点。唯乾隆《甘州府志》卷四抚彝厅古迹条下所记："昭武故城，城东北四十里。土人云，遗址尚存，在今板桥东南，古月氏城，而汉县因之。晋避文帝讳改临泽，后魏时废。北凉有临池郡，亦其地也。按《唐书》，月氏至唐时分十余国，而其酋率自称昭武人云。"按，清抚彝厅始置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治今蓼泉乡。1913年改厅为县，曰抚彝县，1928年更名临泽县，1952年从蓼泉乡迁治沙河堡，即今县政府驻地城关镇。《府志》所言昭武故城在抚彝厅东四十里，即今蓼泉乡以东四十里。这是最早对昭武故城的确指。其后安维峻的《甘肃新通志》，杨思、张维等的《甘肃通志稿》也都如是说。《中国历史地名词典》指汉之昭武县"治所在今甘肃临泽县西北旧临泽县之东"，其亦未超出上述意见的范围。

那么汉之昭武县究竟在今天什么地方？李并成认为，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一带"与诸史籍所载方位皆合，汉昭武县故城位于这一带是颇有可能的"[27]。笔者赞同这一说法，不过李氏发表这一意见时，尚未看到悬泉汉简中的里程简，本文就是想利用里程简的准确记载为汉昭武城位置

增添一新的论据。里程简“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62 里 =26 千米左右,从今天张掖西北明永乡西城驿沙窝的北古城西北行,到今临泽县鸭暖乡张家寨子东南 2 千米处的昭武村,正好 26 千米左右,符合 62 里的里距。据李并成走访,周围曾有古城一座,毁于 20 世纪 50 年代。另据考古调查,村南 2 千米的南板滩上,遍布汉墓,范围有 360 万平方米,有汉代器物和五铢钱出露。这里平畴沃野,土肥水美,气候适宜,交通便利,是置郡设县的理想之处。所谓“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者,疑张掖郡曾有过移驻于昭武的历史。

(四)祁连置与表是

“悬泉里程简”中有“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祁连置为张掖郡西部一处驿置机构,其功能和悬泉置相若,承担公文信件的传递和过往人员的接待。从昭武县沿羌谷水南岸西行 61 汉里即 25 千米左右,即到今蓼泉乡西部的双泉堡,以里距准确测算,此地当为汉之祁连置所在。这一见解已故吴礽骧先生已经指出[28]此地明清有堡寨,清设双泉塘,驻有马、夫若干。从地理位置看,汉代在此设祁连置,当为张掖郡进入酒泉郡表是县的必经之地。

表是,《续汉志》作表氏。是、氏通用。两汉魏晋以及前秦五凉(除南凉外),表氏县先属酒泉郡,前凉张骏后改属建康郡,后魏废。至于具体位置,过去的记载大都过于笼统。《后汉书·灵帝纪》:光和三年(180 年)秋,“表是地震,涌水出”。李贤注曰:“表是县,属酒泉郡,故城在今甘州张掖县西北也。” 汪士铎的《汉志释地略》云:“表是,高台西南。”徐松的《新斠注地里志集释》《大清统一志》和《甘肃通志》均载:“表是故城,在高台县西。”

研究表是县的具体城址,首先要弄清的一个问题就是两汉的表是县曾经因地震而有过搬迁。上引《后汉书·灵帝纪》云:光和三年(180 年)秋,“表是地震,涌水出”。《后汉书·五行志》亦云:“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余动,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倾,县易处,更筑城郭。”[29] 说明光和三年前后,表是县城的位置不在一处。而汉简所记载的表是县与有

关地方的里距只是地震以前情况，至于地震以后的表氏县城只能根据别的材料加以判断。李并成的《河西走廊历史地理》认为，地震前的表是县城当在今“酒泉市屯升乡沙山村北 15 千米处的新墩子古城”，而地震后的表氏县当为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海乡的草沟井城”。但我们根据悬泉里程简记载的情况和其他材料判断，光和三年前的表是县城当在今高台县黑泉乡定安一带。上引里程简有“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的记载。同时还有一条几乎内容相同的记载是：“表是去祁连置七十里”，可见这一里距的记载是相当准确的。那么，上面所说祁连置的位置只能在今临泽县蓼泉乡西边的双泉堡，而双泉堡西行七十汉里，即 29 千米左右，其地正是黑泉乡南部的定安村。从删丹、屋兰、氐池、觻得、昭武到祁连置和表是的具体位置看，有两条基本规律，其一是县、置城址的设置基本沿着走廊腹地由东向西排列开来；其二是筑城设县基本沿着弱水和羌谷水两岸近水处。按照这两条规律和简赎所记里距材料，围绕已知的坐标，我们将地震以前的表是县城确定在高台中部的定安一带，当不会有太大误差。县治搬迁的原因是因高“地八十余动，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倾”。想在两千年后的今天找到遗址和故城比较困难。今酒泉市屯升乡沙山村北的新墩子城距临泽双泉堡直线距离约 70 千米，合 160 多汉里，与当时里距不符，显然是不可能的。《甘肃日报》2002 年 9月 6 日刊载高台县博物馆赵万钧同志的文章，认为光和三年地震前的表是当在骆驼城以北约 8 千米～9 千米的黄河湾（“河”当为“沙”之讹）[30]，同样道理，此处距临泽双泉堡约有 42 千米，相当于 100 里以上，与汉简中记载的里距差异较大，亦不能令人信服。今日的双泉堡即我们所考定的汉代祁连置，在北纬 39°，东经 99°58′，即令离开羌谷水流域直线距离往西走，29 千米的距离，最西也只能到东经 99°38′，西距骆驼城还有将近 6 千米。而黄沙湾在北纬 39°05′，东经 99°31′，超过汉简里距 13 千米左右，这就是我们认为黄沙湾不可能是汉代表是县的理由。

至于迁址后新筑之表氏城，即今天的骆驼城。有些史籍认为今骆驼城当为汉代之乐涫城。最早是乾隆《肃州新志》高台县古迹条下如是说，

“骆驼城，在县西南四十里。旧志：即汉乐涫县。旧北凉段业建康郡故基”[31]。后来《甘肃古迹名胜词典》亦沿用其说，认为后世的骆驼城即是在汉乐涫县的遗址上建立起来的。其实乾隆《肃州新志》所引旧志材料是靠不住的。按张维的《陇右方志录》所载，肃州旧志四部：一部是《元肃州志》、一部是《明肃州新志》，均已亡佚。一部是《万历肃镇志》，一部就是上面所引用的乾隆《肃州新志》。高台志有两部：一是《万历高台所志》，亦佚。一部是民国《高台县志》[32]。乾隆《肃州新志》所云“旧志”，只能是《万历肃镇志》或《万历高台所志》，而后者今已不可得见，至于前者有顺治重刻本，其史料价值前人早有定评。清人黄文伟在《重修肃州新志序》中云：“先翻肃镇旧志，见其板刻漶漫，笔画舛讹，至不可句。”[33]至于其内容，张维引《重修肃州新志》凡例云：“旧志误谬颇多，亥豕鱼鲁，难以枚举。如酒泉太守竺曾而讹为竺会；张奂渊泉人而讹为酒泉人；大禹治水合黎而致疑龙门、积石不在于此；及慧达，沮渠蒙逊时僧而或为明初。”这样一部谬误百出的书，所谓“骆驼城即汉之乐涫城”的记载能够征信吗！

近年在骆驼城附近发现的墓葬中，多有表是县的记载。如高台县博物馆藏有一块红色铭旌，长 62 厘米，宽 46 厘米，上面红底白字：“元康元年十二月庚戌朔晋故凉州酒泉表是（下部残破）”的字样。元康元年为公元 291 年，晋惠帝司马衷的年号。说明其时的表是县尚属于酒泉郡，县境当在今日骆驼城周围。该馆还藏有 1997 年发现的一块前凉时期的木牍，全文 179 字，内容如下：

建典廿四年三月癸亥朔廿三日乙酉，直执凉州建康表是县显平亭部前玉门王领校周振、妻孙阿惠得用今岁月道通葬埋太父母以次入蒿里，三九入太一，下从玄入白葬，后世子孙法出二千石，宗人室家共祭送死人周振、阿惠金银钱财，五穀粮食，荔子黄远，牛羊车马，猪狗鸡雏，楼舍帷帐，栝杆盘案，彩帛脂粉。诸入冢什物，皆于方市买，贾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上至苍天，下至黄泉，不令左右伋 ，名时旁人。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沽绘各半如律令。

建典是愍帝司马邺的年号，313 年至 316 年共四年时间。但前凉张氏

割据河西，奉晋正朔，张柞之前沿用建典年号，建典廿四年，当为336年，值前凉张骏。从木牍内容看，前凉时张氏置建康郡，而表是隶建康而不隶酒泉。《周书·史宁传》："史宁，字永和，建康表氏人也。曾祖豫，仕沮渠氏为临松令。魏平凉州，祖灌随例迁于抚宁镇，因家焉[34]。""表氏"原作"袁氏"，《周书》校勘记云："钱氏《考异》卷三十二云：'此凉州之建康，非扬州之建康也。袁氏当为表氏之讹。'按钱说是。表氏是汉以来的旧县，属酒泉郡。建康郡，前凉张骏，表是县当时改属建康。"实际上自从张骏设置建康郡直到北魏被废，历前凉、后凉、西凉、北凉，表氏县都属建康郡而不属酒泉郡。民国《甘肃通志稿·舆地志》将其隶酒泉郡下不确。据此，上引骆驼城周围墓葬所出木牍证明，汉代光和三年地震后的表氏县城即在今天的骆驼城。

根据上面论证，我们的结论是：汉代的觻得县城在今张掖市西北18千米处的黑水国北古城，位置在东经100°2' 30"，北纬39°02'。汉之氐池县城当在今张掖市东南2千米左右梁家墩镇梁家墩村左近，位置在东经100°28'，北纬38°55'的范围内，不在洪水城（即今民乐县城）。昭武县址在今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一带。祁连置的位置在临泽县蓼泉乡西部双泉堡。而汉之表是县城，光和三年（180年）地震前在高台黑泉乡之定安村一带，位置在东经99°41'，北纬39°27'；光和三年地震后搬迁至骆驼城。过去将骆驼城指为汉之乐涫城不确。

**注释：**

①刊《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

②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③前者见《西北史地》1986年3期，后者见《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④《居延新简》，中华书局1994年版。

⑤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⑥汉之武威县并不在唐之武威城,该书纪述之混乱由此可见。

⑦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⑧《居延新简》,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⑨李并成:《居延汉简里程简地理调查与考释》,《西北史地》1993 年第 1 期。

⑩《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⑪顾颉吉:《隶辨》,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⑫《二十五史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 1955 年版。

⑬《二十五史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 1955 年版。

⑭或有认为唐代以 360 步为一里,等于 540 米,但以实际距离测之,往往不合,今不取。

⑮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社会科学战线》1987 年第 1 期。

⑯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⑰吴礽骧:《河西汉代驿道与沿线古城小考》,《简帛学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⑱《三国志》,中华书局 1959 年。

⑲《晋书》卷一一九,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⑳《资治通鉴》卷一一二,中华书局 1956 年版。

㉑《甘州府志》,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 年版。

㉒刘满点校,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四,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㉓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㉔吴礽骧:《河西汉代驿道与沿线古城小考》,《简帛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㉕《隋书·西域传》,中华书局 1973 年版。

㉖《后汉书·梁慬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㉗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㉘吴礽骧:《河西汉代驿道与沿线古城小考》,《简帛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㉙《后汉书·五行志》,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㉚《高台发现大型汉代城址》,《甘肃日报》2002 年 9 月 6 日第 6 版。

㉛《重修肃州新志》,酒泉县博物馆 1984 年翻印本。

㉜张维:《陇右方志录》,北平大北印书局 1934 年版。

㉝《重修肃州新志》,酒泉县博物馆 1984 年翻印本。

㉞《周书》卷二八,中华书局 1971 年版。

作者:张德芳,1955 年出生,男,甘肃永昌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郝树声,1953 年出生,女,山东牟平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 古代河西的兴衰

齐陈骏

## 一

河西因在黄河以西而得名，又因它夹在祁连山与走廊北山之间，形成一条长约1000多公里、宽100公里或仅数公里的天然狭长地带，犹如一条长廊，故称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的历史最早见于史籍的是《尚书》的《舜典》《禹贡》等篇。其中有三危、黑水等名，后人指为今张掖黑河及敦煌三危山，其说不一定可信。但根据考古发掘，河西早有人类在此生息。仅武威地区，现发现的新石器遗址就有皇娘娘台、鸳鸯池、营盘梁、张家台、罗家湾、海藏寺、瓦罐滩、二坝、三角城、小崖子、王景寨等十余处。在酒泉地区，则有闻名中外的“火烧沟类型文化”。这一类型的文化遗址，在山丹、民乐、酒泉、玉门等地均有发现。

战国以前的河西，是羌戎等少数民族活动的地区。到战国、秦汉时期，月氏、乌孙和匈奴是河西的主人。后来月氏强大，赶走乌孙，成为河西的统治者。1957年在玉门骟马城新石器遗址出土了一批夹沙的红褐色或灰色平底的陶器，人们推测是秦汉以前乌孙或月氏人在这里活动的遗物。

月氏占有河西后，一度非常强盛。大约在秦朝时，匈奴头曼单于曾把太子冒顿送至月氏作为人质。后来冒顿逃归，杀父自立，打败月氏，迫使月氏西逾葱岭，进入今阿富汗境内。残留在河西的部分号称小月氏。自此匈奴遂占有整个河西走廊，由右贤王部下的休屠王、浑邪王管辖。

至今闻名中外的祁连山，据说是匈奴人命名的。“祁连”即“天”的意思，因其高入云霄，故名祁连山[①]。凉州武威县，原名姑臧，据说亦为匈奴语“盖藏”的转音[②]。

秦末汉初，匈奴东灭东胡，西灭月氏，南破楼兰、白羊，北服浑庾、丁零，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③]，建立起东起东北、西达新疆的强大的奴隶制游牧国家，时常侵扰汉朝边境。特别是在占有河西以后，实力大为增强，直接威胁着汉王朝的腹心地区，即关陇地区。西汉初年，由于国力不强，统治者无力反击，只能采取和亲的办法，给匈奴贵族送去大量的丝织品及酒食，借以求得边境的安宁。但事实上这并不能满足匈奴贵族的贪欲，他们仍是连年南下，骚扰汉境。直到武帝时，他凭借着汉初几十年休养生息而大大增强了的国力，开始了对匈奴大规模的反击战。

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主要有三大战役：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发生在河西的这次战争，是在元狩二年（前 121 年）。这年春天，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万骑出陇西，从青海的东北部进人河西，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俘获浑邪王的王子和休屠王的祭天金人。这年夏天，霍去病与公孙敖再次出击河西，霍军出北地，“涉钧耆，济居延”，再由北向南一直打到祁连山；公孙敖出陇西，可能是拟经青海，翻越祁连山进入河西，与霍军进行南北包抄。由于公孙敖军迷路失道，未进入河西，霍军则按原定战略取得了很大胜利。在考察中，我们到达了民乐县的扁都口和永固城。永固城在汉代叫汉阳城，是历代屯兵要地。在今永固城东面，有一古城遗址，当地群众叫做霍城或八卦营，说是当年霍去病屯兵的地方。自古以来，由南边进入走廊，多走扁都口一线。霍去病第一次由南边进入河西，大概就是经过扁都口，在永固城一带屯兵完全是有可能的。

汉军的胜利，促使匈奴内部的分裂。匈奴单于迁怒于浑邪王和休屠王，欲召诛之，于是两王惧而降汉。休屠王中间反悔，为浑邪王所杀。浑邪王带了四万部众入塞，被安置在陇西等沿边五郡塞外，称“五属国”。河西自此归汉统治。汉王朝先在这里设立了武威、酒泉二郡，后又分置张掖郡和敦煌郡，史称“河西四郡”。四郡共辖 25 个县。

河西归汉是河西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汉朝为经营这一地区，先后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徙民活动，把中原地区的贫民和“罪犯”徙来河西。据《汉书·地理志》所载，河西四郡当时有户 61000 余，口 28 万余。如果再加上屯田的士卒，估计整个河西大约有 40 万人左右。大量劳动力的进入，加以他们带来中原人民丰富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大大地促进了河西地区的开发。

西汉王朝在河西地区的屯田，可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由戍边士兵所种，收获交公，衣粮由国家供给；民屯则由徙民所种，向国家交纳地租。当时屯田是很有成绩的。首先，西汉在这里曾兴修过规模比较大的水利工程。据居延发现的汉简，就有甲渠、临渠、广渠等名称，还有专门从事治渠引水的“河渠卒”。《史记·河渠书》也提到“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其次，是在这里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汉武帝末年，赵过发明的代田法，就是首先在边郡和居延城推广的。居延汉简有“代田仓”的名称，大概就是专门收藏代田法所获粮食的仓库。再次，从屯田的收获量来看，数量也是很大的。屯田所得粮食，除自给以外，还有剩余。有一汉简记载，汉元帝时内地遇灾，还曾调发居延粮食前去接济。居延如此，河西其他屯区亦应大体相似。

秦代长城没有修到河西，汉得河西后，为防止漠北的匈奴，在走廊的北边修筑了一条与走廊平行的长城。立郡之初，即修筑了令居塞，从今甘肃永登县修筑到酒泉。以后，又修筑了酒泉与玉门间、敦煌与盐泽间的边塞，在居延还修筑了遮虏障。这次考察，在玉门关附近看到了一段保存较完好的长城，由芦苇夹沙石筑成。芦苇和沙石每层的厚度为 20 厘米 ~30 厘米。虽经二千年风雨蚀剥，这段长城还高有 3 米多，底亦有 3 米宽，顶上最宽处亦有 1 米左右。筑城芦苇是附近沼泽中取来的。在玉门关与阳关之间，平漠无边的戈壁上还有一条隆起的沙石垄，平均高约 30 厘米，当地同志也认为是汉代所筑的长城。

汉代除在河西修筑长城外，在整个军防系统中，还有关隘和烽火台的设置。关隘主要是玉门关和阳关，两关是河西通西域的两个门户。我们这次到了小方盘城和古董滩。小方盘城一直被国内外学者定为汉代的

玉门关遗址，现在保存尚好，四壁多是夯土版筑，高约 10 米左右，占地约 630 平方米。此城规模很小，是否是玉门关遗址，颇有怀疑。甘肃考古队据近年发掘，认为玉门关不在小方盘，而应在马圈湾附近。阳关遗址坐落在古董滩的高土台上，规模更小于小方盘城，现尚有夯土残留遗址。我们认为这一土台仅是汉代的一个烽火台遗址。至于阳关确切地址，尚有待进一步发掘与研究。

汉代烽燧遗址保存得较多的亦在敦煌，据调查，敦煌境内有 70 余座。我们见到的，以小方盘城西约 2 公里处的一座较为完好，也由芦苇夹土坯筑城，残存的有十三层。遗址南边有五堆柴草，都是芦苇、红柳或胡杨树枝。据居延发现的《塞上烽火品约》，这些柴草应叫“积薪”。敦煌县博物馆陈列了从烽火台内取来的一束束芦苇火把，长的有 2.85 米，小的只几公分，这大概就是叫做“大苣”“小苣”的报警燃料。

在汉代，移民、设郡、设防、屯垦这四者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正是汉代河西得以开发并有很大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河西地区，西汉的墓葬群也很多。张掖黑水国附近及武威乱墩子滩等地都有上千个西汉墓。在河西的大量汉墓中，曾出土了大量的汉简、丝织品、陶、木等器物。武威磨咀子汉墓群曾出土了大批木简，其中 6 号墓出土的 469 枚木简，共有 27000 多字，是完整的九篇《仪礼》，为中国古文字及古籍校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62 号墓出土的木质仪器式盘，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发现的古代天文仪器。另外还有铜饰木轺车以及十多种花纹精致、经纬细密的绢、锦、纱、罗等残片。这些文物的出土，说明西汉时期的河西是一个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

西汉末年，中原大乱，河西却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地区。窦融就是因为“河西殷富”，是个避乱“遗种”的好地方，才要求出任张掖属国都尉，后来被推举为河西五郡（包括金城郡）的首领。在窦融统治下的河西，光武帝曾说它是个“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的区域④。在光武帝出兵西击割据陇右的隗嚣时，窦融全力支援，在东汉王朝统一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东汉初年，窦融去洛阳以后，任延为武威太守。他在武威建立学校，奖励耕垦，兴修水利，整修武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河西当时乃是一个殷富的区域。但是，到汉明帝（58 年 ~76 年）以后，开始是北匈奴的骚扰，继之是东汉王朝镇压羌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十余次战争，“并、凉二州，遂至虚耗”⑤，使河西经济、文化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后汉书·郡国志》所载汉顺帝时河西仅有 4 万多户，16 万多口，比西汉时减少了三分之一，可见是在逐渐衰落下去了。

在我们这次考察中，曾见到了许多东汉时期的墓群和文物。张掖黑水国遗址中有一大批是东汉时的墓葬，在这里出土过一些陶灶、陶鸡窝等。酒泉博物馆曾展出了东汉时期的银釉陶壶、铜连枝灯、羽人灯、神兽镜等等，造型优美，制作精巧，反映出东汉时期河西地区手工业的发展已有了很高的水平。特别是 1966 年发掘的武威雷台下的东汉晚期大型砖墓，出土了金、铜、铁、玉、骨、陶、石等器物 231 件，其中铜器 172 件。最精致的是一套铜铸的武装车马出行行列，有俑 45 个，马 39 匹，车 14 辆，牛 1 头。闻名中外的铜奔马就是从这个砖墓出土的。此马一足踏飞燕，三足凌空，昂首翘尾，奔突向前，是罕见的中国古代的艺术珍品。这座墓中出土的立俑、骑俑的身上，刻有“张氏奴”“张氏婢”“御奴”“车奴”等字样，随葬的还有一座高大的釉陶楼院，周有围墙，四角有角楼，俨然是东汉晚期的一个地主庄园，它是研究东汉晚期河西阶级关系最形象的资料。东汉晚期，战乱不止，各地豪强地主趁机兼并土地，攫取劳动力，迫使他们变成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私附和部曲，建立起所谓壁、坞、堡、垒的地主庄园，横行乡里，割据一方。魏晋时期长期的分裂割据，就是在这一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河西地区出现这种典型的地主庄园，也就为魏晋时期的河西能出现许多割据政权提供了经济基础。

## 二

自东汉镇压羌人战争以后，战祸频繁，河西受到极大的破坏。到曹

魏初年，河西先后又有张进、黄华、麴演、伊健妓妾、治元多等的叛乱，河西大扰。魏明帝太和年间，仓慈为敦煌太守，史称“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出现了“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地”的状况[6]。这时河西的人口也急剧地下降。《三国志》无河西户口的记载，但与毗邻的金城郡相比，可知大概。东汉顺帝时，金城郡有户 3800 多户，而到曹丕称帝，苏则为金城太守时，却是“户不满五百”了。后经苏则“内抚凋残，外鸠离散”，经多方努力，也只到达了 1000 户[7]，只有东汉时的三分之一。估计河西各郡情况也应大致相似。由于战乱和豪强地主的阻挠，两汉以来繁荣的中西交通，这时也处于不绝如缕的状态之中。

西晋建立后，全国出现了短期的统一，河西也得以相对安定。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凉州 8 郡 46 县，有户 30700，除去不属于河西的金城郡和西平郡的 6000 户，河西实有 24700 户左右，以每户五口计，则应有 12 万人。与曹魏时比较，人口显有回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河西地区的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

西晋统一极其暂短，很快即进入了一个大分裂的时期。这时的河西，先后出现了五个称“凉”的政权。据现有资料来看，在前凉和前秦统治时情况较好。前凉张氏统治河西时，当时有民摇说：“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8]。”社会相对安定的局面，招来了中原大量的流民。前凉政权在其初期还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和注意兴修水利等政策，如在敦煌地区就兴建了北府渠、阳开渠、阴安渠等等，使百姓蒙受其利[9]，因此经济情况较好。到前秦灭掉前凉，苻坚虽曾将河西 7000 余户“豪右”迁往关中，但又从江淮及中原地区迁来 17000 余户，从户口来说，可能比前凉还要稍多一些。这时的中西交往也比以前有所发展，西域各国都曾派使者前往长安朝贡。

淝水之战后，前秦崩溃，被苻坚派去征讨西域的吕光在东还时占有河西，建立了后凉政权。河西自此进入长期动荡不已、灾荒连年的时代。后凉统治十分残暴，史称：凉州百姓“饥馑流亡，死者大半[10]。仅吕隆统治

时(401~404年)的一次灾荒,姑臧一带饿死的就达十多万人。后凉亡后,河西出现了南凉、北凉和西凉三个并立的割据政权。这些统治者尽管口头上也说要恢复和发展生产,但由于不断的混战,加以战胜者总是千方百计地掠夺人口,广大人民被逼得流离失所,根本无法从事生产。所以到北魏取得河西时,河西已是地旷人稀,一片荒凉了。这时河西的人口,据《魏书·地形志》的记载和推算,大约亦只7000来户,比西晋又相差得很远了,从此也可见河西破坏的严重。

北魏在孝文帝时推行均田制度,对河西的恢复起了很大的作用。据《隋书·地理志》所载,河西有3郡,25000户,这应当是推行均田制以后发展起来的。这时的中西交通也日趋频繁,僧侣、商人、使臣往来于河西走廊的史不绝书,其著名的僧侣就有竺法护、法显、鸠摩罗什、师贤、昙无谶、昙耀、智猛等等。早在魏太武帝太延年间(435~440年),西域十六国使者即来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其后使者不绝,每年都有数十次之多。至于商旅往还,这时也日见增多,《周书·异域传》有"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的描写。北周时,瓜州曾发生了一次张保的变乱,据《周书·令狐整传》说,州人推波斯主张道义来主持州事。张道义可能就是一位主持与胡商交易的头面人物,让他来管理州事,瓜州胡商看来是一定很多的,贸易也一定比较繁荣。

魏晋时期的河西虽不及两汉时繁荣,留下的文物却比较多,著名的有酒泉、嘉峪关的画像墓砖及石窟寺等等。这些文物可补史籍的不足,加深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历史的认识。

嘉峪关的画像墓砖是1972年在该市新城公社跃进大队的魏晋墓中清理出来的。这些画砖多嵌在墓的前室四壁、中室东西两壁及后室的后壁上。画面多用白灰作底色,用墨线勾勒轮廓,然后用赭石、白、石黄、浅石绿、浅赭石等色填补而成。砖画反映的内容比较广阔,有反映当时农业、畜牧生产的,如耕种图中,上下画有双套牛两对,四男驾牛,前两套犁地,中二女持钵播种,后两套耱地。同今天河西地区的耕作程序基本相似。打场、扬场的砖画有好几幅,都是画农夫、农妇持杈扬场或用连

枷打场，同今天河西有的地区农民打场完全一样。畜牧画中画有一牧童放着二头牛、十二头羊。现在河西的蚕桑业很少，砖画则画有采桑、蚕茧的图画，说明当时河西还有丝织业的生产。这些砖画既反映了魏晋时期劳动人民进行生产的情况，也为研究当时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提供了形象的资料。还有一幅屯垦的砖画，上部画一骑马武官与两排持盾扛矛的武士在行进，下部画有二套牛在耕地，前一套耕者为一短衣窄袖、宽裤、辫发的少数民族。西汉以来，河西就是著名的屯田区，魏晋时期，屯垦规模虽然缩小，但割据者仍在这里屯垦则应是肯定的。两汉屯垦主要的是戍卒和徙民，画砖表明，这时少数民族人民也成了屯垦的主要劳动力了。这种变化，应是东汉中期以来周边各族人民不断内徙的结果。自那时起，河西即成为一个民族杂居的区域。氐族吕光建立后凉，鲜卑族秃发乌孤建立南凉，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北凉等政权，正是民族融合及斗争中的必然产物。河西的开发与发展，应该认为是河西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劳动所取得的成果。

除上述内容外，砖画中还出现了魏晋时期史籍中常见的称作“坞壁”的地主庄园，其中一幅还用朱红色标写出“坞”字。坞四周有高墙，坞内有高层碉楼或望楼、敌楼。坞外有圆形的帐篷，好像是家奴的住处。砖画还反映了坞内主人在奴婢侍奉下宴饮享乐的情景，有杀牛、宰猪、烤肉、烹调、进食以及弹奏、歌舞的场面。这正是当时阶级对立的真实写照。从砖画我们可以看到，坞主既有大量的土地和牲畜，也有大量的依附农民和从事家内劳动的奴婢。东汉以来，正是由于这种自给自足、号称坞壁的地主庄园的发展，才出现了魏晋时期生产发展缓慢、商品经济冷落和割据政权迭兴的局面。

魏晋墓葬中保存得最完整的是酒泉丁家闸5号墓。该墓的壁画同样也是反映上层统治阶级燕居行乐的情景。据推测，这是五凉时期一个王侯的墓葬。墓室中的壁画分天上、地下、人间三个部分。天上画的是日、月、东王公、西王母、羽人、三足鸟、九尾狐等道教仙人及神禽异兽；人间则是反映墓主生前的财富和生活享受的场面，如农牧蚕桑生产、庖厨饮

宴、伎乐百戏等等；地下则是画的负重神龟。从艺术角度看，这座墓的壁画笔力刚劲，技法娴熟，比嘉略关砖画有更高的艺术水平。这些砖画和壁画，不仅是研究这一时期河西历史的直接资料，对研究当时的思想意识、美术音乐的历史也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在这一时期的文物古迹中尤其要值得注意的是，河西从这时开始出现了许多的石窟寺。自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它就沿着丝路不断东传。到十六国时期，一方面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同时也因为连绵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对现实的失望，使广大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因此，宣扬“人生皆苦”“屈辱忍让”“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的佛教便得以在南北流行起来。河西作为中西交通的必经通道，佛教西来，首先传到河西，到十六国时佛教已在河西广为传播了。前凉统治时，据《魏书·释老志》所说，敦煌地区已是村坞之间多有寺塔，而到北魏取得河西，佛教则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它在河西与汉族的文化交流、融合，从而在这里根植生长，开放出一朵朵茂盛的佛教艺术之花。河西的石窟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艺术价值上，在全国可以说都是首屈一指的。

河西的石窟寺，最早有纪年可查的是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创建的敦煌莫高窟。十六国及北朝时期石窟的建筑形式、造像、壁画的特点是，窟内有中心塔柱和禅窟，佛像有高鼻深目的形象及有垂肩的发绺和交脚而坐的格式。这些都明显地带有印度和中亚的风味。至于壁画，则多是本生故事及佛传故事。但是，也就在这些早期的石窟中，我们也看到了道教神话中的仙人形象，如东王公、西王母驾龙车、凤车出行，还有伏羲、女娲、雷公、雨师等等。佛、道同居于一窟，这正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最有力的证据。

魏晋时期佛教虽在河西广泛流传，但从当时的墓葬中来看，却往往只有道教题材的壁画，没有佛教的题材。上述丁家闸5号墓是这样，敦煌佛爷庙新近发掘的记有前凉、后凉、北凉、西凉年号的一些陶片上，也都是写的“急急如律令”等道教咒语，没有佛教影响的痕迹，是否可以这样认识：佛教虽已在人世广泛流行，但还未进入地下，在墓室中占统治

地位的依然是中国传统的道教神话。

尽管这次考察所见的这一时期文物大都是与佛道有关的，但决不是说在思想意识领域里佛道已占了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中国传统的儒学。自西晋末年中原大乱以后，河陇学者多来河西避难，司马光就说："永嘉之乱，中州之人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故凉州号为多士[11]。"前凉张氏和西凉李氏本是汉族，重视儒学自不待言，就是建立南凉的秃发乌孤，建立北凉的沮渠蒙逊，为了统治的需要，也不得不重视儒学。这批河西学者不仅为保留中原传统的儒学作出了贡献，而且，他们反过来还影响着中原文化的发展。如前秦时，洛阳、关中的千余生徒就是跟着河西学者胡辩学习的。北魏统一北方后，河西学者如赵逸、刘昞、胡叟、江式、阚骃、程骏、常爽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河西的儒学，一直到隋唐时期还有影响。

魏晋时期的河西古城遗址，我们只走访了高台县的骆驼城。城在高台县西约 40 公里处。其城规模很大，分外廓、宫城、皇城三重，宫城在城西角，外城北面有一条小河，是黑河的支流白水河，北墙因河水侵蚀，已经塌坏，有关部门正派两台拖拉机修筑堤坎保护此城。高台县文化馆的同志认为，北凉的沮渠蒙逊曾在此建都。他们在城中曾拾得铜镞一吨多，还发现了一枚"部曲督印"。据《晋书·吕光载记》《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等记载，该城不是北凉建都之处，而是沮渠男成和段业起兵发迹的地方，即建康郡的故址。

## 三

隋唐时期，河西进入了它经济文化的第二个迅速发展的时期。隋朝立国虽短，但河西却是它与西域交市的地方，因而颇受重视。大业五年（609 年），隋炀帝经大斗拔谷（即今扁都口）进至张掖，高昌王、伊吾设等西域二十七国的首领、使者和商人，"佩金玉，被锦罽"，朝谒于焉支山。隋炀帝亦令张掖、武威仕女盛装欢庆，用以表示国力的强盛，这可以说是

有史以来河西的一次空前的盛会。尽管炀帝此举是为了要粉饰升平，夸耀外族，但如果河西当时没有一定的经济文化基础，没有繁荣的国际贸易，要想举行这种盛会也是绝不可能的。

隋末唐初的战乱，曾使河西变成了“州县萧条，户口鲜少”的地方[12]。但经过唐初一百多年的安定局面，到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年），却成了一个农桑繁盛、士民殷富的区域。《资治通鉴》即曾说过，当时“天下称富庶者莫如陇右”[13]。唐在河西设有凉、甘、肃、瓜、沙五州，据新、旧《唐书·地理志》所载，五州共有172000余人，加上凉州境内少数族吐浑等八州府的17000余人，整个河西当时应有人口近19万。这一数字是两汉以后河西人口最高的数字。

唐代前期河西的繁荣，我们从唐朝在这里屯田、和籴等情况也可以看出：武则天时，陈子昂在论及甘州屯田时就说过，甘州土地肥沃，四十余屯，“每年收获常不减二十余万”[14]。甘州刺史李汉通置屯开垦，“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粟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15]。粮价大幅度的下降，只有原来粮价的十分之一，乃至数十分之一。在推行“和籴”法以后，天宝八年（749年），唐王朝从河西收购了371000石粮食，占当年全国和籴总数的32%强。由此可见河西富庶的一斑。

唐代河西的繁荣，也是与中西交通分不开的。早在隋末唐初，就有许多西域胡人入居河西。唐初割据河西的李轨，一是利用了薛举的降人；二是利用了安国人安兴贵、安修仁兄弟组织的胡人队伍而取胜的。贞观初年，玄奘西行，他在凉州曾见到了大量的西域胡商。他说：“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番，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16]。”当时的凉州、甘州、瓜州、沙州，都是著名的中西贸易的城市。后来到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武威九姓胡商发动了一次叛乱，并占了武威七城中的五城，杀死了节度使周泌，由此可见河西胡商之多、势力之大。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调河陇兵力东去平叛，河西空虚，吐蕃因此乘虚而入。到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沙州陷落，河西全部落入吐蕃之手。吐蕃当时尚处于奴隶制阶段，占有河西后，河西人民很多沦为吐蕃奴隶

主的奴隶，河西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也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以后，随着吐蕃在封建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封建割据的日益加剧，随着河西人民反抗斗争的不断加强，吐蕃在河西的统治大大地被削弱了。到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沙州张议潮领导人民起义，赶走了吐蕃势力。到咸通二年（861年），收复凉州，河西全部光复，唐因以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但是，当时唐王朝已十分衰弱，对河西亦无暇顾及，因此归义军实际上是一个半独立的地方政权。到五代朱梁时，张氏之后断绝，沙州人士因推曹议金为节度使。曹氏的统治一直到1036年瓜、沙两州为西夏攻陷才正式结束。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张氏为归义军节度使时，其初期是统有整个河西，而到了五代朱梁乾化年间（913~915年），甘州回鹘的势力已逐渐强大起来，自称“白衣天子”的张承奉在战败后，被迫称回鹘可汗为父，归义军不再统有整个河西，而是仅有瓜、沙一隅之地了。曹议金大体上也是继承了这种“父子”关系的，事实上曹氏已成了甘州回鹘的附庸。据《旧五代史·吐蕃传》所载，当时河西内部除归义军曹氏以外，甘州、肃州是回鹘的势力，凉州则是一夷夏杂处的地区，也是“自立守将”，不受中原政权统辖的。可以这样说，河西当时是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到1028年，西夏攻占甘、凉两州，1036年又先后攻占肃、瓜、沙三州，河西才全部为西夏占有。

隋至西夏时期的河西，我们主要参观了一些古城遗址、唐代写经、石碑及安西榆林窟、敦煌莫高窟等。

大业五年，隋炀帝西巡，经大斗拔谷而进到张掖，《隋书·炀帝纪》说：“六月……癸卯，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大半。”六月冻死士卒，过去很难理解。这次我们在7月17日到了古称大斗拔谷的扁都口，只见两边山势高峻，谷口蜿蜒曲折达40余公里，山崖上的小径在某些地段仅能鱼贯而过。当时河西各地的小麦均已收毕，唯独民乐以南至谷口一带的小麦仍青青在野。当地同志介绍，此地气候变化甚大，常有冰雹风雪，九月就降霜封冻。由此推想，隋炀帝于盛夏在此遭遇风雪，也完全是有可能的。

唐代的古城遗址，我们走访了锁阳城。该城原名苦峪城，向达先生认为这即是唐代的瓜州治所晋昌县。该城位于安西桥子公社南坝大队正南 7 公里处。城呈长方形，夯土版筑，南北约 470 米，东西 330 米，城墙高处近 10 米。城中南北有一隔墙，将城分为两部，西大东小。西城约 16.5 万平方米。东城约 1.7 万平方米。城内杂草丛生，一片荒芜。当地盛传薛仁贵兵困锁阳城的故事，说薛仁贵兵败受困此城，士兵全靠采集城中所产的锁阳充饥，后有救兵，才得解救。该城由此又名锁阳城。又说，唐朝在这里与少数民族军队进行过多次的战争，后来少数民族军队由祁连山口冲入，截断城东疏勒河上游的水源，于是城被废弃。据唐书记载，高宗开耀元年(681)，薛仁贵确实曾被任命为瓜州长史，但兵困此城、锁阳充饥之事，则史无记载，也许是子虚乌有。至于少数民族截断水源一说，倒可能是真的。这里本来是缺水的沙碛地区，饮水、耕种，全靠渠道引来祁连山的雪水，唐玄宗开元年间，吐蕃曾攻陷瓜州，毁坏了全部渠道和瓜州城。后来玄宗经张守珪为瓜州刺史，修复城池，重整水渠，人民才是安顿下来。为了感谢张守珪的德政，瓜州人民还曾“刻石以纪其事”[17]。

隋唐在河西留下的文物，当以壁画和写经为最多。莫高窟和榆林窟中绝大多数是隋至宋的塑像和壁画。这一时期的建筑形式和艺术风格与北朝时有明显的不同。从洞窟建筑来说，北魏时期那种带有中亚风味的禅窟、中心塔柱没有了，代之以魏晋以来宫殿形式的殿堂窟；从塑像来说，垂肩发绺、高鼻深目或“面短而艳”的形象，被曲眉丰颊、肢体健美、色彩鲜艳、写实逼真的形象所代替了；从壁画来说，隋唐以前的画面粗矿、奔放，内容多是释迦牟尼本生故事及佛教事迹画，给人以古拙朴实之感，而隋唐以后则日趋雍容，清新华贵，精彩绝艳，画面多是大幅的经变，给人以富丽堂皇的印象。这些变化，当然是与隋唐时期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分不开的。莫高窟和榆林窟出现在河西，应该说是河西地区当时经济、文化长足发展的一种反映。

石窟中的壁画当然是宣传佛教的，但壁画中却真实地反映了隋唐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诸如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场面，地主庄园

的规模，唐代音乐舞蹈的状况，当时的服饰与社会风尚，民间的婚丧礼仪与官吏的出行仪仗等等，都是研究历史的形象资料。至于壁画上的题记，更是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河西地方史的最可靠的文字记载。可惜这方面研究尚不甚多，有待于今后的努力。

这次在河西考察所见的敦煌遗书，以敦煌县博物馆所藏《唐书地理志残卷》最为宝贵，可用来补正两唐书地理志及研究唐代官商的概况，在兰州及敦煌，我们还看到了数量较多的藏文写经，大概是吐蕃占领时期的遗物，应是研究当时民族关系及吐蕃历史的珍贵资料。

关于古代河西的民族关系，唐代吐谷浑在河西留下的文物值得我们注意。在武威，我们看到了弘化公主、慕容神威及大唐故武氏墓志等七块墓志，还到武威城南 40 里的青咀、喇嘛湾实地观看了出土这些墓志的墓葬。据两唐书所载，高宗初年，吐谷浑为吐蕃打败，在首领诺曷钵率领下走投凉州。后来薛仁贵进援吐谷浑反为吐蕃所败，吐谷浑国亡。唐在灵州特设安乐州以安置吐谷浑部众。墓志表明，弘化公主和慕容忠等均在灵州死后归葬这里的。这里应是吐谷浑王族的祖茔。其中武氏一志，是研究武则天以后唐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几个大族关系的重要资料。

唐代河西的墓葬，《陇右金石录》除收有慕容氏家族的几块志以外，还有毛裕、康阿达两块墓志，石碑也仅有敦煌李府君、阴处士、吴僧统、僧洪谘及索公、杨公等几块。近年敦煌曾发掘了几座唐墓，亦仅获得几块莲花砖、麒麟砖而已。不像河西的汉墓，到处皆是。河西在汉、唐两代最盛，为什么汉墓多，文物亦多；唐墓少，所得文物也少，令人费解，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去探索。

吐蕃及西夏的文物在河西发现甚少。除藏文写经、壁画和题记，以及居延黑城子曾出土了一批西夏残文书以外，要算武威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和 1977 年在武威西郊林场发掘的两座西夏墓所得的彩绘画版、木塔等最引人注目了。木塔塔顶书有“故考任西经略司都案刘德仁，寿六旬有八，于天庆五年岁次戊午四月十六日亡殁，至天庆七年岁次庚辰孟夏十五日兴工建缘塔，至中秋十三日入课讫”的墨书。塔身有黄色

书写的梵文咒语。随葬的还有木桌、木衣架、木宝瓶等等。这些东西应是研究西夏职官、建筑艺术及文化的可贵资料。

自吐蕃统治河西至1127年蒙古占有河西，河西的经济和文化又走了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从全国范围来说，它已成了一个后进的地区了。关于这一点，元初著名的史学家马端临敏锐地指出，河西“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18]在元代，甘肃行中书省之下，属于河西的有甘州路、永昌路、肃州路、沙州路和亦集乃路。据《元史·地理志》，五路中仅记载了甘、肃两路的人口。甘州路有1500户，口23987；肃州有1262户，口8679。而这两路人口，还包括了元代初年统治者强行从瓜、沙两州迁徙而来的人口在内的[19]。以此数与唐代相比，唐甘、肃两州有户8500多，元代只有2800多，数字相距很大，由此亦可见元代河西日见衰落的状况。

明代河西，划嘉峪关而守，不暇经理关外。洪武（1368~1398年）末年及永乐时期（1403~1424年），在关外曾设立了七个卫所，即所谓“关西七卫”。到明英宗正统（1436~1449年）以后，这些卫所在吐鲁番的进逼下，全部迁人关内。在嘉峪关以东的走廊内部，明代则设有凉州卫、永昌卫、肃州卫及甘州五卫。为了确保这一边防重地，明朝曾强迫这里的回民迁入内地，如英宗正统中，一次把甘、凉两州的回民1700余人迁往江南[20]。但也不断派遣大量军队在河西驻防屯垦。据统计，从洪武到弘治（1488~1505年），凉州等十一卫有正式屯军7万余人，下屯旗军近4万人。屯田面积最高时达26000余顷。除了下屯正军以外，还有余丁及正卒家属下屯耕种。正是这些屯田军丁及其家属，与河西各族人民一起辛勤地劳动，使河西又逐渐兴盛起来。在这一基础上，清王朝初年又大量召民到河西屯种，如雍正（1723~1735年）年间，一次就召民2405户至敦煌屯种[21]。同时，又实行了诸如改变凉州戍军为屯丁，把明藩王的土地归民户经营，以及免除钱粮、兴修水利等措施，使河西更加繁荣起来了。所谓“金张掖，银武威”的传说，也就从那时起一直流传到今天。

## 四

从古代河西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在河西历史上曾经出过三个波浪式的高峰：从原始社会到两汉时期，这是河西历史上第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前凉、前秦以后，则逐渐衰落，至北魏时成了一个地广人稀的区域。从北魏后期到隋唐时期，河西又慢慢兴盛起来，出现了河西历史上的第二个大发展的时期，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是其顶峰，但到吐蕃占领河西，经西夏而到元代，河西又走了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到明后期及清代初年才又有了迅猛的发展。

纵观古代河西历史发展的进程，使我们得到了以下几点认识：

（一）河西本身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它是河西得以开发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河西地处黄土高原，气候干燥。走廊北部和西部，年降水量在 50 毫米 ~200 毫米之间。走廊南部稍好一点，年降水量也仅有 100 毫米 ~500 毫米左右。降雨量少而蒸发量大，从气候条件来说，显然是不利于农业的发展的。但所幸者是走廊南边的祁连山却拥有丰富的冰川积雪。每年春夏，融化的雪水从祁连山北麓流入走廊，网织成了三个较大的内陆河流域，与此相适应的，走廊内部也出现了三块面积较大的平原，这就是：石羊河流域—武威、永昌平原；黑河流域—张掖、酒泉平原；疏勒河流域—玉门、敦煌平原。由于这三块平原有祁连山雪水的滋润，所以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水草肥美、可耕可牧的区域。早在秦汉时，匈奴因为失去了河西，就曾发出了“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哀叹。《汉书·地理志》也说道，河西“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因此，历代都把河西作为重要的屯垦地区。良好的自然环境，它是历代各族劳动人民在这里生养繁息的基础。

从历史上河西的兴衰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点：兴修水利，引水溉田，充分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这是河西农牧得以发展的关键。河西在汉唐两代最盛，这同两代在这里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是分不开的。如

上所述，汉在居延，唐在甘州、敦煌，都曾修建过许多渠道，并在这里设监牧马，推广先进生产技术，故河西是当时国内的一个殷富之区。而到魏晋时期和吐蕃、西夏统治的时候，社会离乱，水利失修，肥沃的土地得不到灌溉，故良田亦变成了沙漠。

（二）河西的兴衰，它是同当时全国的形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是说，当中原王朝国势比较强盛、社会比较安定的时候，河西地区相应地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如两汉、隋唐、明清三个时期，中原都是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由于实行了一系列轻徭薄赋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国内安定，生产持续发展，这当然对河西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安定和强盛，中原王朝才可能有雄厚的人力、物力作为后盾来经营这块地区。汉唐及明清几朝，统治者大多都在河西采用过诸如设郡驻军，移民屯垦，兴修水利，发展交通等措施，不仅给河西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直接为河西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条件。相反的，当中原动乱、争战不休的时期，或者是少数民族统治者用落后的生产方式来统治这个地区的时候，河西的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出现缓慢、停滞的状态，如十六国时期及唐中叶以后的几百年时间就是如此。

（三）古代河西的兴衰，是与它在中西交通上的重要地位有关的。河西所以称之为走廊，固然是由于它本身是一条形似长廊的地域，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它是古代通往西域、中亚的必经之路。河西的地形是：走廊南边是著名的祁连山，终年积雪，不易翻越。祁连山以南，亦多是大坂山、大通山、宗务隆生等大山，道路极其艰险。走廊的北面，则是龙首山、合黎山及马鬃山等等，在山的外面是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渺无人烟，一片荒凉。在古代人走马行的条件下，在走廊南北以外行走是非常困难的。相反的，在走廊内部却是一个可耕可牧的地区，因此，在海路未通之前，自古以来，东来西去的行人、商队大多都是通过这条走廊。从东往西，进入走廊的路线，我们通过这次考察和查阅资料，大概主要有以下三条：北道，经过景泰县，沿腾格里沙漠边缘进到武威；南道，因祁连山从酒泉至永昌一带除扁都口一个山口以外，皆是海拔四千米以上的

雪山，所以，此道多由西宁北上，穿过扁都口而至武威或张掖；中道，即由兰州经永登，翻过乌鞘岭而到武威。三道中似乎南道较早，秦汉、魏晋时行人多从南道进入河西，如法显、隋炀帝就是走的此道。隋唐以后，中道渐成主要的干线。玄奘、岑参就是循此道西去的。至于北道，据有人考证，认为是秦汉时行军作战时的一条通道。

正因为河西走廊是古代中西交通的必经大道——丝绸之路的东段大道，中原和西域的精神和物质文明都是通过这条走廊交流的，所以商业一直比较兴盛，敦煌、武威两地，自秦汉以后就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河西各地历代都住有大量的胡商、胡僧。特别是在汉、唐两代，国势强盛，中西交往极其频繁，它必然对河西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隋唐时期在河西出现那样绚丽多姿的壁画，有风靡一时的西凉歌舞，这都是与中西交通分不开的。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写道："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朴地桑柘稠。""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2]可以说这是中西交通与河西繁荣之间关系的最直接的资料。后来到了宋元两代，由于海路的畅通，中亚商人多从海路进至中原，这也就大大地影响了河西经济文化的发展。元代河西所以未能恢复起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四）河西的兴衰，也是与它在古代军事设防上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自汉以后，河西从来就是古代中原王朝西北边防上的重地。汉唐建都长安，为解除西来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威胁，确保秦陇、河西的安全是一必不可少的条件。顾祖禹曾说："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3]。"汉武帝所以进军河西，一来是要解除匈奴来自西边的威胁，二来也是为了要"断匈奴之右臂"，隔绝北方游牧民族与祁连山南边羌人之间的联合，减轻后方的压力。不仅如此，占有河西这块可耕可牧的土地，还可以以此为根据地，进而向西域发展。后来少数民族虽迭有兴衰，但这种形势仍然没有改变。也因此，历代中原的王朝都在河西修城筑塞，开屯布防。走廊北面虽有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等，但这些山与地面相对高度仅500米~1000米之间，驼马都易翻越，故汉代在此修了长城。走廊南面则

因有祁连山的天然屏障，故只把守几个重要的山口，如庄浪河谷口、扁都口、当金山口等。唐代时军事重心虽然已西移到天山南北路，但河西仍是唐防突厥、吐蕃的重要阵地。唐在河西先后设立了凉州都督府、河西节度使等重要军事机构。河西节度使有驻军 7.3 万人，是当时仅次于陇右的一个最大的军镇。

河西既为古代边防重镇，于是驻军屯垦、移民实边也就随之而来，这对于河西的开发与发展势必带来巨大的影响。河西在汉唐所以兴盛，应是同两朝在河西大力地进行军事经营有关的。

**注释：**

①《汉书·霍去病传》。

②《西河旧事》。

③《汉书·匈奴传》。

④《后汉书·窦融传》。

⑤《后汉书·西羌传》。

⑥《三国志·魏书·仓慈传》。

⑦《三国志·魏书·苏则传》。

⑧《晋书·张轨传》。

⑨《鸣沙石室佚书》之《沙州图经残卷》。

⑩《晋书·吕隆载记》。

⑪《资治通鉴》卷一二三。

⑫《旧唐书·李大亮传》。

⑬《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⑭《陈子昂集》卷八《上西蕃边州安危事》。

⑮《旧唐书·郭元振传》。

⑯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⑰《旧唐书·张守珪传》。

⑱《文献通考》卷三二二《古雍州》。

⑲《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五年……沙州、瓜州民徙甘州,诏于甘、肃两界划地使耕,无力者给以牛具农器。”

⑳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九。

㉑常钧:《敦煌随笔》“沙州”条。

㉒《元氏长庆集》卷二四《西凉伎》。

㉓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三《甘肃镇》序言。

作者:齐陈骏,1936年出生,男,浙江天台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两汉凉州畜牧业述论

汪受宽

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对郡国大吏实施监督，保证皇朝政令的贯彻执行，于元封五年（前106年）将全国正式划分为13个监察区—州，称十三州刺史部，每州各设1名刺史，专事定期巡察。以后刺史监察范围不断扩大，并逐渐干预地方行政，积久成制，刺史部成为朝廷之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西汉时，皇朝西部的凉州刺史部，管辖陇西（治今甘肃临洮）、武威（治今甘肃武威凉州区）、张掖（治今甘肃张掖甘州区）、酒泉（治今甘肃酒泉肃州区）、敦煌（治今甘肃敦煌）、天水（治今甘肃通渭西）、安定（治今宁夏固原）、金城（治今甘肃兰州）8郡。东汉时，凉州部辖境扩大，除原领8郡（天水郡改名汉阳郡）外，又将武都（西汉治今甘肃西河南，东汉治今甘肃成县西）、北地（西汉治今甘肃庆阳宁县西北，东汉治今宁夏吴忠市西南）二郡划归其管辖。总之，所谓两汉的凉州，大体包括今甘肃、宁夏及青海省东部农业区。

两汉时期，因为战争对马匹的大量需求，使畜牧业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两汉朝廷非常重视畜牧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作为西部主要地区的凉州，地域辽阔，气候温凉，水草丰美，具有发展畜牧业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畜牧业成为凉州最具优势的产业。《史记》《汉书》中概述凉州畜牧业发展状况时说：

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①]。

秦地，……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②]。

两汉时期，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对畜牧生产的经营

管理体制逐渐完备，尤其官营畜牧业得到突出的发展。畜牧业大体可分为国家所有、皇室所有、牧主经营和家庭经营。以后逐步有所变革，但在性质上仍可区别为官办和民间经营两大类型。凉州的畜牧业经营形式也有官苑牧业和民间畜牧业两大类。

**一、少数民族畜牧业**

凉州，是少数民族相对集中聚居的地方。早在先秦时期，当地已是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俱全。而羌、戎、猃狁等族，更是以畜牧为主要产业。秦汉之际，河西地区有月氏人和乌孙人。史书中说：大月氏"行国也，随畜移徙[3]；乌孙人"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4]说明河西畜牧业很发达。月氏、乌孙所牧养的牲畜以马、牛、羊为主，还有骆驼、驴、骡等。当乌孙人、月氏人陆续西迁后，河西地区便成了匈奴人的游牧场所。匈奴族依靠蒙古高原及河西走廊绿洲的肥美水草，"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佗（即骆驼）、驴、骡、驶騠、騊駼、驒奚"。衣食住行仰给于牲畜及与之有关的产品，即所谓"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5]。以畜肉、乳浆和干酪为食饮，以皮、革、裘为衣，以旃（毡）、裘为铺盖，以毡做帐幕房屋（即"穹庐"），其它如船只、铠甲，也多以皮革制作。后来河西走廊被汉军占领后，匈奴人悲伤地唱道："失我祁连山，令我六畜不蕃息。"

在长期从事畜牧业的过程中，匈奴族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高了畜牧业水平。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被进击河西的汉军俘获，后来被朝廷派到黄门养马，个个膘肥体壮，受到汉武帝嘉奖，当即拜为马监。

祁连山以东至秦陇间，经营畜牧业的主要是羌、氐等民族。赵充国说：羌人"以畜产为命"[6]。许慎解释羌字，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7]都反映羌人长于畜牧业。汉宣帝初，朝廷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到羌人中视察，史书称：

是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先零豪言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安国以闻。……是后，羌人旁缘前言，抵冒渡湟水，郡县

不能禁[8]。

当时有许多羌人部落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而且他们很希望能到气候较为温暖的湟水流域放牧。对于羌人的请求，汉王朝不予理睬，羌人遂强渡湟水放牧，义渠安国对羌豪及其部众进行镇压，激起羌人的大规模反抗。“羌人反抗汉朝的斗争，是为了争取优良牧地，为了争取生存权的斗争[9]。神爵元年（前 61 年），在赵充国统帅的汉军与先零羌的一次战役中，汉军“卤马牛羊十万余头”[10]，说明羌人畜牧业规模之大。

氐族先民，自石器时代，就在陇山以西生活繁衍，从事农牧。商周之际，氐族先民与中原王朝多有交往。《穆天子传》中称，周穆王西行到过氐族地区，氐族曹奴部首领戏特地在洋水（今白龙江）之滨设宴为穆王接风，并献给穆王良马 9 百匹、牛羊 7 千头，助其西征。秦汉时，氐人中最为强大的白马氐，活动于今陇南及今甘、川、陕交界的三角地带。氐人游牧与农耕兼营，其畜牧业发达。据史书记载，他们培育的马匹品种优异，而被称为“良马”“名马”[11]。氐人还驯养了大量猪、牛、羊、驴、骡等家畜。氐人将牛皮鞣制成革，缝制为皮靴和战衣。史书记载，氐族军人穿坚固的“犀革”衣[12]，防御能力极强，敌方弓箭无法穿透，连戈矛对它也无可奈何。

东汉甘肃地区少数民族的畜牧业也很兴盛。我们检索《后汉书·西羌传》中，汉军与反叛的西羌作战后，所报告掳获羌人的牲畜数字，列表如下：

我们列下表，并非想彰显汉军镇压反叛羌人的功绩，而是想以数据说明，即使在反复动乱和战争中，羌族同胞仍坚持发展畜牧业，以至所畜马牛羊的数量很大。

逐水草而居的畜牧民族，生产条件的改进十分缓慢，一遇自然灾害，畜牧生产就会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随即为之萎缩。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太初元年（前104年）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征和四年（前 89年），“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本始二年（前 72 年）冬，“天大雨雪……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地节二年（前 68 年），“匈奴饥，人民畜产死十六七”。除自然灾害外，战争及内乱，也给畜牧业造成极大的摧残。例如

| 时 间 | 汉军将领 | 羌人种落 | 作战地点 | 获牲畜数字 |
|---|---|---|---|---|
| 永元九年（97） | 寇盱 | 迷唐 | 临洮南 | 得牛马羊万余头 |
| 永初七年（113）夏 | 马贤、侯霸 | 零昌别部牢羌 | 安定 | 得驴骡骆驼马牛羊二万余头 |
| 元初二年（115） | 任尚 | 杜季贡 | 丁奚城 | 获牛马羊数千头 |
| 元初三年（116） | 任尚 | 零昌 | 北地 | 得牛马羊二万头 |
| 元初四年（117）冬 | 任尚 | 零昌 | 北地富平河 | 牛马驴羊骆驼十余万头 |
| 永宁元年（120）夏 | 马贤 | 沈氐弟 | 张掖 | 马牛羊以万数 |
| 建光元年（121）春 | 马贤 | 当煎羌 | 允街 | 掠马牛羊十万头 |
| 阳嘉四年（135） | 马贤 | 钟羌 | 陇西 | 获马牛羊五万余头 |
| 永和三年（138）冬 | 马贤 | 烧当羌 | 金城 | 获马千四百匹 |
| 永和四年（139） | 马贤 | 烧当羌 | 金城 | 得马骡羊十万余头 |
| 永和六年（141） | 赵冲 | 巩唐羌 | | 得马牛羊驴万八千余头 |
| 汉安三年（144）夏[13] | 赵冲、张贡 | 烧何羌 | 参繇 | 得牛羊驴十八万头 |
| 建康元年（144）春 | 卫瑶 | 众羌 | | 得牛马羊二十余万头 |
| 延熹二年至八年（159~165） | 段颎 | 西羌 | | 获马牛羊八百万头 |
| 建宁元年（168） | 段颎 | 先零诸种羌 | 逢义山 | 获马牛羊二十八万头 |

本始二年，汉兵击匈奴，“匈奴闻汉兵大出，老弱奔走，驱畜产远遁逃”，结果“畜产远移死于（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当年冬，匈奴又受乌孙、乌桓、丁零的合力进攻，结果“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再如五凤三年（前 55 年），匈奴“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14]。

两汉时期的凉州地区，地广人稀，自然条件复杂，既有适宜于农耕的平川水地绿洲和山地，又有适宜于畜牧业的山谷、草原，形成了匈奴、羌等少数民族经济，以畜牧业生产为主，兼营粮食种植业的经济结构。匈奴、羌人也从事农业生产，如汉武帝征和四年（前 89 年），匈奴连续雨雪数月，“谷稼不熟”[15]；《汉书·赵充国传》记载“羌人当获麦，已远其妻子”[16]。

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河西农业文化的影响迅速扩展，但不论河西还是整个凉州地区，一业为主，半农半牧的经济大格局并未改变。

少数民族的畜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生产与生活的需要，能够为农业区提供的牲畜数量是有限的。而且，秦汉中央政府与周边畜牧民族有时处于战争状态，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也时有中断，因此，对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控制和利用也是有限的。

**二、其他民间畜牧业**

除了各少数民族之外，西汉凉州汉族的畜牧业也较发达。这种畜牧业，既有规模比较大的私人牧主，也有一般的牧民，还有农户经营的畜牧业。

为了适应对匈奴战争的需要，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西汉初期采取了各种措施促进养马事业的发展。到汉武帝即位之初，民间养马大见成效，出现了“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牛字牝者摈而不得会聚”的情景[17]。有了充足的战马，凭借强大的骑兵，汉武帝时取得了对匈奴作战的胜利。后期，因连年征战战马损耗太大，武帝采取了新的措施来繁荣马政，主要有：提高马价，规定“平牡马匹二十万”[18]；以马代役，即“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为攻打匈奴，长安集中了大量马匹，养马人手不足，由关中周围征调养马者。《汉书·食货志》载，汉武帝“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奖励民间养马，恢复养战马一匹复三卒的 规定；从民赊马，即若一时政府急需大量马匹，而政府又拿不出钱，就先取民马用，过后付钱；民养官马，即在边疆地区实行由官府借母马予民饲养，三年后归还母马，还息 什一，就是交十分之一数量的幼马，以拓宽马源；继续实行“马复令”“马弩关”；强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的官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牛字马，岁课息”[19]；强买民间马匹补充军马等。终西汉之世，马政一直受到高度重视，从不中断。

在朝廷一以贯之的重视民间养马的政策之下，凉州地区的民间畜牧业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发展起来。

河陇等地，私营畜牧业发达，大畜牧主动辄有千万匹马牛。司马迁曾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20] 意思是，凡拥有 50 匹马、200 头牛、250 只羊、250 只猪，就可以享有与千户侯同等富裕的生活。史书中有两条凉州大畜牧主的事迹。一条在《史记·货殖列传》中：

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

所谓塞之斥，指的是汉武帝开边时[21]，桥姚在新开辟的西部边塞地区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竟拥有了 1 千匹马、2 千头牛、1 万只羊，可说是富比万户侯了。另一条材料讲王莽时的马援，《后汉书·马援列传》称：

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诸兄奇之。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乃辞况，欲就边郡田牧。……后为郡督邮，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纵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常谓宾客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

马援对马匹在现实社会经济和军事中的作用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他说："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22]王莽末年，马援因私自放走死罪囚犯，而亡命到北地（今甘肃庆阳市大部及宁夏银南地区），就留在那里从事畜牧业，有数百家宾客投奔他，参与畜牧和农业生产，马援有了千百人经营的大畜牧场和农场，其放牧的马牛羊有数千头只。其间，马援还"转游陇汉间"，在西北其他地方从事畜牧业。据《水经注》卷二记载："苑川水地，为龙马之沃土，故马援请与田户中分以自给也。"苑川，就是今天甘肃榆中县地，这里水草极好，是培育龙马的地方，马援带着宾客也转游到苑川，自己身穿羊裘皮裤从事畜牧。

古代以农业立国，而"牛者稼穑之资"[23]，因此历代王朝十分重视耕牛，并禁止宰杀耕牛。汉代，牛已受到法律保护，甘肃金塔县额济纳河西岸破城子遗址出土的木简，就有禁止屠杀牛马的诏令。汉代，常因军需而

征用民牛，或供运输，或充军食。如李广利受命远征大宛，出关边骑携有“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多赍粮”[24]，可见当时河西地区畜牧业的兴盛。汉代实行牛马等大家畜登记的管理制度，除为了便于查核，防止窃失以外，更是为了保证饲养水平，并促进繁殖。在居延汉简中，就有“十五日，令史宫移牛籍太守府”[25]的简文。一般牛籍简，是依照每头牛的毛色、性别、标记、年龄、体尺等要素依次登记建立的。如悬泉简“亭官牛一，黑，□，齿八岁，夬（缺）鼻，车一两（辆）……”[26]马籍记载的内容与牛大体相同，如悬泉汉简为建始二年三月上报的悬泉驿《传马名籍》底本，原册有散佚，尚存有10匹马的名籍，如第17简文为“传马一匹，赤骝，牡，左剽，齿九岁，高五尺八寸，驾，名曰铁柱”[27]。

养羊，是民间畜牧的主业。《汉书·苏武传》记载，苏武曾被迫在严寒的北海（今俄国贝加尔湖地区）牧羊：“乃徙北海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羝是公山羊。汉代还通过多次对匈奴的战争，把马牛羊作为战利品带回内地。如汉武帝时，卫青出征匈奴，击败白羊王于河南（今河套地区），虏获羊百余万只。又，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汉军联合乌孙反击匈奴时，虏获大量牲畜及60万只羊，并且许可乌孙自取其中一部分战利品。汉简中有不少养羊的记录。如居延汉简中：“□臣多羊偿卒□钱”[28]的简文，是一位戍吏以私养的多只羊偿还某卒债务的说明。

骆驼也是凉州的重要牲畜。骆驼，在汉代典籍和出土简牍中亦写作“橐佗”“橐驼”“橐它”“橐驼”等。当时，少数民族及官、私皆有牧养骆驼的。如居延汉简有“……为部卒取私橐□”[29]，是指边塞士卒私人喂养的骆驼。而悬泉汉简中“所遣骊軒苑监侍郎古成昌，以诏书送驴、橐他”[30]。说明，骊軒苑中亦牧养有骆驼，并按照朝廷要求向它处调送。居延汉简中“橐马一匹，高六尺八”[31]，是官有骆驼的名籍。汉简中记载，河西有虏获匈奴人骆驼的，如敦煌马圈湾出土汉简中“湖部尉得虏橐它……”[32]，也有捕获野骆驼牧养的，如居延汉简中记载，永始二年，大昌里男子张宗到居延甲渠收虏燧探亲，张“宗见塞外有野橐佗□”，“□宗（乘）马出塞逐橐佗，行可卅余里，得橐佗一匹……”[33]还有西域诸国进贡骆驼，留置凉州的。悬

泉汉简中简《康居王使者册》言，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肩阗，苏鋈王使者、姑墨副沙困、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橐佗入敦煌关，县次赎食至酒泉昆归官，太守与杨伯刀等杂平直肥瘦。今杨伯刀等复为王奉献橐佗入关，行直以次食至酒泉，酒泉太守独与吏直畜，杨伯刀等不得见所献橐佗。姑墨为王献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以为黄，及杨伯刀等献橐佗皆肥，以为瘦，不如实，冤。……[34] 即是西域使者对酒泉太守评估其进献骆驼情况不实的申报。凉州骆驼可以买卖。敦煌汉简中简载："□☑省卖□得骑驼三百二匹。"[35] 一次骆驼买卖达 302 匹，可见当时凉州牧养骆驼的数量之大。骆驼既用于骑乘，也用于拉车和驮运物资。如敦煌马圈湾出土 42 号汉简，"即闻第一辈起居，虽从后遣橐佗驰告之，窃欲德义"[36]，就是骑乘骆驼的记载。而敦煌 370 号简，"出橐二，剧一，具绊一。三月六日，第十三车子杨闳，取给橐佗一，牛一头"[37]。其中第一个"橐"字，指装东西的口袋，与剧（车上用的木杈）、具绊，都是载运车子上的物品。车子，即车夫，驾车者，他领了随车的用品，以及骆驼和牛，要去执行以骆驼车、牛车运输物品的任务。

凉州民间牧养牲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如，人们知道，瘦疲之马不能只喝水吃草，必须喂粮食，才能恢复体力。敦煌汉简第 41、43、164 简："羸瘦困亟，间以当与第一辈兵俱去，以私泉独为粜谷。……少罢，马但食枯葭饮水，恐尽死。""马毋谷气，以故多物故。"[38]凉州民间畜牧业的丰富经验，对官营畜牧业的发展有推动作用。昭帝时，曾选拔北地人傅介子，担任朝廷骏马监之职，以更好地管理皇家牧马业。

两汉之际，全国各地都遭受到长期的混乱和兵燹，但河西地区由于窦融等人的经营，社会经济仍呈现繁荣的景象。建武十二年（36 年），窦融等离开河西时，"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39]。清正廉洁的姑臧长孔奋单车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谓曰：'孔君清廉仁贤，举县蒙恩，如何今去，不共报德！'遂相赋敛牛马器物千万以上，追送数百里。奋谢之而已，一无所受"[40]。路上披野的牛羊，以及拟送给孔奋的"牛马器物千万"，都说明其时河西畜牧业的兴盛。经过光武、明帝等东汉初期的

经营，凉州各地民间畜牧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时人称当地“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41]。安帝时任尚书的翟酺，年轻时“以报舅仇，当徙日南，亡于长安，为卜相工，后牧羊凉州。遇赦还”[42]。翟酺是史书中见于记载的东汉凉州放牧者。

**三、官营畜牧业**

汉代，出于对马，尤其是战马的需要，政府十分重视官营畜牧业的发展。汉朝官营畜牧业的管理机构比较复杂，主要包括：边郡牧师苑、皇室苑厩、各级政府的官厩。凉州境内的官营畜牧业主要是牧师苑。

（一）汉代的牧师苑制度

牧师苑，是朝廷设在边郡的大规模官营牧场，在牧师官管理之下，以养马为主，兼牧牛、羊、骆驼等。

汉朝对官营畜牧业，实行太仆—牧师令—牧师苑三级管理制度。

太仆是全国牧师苑事务的总管。太仆所辖主要有两个马匹的豢养系统，一个是朝廷养马以供御用和国家重大活动用马，另一个是边郡六牧师苑的苑马系统。皇室和国家用马系统，包括：（1）大厩、未央、家马三令下辖的家马系统，专供皇帝私用；（2）车府、路軨、骑马、骏马四令丞，是专供皇家乘舆及国家各种祭祀活动所用的车马；（3）龙马、闲驹、橐泉、騊駼、承华五监长丞所属的专为皇帝之用饲养的特种马匹的系统。太仆另外还管辖豢养骆驼的牧橐和其他野兽昆蹏（如狮、虎、豹等）的两个机构，以及专为皇太后掌管舆马的中太仆。

当时，设在边郡的牧马场称为苑。《三辅黄图》卷四言：“养鸟兽者通名为苑，故谓牧马之处为苑。”[43]《汉书·食货志》称：

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其后，……始造苑马以广用，宫室列馆车马益增修矣。（颜师古注称：“苑马，谓为苑以牧马。”）

由此史料可以推定，汉皇朝的牧师苑始设于汉景帝时。全国共有6个郡有国家牧马场，每郡一令，总称六牧师苑令。牧师苑令的职掌是负责一郡范围内的牧师苑事务。《后汉书·马援传》注引《续汉书》曰：“援过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宾，本客天水，父仲又尝为牧师令。是时援为护苑

使者，故人宾客皆依援。”这是马援的父亲曾经担任天水郡牧师苑令、马援本人也担任天水郡护苑使者的史料。陈直先生认为，此处“护苑使者，为监护六郡牧师苑临时特置之官。所护之苑，为边郡六牧师苑，而非指上林苑”[64]。《汉书·百官公卿表》又云：“边郡六牧师苑令，各三丞。”[65] 丞为牧师令的副手；骑丞当为三丞之一。

六牧师苑究竟设于哪些郡？有关史料并不清楚。清孙星衍辑录《汉官仪》（二卷）：“牧师苑令三十六所，分置西北边，分养马三十万头。”《后汉书·百官志二》“太仆”下，本注：“又有牧师菀，皆令官，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兴皆省，唯汉阳有流马菀，但以羽林郎监领。”则明确地指明在河西六郡界中，此所谓河西，当然不是河西走廊，而是指陕山黄河以西，大体指今陕北、甘肃、宁夏一带。《玉海》卷一二三《官制·汉牧师苑令》言：“牧师菀令，志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汉官仪》三十六 所，陇西、天水、安定、上郡、北地、西河。”已明确说明河西六郡之名。六郡之中，西河郡在今山西长治一带，上郡在今陕北，北地郡在今甘肃庆阳市和宁夏银南地区，其余三郡都在今甘肃省境。

每一牧师令管辖有数量不等的牧师苑，每一苑通常“以郎为苑监[66]”，管理牧场事务。陈直先生考证各牧师苑之名，称：“考之《地理志》注苑名者，北地郡灵州县有河奇苑，号非苑，归德县有堵苑，白马苑。西河郡鸿门县有天封苑。又《说文》载有騅苑，（《说文》騅，苑名，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为西汉三十六苑之一。）居延木简载有坚年苑（《居延汉简释文》173 页，有“坚年苑髡钳钛右右止大奴冯宣”之简文，余亦考坚年苑应为三十六苑名之一）。综言之，六郡牧师苑，今可考者仅有两郡，三十六苑之中，今可考者仅有七苑。此外《地理志》注有牧师苑官者，有北地郡郁郅县一处。又辽东襄平县亦有牧师官，疑在六郡之外。牧师令有三丞，今可考者有骑丞，详见太仆条下[67]。

陈直先生所考北地郡郁郅县的牧师苑官，《汉书·地理志下》原文为“郁郅，泥水出北蛮夷中。有牧师菀官。”另外，据《水经注》卷二，“苑川水出勇士县之子城南山 ……又北径牧师苑，故汉牧苑之地也。羌豪迷吾等

万余人，到襄武、首阳、平襄、勇士，抄此苑马，焚烧亭驿，即此处也。又曰：苑川水地，为龙马之沃土，故马援请与田户中分以自给也。有东、西二苑城，相去七十里。西城，即乞佛所都也”。杨守敬按“此为西边之苑也。”由之可知，天水郡勇士县境（今定西安定区西及榆中县北）有牧师苑，或苑川水及苑川之名皆来自于西汉曾在此设牧师苑。又《后汉书·百官志二》“太仆”下，本注：“又有牧师菀，皆令官，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兴皆省，唯汉阳有流马菀，但以羽林郎监领。”此汉阳当为郡名，系东汉永平十七年改天水郡置，治冀县，在今首肃甘谷县东。这是说，西汉时在天水郡有牧师苑名流马苑。汉简中有骊靬苑之名，如“……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辛……”[88]此骊靬苑亦应为牧师苑，然似乎不在三十六苑之列。安定郡有呼池苑，《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根据以上考证，我们可以列出西汉已知牧师苑的名称：

北地郡　灵州县河奇苑、号非苑，归德县堵苑、白马苑，郁至县牧师苑。

西河郡　鸿门县天封苑。

天水郡　勇士县牧师苑，流马苑。

安定郡　呼池苑。

张掖郡　骊靬苑，坚年苑。

某某郡　騅苑。

以上诸苑，大体多在凉州境。牧师苑设立的地点基本是固定的，但当牧苑附近发生战事时，常常将牧苑向内地迁移。

牧师苑的放牧人员主要是官奴婢，还有服役农民和刑徒。汉武帝实行“告缗”法后，“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娉以千万数”，“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于诸官”[89]，《汉官旧仪·补遗》称：“太仆帅诸苑三十六所，分布此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择取给六厩，牛羊无数，以给牺牲。”西汉边郡牧师苑使用的官奴婢曾达 3 万人之多。以诸牧师苑牧人 3 万养马 30 万匹计算，每牧师苑平均有 牧人 833名、

养马 8333 匹，规模很大。另外，还豢养牛、羊、骆驼等。牧师苑所养马、骆驼，供军用和驿传之用，牛供使役用，牛、羊除了供肉食外，还要给牺牲，就是在各种祭祀场合作为供品。

牧师苑的经营费用，来自封建国家的租税收入。汉代征收的“算赋”，是为“治库兵车马之用”[49]；“口赋”的一部分也是用“以补车骑马”[50]。二者都用于佐助官营畜牧业的经费。

西汉时期，牧师苑的发展，固然为汉王朝提供了大量的牲畜，增强了皇朝的军事实力，但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西汉政府曾经下诏省减苑马。例如：建元元年（前 140 年），武帝诏令“罢苑马，以赐贫民”[51]；巧元凤二年（前 79 年），昭帝“颇省乘舆马及苑马”[52]；平帝时，“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53]。这种措施一般只是权宜之计，对于牧师苑并没于造成实际的影响。

除太仆属下的牧师苑之外，朝廷的某些部门亦在边郡辖有一定数量的官营牧场。西汉时，京师诸官府属下各有其主管畜牧的系统。例如《汉书·倪宽传》记载，张汤为廷尉时，任命倪宽为从史，倪宽“之北地视畜数年，还至府，上畜簿”[54]。颜师古注云：“畜谓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诸司公廨牛羊。”[55] 可见北地郡即有廷尉属下的牧场。

东汉时凉州的官营牧马呈衰败景象。《后汉书·百官志》载：“又有牧师苑，皆令官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兴皆省，唯汉阳有流马苑，但以羽林郎监领。”

细品上文，似东汉初即将西汉所设三十六牧师苑皆裁撤，仅保留了汉阳的流马苑，由羽林郎统领。但永元五年（93 年）二月，和帝又“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56]。既然到和帝时，凉州还有“诸苑马”可供其省减，则此前在凉州应该拥有不止一处而是多处的牧马苑，或许明帝伐匈奴前恢复了一些牧师苑。顺帝永和五年（140 年），羌豪且冻曾“分遣种人寇武都，烧陇关，掠苑马”[57]。陇关，又名大震关，在今甘肃清水县东北小陇山，属汉阳郡地。如果《百官志》所言流马苑难以落实其地望的话，似乎小陇

山之有马的“苑”可以当之。

凉州诸牧师苑，到东汉成了羌人造反的战场。整个东汉时期，羌人的武装反抗斗争时起时伏，持续不断。东汉政府却节节败退，曾一度放弃了陇西、安定、北地、上郡等地，并将上述郡治徙至三辅境内。在这种情势下，牧师苑显然不可能在西北边郡继续立足。东汉后期，地方军阀和豪强地主的实力迅速膨胀，朝廷对边郡的控制力大大削弱。大量的马匹为军阀和豪强直接掌握，直属朝廷的边郡牧师苑也就更为江河日下、一蹶不振了。

（二）两汉官营畜牧业的作用和影响。

凉州等地牧师苑的直接作用，是生产了大量的马牛羊等牲畜，增加了社会财富，增强了军事实力，为汉帝国的强盛提供了物质基础。西汉时期的边郡牧师苑适应当时的形势需要，为当时的农业生产、军备边防、交通运输以及统治者的日常消费，提供了大量的军马、耕牛、运输畜力、牺牲和肉食，在满足社会对牲畜的需求方面，凉州地区的边郡牧师苑发挥了作用。对抗击匈奴侵袭，维护边地与内地的生产开发，有着重要意义。

凉州等地牧师苑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对当时农业与畜牧业比例关系的消长变化，有重要影响。重农轻牧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个严重倾向。如果这种倾向不能得到一定的抑制的话，势必影响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两汉时期，在中原农业区与西北畜牧区域之间，存在着辽阔的半农半牧区。这些半农半牧区不仅是沟通农业区与畜牧区的桥梁，而且是比较稳定的畜牧基地和牲畜来源。它的存在，大大减轻了中原地区农牧业失调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汉高祖时张良最早发现凉州一带宜于畜牧的自然条件，他劝刘邦定都关中时说：“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59]《索隐》引崔浩云：“苑马牧外接胡地，马生于胡，故云胡苑之利。”《正义》曰：“《博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按：上郡、北地之北与胡接，可以牧养禽兽，又多致胡马，故谓胡苑之利也。”总之所谓胡苑之利，就是上郡、北地二郡靠近匈奴，适合发展

养马业。两汉时期，凉州所在的西北边郡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半农半牧区域，牧师苑集中设在这里，可以发挥当地的自然优势，促使其保持以牧为主、半农半牧的经济特点，从而有利于维系西汉时期农牧比例关系的平衡。反之，随着这些地区牧师苑的衰落，半农半牧区内牧业所占比重迅速下降，势必给整个国民经济结构造成不良影响。

凉州等地牧师苑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巩固中央政府对边郡的统治，同时也促进和密切了中原地区与边郡地区的经济联系，对边郡的经济开发以及中央政府对边郡的统治，具有重要意义。西汉时期的边郡，拥有着大量未经开垦或不宜农耕但却适宜畜牧的草地，但是，边郡地区人口却较为稀少，显然，仅仅依靠地方上的力量缺乏开发利用这些自然资源的能力。设置牧师苑之后，中央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可以集中开发利用边郡的畜牧资源，从而对边郡的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也有利于加强中央和边郡的联系，巩固中央政府对边郡的统治。

两汉时期凉州等地牧师苑的建立和发展，常为后世封建王朝所效仿。例如，直到清代前期，为适应皇室御用、军用和屯田的需要，在西北继续设置牧马监。其在甘肃境内者，有雍正十二年（1734 年）陕西总督刘于义在甘州大草滩、凉州黄羊川、肃州花海子湃带湖等地设立的马厂[60]。由于马厂所在之地都是水草丰美的前代养马之地，管理也比较得法，故一度兴盛。

总之，两汉时期凉州等边郡牧师苑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四、畜牧业技术的提高**

两汉时期凉州地区畜牧业技术的提高，首先体现在对种马的引入和马匹的改良上。

西汉时重视引进野马或特种良马与家马交配而获得优良的马种。西汉最早的凉州良马，当是天水西南的龙马。在太仆所辖诸厩中，有龙马厩。此厩中所豢养的马称为龙马，也就是最宝贵的马。而此龙马的来源，应为上邽龙渊水所出。《水经注》卷二〇《漾水注》载："今西县嶓冢山，

西汉水所导也……西流与马池水合，水出上邽西南六十余里，谓之龙渊水，言神马出水，事同余吾、来渊之异，故因名焉。《开山图》曰：陇西神马山有渊池，龙马所生。即是水也。其水西流谓之马池川，又西流入西汉水。"[15]而《太平御览》卷六五《地部三十·陇蜀诸水》之"马池水"条称："《关山图》曰：陇西神马山有泉池，龙马所出。"[16]可见，西汉之龙马为天水之龙渊水所产马。《水经注》卷二《河水注》还言："苑川水地，为龙马之沃土。"[17]亦可能与此地马匹品种极为优异有关。

元狩三年(前120年)"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18]。这件事颇具传奇色彩。据东汉人李斐称，南阳新野暴利长，在汉武帝时遭到刑罚处理，被押送到敦煌境内参与屯田。他多次在渥洼水旁看见在一群野马中有一匹奇特的马，不时到这里来饮水。暴利长就设计捕捉该马。他做了一个泥人，手持捕马的勒鞮，立于渥洼水旁。该马渐渐对泥人熟悉了，也就不当一回事。后来，暴利长将自己身上抹了泥，代替泥人手持勒鞮站立在渥洼水边，该马来喝水时，照样与他嬉戏，毫无戒备。暴利长乘机用勒鞮套住野马，将其献给武帝。为了使该马更具神奇色彩，他谎称这匹野马是从渥洼水中冒出来的神马。汉武帝得到渥洼宝马，极为兴奋，称之为天马，并咏《天马之歌》道："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俶傥，精权奇，籋浮云，晻上驰。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19]

得到渥洼天马以后，汉武帝对西部地区的良马更为渴求。他打开《易》书，请人占卜，占辞是"神马当从西北来"。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返回时，乌孙昆莫派使者带了"马数十匹"，随同张骞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到长安，向汉武帝表示感谢。汉武帝看到乌孙进献的这几十匹马长相骏伟，头轻，面干，眼大，耳小，口裂深，鼻孔大，背腰宽大，尻宽稍斜，四肢干燥，坚强，是极好的良马，十分高兴。史书称其"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20]。

大宛国是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一个西域强国，该国"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据《汉书音义》记载，大宛国有一座很高的山，山上有马，人们无法捕得，就找来五色母马放到山下，诱使马

下山与母马交配，生出的马驹出的汗色红如血，称之为天马子。张骞出使西域回长安时已经向武帝描述过大宛马的奇特。后来，那些出使西域的使者又向武帝报告："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史记·大宛列传》记载道："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宛国饶汉物，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奈我何。且贰师马，宛宝马也。"遂不肯予汉使。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宛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

武帝听到消息十分震怒，这时有人向他建议，派三千汉兵远征，就可以打败大宛，夺得其善马。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属国6000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出敦煌，西去打击大宛，夺取善马。李广利的西征极不顺利，曾经退回敦煌，上书请求罢兵。汉武帝派遣使者挡在玉门关口，说："军有敢入者辄斩之！"汉武帝增兵6万，李广利再次出征。围攻贰师城40余日，迫使其投降，"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回长安向武帝报捷。汉武帝改称大宛马为"天马"，将乌孙马改名为西极马，又赋诗道："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67]

这次李广利远征大宛，虽以取大宛善马为名，实际上是因为大宛为匈奴在西域的最重要的盟友，打击大宛是在西域与匈奴进行较量，消除匈奴在西域的影响，维护中西交通的安全，为汉朝控制西域扫除障碍。后来，汉朝从西域获得更多的良马。敦煌悬泉简中，就有汉昭帝时派使者到敦煌迎大宛"天马"的记录，简文称："元平元年（前74年）十一月己酉，□□诏使甘□□迎天马敦煌郡。为驾一乘传，载御一人。御史大夫广明下右扶风，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68]

凉州各地亦重视捕捉野马以与家马交配，居延新简中载："□野马

一匹，出殄北侯长皆□。”[69]汉武帝之所以在凉州和西域各地寻求野马、良马，主要是为了对马匹进行改良，提高骑兵的战斗力，在对匈奴的作战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除了对马的品种进行改良外，对其他大牲畜品质的改良也有较大成绩。少数民族所豢养的牲畜中，“其奇畜则橐佗、驴、骡、驹骆、騊駼、驒奚”[70]。颜师古注称：“骡，驴种而马生也。驹骆，骏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騊駼，马类也，生北海。驒奚，駏驉类也。”《说文解字》中更明确解释说：“羸（骡），驴父马母”；“驹骆，马父羸（驴）母也”。马驴远缘杂交所产生的骡和驹骆，具有耐粗饲、耐劳役、抗病力强、挽力大而且持久等优势。

张骞通西域后，从西域引进了苜蓿。《汉官》载：“长乐厩，员吏十五人，卒驺二十人，苜蓿苑官田所一人守之。”[71]是说，京师长乐厩有专门种植苜蓿的苑田。苜蓿从西域传入，第一站就是河西走廊，凉州尤其是河西地区应有苜蓿的种植。苜蓿是优质的饲草，用于饲养牲畜，在中国畜牧史上是一件大事，对繁育良种马，增强牲畜的体质和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甘肃各地出土的汉代陶屋明器，许多都带有猪圈。它说明，在汉代凉州各地猪的饲养已经由放养发展到圈养与放牧相结合。圈养是猪养育史的重要里程碑，既利于猪的肥育，又有利于肥料的积蓄，以用于庄稼地施肥。

汉代，牲畜阉割去势的范围已相当广泛。《说文解字》中有“騬，犗马也”；“犍，犗牛也”；“羯，羊羖犗也”；“猗，犗犬也”；“豮，豕也”等释文。犗，阉割过的牲畜。说明汉代马、牛、羊、犬、猪等牲畜均已实行阉割去势术。汉代还发明水骟法为马去势，比火骟法更安全保险。

汉代凉州地区兽医药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当时，在许多有马的机构中都设有专门的马医[72]。

元始五年（5年），为了递送西域都护给皇帝的紧急公文，遮要亭派遣马医亲自传递。从这则汉简中，我们知道了汉代驿亭中可能设有专门的马医，遮要亭的马医名王竟。汉简中有许多治牛马病的医方，如治马

受鞍伤后形成的鞍疮方、治马伤水方等[⑧]。

两汉相马法得到很大的发展。什么样的马才可以称为良马，必须由高明的相马师根据其外形和骨骼予以判断。凉州等地的牧马者，在长期的牧马生涯中总结和研究相马的经验，相马的准确率日益提高，负有盛名。其中最著名的是杨子阿和曾在北地、天水放牧的马援。杨子阿，西汉成纪人，他到关中向师承有绪的茂陵人丁君都学习相马之术，深得其真传。马援的父亲曾在天水为牧师令，马援喜爱骑马，对相马极有兴趣，他走遍关中、陇西等地，向善于相马者求教，终于在成纪拜师于杨子阿，向其学习相马之术。马援从杨子阿处学到了以骨骼相马的技术，但他不拘于师法，继续求师，并且结合实际，检验于所见各种马匹，积累了丰富的相马经验，他集诸家骨相法，综合仪氏鞮，中帛氏口齿，谢氏唇鬐，丁氏身中，开创了综合相马新法。他把自己的相马法运用于实践之中，发现了许多良马，再用这些良马来改进畜牧的马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流传至今的马援《铜马相法》曰：

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两孔间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红而有光，此马千里。颔下欲深，下唇欲缓。牙欲前向。牙去齿一寸，则四百里；牙剑锋，则千里。目欲满而泽。腹欲充，胁欲小，季肋欲长，悬薄欲厚而缓。悬薄，股也。腹下欲平满，汗沟欲深而长，膝本欲起，肘腋欲开，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坚如石。

马援认为，相马之法仅仅靠相马者口传身授，难以普及推广，更难以传之久远。为了把自己的综合相马法传播开来，发展全国的牧马事业，马援南征交阯以后，没收了越人的铜鼓，将其熔化，铸成了一匹具备诸家骨相的马式。这匹铜马式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马援将铜马献给朝廷，汉光武帝将其置于洛阳宣德殿，成了天下名马的准式。

汉简中也有相马法的残篇，如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简牍中云："胃肠小者腹下平。胃脾小者，听耳寓听。耳欲卑，目欲高，间本四寸六百里。"

在《流沙坠简·术数篇》中，王国维对此进行考证，言："右简语多不

可解，然细绎之，则《相马法》也。”

1969年在武威雷台东汉墓发现的著名的铜奔马，体型矫健，应该是在吸收当时风行的良马意识、神马传说及名马式的基础上，创造出的一件罕世艺术精品。从另一方面来说，武威铜奔马又是两汉凉州畜牧甲天下的代表。

**注释：**

①《汉书》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62页。

②《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5页。

③《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61页。

④《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01页。

⑤《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879页。

⑥《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第2977页。

⑦许慎：《说文解字》“羊部”，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8页。

⑧《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第2972页。

⑨刘光华主编：《西北通史》第一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8页。

⑩《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第2983页。

⑪《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白马氐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59页。

⑫《宋书》卷七八《萧思话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13页。

⑬此次战役，《后汉书·西羌传》系于汉安三年，因汉安三年四月改年号为建康，该年四月至十二月为建康元年，而同传建康元年又有“建康元年春，护羌从事马玄遂为诸羌所诱，将羌众亡出塞，领护羌校尉卫瑶追击玄等，斩首八百余级，得牛马羊二十余万头”的记载，实建康元年春即汉安三年春。《资治通鉴》将前一战系于汉安二年，后一战系于建康元年，或司马氏另有材料根据。

⑭《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66页。

⑮《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81页。

⑯《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第2979页。

⑰《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1135页。

⑱《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9页。

⑲《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14页；《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22页；《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39页。

⑳《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72页。

㉑我们之所以将这段材料视为西汉凉州地区的事，主要依据，一是所谓"塞之斥"之塞，为汉代对边境的称呼，而《史记》又是汉武帝时人司马迁所撰，所记史事当在其生前；二是"斥塞"即开边，在西汉中期，汉武帝所开边地主要是河南地和河西走廊，前者毗邻凉州北境，后者属于凉州地区。

㉒《后汉书》卷二四《马援列传》，第840页。

㉓魏王弼注：《周易注疏》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

㉔《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76页。

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页。

㉖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㉗《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81页。

㉘《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第89页。

㉙《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第20页。

㉚《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61页。

㉛《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第60页。

㉜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第11页。

㉝《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第158页。

㉞《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18页。

㉟初师宾总主编，吴礽骧本卷主编：《中国简牍集成》第3册《甘肃卷》上，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

㊱《敦煌汉简释文》,第 5 页。

㊲《中国简牍集成》第 3 册《甘肃卷》上,第 49 页。

㊳《中国简牍集成》第 3 册《甘肃卷》上,第 12、24 页。

㊴《后汉书》卷二三《窦融列传》,第 807 页。

㊵《后汉书》卷三一《孔奋列传》,第 1099 页。

㊶《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 2893 页。

㊷《后汉书》卷四八《翟酺列传》,第 1602 页。

㊸《三辅黄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㊹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94 页。

㊺《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 729 页。

㊻《汉书》卷五《景帝纪》,如淳注引《汉仪注》,第 150 页。

㊼陈直:《汉书新证》,第 215 页。

㊽转引自张德芳的《汉简确证:汉代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光明日报》》2000 年 5 月 19 日。

㊾《汉书》卷二四《食货志》,第 1170、1171 页。

㊿《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如淳注引《汉仪注》,第 46 页。

(51)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之《汉旧仪》卷下,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 82 页。

(52)《汉书》卷六《武帝纪》,第 157 页。

(53)《汉书》卷七《昭帝纪》,第 228 页。

(54)《汉书》卷一二《平帝纪》,第 353 页。

(55)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八《倪宽传》,第 2628 页。

(56)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八《倪宽传》,第 2629 页。

(57)《后汉书》卷四《和帝纪》,第 174 页。

(58)《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 2895 页。

(59)《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第 2044 页。

(60)刘于义:《请设马厂疏》,载《皇(清)朝经世文统编》卷七三《马政四》。

(61)陈桥驿点校:《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87~388 页。

㉜夏剑钦、黄巽斋校点:《太平御览》第1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版,第517页。

㉝陈桥驿点校:《水经注》,第41页。

㉞《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84页。按,暴利长向汉武帝献渥洼马的时间,在《武帝纪》中记为元鼎四年,但是《汉书·礼乐志》记武帝赋《天马之歌》为"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考武帝先是称渥洼马为天马,后得乌孙马,好,又改称乌孙马为天马。而乌孙人最早献马的时间是元鼎二年,若依《武帝纪》所言时间算,则献乌孙马在前,得渥洼马在后,不当。故依《礼乐志》所记,定为元狩三年献渥洼马。

㉟《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60页。

㊱《汉书》卷六一《张骞传》,第2693页

㊲《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60~1061页。

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04页。

㊴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㊵《汉书》卷九四《匈奴传》,第3743页。

㊶《汉官六种》,第4页。

㊷《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11页。

㊸《中国简牍集成》第3册《甘肃卷》上,第275页。

作者:汪受宽,1943年出生,男,江苏东台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晚唐五代瓜州都河水道变迁与环境演变

郑炳林　曹　红

唐代瓜州晋昌郡即汉酒泉、敦煌二郡地，晋惠帝分酒泉、敦煌郡置晋昌郡，隋代调整郡县，取消晋昌郡并入敦煌郡。唐武德五年（622年）于晋昌置瓜州，以其地出美瓜取名，相传狐食其瓜，不见首尾。大历十一年（776年）被吐蕃占领，吐蕃于瓜州置节度使，管理瓜州、沙州及其相邻地区。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收复瓜沙二州，又于晋昌置瓜州，管辖有晋昌、常乐、新乡、新城、会稽、玉门、雍归等县镇，特别是西汉金山国和曹氏归义军时期，管辖范围仅仅二州八镇，其中六镇分布在瓜州地区，足见州地位的重要。瓜州地区水流较少，干流单一，流经瓜州和发源于瓜州地区的河流只有三条，榆林河、苦水和疏勒河；草场分布与河流关系密切，分布于榆林河上游地区雍归镇一带、苦水河及冥水（都河）下游地区；瓜州地区保留很多古代城址遗迹，这些城址有些可以与历史记载联系上，更多的是很多古城与历史记载还联系不起来，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才能考证清楚。瓜州地区明代以后放弃，居民大量迁徙到嘉峪关以内的甘、肃、凉等地，清代开始重新设置行政建制，并向这些地区移民。这样一来，就使历史的记载与遗存联系不起来。关于瓜州地理环境演变，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人就这一问题作专门的研究，瓜州地区地理环境问题有河流改道、城址地望和草场分布等，关于这些问题有些已经有专家做了研究，还有的遗留至今没有解决。

## 一、晚唐瓜州都河水道河源问题探讨

晚唐瓜州地区的主要农业灌溉河流就是疏勒河，疏勒河是现在名称，历史时期的疏勒河有很多名称。汉代瓜州属敦煌郡之冥安县、广至县、

渊泉县，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广至县标注在今瓜州县西南苦水流域，即唐常乐县；将渊泉县标注在今瓜州县东乡族乡和河东乡，将冥安县标注在瓜州县锁阳城故址。根据《汉书·地理志》敦煌郡记载，冥安县有冥水，“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颜师古注：“应劭曰：冥水出北，入其泽。”又有渊泉县，颜师古注曰“阚骃云地多泉水，故以为名。”广至县“宜禾都尉治昆仑障。莽曰广桓”[①]。其中与疏勒河有关系的只有冥安县的籍端水。

籍端水出南羌中，羌中为泛称羌人居住区域。不仅籍端水源自羌中，凡是河西地区发源于祁连山的河流，都称出羌中。如氐置水、呼蚕水、羌谷水等。《汉书·地理志》敦煌郡龙勒县、酒泉郡福禄县、张掖郡觻得县记载其河流源自羌中：龙勒。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福禄。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觻得。千金渠西至乐涫入泽中。晃谷水出晃中，东北至居延入海，过郡二，行二千一百里[②]。

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武威郡诸水并不言出羌中，而称出南山：“姑臧。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苍松。南山，松陕水所出，北至揟次入海。”[③]而不说出羌中或者南羌中，说明这个地区当时不属于羌中的范围。羌中（或者南羌中）到底指那些区域？从《汉书·地理志》记载得知，河西从张掖郡以西到敦煌郡有四条水源自于羌中。《汉书·赵充国传》记载：“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充国以为：‘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势不能独造此计，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约。……’”后来汉朝采纳辛武贤建议准备出兵至鲜水北句廉上攻打罕羌，赵充国认为“先零羌虏欲为背畔，故与罕、开解仇结约，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汉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为其计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坚其约，先击罕羌，先零必助之”[④]。表明鲜水左右的羌中实际上活动的主要是罕羌，赵充国打败先零羌之后才到罕羌活动区，亦说明罕羌生活在先

零羌之西。而地处鲜水之西的籍端水，也是罕羌的活动区域。南抵属国，刘满认为应作“抵属国南”，刘满先生认为沙阴指居延海附近的流沙，盐泽即蒲昌海，长坑指盐泽以东的汉长城，穷水塞指盐泽以东汉朝塞名，“在盐泽以东，今甘肃敦煌、酒泉以南的青海境内，故称‘南羌中’，这里就是羌人的聚居地”。“总之，赵充国所说的羌匈交通路线是：由今内蒙古的额济纳旗北的沙漠往西，经今新疆东部的沙碛，到新疆东南的罗布泊（即盐泽），再经过罗布泊附近的长坑和穷水塞，而后向东进入今青海西部，即汉代的‘羌中’。”[5]羌中是一个泛称，泛指敦煌、酒泉、张掖以南祁连山羌人居住的地区。

疏勒河上源流经区域就是汉代羌中，这里都是河谷地带，有很好的牧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甘肃省卷高原山地部分记载，疏勒河流经花儿地之南有宰力木克山，“谷地为草甸草原”；疏勒南山，西起崩坤沟，东至苏里漫滩，北界疏勒河谷地，因居疏勒河上游谷地之南得名，“谷地为高山草甸草原，系夏季牧场”。沙果林那穆吉木岭，在疏勒河上游谷地之南，西起苏里漫滩，东至日阿吾尔多额，南北介于希格尔曲上游支流与疏勒河上游谷地之间，为陶赖河、疏勒河、黑河、大通河与布哈河的发源地。陶勒河南山，在陶勒河与疏勒河上游谷地之间，“谷地为高山草甸草原，系冬季牧场”。位于昌马盆地南和野马河谷地之北的大雪山，“冰雪融水补给疏勒河，谷地为高山草甸”[6]。可证实疏勒河上游谷地是高山草甸草原，为夏冬季牧场。羌族是游牧 民族，主要生活在这一区域，所以将这里称之为羌中。此外党河上游地区也是牧场，位于野马南山之南的党河河谷，“谷地宽敞，为高山草原，草被覆盖度大，为良好牧场”。党河南山“坡地为寒漠，谷地为高山草甸草原”[7]。位于裕固族自治县红湾寺镇东 45 公里黑河东岸的平顶山，“为高原半干旱气候区，山上水草丰美，属高山草原，为良好夏季牧场”[8]。在野牛山、临松山等都有非常好的牧场，在黑河、陶勒河、梨园河上游河 谷地带也是畜牧区域。这些地区都是适合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 羌族是从事畜牧业生产 的，“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9]。汉代大小开羌居住于黄河以

南地区;先零羌"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10]。主要活动在河湟地区及大通河流域,而罕羌主要活动在先零羌之西的酒泉、敦煌南地区[11]。

羌族居住区域,《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12]汉武帝时期先零诸羌与匈奴合兵攻令居等地被汉朝击败,"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13]。因此羌人活动区域包括了敦煌、酒泉、张掖以南的祁连山在内,羌中、南羌中就是羌人活动区域。

这条河流的径流特征与敦煌出土文献《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独利河水特征基本相同。独利河水:右源出瓜州东南三百里,流至沙州敦煌县东南界。雨多即流,无雨竭涸[14]。

疏勒河的特征,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甘肃省卷:源出疏勒南山与陶赖南山间之疏勒脑,西北流经治泽地,汇山区冰雪融水及深山区降水,至花儿地后折向北流入昌马盆地,称昌马河;出昌马峡后进河西走廊冲积平原,河道呈放射状,河水大量渗漏,成为潜流;至冲积扇前缘出露形成道泉水河,诸泉河北流至布隆吉汇合,称布隆吉河。[15]

疏勒河在出昌马峡以下进入冲积扇,河道呈放射状,河水渗漏成为潜流,就是敦煌出土文献所记载的"雨多即流,无雨竭涸"。疏勒河从发源于地今苏北蒙古族自治县与青海接壤的岗格尔肖合力山北,流经花儿地到昌马盆地前,这一区域都是高山草甸草原。属于畜牧区域,汉唐时期,中原王朝控制地区没有达到疏勒河上游地区,因此敦煌出土文献记载疏勒河的上游地区的流向、里程、环境、植被模糊不清,就是河源也含混不清。所谓源出瓜州东南三百里,显然与事实不符。根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瓜州八到,"南至大雪山二百四十里"[16]。按大雪山,当指位于昌马盆地之南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大雪山,唐代了解疏勒河大概只到大雪山东北隅,也就是昌马盆地的北缘。疏勒河昌马水库以上祁连山区,河长328公里,到花儿地大约一半流程。足见唐代对这一地区的了解程度及其瓜州管辖范围。

疏勒河谷还是汉唐以来羌浑来往河西地区的交通道路。关于这一

点我们从《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中已经看出来，雪山“南连吐谷浑界”，瓜州八到“南至大雪山二百四十里”[17]。由此得知疏勒河上游谷地还是吐蕃通往河西地区的主要通道，吐蕃尚乞心儿攻打沙州，赞普徙帐南山，亲自坐镇监督，南山就是指这一地区的祁连山，表明吐蕃是由这里进入河西走廊的。

**二、新城镇都河堰与都河的古河道变化**

疏勒河从昌马大坝以下进入冲积扇地区，河道很不稳固，分流形成很多河道，最后渗入地下，在冲积扇边缘渗出形成很多泉眼，汇集重新形成河流。而作为瓜州治所的晋昌县即今锁阳城，农业灌溉主要依靠河流灌溉，但是这里没有河水流经，因此这里的农业灌溉用水主要靠引附近河流进入通过水渠灌溉。瓜州锁阳城引疏勒河灌溉而形成的渠道称之为都河，它的得名与可能与敦煌都乡渠一样，为诸乡共造：“都乡渠，长廿里：右源在州西南一十八里甘泉水马圈堰下流，造堰拥水七里，高八尺，阔四尺，诸乡共造，因号都乡渠。”[18]这条水渠在《敦煌行水则》记载中与宜秋、北府、东河等一样，称之为都乡大河母，唐代有将主干渠称之为河的习惯[19]。晚唐五代时期就直接叫河了，高居诲《使于阗记》记载出敦煌往西行，“西渡都乡河至阳关”[20]。都乡渠就演变成都乡河。因此流经唐瓜州晋昌县的都河，可能就是唐瓜州地区诸行政机构联合修建，因此被命名为都河。都河原来是一条人工修造的水渠，这对于我们认识这条河流演变具有很大意义。

都河既然是唐瓜州地区联合共建的一条人工水渠，因此就要经常性对水渠维护和疏浚，要有堤堰堰水进入水渠。因此寻找都河堰是我们了解这条水渠起点的关键。敦煌文献中关于都河堤堰记载有一处，即：《大唐河西归义军节度左马步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故张府君邈真赞并序》：夫禀道怀志，庄周岂叹于西驰；孰为奇仁，鲁父轸词于东逝。况我公讳保山，字□□。雄门之将，性本奇聪。三端别秀于人伦，六艺每彰于西裔。弯弧伏兽，细柳未比于今时。举矢猿啼，箭动傅空而雁泣。故得文深墨宝，诗书缀玉而成章。笔彩龙飞，触锋

七分而入木。智周五郡，不改始终。言以安人，谦谦守道。侍历两政。谨专一途。金王会临，超先拔选。东陲大镇，最是要关。公之量宽，佥然委任。新城固守，已历星霜。兹镇清平，人歌邵(绍)泰。堰都河而清流不泛，浚沟洫而湍涌沄波。五谷积山，东皋是望。贮功廪什(实)，抚备边城。效壮节得顺君情，念衣冠而入贡。路无阻滞，亲入九重。上悦帝心，转加宠秩，得授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回骑西还，荐兹劳绩，当佥左马步都虞侯。一从注辖，五载有余。内外告泰安之声，囹圄止讹斜(邪)之遗。冰清月皎，六街无奸盗之非。防险虑虞，百坊叹长年之庆。谯公秉节，头(倾)慕忠贞。公之英奇，颇能携荐。辕门指拓(挥)，须凭盛族之良。军府杞材，仍藉有功之士，转迁右马步都押衙。公干当世，韬钳(钤)满怀。胆气出群，辛勤百战。不辞寝甲，皓首提戈。常进智谋，再收张掖。洪军霸战，四路传声。要达皇王，刻名玉案。公之猛列(烈)，不顾艰险。又至天庭，所论不阙。慕公忠赤，报以前勋，乃荐左都押衙[21]。

邈真赞中记载张保山出任新城镇镇遏使，时间大约是张承奉西汉金山国时期，“堰都河而清流不泛，浚沟洫而湍涌沄波。五谷积山，东皋是望。贮功廪什(实)，抚备边城”。我们分析这段记载表明都河堤堰在新城镇，而新城是西汉金山国的“东陲大镇，最是要关”，位置大概应当在西汉金山国的东部边疆地区。堰都河而清流不泛，说的是经过堤堰堰水，都河水流不再泛流，根据疏勒河“出昌马峡后进入河西走廊冲积平原，河道呈放射状，河水大量渗漏，成为潜流”，这样都河堤堰应当在位于昌马冲积扇河道呈放射状进入渗漏区之前，只有将堤堰建造在这一带堰都河才能使其不至于泛流。其次新城镇不仅有都河堤堰，而且还要有水渠，邈真赞记载的“浚沟洫而湍涌沄波”就是指的这条人工水渠，也就是都河。

都河堤堰在新城镇，经人工疏浚的沟洫从新城镇开始，这是我们确定新城镇的重要依据。这个位置只能是昌马，而都和堤堰应当就在今天的昌马大坝。黄盛璋《沙州曹氏二州六镇与八镇考》认为新城即新乡[22]。《广顺五年都知兵马使吕留延都知兵马使阴延等状太保衙》：“右□今月□日

□时于向东甚处递到消息，言道有马踪多少骑，数来人会稽、新乡、雍归、新城管界。更有输□看临时书之，谨具状申。”[23]新乡、新城同时出现，是证应为二镇。《归义军破历》记载新镇五次，镇使张从武。《社户吴怀实状》记载丁酉年新城张镇使。罗福苌编《沙州文录补》收有《新城镇使张宝山书状》封书样：“新城镇使状上相公衙，节度押衙、充新城镇遏使张保山状。谨封与大将军书样，谨上郎中阁下。节度押衙、充新城镇遏使张保山状封。”[24]共两条。我们从这些文书中得知，新城镇是张承奉时期归义军政权一个重要军镇，和会稽、新乡、雍归等镇一起，构成归义军政权的东部疆界或者防线，雍归镇在今石包城，会稽镇在今瓜州县布隆吉到玉门镇一带，新乡镇，根据《通典》《太平寰宇记》的记载“瓜州南至新乡镇一百八十里”[25]，根据《元和郡县图志》瓜州条记载“南至大雪山二百四十里”，又载“雪山，在县南一百六十里。积雪夏不消，东南九十里，南连吐谷浑界”[26]。这里的计算当以晋昌县界为起点，案雪山即位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大雪山，路经昌马大坝、昌马，大约二百四十里，如果减去八十里，新乡镇的位置应当在今昌马。而新城镇只有一个地区与之相配，就是玉门市的昌马北边的大坝附近。只有这样才能起到东陲大镇最是要关的作用，又有都河堤堰可浚沟洫而湍涌沄波。

我们注意到新城镇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最是要关，显然是控制某个关口或者交通要道的关隘之地，我们从《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得知雪山东南九十里“南连吐谷浑界”，这里就是汉代的羌中地，即今肃北县花儿地，吐谷浑生活的地区。吐谷浑灭亡之后，这里就是吐蕃生活的地区。《新唐书·吐蕃传下》记载“始，沙州刺史周鼎为唐固守，赞普徙帐南山，使尚绮心儿攻之”[27]。南山指位于酒泉、张掖、敦煌之南的祁连山，实际上就是汉代南羌中。我们根据吐蕃占领敦煌地区之后，将统治中心放在瓜州，设置瓜州节度使衙，推测吐蕃赞普的行帐应当在瓜州附近，因此这个吐蕃赞普行帐所在的南山，就在疏勒河上游河谷地。吐谷浑、吐蕃生活在这一地区，那么他要形成对瓜州地区的威胁，就要从西部经由雪山南野马河谷，翻越龚岔达坂往北经由石包城即雍归镇，过水峡口沿榆林河

到瓜州常乐县;其次就是沿疏勒河经昌马大坝到瓜州。因此大坝位置处于鹰嘴山之东,是吐蕃向北进人瓜州地区的必经之地。同时昌马大坝还是瓜州东到肃州的关隘所在。《西天路境》记载肃州:"又西行一日至玉门关。又西行一百里至沙州界,又西行二日至瓜州,又西行三日至沙州。"[28]肃州西行一日的玉门关,位置大约就在今天的嘉峪关附近,再西行一百里进人沙州界,当指曹氏归义军政权管辖的范围,大约在今天玉门市清泉、赤金或者玉门市左右的地方。这批使节的行走速度大约每天一百里,因此从瓜州到肃州四百八十里,共走了四天多时间。我们根据《高居诲使于阗记》记载:"(甘州)西北五百里至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西至瓜州、沙州。"[29]《西天路境》记载的玉门关,应当是天门关,而高居诲所记载的玉门关,可能就是曹氏归义军政权玉门镇或者玉门军所管辖的关口。大约在赤金一带。而经此往西的吐蕃界,这个吐蕃部落可能在今玉门市与昌马之间。因此新城镇作为东陲大镇最是要关的地位体现出来了。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河流水道,都可以确定新城镇就设置在昌马大坝一带。

**三、唐瓜州晋昌县农业区域与都河倭流问题**

唐瓜州治晋昌县,即今锁阳城,已经废除,故城附近水渠、农田荒废,仅保留遗迹,从这些遗迹还能看出原来农田分布和水渠走向,从遗迹看,水渠有干渠和支渠,从东南向西北呈放射状分布。由此表明唐瓜州晋昌县的农业灌溉,主要依靠从锁阳城西南某处疏勒河上引水。晋昌农业区虽然今天已经荒废,这个区域南邻鹰嘴山,东南有昌马大坝故废弃河道通人,东部地区为戈壁沙漠地带,西与榆林河下游灌溉区相邻,北部遥望疏勒河。这个区域没有径流经过,东部榆林河灌溉区地势较低,河流不便引入,而且径流较小,不能满足晋昌地区农业灌溉需要。因此,晋昌地区的农业用水除了开凿水渠引疏勒河之外,没有任何别的途径。关于瓜州晋昌县依靠引疏勒河,在唐代史籍和敦煌出土文献中都有记载,很多记载水流特征也与今天相似。从唐代到归义军时期,瓜州晋昌的河流渠道有两次大的毁坏和修复,一次发生在唐开元十六年,一次发生在归

义军时期索勋任瓜州刺史时。

唐开元十四年瓜州晋昌县河流毁坏与修复，是唐与吐蕃战争直接导致的结果。这年冬吐蕃大将悉诺逻率中外从大斗拔谷进攻甘州，焚烧市里而去，王君奠率军追至青海尽俘其辎重，以功迁右羽林大将军凉州都督，随即吐蕃进行了报复，攻下瓜州并俘虏其父，《旧唐书·王君奠传》记载：

其冬，吐蕃寇陷瓜州，执刺史田仁献及君奠父寿，杀掠人户，并取其军资及仓粮。又进攻玉门军及常乐县。仍纵僧徒使归凉州，谓君奠曰：‘将军常欲以忠勇报国，今日何不一战？君奠闻父被执，登陴西向而哭，竟不敢出兵。

吐蕃之寇瓜州也，分遣其副将莽布支攻常乐县，县令贾师顺婴城固守。及瓜州城陷，大将悉诺逻又尽引其众乘势以攻之，数日不陷……悉诺逻知城中无财帛，夜烧死人，引众毁瓜州城。师顺递开门收器械，更修守备。吐蕃果使精骑回袭，而巡城知有备，始去[30]。

《新唐书·吐蕃传上》也记载这次战争：未几，悉诺逻恭禄、烛龙莽布支入陷瓜州，执刺史田原献及君奠父，遂攻玉门军，围常乐，不能拔，回寇安西，副都护赵颐贞击却之。会君奠为回纥所杀，功不遂。帝乃用萧嵩为河西节度使，左金吾将军张守珪瓜州刺史，复城之。嵩纵反间，杀悉诺逻恭禄。明年，大将悉末朗攻瓜州，守珪击走之[31]。

从以上记载得知，吐蕃出兵先攻打瓜州，然后分兵进攻瓜州东部的玉门军和西部的常乐县，由此推测吐蕃是由瓜州南部进入，表明是由昌马到达瓜州。《新唐书》的记载基本与《旧唐书》相同：“俄而吐蕃陷瓜州，执刺史田元献及寿，杀居人，取资粮，进攻玉门军……始，吐蕃寇瓜州，分遣莽布支攻常乐，令贾师顺乘城守。俄而瓜州陷，悉诺逻并兵攻之……悉诺逻知无有，乃夜撤营去，毁瓜州城。”[32] 也记载吐蕃先攻瓜州，而后分兵进攻玉门军和常乐县。关于吐蕃对瓜州城毁坏情况及其修复，《旧唐书·张守珪传》有详细的记载：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奠死，河西恟惧。以守珪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领余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暴至城下，

城中人相顾失色，虽相率登陴，略无守御之意。守珪曰："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纵兵击败之。于是修复廨宇，收合流亡，皆复旧业。守珪以战功加银青光禄大夫，仍以瓜州为都督府，以守珪为都督。瓜州地多沙碛，不宜稼穑，每年少雨，以雪水灌溉田。至是渠堰尽为贼所毁，既地少林木，难为修葺。守珪设祭祈祷，经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涧而流，置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于是水道复旧，州人刻石以纪其事[33]。

同样的记载还见载于《新唐书·张守珪传》：王君㚟死，河西震惧，诏以守珪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督余众完故城。版筑方立，虏奄至，众失色。守珪曰："创痍之余，詎可矢石相确，须权以胜之。"遂置酒城上，会诸将作乐。虏疑有备，不敢攻，引去，守珪纵兵击败之。于是修复位署，招流亡使复业。有诏以瓜州为都督府，即诏守珪为都督。州地沙堉不可蓺，常潴雪水溉田。是时，渠堨为虏毁，材木无所出。守珪密祈于神，一昔水暴至，大木数千章塞流下，因取之，修复堰防，耕者如旧，州人神之，刻石纪事[34]。

仔细推敲《新唐书》与《旧唐书》记载文字，还是有很多区别。《旧唐书》吐蕃毁坏渠堰，《新唐书》称之为渠堨，都是指都河上的斗门之类，另外我们从记载中得知，大木是顺着都河塞流而下或者塞涧而下，这里的涧，可能指的是昌马大坝之上到水峡一带，或昌马至瑞阳城间的自然水道。木材从昌马大坝漂流到瓜州城才被用于修筑城池和渠堰，这里所说的渠堰当指瓜州晋昌县农业灌溉区的渠堰，而不是远在大坝附近的都河堰。我们通过这些记载还可以得到一些瓜州地区农业区的重要信息，这里土地多沙碛，不适合耕种，且降雨很少，主要依靠雪水消融灌溉农田，一旦渠堰毁坏，就无法耕种。而瓜州所引雪水只能来自于疏勒河，只有疏勒河能够将位于瓜州南二百四十里的雪山消融的河流引入瓜州。

吐蕃统治时期将节度使衙设在瓜州，一方面与吐蕃占领敦煌时将指挥所放在瓜州有关，另外一方面也与瓜州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农业经济有关。归义军建立之后，瓜州刺史的人选都由重要人物担任，最先有阎英

达、康使君，而后有索勋、李弘定。阎英达大中五年为部落使，同节度使张议潮、副使安景旻一起派使节人朝，足见非同一般。康使君是安景旻之后敦煌粟特人的代表，阎英达死于咸通十二年（871 年）至乾符三年（876 年）间，康使君死于乾符三年（876 年）至六年间（879 年），因此索勋出任瓜州刺史最晚应当在乾符六年。而索勋与左马步都押衙阴文通、凉州左司马李明振都是张议潮的女婿，所谓“司空半子，超擢升迁”[8]，阴文通死于咸通五年（864 年），李明振死于龙纪二年（890 年），都官居要职。保存于敦煌市博物馆的《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记载索勋担任瓜州刺史阶段修筑过都河堤堰和水渠。

索勋出任瓜州刺史之后，根据碑文记载他主要做这样一些工作，因瓜州地区“外乏金汤之险”，所以修筑了巍峨的城池；由于瓜州周围万顷肥沃农田依靠都河灌溉，河道不通渠流顿绝而修筑了堤堰水渠，解决了农业土地灌溉问题，粮食得到丰收。我们从“布盘石，拥云汉；川响波澜，众流辐辏”句看，似乎修筑堤堰的地点应当在昌马大坝一带，才能形成众流辐辏的境况。记载到都河的还有《李明振碑》，“次男[弘定]瓜州刺史，文武全材，英雄价（贾）勇。晋昌要险，能补颇、牧之威；巨野大荒，屏荡凶（匈）奴之迹。挟纩有忧（幽）于士卒，泯燧不愧[于]襄阳。都河自注，神知有道之君；积贮万箱，东郡著雕金之好[9]。从都河很顺畅流入瓜州境域灌溉农田，使这里家给人足积贮万箱。

都河最大的特征之一是众流辐辏，就是集中众水为一条河道，这可能就是都河名称的来源。这条河流的特征之二就是时常发生断流现象。这与疏勒河流经昌马大坝以下的特征完全相符。关于都河，《宋开宝四年（971 年）五月一日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氾愿长等状》记载：

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推氾愿长与合城僧俗官吏百姓等。

右愿长等昨去五月一日城头神婆神着说神语，只言瓜州城隍及都河水浆一切总是故慕容使君把勒。昨又都河水断，至今未回。百姓思量无计，意内灰惶。每有赛神之时，神语只是言说不安置慕容使君座位，未敢申说。今者，合城僧俗官吏百姓等不避斧钺，上告王庭。比欲合城百姓奔

赴上州，盖缘浇溉之时，抛离不得。今者申状号告大王，此件乞看合城百姓颜面方便安置，赐予使君座位，容不容，望在大王台旨处分。谨具状申闻，谨录状上。牒件如前，谨牒。宋开宝四年五月一日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氾愿长与合城僧俗官吏等牒。衙推氾愿长信紫羊角壹双献上大王[57]。

我们从这件状文看，是瓜州衙推氾愿长牵头，率领瓜州合城僧俗官吏百姓等给敦煌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状文，称瓜州城隍及都河水流都是已故慕容归盈掌管，都河水流断绝，百姓灌溉不得，所以请求为慕容归盈安置神庙。五月正好是农田灌溉的最忙季节，而都河突然水断流，表明这条人工开凿的河道经常断流，原因一是渗漏，二是渠破。

都河流经瓜州城之后分派灌溉农业，散入地下，最后消失，末尾渗出的余流进入苦水，或在北桥子一带形成沼泽。这条河流很多流段依靠人工与自然河床相结合组成，长度达百余里，流经戈壁地带，如果没有人工维护，很容易改道，其次渠道也很容易遭到毁坏，瓜州衙推氾愿长状中所称的情景，会经常发生。由于都河经过人工河流引入瓜州城，不仅使这里农业种植面积增大，而且使苦水流域水源增加，加大这里沼泽地的形成，同时也促成苦水下游地区绿洲农业区域的出现。由于都河主要河流水道的改变，瓜州地区的农业灌溉区域也发生了变化，晋昌一带越来越重要而渊泉县消失，表明这个地方农业地位降低。

**四、疏勒河下游地区湖泽及其尾闾湖问题**

疏勒河同党河、黑河、石羊河一样都是内陆河，同样在终端会形成一个相应的尾闾湖，《汉书·地理志》也记载到籍端水“西北入其泽”，表明疏勒河在汉代是流入尾闾湖的，这个尾闾湖在那个位置，是我们研究的重点问题。《汉书·地理志》还记载到氐置水“东北入泽”，源出汉龙勒县的氐置水，即今党河，在流经今党河水库之后，折向东北流，至敦煌城周分流灌溉农田。今天党河水经农业灌溉之后，基本上没有多余的水形成尾闾湖，但是在汉代党河下游注入湖泊，这个湖泊的方位在党河水库的东北方向，也是敦煌城的正北偏东方向，也就是唐代兴胡泊、玉女泉的方位。而这个方位就在瓜州西北方向，正好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

相符合，因此籍端水、氐置水所注入的湖泊很可能是一个湖泊。然而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将两汉时期氐置水注入的湖泊绘制在今敦煌正北偏西的大方盘城附近，将籍端水注入的湖泊绘制在今瓜州县布隆吉乡的疏勒河古河道上，即汉渊泉、池头县北边。

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敦煌郡冥安县“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寿昌县“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38]。从方位上说：这两条水最后应当流入一个湖泊之中，才能与《汉书》的记载相符合。另外我们阅读这段资料，应当分开理解，氐置水从寿昌县进入敦煌绿洲之后灌溉民田，然后渗出余流进入湖泽中，这个湖泽就在敦煌的正北党河与疏勒河交汇地区；而流经冥安县的籍端水也是经过灌溉民田之后，流入湖泽之中。这个湖泽就是汉代疏勒河和党河的尾闾湖。关于这个湖泊，《元和郡县图志》瓜州晋昌县记载作冥水：

晋昌县，中下，郭下。本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因县界冥水为名也。冥水，自吐谷浑界流入大泽，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丰水草，宜畜牧[39]。

如果《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无误的话，这个湖泊应当从瓜州地界一直向西延伸到沙州地界，正好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符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甘肃卷》记载疏勒河从布隆吉“西流经双塔水库，引灌安西绿洲；至敦煌市北，党河从南汇入，再向西注入哈拉湖（又名黑海子，今名榆林泉）。全长 580 公里，流域面积 3.95 万平方公里。疏勒河在史前曾注入新疆罗布泊，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尾闾湖已萎缩到安西县西湖一带。昌马水库以上是祁连山区，河长 328 公里，流域面积 1.1 万平方公里。年径流量 8.39 亿立方米，是径流补给区；昌马水库以下河西走廊地带，是径流散失区，建有水库和干渠，引灌沿河诸绿洲”[40]。这个记载至少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信息，疏勒河的尾闾湖形成于西湖及其以西地区。疏勒河在这里与党河交汇，向西注入哈喇湖。哈喇，蒙古语，意思为“黑”。这个哈喇湖很可能就是冥泽萎缩所致。

疏勒河下游尾闾湖的位置及其环境演变，《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到瓜州“时刺史孤独达闻法师至，甚欢喜，供事殷厚。法师因访

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里有瓠卢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41]。瓠卢河下广上狭，就是说该河流上游河道比较狭窄，而下游宽阔，可能就是大泽所在的地方，也与《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特征比较符合。瓠卢河在瓜州北五十里，也是疏勒河流过的地方。还记载：“于是装束，与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遥见玉门关，去关上流十里许，两岸阔丈余，旁有梧桐树丛。胡人乃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 过。”[42]从瓜州北行五十里到瓠卢河，让又东行十余里渡河，这里方位大约在今天瓜州双塔堡左右渡过瓠卢河，这里河道狭窄，阔仅丈余。为什么选择在这里渡河，主要是因为葫芦河下广上窄的缘故。从这些记载我们得知，冥水注入的大泽不可能在唐玄奘渡河以上河段，就是不可能在玉门关以东的河段。

另外我们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明日日欲下，遂入草间，须臾彼胡更与一胡老翁乘一老赤马相逐而至。”[43]这里距离瓜州城不是很远，人畜可以进入草间隐藏，足见瓜侧北部地区的水草还是很好的。这种植被的形成可能与引水灌溉瓜州 地区农田，同时也使瓜州水草丛生，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

瓠卢河下广上狭，下广就是指大泽形成地区，《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大泽南北六十里，显然将其放置于在唐玉门关以东地区都是不合适的。疏勒河从今瓜州城以西河道渐宽，如果形成沼泽地带，也只能在今瓜州域以西地区。兴湖泊、玉女泉等都是大泽上几个湖泊点而已。兴湖泊的地理位置，根据《沙洲都督府图经》记载：一所兴胡泊，东西十九里，南北九里，深五尺。右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其水咸苦，唯泉堪食，商胡从玉门关道往还居止，因以为号[44]。

关于兴湖泊的地理位置，《沙州图径》也有记载：凉兴胡泊，县西北一百一十里，余水皆苦，唯此水可饮，商胡从玉门关往来，皆止于此[45]。

兴湖泊的地理位置，《沙州图经》记载“兴湖泊，州西北一百一十里”[46]。前者记载在州西北，后者记载在县西北，实际都指一地。既然途径玉门关的商胡居止于此，应当距离玉门关很近。玉门关在寿昌县东北一百六十

里，而曲泽在，根据 P. 5034《沙州图经》记载，在寿昌县东北一百六十里：曲泽，东西十三里，南北十五里。右在县西北一百九十里，□□□□，因号曲泽[47]。

曲泽还见载《寿昌县地境》：曲泽，县西北一百九十里。其泽迂曲，故以为名[48]。

敦煌出土文献《沙州城土境》记载：曲泽，县西北一百九十里[49]。

我们如果将汉玉门关确定在小方盘城，根据这个地理位置推测，曲泽应当在今大方盘城之东的条湖一带，而兴湖泊按照地理位置应当在东园湖、大月牙湖一带，也就是哈拉湖。另外敦煌出土文书还记载到玉女泉，在敦煌县西北七十里。《沙洲图经》记载：玉女泉，县西北七十里，蛟龙[50]。

敦煌出土文献《沙州城土境》记载：玉女泉，州西北一百八十五里[51]。

关于玉女泉的记载还有《敦煌录一本》：

城西八十五里有玉女泉，人传颇有虚，每岁此郡率童男女各一人充祭湫神，年则顺成，不尔损苗。父母虽苦生离，儿女为神所录，欢然携手而没。神龙中，刺史张孝嵩下车，求郡人告之，太守怒曰："岂有川原妖怪，害我生灵！"遂设坛备牲泉侧曰："愿见本身，欲亲享，"神乃化为一龙，从水而出。太守应弦中喉，拔剑斩首，亲诣阙进上。玄宗嘉称再三，遂赐龙舌，敕号龙舌张氏，编在简书[52]。

其次关于玉女泉还有《瓜沙两郡史事编年并序》记载："州城西[北]八十五里，瓜沙二州水尾下，有一玉女泉，每年各索童男童女二人祭享，如若不依，降霜雹损害田苗。"[53]玉女泉的地理位置在党河与疏勒河交汇的地方，应当在大月牙湖东部。同样的记载还见载于《太平广记》沙州黑河条："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深可驾舟，其水往往泛滥，荡室庐，潴原野，由是西北之禾稼尽去，地荒而不可治，居人亦远徙，用逃垫溺之患，其吏于北庭沙州者，皆先备牲酎，望祀于河浒，然后敢视政，否即霪雨连月，或大水激射，圮城邑，则里中民尽鱼其族也。"[54]张嵩曾经出任过沙州刺史，后又任北庭节度使。《太平广记》将发生于沙州的事件与北庭混在一

起了。不过记载黑河特征与疏勒河“雨多即泛”特征基本相符。另外《都河玉女娘子文》记载玉女泉神能“吐沧海，泛洪津……喷骊珠而水涨，引金带而飞麟”。所以邦君都要祈祷玉女神灵，使“都河石堰，一修永全。平磨水道，堤防峻坚。俾五稼时稔，百姓丰年”。黄征将都河比堪作都乡河，将玉女泉神比定作张女郎神[56]。显然将都河比定为都乡河是错的。都河玉女娘子有控制着都河石堰堤防坚固，保证着这里百姓农田丰收，能使洪流泛滥而成沧海，这个玉女娘子神庙只能在玉女泉一带，因其震怒而形成的沧海只能是这里的众多湖泊。

冥水所注入之大泽不是一个湖泊，而是众多湖泊形成的沼泽地带，我们从敦煌文献的记载中得知，这里有名的湖泊有曲泽、兴湖泊、玉女泉湖，如果水流充足，就会相连成一片汪洋。敦煌地区的咸水湖主要分布在盐池庙、香炉墩、大方盘、盐池湾、新店湖冲积平原及湖沼洼地中；淡水湖主要分布在敦煌冲积平原和积水洼地，如盐池庙湾、月牙湖、条湖、马迷兔滩、榆树泉、天桥墩、弯腰墩以及新店湖等，植被以盐生草甸和荒漠草甸为主，可利用面积 121 万亩，可发展林业和畜牧业[58]。汉代曾经在沼泽地带开垦土地耕种，乃至唐代还有很多农业灌溉设施薄和居民村落，水流太多就会淹没这些城池村落，唐代沙州刺史每每上任都要祭祀玉女娘子，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冥水大泽是瓜州地区主要牧场之一，“丰水草，宜畜牧”，是瓜沙二州经营畜牧业主要地区，敦煌出土文献记载，这里放牧的主要是马和骆驼，《（964 年）归义军衙内酒破历》记载马群进入泽地放牧，为了畜牧丰收都要祈祷驼马神：（四月）“廿二日，马群入泽神酒壹角”，（六月）“十二日，南泽赛马神设酒壹瓮”[57]。从这两条记载，马群是归义军官府的畜牧，所以由官府出资赛神。同时我们根据记载敦煌有北泽、南泽之分，湖泽地区只能形成于党河、疏勒河下游地区，因此这个南泽很可能也在敦煌北部湖泽地带，由于这个泽面积比较大，因此将其分别称之为南泽和北泽。敦煌出土文献还记载了赛神规格及其所用物品，《庚辰一壬午年间（980~982 年）归义军衙内面油破历》：“准旧驰儿人草泽赛神，细供七分，胡饼

二十枚，用面二斗三升三合，油五合勺。”[58]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通过《(980年)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的记载得到证实：“准旧马群人草泽赛神细供七分，葫併二十枚，用面二斗三升五合，油五合六勺。准旧马骑赛神细供七分，胡併六十枚，用面四斗三升三合，油五合六勺。又偿细供十分，胡併六十枚，用面四斗九升，油八合。”“准旧駞官邓富通等三群駞儿人草[泽]赛神用食七分，胡併二十枚，用面三斗一升，油一升四合。”[59]邓富通是归义军官马院的主管驼马官，地位归义军节度押衙。官马院不仅负责放牧，同时向出使者支付驼马作为运输工具。《己卯年(979年)駞官邓富通群骆驼破籍并判凭》：“己卯年十一月二日，駞官邓富通群人算后骆驼破籍。伏以今月二日，支兴于阗使头南山大父駞壹头，未蒙判凭。伏请处分。己卯年十一月二日，駞官邓富通。为凭三日(鸟印)。”[60]为了管理畜牧草场，归义军政权还专门设置了草场使。根据《敦煌志》的记载敦煌东湖林区有牧草面积1.13万公顷，北湖林区有牧草0.46万公顷西湖林区有牧草7.41万公顷[61]其中西湖、北湖林区牧草主要为疏勒河、党河尾闾湖地区即唐大泽牧区。《敦煌志》在论述古代敦煌畜牧区域分布称：敦煌地区由于河水渗漏及地下潜流涌出，在河流沿岸或下游低洼地带积聚成湖泽或滩涂，这些地区水草丰茂，形成天然的畜牧区域[62]。古代是这样，目前的自然环境虽然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但是这一基本格局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通过以上对疏勒河尾闾湖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认识，唐冥水(都河)注入的大泽，位置不在唐玉门关、合河戍以东，即今布隆吉以东地区，这里虽然众泉涌出，汇集成河，形成湖泽，但是要汇集成一个东西260里、南北60里的大湖泊，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将大泽绘制在这里肯定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大泽不是一个单一湖泊，它是很多湖泊汇集而成，会多连成一片，水少时分成不同小型湖泊，或大会小，回环迂曲相连，形如葫芦。大泽即其总称，大泽宽则达60余里，而东西狭长达260里。可能从玉门关往东到西湖，都是大泽的分布范围。

疏勒河是唐代瓜州地区的农业主要灌溉河流，对瓜州地区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古代这条河流水道变化如何，学术界一直没有专门的研究，因此《中国历史地图集》在绘制这条河流时采取了望文生义，推测其河流走向及其尾闾湖的形成地域，对研究古代瓜州地区环境演变产生不利因素。经过我们的探讨，认为汉代氐置水和籍端水都注入一个湖泽，唐代冥水注入的大泽，不在布隆吉以东的汉渊泉县、唐会稽镇，而是西流与甘泉水汇合形成一个广阔的湖泽地带，这个湖泽地带虽然称之为大泽，实际上是由很多湖泊、沼泽形成的，曲泽、兴湖泊、玉女泉都是大泽中比较有名的湖泊而已，在上游用水较少，来水量大的情况下可能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大湖泽。疏勒河在晚唐称之为都河，为众流辅凑之意，也可能是集瓜州全州之力修筑而成的人工河流水道。都河又称独利河水，可能是唯独瓜州受利，上游源自于吐谷浑界，即汉南羌中，这里水草丰美，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区域，唐代没有管辖到这里，所以敦煌出土文献记载其源头非常简略。都河在新城镇经都河大堰，汇集众流经人工河西北流经瓜州灌溉民田，余水北流进入主河道往西注入大泽，大泽是对甘泉水与都河汇合之后形成的尾闾湖总称，这里是瓜沙地区的主要畜牧区域。

**注释：**

①《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14~1615页。

②《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1614、1614、1613页。

③《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1612页。

④《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第2973、2982页。

⑤刘满：《关于西汉昭帝时期的羌匈交通路线》，参见刘满的《河陇历史地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157页。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甘肃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89~292页，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甘肃卷），第288~289页，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甘肃卷），第294页。

⑨《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69页。

⑩《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第2972页。

⑪《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记载辛武贤上书称："郡兵皆屯备南山，北边空虚，势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进兵，此虏在竟外之册。今虏朝夕为寇，土地寒苦，汉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张掖、酒泉万骑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马食，以七月上旬发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开在鲜水上者。虏以畜产为命，今皆离散，兵即分出，虽不能尽诛，亶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复引兵还，冬复击之，大兵仍出，虏必震坏。"

⑫《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69页。

⑬《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77页。

⑭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甘肃卷，第352~353页。

⑯《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下》"瓜州"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7~1028页。

⑰《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下》"瓜州"条，第1027~1028页。

⑱《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7页。

⑲《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90~93页。

⑳《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18页。

㉑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06~507页。

㉒敦煌研究院编：《一九八三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9~281页。

㉓《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㉔黄盛璋：《沙州曹氏二州六镇与八镇考》，载《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第269~281页。

㉕《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瓜州晋昌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555页。

㉖《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下》"瓜州"条，第1027~1028页。

㉗《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01页。

㉘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 225 页。

㉙《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三》,第 917~918 页。

㉚《旧唐书》卷一〇三《王君㚟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3191~3192 页。

㉛《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上》,第 6083~6084 页

㉜《新唐书》卷一三三《王君㚟转》,第 4547~4548 页

㉝《旧唐书》卷一〇三《张守珪传》,第 3194 页。

㉞《新唐书》卷一三三《张守珪传》,第 4548~4549 页。

㉟P.4660《河西节度故左马步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侍御史阴文通邈真赞》,参见郑炳林的《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94 页。

㊱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 41~43 页。

㊲录文参见《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册,全国图书馆微缩复制中心 1990 年版,第 25~26 页。

㊳《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 1614 页。

㊴《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下》"瓜州晋昌县"条,第 1028 页。

㊵《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甘肃卷),第 352~353 页。

㊶《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12 页。

㊷《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第 14 页。

㊸《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第 13 页。

㊹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 9 页。

㊺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 56~57 页。

㊻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 39 页。

㊼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 44 页。

㊽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 60 页。

㊾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 40 页。

㊿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 56 页。

(51)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 39 页。

(52)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 87 页。

㊸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 82~84 页。

㊹《太平广记》卷四二〇“沙州黑河”条,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3423~3424 页。

㊺参见黄征、吴伟的《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 1995 年版,第 22 页。

㊻敦煌志编纂委员会编:《敦煌志》,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04 页。

㊼《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3 册,全国图书馆微缩复制中心,1990 年版,第 271、273 页。

㊽《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3 册,第 280 页。

㊾《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3 册,第 282 页。

㊿《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3 册,第 600 页。

(61)《敦煌志》,第 191 页。

(62)《敦煌志》,第 179 页。

作者:郑炳林,1956 年出生,男,陕西黄陵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曹红,1969 年出生,女,北京通州人,兰州大学副校长。

# 唐诗地名“临洮”辨正

刘 满

中国历史悠久，幅员广大，地名雷同是常见的现象，唐诗中出现的临洮就是一例。唐诗中的临洮，名称相同，而地望实异。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唐诗注本，由于没有仔细分辨，以致在对临洮一地的注释中出现一些失误。如唐诗中的临洮，有的指唐临洮郡，而注者误以为秦临洮县；有的指唐临洮军，而注者或误以为唐临洮郡，或误以为秦临洮县。因此，本文试作辨析如下。

**一、王昌龄《塞下曲》中之临洮**

王昌龄《塞下曲》之二云：“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日沙未没，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①

马茂元先生注释说：“临洮，秦置县名，长城的起点。因县临洮水，故名。注详前《哥舒歌》。”②

又云：“长城战”一作“黄龙战”。按“长城”与上文“临洮”相应，作“黄龙”误。开元二年（714年），吐蕃将十万人寇临洮，朔方行军道总管王晙与战于武阶，斩首七千，获马、羊二十万。又战于长子，吐蕃大败。死者枕藉，洮水为之不流。这里所说的“长城战”，当系指此③。

《中国历代诗歌选》和《唐诗三百首新注》也都采用了相同的说法④。

上述注本将诗中的长城战与开元二年（714年）吐蕃寇临洮联系起来，这是符合诗意和历史的。但由于没有对史料作进一步的分析，注者将诗中的“临洮”和“长城”误以为是秦临洮县及其境内的长城了。其实这一临洮指的是唐临洮军，长城指的是临洮军附近的“长城堡”。

关于开元二年吐蕃进犯临洮事，《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坌达延将

兵十万寇临洮，入攻兰、渭，掠监马。……友诏薛讷为陇右防御使，与王晙等并力攻击。帝怒，下诏自将讨之。会晙等战武阶，斩首万七千，获马羊无虑二十万。又战长子，丰安军使王海宾战死。乘之，虏大败，众奔突不能去，相枕藉死，洮水为之不流。帝乃罢行。

《旧唐书·薛讷传》亦云，吐蕃大将坌达延、乞力徐等率众十万寇临洮军，又进寇兰州及渭州之渭源县，掠群牧而去。诏讷白衣聂左羽林将军，为陇右防御使，与太仆少卿王晙等率兵邀击之。十月，讷领众至渭源，遇贼战于武阶驿，与王晙掎角夹攻之，大破贼众。追奔至洮水，又战于长城堡，丰安军使王海宾先锋力战死之。将士乘势进击，又败之，杀获万人，檛其将六指乡弥洪，尽收其所掠羊马，并获其器械，不可胜数。

上述两条记载中，关于吐蕃进攻的地点所记不一：一作“临洮”，一作“临洮军”。查有关史料，除《新唐书·吐蕃传》《新唐书·薛讷传》《新唐书·王晙专》作“临洮”外，《旧唐书·玄宗纪》《旧唐书·王晙传》《旧唐书·吐蕃传》《通鉴》和《册府元龟》均作“临洮军”[⑤]，与《旧唐书·薛讷传》所记相同。由此可知，吐蕃入寇的临洮，实为临洮军。

其次，上述两条史料都提到一个事实，即吐蕃时入临洮之后，“掠监马”“掠群牧而去”，而且新、旧唐书《王晙传》都说王晙当时为陇右群牧师。由此可见，吐蕃入侵之地，是唐监牧地。据《元和郡县志》卷三原州条下云，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译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

这说明，当时官方养马地，南以秦州、渭州（今甘肃天水、陇西一带）为界，西界在兰州狄道县（今甘肃临洮）以西。而秦临洮县（为唐岷州郡治所）和唐临洮郡（洮州）在兰、渭、秦三州的南方，都非监牧地。

既然吐蕃入侵的临洮有监马，说明此临洮既不是秦时的临洮县，也不是唐代的临洮郡，应是监牧地所在的临洮军。

据《元和郡县志》卷三九临州条记载：天宝初，割兰州狄道县，又别

置安乐县，置临州。郭旧有临洮军，久视元年置，宝应元年陷于西蕃。

上述记载说明，临州（狄道郡）置于天宝初，辖狄道、安乐二县，郡治在狄道（今甘肃临洮）。久视元年（700年），置临洮军，在狄道城内。开元二年（714年）吐蕃入侵时，临州当时地属兰州，但临洮军早已设立了。可见吐蕃入寇的临洮实为临洮军。

再次，关于开元二年（714年）吐蕃入侵临洮一事，有关史书涉及唐与吐蕃战斗的地方有大来谷、武阶和长子，考证这些地名的大体方位，也可以看出临洮是否为临洮军。

据《新唐书·王晙传》记载：开元二年，吐蕃以精甲十万寇临洮，次大来谷，其酋坌达延以兵踵而前。晙率所部二千与临洮军合……俄而薛讷至武阶。距大来二十里……

吐蕃寇临洮，王晙以所部二千与临洮军合，说明此临洮是临洮军的防区。已如上述，当时临洮军在狄道，说明吐蕃入寇之临洮与狄道有关。另外，吐蕃寇临洮，驻军大来谷，说明临洮在大来谷附近。而大来谷又与武阶相距二十里，因此我们只要确定了武阶的方位，就可以知道大来谷与临洮的方位了。

武阶一地，《旧唐书·王晙传》作“武阶谷”，《通鉴》作“武街”，《旧唐书·吐蕃传》《新唐书·薛讷传》《旧唐书·薛讷传》《册府元龟》等均作“武阶驿”。关于武阶的位置，《册府元龟》卷九八六谓在“渭州西界”[6]，《旧唐书·吐蕃传》说它在渭源县（今甘肃渭源县）。而《水经·河水注》对武阶的记载则更为具体：（洮水）又北，陇水注之，即《山海经）所谓滥水也：水出鸟鼠山西北高城岭，西径陇坻（按：此与陇山的异名陇舐有别）……又西北历白石山下。《地理志》曰：降狄道东有白石山。滥水又西北，经武街城南，又西北经降狄道故城东。

滥水，或曰陇水，即源于甘肃渭源县西北的东峪沟[7]。其水西北流，至今临洮县城汇入洮河。由此可知，武街在今临洮县东、东峪沟北。今临洮县为唐狄道，临洮军就在狄道城内。因此，吐蕃进犯的临洮决不是远离武街的秦临洮县或唐临洮郡，只能是武街西的临洮军。

上述史料和论证说明，开元二年吐蕃入侵的是唐临洮军、兰州和渭州。因此，唐与吐蕃作战的地方也当在这一带。关于“长子”一地，只见于《新唐书·吐蕃传》，而《旧唐书·薛讷传》《新唐书·薛讷传》和《通鉴》均作“长城堡”。可见，“长子”实为“长城堡”，所以以上述《塞下曲》之“昔日长城战”，就是指长城堡之战。长城堡之战发生在唐军于武街大败吐蕃之后。唐军乘胜“追奔至洮水，又战于长城堡……将士乘势进攻，又败之，杀获万人，擒其将六指多弥洪，尽收其所掠羊马，并获其器械，不可胜数”[8]。《新唐书·吐蕃传》说这次战斗“虏大败，众奔突不能去，相枕藉死，洮水为之不流”。吐蕃士卒死伤的数字，反映了唐军士气之盛。这些情况，与《塞下曲》中的“咸言意气高”“白骨乱蓬蒿”都是相一致的。上述史料也说明，长城堡地近武街，濒临洮水，与秦临洮县是无关的。

总之，《塞下曲》中之临洮为唐临洮军，在今临洮县；“长城战”之“长城”为长城堡，在今临洮县北的洮水边。

**二、岑参诗中的临洮**

岑参两度出塞，经过临洮，先后写了《临洮客舍留别祁四》《临洮龙兴寺玄上人院咏青木香丛》《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和《临洮泛舟赵仙舟自北庭罢使还京》等诗[9]。这四首诗中的临洮，《岑参集校注》是这样注释的：临洮，唐郡名，治所在今甘肃临潭县西南[10]。

上述四首诗中的临洮，并不是唐代的临洮郡，而应该是一度设在临州的临洮军。临州的治所在狄道县，其地即甘肃临洮县，临洮军曾设在这里。

自汉至唐，狄道县都是由长安通往西域的交通要冲。从岑参两次出塞行经的地点看来，他都要经过狄道县，决不会行经僻在甘肃南部的临洮郡的。岑参在出塞途中行经的地点说明，他由长安出发，沿渭水西行，到了今甘肃和陕西的界山陇山。如他的《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中的“平明发咸阳，暮宿陇山头”，以及《经陇头分水》《赴北庭度陇思家》等诗就是证明[11]。过了陇山，经秦州（治所在今甘肃秦安县西北），就到了渭州（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东南），诗人在这里写了《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

川》[12]。由渭州西行到兰州，兰州唐亦称金城郡，《题金城临河驿楼》就是在这里写的[13]。从兰州过黄河往西，大致沿今兰新线西北行，就到了当时河西的重镇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县城关）。由上所述可知，诗人由长安到凉州的路线，就是唐人所谓的“秦州路”，这一段路程总长为二千里[14]。

从岑参全部边塞诗反映的情况来看，诗人两次出塞的往返路线，都是经由秦州路的。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既然岑参出塞取秦州路，那么他在渭州与兰州间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到远离这条线路的临洮郡去绕一个大圈子。因为据《元和郡县志》记载：渭州西南至岷州二百二十六里，岷州西南至洮州一百八十里；临州南至岷州三百四十里，岷州西南至洮州一百八十里；兰州西南至河州三百里，河州东南至洮州三百里[15]。上述渭州、临州和兰州三州与洮州的方位和里数，可以看出临洮郡（即洮州）僻在这几州的西南或南方，其间相距数百里。我们不禁要问：岑参为什么到远离秦州路很远的临洮郡去呢？按常理说来，确实是没有必要的。

如按《岑参集校注》所说，岑参诗中的临洮即唐临洮郡，那么岑参就不止一次地绕远道前往该地。据闻一多先生考证，《临洮客舍留别祁四》和《临洮龙兴寺玄上人院同咏青木香丛》两首，是天宝十载（751年）诗人由凉州返长安途中所作；《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是天宝十三载（754年）诗人赴北庭时途经临洮所作[16]。这就是说，诗人第一次出塞由安西返回长安时到过临洮，而且在第二次出塞前往北庭时又一次如往临挑。如临挑指唐临桃郡，那么当时在西域供职的诗人，为什么不惮烦劳，一再要绕道去临洮郡呢？这是令人无法理解的。更奇怪的是，《临洮泛舟赵仙舟自北庭罢使还京》一诗说明，由北庭罢使返长安的赵仙舟也绕道去临洮郡。这些问题只能说明，岑诗中的临洮不是临洮郡，而是当时秦州路上的另一临洮。

据《元和郡县志》卷三九渭州八到条下云：西北至临洮军百九十里。

同书兰州八到条下又云，东（按：应作“南”）至临州一百九十里。

如上所述，临洮军一度设在临州治所狄道县，上述记载中渭州至临洮军的距离，实际为渭州至临州的距离。由此可知，由渭州经由临洮军，或曰临州，到兰州的距离是三百八十里。

《元和郡县志》卷三九渭州八到云，东至上都一千一百里。

同书兰州八到又云，东至上都一千四百六十里。

这样，兰州至渭州为三百六十里，与上述三百八十里相接近。这说明，由渭州经临洮军至兰州是一条最近的路线，临洮军为秦州路的必经之地，因此，岑参所经的临洮当为临洮军。

这里要指出的是，岑诗经临洮是天宝年间，天宝三年（744 年）唐已设立临州，但当时临洮军已不在临州了。据《元和郡县志》卷三九鄯州条下记载：开元二十一年，置陇右节度使，备西戎，统临洮军（开元中，移就节度衙置，管兵五万五千人，马八千四百匹）[17]。

又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临洮军在鄯州城内，管兵万五千人，马八千匹[18]。

上述史料说明，开元年间临洮军早已由狄道迁移到鄯州治所湟水县（今青海乐都）。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岑诗中临洮为临洮军呢？地名的改易变化是常有的，但人们还是习惯于沿用旧称。如在《元和郡县志》成书时，唐人仍将临州称为临洮军，就属于这一类。

总之，岑参诗中的临洮不是唐临洮郡，应是唐临洮军，也就是临州狄道县，即今甘肃临洮县。

**三、《哥舒歌》中之临洮**

《哥舒歌》云，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胡马，不敢过临洮[19]。

马茂元先生和《唐诗选》以及其他注本都认为“不敢过临洮”之临洮，指的是今甘肃省岷县，即秦临洮县。

其实《哥舒歌》中的临洮指唐临洮郡，治所在今甘肃临潭县。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先对《哥舒歌》反映的历史事实作一简单的探讨。

有的注本把《哥舒歌》的本事指为哥舒翰筑龙驹岛，破吐蕃石堡城，这也是不符合历史和诗义的。据《通鉴》天宝七年（748 年）十二月条云，

哥舒翰筑神武军于青海上，吐蕃至，翰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谓之应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

诚如《通鉴》所记，哥舒翰筑城龙驹岛之后，吐蕃确实不敢近青海。但《通鉴》天宝八载六月条又记载说，项之，翰又遣兵于赤岭西开屯田，以谓卒二千戍龙驹岛，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尽没。

由此可见，哥舒翰筑城于龙驹岛，后来又增派部队戍守，但不久即为吐蕃扫荡尽净。此后哥舒翰再也没有进兵龙驹岛，实际上是承认了失败。

至于哥舒翰攻拔石堡城一役，完全可以说是唐军的一次失败。《通鉴》天宝八载六月条云，上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凡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险绝，唯一径可上，吐蕃但以数百人守之，多贮粮食，积檑木及石，唐兵前后屡攻之，不能克。翰进攻数日不拔，召裨将高秀巖，张守瑜欲斩之，二人请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获吐蕃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数万……

唐兵以六万余对数百人的绝对优势攻打吐蕃一个小城，最后以几万人死亡的重大牺牲，达到了目的。这次战争，一没有重创吐蕃，二没有夺回失地，这样的战争能够解除吐蕃对唐边境的威胁吗？这样的战果有什么值得歌颂的地方呢？再说，诗中明言“不敢过临洮”，临洮与青海是不能混同的。至于哥舒翰以半条枪败吐蕃，使吐蕃不敢近青海这种说法，就离史实和诗义更远了。

《哥舒歌》称颂的是哥舒翰收复黄河九曲之役，这是因为收复黄河九曲，是哥舒翰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战功，同时也是安史之乱以前，唐与吐蕃长期斗争中一次重要的转折，正是这次战役的胜利，使唐朝在陇右收复了失地，阻止了吐蕃对陇右的入侵。

黄河九曲指的是黄河流经今甘肃玛曲至青海同德间黄河以北的地区。原来“吐蕃本以河为境”[19]，也就是说九曲之外，黄河以南，地属吐蕃，黄河以北的九曲之地属于唐朝。因为九曲“水甘草美，宜畜牧”[20]，吐蕃买

通鄯州都督杨矩，得到了九曲之地。《新唐书·吐蕃传》说，自从吐蕃得河曲之后，“虏益雄张，易入寇”。《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二年（714年）八月条也说，九曲“其地肥饶，吐蕃就之牧马，因以入寇”。吐蕃取得九曲在睿宗景云元年（710年），自这以后，不断入侵九曲邻近的郡县，如上述开元二年（714年）吐蕃入寇临洮军、兰州、渭州，致使玄宗“下诏欲亲征”，就是吐蕃的一次大举入侵。再如开元五年（717年）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大破吐蕃于九曲，开元十六年（728年）陇右节度使张忠亮拔吐蕃大莫门城（在九曲），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杜希望夺吐蕃河桥置镇西军（在河州西百八十里），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选募关内、河东壮士三五万人，诣陇右防遏”吐蕃[29]，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吐蕃屠达化县，陷石堡城等等，都是唐与吐蕃在九曲一带的争战。由此可见，吐蕃在取得九曲之后对唐造成很大的危害与威胁。

此外，从唐所设置的陇右节度使及其屯兵设守的重点，可以看出吐蕃对唐的威胁及收复九曲的重要性。《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条云：陇右节度使备御吐蕃，统临洮，河源镇西十军，经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万五千人。

陇右节度使设置于开元二年（714年）十二月，即吐蕃大举入侵临洮军、兰州、渭州之后两月，目的是为了防御吐蕃。它共领有十二个州郡，但屯兵设守的只有鄯、廓、洮、河四个州郡，这四个州郡都是与九曲相连的地方。因为唐失九曲之后，使这四个州郡失去了原来的屏障，因而使其成为直接面对吐蕃的前沿阵地。而收复九曲以后，使这四个州郡免受吐蕃的直接威胁，也减轻了吐蕃对整个陇右节度使防区的压力，其意义是很重大的。至于秦临洮县，唐时为岷州治所溢乐县（今甘肃岷县），位于洮州之东，吐蕃本来对其构不成威胁，更谈不上经过这里。收复九曲之后，它又多了一道屏障，吐蕃更是鞭长莫及了。因此，“不敢过临洮”之“临洮”，绝不是指秦临洮县。

如上所述，临洮是陇右节度使重兵戍守的州郡之一。在陇右节度使统率的十军中，驻在临洮城内的漠门军有兵五千五百人，仅次于鄯州的

临洮军、河源军、安人军和河州的镇西军[5]。据《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五年(725年)十二月记载,戊寅,制以吐蕃为边患,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兵五万六千人,河西道及诸军团兵四万人,又征关中兵万人集临洮,朔方兵万人集会州防秋;至冬初,无寇而罢,伺虏入寇,互出兵腹背击之。

唐朝征调十余万大军集结临洮郡,等待吐蕃入犯,可见临洮郡是吐蕃入寇的重要目标和通路。《通鉴》卷二一七天宝十三载七月条云:癸丑,哥舒翰奏:于所开九曲之地置洮阳、浇河二郡及神策军;以临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阳太守,充神策军使。

同书胡注云,洮阳、浇河二郡,皆置于洮,廓二州西南。……洮州西八十里磨环川置神策军。

收复九曲之后,在临洮郡西置洮阳郡和神策军,由临洮太守兼管。唐朝在临洮郡西重点设防,也说明该地为吐蕃入侵的重要目标和通路。重点设防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吐蕃对临洮的入侵,同时要切断吐蕃由临洮入侵内地州郡的通路。这都与"不敢过临洮"是完全相符的。

总之,《哥舒歌》歌颂的是哥舒翰收复九曲的功绩,其中的临洮是唐临洮郡。

**注释:**

①《全唐诗》卷一四〇。

②马茂元:《唐诗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26页。

③马茂元:《唐诗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26页。

④林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页。

⑤《册府元龟》卷九八六。

⑥《册府元龟》:"薛讷破蕃于渭州西界武阶释。"

⑦杨守敬:《水经注疏》(科学出版社影印本)引董祐诚说如下:"今渭源县北分水岭即鸟鼠山之干,东则渭水源,西则洮水源也,俗曰东峪河。"按:

此说至确，东峪河今又作东峪沟。

⑧《旧唐书，薛讷传》。

⑨四首诗均见《全唐诗》卷二〇〇。

⑩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97、142 页。

⑪分别见《全唐诗》卷一九八和卷二〇一。

⑫《全唐诗》卷二〇一。

⑬《全唐诗》卷二〇〇。

⑭《元和郡县志》卷四〇，武威郡八到条下云："东北（按：应作'东南'），至上都取秦州路二千里。"

⑮《元和郡县志》卷三九。

⑯《岑嘉州系年考证》。

⑰按：《元和郡县志》所记临洮军管兵数为五万五千人，与《旧唐书·地理志》《通鉴》胡注所记不同。据冬仲勉先生的《通鉴隋唐记比事质疑》一书"天宝元年天下兵马数"条考证，"五万五千"是"万五千"之讹。

⑱又见于《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胡注。

⑲《全唐诗》第十一册，第 8850 页。

⑳《新唐书·吐蕃传》。

㉑《新唐书·吐蕃传》。

㉒《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七年正月条。

㉓《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胡注。

作者：刘满，1942 年~ 2017 年，男，甘肃兰州人，兰州大学副教授。

# 新玉门关考

李正宇

## 一、历史上不在一处的两所玉门关

《汉书·地理志》"敦煌郡龙勒县"条班固注云："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史记·大宛列传》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玉门关在（龙勒）县西北一百十八里。"《元和郡县图志》及《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俱同。敦煌石窟保存的晚唐抄本《沙州志》，五代写本《寿昌县地境》及《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亦载此关，但将距寿昌城里数误作"一百六十"[①]。此关建于西汉武帝时，约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51年），史称"故玉门关"或"古玉门关"。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瓜州晋昌"县下载："玉门关在（晋昌）县东二十步。"[②]此为唐人著录的另一玉门关。此关在故玉门关东450余里，因置于故玉门关废弃之后，可称新玉门关。

以上两所玉门关，建立有先后，位置分东西，虽同名而并不相混。世人熟知者为旧玉门关，至于新玉门关。其建置年代及所在位置多不甚了然。古代史籍及古人诗文多有言及"玉门"或"玉门关"者，由于世人对新关不甚清楚，多以旧关释之[③]，既乖于地望，复谬于史实。盖皆由莫辨二关地望之异，东西之别，不得要领，姑妄言之，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及文学史上一桩悬案。

近百年来，不少学者发现了问题。乃从事于新玉门关之考证，但诸说不一，迄无定论。余近年从事瓜、沙历史地理研究，于研读诸家论述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实地考察，加以验证。略有新见，就教于方家。

## 二、明清以来对新玉门关所在的记述及推测

明清以来，关于新玉门关的位置所在，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在“故瓜州西北一十八里”，见《大明一统志》卷三七“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关梁”条。一说在今瓜州县东百余里之双塔堡东北。此说以陶保廉为代表，见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五“十一月初九日”记事自注。还有一说认为“唐初玉门关在瓜州西北五十里之瓠芦河上，后迁至瓜州城近处”。此说以严耕望先生为代表，见严耕望著的《唐代交通图考》卷二。

以上三说，《大明一统志》之说并未引起人们重视：严耕望先生之说，虽倾向于在锁阳城西北，但一疑在窟窿河下游之双塔堡东，二疑在小王堡（当地称小宛堡）之西，还提出了初唐以后移关于瓜州城近处的推测。数疑俱存，未作决定，惟陶氏之说影响最大。林竞的《西北丛编》[④]、阎文儒的《敦煌史地杂考》及《河西考古杂记》[⑤]等，都对陶说加以推介，并有所申论。阎文儒先生作为考古专家而又亲赴双塔堡一带考察，著文肯定陶说“最为可靠”。其文为今时学者频频引用，影响颇大。1992 年出版的《安西县志》则指出双塔堡为唐玉门关。于是，陶氏之说几成定论。

陶氏所著《辛卯侍行记》卷五之“十一月九日”记云：“初九日，卯出布隆吉尔堡东门，绕向西。二里，出旧城北门。三里，过小河，即布隆吉水也，北有草滩。四里，上小坡。三里半，逾一渠，迤北曰权家堡。四里半，道北有远树。六里，月牙湖墩。十四里过窟窿河。唐时玉门关迁此。今堡空无人，把总及土民二十余家均在堡外。”

陶氏推测的唐玉门关在布隆吉堡西 37 里，双塔堡东北，当左葫芦河与疏勒河会合口之西侧。其西南之双塔堡，陶氏推测为唐之晋昌县故址。陶氏的推测，并非由于发现了唐晋昌城及玉门关遗址确在此处的什么证据，而仅仅是根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瓜州晋昌县东去肃州、西去沙州的里程作出的比定。《辛卯侍行记》卷五“十一月初八日”自注中有如下说明，《元和郡县图志》：“瓜州晋昌县本汉冥安县，东南至肃州四百八十里，西至沙州三百里。”今肃州至安西州六百六十里。又西至敦煌即唐沙州二百七十里。乾隆时，考古者以安西州西南六十里之瓜州口为

唐瓜州。则东距肃州逾七百里，西距沙州只二百一十里，较《元和郡县图志》所言相差太远。俞浩《西域考古录》疑之，以布隆吉为唐瓜州，继又云“在双塔堡”，则近似矣。盖布隆吉东距肃州五百里，较《元和郡县图志》多二十里；其西距沙州四百三十里，较《元和郡县图志》多一百三十里，左右未均。若双塔堡，则距肃距沙较《元和郡县图志》各多数十里。近代，有司定驿程，报部之数，率浮于实量之数。以是核之，双塔堡之去肃、沙，与唐瓜州之东、西二至道里不甚悬殊也。

从陶氏的说明中可知，把唐晋昌县城定在双塔堡，除了东距肃州，西距沙州里程“不甚悬殊”之外，别无其他证据。陶氏根据肃、瓜、沙三州里距之比定作出的推断，其实并不可靠。岑仲勉先生指出：按依《侍行记》所载，双塔堡至安西一百十三里，再加安西至敦煌二百七十里。共三百八十余里，比《元和郡县图志》多八十余里，而肃州至双塔堡五百廿二里，比《元和郡县图志》只多四十里，仍是左右未均。况古地理书传久失真，里数多误，《元和郡县图志》亦所不免。总须旁证他说，方可得其通。《通典》卷一七四“瓜州东至酒泉郡五百二十六里……西至敦煌郡二百八十里。”又依本篇（指明佚名《西域土地人物略》）校正道里，肃州至瓜州应五百九十里，瓜州至沙州二百六十里，前者比《通典》多六十五里，后者比《通典》少廿里，未见得双塔堡之比定较优。⑥

问题尚不止于此，尤其让人生疑的是，双塔堡处既无古州县城址及瓦砾，陶片散布，附近又没有汉唐州县城必有的同时代墓葬群。据乾隆初《重修肃州新志·柳沟卫册》记载，此城系雍正六年（1728 年）所筑。时在双塔一带驻军，置千总衙门，因筑堡城，堡西山上有两座故烽火台。时人目为双塔，遂有双塔堡之名。此堡规模不大，《重修肃州新志·柳沟卫册·册记》云：“城周围一里一分零，高一丈八尺，宽一丈七尺。南北城门二座，各有城楼。”督工建造者为吏部文选司郎中马尔泰及光禄少卿汪灢。筑堡之时，此地并无古城遗址，仅其西 3 里及 6 里处小山上各有故烽火台一座，督工者汪灢有《双塔堡》诗云：“塔影参差旧迹荒，营屯卒伍启新疆。雪峰南耸当山阁，红日东来照女墙。草色满郊千骑壮，河流双汇一川长。幽情更爱禽鱼盛。闲向溪林钓猎忙。”近处景致提到了“塔影旧迹”“河流双

汇”以及“草色”“禽鱼”“溪林”;远处景致则说到了“雪峰南耸”“红日东来”,却不曾提到此地有古城废垣。若当地本有古城废垣,正堪平添今昔兴替之慨,诗人岂能漠然放过不著一字?阎文儒先生到此作考古调查,除见到清雍正六年(1728年)新筑的双塔堡城之外,也未发现古城及古墓葬群遗址。向达先生指出:“惟今双塔堡,乱山子一带仅余古烽墩二。其他遗迹悉化云烟,关址所在,疑莫能决。”[7]可见陶氏之说,并不足视为定论。

另一方面,从唐代瓜伊驿道经行路线进行评量,玉门关亦不合置在双塔堡。唐代瓜伊驿道,是从瓜州城(今锁阳城)向西北115里抵常乐县城(今瓜州县六工村破城子)[8],北入莫贺延碛路(又名“第五道”),又西北785里抵伊州(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9]。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及“双泉驿”等条,对这条驿道有确切而又具体的记载。唐之玉门关,即置在瓜州往伊州驿道之首途——瓜州城至常乐城之间。唐僧慧立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玄奘西行求法,行抵瓜州,“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芦河,上广下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又记玄奘“与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遥见玉门关。去关上流十里许,两岸可阔丈余,傍有胡桐树丛,乃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此云玉门关在瓜州城北50余里。常乐县在瓜州西北,伊州又在常乐县西北。从驿道走向来说,玉门关当在瓜州城西北为是。而双塔堡却在瓜州城的东北方向100里[10]。一则方位不合,二则里程过于悬殊。《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及敦煌出土本《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俱载瓜州距常乐城“一百十五里”,此为自瓜州城直趋西北前往常乐城的里程,若驿道果经双塔堡而抵常乐城,其行进路线则是先东北再西南,里程远达270余里,枉作转折,劳力耗时,有何必要?退一步说,若从双塔堡直指西北不再绕道常乐而趋伊州的话,就地形论之,则当自双塔堡直插红柳园(唐乌山烽)入莫贺延碛路。然而双塔堡至红柳园间200里,唐代并无驿路通行,漫漫戈壁,既无水草,亦无驿站,行旅无所补给,故汉唐以来无就此道而行者。由此可知,作为“西境之襟喉”、

瓜伊驿道“路必由之”的玉门关，必不置在古不当道的双塔堡。

**三、新玉门关址的重新考定**

近年来，笔者在对瓜州历史地理考察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概念，即唐玉门关必置在瓜州城至常乐城（即锁阳城至六工村破城子）之间，其驿道当呈东南西北走向，绝不绕道东北之双塔堡。就是说唐玉门关必不在双塔堡一带。根据《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所载瓜伊驿道加以推测，唐玉门关应在锁阳城，北桥子及踏实乡破城子之间三角地带范围内，于是笔者把这一三角地带确定为重点考察地段。这一地带如今大部分退化为盐碱荒滩，古代遗址颓毁严重，高地遍布卤壳圪垯，低地沮洳泥泞。汽车不易通行，步行亦甚艰难。笔者多次进行踏察，仍不免多有遗漏。1996 年 8 月，笔者又去瓜州考察，果然见大小不同又错落毗邻的两所古城遗址。

小城筑在一古河道西岸，东、西二垣各长 60 米，南、北二垣各长 68 米，平面占地 4080 平方米。东垣下临古河道，由于河水侵蚀而坍毁。另外三面即西、北、南垣外有护城壕环绕。城内西南隅间隔出一小型子城，北墙及东墙各长 19.5 米，子城平面 380 平方米。此城四面城垣及子城墙垣绝大部分已坍毁成土垅形，残高 2.5 米。仅北垣东端还残存一段夯筑原墙。残长 4.4 米，残高 82 厘米，顶宽 1.4 米，夯层厚 15 厘米。

小城西南 30 米许有一大城，东垣因临河水浸，全已坍毁；南、西、北三面城垣犹存土垅。笔者步测其西垣长约 260 米，南垣长约 220 米，城址呈长方形。平面占地约 57200 平方米。如此规模，在汉唐时期之河西地区，相当于县级城址[11]。城址内外盐碱侵蚀严重，卤壳累累，遍地荆棘，一如小城状况。

晋昌城的具体位置，向来失载。仅《明一统志》云：“晋昌废县，在故瓜州北。”此次所见马圈村大城正在瓜州城（锁阳城）正北略偏西。此城规模之大，必不低于县级。在这一区域内出现的县级或县级以上的城址，唯一的可能只能是晋昌城，别无他城在此。

《元和郡县图志》载：“玉门关，在（晋昌）县东二十步。”马圈村大城

东北的小城正好在大城东“二十步”，与《元和郡县图志》相合无二，自应是唐玉门关城。城内西南隅之子城，当为关官衙署。城东古河道，必即玄奘所说“上置玉门关”的“瓠庐河”，即岑参诗中的“葫芦河”。此河从小城东南 26 里东坝滩乱泉处发源，发源处西南 15 里即锁阳城（唐瓜州城）。此河自锁阳城东北 15 里的东坝滩发源处西流，10 里抵南坝（在锁阳城北 12 里），折西北 7 里过头坝南侧，又西北 10 里至马圈村南，又西 2 里抵马圈村小古城（唐玉门关城）东南，北过小古城东侧；折西北，穿过平湖，蘑菇槽及野糜子湖，抵截山（唐常乐山）南麓，计 20 里；沿截山（唐常乐山）南麓向西南流（因此山走势为西南东北向）。24 里至青山子，入黄水沟。又西南流 18 里过双墩子（古烽火台）南，又西南 21 里至牛桥子；又西南 5 里至土墩子南（土墩子为西夏佛塔）；又南 17 里抵芦草沟峡谷南口，此峡即常乐山与悬泉山分界沟；西北 10 里穿过山峡抵峡谷北口；北流 18 里，至阶亭驿南，折向西北，22 里至烽燧（即唐代之廉迁烽，地理坐标：X16702.8，Y4484.25）；过汉长城，又西北 2 里，散入沙碛。此河全长 220 里。这条古河，由于都河废弃[12]，水源顿减，上游自源头抵平湖一段，河水断流，河道废湮，面貌改观；其中游因得到沿途诸泉补给，尚未断流，但水量甚小，至土墩子以下水量稍增；流至芦草沟北口之东北 3 里渗入地下，此下尾闾段亦断流无水，河道因废毁年久而变形，宽窄不一。所幸者通过考察，这条具有历史地理意义的古河道得重新认定。

笔者所考定的这条瓠庐河，同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所载之“苦水”恰恰相当。今引《图经》原文如下：苦水源出瓜州东北十五里，名卤涧水。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余里；西南流一百二十里，至瓜州常乐县南山南，号为苦水。西北流 15 里，入常乐山；又北流，至沙州阶亭驿南即向西北流，至廉迁烽西北廿余里，散入沙卤。

此记苦水源头在“瓜州东北十五里”，“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余里”，“西南流一百廿里至瓜州常乐县南山南”，以及“西北流……入常乐山”，“又北流，至沙州阶亭驿南即向西北流”，“至廉迁烽西北二十余里，散入沙卤”等，与马圈城东之古河道一一吻合，必系同一河流无疑。因知

此河即唐初之瓠庐河，武周时期名为苦水。航片显示，锁阳城往马圈小城确有古道遗迹。其道出锁阳城北门，向西北有一凹槽，即古驿道之切迹，经平头树村东向北，抵黄水沟（古渠遗址），又西北过黄水沟抵马圈小城。自锁阳城抵马圈小城约 30 里；北过苦水（即瓠庐河），西北抵截山子南麓土圪塔湾（截山子为三危山之东段，自西南趋东北，长 150 余里，即唐之常乐山），土圪塔湾之“土圪塔”为古烽火台遗址，残高 1.5 米。自马圈小城抵土圪塔湾 17 里（土圪塔湾向北有小道，循峡谷入常乐山，此一峡谷今名桥子口子；循峡谷向西北亦可出山）；驿道则由晋昌城及玉门关（马圈村二古城）之间向西北，66 里抵截山达拉口子（截山为常乐山之一段。达拉口子为山中一条从东南向西北的峡谷通道，今自马圈村古城往达拉口子，地面退化为盐碱滩，沮洳难行。而古代当有路可通），循达拉口子向西北，16 里至七工堡南出山，又西北 15 里抵常乐城（六工古城）。自瓜州城由此路向常乐城，今里为 128 里，折合唐里为 114.5 里，[13] 与《元和郡县图志》《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及《太平寰宇记》所载常乐县去瓜州“一百一十五里”正合。

或问此既推断马圈小城为唐玉门关、锁阳城为唐瓜州，但锁阳城抵马圈小城仅 30 里许，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云瓜州城北“五十余里，有瓠庐河，上置玉门关”之语颇不合。岂有说乎？余曰：瓜州城（锁阳城）正北 40 里（折唐里不足 36 里）即常乐山，玉门关必不在山北。以实校之，所谓瓠庐河及玉门关在瓜州城北“五十余里”必误无疑。度其所误，不外二因：

其一，“五十余里”本是玄奘闻之于“人或报云”，容有不实，何必定准？近人信以为实，曲为之解。据“与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之文，以为夜间行走较慢，三更计 6 小时行进 50 多里可信。然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云“夜发”，岂必日落即发？玄奘西行，本系偷越，冥祥撰的《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所谓“国家法，私向外国，罪名极重”。则玄奘出发之时，自应在夜深人静之后，古人云“人定亥，夜半子”。亥时为夜 9、10 点钟；子时即三更，为夜 11、12 点钟。假设夜 10 点多钟动身，12 点（三更）

到河，两个多小时，夜间行走谅不过 30 里许，同锁阳城抵马圈小城 30 里许正合。

其二，颇疑“五十余里”，本作“二十余里”。“二”讹作“五”，故今本作“五十余里”。古籍“二”“五”形近互讹之例何烦悉举？“二”字上下画之间若有墨污，颇易误释为“五”。今锁阳城北抵截山子仅 40 里，西北抵马圈城瓠庐河仅 30 里，用以校正《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谓“五十余里”，正应作“二十余里”（唐里）。《明一统志》：“玉门关在故瓜州西北一十八里。”方位正确而里距略短，或者也不排除《明一统志》原文为“二十八里”，讹作“一十八里”的可能。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考证唐玉门关方位固然十分可贵，但是，其中也的确存在着若干不实之词。“五十余里”之不实，可据瓜州城（今锁阳城）北距常乐山（今截山子）唐里不过 40 里（折唐里不足 36 里）之实予以勘正。若以为原文本为“二十余里”传写致误，谬不出自玄奘亦属可能，但下举之谬，必出自玄奘口述无疑。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瓠庐河“洄波甚急，深不可渡”。《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亦有此语，一字不变。此诚大言夸张，去实远甚。按瓠庐河源出“瓜州东北十五里”众泉出露地带。此处泉流，乃是都河渗漏入地二次露头之水，水量有限；此河上中游皆在截山以南，这一带为细土平原，地势较低，坡度平缓，河流缓慢，河床下切不深，瓠庐河何至于“洄波甚急，深不可测”？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本文证之，亦知此河并不“深”“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云玄奘与少年胡人三更许至河，“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设使水深流急，仅以二人之力更在暗夜之中摸索操作，岂能遽而成桥？试问，二人在丈余宽的河上架桥，此桥又足以承受马足，不至踏穿陷蹄，需要砍伐几多丈余长的树干，需要芟刈几多树枝杂草，需要挖掘、搬运几多土方？二人短时间居然能在丈余阔的河上架桥“驱马而过”，吾知此河绝非“洄波甚急，深不可渡”。宋程大昌指出：“僧玄奘《西域记》，乃言五印度境周九万里，一何荒诞之甚也。”[19]此云瓠庐河水深流急，亦夸大之辞，饰言西行之艰难而已。孟子曰：“尽信书

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之所云，岂可尽信哉！

《通典·州郡二》有“墨离军，晋昌郡西北千里”之说（唐晋昌郡即瓜州，为不同年代所改名），陈国灿先生以为“千”乃“十”之误，校作“晋昌郡西北十里”[15]。笔者认为，从河西古城调查资料看，军城的规模很小，不及县城之半。而马圈村古城规模之大，绝非墨离军城可比者，故非墨离军城。笔者将马圈村大城定为晋昌城，也有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通典》及《元和郡县图志》皆载，瓜州及晋昌县同驻一城，意味着晋昌城也就是瓜州城。而笔者将锁阳城视为瓜州城，而将马圈村大城视为晋昌县城，与《通典》及《元和郡县图志》州县同在一城的记载不符。这的确是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古已存在。如《玄奘传》载，从瓜州城“北行五十余里……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而《元和郡县图志》明确记载，晋昌县为瓜州郭下县，却又说“玉门关在（晋昌）县东二十步”。玄奘说玉门关在瓜州北数十里，李吉甫则说在晋昌城（即瓜州城）东20步。二人已互为抵牾。笔者认为，二人所说应是不同年代的变动，其实并不抵牾。笔者将晋昌县城与瓜州城视为二城，就是根据玄奘及李吉甫之说。二人之说有所不同，应是不同年代有所变动的反映。不然的话，只好去问玄奘和李吉甫了，除了玄奘和李吉甫，其中因由，谁也不能说清道明。

**四、新玉门关的建置年代**

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最早对新玉门关的位置作出明确（但欠准确）的记载，百余年后，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又一次指明位置，知此关存在于唐代无可置疑。然而此关并非唐代始建。《隋书·地理志》“敦煌郡常乐县”注已指出常乐县“有关官”。隋常乐县故址即唐晋昌城。《新唐书·地理志》“瓜州晋昌县”条指出，晋昌县本隋常乐县，“武德五年更名”。所谓“更名”，乃谓仅改县名，未移治所。余意前述马圈村西大、小二城之大城即隋常乐县、唐晋昌城。向达先生早已指出：“隋常乐有关官，其治所为玉门关无疑也。”又引《隋书·西突厥传》云：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即今哈密市北

巴里坤山及哈尔里克山)。高昌王麹伯雅上状,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向氏本中国人,嫁西突厥泥利可汗,生子达漫,继位为处罗可汗)。驰至玉门关晋昌城。

向达先生指出:"《隋书》亦云玉门关晋昌城,是自长安西去,必先至玉门关而后抵晋昌,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记合。"[16]今验以马圈村西二古城,小城居东北,大城居西南,二城相去 20 步。据《元和郡县图志》玉门关在晋昌县东 20 步之语,知东北小城即隋玉门关,西南大城则为隋常乐县,唐代改常乐为晋昌,玉门关则沿置未改。如此看来,新玉门关隋代已确乎存在。

法国汉学家沙畹著的《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所获中国文书考释·序论》中提出汉武帝太初年代以前的玉门关在敦煌以东的新说,王国维先生在《流沙坠简·序》中亦赞成沙畹说。向达先生著《两关杂考》驳之[17],沙畹之说已被否定。最早的玉门关为西汉所置,在敦煌西北确然无疑;后来玉门关东移,也已是学界公认的事实。问题是玉门关何时东移,至今尚未解决。向达先生虽指出隋代的玉门关已在常乐县东,并不认为东移的玉门关始建于隋代。他认为"玉门关之东徙与伊吾路之开通当有关系"。接着他引证《周书·高昌传》及《北史·高昌传》关于伊吾路的记载,以及《晋书·吕光载记》和《晋书·凉武昭王传》已透露玉门关在敦煌以东的信息,据以作出推测道:"玉门关之东徙,或者即在典午末叶,五凉鼎盛,伊吾路开通之际亦未可知也。"可惜此论未引起学者足够的重视,未能沿着向达先生的思路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讨论新玉门关建置年代之前,有必要首先弄清旧玉门关废弃于何时。这是由于就其呵察职能、关名及关址移动来看,新玉门关乃是旧玉门关的递替。旧关不废,必无异地又置新关之理。由此推之,新关之置,必在旧关罢废之后,二者不得并时两存。弄清旧玉门关罢废的时间,也就为新玉门关之始建找到了上限,同时,也为新玉门关的建置追寻到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

东汉建国初期,忙于内战及内政,"未遑外事",无力西顾。建武二十

二年(46年)十月“诏罢诸边郡亭候吏卒”。敦煌郡边塞的宜禾、中部、玉门、阳关四都尉皆当奉诏一时而罢。但玉门关作为呵察出入的关卡,容或继续存在。至建武二十七年,朗陵侯臧宫与杨虚侯马武上书请伐北匈奴,光武不听,曰:“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乃“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辞币以礼匈奴之使”。玉门关应即废于此时。这就是说,在“罢诸边郡亭候吏卒”五年后,才关闭玉门关。自西汉武帝以来存在140多年的古玉门关,在东汉建武二十七年(51年)被罢废,那么新玉门关的建置,必在是年以后。

新玉门关的建立,与伊吾路的开通以及由此引起丝绸之路主道的改移有着直接的关系。伊吾路的开通,肇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二月,汉遣数将军,四万四千骑分路出高阙塞、平城塞、酒泉塞、居延塞北征匈奴。其中,将军窦固,耿忠一支大军出酒泉击匈奴呼衍王,取伊吾卢地,过天山(今哈密北山),追敌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卢城。表明这一年伊吾路已打通。

永平十七年(74年),窦固大军再次北征,出昆仑塞,经伊吾,逾白山,过蒲类海,破车师;继在车师前后部置西域都护、戊校尉与己校尉。永平十六、十七两年间,班超又连降鄯善,于阗,龟兹等西域诸国,“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与汉绝六十五载,至是乃复通焉”。西域既通,势须设置经办西域往来事务的机构及官职。永平十七年,郑众“与虎贲中郎将马廖击车师,至敦煌,拜为中郎将,使护西域”。永平十七年(74年),征车师大军皆从敦煌东境昆仑塞循伊吾道北出,并不经过敦煌。故知郑众实际上是刚到达敦煌郡东境便接到了改任“使护西域中郎将”的任命。只因昆仑塞属敦煌郡地,所以《郑众传》泛言曰“至敦煌”。《后汉书·耿恭传》记永平十八年(75年)匈奴围攻戊己校尉耿恭,建初元年(76年)三月,耿恭狼狈而归,“发疏勒时(此为车师国疏勒城,非南疆之疏勒国),尚有二十六人,随路死殁,三月至玉门,唯余十三人,衣屨穿决,形容枯槁”。作为“使护西域”的中郎将郑众,“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并上奏耿恭苦战事迹,以为“恭之节义,古今未有,宜蒙显爵,以厉将帅”。关于“三月至玉门”,

唐李贤注云："玉门，关名，属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贤按，酒泉郡又有玉门县，据《东观汉记》曰'至敦煌'，明即玉门关也。"李贤根据《东观汉记》"至敦煌"的记载，正确地指出此所谓"玉门"实为玉门关，可谓得实。然而他却说玉门关乃指敦煌西北的故玉门关，又大谬不然矣。

耿恭自天山北疏勒城东归，本来有三条路线可走：一是沿天山北麓东行，南过天山，经伊吾入昆仑塞；二是从车师后部南越天山抵高昌壁，折东经伊吾屯城、东南入昆仑塞；三是从车师后部南抵高昌，折向西南，经焉耆、龟兹，复折东，沿孔雀河北岸东行，过蒲昌海（罗布·自）北岸，又东过白龙堆抵故玉门关。其中，经焉耆、龟兹而东奔旧玉门关一道，由于数月前"焉耆与龟兹共攻殄西域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杀吏士二千余人"，叛而未服，道路不通，即《班超传》所谓"会陈睦之变，道路隔绝"，耿恭以其孱弱残兵必不敢取此道。其次，似可取南下高昌壁，东趋伊吾一道而归。由于汉朝王蒙及皇甫援等部大军数月前攻破交河，"北虏惊走"，车师前王复降，叛乱已被平定，而且王蒙等军亦由此道东归，道路平静安定。然而，设若耿恭等取此道，却不至有"虏兵追之，且战且走""随路死殄"的遭遇。可知耿恭东归未取上述二道。至于沿天山北麓向东，复南逾天山，经伊吾入昆仑塞一道，其天山北麓一段属匈奴呼衍王领地，所以有"虏兵追之"，不得不"且战且走""随路死殄"。故知耿恭东归必沿天山北麓东行，复南过天山到达伊吾屯区，方才摆脱"虏兵"的追击，而从伊吾屯城向东南，沿途设有烽戍（今哈密趋东南，一路有格子烟墩、天生墩、沙泉子、星星峡、马莲井、大泉墩、红柳园墩、白墩子等，皆为东汉驻守之烽戍），耿恭等必由此路入昆仑塞，昆仑障东南90里即抵新玉门关，受到中郎将郑众的接待慰问。从郑众"至敦煌"（实为至敦煌郡东境）拜为中郎将"使护西域"及在"玉门"（实为敦煌东境的新玉门关）为耿恭等"洗沐易衣冠"来看，中郎将郑众的驻地应即在新玉门关。1990年至1992年，在敦煌市悬泉置掘得汉简近2万枚，西汉至王莽时简牍多，而东汉简牍寥寥无几。笔者则以为，此中正透露出东汉光武年代罢废故玉门关、旧玉门关道行人稀少，明帝永平十六年及十七年开通伊吾路，成

为往来西域的新干道。新玉门关置应在敦煌郡东冥安县境，雄踞伊吾道的南端，控扼伊吾道的起点，管理伊吾道往来事宜。之后，除拘弥、鄯善、小宛、精绝数国外，其余西域二十余国皆多由伊吾道而通中原。西汉时经悬泉置，敦煌城，出故玉门关往西域的旧路必然萧条。悬泉置发现东汉简极少，正表明东汉时期西域古道衰落的实况。新玉门关北临伊吾路，东接酒泉路，扼中西交通之枢纽，可谓背依内郡，外通西域，“使护西域中郎将”郑众正宜设衙于此。从郑众在新玉门关接待耿恭还国来看，新玉门关应即郑众“使护西域中郎将”驻衙之地。

如前所述，新玉门关既是为伊吾道而设的关卡，也是东汉“使护西域中郎将”的衙府。从上述数宗史料所透露的信息来看，都表明新玉门关应置于东汉永平十七年。

前人多根据《隋书·地理志》“常乐县……有关官”的记载，以为新玉门关始置于隋代。笔者根据个人多年来对瓜、沙史地研究的心得，乃知新玉门关始置于东汉。除了上述的论证外，还可以举出以下几条参证：

其一，《汉书·西域·车师后城长国传》云，西汉平帝“元始中（1～5年），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扼”。五船，即“姑衍”“呼衍”之别译，晋代又作“呼延”，唐代则作“莫贺延”，别作“拔河帝”[18]，乃指莫贺延碛[19]。此所谓从五船以北，穿过五船碛（莫贺延碛）而到达的玉门关，必是东汉改置于昆仑障东南的新玉门关，而非敦煌西北之古玉门关。东汉史家追述此道之原始，却用了东汉新玉门关之名。后世史家不明其故，或视为西汉之故玉门关，或曲解为汉酒泉郡之玉门县，皆误。敦煌西北之古玉门关与伊吾之间为600里大沙海，干枯无水，为生命之禁区，从古至今，不通人行。故知《汉书·西域·车师后城长国传》所说的玉门关必非古玉门关，无疑是指敦煌郡东境的新玉门关。

其二，《后汉书·窦固传》记永平十七年窦固北征云：“明年（永平十七年），复出玉门，击西域。诏耿秉及骑都尉刘张，皆去符传以属（窦）固。因遂破白山，降车师。”此“玉门”亦指新玉门关。唐以来史家或以为此“玉

门”乃指酒泉郡的玉门县。但《后汉书·明帝纪》及晋袁宏《后汉纪》皆明言窦固大军“出敦煌昆仑塞”。昆仑塞即在敦煌郡境之东部，故得谓之“敦煌昆仑塞”，新玉门关则在昆仑塞之南数十里，地属敦煌郡冥安县。而玉门县却不属敦煌郡而属酒泉郡，且远在昆仑塞以东400余里。又据悬泉置出土《酒泉郡驿置道里簿》载：“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见何双全《敦煌悬泉置和汉简文书的特征》），可见驿道是从玉门县向西，经沙头县，过乾齐县进入敦煌郡境，并没有从玉门县折向西北斜插伊吾的道路。所以，对窦固大军所出的“玉门”，没有理由判断为酒泉郡的玉门县，据理缘情足以判断为新置不久的东玉门关。《窦固传》永平十七年“出玉门”的记载，恰恰透露了东玉门关的消息。

其三，《后汉书·班超传》载班超：“久在西域，年老思土，上书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前人或以为当指敦煌西北的古玉门关，或以为当指酒泉郡的玉门县，由此又引起西汉太初二年（前103年）前玉门关究竟是置在酒泉之西或在敦煌之西的争论。其实皆因不明敦煌西北之故玉门关已在东汉光武帝时罢废，23年后明帝复于敦煌郡东境置新玉门关之事。《后汉书·班超传》记班超上书，时在永元十二年（100年）。是时，古玉门关既已罢废，其地当然不再以“玉门关”称名于世了。而新玉门关已赫然存世26年。班超上书中的“玉门关”，必不指已被废弃、不以“玉门关”称名于世的故关，理所当然是指现存于世的新玉门关。新玉门关在敦煌郡东境冥安县界，东距酒泉500里，所以班超有“不敢望到酒泉郡”之言，这本来很容易理解，并不牵涉已废弃的故玉门关及酒泉郡玉门县，至于为此而引起的争论，不客气地说，不过是无风起浪、徒为自扰而已。

其四，《三国志·魏志·乌丸传》引《魏略》云：“《西戎传》云：‘……西域诸国，汉初开其道时有三十六国，后分为五十余。从建武以来，更相吞灭，于今有二十。道从敦煌玉门关人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

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所言“新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出五船北，到高昌。即西汉徐普欲开未果、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才得开通的“五船道”，即后世所称“伊吾道”。此道所经之玉门关，实为敦煌郡东冥安县境的新玉门关。而以往史家误解为敦煌西北的古玉门关，以至有学者将“横坑”比附为敦煌小方盘城西的“后坑”。而笔者考“五船”，即姑衍、呼衍、呼延、莫贺延、拔河帝之译音，乃指莫贺延碛。盖原属匈奴呼衍王领地，故以“呼衍”名其地。经由莫贺延碛之道路，亦被称为“莫贺延碛道”，犹云“呼衍道”是也。《西戎传》记此道起自“玉门关”亦无误，不过此一“玉门关”并非敦煌西北的故玉门关，而是东汉新建的东玉门关。由于《西戎传》未将南道及中道起点的敦煌西北的西汉玉门关同新玉门关加以区别，后人又无东汉新建的东玉门关的概念，遂仍释为敦煌西北的西汉玉门关，以至影响到对“五船道”取线的考定。今既加以澄清，则《西戎传》云云，可为有关东汉新置之玉门关的较早记载。

其五，《魏书·张骏传》载，张骏以“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其中“玉门大护军”兼统伊吾都尉，盖承东汉“使护西域中郎将”旧制而变名者，亦略同于十六国时期的“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后汉书·班勇传》记班勇对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将居敦煌，后置副校尉于车师，既为胡虏节度，又禁汉人不得有所侵扰。”前已指出，初遣中郎将指“使护西域”中郎将郑众，所谓“居敦煌”，实为居于敦煌郡东境的新玉门关。前凉所置“玉门大护军”，既防自东汉“使护西域”中郎将而来，同样是“既为胡虏节度，又禁汉人不得有所侵扰”，相当于东汉之“使护西域中郎将”。至于所以改名“玉门大护军”，盖由于驻衙于新玉门关以临西域新道之故。以往史家以为“玉门大护军”驻敦煌西北旧玉门关，殆亦误也。

其六，《晋书·吕光载记》云，吕光自西域东还，“及至玉门，梁熙责光

擅命还师，遣子胤与振威姚皓、别驾卫翰率众五万，拒光于酒泉”。此“玉门”，以往史家多以为指敦煌西北之旧玉门关，实则当指敦煌东境的新玉门关。据《晋书·苻丕载记》，吕光平龟兹之后东归，先“至高昌”，高昌太守杨翰以郡降；再“至于宜禾”，此指宜禾县，即西汉之昆仑障，今之瓜州县六工村古城；继后，“及至玉门”，梁熙始谋闭境拒之。由此知吕光东归之路是从龟兹抵高昌，东经伊吾入宜禾县，又至“玉门”。则此“玉门”必为新玉门关无疑。若吕光所入为旧玉门关，则不会经高昌、伊吾而抵宜禾县，更不当从宜禾县掉头向西奔赴敦煌及其以西的旧玉门关。《苻丕载记》载：“吕光自西域还师，至于宜禾……敦煌太守姚静、晋昌太守李纯以郡降。”宜禾县在敦煌郡城以东200里。吕光若从旧玉门关而归，必继抵敦煌郡，敦煌太守姚静当即时而降，何待吕光东过敦煌200里之宜禾城而后降？从姚静降在吕光抵宜禾之后加以判断，亦知吕光所至之“玉门”必为敦煌东部的新玉门关，以往释为旧玉门关者亦当纠正。

其七，《晋书·凉武昭王传》记李暠于公元400年自立为凉王，建元庚子，追封父祖，任官命将，“又遣宋繇东伐凉兴（凉兴郡在今瓜州县六工古城），并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此所谓“玉门”，以往史家皆以为指敦煌西北之古玉门关。唯向达先生独具慧眼，谓此两云之“玉门”，“皆当指玉门关而言，且疑已在敦煌以东”[20]。笔者认为，《传》既明言“东伐”，必非攻打敦煌西北古玉门关以西之地；又云，“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当时西凉国的大敌在东方，所以西凉王将大军集结在西凉国东部边境新玉门关一带屯田备战，而不是相反地却将军队集结于敦煌以西的古玉门关，且是时并无屯田阳关之举，因知所谓“屯田玉门阳关”，实则应为“屯田[东]玉门关”，衍一“阳”字。盖唐人已昧于西凉史实，遂有此误。

其八，《北史·西域传》记北魏董琬奉使西域，归而言曰：“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此道亦指五船道。故知所谓“玉门”，亦指东汉新玉门关。若指敦煌西北之旧玉门关，则距车师不过1600里，何云“两千二百里至车师”？

以上八例，表明从东汉明帝新置东玉门关以来，经三国、晋及北魏，代不绝书，惟未指明东玉门关的具体而已。至《隋书·地理志》始明言“常乐县……有关官”，而隋常乐县即唐之晋昌县，《元和郡县图志》进一步具体指出“玉门关在（晋昌县）东二十步”。但唐晋昌县又在何处，一直疑莫能决。今得马圈村大、小二古城，则唐晋昌城及玉门关的所在，似可论定。

**五、文献中涉及玉门关地望之辨正**

笔者既考故玉门关废于东汉建武二十七年（51年），新玉门关置于永平十七年（74年），那么，势必引起涉及新旧玉门关若干史料及诗文的重新认识。大抵东汉建武二十七年以前凡言玉门关者，皆指敦煌西北之旧玉门关。仅《汉书·车师后城长国传》记五船道“通玉门关”及《汉书·窦固传》“出玉门”指新玉门关，为班固叙往事而用新地名。此后，史志则多指新玉门关。而后世诗文中，或指旧关或指新关，两者杂见，不可执一而论；东汉以来史籍、诗文涉及玉门关者甚多，何可一一辨之，举其要者，辨之于后。其余或可依例推之。

《敦煌汉简释文》载有“玉门关”，“玉门关侯”，皆属旧玉门关。其年代则不晚于建武二十七年。因建武二十七年旧玉门关已被罢废故也。《后汉书·西域·车师后王传》记阳嘉四年春（135年），“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后部。帝以车师六国接近北虏，为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侯、伊吾司马合六千三百骑救之，掩击北虏于勒山，汉军不利”。又《隶续》卷一二 载中平二年（185年）之《刘宽碑阴》门生题名有“玉门关侯……段琰”。上二“玉门关侯”出现在旧玉门关省废之后80~130多年，必是新玉门关之关侯，而非旧玉门关侯。以往皆理解为旧玉门关之关侯，显然有误。

隋代涉及新玉门关者较多。《隋书·地理志》载敦煌郡常乐县“有关官”。隋常乐县即唐晋昌县，为今瓜州县桥子乡马圈村大城，其“关官”，即玉门关官，驻今马圈村小城是也。同书《西突厥传》裴矩送处罗可汗之母“驰至玉门关、晋昌城”，即此二城。《隋高祖纪》记云，仁寿四年（604年），“尝令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薛世雄传》“以世雄为玉门道行军

大将，与突厥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师次玉门”；《吐谷浑传》“帝立顺为主（吐谷浑主伏允之子名顺，质于隋者），送出玉门，令统余众。”上述所谓“玉门关”或“玉门”，皆指新玉门关，即《隋书·地理志》常乐县之玉门关。

唐张说《张燕公集》卷二五《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郭震）行状》：“睿宗即位，征拜太仆卿。勒至之日，举家进发，安西士庶、诸蕃酋长，号哭数百里，或鬓面截耳，抗表请留。因给之而后即路。其至玉门关也，去凉州八百里，河西诸州百姓、蕃部落，闻公之至，贫者携壶浆，富者设供帐，连绵七百里不绝。公旌节下玉门关，百姓望之，宛转叫呼，声动岩谷，自朝至暮，传呼至凉州。凉州城中男女，在衢路并歌舞出城，咸言‘吾父至矣！’通夜城门不受禁制。都督司马逸客闻之，谓公近矣，陈兵出迎。会侯骑至，云‘始入玉门关’。都督嗟叹良久！”此事，《新唐书》采入《郭震传》。文所说玉门关，参以“去凉州八百里”之言，必指唐瓜州晋昌县境的新玉门关无疑，若敦煌西之故玉门关，则去凉州千余里矣。

唐代史料言及新玉门关者，除前举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及《元和郡县图志》外，又有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十九年（731年）唐荣买婢市券》，钤有“玉门关之印”三方，为唐开元年代玉门关存在的确证。同墓出土《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益谦等请给过所案卷》载，唐益谦从四镇来到西州，今欲往甘州，“路由玉门关”。开元年代从西州往甘州，驿道是经伊州、瓜州、肃州而达，因知文书中的玉门关，必系瓜州境的新玉门关而非沙州西北的废玉门关。又敦煌遗书《吐蕃沙州某汉人都督书仪》云：“玉门释（驿）户张清等，千东煞人，聚徒逃走，劫马取甲，来赴沙州。千里奔腾，三宿而至。东道烽铺，烟尘莫知。”此“玉门关”在沙州之东，又云“三宿而至”沙州，“三宿”即四天，知此关在沙州东四日程。《唐六典·户部·度支郎中·员外郎》：“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四日约280里，与马圈小城至沙州里程相合。亦可为新玉门关在马圈小城提供旁证。此文为吐蕃占据敦煌初期的文书，此时之东玉门关似已称“玉门驿”而不复称“玉门关”矣。

王昌龄《从军行》之七：“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南山北总是烽；人依远

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诗中之“玉门”，据环境、景物考之，当为新玉门关。所写之山，为新玉门关北之常乐山，今名截山（《辛卯侍行记》作“尖山”）。此山南北宽 10 余里，长 150 余里（东起芦草沟峡，西至双塔水库西岸）；又西与敦边之火焰山、三危山、鸣沙山一脉相连，重峦叠嶂，延绵三百余里，“玉门山嶂几千重”指此；从新玉门关去常乐县（今瓜州县六工村古城），驿道是从今瓜州县锁阳城镇马圈村古城（唐晋昌城及玉门关）向西北，从拉达口子穿过截山（唐常乐山）。诗云“马踏深山不见踪”，正是峡中崎岖穿行情景的纪实；此山南北散布数十座烽燧，所谓“山南山北总是烽”是也。而敦煌西境的故玉门关，附近无山，远在西北 40 里许有乱山子，山体不大，谈不上“山嶂几千重”；且驿道经山南而西，不往山北，无所谓“马踏深山”；山南虽有烽火台，但山北为荒漠流沙，自古无路可通，故无烽燧之设，与“山南山北总是烽”亦不合。据实考之，此诗所写之“玉门（关）”为东玉门关无疑。

又王昌龄《从军行》之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宁瑞栋先生以为“孤城”者，唐之瓜州城也，此城孤处戈壁北缘，登城而望，南则“青海长云暗雪山”，北则遥见玉门关。马圈村小古城距瓜州城 20 余里，遥望可见是也。此说切合地望景物，非亲历其地者莫可道之。李云逸《王昌龄诗注》以为指敦煌西北之旧玉门关，环境地理皆不合。

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地理情势与敦煌西北之旧玉门关相合，而新玉门关地处瓜州农耕绿洲之内，平原茂草，何来黄沙万里的大漠景象？岑参于天宝十三载（754 年）春末随安西四镇节度兼伊、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至庭州，任节度判官；天宝十三载冬，封常清征播仙（据闻一多先生《岑嘉州系年考证》）时，岑参兼领伊、西、北庭支度副使，所以到玉门关按察征讨播仙大军的军需供应事宜，诗中所谓“我来塞外按边储”是也。自唐高宗以来，吐蕃军队便不断侵扰西域，对敦煌形成威胁。乃在敦煌西境置紫金镇（在阳关西南）及西关镇（在旧玉门关），派重兵驻守，以防吐蕃东进。盖将军是天宝年代的西关镇将，诗中之所以称之为“玉门关盖将军”，不过是借用古关之

名以壮声威。此次出征播仙，封常清为统帅，但征讨大军却是从敦煌出征的，岑参《献封大夫破播仙镇凯歌六首》之二云“官军西出过楼兰，营幕旁临月窟寒”透露了这个事实。若征讨大军从庭州、西州前往播仙，当云“官军南出（东南出）过楼兰”，不当曰“西出过楼兰”。敦煌之西关（即故玉门关）也是西征大军军需储供的转运基地，岑参到此按察征讨大军之军需储供事宜，受到守将盖将军的招待，于是才有了这首《玉门关盖将军歌》。歌云“我来塞外按边储”，正道出了岑参此行的缘由。岑参“按边储”所到的玉门关，无疑应是敦煌西北之故玉门关，而非瓜州境内的新玉门关。试问天宝后期，唐朝不在防蕃前线的敦煌西关驻军设防，却在后方的瓜州新玉门关驻守“五千甲兵”是何道理？再者，岑参按察征讨播仙的军需储供，不去供储基地的敦煌故玉门关，却往瓜州的新玉门关有什么可“按”？闻一多先生以为《玉门关盖将军歌》中的玉门关为瓜州新玉门关，亦不免智者偶失。

此外，又有明言“玉门关”，却不坐实为故玉门关或新玉门关者。如陈代何胥《伤章公大将军诗》：“十万横行罢，三千白日新。短箫应出塞，长笛反惊邻。槐庭惨芳树，舞阁思阳春。所悲金谷妓，坐望玉关人。”及戴叔伦《闺怨》：“看花无语泪如倾，多少春风怨别情。不识玉门关外路，梦中连夜到边城。”二诗中的玉门关，既不确指故玉门关，亦不确指新玉门关，不过代指遥远的边关而已。

**注释：**

①敦煌出土唐五代诸种当地乡土志书皆误作寿昌县“西北（或径云“北”）一百六十里。”盖原应为：“一百十八里。”“十八”竖写作“大”，抄者误认为“六”字。辗转传抄之间，复在“六”下妄增“十”字。“一百十八里”遂误作“一百六十里”。详余著《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

②今见《元和郡县图志》诸本，如清武英殿本、金陵本、岱南阁本、畿辅丛书本、戈襄校仿明本、通经楼钞本、陈树华抄本等，皆作“（晋昌）县东二十步”。唯清王琦《李太白集注》之《胡无人》诗注云：“《元和郡县志》玉门关在

瓜州晋昌县东二十里。”与诸本皆不合。疑王琦引文有误。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炀帝大业七年冬十月条:“帝遣裴矩与向氏亲要左右驰至 玉门关晋昌城。”胡三省注云:“《新唐志》:玉门关在沙州寿昌县西北。” 但裴矩所至之玉门关乃指在晋昌县东二十步之新玉门关,《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分明载之。而胡三省已不知晋昌县另有一新置的玉门关。

④《西北丛编》为林竞 1919 年 3~4 月游历西北记行之作,初刊于 1920 年。近年收入《西北文献丛编》之《西北民俗文献》第六卷。

⑤前文刊于《文物参考资料》1951 年第 5 期;后文连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86 年第 4 期及 1987 年第 1 期。

⑥岑仲勉:《从嘉峪关到南疆西部之明人纪程》,引自《中外史地考证》(下册),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638~676 页。

⑦向达:《两关杂考》,引自《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385 页。

⑧《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及敦煌遗书 P.2691《沙州归义军经略抄》皆载常乐县东去瓜州一百一十五里。

⑨《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伊州八到”载:“东南取莫贺延碛路至瓜州九百里。”而瓜州至常乐县 115 里,故知常乐县距伊州为程 785 里。

⑩《辛卯侍行记》卷五,“十一月初九日”注云:“(双塔)堡南十五里冰草沟,又五十五里桥子村。”又于“十一月初八日”注云:“自桥子南行三十里上达里图,即前明苦峪城也。”上达里图即今锁阳城,唐之瓜州城是也。此载双塔堡抵瓜州城 100 里。

⑪李并成先生指出:“城址规模是确定城市等第、判定城址性质的重要依据”。又说:“河西汉代县城城郭平面多呈方形或长方形,每边长度多为 200~300 米,周长一般 1000~1400 米左右。”见李并成著《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第一卷),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0 页。笔者认为,北朝及隋唐时期河西县城规模亦如此。

⑫“都河”为瓜州灌渠之引水河。此河自瓜州东南 53 公里疏勒河昌

马大坝处引水，沿大崖头及前夹山之北麓西北流。在瓜州城东南次第开四所斗门，分水入各干渠，灌溉瓜州城附近农田。今此河已废，古河道遗址仍历历在目。

⑬以往学者鉴于唐尺仅31.3厘米，步为5尺，300步1里，算得唐里合466.5米，小于今里。但《唐六典》，《通典》，新、旧《唐书》皆载，唐代度量衡行用大小两制，除"调钟律、测晷影、合汤药及冠冕"用小制之外，其余官私悉用大斤、大升、大尺。程大昌《演繁露》卷七载："开元九年敕：度，以十寸为尺，尺二寸为大尺。"即大尺为小尺之1尺2寸，合今37.32厘米。量地计里悉用大尺，唐1里为1500大尺，合1800小尺，折今制559.8米，较今里加长近60米。以敦煌文献所载唐代里距验之，皆合。如S.788《沙州志》、P.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及《寿昌县地境》皆载寿昌城距沙州城120里。寿昌城即今敦煌市南湖乡西北破城子，沙州即今党河西故城。二城相距今里为135里，较唐里多15里；又P.3720《莫高窟记》、S.5448《敦煌录》及莫高窟156窟前室北壁咸通年代墨书题记等，皆云莫高窟距沙州城25里，今自沙州城往莫高窟，取戈壁捷路，经东湾及鸣沙山二层台直插莫高窟，亦达28里，比唐里多出3里。如上所举，皆表明敦煌唐里大于今里。依余所定唐里为559.8米计算，锁阳城至六工破城子今里128里(128×500米=64000米)，折合唐里则为1145里(64000÷559.8=114里余283米)，与《元和郡县图志》《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及《太平寰宇记》等所载瓜州距常乐县"一百十五里"之数相合。研究瓜沙历史地理，里值不辨，则失其准绳矣。

⑭见程大昌的《考古编》卷八"外国地里书难信"条。按，玄奘原著《大唐西域记》卷二《印度总述·疆域》云："五印度之境，周九万余里。"

⑮陈国灿：《武周瓜沙地区的吐谷浑归朝事迹》，载《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篇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⑯向达：《两关杂考》，引自《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84页。

⑰同⑮，第392页。

⑱“五船”“姑衍”“呼衍”“莫贺延”“拔河帝”互为对音之详说，请参阅拙文《唐瓜州常乐县“拔河帝山”考》。(清)徐将“五船”比附为新疆木垒县东南色必口南至哈密市瞭墩路段(当地称“小南路”)上的五座小山。云：“今小南路有小山五，长各半里许，顶上平而首尾截立，或谓是‘五船’也。”(见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下“车师后城长国传”注)。此说不足为训。

⑲《大慈恩寺三藏法师(玄奘)传》记玄奘从瓜州往伊吾，行进到第四烽，烽官王伯陇告以“师不须向第五烽，彼人疏率，恐生异图，可于此去百里，有野马泉，更取水。”《传》文接着写道：“从此已去，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伊州柔速”县条“柳谷水，南流入莫贺延碛”。“第四烽”即今瓜州县红柳园西北之大泉。(详见拙撰《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之《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双泉驿》笺证)；“柳谷水”出自哈密北之雪山(即折罗漫山)，南流至沁城，亦名塔纳沁河。据此可知，自哈密北雪山以南，抵瓜州县马莲井之大碛，总名莫贺延碛，所谓“长八百余里”是也。

⑳向达：《两关杂考》，引自《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388 页。

作者：李正宇，1934 年出生，男，河南正阳人，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街亭地名的历史演变

李清凌

从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战国秦木板地图可以看到，秦人最早所置的邽县就在街亭所在的麦积区境内。秦汉以时期，街亭是县以下“亭”级基层单位。直到明清民国时期，这里相沿有城、有街道铺面和保存完好的城隍庙，一直是陇右繁华的经济文化区。

**一、远古、先秦时代的街亭**

街亭是一个自然环境优美，人文积淀深厚的地方。它所在的东柯谷，又叫轩辕谷，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性人物轩辕氏生活过的地方；像这样名字相同的地方，还有清水县的轩辕谷。春秋时代，老子从关东经陈仓古道西来，在距离街亭不远的今麦积区伯阳谷驻留，留下许多遗迹。

街亭所在的麦积区，是距今2700余年建立的邽县的治所。它和冀县（治今甘肃甘谷县东）同是中国政治史上县制演变的一个节点和闪光点。

商周时期，今麦积地区还是秦人的先祖同邽戎部族共同生活的地方，秦武公十年（前688年），秦灭邽戎，完全占有了这片地方，建立了邽县。邽县的治所就在今麦积区，街亭就在这个范围。邽县的“县”，并不是什么新的建制，早在夏商周时期，人们就把天子所居的州界，即王畿，称作县。《周礼注疏》上有一段话说：（郑玄）注：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县[①]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此盖夏时采地之数，周未闻矣[②]。

意思是说，《王制》上说，天子的县（王畿）内，有占地100里的封国9个，有占地70里的封国21个，有占地50里的封国63个。这是夏朝时的采邑数，周朝不是这样。后世人们也往往把京畿地区也称作县或京县。

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有句“河阳视京县”，就是称京师为京县。

最迟在西周时期，国家基层组织就有“县”的设置了。按《周礼》记载，西周京畿内外的基层组织名称是不一样的。畿内的基层组织，有乡、州、党、族、闾、比；畿外的基层组织，有遂、县、鄙、鄹、里、邻[3]。县是畿外基层组织的二级行政组织。其首长叫“县正”，“县正，每县下大夫一人”[4]。就是任命有下大夫爵位的一个人作为县的长官。其属官，还有：县师，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郑玄注：主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数，征野，赋贡也。名曰县师者，自六乡，以至邦国，县居中焉。郑司农云：四百里曰县。意思是说，县级官员和工作人员，还有上士（爵名）2人，中士（爵名）4人，府（官名）2人，史（官名）4人，胥（工作人员）8人，徒（劳务人员）80人。[5]郑玄注说：县师主管天下土地、人口等数目，征收赋贡。其名称叫“县师”的原因，是从京畿地区内的六个乡算起，到各邦国封地之间，县处于中间地带。郑司农（郑众）说过：距离京畿400里的行政组织叫县。《周礼》又记载：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6]。意为九个男劳力所分的耕地（基础数字是一夫百亩）合起来叫做井，四个井的面积合成一个邑，四个邑的面积合成一个丘，四个丘的面积合成一个甸，四个甸的面积合成一个县，四个县的面积合成一个都。这是按土地面积划分的地域单位名称。不算闲地和轮作面积，一个县的耕地面积至少应有23万余亩。

县的人口规模，按《周礼》的记载：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鄹，五鄹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简其兵器，教之稼穑[7]。

意为，按田地登记册《图经》上登记的田地数，制作县、鄙范围的形状和面积图形文书。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四邻为一鄹（zàn，100家），五鄹为一鄙，五鄙为一县，五县为一遂。每个地域都有沟或树作为界标。这样使各级地方组织负责所管地域内的政令刑法，每年按时清查管内人口，分给田地。清查兵器数目指导耕作技术。周代的社会现实肯定没

有这样严密的管理现实，但它至少反映了当时的管理轮廓。据此推断，周代一个县的人口，大致是2500家。按一家五口估算，当是12500口。

据载西周还有郡的设置，但级别比县小。“千里百县，县有四郡。”[8]是说在王畿以外千里的地盘上，可以设置一百个县，每个县下设四个郡。

秦人正是在创造性地继承周制的基础上，逐渐设置了地方行政区划。秦武公十年（前688年），秦国在今麦积区、甘谷县建立的邽县和冀县。秦孝公（前361~前338年）任用“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9]。县除令（长）外还设丞、尉等。将县以下繁多的基层组织合并为乡里什伍等精简的机构。秦庄襄王（前306~前251年）时代，庄襄王的母亲宣太后灭义渠戎国。在陇右、陕北设立了陇西、北地、上郡三个郡，每个郡的范围都比县大得多。这一切，都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提供了范本。

综上可知，第一，邽冀两县的建立，并非像学者所说是天下第一县（中国最早建立的县），但它们是秦襄公建国（前770年）后秦国最早设置的两个县。它们同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陇西郡的设置一起，启导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的郡县制，影响了其后两千多年的地方行政建制，直到今天余韵犹在。第二，放马滩秦墓出土的木板地图上，邽丘标在今麦积区。邽为县的治所，丘是“四邑为丘”的丘治，表明这个地方既是邽县又是其下属邽丘两级组织的治所。其对于街亭经济、文化的发展，肯定起了奠基的历史作用。至于有学者怀疑木板地图上的“邽”应是“封”字误读的问题，对于我们的判断没有影响，因为我们强调的是它的地理位置，而不是读什么。

对于秦置邽县的治所，有学者根据放马滩秦墓出土的木板地图，指出就在今麦积区[10]。此看法与清乾隆《甘肃通志》的记载一致。该志卷六《山川》云：改龙山在州东南一百里，一曰仙人岩。有岩突出两山间，其阿如屋，松柏窈窕，流泉入厨，亦异境也。下有改龙镇，俗称街子口，爲古上邽县治。

也有学者认为在秦州区[11]。两种说法各有证据，持之甚坚。其实可以

统一起来。

认为邽县治所在天水秦州区的学者，其主要的史料依据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渭水》。其所述是郦道元认知中的邽县治所，不能证明邽县从建立时起治所就在此地，因而不能否定根据考古资料形成的邽县初建时治所设在今麦积区的结论。在我们看来，两种观点倒是可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即邽县初建时治所在今麦积区，后迁到了今秦州区。何时移的，现无直接证据，推测极有可能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郡县制时期。在这以前，从秦襄公以降的五百多年，秦国的政治目标在关中等东方，邽县建在陇右秦人大后防靠东的地方，将是秦人东进的一个据点；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以后，秦的陇西郡治设在今甘肃临洮县，将邽县治所移到相对靠西的今秦州区，对于陇西郡守的行政管理比较便当，而对于邽县通过“丝路”陇坂大道进入关中也是很有利的。总之，提出邽县治所有过迁移的看法，既可以维护根据考古资料得出的结论，又解决邽县治所在今秦州区论者找不到秦汉以前邽县在今秦州区的证据尴尬。至于邽县治所从麦积区迁到今秦城区的具体时间，还可以有其他的说法，不影响基本的推论。

**二、秦汉至唐代的街亭**

街亭是先秦邽县的治所。秦汉以后，县以下行政机构的名称，各代变化较大。到唐朝，基本是县下乡、村两级制。唐人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在各州（郡）下先列出乡的数目，再列县数及县名。如：“秦州，天水，中府，开元户二万五千七，乡三十九。”“管县五：上邽、伏羌、陇城、清水、成纪。”[12]今麦积区甘泉镇的西枝村，早在唐代就有此名。杜甫诗有《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13]，就是一个证明。

街亭的名字在文献上最早出现于晋陈寿撰《三国志》。其中《魏志》《蜀志》中都多次出现。如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正月，“蜀大将诸葛亮寇边，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应亮。遣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并进兵，右将军张郃击亮于街亭，大破之，亮败走”[14]。

蜀后主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身率诸军攻祁山……魏明帝

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15]。

文中的街亭都是指县以下基层行政单位。《汉书》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16]。

就是说，亭是秦汉以来固有的基层建制。秦汉时每十里设一亭，每十亭设一乡。一个县一般是100平方里。人口稠密地区可能会小一些；人口稀疏地区可能会再大一点，乡亭的设置也按这一原则办理。汉沿秦制。三国时期也当如此。可见今麦积区的街亭渊源很古，汉代就有（汉下距史书上出现街亭之名的“街亭之战”只有8年），汉“皆秦制”，因此它极可能早在秦设基层组织“乡亭”时就已经出现。三国时的“街亭”是一个乡以下、里以上的行政组织。

唐代诗人杜甫旅居街亭东柯谷的时候，留下了大量的精美诗篇，是街亭、麦积，也是西北、中国文学的闪光点。

**三、宋元明清以来的街亭**

宋元明清县以下乡村机构的层次、名称虽有变化，但都保留了“乡”“村”的基本元素。今日我们仍能看到的街亭街道以及东、西两城门（据说还有南北门，已毁），都是明、清风格的建筑。据调查：原来四座城门均有古建，东城门榜书“瞻麓门”，其下一门三进，形式独特，其楼正面通道宽3.16米，柱径36厘米，直通二楼，悬山顶两坡水屋顶。正脊中饰方戟形宝瓶，两端为角尺形脊吻，垂脊上翘，檐下斗拱大齐全，有象鼻状大耍头，其下有小升斗，为一升三斗，大耍头两朵云，其下双昂上为凤头状，其下龙首状，其昂外翘，以朱、兰、白三色彩绘，色调明朗、质朴大方……门洞所砌条形青砖为（32×15×7）厘米，亦应为明代遗物[17]。

（一）街道

明、清、民国以来街亭的街道布局，原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呈十字形东西、南北两条主要街道。每条街道又有许多巷道和院落。东西街口还保留着门洞式两层楼式建筑。南北街口的建筑物已经毁灭，但基本格

局还可以看到。从十字街心往四方展开，八列店铺栉比，院落密集。那随处可见的板屋，或一层，或两层，门挂紫萝，巷列白松，花香鸟语，更显著地展示着《诗经》以来，陇右房屋建筑的地方特色。联系放马滩秦简上多处记载的“贾市”“市贩事”“财门所利”等史料，看着东堡子山上的城隍庙，街区的山陕会馆等，你完全可以判断，历史上这里绝不是一个一般的乡间集镇，而应是一个联系广远，商贾密集，有着悠久传统的县级行政和商业区。

（二）商铺

主街道东西南北交界的十字处是最繁华的地方。这里街面铺着青石板（今已由水泥覆盖），两侧分布着土木结构的店铺、客栈和民居大门。街亭偏在麦积区的东隅，但它自古以来就是陇右通往关中、川蜀的交通要道。远的不说，清朝、民国以来，街亭街道上还有多家供人、畜歇息的客栈及骡马店，也有许多本地人专门搞长途贩运的。本地从事长途运输的人家，每户养几匹、十几匹、几十匹不等的骡马，常年雇佣几至几十个年轻力壮，又有一些武艺，能够防身、护群的“脚户”（雇工），联合成群，叫做“马帮”，前往川蜀、汉中、内蒙古等地贩运赚钱。跑成都一线的最多，说是“下川”，陇商去时一般载运本地出产的皮张、毛货、褐布等；回程则主要带茶叶、丝绸（包括丝线、绸缎做的瓜皮帽等）、洋布、竹器、染料、文具等，利润相当丰厚。山西、陕西等地的商人，也把街亭当做他们的一个重要集结点。能够在这里建立商铺，其商铺能上百年、数百年保存下来的商户，都是经营时间长久，资本殷实的商家。如本地的“古镇何家”“北坪李家”“陈家山王三少爷家”“麦积崖阮家”等，都是本地著名的商家“帮户”，也一时是这条街道上的大拿。直到晚近，年纪较大的人还能记得和叫上他们的名字。

（三）城隍庙

街亭民间信仰中，有一座城隍庙，就建在今街亭村东的观龙山上。山的顶部是崇奉道教的杏林观，中部是崇福寺，前院为城隍庙。应当说，这里是历代街亭人的精神家园。

城隍信仰起源很古，这里暂不探讨。专说街亭人信奉的城隍爷纪信，它也是有来头的。据史书记载，秦末楚汉战争中，刘邦一时不抵项羽，躲在荥阳县城（治今河南荥阳市东北），项羽追来，包围了荥阳城，情急之下，汉将纪信请求冒充汉王刘邦降楚，夜率女子"被甲二千人"，从城东门出，以吸引楚军；刘邦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逃往成皋（治今河南荥阳市西北）。项王被骗以后，"烧杀纪信"[18]。刘邦为了报答纪信的救命之恩，建汉以后为其建祠，用作祭祀，后来许多地方包括西北的天水等州县都奉纪信为城隍。这是街亭城隍的来历。

然而从明朝以后，城隍之祭列入国家祀典，县以下是没有城隍庙的。

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朱元璋下旨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封南京、北京、开封府、临濠府（治今安徽凤阳县）、太平府，和州，滁州的城隍为王[19]，"余在各府州县者，府为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秩正二品；州为鉴察司民城隍灵佑侯，秩三品；县为鉴察司民城隍显佑伯，秩四品"。并颁布了"章服"（法定的服装）、"制文"（法定的祭文），有关部门职官都要按规定塑像、致祭[20]。明太祖洪武六年三月，朱元璋说："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21]意思是说，我封立城隍神，目的是要人们知道有所畏惧，人有畏惧之心，就不敢胡作妄为了。看来，他立城隍是服务于社会治理的。清承明制，同样把城隍列入祀典。新官上任前，都要先到城隍庙祭拜，才敢进入公堂。对于人民群众，城隍爷主管富贵、寿夭、祸福，因此同样崇拜有加。

话又说回来，城隍庙一般建在县级以上城区，乡村中的城隍不在国家祀典之列，因此尽管始建于清仁宗嘉庆（1796~1820年）时期的这座城隍庙，建有大殿、拜殿和抱厦。正殿饰有龙吻脊兽，麒麟宝瓶，相当豪华，但县太爷是不来例行祭祀的。

（四）山陕会馆

会馆是商人集会、议事的地方，一般建在商人较多的县城以上地方。街亭作为一个乡村集镇，有山西、陕西两省商人联合建置的会馆，说明这里曾云集了至少两省得外商，本省商客的繁多就可以想见了。

据现存于会馆的石碑可知，会馆内塑有关帝、火神、水神等像。关帝是财神之一，中国北方人信仰关财神相当普遍，这里也不例外。商人期望通过财神信仰，使自己财源旺盛，生意兴隆，赚很多钱，因此非常虔诚。火神、水神信仰，主要是希望神灵保佑不要发生火、水灾害，生活安全。会馆内有几块石碑存留至今。现存于街亭崇福寺的《陕西客商重修会馆碑记》记载“建自康熙甲申岁，依北向南，其中庙貌巍峨，古树峥嵘”，为“一境之大观也”。这段话证明，山陕会馆早在清圣祖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岁（1704 年）就创立了。当时的设计布局，就已经是庙中设馆，馆在庙中。庙貌巍峨，古树峥嵘，为境内之一美景。会馆的组织、建设及塑像等情况，我们还可以从文字保存较完整的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重修会馆山西碑》窥见一些。节录如下：

街亭乾位建关帝庙内山陕会馆，方余作商于兹，其庙貌巍峨堪览也，松槐之葱蔚渐浓也，迨历有年所，不免风雨剥落，况乎鼩鼱栖栋（鼩鼠和鼱鼠在栋梁上栖息），难伸俎豆之仪，霜露沾裳，莫展椒醑（以椒浸制的芳烈之酒）之献。今于乾隆己丑（1769 年）春，阖会公议，为重新之举，商于陕西会中，亦皆欣然，所谓一倡而百和也。因大兴鸠工，各随善念，共捐资壹佰柒拾两，共董其事。不数月而坠者举，废者兴。而且竣宇雕墙，自大殿、卷棚以及钟鼓、戏楼，大小皆成完屋。戏楼之下有中门，原旧低小，今则易而高大。经始于仲春，告竣于季夏，山陕各有碑志焉。戏楼东厢，创建廊房六间。时将勒石，首事者嘱余为记。余不敏，固辞。佥曰记事耳焉，用□为，余诺而为斯记。平阳府襄陵县后学 刘枝生熏沐撰并书后学曹克篆额[②]。

从上碑文可知，其一，山陕会馆中的山西会众和陕西会众是分开的商会。从道光十三年《重修会馆韩城县碑记》分析，即同是山西会众，也还有韩城和其他府县的区别。可见街亭的山陕会馆是山西、陕西在这里经商人员合伙建立，商会分开的联合体，没有统一的组织。其二，馆内建筑，有关帝、火神、水神等神庙，有戏楼、钟鼓楼、卷棚、厢房等。其三，神像以关帝为主，所以上引碑文开头就说“关帝庙内山陕会馆”，意为山陕

会馆建在关帝庙内。其四，在一个乡间商埠能聚集数省商人成立会馆，证明这里当时的商业一定相当繁荣。

（五）民居院落

街亭现存古民居院落数十座，有的临街是铺面，后头是院子。而多数院子都在街道延伸的巷道里。曲径紫藤，槐柳掩映，高门石阶，栉比鳞次。院内房屋有的是土木结构，有的是土坯砌墙的楼房，上层做成板屋，也有的是砖木结构的堂屋，砌脊瓦兽，雕门镂窗，丹垩绘彩，饰以铜铁，建筑相当豪华。有报道，东街 8 号王家院的建筑情况是：

（院）距文昌阁 55 米，从大街至院 36 米，该院前街有土木楼，后院垂花门精美无比……该院有三面古建，均为三间硬山顶，东房两坡水，开间为 2.9 × 3 × 0.8 米，进深 4.9 米，廊宽 2.7 米，廊台高 0.51 米，踏步三级，西为倒座及南房均为一坡水，起架平板枋下 3.04 米，南厦房开间 2.75 × 3 米，起架 2.55 米，进深 2.61 × 3.9 米，均为清代建筑，大耍头多为一朵云，平板房间雕花古朴，形式各异。其厅柱围 2.65 厘米，高 8 米，柱围 1.1 米，四扇直板门，平板枋上为莲花座墩，大耍头一朵云，补作铺间特薄，小耍头三朵云，前檐有双钩雕版，斗低，雀替为透花变形龙纹，斗拱升双叠，下层梅菊牡丹等四季花。倒座三间，8.7 米，柱围 0.94 米，廊宽 2.25 米，高 0.4 米。厢房基 0.23 米，廊宽 2.2 米，长 3.2 米。厦房开间 2.7 × 3 米，起架 2.55 米，进深 2.61 × 3.9 米，此院另一面古建已毁，整个院[89]。

据统计，街亭古镇保留下来的古民居共有 254 处，古树 12 株，明清古井 6 眼。在一个乡村古镇，能保留下来这样多古色古香的明、清、民国时期的院落实属不易。

室内陈设，木质桌椅、铜制香炉、瓷瓶之类的传统家具、饰件是少不了的。而且几乎家家户户都挂字画。明清时期街亭出过一些进士、举人，有许多生员、贡生、读书人，在他们的带动下文化氛围相当浓厚，反映在民居院落上，楹联、门额，院落布局装饰也充盈着浓浓的书香气。据说清后期左宗棠路过街亭，还亲笔为王家埝一位仙姓举人榜书了“文魁”二字的匾额，被看做极大的荣幸。这些都是极有价值和需要科学保护的文化

遗存。

(六)堡子

堡子是社会战乱的产物。明、清、民国时期,包括街亭在内的西北各地乡间,都选择险要的山头建筑堡子。兵来祸起,民众就扶老携幼地躲进堡子,保护生命安全。而今,这些堡子又都成了值得保护的历史遗迹。街亭古镇周围保留下来的堡子有好几座。雄踞观龙山顶的"平安堡"(又称"太平堡")就是其中的一座。此堡呈长方形,占地 20 余亩。其西有角墩两座,堡门一座,马面一座,其北另有马面两座。夯土筑起的城墙有三丈多高。城门用巨石、青砖砌成,上嵌"平安堡"三个砖雕大字,这在古堡建筑上已经是很豪华的了。据传平安堡始建于明代,后有维修。而今堡墙坍塌严重,仅存基本轮廓,唯堡门保存还算完好。

**注释:**

①天子之县,指天子畿内的地盘,不同于基层组织的县。

②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一〇。

③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九。

④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九。

⑤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九。

⑥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一一。

⑦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一五。

⑧(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五七。(晋)孔晁注:《逸周书》卷五略同。

⑨《史记》卷五《秦本纪》。

⑩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 年第 2 期。

⑪薛方昱:《中国最早设置的邽、冀二县考》,《西北史地》1998 年第 1 期。

⑫(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卷三九。

⑬(清)费廷珍纂修:《直隶秦州新志》卷一一。

⑭(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明帝纪》。

⑮(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

⑯《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

⑰《天水日报》2010年12月19日第3版。

⑱《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另据乾隆《甘肃通志》卷三七记载:"汉纪信,成纪人。"关于纪信的籍贯,还有山西、四川等多种说法。

⑲封京都城隍为承天鉴国司民昇福明灵王,其在北京、开封府者封为承天鉴国司民显圣王,临濠府为承天鉴国司民贞佑王,太平府为承天鉴国司民英烈王,和州为承天鉴国司民灵护王,滁州为承天鉴国司民灵佑王,五府州皆正一品。余在各府州县者,府为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秩正二品;州为鉴察司民城隍灵佑侯,秩三品;县为鉴察司民城隍显佑伯,秩四品。

⑳《明太祖实录》卷三八,洪武二年正月丙申。

㉑《明太祖实录》卷八〇,洪武六年三月癸卯。

㉒汪明校注:《麦积区金石校注》,三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7页。本文略作笺注。

㉓《天水日报》2011年1月9日第3版。

作者:李清凌,1944年出生,男,甘肃甘谷人,西北师大文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北史研究所所长。

# 论河西地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张克非

河西地区，是西部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地理单元。作为历史上东西交通及经济、文化交流的要道，这里汇聚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繁荣做出过重要贡献，而且与国家西部版图的形成和领土统一、民族融合息息相关。但是，随着唐代以后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和中外海上贸易的兴起，河西地区及其重要性亦多被忽视。

晚清，河西的历史又开始受到重视。20 世纪 40 年代，陈寅恪先生对河西文化在隋唐制度形成中的贡献给予很高评价[①]。尚达先生在赴河西考察后所写《西征小记》中预言："河西一地，将来在经济上究能开发至何种程度，今日尚难预言。唯其在政治上以及经济上之地位，以之与汉、唐相较，初不因时代之迁移，而失去其重要，此则可以断言者也。"[②]秉承此传统，近些年来，河西历史研究继续为学术界所关注，许多研究论著分别涉及河西的民族迁徙、融合，汉代河西四郡的设置，河西各地的经济、军事和文化，丝绸之路的影响，河西的佛教及其艺术、石窟寺，河西的考古发现等，都为今人了解、认识和开发河西提供了史鉴。谷苞[③]、李并成[④]、王乃昂[⑤]等先生也曾分别就汉唐时期的河西或凉州等地的特点及地位等，进行过相对深入的探讨。

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 21 世纪繁荣、发展和复兴民族文化的需要出发，进一步深入认识、把握历史上河西地区的战略地位和特殊作用。

## 一、历史上河西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其演变

河西是中国西部较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曾经创造出颇具特色

的史前文明类型。早在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生存[6]。

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在河西地区都有遗存。稍后，河西出现了东起民乐、西至酒泉的四坝文化。该文化“内涵丰富，并有其独具的特征，明显地有别于甘青地区已知的史前文化遗存”[7]。有专家指出，“祁连山脉蕴藏着丰富的铜矿和有色金属矿藏，为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甘肃已发现的早期铜器达300余件，占全国出土的商代以前铜器总数的80%以上。”其中大部分又是出土于河西地区，表明河西是中国早期铜器冶炼、制造技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尤其是四坝文化遗址出土的砷铜冶炼技术及其铜器的特殊形制和风格，不仅表明它们已进入青铜时代，而且由于地处“东西交流的重要通道，故造成其铜器具有与中原青铜文化不同的特点”[8]。近来，也有中外学者提出，西北青铜冶炼技术的出现比中原早二三百年，受来自西亚、中亚地区青铜冶炼技术的影响，并随之继续东传，开启了华夏文化的青铜时代[9]。这也说明，早在史前时期，河西地区就已经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重要通道，这里的早期居民在青铜冶炼技术等方面，对中国青铜时代的出现和发展具有独特贡献。

再后来，还形成了分布于今民勤、金昌、永昌一带的沙井文化，已发现一定规模的土城堡，石器，骨器，铜制刀、斧、镞、铃、牌和铁铲、金耳环等金属器，以及形制独特的陶器等；其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西周至春秋晚期。有专家认为：“把沙井文化界定为河西走廊地区的本土文化是比较稳妥的。它与河西及河湟地区诸多古文化遗存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特别是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的联系较为密切。”[10]

战国以前，河西是羌戎等族活动的地区。战国、秦汉时期，乌孙、塞种、月氏、匈奴相继占据河西。史书记载，河西“为月氏国地，后为匈奴所据”[11]，“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12]。

汉代河西四郡的设置具有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有学者指出：这使

“河西成为‘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基地，加强了汉朝的防御能力，推动了西域各族与汉朝联合对抗匈奴”；通过连接中原、西域和葱岭以西三大农业区，“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条件，便利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河西走廊由游牧区向农业区的转变，“促进了该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13]。

此后直到隋唐时期，河西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都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其一，汉唐时期，河西一直作为拱卫秦陇、经营西域的战略枢纽而备受重视。

历史上，在北方草原兴起的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政权，一直是对华夏农耕文明及中央政权最大的外部威胁和竞争对手。中华帝国的崛起与兴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最终通过军事较量，相对有效地解除了对手的威胁。公元前 2 世纪，汉武帝改变已延续近百年的“和亲”政策，开始大规模出击匈奴，并相继设置河西四郡，使中央政府有效控制河西这一战略要地，起到了在南北方向“扼束羌戎……扼绝羌与匈奴相通之路，使不得解雠合约为中国患”[14]；以及在东西方向拱卫秦陇、联通西域的战略作用，从根本上扭转了汉王朝与匈奴政权及其游牧文化之间的力量对比，也为在东汉时期最终消除匈奴的威胁，并迫其西迁创造了关键性的条件。

隋唐时期在与突厥政权的军事较量中，继承了重视河西的传统战略。盛唐时代的出现，即与此有直接的关系。唐初，褚遂良曾上书唐太宗，认为“河西者，中国之心腹”[15]。太宗凭薛仁贵，得陇上地；虏李轨，得凉州；破吐谷浑、高昌，开四镇。玄宗继收黄河积石、宛秀等军，中国无斥候警者几四十年。轮台、伊吾屯田，禾菽弥望。开远门揭候署曰：“‘西极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无万里行也。”[16] 经过一百多年的经营，天宝初年，“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这也包括河西“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17]。唐开元年间始设十节度使，设于凉州的河西节度使、设于鄯州（今青海乐都）的陇右节度

使各统兵七万余人，仅次于设于幽州的范阳节度使；主要防范北边的突厥和南边的吐蕃[18]。

“安史之乱”发生后，河西驻军东调平叛。“自乾元以后，河西军镇多为吐蕃所陷，而安西、北庭犹为唐守，贞元中始陷于吐蕃，自是陇坂以西皆为异境。畿辅震惊，烽火时至，盖河西强兵足食之本也”[19]。“吐蕃甚至突入京城长安，迫使代宗皇帝东幸陕州。……至此，吐蕃成了唐朝最大的外患。”[20]

汉唐历史证明，中央政府只要能够有效掌控河西，就犹如伸出了有力的臂膀，获得了在军事上有效抵御、遏制来自北方和西部的游牧民族及其政权，解除其进攻威胁的重要条件和机遇。所以，能否有效控制河西，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古代中央王朝在与匈奴、突厥、吐蕃等诸多政权较量中的安危兴衰。

其二，河西历来是众多民族和东西方多种文化融合的舞台，也是孕育、形成许多过渡形态新文化的摇篮，对促进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河西在“海通以前两千年来，中国与外国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之交光互影，几无不取道于此”[21]。这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主要通道，具有连接内地与新疆，沟通欧亚大陆经济、文化的重要作用，东西方不同族人的对向迁徙，东亚农耕文明与中亚游牧文明的互动、融合，大批重要物种、技术、产品的相互传播，都要经过河西或与这里有关。季羡林先生指出：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22]。来自中原、西域及中亚西亚、欧洲众多地区、民族的各种文化元素和形式，不仅最集中地汇聚于河西，而且往往先在这里相互融合、调适和积淀后，再以新的形态东传内地、或西输域外，极大地丰富着汉、唐等时期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形成了吸收、融合多种文化的内在张力，给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增添了绚丽色彩和鲜活的生命力；也给西方文化注入了许多东方元素。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经由河西走廊源源不断传入的多种物质、精神文化，

以及它们在河西走廊相互融汇、适应后所形成的许多新文化元素的注入，宋代之前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绝不会如此丰富多彩、恢弘壮丽。

如历史上许多从西域等处传入中原的植物，像小麦、葡萄、棉花等，最初多曾在河西栽培、种植，相对适应并取得栽培经验后，再渐次东传。来自印度的佛教、西域的音乐歌舞等，也同样经历了先在河西的调适和变化，尔后才逐渐进入内地并广泛传播的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杂糅、吸收了许多河西特有的民族、文化因素及其影响。至今河西走廊自西而东所保留的不同时期众多佛教石窟及其形制、造像、雕塑、壁画等，就十分生动地体现了佛教自印度东传过程中，在河西沿途所发生的奇妙变异。这一切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雕塑和文献中就有集中、生动的反映。有学者强调，古代“河西是中原文化吸收并改造外来文化的第一站，也是最重要的一站”[28]。

其三，河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的战乱动荡中，发挥了保存、延续华夏文明的重要作用，并孕育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文化。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在西晋永嘉之乱后，“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29]。由此一脉相续，也造就了河西文化对中原文化高度的认同、归属感。

汉、唐时期都曾在开疆拓土、向西发展方面颇有建树，培育出中国古代自强不息、雄健尚武、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民族向心力。尤其是在经营河西、西域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和精神，就是最有代表性的，成为传统爱国主义的典型象征，深深地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千百年来，凡是稍涉中国古代史书、诗词的人，都不会忘记苏武、张骞、霍去病、李广、班超等许多出生入死、建功边塞的英雄；不会忘记鸠摩罗什、法显、玄奘等弘扬佛法、万里壮游的高僧大德；还有那些以大漠边关、金戈铁马、刁斗残月等为主要符号，以苍凉、雄浑、悲壮为基调的边塞诗歌……这些特有的文化元素，不仅作为华夏文明中极

富光彩的部分，鼓舞、激励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至今仍为现代人“不能承受之轻”的生命、生活，增添着意义和凝重。

其四，河西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同样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优势，曾经是最为富庶、发达的地区之一。

在汉唐经营河西过程中，中央政府都非常重视控制、开发河西，通过移民、屯垦和兴修水利、发展商业、保护交通等方式，将内地的农耕技术引入该内陆干旱地区，因地制宜创立了与内地迥然不同的绿洲灌溉农业、完善的水利灌溉系统及管理体系，保持了不亚于内地的粮食亩产量；不仅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也为进一步经营西域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

史书记载，汉代河西“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粟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25]。东汉初年的河西“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26]。

李并成先生根据敦煌遗书考证出，唐代敦煌地区曾开浚有大小灌溉渠道百余条，形成了完整的灌溉系统，浇灌大片良田。“其工程建设的规模之宏大，渠道堰坝的配套之完备，灌水配水的制度之严密，实在令人赞叹”。当时，河西其他地方的水利设施也同样完备。当时河西军屯、民营等各种形式的耕地面积约合今三百二三十万亩，户均 70 亩左右；粮食总产量估计可达 45400 万斤。当地农民每年上缴的仓储粮户均达 29.01 石，已成为“国家所依赖的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27]。另据杜佑《通典》记载，天宝八年（749 年），全国和籴仓储粮总数 1139530 石，其中河西即多达 371750 石，占到 32.6%[28]。时人云：开元时“西有甘、凉六府之饶，东有两河之赋”[29]。

正是以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和富庶的地方经济为前提，才为河西繁荣的商业贸易、丝绸之路上众多的商旅和驻军，提供了充足的供应及马匹等交通工具，确保了该地区影响全局的战略地位和当时凉州、张掖、

酒泉、敦煌成为国际化都市的可能，也为河西文化的兴盛创造了相对坚实的物质基础。实现了河西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有机结合和同步发展。河西在历史上形成的这种复合型经营模式和开发经验，不仅保证了当时这些地方不同民族群众的丰裕及和谐，也为河西未来的发展，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

因地制宜，耕牧结合，胡汉相融，注重商贸、交通和军事——古代河西区域社会模式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学者拉铁摩尔认为，包括河西在内的次绿洲地区，是历史上汉族农业文明与游牧民族草原文明之间的缓冲和边缘地带。“在边缘环境中形成的边缘团体，不但能够保存某些不合规范的东西，而且还能将其发展成一个新规范。”[30]这对欧亚内陆文明的发展也同样具有重要贡献。

河西地区唐代中后期逐渐为吐蕃所占。宋代又为西夏所占。“元置行省于甘肃，而西域诸国悉为附庸。”“明初冯胜出兰州，略甘、肃……抵瓜、沙州，分布戍守，扼塞关隘而还。永乐二年建哈密等卫，领袖诸番，藩篱内地。成化以后，哈密为吐鲁番残破，嘉靖中徙其部落于肃州近境，而弃其地于吐鲁番，自是西域隔绝，嘉峪以西声教不至矣。”[31]

清雍正三年（1725 年），裁行都指挥使司及诸卫所，在河西改置甘州、凉州，升肃州为直隶州。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置安西府；同时，清军相继平定准噶尔部和南疆。二十九年，“裁甘肃巡抚，以陕甘总督治兰州，行巡抚事。三十八年，置镇西府于巴里坤、迪化直隶州于乌鲁木齐”[32]。这些措施不仅加强了对河西的管辖和建设，而且将北疆东部农耕地区都划归陕甘总督统一管辖。这对于清政府恢复汉唐时期中国西部疆域，有效统辖新疆提供了重要保证。

同治元年（1862 年），陕甘回民起义，包括河西在内的整个甘肃陷入战乱。两年后，新疆各地也出现反清起义。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趁乱入侵，控制南疆和北疆东部；沙俄也出兵强占伊犁。同治五年（1866 年），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经过近六年的努力，逐渐平定甘肃，恢复对河西的控制；并采取招抚流民等一系列善后措施，尽快恢复河西地区

的农业生产，为出兵新疆做准备。光绪元年（1875 年），清廷又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左宗棠将其大营迁往肃州（今酒泉），指挥所部出河西走廊进军新疆，经过两年激战即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大部分地区。

诚如清代学者顾祖禹所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33]。秦陇、河西、新疆，三者密不可分，共同构建起中国西部疆域连接一体和不同民族之间沟通融合的基本格局。正可谓河西盛则秦陇安、新疆稳。能否控制、开发河西，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疆的安危治乱；也成为衡量古代中央政权兴衰强弱的重要标志。因此，汉代以后，“河西四郡虽间有短时期沦于异族，不旋踵而仍归于中国，此盖非偶然也”[34]。

## 二、20世纪河西地区的重振和崛起

明清时期，河西地区虽无复昔日的繁华，但它那连接内地和新疆、国外的重要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资源禀赋却是无法改变的。20 世纪初，河西上万枚汉代简牍和敦煌藏经洞数万件珍贵文献的再见天日，不仅作为最有价值的重大学术和文化发现，改写了中国的学术史，导致了简牍学、敦煌学的出现；也使曾被忽视的河西重新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逐渐开始续写自身新的辉煌。

20 世纪 20、30 年代，由于军阀割据，国民政府难以有效地管控河西，也严重影响了对新疆的管辖，使新疆在强邻环伺下岌岌可危。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曾说：“人常云，不到西北，不知中国之大；可再加一句，不到西北，亦不知中国之危。”蒋介石则将新疆与东北、外蒙一样视为外国占领区：“新疆已成为东北，当忍之。”[35]为了尽快恢复对新疆的有效控制，国民政府开始重视并直接治理甘肃。

随着抗战的爆发，河西走廊的重要性再次表现出来。1938 年初开通、贯穿河西的兰新公路，成为当时连接苏联、中亚国际交通线的必经路段。仅 1937 年秋至次年夏，就有可装备陆军 20 个师的苏联军火、航空器材、汽车及零配件，通过河西运往抗日前线。其中有军用飞机 297

架、各式火炮 290 门、坦克 87 辆、汽车 400 辆，以及各类配件和大量弹药，总价值近 5 亿美元[36]。这是抗战初期中国得到的最为重要的外援，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军队的对日作战。

抗战期间，由于日寇的封锁，国外石油制品的进口几乎断绝。为保证抗战期间军需民用油料的供给，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全力开发玉门油矿，成立了由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孙越崎为总经理，严爽、孙健初为地质工程师的甘肃油矿筹备处。他们克服各种困难，于 1938 年开始在戈壁滩上勘探、寻找石油。1939 年第一口钻井出油。1941 年 3 月，成立甘肃油矿局。“惟国外选购之炼油器材，因太平洋战争突起，散失香港、仰光等地，乃尽力利用国内器材，自建炼炉，提炼各种油品。”到 1945 年，玉门油矿共钻井 26 口，生产原油 7866.7 万加仑、汽油 1303.35 万加仑、煤油 511.6 万加仑、柴油 71.7 万加仑。这些油料“广销于西北各省，并远及蓉、渝一带”[37]。抗战期间，大后方共生产液体燃料 3625 万加仑，其中玉门油矿的产量就超过 55%，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无法替代的贡献。从 1938 年至 1944 年间，资源委员会共向玉门油矿投资 9.3 亿元，占同期投资总额的 15%，使之成为抗战期间国家投资最多的企业。1938 到 1949 年，其原油产量占全国同期石油总产量的 90%以上，约占旧中国石油开发 45 年间总产量的 70%以上。新中国“一五”期间，玉门油矿的石油产量仍占到全国的 80%以上[38]。真正成为当时中国石油工业最为重要的发源地。

20 世纪 40 年代初，中央和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强河西地区的经济建设。1941 年，中国银行与甘肃省政府按七三比例，共同投资建立甘肃水利林牧公司，聘请专家成立水利勘测总队[39]。自 1942 年起，行政院每年拨专款 1000 万元支持河西水利建设[40]。1943 年 6 月，正式开工兴建酒泉鸳鸯池水库。1944 年，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确定“开发河西农田水利为国家事业”[41]。1947 年 7 月，大坝高 30 米、长 260 米，设计库容 1700 万立方米的鸳鸯池水库竣工[42]。在当时有“全国第一水利工程”美誉，成为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43]。

在大力开发河西的同时，国民政府派遣中央军进驻河西，取代以往长期驻扎河西的青马部队，进一步将河西作为国家出兵和管控新疆的前哨基地。这对盘踞新疆的盛世才造成强大压力。1942 年，负责甘肃军政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多次从兰州飞抵迪化（今乌鲁木齐），促使盛世才归顺中央政府。1943 年秋，朱绍良在武威组建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后前移至酒泉。次年 3 月，其下属部队进驻哈密等地。国民政府逐步完成从政治、军事、金融等方面对新疆的控制。9 月，迫使盛世才离新，结束其在新疆长达 12 年的独裁统治[64]。蒋介石曾在 1942 年 12 月 31 日所做的一年总反省中认为，新疆盛世才于 7 月公开声明反正、河西走廊马步青军队撤回青海，“兰州以西直达伊犁直径三千公里之领土（古代欧亚主要交通路线所经过之地区）全部收复，此为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其面积实倍于东北三省也”[65]。

1949 年 9 月 25 日，陶峙岳将军率领国民党驻疆部队和平起义。28 日，在彭德怀、王震指挥下，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二兵团从酒泉出发，长驱直入进驻新疆。

20 世纪后半期，巨大的资源优势及内在生机，造成河西地区新的辉煌。

玉门油矿作为全国首个国有大型油矿，培养了孙健初等许多优秀技术、管理人员，也培养出像“铁人”王进喜那样的石油工人；成为新中国石化工业的摇篮。在五六十年代，可以说那里有石油，那里就有玉门人。正是以玉门油矿的原油资源为依托，“一五” 期间国家才将兰州定位为重要的石油化工基地，投资兴建了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兰州炼油厂等大型石化企业。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在河西相继发现了国家急需的铀矿、镍矿，四〇四厂、镍都金昌、酒钢和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建立，分别为新中国的核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航天工业的起步、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河西、甘肃的经济结构，改变了河西在国内外的传统形象及其在西部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同时也构建起河西

新的先进文化和传统。

创立于1944年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84年改为敦煌研究院。通过以常书鸿为代表的几代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不仅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及合理开发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独有的敦煌精神和学术领域；而且汇聚了大批人才，在相关专业领域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下，始建于公元366年的敦煌莫高窟这一人类伟大的艺术宝库，在国内外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敬仰。许多国外参观者由衷地赞叹道："看了敦煌莫高窟，就相当于看到了全世界的古代文明。""它是世界现存佛教艺术最伟大的宝库。"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在1991年颁发"世界文化遗产"证书。国内外众多作家、艺术家纷纷以莫高窟和敦煌的历史为素材，创作出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小说、戏剧、歌舞、音乐及影视作品《丝路花雨》《大梦敦煌》入选中国经典舞剧，在国内外长演不衰。现在，敦煌不仅是河西的明珠、甘肃的"名片"、古代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象征，也是全人类的艺术宝库和无可替代的文化、旅游资源。

近些年来，河西地区享誉世界、受到广泛重视的文化资源，除了博大精深的古代简牍文化、敦煌文化，还有以玉门关、嘉峪关等为代表的古代长城文化，以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为代表的汉代文化，自西往东、连绵不断的佛教文化，被选作中国邮政标志的酒泉魏晋墓出土砖画及其所代表的古代墓葬文化，以黑水城和西夏文碑为代表的西夏文化，以红军西路军血战河西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等等。它们既是以往河西灿烂文化的宝贵遗存和实物见证，也给今人留下了无比丰富、可资传承和开发利用的众多历史遗产、文化财富。

总之，河西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及其在近现代的复兴，充分证实了该地区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独特贡献，浓缩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篇章和精神财富，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曲折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系统、深入地认识和继承、保护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不仅对今天更好地开发、建设河西，具有重要的启示和

借鉴价值;而且有利于探索特色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社会文化普遍性需求的有机融合,积极促进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繁荣和未来发展。

**注释:**

①㉞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2,46~47页。

②㉑㉞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328、329页。

③谷苞:《论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意义》,《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第29~37页。

④㉗李并成:《隋唐时期河西走廊的区位特点与开发》,李孝聪:《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83、88、91、92页。

⑤王乃昂、蔡为民:《论丝路重镇凉州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4期,第22~33页。

⑥祝中熹著:《甘肃通史·先秦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⑦⑪⑩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214~215,222页。

⑧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第75、83页。

⑨刘学堂:《拓宽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视野》《光明日报》2012年2月20日。

⑪⑭⑲㉛㉝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三,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970,2971,2972,2973页。

⑫㉕班固:《汉书》卷二八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4~1645页。

⑬汪受宽:《甘肃通史·秦汉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184页。

⑮⑰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卷二一六,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78、6919、6895页。

⑯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一六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07页。

⑱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 354 页。

⑳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 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213~214 页。

㉒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红旗》1986 年第 3 期,第 32 页。

㉓吴廷桢、郭厚安:《河西开发研究(古代卷)》,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48 页。

㉖范晔:《后汉书》卷二三,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799 页。

㉘杜佑:《通典》卷一二,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291 页。

㉙沈亚之:《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全唐文》卷七三四,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7578 页。

㉚[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52 页。

㉜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六四,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2109 页。

㉟转引自王建朗的《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晋阳学刊》2001 年版,第 95、102 页。

㊱㊳宋仲福、邓慧君《甘肃通史·中华民国卷》,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04,196~197 页。

㊲张丽门、何葆善:《十年来之石油事业》,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四》,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942 页。

㊴甘肃省政府等:《甘肃省政府、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发展甘肃省农田水利及林牧事业合作办法》,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编。《同人通讯》1942 年第 1 期。

㊵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业务志要》,《同人通讯》1943 年第 6 期。

㊶《中央宣布开发河西农田水利为国家事业》,《同人通讯》:1944 年第 26 期。

㊷顾淦臣:《鸳鸯池水库初建史》, 政协甘肃省金塔县委员会:《金塔文史资料(第 3 辑)》,1997 年版,第 109~117 页。

㊸史仲:《全国第一水利工程鸳鸯池落成记》,《联合画报》1947年第208期。

㊹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2~375页。

㊺李嘉谷:《蒋介石收服盛世才始末》,《百年潮》:2002年第2期,第60页。

作者:张克非,1956年出生,男,河南伊川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北宋时期中原通西域的几条道路的探索

陈守忠

唐代中叶以后，因藩镇割据、边疆地区的民族迁徙与动荡，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渐趋衰落，但并未被遮断。由于东西方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所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人总是想方设法要往来的，陇西道不通，可走别路，即使在五代大分裂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域各国，仍然是信使往还，后晋时高居诲使于阗即其例证。僧徒等往印度者，更是络绎不绝。

公元960年，宋朝建国。因开国皇帝赵匡胤对西北边疆少数民族的积极争取，丰州王承美、府州折御卿、夏州李彝兴等地方民族首领，皆被许之世袭为节度使，给以优厚的待遇，由是边疆安定。河西地区的瓜沙归义军曹氏、甘州回鹘、凉州吐蕃六谷族等均向宋朝靠拢，于是以灵州为枢纽，经河西走廊以达于阗，远至印度、大食的交通因而畅通。后因西夏的割据，屡经改道，总计北宋时期，先后有灵州道、夏州道、泾原道、青唐道四条道路通行。今按时间的顺序，分别探讨如下。

## 一、灵州道

灵州为唐代朔方重镇。安史之乱中肃宗以此为根据地收复两京，讨平叛乱。其后因吐蕃占领陇右、河西，中原通西域改走回鹘道。武宗会昌（841~846年）以后，回鹘、吐蕃王国相继瓦解，回鹘一部南下甘州，建立政权。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起义沙州（今敦煌），以瓜沙地区归唐，唐封之为归义军节度使。凉州则由吐蕃人团聚为六谷族，建立地方政权。唐末五代至宋初，传统的陇西道仍然被散处于秦陇的吐蕃各部族隔断，于是灵州遂成为中原连接河西的交通枢纽。

后晋天福四年(939年),谓义成节度使(治河南滑州)冯晖为朔方节度使,镇守灵州,于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卒,其子牙内都指挥使冯继业杀兄继勋,自知军府事[①]。宋初仍命其袭节。冯继业杀兄自立,还"抚士卒少恩,部下多携二",又"时出兵掠羌夷羊马,戎人不附",太祖选派考功郎中段思恭代之。思恭到任之后,力矫继业之失,对属下部族"悉心绥抚,夷落安静,周访利病,甚得民情"[②],安定了一方,保证了灵州至河西道路的畅通。我们先扼要叙述与西域交往的情况,然后详考灵州道的走向。

瓜沙归义军自后梁乾化四年(914年)曹议金取代张氏之后,子孙相继。建隆二年(961年)十一月,节度使曹元忠及子瓜州团练使曾延敬皆遣使修贡。三年正月,加元忠中书令,延敬瓜州防御使,赐名延恭。曹氏奉宋正朔。同光二年(924年)后唐册封甘州回鹘王仁美为英义可汗。至宋初,三传至景琼可汗,建隆二年遣使来贡方物。三年,阿都督等42人又来朝贡。乾德二年(964年)、三年连续遣使入贡,至开宝中和宋朝保持极友好关系。凉州吐蕃族自五代以来,或自置牧守,或请命于中朝。乾德二年十二月,当地首领数十人诣阙请帅,太祖以供备库使翰彦饶为河西节度使。按宋初凉州吐蕃六谷族先是折逋氏当权,后由潘罗支主其政,连年向宋朝进贡。由于河西地方三政权主动向宋朝靠拢,才保证了灵州道的畅通[③]。建于今新疆南部的于阗王国,建隆二年其王李圣天遣使来贡方物。乾德三年冬、四年,李圣天连年遣使来贡。圣天自称是唐朝宗室,和瓜沙曹氏联姻,曹议金的女儿嫁给他为皇后,他的女儿嫁给曹延禄为夫人。这样的婚姻关系加强了本地区的民族团结,均与中原通好,使臣来往频繁,在敦煌资料中留下了可贵的记载。敦煌壁画第98窟东壁北侧绘有与人等身的李圣天皇后供养像,61窟东壁北侧绘有于阗公主及家属供养像,均有题记,给我们留下了形象的史料。于阗国笃信佛教,与北印度加湿弥罗国有密切联系,所以当时西行求法的僧徒均绕道于阗。引起重大反响的是道园和尚之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乾德三年十一月戊午纪事:"先是,沙门道园出游西域二十余年,于是与于阗朝贡使者俱还,献贝叶经及舍利。癸亥,上召见之,问山川道路及风俗,一

一能记，上喜，赐以紫衣及金币。”由是触发了宋太祖招致大食等国朝贡的念头。他下诏征召僧徒往西域。据《宋史·天竺传》载：“（乾德）四年，僧行勤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书，许之。以其所历甘、沙、伊、肃等州，焉耆、龟兹、于阗、割禄等国，又历布路沙、加湿弥罗等国，并诏谕其国，令人引导之。”另据《大食传》，僧徒们还带着宋太祖赐大食国王书。据《佛祖统纪》僧行勤等此行确实是太祖先下诏，他们应诏而往的。与此事有关的还有一件珍贵史料，即编号为 S.0383 号的敦煌写卷《西天路竟》（竟即境），经黄盛璋氏研究④，该卷所记东京至西天（印度）路程，与所经历的甘、沙、肃等州至加湿弥罗等国的地境，与《宋史·天竺传》符合，肯定为僧行勤等一行中的僧徒回国后所记行程的一个传抄本。这些僧人不辱使命，以宋朝国书奉达大食，最远到了印度最南端的宝陀洛山，沟通了印度和宋朝的往来。开宝元年（968 年）十二月，大食贡使至，四年又至。开宝八年，东印度王子稂结说罗来朝。僧徒们分批回国，最早的在开宝四年，最晚的则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他们走的就是后晋时高居诲使于阗的灵州道，现根据《高居诲使于阗记》及《西天路竟》等，将该条道路具体走向考证如下⑤。

宋都开封，此路由开封起程，经洛阳、长安，然后沿泾河抵邠州；再循泾河支流环江北上，经宁州、庆州、马岭（今庆阳县马岭镇）、方渠（今环县曲子镇），以达环州（今环县），由环州再北上至洪德寨，循环江西支白马川（今名西川河），出青岗峡，经清远军（今环县甜水堡）、溥乐（在今宁夏甜水河与苦水河会合处）、耀德（今吴忠县南）等寨以达灵州，是为东段。据宋太宗淳化五年吏部尚书宋琪上书：“灵武路自通远军入青岗峡五百里，皆蕃部熟户。向来使人、商旅经由，并在部族安泊，所求贿遗无几，谓之‘打当’，亦如汉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⑥可见是通行无阻的。由灵州向西，可称西段。先渡过黄河，出贺兰山口（现在叫三关口），穿越腾格里沙漠。据《高居海使于阗记》：“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宿月氏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余里，至黑堡沙，沙尤广，遂登沙岭。”而《西天路竟》只记“灵州西行二

十日至甘州”。因此，论者谓出贺兰山口后穿过沙漠的此段路程“无可确考”。经我们调查民勤绿洲时所得，还是可以搞清楚的。出贺兰山口后不是向西行或向西南行，而是向西北，所经细腰沙、神点沙即今贺兰山外数十里间沙漠，北上至今阿拉善左旗即折向西北，经现在的锡林郭勒和屯盐池至四度井转向西南，到达今甘肃民勤县的五托井。《使于阗记》中所记“至三公沙……自此沙行四百里，至黑堡沙，沙尤广”的地段，按方位里数，就在四度井与五托井之间。由五托井再南行 100 余里，即达白亭海至白亭河（现在的石羊河），即民勤绿洲地区。近代民勤人跑生意走阿拉善左旗，远至银川，仍然走这条路。从地图上看，是向北绕了一个大弯子，实际上这是出贺兰山越腾格里沙漠最好走的一条路。渡白亭河以达凉州，即与传统的河西道合，无须详述。但西至沙州后，高居诲使于阗是出阳关，度胡卢碛，从西域南道以达于阗；而《西天路竟》记载的僧行勤等则不走此道，而是从沙州“西行三十里入鬼魅碛，行八日出碛至伊州”。即由敦煌县向正北方向走，鬼魅碛即现在穿越青墩峡以北的大沙碛，北上至现在的红柳河，由此偏西进入今新疆境，再向北达伊州，即今哈密。由伊州向西至高昌（今吐鲁番），是按唐代的北道走的，基本上就是现在由哈密通吐鲁番的公路线。路是人走出来的，现在的交通线是沿着旧路修成的。由高昌西去，经月氏（今焉耆）、龟兹、割鹿（即葛逻禄），南下至于阗，由于阗再北上至疏勒（今喀什市），转向西南，经现在的塔什库尔干，越过葱岭，进入加湿弥罗（今克什米尔），达印度。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 年），西夏李继迁大集蕃部，攻陷灵州。从此灵州道被隔绝。

**二、夏州道**

夏州道，北宋初期通行。要搞清这条道路，须先对夏州的历史变迁有个大致的了解。夏州城，即十六国赫连勃勃所建统万城。据《晋书·载记第三十》及《通鉴》的记载，赫连勃勃于晋安帝义熙九年（413 年）自称大夏天王，建号凤翔；发岭北夷、夏 10 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蒸土筑城，号曰“统万”，言其统领万众也。后为北魏所灭，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 年）于其地置夏州。唐灭东突厥后，在夏州、灵州南部（今内蒙古伊

盟南境)置鲁、丽、含、塞、伊、契等州以处突厥降户,号称为六胡州,后又合并为匡、长二州,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又改置为宥州。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宥州移治长泽县,于是在今鄂尔多斯市南境就有夏、宥两个大州。后党项族迁居其地。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其首领拓跋思恭助唐镇压黄巢起义,因功封定难节度使,赐姓李氏,许之世袭。宋初,李彝兴为节度使,建隆三年(962年)并遣使贡马300匹,太祖优礼答之,加封西平王,领有银、夏、绥、宥四州,为宋朝属下的地方政权,世袭如故。按:银州故址在今陕西榆林县榆林河(宋代称明堂川)与无定河交汇处的西岸;绥州即今陕西绥德县;夏州即统万城,据侯仁之先生考察,其故址即今陕西靖边县最北、无定河上游红柳河大转弯后向东15里处河床北岸的古城废城白城子;宥州城故址在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南部,地当夏州城址西南102里处的城川古城⑦。

宋初因与夏州李氏保持密切关系,王延德出使高昌,即走此道。高昌即西州回鹘,牙帐在今新疆吐鲁番境内,与中原王朝通好,建隆三年遣使阿道等来贡。乾德三年(965年),又遣僧法渊来贡,献佛牙、琉璃器、琥珀盏等。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其王始自称西州外甥师子王阿斯兰汗,遣都督麦索温来献。五月,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使高昌。……雍熙元年(984年)四月,王延德等还,叙其行程来献"⑧。其所记行程,即《使高昌记》。延德此行走夏州道。此道由宋朝都城开封出发,经洛阳、长安,由长安北上经延州至夏州,是为东段。据《长编》卷三五太宗淳化五年宋琪上书言边事中所讲:"从延州入平夏(即夏州,宋人又称夏台)有三路:(一)东北自丰林县芋子驿至延川县,接绥德入夏州界;(二)正北从金明县入蕃界,至芦关四五百里,方入平夏,是夏州南界;(三)西北历万安镇经永安城,出洪门,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西界。"与现在的地图对勘、宋琪所言东北路,是出延安后经四十里铺(宋丰林县城当在此),过甘谷驿、文安驿至延川,由延川北上经青涧、绥德以达银州,再循无定河西至夏州;正北路出延安经沿河湾(金明县址当在此附近)、安塞城至靖边城(旧名关路畔,宋芦关当在此),再直北即达夏州;

西北路出延安向西，过三川口至保安军（现志丹县），再向北越白于山达洪门（即夏人所建洪州，故址在今靖边县境内长城北红柳河与西湾河汇合处），再北上至宥州，向东北 120 里即达夏州。《使高昌记》只从夏州说起，未谈东段情况。延德等从延州至夏州，当走北路。

夏州以西，属关键性地段，因历史的变迁，现在这一带都成了蒙古语地名，承继下来的历史地名极少，很难一一查对。但有几个重要点是肯定的，根据这几个点是能勾画出夏州以西的道路的。据《使高昌记》，王延德等一行，“初自夏州历王亭镇，次历黄羊平，其地平而产黄羊。渡沙碛……凡二日至都罗罗族”。按：这是从夏州向北走，至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乌审旗渡沙碛的，此沙碛当然是毛乌素沙漠。不过宋时沙漠还没有向南移动到现在这么远。玉亭镇与黄羊平，依次在夏州与今乌审旗之间。渡沙碛后所历之都罗罗族住地，当在今鄂托克旗。“次历茅女喝子族，族临黄河，以羊皮为囊，吹气实之浮于水，或以橐驼牵木筏而渡。”渡黄河后即“行入六窠沙，沙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驼”。按：渡黄河后所行入之六窠沙，肯定是现在的乌兰布和沙漠，可知他们是从现在的乌海以北巴音木仁附近的旧磴口渡河的。“穿六窠沙，历楼子山，无居人。”“次历卧梁勃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鹘之地。”按其所行方向，穿越乌兰布和沙漠不是向西南的吉兰泰盐池的方向前进，而是向西偏北，傍阴山余脉前进，所历都督山，当为阴山余脉迭布斯格乌拉（山）。这一带原为回鹘之地。过都督山后，历经大虫太子族，达于越王子族、拽利王子族，“有合罗川，唐回鹘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汤泉”。据王明清《挥麈录》所载，于越王子族下有“九族，达靼中尤尊者”语。合罗川，当是现在阿拉善右旗境内巴丹吉林沙漠以北之大草原，并不是回鹘西迁甘州后所称的合罗川——现在张掖西北的黑河。因为王延德一行根本不走河西。川，不一定是一条河流，凡平原旷野皆可称为川，现在西北地区仍然是这样称谓的。这一带原为回鹘牧地，唐朝嫁给回鹘的公主在这里住过，至今仍然是湖泊井泉密布的水草牧场。不过牧主人早已换成蒙古族了。清代把这里称为北草地，有驿路直达新疆哈密。王延德一行过合罗川后，“次历

阿敦族，经骏马山望乡岭，岭上石龛有李陵题字处。次历格罗美源，西方百川所会，极望无际，鸥鹭鸟雁之类甚众”。按此西方百川所会之格罗美源，无疑是现额济纳旗，即历史上有名的居延海地区。“极望无际，鸥鹭鸟雁之类甚众”是纪实。有李陵题字处的马骏山，不是今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之马鬃山，而是居延海东北的某个山。过格罗美源，向西直达伊州，即现在新疆的哈密。伊州以西，历益都、纳职城，“城在大患鬼魅碛之东，南望玉门关甚近”。按益都、纳职城，当为今哈密以西之二堡、柳树泉等地。玉门关确在伊州正南方，但相距遥远，说“南望甚近”，不过是想象而已。大患鬼魅碛，即《西天路竟》中所称之鬼魅碛，就是现在敦煌县以北、哈密以西以南之大戈壁。这里戈壁呈黑色，常出现海市蜃楼等幻影，鬼魅碛由此而得名。过纳职城，“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风驿”，此鬼谷口，当在今哈密县七角井，这里是天山西端有名的风口，设避风驿，是待风止而后行。过避风驿凡八日至泽田寺（在今鄯善以西），高昌遣人迎使者，“次历地名宝庄（今鄯善），又历六种（当在高昌近郊）乃至高昌”，即今吐鲁番。高昌以西之路，就不必重述了。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继迁叛，此后和宋朝关系时断时续。淳化五年（994年），宋朝放弃夏州，迁其民于绥、银等州。夏州道被西夏隔绝。

### 三、泾原道

泾原道以唐代原州即宋代镇戎军为枢纽，东南至渭州（今平凉）、泾州以达内地，西北至凉州（今武威）以通西域。据《宋史·吐蕃传》：“开宝六年，凉州令步奏官僧吝毡声、逋胜拉鬬二人求通于泾州以申朝贡，诏泾州令牙将至凉州慰抚之。”这说明在太祖时，西凉府六谷族已有了不经过灵州而直通泾州的道路，但不知此道的详情。太宗至道初，以故原州平高县置镇戎军[9]，才明白了此道的路程。至道二年（996年），西夏李继迁邀击往灵州护送粮草的宋军，夺取刍粟40万。宋朝五路进讨，因诸将失期，无功而还（见《长编》卷三九、四〇纪事）。三年春，宋将李继隆请由古原州蔚茹河路往灵州输送粮草，“太宗许焉。遂率师以进，壁古原

州，令如京使胡守澄城之。是为镇戎军”（见《宋史·李继隆传》）。不久太宗死去，真宗即位，由镇戎军向灵州运粮事遂搁置不行，又弃镇戎军不守。咸平四年（1001年）李继迁围灵州，继隆弟“洛苑使李继和固请复城之。乃命版筑，即以继和知军事，兼渭、仪（今甘肃华亭县）都巡检使。张齐贤经略陕西，因访继和边事，继和上言：镇戎军为泾、原、仪、渭北面捍蔽，又为环、庆、原、渭、仪、秦熟户所依，正当回鹘、西凉六谷、咩逋、贱遇、马臧、梁家诸族之路”[30]。可见夏州、灵州二道被阻之后，宋朝通往河西的道路以镇戎军为枢纽。这条路，实际上是汉唐的丝绸古道之一。由镇戎军往内地，据李继和上言，有数道：“若自陇山南去，则由三白堡入仪州制胜关；自瓦亭路南去，则由弹筝峡入渭州安国镇；自青石岭东南去，则由小卢、大卢、潘谷入潘原县，若至潘原，西则入渭州，东则入泾州；若自青石岭东公主泉南去，则由东山寨故彭阳城西，并入原州。”按：由“陇山下南去”入仪州制胜关道，即由今固原南下，经泾源县（唐制胜关在此）至华亭的通道；“自瓦亭路南去”由弹筝峡入渭州道，即由今固原南下至瓦亭折向东南，循泾河河谷经蒿店、安国镇至平凉的大道，此为径原道的主干线；“自青石岭东南去”入潘原县路，由今固原南下至青石嘴折向东南，循泾水的两条支流大路河、小路河（即大卢、小卢）均可通至今平凉四十里铺即潘原县城，自此往西可至平凉，往东可至泾川；“自青石岭东公主泉南去”入原州的路，即由今青石嘴向东南循茹河河谷经彭阳、开边堡至镇原县城即宋代原州。三条路均以镇戎军为起点，而以自瓦亭至平凉、泾川的泾河大道为主要通道。

宋代的镇戎军城，即汉代安定郡治高平城、唐原州治平高城、今宁夏固原城。由此西通凉州，有古道可循。由镇戎军北走，经平夏城、西安州入会州，过黄河后经今景泰、古浪至西凉六谷族政权所在地凉州。据《长编》卷四九真宗咸平四年七月己亥纪事：“以会州刺史乩遇为保顺郎将，苏家族屈尾、白马族埋香、韦移族特都香并为安化郎将。”可知当时在会州（今靖远）境内的吐蕃诸部是归附宋朝的，由此过境的道路是畅通的。河西的西凉六谷族、甘州回鹘、瓜沙归义军以至高昌回鹘、于阗等国，在

灵州道、夏州道被阻绝之后，均由此道与中原保持联系。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西夏攻占西凉以后，此道被阻，宋朝通西域就只有青唐道了。

**四、青唐道**

青唐道，指经青唐地区以达西域的路线。唐末吐蕃王国瓦解，部族离散。宋初，在河湟地区团聚成以唃厮啰为首的地方政权，宋人称之为青唐羌。其所占地盘，据宋人李远《青唐录》[31]载，在“黄河之曲，直西成都数千里，占河、湟间二千余里”。

唃厮啰建立政权之日，正是西夏向河西侵逼之时。他联宋抗夏，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遣使入贡。宋朝回赐甚厚，并派侍禁杨承吉往青唐报聘。明道元年（1032年），仁宗授唃厮啰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32]。此后双方信使往还，于阗及以西诸国来宋朝贡使，均走青唐道。其东段即传统的陇西道，中段即汉代的湟中道，青唐城（今西宁市）以西可称为西海道，而以青唐城为枢纽。下面分段叙述。

宋朝建国之初，以秦州为西部重镇。自伏羌寨（今甘谷城）以西沿渭水过洮水直至青唐城，均有吐蕃部族分居。皇祐四年（1052年），宋朝力量伸展至古渭州，筑古渭寨。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大举攻宋。宋廷接连派使臣诏谕唃厮啰出兵，从侧背击元昊以分其势。康定元年（1040年）八月，“屯田员外郎刘涣出使邈川。……涣出古渭州，循末邦山（抹邦山）至河州国门寺，绝河逾廓州抵青唐城”[33]。这是第一次记载宋使所经行程，但只提到末邦山、河州、国门寺（即炳灵寺）等地名，而且由炳灵寺渡河是走鄯州（即邈川城），不会走廓州（青海尖札县北）。记载有误。至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宋将王韶开拓熙河，从其行军路线得悉这条路径的详细经过，是从古渭寨至渭源城，分两路：一路越鸟鼠山经庆平堡，循东峪沟到熙州；一路经竹牛岭（今五竹乡）循抹邦山，过会川城至熙州、过洮西则又合为一路，经康乐寨、当川堡、定羌城（今广河县城）到河州，由河州经炳灵寺渡河（渡口在寺东1里处，今没入水库），经今永靖的杨塔（有古城名宋家城）、川城、民和的古鄯至邈川，循湟水至青唐城，这是中段，即汉代所开湟中道。经调查：宋代康乐寨（今康乐北6

里处)出土大量汉瓦片,最早为汉城。汉大夏县在今广河西10华里大夏河西岸。枹罕古城在今临夏市西南40里的双城,出土有秦汉瓦片,证明《元和郡县志》河州枹罕县条所载"故罕羌侯邑,秦灭为县,后遂因之"的记载是可靠的。由今康乐、广河至临夏市,又由今永靖县经杨塔,川城直至乐都有一条经烽燧嫌线,每10里1烽墩,现均保存,为汉代军事设施,宋代青唐道是循汉代古道而行的。自河西走廊被西夏阻隔,青唐城及其西40里之林金城,就成为西来的贡使、商人往宋朝必经之中转枢纽。据《青唐录》:青唐城有"于阗、四统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自青唐西行四十里至林金城,城去青海"。《宋史·唃厮啰传》云:"厮啰居鄯州(即青唐城),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唃氏)以故富强。"又据《长编》卷一二七康定元年四月辛亥条:"以邈川首领唃厮啰子董毡为会州刺史。董毡方九岁,乔氏所生。乔氏……居历精城(另一处记载为林擒城),所部可六七万人,号令明肃,人惮服之。"按:林金城、临谷城、历精城为同名异译,即今西宁市西多巴镇。自此以西,则为漫长的西海道。

李远《青唐录》:"自青唐西行四十里至林金城,城去青海,善马三日可到。……海西皆平衍无垄断,其人逐善水草,以牧放射猎为生,多不粒食。至百铁堠,高丈余,羌云,此以识界。自铁堠西皆黄沙,无人居,西行逾两月,即入回纥、于阗界。"另据《长编》记载,元丰四年拂菻国(西亚地中海沿岸地)贡方物。其贡使尔厮都令厮孟判言其东来的行程是:"东至西大食,及于阗新福州,次至旧于阗,次至灼昌城,乃于阗界。次东至黄头回纥,又东至种温,又东至董毡所居。次至林金城,又东至青唐,乃至中国界。"[14]又元丰六年五月于阗贡使至,见于延和殿,神宗问其去国岁月及所经何国,对曰:去国四年,道途居其半,"经黄头回纥、草头达靼、董毡等国"[15]。按于阗国都在今新疆和田,灼昌城在今且末,黄头回纥、草头达靼地当今柴达木盆地及其以北,据此,我们可以勾画出西海道是从林金城出发,过日月山至青海湖南面的大草原(唐代称大非川),然后循昆仑山北麓、柴达木盆地南沿一直向西,至茫崖镇以西穿越阿尔金山至新疆若羌、且末以达于阗(于阗西古道无须重复)。

西海道当然不是宋代才开辟的。青海湖以西直至新疆南部，为古羌人居地，自西晋至唐初，由东北迁来的鲜卑族在这里建立了吐谷浑汗国，国土西极于阗。作为游牧民族，他们早就开通了此道。但作为官方通道，是唐代才开的。贞观八年吐谷浑连续寇凉州、鄯州，大掠而去。太宗决计用兵，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节制侯君集、李道宗等五总管之兵大举征讨。十二月，主力军由鄯州出发，经牛心堆（今西宁市南川河旁）、赤岭（日月山）、赤水源（今倒淌河上源）至大非川，然后分军为二：先锋将契苾何力、薛万均、薛万彻等穿过柴达木盆地南沿西追，至且末，“穷其西境”，至突伦碛（且末至于田之间的沙碛），袭破吐谷浑可汗伏允牙帐而还[10]。这就是西海道，是中央王朝的军力第一次穿越柴达木盆地直达新疆南境；另一路李道宗、侯君集以偏师由大非川向南，越汉哭山，经破逻真谷（今花石峡以南）过柏海（今鄂陵湖、札陵湖），至河源而还，这就是唐蕃古道（即河源道）。文成公主进藏过日月山走唐蕃古道，在贞观十五年正月，代表唐王朝持节护送她的正是李道宗。这里附带提及河源道，是因为它与西海道为唐朝政府同一年所开。

**注释：**

①《资治通鉴》卷二八二，后晋天福四年正月甲寅条、卷二九〇后周广顺二年五月己亥条。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〇，开宝二年正月己丑、八月己卯及九月庚戌条。

③关于河西三政权的始末，参看本书《八世纪后期至十一世纪前期河西历史述论》。

④黄盛璋：《西天路竟笺证》，兰州大学《敦煌学辑刊》总第6期；《敦煌写本〈西天路竟〉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1981年创刊号。

⑤《高居诲使于阗记》及《西天路竟》《佛祖统纪》等，笔者使用的本子是吴丰培的《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⑥《长编》卷三五，淳化五年正月宋琪上书言边事及《宋史·宋琪传》。

⑦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后收入其《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

⑧《宋史·高昌传》。

⑨据《元丰九域志》卷三,至道元年置镇戎军;《宋史·李继隆传》记此事于至道三年。

⑩《长编》卷五〇,真宗咸平四年十二月乙卯条。

⑪《说郛》卷三五,李远《青唐录》,商务印书馆一百卷本。

⑫《长编》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九月丙子、十二月丁亥纪事;卷一一〇明道元年八月辛酉纪事。

⑬《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八月癸卯条。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2。

⑭《长编》卷三一七,神宗元丰四年十月己未条。

⑮《长编》卷三三五,元丰六年五月丙子条,《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于阗》有相同的记载。

⑯《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八年、九年纪事。

作者:陈守忠,1921年出生,字子贞,号醒吾,男,甘肃通渭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 北宋御边政策调整略述

刘建丽

立国于中原的北宋王朝与辽、西夏鼎足而立，其边防线从北至西绵延千里。为巩固封建政权、维护统治秩序，北宋政府的御边政策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可分为初期（太祖、太宗、真宗时期）、中期（仁宗、英宗时期）、后期（神宗、哲宗、徽宗时期）三个阶段。本文试就北宋御边政策的变化及调整，作一分析探讨。

## 一、重北边轻西鄙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立即着手制定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采取“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策略。首先将契丹辽朝视为强敌。因此，在南向用兵，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对北方的强辽暂时采取和好之态。此时的辽朝因忙于内部事务，也愿与宋通好。所以宋太祖时期，北部边境基本保持安宁稳定。然而宋太祖赵匡胤始终念念不忘收复燕云地，曾多次“巡幸边陲，亲抚士卒”[①]，并不断颁发《幸河北诏》《幸边陲诏》《敕北边州军诏》，同时还在北部边境河朔之地，“岁屯重兵”[②]，对辽朝契丹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宋太宗赵炅即位。他继承其兄收复燕云的遗志，在次第平定了南方诸国及北汉后，即将矛头指向北方的辽朝。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六月，宋军欲伐辽取幽蓟。结果在高梁河之役中，遭到重创，全线溃败。雍熙三年（986年）正月，宋太宗又乘辽主年幼，母后专权之际，再次兵分三路北伐，兵力不下三十万[③]。战争失败，宋太宗锐气耗尽，“自是不敢北向”[④]。从此后，北宋对辽采取守势。于是，在河北中部西起顺安军（今河北高阳县西），东至泥姑寨海口（今天津塘沽附近）东西三百里，南北五七十里地区，“资其陂泽，筑隄贮水为屯田”[⑤]，设寨铺戍

守,阻止辽朝骑兵奔轶南下。而“顺安军以西,抵西山百里许,无水田处”[6],也“选兵戍之”。由此宋王朝将战略进攻改变为战略防御,重点防御北边强邻辽朝契丹。

宋王朝在制定“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策略时,却对陇山以西地区掉以轻心,没有作统一边疆的打算,正如宋人张方平所言:“太祖不勤远略。”[7]而宋太宗更是对西部党项、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漠然视之。当时党项对宋西北边境的威胁,远不如汉唐时期匈奴、突厥、吐蕃所造成的边患那么严重。宋朝一些臣僚对来自党项的威胁也认识不足,尤其对李继迁的不断骚扰,断言只不过“是怀念父祖旧地,别无他心”[8],认为“党项号为小蕃,非是劲敌,诚如鸡肋”[9]。

9世纪中期,吐蕃政权崩溃,迁徙到河西、陇右地区吐蕃族种分散,不相统一,已不能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发挥作用,宋初的统治者对他们也未放在心上。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当吐蕃诸族遣使入贡献马时,太宗表面上厚加抚慰,赐以束帛,但对臣僚却说:“吐蕃言语不通,衣服异制,朕以化外视之。自唐室以来,颇为边患,以国家兵力雄盛聊举偏师,便可驱逐数千里外。但念其种类蕃息,安土重迁,倘加攘却,必致杀戮,所以置于度外,存而勿论。”[10]足见宋太宗对吐蕃的兴起与发展缺乏应有的警惕。

宋真宗即位后,按照其父的既定方针,对西北地区仍是漫不经心,无意经理。主张“令屯兵于内地,且简其闲冗,转饷当逐减省”[11],目的在于“欲罢出兵,自固吾圉,非务攻略”[12]。太宗和真宗的上述言论便成了宋初统治者对西北少数民族歧视及漫不经心的态度,也是对西北地区无意经理的指导思想。

北宋王朝无意经理西北的政策与其对内政策的演变有着密切关系。以“陈桥兵变”立国的宋王朝,没有经过农民起义暴风骤雨的冲击,立国伊始,就面临尖锐的阶级矛盾。端拱二年(989年),宋太宗诏文武群臣言备边御戎之策时,知制诰田锡就提出:“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13]随着阶级矛盾的发展,淳化二年(991年),宋太宗向大臣们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

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14] 在这种守内虚外思想的指导下，必然把防范和镇压人民的反抗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这势必在军事防守上就会轻视西鄙。

**二、防御重心西移**

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 年）闰四月，辽军大举南征，兵临澶州（今河南濮阳县）城下。在军事形势对宋朝有利的情况下，辽宋双方最后达成和议，订立“澶渊之盟”，这是辽宋双方力量均衡的产物。“澶渊之盟”以后，“三边罢警，俱息于战争”[15]，正式形成辽宋南北对峙的局面，结束了双方长期的战争状况。宋朝北方边境“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16]。随着北方边境的安定，与辽友好往来，北宋王朝与契丹的矛盾也相对减轻。

党项攻占灵州（今宁夏吴忠县东北）以及元昊立国后，北宋王朝与党项间的关系渐趋恶化，宋夏之间的矛盾，始终处于主导与支配地位并影响和制约着其他诸多矛盾。北宋开始设防西方，防御重心由北边转向西北边陲，西北沿边防御逐渐出现局部优势。

灵州位于夏州西侧，倚负贺兰山，带引黄河，“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17]，是唐宋时期西北边疆的著名重镇。灵州的西面是中国古代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河西走廊，当时灵州地区散居着回鹘部落，灵州的西南又散居着吐蕃部落，因此，灵州便成为宋王朝、回鹘、党项、吐蕃各方势力争夺的战略要地。如果宋朝弃灵州，则等于撤去了一道屏障，并失去了军马的供给地。但是灵州地区经长期战争破坏，经济凋敝，粮饷给养不足，戍守十分艰难。党项首领李继迁，于真宗咸平五年（1002 年）三月，攻占灵州。从此，宋朝西部边疆失去藩篱，不得不对党项刮目相看。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 年），元昊建立西夏国，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18]。与宋、辽形成鼎足之势，与宋王朝矛盾日益尖锐激烈。西北沿边成为宋王朝重点防守地区，御夏成为赵宋王朝的头等大事。

元昊在与宋王朝相邻的河东、陕西沿边驻扎十万大军。面对这种严峻的军事形势，北宋王朝的统兵体制及部署有所变化。庆历元年（1041年），“分陕西沿边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19]以便于各路军队相互配合、策应，更好地抵御西夏党项的进攻。庆历年间，由于宋夏战争的需要，北宋军队数量急骤膨胀，兵额总数为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20]，部署在“鄜延路屯兵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二万七千”[21]，仅在陕西沿边正规军禁军兵力二十一万五千。

西部沿边地区除屯驻禁军外，还有厢军、乡兵、番兵、弓箭手等。厢兵是“诸州之镇兵”，是地方军兼杂役军。厢兵数额庞大，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7年）为四十三万八千人，庆历年间（1041～1048年）为四十九万九千人[22]。

乡兵是“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23]。康定初，元昊起兵反宋，北宋政府在河东添籍强壮“十四万四千，皆以时训练”[24]，后又因“西师屡衄，正兵不足”，就籍陕西之民，“三丁选一以为乡弓手”[25]。并在陕西点籍义勇，“得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26]。治平末，河东七州军弓箭手总数为七千五百人，陕西十州军并砦户总数为四万六千三百人[27]。番兵是乡兵的一种，是西北沿边地区少数民族熟户蕃部丁壮组成的军队，具有地域性与民族性。番兵主要分布在陕西的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以及河东的石、隰、麟、府诸州。庆历年间，泾原路熟户番兵一百七十七族，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一人，马一千五百匹；秦凤路一百四十七族，三万五千六百人，马二万二千四百七十匹；环庆路二百四十七族，四万四千人，马四千三百九十匹；鄜延路九大族一万二千七百人，马一千四百九十匹[28]。到英宗治平年间，陕西四路有番兵十万零六千五百二十六人，再加上弓箭手数，共计十六万多人。番兵成为北宋西北地区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此时的宋政府对建国初期的西夏军事力量并没有足够的重视，自恃为大国又有大量重兵屯聚，在战术上采取进攻与速战速决的策略，企图轻而易举地剿灭西夏，结果导致了军事上的惨败。

从西夏开运元年(1034 年)到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 年),元昊多次进攻,但均被宋军击退。经过几年试探性的进攻,元昊摸清了宋朝沿边各地的防御状况,横山以东以南,宋朝河东路、陕西路一带"备御完固","环庆路边砦排密"[29]。而鄜延路的边境"地阔而砦疏,近者百里,远者二百里,士兵寡弱,又无宿将为用"[30]。因此延州(今陕西延安市)便成为元昊攻宋的突破口。鄜延环庆路副都部署刘平却认为陕西四路兵马及蕃汉弓箭手、步骑可"得精兵二十万"[31],是元昊军队的三倍多,"不出一月,可坐致山界洪、宥等州"[32]。正是这种盲目轻敌与冒进,造成惨败。康定元年(1040 年)正月,西夏元昊声称攻延州,在三川口(今陕西志丹县南)设伏,宋全军覆没,西夏军队控制了横山以南至延州一带地区。

三川口战败后,宋政府调整防务,以范仲淹知延州。范仲淹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使鄜延路防线基本稳固下来。庆历元年(1041 年)春,西夏又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元昊亲率十万大军向渭州(今甘肃平凉市)推进。宋军骄傲轻敌,盲动冒进,士卒死伤万人,数十名大将阵亡。从此,宋政府改变策略,对西夏党项采取持重守御之策。

旷日持久的战争给宋夏双方都带来了极大损失,两国的统治者都产生了尽快结束战争的愿望。当此之时,宋、辽、夏三国关系出现新的变化,辽夏交恶,联盟破裂,元昊恐两面受敌,愿与宋息兵议和。庆历四年(1044 年),宋夏双方签订了合约,史称"庆历和议"。自 1040 年至 1042 年,三年之间,元昊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均以掠夺财富为目的,每次虽都获得胜利,劫掠后匆匆退走,但却无法占领北宋大片领土,因宋朝已对西北沿边进行重点防守,精兵强将云集西北,各路屯驻重兵,"以牵制其势也"[33],西北沿边防御渐现局部优势。

**三、以攻为守,兼制西夏**

宋夏之争激化时,散处于河陇地区的吐蕃部族加入到辽、夏与宋王朝的角逐之中,宋朝君臣意识到其举足轻重的作用,先是采用羁縻怀柔政策,进而对吐蕃取笼络联合,不断加封部族首领,经济上进行援助等手段结其欢心,以攻西夏。这就是宋神宗即位前,北宋对吐蕃的基本政

策。这种政策在当时确曾获得收效，凉州潘罗支、青唐唃厮啰等就曾一度成为宋王朝的盟友，从而牵制了西夏党项的兵力。

宋王朝中期，国家积贫积弱，危机四伏，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发出了要求改革的呼声。嘉祐三年（1058年）春，新到京城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写成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指出宋王朝内部潜伏的种种矛盾与危机，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改革意见和方法，但没有引起仁宗皇帝的重视与执政大臣的赞同。

宋神宗即位后，起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并支持他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经略河湟，兼制西夏，收复汉唐旧境，开拓经营西北边疆，是王安石等革新派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此时的宋王朝经历了近百年的对夏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防卫体系已渐完固，军事上已显出对夏步步进逼的态势，而西夏却失去了昔日元昊时期的军事鼎盛之势，不得不收缩战线，渐渐转入被动防守。此时的吐蕃由于西夏的威逼已渐浸衰弱，表示出亲夏的态度。

在这种形势下，宋王朝一反对吐蕃笼络联合的政策，转而展开对秦陇以西吐蕃诸部武力开拓经营。熙宁五年（1072年），以熙（今甘肃临洮县）河（今甘肃临夏市）洮（今甘肃临潭县）岷（今甘肃岷县）州、通远军（今甘肃陇西县）为一路，置兵马步军都总管、经略安抚使，后又“以熙、河等五州军为一路，通旧鄜延等五路，共三十四州军”[38]，这样在西北沿边形成了五个军事区。熙河路的设置，是宋王朝实施两面夹击西夏的重要举措。从熙宁五年（1072年）开始的熙河之役，到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王韶再次攻克河州，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取得“修复熙、洮、岷、叠、宕等州，幅员二千余里，斩获不顺蕃部万九千余人，招抚小大蕃族三十余万帐”[39]的重大胜利。

开拓熙河的胜利，使宋神宗飘飘然产生轻敌之心，欲乘胜一举吞灭西夏。元丰四年（1081年），神宗调集陕西、河东五路大军草率出兵，招致失败。仅李宪一路以偏师出夏人侧背夺取兰州（今甘肃兰州市）、会州（今甘肃会宁县北），使宋朝边境越过马衔山推进至黄河边，远抵天都山，

扩大了开拓熙河的成果，不仅把熙河路扩展为熙河兰会路，而且开拓了宋朝由内地通往西部地区的另一通道。这样，宋朝西北边境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五个军事区就有南北两道贯通，两道均可至炳灵寺通青唐，相互间联系更加紧密。

宋徽宗即位后，也决心“绍述先志”，效法熙宁之治，起用早年追随王安石变法的蔡京为相。蔡京对内变新法以营私，对外欲以边功炫耀。然而此时的北宋王朝已处于崩溃的边缘，政治黑暗腐败，实力大为衰弱，不堪一击，若与辽、西夏交锋，未易取胜。好大喜功之心驱使徽宗将视线转向神、哲二宗曾立功建业的河湟地区，开始又一次发动河湟之役。崇宁二年（1103 年）六月，命王厚率军向湟州进发，先后攻占湟洲、鄯州（今青海西宁市）、廓州（今青海尖扎县北），控制了今青海东南部的黄河以北地区，宋王朝收复河湟的目的已基本达到。从崇宁二年（1103 年）开始到崇宁三年（1104 年）四月底结束河湟之役，“开拓疆境幅员三千余里”，“招降到首领二千七百余人，户口七十余万”[39]，将鄯州改为西宁。吐蕃青唐政权自 1032 年建都，到 1104 年王厚、童贯再次攻下青唐，这个政权宣告瓦解，退出了宋、辽、西夏的多方角逐之中。

宋朝自神宗起，进一步调整御边政策，开拓熙河，经略河湟，这是对西夏战略的组成部分之一，重点则在遏制西夏，是对西夏的侧面出击，主动防御。西线战场的开辟，是宋朝实施两面夹击西夏的重要步骤，意味着宋夏双方战略地位发生了变化。

纵观上述，北宋政府的御边政策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北宋初期重北边轻西鄙、到中期防御重心从北边移到西北，自熙宁变法后，又以攻为守兼制西夏。这种政策的不断变化与调整，主要受北宋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影响，与周边邻国西夏党项、契丹辽国、西北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兴衰有密切关系，它是北宋、辽、西夏、吐蕃等势力相互消长，相互制衡的产物，也是北宋时期民族关系的另一种表现形态。

**注释：**

①《全宋文》卷六《幸边陲诏》，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148页。

②《宋大诏令集》卷一八《谕河北诸州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85页。

③《元丰类稿》卷四九《添兵》，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8册，第757页。

④《辽史》卷八三《耶律休哥传》，第5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01页。

⑤⑥《宋史》卷二七三《何承矩传》，第27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328页。

⑦《宋史》卷三一八《张方平传》，第30册，第10357页。

⑧《宋史》卷二六六《张齐贤传》，第25册，第9157页。

⑨《长编》卷三五淳化五年春正月甲寅条，第4册，第769页。

⑩《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九月庚午条，第3册，第553页。

⑪《长编》卷四二至道三年九月丙子条，第4册，第880页。

⑫《长编》卷四二至道三年九月丙子条，李焘注，第4册，第880页。

⑬《长编》卷三〇端拱二年正月癸巳条，第3册，第678页。

⑭《长编》卷三二淳化二年八月丁亥条，第3册，第678页。

⑮《宋大诏令集》卷一八七《谕河北诸州诏》，中华书局1962年10月版，第685页。

⑯《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第13册，第4163页。

⑰《长编》卷四四咸丰二年六月戊午条，第4册，第947页。

⑱《西夏书事校证》卷二一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页。

⑲《宋史》卷八《地理志三》，第7册，第2143页。

⑳《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第14册，第4576页。

㉑《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闰九月癸巳条，第10册，第3303页。

㉒㉜《宋史》卷一八九《兵志三》，第14册，第4643页。

㉓《宋史》卷一九〇《兵志四》，第14册，第4750页。

㉔㉕㉖《宋史》卷一九〇《兵志四》，第14册，第4706、4708页。

㉗《宋史》卷一九〇《兵志四》,第 14 册,第 4713 页。

㉘《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八上,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726 册,第 526、532、523、519 页。

㉙《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三,第 154 页。

㉚《宋史》卷二八八《范雍传》,第 28 册,第 9679 页。

㉛㉜《长编》卷一二五宝元二年闰十二月壬子条,第 9 册,第 2957 页。

㉝《宋会要辑稿》第 175 册《兵》8~21,中华书局影印本,第 7 册,第 6897 页。

㉞《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第 7 册,第 2143 页。

㉟《长编》卷二四七,熙宁六年十月辛巳条,第 18 册,第 6022 页。

㊱《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三,崇宁三年四月庚午条,光绪癸未渐江书局刻本,第二函第 7 册。

作者:刘建丽,1947 年出生,女,河南开封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 试论明清时期河湟文化的特质与功能

武 沐 王希隆

河湟文化是祖国文化中的奇葩，是西北各民族文化中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巨大的文化。伊斯兰民族、藏族、蒙古族、汉族等各族文化建构了河湟文化多元鼎立与兼容并包的特质和屏藩、整合、承传的功能。史学界对于河湟文化的研究，就其多元性的民族文化而言，已多有论述，但多限于文化宗教、衣食住行的一般性论述。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探讨河湟文化的多元性，而是试图将该地区各民族文化放在河湟文化整体背景中去研究，尤为着意探讨河湟文化中各民族文化相互间的地位、兼容的机制、原因，传承的方式、途径，文化功能等。缕陈其间原委，以求证于当世方家。

**一、鼎足而立与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

河湟文化之起源，应追溯到汉武帝拓西陲。当时的河湟地区主要是汉、羌文化交汇的地区。魏晋南北朝的西秦时，河湟地区是羌、汉、吐谷浑、氐、陇西鲜卑、拓跋鲜卑等众多民族驻足、争夺之地，可谓启河湟多民族文化的端倪。隋、唐、宋三朝，河湟文化主要在汉与吐蕃间对话，且大部分时间为吐蕃、西夏金朝占据。历史上大凡两个或几个语言不同、风俗各异的民族相处，其间必然有一中间地带，河湟地区正是当时藏、汉等民族文化相交的中间地带。但蒙元时，这一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异，蒙古人不仅把自己的同胞带到了河湟地区，而且也迫使大批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客居他乡，寻梦河湟，并最终催生了回、藏、汉、蒙 、东乡、撒拉、保安、土族等众多民族共居，伊斯兰教、藏传佛教、道教、汉传佛教以及儒家礼教等众多宗教和政治学说汇聚的多元鼎立、兼容并包的文化格局，使河湟文化鼎盛一时。有明一代河湟文化曾一度沉寂息影。清初以

至民国时，河湟文化因伊斯兰门宦制和回族军事将领的出现而骤然东山再起。此时的河湟地区汇聚了世界三大宗教中的两大宗教、中国五大民族中的四个民族，加之河湟地区土生土长的特有民族东乡、撒拉、保安、土族，从而形成了今日河湟文化的基本格局。这种八个民族、七种语言、四大宗教或学说同时汇聚一地，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明清时期的河湟是众神狂欢之地。

河湟地区特有的地理位置、多民族共存的历史背景和氛围使之成为西部众多文化汇聚的枢纽，而众多文化的汇聚又导致和规约了河湟文化的多元性。但特殊的是，汇聚于河湟地区的众多文化又同时处在各自文化的边缘，即沿海及中原的汉文化向西发展到河湟地区与其他文化交汇时，已是凤首鸡尾，其文明与在沿海时已迥然不一。所谓“甘肃士人独安固陋，不求闻达也”[①]。而藏文化、蒙古文化以及中亚、西域伊斯兰文化传播到河湟地区时也已是龙魂蛇影，其影响明显减弱。这种边缘文化的特性又限定和拘囿了河湟文化只能是多元鼎立、兼容并包的混合型文化，而不是像近邻河西文化、陇西文化、安多文化那样，呈现为一元为主，多元为辅的格局。但多元并不意味着多极，鼎立不导致对立，兼容绝非兼并。虽多元发展却始终聚合在同一社会整体之中，虽鼎足而立却蕴涵着千丝万缕、割舍不断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奠定了兼容并包的基础。多元鼎立文化发展的结果是共同托起了一个兼容并包的社会。历史上河湟各族间虽间或存在着虞诈相加、以邻为壑、掉首无情的现象，但在各民族交往的漫漫长河中，这并不是主流。它并不能取代蕴涵在河湟各族文化深处的相互联系和各民族得以立足的社会机制，更不能阻碍我们对这些联系与机制的探讨。对于这种探讨原本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论述，其优点是可以将不同民族放在同一问题中去讨论，但那样一来就割断了各民族的整体感。笔者才疏，难以二者兼顾，只好将各民族文化的机制分别论述。

（一）汉文化的机制

元朝以来汉文化之所以能够立足于河湟地区，用左宗棠的话说：甘

宁青地区“汉蒙回番杂处其间，谣俗异宜，习尚各别。汉敦儒术，回习天方，蒙番崇信佛教……置省以来，诸凡建设，或创或因，于武备尚详，而文治独略”[②]。依左将军看，汉文化之所以立足于河湟地区乃“武备尚详”之故，而文化孱弱苍白得几可忽略。河湟地区的汉文化依托于强大的中央政权，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无可置否。然而强调汉文化在政治、军事方面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汉文化只是在政治、军事方面存在着影响。实际上，河湟汉文化即使抛开中央强大的政治、军事依托，依然能凭借其卓越的文化功能立足于河湟社会中。这种文化功能主要得力于：一是汉文化是该地区先进科学技术与文化的传播者。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汉文化对该地区影响最大的，既不是通常所谓儒家之道，更不是道教、佛教，而是汉文化中先进的科技因素。内地军民的大量屯田，为河湟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文明。从汉代赵充国的屯田，到明末郑洛的经略，河湟各少数民族是在接受先进农耕文明的同时，部分地接受了儒家伦理道德之说。明嘉靖《河州志》记载的以王佐、王竑父子为代表的河州各界名流、进士、隐逸等知识分子，大多为从戎河州军吏的后裔。明、清《河州志》中记载的 64 位历任河州知州，清顺治《西宁志》中记载的 53 位历任西宁兵备道副使等均来自内地，且大多出身进士。他们与民间文化传播一道，对于推动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河湟伊斯兰各族及部分蒙古族、藏族、土族在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换过程中，都是从汉文化那里潜移默化地汲取了先进的耕作技术。汉文化先进的科技因素犹如一条不可缺少的、更无法替代的文化纽带，把该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文明进程与先进的科学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进而为汉文化的立足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二是汉族与其他各族一起连接了一条彼此相依的经济链。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间的巨大差异，为河湟地区的商品交流创造了绝好的商机，汉、藏两地广阔的空间既是商品销售的巨大市场，又是源源不断的原料供应基地。而河湟伊斯兰民族以其良好的商业素养，悠久的经商传统和坚忍不拔的吃苦精神在河湟各族之间架起了通衢四方的商业桥梁，同时也使其在河

湟经济中占据了不可缺少的重要位置。三是汉文化代表了河湟文化的发展取向。河湟汉文化代表着主流，但不是主导。河湟各少数民族虽宗教信仰、语言风俗各不相同，其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也先后不一，但近代化发展的取向都是因循汉文化的，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

（二）异军突起的伊斯兰文化

河湟伊斯兰民族深受多种文化的影响，又影响着其他文化。河湟伊斯兰民族因信仰伊斯兰教而与汉族有明显的区别，又因受汉文化影响较深而异于其他地区的伊斯兰民族，有着自己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民族性格和历史传统。他们与河湟各民族既有激烈冲突，又有真诚合作。这种文化的交融，在锤炼出河湟伊斯兰民族的极强自尊、使其呈现出复杂、矛盾、独特和坚韧的民族性格的同时，又孕育了河湟伊斯兰民族与其他文化间息息相通、难舍难分的文化情结。与汉文化相比，河湟伊斯兰民族既不具育强大的政治、军事影响力，又不是先进科学技术的传播者和主流文化的代表；与藏族文化相比，它缺乏那种造就出藏文化古老而又封闭的历史背景和自然条件，然河湟伊斯兰文化却是河湟文化中最富有粘连能力而同时又能很好地保持自我的文化，是整合中最活跃的因子。河湟伊斯兰民族之所以能把这种极具粘连的能力演绎得出神入化，首先应归结于元朝以来河湟伊斯兰教的迅猛崛起。元末明初蒙古族、藏族势力的衰微，明清汉文化的姗姗来迟，以及元朝以来历代统治者对藏族的打压，为这一中间地带留出了巨大的历史空白，历史为河湟伊斯兰教的发展创造了绝好机会相宽松的环境。大多数文章在论述河湟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的联系时，多以河湟伊斯兰教如何吸取儒家学说、河湟伊斯兰民族族源之广泛以及连接四方的商业情缘为主题，这毋庸置疑。但河湟伊斯兰民族与汉文化的联系还有其独特之处，如河湟伊斯兰门宦制。河湟伊斯兰门宦制首创于河湟地 区并迅速传播于西北。门宦制不仅表现为众多的教派、教义，更重要的是它还创建、整合了新型的伊斯兰民族的基层社会组织。与其他民族不同，伊斯兰民族是分散进入中国的，因而缺乏本民族的社会基层组织。门宦制出现后，在一定程度上把河湟伊斯兰民族进

行了重新组合，使之出现了一种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的、具有伊斯兰民族特色的社会组织。它的出现是河湟地区伊斯兰民族走向成熟的表现，我们不能因为存在着民族冲突而怀疑它的出现。但这种重新组合后的社会组织仅仅是一个准社会组织，由于不具备完整的政府功能，因而它无法取代郡县制，也不可能成为与中央政权并驾齐驱的地方组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甚至无法取代土司制。尤其在各教派冲突时，政府出面的调解、仲裁作用显得尤为重要。门宦制只是郡县制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延伸和补充，是在郡县制的羁绊下，中央王朝借以管理河湟伊斯兰民 族的一种方式。历史证明，河湟伊斯兰民族正是通过这种准社会组织而始终与主流社会保持着若即若离，却又割舍不开的联系。因此，从社会学角度，而不是从宗教角度来看，门宦制的出现不仅为河湟地区伊斯兰民族提供了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而且也为中央政府治理河湟地区增加了一种选择，其在此意义上的积极作用在明清以来几百年的历史中应得到认可。

除门宦制外，河湟伊斯兰文化的非主流化也是其独具特色之处，只是较之其他方面，它表现得更为曲折、更为隐现。河湟伊斯兰民族文化的独特、有趣之处在于，它一方面以伊斯兰文化作为自己民族文化的主流，以保持相维护自身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又以那些被儒学视作非主流，同时也被自身民族认为是非主流的文化作为进入河湟主流社会的手段。非主流文化在河湟伊斯兰文化中表现得异常突出和普遍，甚至十分微小的细节都被顽强地坚守着。河湟地区伊斯兰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边远地区，文化的发展受到经济、宗教等众多因素的限制，其通儒达经的水平不仅远不如内地，即使在本地也常常因科举落后而受到崇尚学经入仕，视“学而优则仕”为进入主流社会通衢大道的士大夫的歧视。因此，科举在河湟伊斯兰文化的价值取向中并不被看重。河湟地区明清两代以经学中进士的六人中，除马应龙族属尚待确定外，其余无一为伊斯兰民族[③]。他们在经堂学习知识而不是在学堂。因此，在其文化中被看重的恰恰是以非主班文化跻身于主流社会的方式。尚武与经商就是典型的例子。

居住在边地的少数民族大多有尚武的习俗，而河湟伊斯兰民族中的

尚武精神更是盛传不衰。河湟伊斯兰民族的尚武，在今天看来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现象，但在明清时期它却包含着复杂的历史背景。这里，既有古代游牧民族的遗风和因居住环境中时常发生民族间械斗而被迫所为等因素，又有受生活所迫，以充当保镖为营生手段或因常年经商在外不得不多练几招以防不测等经济原因；但更重要的仍是隐现在尚武精神背后的文化蕴涵。这就是：河湟伊斯兰民族以尚武为进入主流社会的主要途径，如出身于河州的马福禄就是因武进士而一跃成为西北著名的军事将领，其弟武举人出身的马福祥更是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西北回族中无出其右者。马占鳌、马海宴家族的入朝秉政也与尚武有一定的关联。河湟藏族中虽亦有武进士④，但与河湟伊斯兰民族尚武的文化蕴涵不可等同而语。河湟伊斯兰民族视尚武为 提高民族自尊心和培养民族性格的一种手段。河湟伊斯兰民族在为民族生存而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勇气，为世人赞叹。其桀骜不驯的民族性格往往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叛逆”的象征而引以为患；河湟伊斯兰民族的尚武可以弥补其单调的文化生活。

经商在以农为本的汉族文化中被看做是“末业”。但河湟伊斯兰民族却以擅长经商而闻名于西北。河湟伊斯兰民族的经商固然有其生活所迫的经济因素，但其文化的粘和作用尤为显要。首先，河湟伊斯兰民族经商，可以大大强化其对河湟文化的向心力。河湟伊斯兰民族通过经商，其经济实力大多在当地汉族之上。民族实力的壮大，对于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十分关键。实际上在河湟伊斯兰文化发展过程中，经商始终是平衡民族心理，强化民族自尊心的主要手段，而民族心理的平衡与自尊心对于一个民族生存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在多民族共存 的文化圈中，每个民族的自尊心往往与其对本民族在这个文化圈中的认可程度相辅相成的。他的认可程度越深，或者说他越认为自己是这个文化圈中的一分子，就越加珍重自身的形象，越加渴望赢得他人的尊重。因此，河湟伊斯兰民族的经商虽被主流社会视作“末流”，但确实又是其立足于主流社会的文化基石，是获得其它民族认可和尊重的主要途径之一。其次，河湟

伊斯兰民族经商可以提高其在本民族的地位，许多商人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成为当地社会组织中的核心人物，一部分人甚至走上了仕途。第三，经商可以帮助河湟伊斯兰民族了解中原文化，增长知识，走向世界。

河湟伊斯兰文化的非主流化虽然早已渗透到河湟伊斯兰民族的血液中，但河湟伊斯兰文化的非主流化并不意味着因此而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它是以非主流化的手段达到进入主流社会的目的。其归宿在于入流，而不是出"流"。河湟伊斯兰民民族是在大一统的总格局下发扬着本民族的"非主流文化"，是河湟这伊斯兰民族在文化上的一大特点，即使在同治年间西北回族大起义中，这一特点仍表现得十分突出。这种主流与非主流的交融，把河湟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有机地联结为一体。

（三）古朴、厚重的藏族文化

藏文化是河湟文化中一支古老、独特而又神秘的马背文化。独辟一隅的藏胞们在虔诚的祈祷声中平静地生活。他们颂扬呼图克图以祈求来世的幸福。藏文化古朴的底蕴像他们脚下的草原一样宽广、厚重。

在宗教教义上，河湟地区的藏族与拉萨地区的藏族并无两样，但在族源上河湟藏族要复杂得多。除古羌族外，氐人、吐谷浑人、鲜卑人、党项人、蒙古人、汉人等都曾是其族源的一部分。这一点决定了河湟藏族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融合更为广泛和深入，如该地区汉族与藏族、伊斯兰民族与藏族间的民族同化现象曾屡见不鲜。西宁藏族土司李南哥的后裔李玑就曾以经学中进士[5]，这说明该地区一些藏族贵族的汉化程度异常之高。这在整个藏族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河湟藏族的这种民族开放与进化相对于从整体上仍处于封闭状态的西藏地区、尼泊尔地区，尤其是印度地区的藏族而言，无疑是其鲜明的特征之一，而正是这一点又恰恰是上述地区的藏族最不以为然之处。

藏族的寺院文化在河湟地区中固然占据着特有的重要地位，但比这更特殊和更重要的是藏族在该地区的政治、军事作用。与河湟伊斯兰民族相比，河湟藏族既不是以宗教也不是以非主流文化进入河湟社会的，他是以政治上的归附、军事上的藩篱为契机，在河湟地区占有不可替代的

一席，成为河湟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明初，以何锁南普、李南哥为首的河湟吐蕃首领的归降，使得明朝统治者顺利地“因其俗而顺其治”，建立了“以流制土、以土治番”的土流参设制度。土官利用他们的势力和影响，控制“番众”，稳定地方，在征调、守卫、保塞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被誉为有“捍卫之劳，无悖叛之事”的民族[6]。河湟地区的土官制度雏形于元，完备于明。从制度演变上看，这种土官制是郡县制、羁縻制、世官制的集大成者。从管理方式上看，它是“因其俗顺其治”的完美结合。以制度学的角度衡量，土官制的实质与核心是权力的分享。但这种权力的分享是在同一政治框架下的权力分享，绝不是分立，更不是独立。土官以其对中央王朝的忠诚为资本，在河湟政治框架中换取和谋得中央王朝的认可，反过来又凭借这种认可来维护自己在部落中的特权。资本与特权的交换，在这里既关键、重要，又默契、娴熟，双方和谐地捆绑在统一的政治框架中，即使部分河湟藏族改信伊斯兰教后，这种政治上的和谐依然顽强地保留着。

河湟藏族在军事上与中央王朝保持联系的主要方式是共建河湟防御体系。所谓共建是指中央王朝以其军事威慑相重点征讨为河湟藏族提供保护，而河湟藏族反过来又以分关把守、层层蕃卫为中央王朝担当藩篱。

河湟地区藏族在军事上的屏藩作用令世人赞叹、瞩目，其特点是藏、汉、回、土等各族共同建立了以西宁为中心、层层藩篱的防御体系。河西四郡与河湟地区虽同地处西北，但历代统治者在两者间采取的防御战略截然不同。前者多讨伐，后者重经略。出征河西之悍将，多怀征伐之豪气，入西域之无尽境地；驻守河湟之功臣，则望西极荒漠，以固守天之尽头为己任。汉赵充国、魏郭淮、晋马隆、隋刘权、唐娄师德、宋王韶以及元吐蕃宣尉司，所用皆此法也。明代郑洛之经略，更难有望其项背者。明中叶以后，进入青海湖地区驻牧的蒙古鞑靼部落势力大振，掳蕃寇边，河、湟、岷、洮一线，岁无宁日，形成“九边之患虏，秦为最。秦患虏，陇右为最”的局面。即使是河湟雄镇河州也曾经被蒙古兵攻占[7]，朝廷上下为之震动。

为此，明政府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派兵部尚书郑洛经略青海。郑洛到达青海后，联合诸蕃，以严借路、急自治、扼川底、议招降等十二条方略经措其事[8]，凭两万之兵拒蒙古十万之众，三四年间，收效甚著，基本稳定了青海局势。熟悉这段历史的学者都知道，郑洛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诸蕃的作用举足轻重，功不可没。而郑洛正是充分和巧妙地将中央的威慑力量与诸蕃的蕃卫能力加以结合才得以成功。

河湟藏族与伊斯兰各民族的关系，比之汉族与藏族、汉族与伊斯兰各族显得更为融洽，这多少有些令人羡慕和费解。有人把这种融洽归结为河湟伊斯兰民族把握了藏族的商业命脉，这话只说对了一部分。商业情缘在两者的关系中占据着显要地位，毋庸置疑，但两者的关系远较商业因素更为丰富、更为复杂。如明清时，河湟藏族在土著化的过程中，许多藏族都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件事若从商业角度评判，恐怕难以自圆。19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在西藏考察时曾发现："西藏人（以及克什米尔人——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域人）声称自己不大尊重汉人，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不信宗教者。"[9]可见，少数民族对于宗教信仰的虔诚心态，很容易使他们以此为尺度来划分彼此间的亲疏。对于信教者，尽管所信之教并非相同，但有时仍能产生出一种虽非同类却异常亲近的感觉。对于不信教、信教程度很低或临时抱佛脚的汉族，则敬而远之。河湟藏族中有许多人皈依了伊斯兰教，甚至整部落改信伊斯兰教，这也许正是藏族与伊斯兰各族较为亲近的另一解释吧。

河湟藏族土官皈依伊斯兰教除信仰外，还应与其既得的政治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土官一旦入流，则一切特权荡然无存。如清康熙末年曾在河湟地区废茶马之制，除不法土官。雍正四年，实行起科，番族俱纳粮当差，与汉民无异。土官改信伊斯兰教，既保留了原有的特权，又适应了藏族从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转轨的形势，满足了环境所迫的需要。

此外，河湟藏族所接受的先进文化大多是从河湟伊斯兰民族中传入的，而不是直接从汉族中传入的，这一点对回、藏关系的影响绝不亚于商业情缘。

## 二、河湟文化的功能

河湟文化的功能大体可分为屏藩功能、整合功能、承传功能。前两者已多有论述，此处只就承传功能谈一点认识。

作为古羌族世代居住的河湟地区早在汉武帝时已基本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此后，河湟地区以其特有的地理位置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与亚洲内陆“草原之路”上的咽喉、“唐蕃古道”的通衢、北方游牧民族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唯一走廊、西南与西北地区即西部中国南北相互沟通的桥头堡。童恩正教授曾从地理位置、海拔高度、太阳辐射、气温、雨量、土壤、动植物和矿产资源等自然景观与生态的相似性方面，论证了我国从东北到西南存在一个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其转折正在河湟一带[10]。这实际上是对河湟地区作为多民族文化聚居区及其文化走廊之汇聚枢纽的地位作了认定。同时，河湟地区还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相互接壤的分水岭。中原政权以此为基地向西、西南发展；游牧民族则视河湟地区为交换贸易和文化沟通的场所，乃至征服劫掠的突破口之一。这些都为河湟文化的传承功能提供了历史背景。

早在十六国时期，河湟地区就是佛教传承最盛的地区之一。炳灵寺是当时佛学大师们在坐禅弘法的著名寺院。据《高僧传》记载，西秦时包括法显大师在内来河湟地区弘法释经的中外法师多达十余位，释经二十余卷。此外，古羌人及吐蕃之东进、吐谷浑之南下、党项族之北上，都曾盘桓于河湟地区，其文化之承载、传播的功绩亦不可小视。河湟地区还是整个藏族地区了解中原文化，学习先进知识以及通过了解世界确定民族自身方位的主要窗口。文成公主入藏就是在河湟告别同胞后，进入西蕃庭的。明清时，出身于西宁的藏族宗喀巴大师创建了黄教，致使河湟地区的黄教在整个藏区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明万历年间，入居青海的蒙古俺达汗部族，正是在黄教的影响下，派使者迎请锁南坚错（即达赖三世）至青海仰华寺隆重会面，俺达汗率众接受灌顶皈依黄教。从此，黄教在蒙古地区广为传播，熬茶膜拜，视若天神，对蒙藏历史影响深远。而锁南坚错及其转世者也因此获达赖喇嘛的名号，成为格鲁派领袖。河湟地

区还是历史上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交流的窗口与前沿。北宋熙宁年间，汉传佛教高僧智缘就曾随王韶经略青唐（今青海西宁），由于深受当地部落酋长喜爱，得以“说结吴叱腊归化，而他族禹龙珂禹藏讷令支等皆因以书款”[11]。清军进入西藏也是以此为后方大本营。但是，河湟文化传承之典型及集大成者莫过于伊斯兰教。

河湟伊斯兰民族对于伊斯兰教的传承不仅仅是单纯的伊斯兰教教义，而是发展、升华为一种包含了伊斯兰民族社会组织形式在内的宗教制度，即伊斯兰教门宦制度及伊黑瓦尼教派[12]。门宦制度的出现不仅仅是伊斯兰教苏非派教义传播、感召的结果，重要的是它还被看做是河湟伊斯兰民族自身民族进程发展的产物。而区别于土官势力的新兴封建政治力量以及以自主创教为特征的新兴宗教力量的出现，则是这种自身民族进程的主要标志。门宦制度不仅表现为名目繁多的教派，而且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是这种新兴政治、宗教力量与苏非派教义结合后产生的一种以宗教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制度。它结束了河湟伊斯兰民族落居后只有宗教组织，没有民族自身基层社会组织的局面。门宦制的传播，对于西北伊斯兰民族社会化进程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全国来讲，其影响也是巨大的。它是伊斯兰教经西域传入中原的一个重要阶梯，是伊斯兰教本土化的关键环节。因此，河湟文化圈的传承不是简单的文化传递，而是社会的理性加工。

河湟各族正是在上述的有机联系中，交织出一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网。探讨河湟文化的内在联系，不仅仅是历史的还原，它对于研究当今河湟地区的民族关系亦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注释：**

①左宗棠：《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折》左文襄公奏稿，卷四四。

②左宗棠：《请陕甘乡试分闱并分设学政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三。

③(明嘉靖)《河州志》,(清康熙)《河州志》,(清顺治)《西宁志·甲第》。

④(清顺治)《西宁志·土司》。

⑤(清顺治)《西宁志·甲第》。

⑥《清史稿·土司六》。

⑦《明史》,卷三三〇。

⑧《明史》,卷二二九。

⑨[瑞士]米歇尔·泰勒者,耿升译:《发现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⑩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⑪《宋史》,卷四六一。

⑫霍维洮:《近代西北回族社会组织化进程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武沐,1958年出生,男,山西洪洞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者:王希隆,1950年出生,男,甘肃兰州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 试论宋代的西北屯田

李　蔚

宋代为了防止辽及西夏的入侵，先后于河北、河东、陕西等三路进行屯田和营田。“本朝自淳化以来，始用何承矩措置北边屯田，开塘泺之利以限北虏，相继西北二边亦广屯田。”[①] 这里的北边，即河北路，西北二边指河东、陕西二路。

宋朝西北地区的屯田和营田，与其他地区（诸如河北雄州、莫州、霸州一带，及湖南沅州一带）的屯田和营田相比较，显得特别重要。其所以重要，第一，持续时间长，涉及地区广。从时间看，自太宗至道元年（995年）陕西转运使郑文宝于贺兰山下屯田开始，至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四川宣抚副使安丙“于关外广结义士，月给以粮，俾各保田庐”[②]，且耕且战为止，首尾212年。从涉及的地区看，太宗至英宗时，西北屯田还仅限于今宁夏南部，陕西北部、甘肃陇东、陇南的一些地区，诸如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县）笼竿川（在六盘山外）、青涧城（位于今延安东北的清涧河北岸）、渭州（今甘肃平凉市）、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等地。至神宗熙河开边后，已扩展至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南）宕州（今甘肃宕昌）洮州（今甘肃临潭）、岷州（今甘肃岷县）、叠州（今甘肃迭部）等地。哲宗绍圣以后，到徽宗崇宁、大观年间，不断开疆扩土，其西北地区的屯田和营田，也就进一步扩大到今青海东部的鄯州（今青海西宁市）、湟州（今青海乐都）、廓州（今青海兴扎北）一带。北宋灭亡后，尽管金朝占领了西北的广大地区，但南宋政府仍在大散关之外的一些州县—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今甘肃成县）、岷州（今甘肃岷县）、洋州（今陕西洋县）等地坚持屯田。第二，宋朝统治者高度重视

西北屯田。在他们看来，“实边之策，惟屯田为利”[3]。他们确认屯田可以巩固西北边防，至少可以宽民力，部份解决那里的兵饷粮运问题。“兴营田，减冗费，为持久宽民之计，”[4]“赡师旅而省转输，此所以为扈边实塞之要务，富国安民之至计也。”[5] 鉴于西北屯田事关边防安危，即使在徽宗大量出卖官田时期，也从未将这一带的屯田列在拍卖之列。“（政和元年十月）总领措置官田所言，原奏请存留屯田为河北、陕西、河东事干边防利害去处，不可出卖，若自余路……即非事干边防亦合出卖，从之。”[6]第三，对南宋东南一带的屯田和营田有一定的影响。这表现在陕西招募弓箭手屯田之法，曾为南宋政府所效法。“乾道四年，知楚州刘舜谟言，两淮旧有壮丁民社乞依陕西弓箭手法，并免下户苗田两顷，从之。”[7]第四，开屯田营田向官庄转化的先河。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北宋的屯田和营田，首先采用官庄经营方式的是熙河路熙州城下的营田[8]，接着，属于熙河路的岷州、通远军……等地的屯田也先后采用了“官庄”的经营方式[9]。所谓“官庄”，即以庄为单位，采用一般地主庄园上普遍采用的租佃经营方式。它同带有某种徭役性的屯田、营田相比较，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意义。

有鉴于此，本文就西北屯田的组管理机构、土地来源、直接生产者授田情况，剥削量、效果、特点、历史作用诸问题，作一粗略的论述。

## 一

宋代，工部设屯田郎中及员外郎等官，负责“掌屯田、营田、职田、学田、官庄之政令，及其租入，种割、兴修、结纳之事”[10]。

北宋初年，朝廷于屯田、营田各路设置“屯田务”和“营田务”。如太宗淳化年间在河北路设“屯田务”，庆历元年（1041 年）在陕西设“营田务”，置营田使，由该路总管或“部署及转运使并兼营田使，转运判官兼管勾营田事”[11]。

宋代西北屯田曾大量招募弓箭手。北宋河东、陕西的弓箭手，因其

战斗力较强，成为抵御西夏的劲卒。北宋王朝为了管理好这支劲旅，于陕西、河东等路的沿边州县设提举弓箭手，并置司管理。其主要职责是“掌沿边郡县射地弓箭手之籍，及团结、训练、赏罚之事”[12]。

弓箭手又分为汉弓箭手和蕃弓箭手两类。两类弓箭手都归各路将领管辖。这种统属关系，大体上开始于王安石置将法推行之时。“（熙宁七年）总天下为九十二将，而鄜延五路又有汉、蕃弓箭手，亦各附诸将而统隶焉。”[13]

为了便于管理，北宋王朝于元丰五年（1082年）2月，将“提举熙河等路弓箭手、营田、蕃部共为一司，隶泾原路制置司”[14]。合并后的机构名叫“提举熙河等路弓箭手营田蕃部司。”这个合并的机构，经过一段时间的管理实践，证明有所不便，至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又下令“罢提举熙河等路弓箭（手）营田蕃部司”[15]，恢复过去的“提举弓箭手司”等机构。

由于提举官的“贪赏欺蔽、务要数多，妄行招刺”，徽宗靖康元年（1126年），又下令废“提举弓箭手司”，凡弓箭手营田之事均归所在各路帅司管理。“罢提举司，复隶帅司”[16]。

南宋建立之初，高宗赵构根据新的历史情况，对屯田、营田的统属关系进行了调整和变动，规定“凡屯田事营田司兼之，营田事府县兼之”[17]。

为了加强对川陕等地屯田的管理，绍兴五年（1135年），赵构“命两淮、川陕、荆襄、荆南诸帅府参谋官各一员，提点屯田”[18]。

绍兴六年（1136年），赵构为了使领导管理一元化，进一步规定以诸路帅臣兼领营田大使、营田使。如“诏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抚使刘光世，淮南东路兼镇江府宣抚使韩世忠，江南东路宣抚使张浚并兼营田大使，荆湖路襄阳府路招讨使岳飞，川陕宣抚副使吴玠并兼营田使”[19]。

至于西北屯田和营田的基层管理组织，北宋规定弓箭手营田，“每五十顷为一营”[20]，设指挥使、都指挥使、巡检等官，如曹玮于镇戎军屯田，“设堡戍，列部伍，补指挥使以下，据兵有功者，亦补军都指挥使，置巡检以统之”[21]。此外，从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王韶于河州招募汉蕃弓箭手

营田，其蕃弓箭手，“仍募汉弓箭手等为甲头”[22]来看，弓箭乎营田可能也像陕西强人砦户、强人弓手一样，也“置押官、甲头、队长”[●]等官。

南宋营田，随着它向官庄转化日益普遍，自绍兴六年（1136年）开始，即实行以庄为计算单位（如吴玠于陕西梁洋一带营田六十庄）。规定“五顷为一庄，募民承佃，其法五家为保，共佃一庄，以一人为长，每庄给牛五具、耒耜及种付之，别给十亩为蔬圃，贷钱七十千，分五年偿”[23]。

## 二

宋代西北屯田的土地来源，大体有以下几种：

其一，曰闲田旷土和弃土。如夏安期知渭州（今甘肃平凉市），“籍寨下闲田，募人耕种，岁得穀数万户”[25]。这是利用闲田。“麟、府间有弃地曰草城川，（郑）戬募土人为弓箭手，计口授田。”[26]这是利用弃土。

其二，曰括地。不仅在汉人居住地区括，也在少数民族地区括。前者如哲宗元祐年间，刘昌祚知渭州，括陇山闲田一万零九百九十顷（宋史刘昌祚传作万顷），招募弓箭手五千二百六十二人（宋史本传为“募士五千”）进行屯田，受到嘉奖，“敕书奖谕”[27]。后者如张守约在秦凤境内“括生羌隐土千顷，以募射手”[28]。甚至发生了因强行括地而引起了少数民族的反抗事件。仁宗时，范祥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市）“括熟户田，诸羌靳之，相率叛”[29]。

其三，曰公田和官地。如熙河路弓箭乎所耕之田，有不少就是当地的公田或官地。“（熙宁五年）十月，诏熙河路以公田募弓箭手。”[30]到熙宁六年（1073年）十月，又“诏以官地招弓箭手”[31]。

其四，曰包占良田。陕西、青海东部的一些地区，诸如西宁、湟州（今青海省乐都县），廓州（今青海兴扎北）、积石军（今青海贵德县）等地的弓箭手所耕之地，就是这类土地。“（徽宗政和）五年二月，诏陕西、河东逐路，自绍圣开拓边疆以来，及西宁、湟、廓、洮州、积石等处新边，各有包占良田，并合招置弓箭手，以为边防篱落。”[32]

其五，曰献地。主要发生在少数民族居住之地。如神宗熙宁年间，秦凤路经略使李师中“筑熟羊等堡，募蕃部献地，置弓箭手”[33]。

其六，曰牧地。以牧地为营田，曾出现在陕西地区。“（陕西）假同州河范牧地为营田。”[34]

其七，曰市田。即通过贸易的方式从少数民族那里购买土地，供招募弓箭手之用。如“熙、河、鄯、湟自开拓以来，疆虽广而地利悉归属羌，官兵吏禄仰给县官，不可为后计。仰本路帅臣相度以钱粮茶彩，或以羌人所嗜之物，与之贸易田土，田土既多，即招置弓箭手”[35]。说明市田主要盛行于今青海东部和今甘南吐蕃居住的一些地区。

此外，在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还有购买属户土地给弓箭手的情况。“（元祐元年七月）秦凤路经略司言，秦州缘边弓箭手，虽令同社助钱买马，然贫不能自给，马多阙。乞许市属户按汉界土田以资赡，从之。”[36]说明所购属户土地，仅分给贫乏不能自存的弓箭手，而不是秦州一带弓箭手的全部。

其八，曰平叛所得之地。如英宗治平初年，李参知秦州（今甘肃天水市），“蕃酋药家族作乱，讨平之，得良田五百顷，以募弓箭手”[37]。

应该指出宋代西北屯田的土地来源，最主要的和大量的是闲田、旷土，其次才是括地、公田、包占良田和市田，至于献地、牧地和平叛所得之地，在整个屯田土地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

## 三

西北屯田上的直接生产者最主要的是招募老百姓充当弓箭手耕种，其次，是轮番戍守的正军（如太宗时刘综令士卒屯田于镇戎军）。第三，是厢军及马递卒。“（元丰）五年，康识言：新复土地……乞许于秦凤、泾原、黑河三路选募厢军及马递铺卒愿行者，人给装钱二千，从之。”[38]说明厢军、马递铺卒主要用于新复土地，即熙河开边所扩大的疆土。

此外，还有犯罪发配之人，简称配卒。如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十

月，“可下诸路，将犯罪合配人拣选少壮堪田作之人，配营田司耕作，从之”[39]。

西北屯田的授田情况，弓箭手一般为一顷。如“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南）近城川地招汉弓箭手外，其山坡地招蕃弓箭手，人给地一顷，蕃官两顷，大蕃官三顷”[40]。有多至两顷的。如渭州（今甘肃平凉市）“弓箭手人授田二顷，有马者复增给之，谓之马口分地”[41]。有不足一顷的。如陕西“大顺城，西谷砦有强人弓手……人赋田八十亩，能自备马者赋田四十亩”[42]。还有四分之一顷的，即授田二十五亩的。如真宗时，陕西转运使刘综“于（镇戎）军城四面置一屯田务，开田五百顷，置下军二千人，牛八百头以耕种之”[43]。开田五百顷，由二千士兵去耕种，平均每个士兵正好耕种四分之一顷。造成不足一顷的原因，显然是由于缺地。当时缺地的弓箭手，除镇戎军外，还有泾原路。“元丰四年，泾原路经略司言，本路弓箭手缺地九千七百顷。”[44]

此外，一些地方如延州、保安军弓箭手的基层管理人员——押官以上皆给身份田。其具体办法是：“欲自十将至指挥使，量其家口数，更等第益以闲田，从之。”[45]

西北屯田的剥削量，一般弓箭手，每亩收三斗五升。如熙河兰湟路弓箭手，“每亩三斗五升，草二束”[46]。也有官私各半的。如徽宗时熙州（今甘肃省临洮县）、秦州（今甘肃天水市）一带的弓箭手迁到熙河新疆（指崇宁三年蔡京出兵从吐蕃手中夺取鄯州、廓州等地）耕种，由政府供给土地、农具、粮种，“遇成熟日，除粮种外，半入官、半给耕夫”[47]。

这种剥削量如果同北宋河东路的一些州（诸如代州、岢岚军北草城川等）的弓箭手相比，显然很重。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诏具为条，视山坡川原均给，人二顷；其租秋一输，川地亩五升，坂原地亩三升，毋折变科徭”[48]。两相比较，其剥削量为七与一之比。

如果将宋代西北屯田上的剥削量同南宋东南营田、官庄相比，也明显较重。南宋营田官庄上的剥削量，见于政府明文规定的为四六分成。“（绍兴七年十月）诏诸路营田官庄收到课子，除椿留次年种子外，今后

且以十分为率，官收四分，客户六分。”[49]如果按照陈规屯田法的规定，那就更轻。“凡民所营之田，水田亩赋粳米一斗，陆田豆麦夏秋各五升（也是一斗）。”[50]无论按照哪种，剥削量都比上述三斗五升和对半分成要轻。

## 四

西北屯田在一些地方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如真宗时裴济在灵州（今宁夏宁武县西南）“兴屯田之利，民甚赖之”[51]。仁宗康定年间种世衡于青涧城（在今延安东北清涧河北岸）“开营田二千顷，募商贾，贷以本钱，使通货赢其利，城遂富实”[52]。庆历年间，周美屯田于葱梅官道谷（位于今延安东北永平寨一带）屯田“岁收穀六千斛”[53]。

至于南宋初年，吴玠、郑刚中的屯田效果尤为突出。高宗绍兴年间，川、陕宣抚副使吴玠，在同金兵对垒期间，于梁洋一带“益治屯田，岁收至十万斛”[54]。得到了高宗赵构的赞扬。稍后，四川宣抚使郑刚中于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今甘肃成县），垦地“凡三千余顷，岁收十八万斛”[55]。说明郑刚中营田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应当指出，宋代西北屯田虽然在一些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从总体上看，其效果仍然很不理想，远远没有达到宋王朝的预期目的。有些地方的屯田和营田甚至出现了得不偿失的情况。如元丰年间，陕西木瓜原（位于今陕西佳县和吴堡之间）屯田，所得“不偿所费”[56]。南宋初年，曾经颇获成效的关外阶（今甘肃武都）、成（今甘肃成县）、岷（今甘肃岷县）、凤（今陕西凤县东北）等州屯田，到孝宗隆兴年间，也因所“得不偿所费罢之”[57]。

西北屯田为什么效果不佳，并且越往后越每况愈下了呢？

从整个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形势看，地主、官僚、商人三位一体的大土地所有制，自杨炎两税法之后日益发展，到了宋代取得了绝对的支配地位，在土地私有观念日益深化，租佃关系日益盛行的情况下，带有中古军事隶农性质和徭役性颇重的宋代屯田和营田，只能成为当时大土地占

有制的附庸和补充形式，并且必然要受其经营方式的影响而日益衰落。

在上述生产关系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不仅宋代西北屯田因为受其影响而效果不佳，而且从整个宋代屯田和营田的效果看，除少数几个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外，大部分地区效益都很糟。如南宋初年的屯田和营田，“除荆南解潜略措置，其余皆成虚文，无实效”[58]。就江淮等路营田来看，因办得很糟，“数年之间皆无成效，朝廷改置官庄，招召军民耕佃，给予牛具借贷种粮”[59]，一句话即采用私人地主的租佃经营方式，但仍由官府掌握而官庄化了。至于北宋河北路的屯田，虽然开始较早，但其效果还比不上陕西路。“在河北者虽有其实而岁入无几，利在蓄水，以限戎马而已。”[60]

具体来说，还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直接生产者身份低下，处境艰难，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诸路汉番弓箭手“皆涅手背”[61]；有些地方如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县西南）地区，“其番弓箭手并刺‘番兵’字于左耳”[62]；很多地区诸如陕西五路的弓箭手，“类多贫乏，或致逃走”[63]；一些地区的屯田和营田，发生了官府强迫老百姓耕种的现象。“陕西昨来兴置营田，本欲助边以宽民力……其近里州县官吏，不能体朝廷之意，将远年瘠薄无人请佃逃田，抑勒近邻人户分种，或令纳租课。”[64]

第二，屯田、营田管理制度上存在的问题以及一些管理官吏本身不称职所造成。“陕西、河东逐路汉弓箭手……提举官贪赏欺蔽，务要数多，妄行招刺，无以激劝。”[65]“自罢专置提举官隶属经略司，事权不专，颇失措置，根括打量，催督开垦，理断交侵等职事，尽在极边，帅臣无由亲到。……兼提举文臣玩习翰墨，多务安养，罕能冲冒寒暑。”[66]废罢行之有效的专门设置管理弓箭手营田的提举官，使之隶属经略司，造成事权不能专一，这是管理制度上存在的问题，而贪赏欺蔽，妄行招刺以及玩习翰墨，多务安养，则属管理者本身存在的问题。以此问题颇多的管理制度和很不称职的官吏去经营屯田和营田，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是不足为奇的。

## 五

宋代西北屯田有何特点呢?第一,“陕西、河东(路)弓箭手,官给良田,以备甲马,今河朔沿边弓箭社,皆是人户祖业田产,官无丝毫之损,而捐躯捍边,器甲鞍马与陕西、河东无异,苦乐相远,未尽其用”[67]。说明陕西等地的西北屯田在“官给良田,以备甲马”这点上,与河东地区完全相同,与河北地区正好相反。

第二,屯堡并置,亦兵亦农。“置屯之法,百人为屯,授田于旁塞,将校领农事,休即教武技。其牛具、农器、旗鼓之属并官予;置堡之法,诸屯并力,自近及远筑为堡以备寇至,寇退则悉出掩击。”[68]这是熙宁三年(1070年)秦凤路经略使李师中对西北屯堡的描绘。我们从这一简明扼要的描述中看到了屯堡并置及其耕战自守的蓝图。

应当指出,在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重镇是否设置堡寨,或者所置堡寨能否经得住敌人的围攻,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和能否在其分得的土地上耕作。“昨来(葛)怀敏之败,定川诸寨不足捍御,遂为弃地,则镇戎军西北两路更无保障,贼马可以直趋城下,弓箭手亦无依援,所给田土,难以耕作。”[69]这说明了堡屯互相依赖,互为存在条件的辩证关系。

第三,屯田、营田名异而实同。神宗时提点刑狱郑民宪云:“祖宗时屯、营皆置务,屯田以兵,营田以民,固有异制。然襄州营田既调夫矣,又取邻州之兵,是营田不独以民也;边州营屯,不限兵民,皆取给用,是屯田不独以兵也;至于招弓箭手不尽之地,复以募民,则兵民参错,固无异也。”这就是说屯田、营田名异而实同,不仅西北屯田、营田是如此,整个宋代的屯田、营田也是如此。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亦云:“熙丰间营田多在边州,土著人少,则不复更限兵民,但及给用即取之,于是屯田、营田实同名异,而官庄之名最后乃出,亦往往杂用兵民也。”这说明宋代西北屯田和营田,至少自神宗以后已经完全名异而实相同(其他地区也大体如此)。

第四，剥削形式多种多样。西北屯田的剥削形式不外三种：第一种是全部产品上缴军仓。主要适用戍守边地的正军。他们每人也分配一定数量的土地，农具、粮种，由所在单位供给，因为他们按时发有军饷，因此，其辛勤耕作所得的全部农产品均上交归军仓。如仁宗庆历年间，右骕使周美，为了阻止元昊入侵宋境，筑栅栏于延州东北面永平寨一带的葱梅官道谷，“令士卒益种营田”[70]大体上就是采用这种剥削形式。第二种是劳役地租。这在宋代西北屯田中是很少出现的。似乎仅见于熙河四州之地。神宗熙宗年间，吴充上疏云：“然屯田行之于今，诚未易，唯有因今弓箭手以为助法公田，似有可为，且以熙河四州较之，无虚一万五千顷，十分取一，以为公田，大约中岁亩收一石，则公田所得十五万，水旱瘠肥三分除一，亦可得十万。诏差太常寺主簿王君俞赴熙河路，与郑民宪同商议推行次第。”[71]这是一种采用劳役地租剥削形式的仿古助田法。这种剥削方式到底实行了没有呢？其效果如何呢？不得而知。但从“官无屯营牛具廪之费，借用众力”[72]，即一切费用（包括耕牛、农具、粮种等等）均由弓箭手自备这点来看，是很难长期推行的，即使勉强推行，其效果之差也是可以想见的。第三种是实物地租。这是西北屯田最主要的剥削形式。大凡使用弓箭手、厢军、或民户进行屯田、营田，均由所属单位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生产工具、耕牛、及粮种，然后到了秋收之时，一律交纳实物地租，其剥削数量的多寡，视各地生产状况而定。

宋代西北屯田的效益虽然很不理想，但它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一是可以垦辟西北的闲田旷土，积蓄部分粮食，为国家减少部分军需开支。如果将单纯驻守之军与屯田军所需的国家军费作一比较，大体上为三与一之此。“住营一兵之费，可给屯驻三兵，昔养万兵者今三万兵矣。”[73] 二是可以使士兵以边塞为家，安心守卫边疆，保家卫国。屯田士兵往往带有家属，并分得一至二顷土地，可以免除徭役、和顾、支移、折变等负担。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因为分得了土地，又享受了一般老百姓享受不到的免除徭役等权利，他们也就自然地产生了“顾恋之心”[74]。他们“顾虑家产，人自为力”[75]“力耕死战”，“世为边用”[76]。在这里，保家与

卫国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携带家属，且耕且战的屯田军，远非东面调来的充满“异乡感”的轮番戍守的“正军”所能比拟的。“其兵徒家塞下，重田利，习地势，父母妻子共坚其守，比之东兵功相远矣。”[77]三是减少军粮运输的劳顿，对于防止商人对粮食的囤积居奇，均平稳定粮食的价格，多少可以起些作用。

在兵饷粮运问题上，宋朝陕西沿边军民可以说吃尽了运输劳顿之苦，有的因此而丧生。“自西事以来，鄜延一路，犹苦输运之患，卞咸在鄜州，欲图速效，自鄜城、坊州置兵车运粮至延州，二年之内，兵夫役死冻殍及逃亡九百余人，凡费粮七万余石，钱万有余贯，才得粮二十一万石。道路吁嗟，谓之地狱。”[78]鄜延一路运输如此劳民伤财，其他如泾原、环庆、秦凤诸路概可想见。

自陕西沿边大力推行营田、屯田之后，这种情况明显得到了改善。范仲淹云：“臣观今之边寨……因置营田，据亩定课，兵获羡余，中粜于官，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可息矣。”[79]贾昌朝亦云：“可以减屯戍，省供馈矣。”[80]这些，充分说明陕西的屯田和营田大大减轻了军粮运输之苦。

由于实行屯田和营田，生产了一些粮食，使当地粮食不致奇缺，这对防止奸商囤积居奇，稳定粮价，显然是有好处的。“省转输，平粜价，如是者其便有六。”[81]

总之，宋代西北屯田可以足食足兵，巩固和加强西北的边防。即所谓，“田既垦，则谷自盈，募既充而兵益振矣”[82]。这种巩固和加强边防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仁宗时的宋夏交兵之上。由于宋朝在陕西一带推行了弓箭手营田，以及其他屯田，迅速加强了军事实力，从而迫使元昊媾和，纳款。“宝元中，赵元昊反……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辑番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臣服。”[83]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至庆历四年（1044年）之间的宋夏战争，最后之所以能够媾和罢兵，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从宋朝方面去看，及时在陕西沿边一带进行屯田，并获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于加速双方停

战议和的早日到来,无疑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宋会要辑稿》第 121 册食货二之八。

②《宋史》卷四〇二《安丙传》。

③④《文献通考》卷七《田赋七》。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二月辛巳条。

⑥《宋会要辑稿》第 121 册食货一之三二。

⑦《文献通考》卷一五六《兵八》。

⑧⑨《宋会要辑稿》第 121 册食货二之五。

⑩《宋史》卷一六三《职官三》。

⑪《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四三《营田》。

⑫《宋史》卷一六七《职官七》。

⑬⑭《文献通考》卷一五三《兵五》。

⑮《宋史》卷一九〇《兵四》。

⑯《文献通考》卷一五六《兵八》。

⑰《宋史》卷一七六《食货上》。

⑱《宋史》卷二八《高宗五》。

⑲《宋会要辑稿》第 121 册食货二之一六。

⑳《宋史》卷一七六《食货上》。

㉑㉒㉓《宋史》卷一九〇《兵四》。

㉔《宋史》卷一七六《食货上》。

㉕《宋史》卷二八三《夏安期传》。

㉖《宋史》卷二九二《郑戬传》。

㉗《文献通考》卷一五六《兵八》。

㉘《宋史》卷三五〇《张守约传》。

㉙《宋史》卷三三〇《傅求传》。

㉚《宋史》卷一九〇《兵四》。

㉛《宋史》卷一九一《兵五》。

㉜《宋史》卷一九一《兵五》。

㉝《文献通考》卷一五六《兵八》。

㉞《宋史》卷一七六《食货上》。

㉟《宋史》卷一九〇《兵四》。

㊱《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七皇祐元年七月癸丑条。

㊲《宋史》卷三三〇《李参传》。

㊳《文献通考》卷七《田赋七》。

㊴《宋会要辑稿》第 121 册食货二之六。

㊵《宋史》卷一九〇《兵四》。

㊶㊷《宋史》卷三四九《刘昌祚传》。

㊸《文献通考》卷一五六《兵八》。

㊹《文献通考》卷一五六《兵八》。

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三月辛亥条。

㊻《文献通考》卷一五六《兵八》。

㊼㊽《宋史》卷一九〇《兵四》。

㊾《宋会要辑稿》第 121 册食货二之八。

㊿《文献通考》卷七《田赋七》。

(51)《宋史》卷三〇八《裴济传》。

(52)《宋史》卷三三五《种世衡传》。

(53)《宋史》卷三二一《周美传》。

(54)《宋史》卷三六六《吴玠传》。

(55)《宋史》卷三七〇《郑刚中传》。

(56)《宋史》卷一七六《食货上》。

(57)《文献通考》卷七《田赋七》。

(58)《宋会要辑稿》第 121 册食货二之三。

(59)《宋会要辑稿》第 121 册食货二之三。

(60)《文献通考》卷七《田赋七》。

㊶㊷《宋史》卷一九〇《兵四》。

㊸《宋史》卷一九一《兵五》。

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一庆历三年六月辛巳条。

㊺㊻《宋史》卷一九〇《兵四》。

㊼《宋史》卷一九〇《兵四》。

㊽《宋史》卷一九〇《兵四》。

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九庆历三年正月丙子条。

㊿《宋史》卷三二一《周美传》。

(71)《宋会要辑稿》第 121 册食货二之四。

(72)《宋史》卷一七六《食货上》。

(73)《宋史》卷一九四《兵八》。

(74)《文献通考》卷一五六《兵八》。

(75)《宋史》卷一九〇《兵四》。

(76)《宋史》卷二八五《贾昌朝传》。

(77)《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四三《营田》。

(7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九庆历四年五月甲申条。

(7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四庆历元年 11 月乙亥条。

(80)《宋史》卷二八五《贾昌朝传》。

(81)《宋史》卷一七六《食货上》。

(82)《宋会要辑稿》第 121 食货二之六。

(83)《文献通考》卷一五三《兵五》。

作者:李蔚,1934 年出生,男,安徽宿松人,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 甘肃先秦农业考古概述

何双全

甘肃地处中国西北，自然资源丰富，历史源远长久，经过考古学者几十年的艰辛工作，在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处都发现了先祖们开拓大自然的足迹。综合分析、研究这些掩埋千古的历史文化遗产，对大力开发甘肃很有益处，本文就农业方面，从最早出现农具、农作物到有文字记载时期，做一全面总结叙述，使我们对甘肃的农业史有一个比较完整而系统的认识。

## 一、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出现原始农业，所以研究农业的起源写发展，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全省发现和发掘的各种文化遗存中，每每少不了农业方面的资料，特别是近几年新发现的早期遗存中，农业方面的资料更为典型，不仅在甘肃农业考古中占重要位置，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者。

### （一）大地湾一期文化

大地湾位于秦安县以北40公里的邵店乡，1979年以来，在遗址下层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另一种遗存[①]，经碳14测定，最早者公元前5200土90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5850年，与中原地区早期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年代相近。发现重要遗迹有房址、墓葬、窖穴三大类，出土遗物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粮食以及装饰品等，除外在墓葬中发现用家畜随葬的事例。这些情况真实反映出当时居民已过着比较稳定的以农业、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结构的生活。

1.生产工具

均为石质,有打制、磨制、琢磨等种。器形有刀、铲、斧、弹丸、磨石等。

石刀是收割工具,形如半月,扁而薄,两面加工,刃部经精磨甚锋利,并有使用痕迹,无钻孔,一般长 6.7 厘米,宽 4.7 厘米,厚 0.7 厘米,用硬度适中的绿叶岩制作。

石铲是翻土和播种工具,扁而平,长方体,有圆肩、窄肩两种,通体磨光,双面弧刃,刃部有使用痕迹,长 4.7 厘米,刃宽 8.4 厘米,厚 1.7 厘米。这种带肩的铲,是新技术的标志,两侧做成肩,中间部分凸出,便于手握,不但可以减轻劳动强度,如果安装长柄,还可作为锄来使用,这样更可以提高劳动效率。

石斧是砍伐工具,有长条平刃和弧刃两种,通体磨光,两面刃,手握处较浑厚,由于使所用致,残断者甚多。

2.窖穴与粮食

在第四发掘 T#303 号探方内发现的 F#374 号房子内有一窑穴,圆形直壁,底部存有已炭化的粮食颗粒,经鉴定是稷和油菜子,这是迄今发现的早期农作物之一。除外,一些陶器上彩绘图案中也间接地反映了当时农作物状况,如[illegible]图案,很可能就是某种农作物的雏形[②]。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正因为当时人们栽培了粮食作物,并成为生活中的主要膳食之物,所以当时的美术家难免要在自己的作品中给以描绘,实际上就是这些无文字说明的历史美术作品,告示后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3.畜牧业状况

畜牧业是与农业非常相关的一个部门,只有较发达的农业,才能有较发达的畜牧业。第 15 号墓中用猪下颌骨殉葬,说明当时家庭已饲养猪,而养猪是以农业为后盾的,所以从养猪业证明农业是比较发达的。

以上三个方面,使我们认识到,大地湾一期文化时期的居民完全过着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生活,特别稷粒和油菜子的发现,就是有力证据。它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当时的食物,而且为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农作物的栽

培技术和农业史获得了极珍贵的资料。简言之，甘肃农业的起源可上溯到距今七千多年以前或更早的时代。

（二）仰韶文化

分布在东部的平凉、庆阳、天水地区，经调查有上百处遗址，1978 和 1981 年连续两次在秦安大地湾正式发掘[③]，出土了不少半坡和庙底沟类型遗物。有居住遗址、墓葬、窖穴。出土物以陶器和生产工具为大宗。陶器种类纷繁，造型别异，多半是用来盛食物或煮饭的器皿，可见当时的日常生活是多样化的，而多样化的生活只有在农业较发达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所以陶器是原始农业发展的象征之一。从具体器物分析，这种象征义完全可以得到证实，如 M53 号墓出土的一件细颈壶，不仅器型美观，更使人注意的是器身沿腹部一周，绘作连续变形猪面图案，这种有意识的美术作品，揭示了当时居民家畜训养活动是很普通的事，同时也说明了当时肉食品已不是靠毫无保障的狩猎来补充，而主要是主动性的自营养猪业来供给。

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刀、陶刀。三者各具特色，器型规整，磨制很好。石斧先用砾石打制而成，然后修整磨制，刃部锋利，长条状，长 15 厘米左右，刃宽 5 厘米，双面刃，刃部以上逐渐聚成圆棒柄，适于手握，因使用大部分残断。石刀用石片做坯，后加工琢磨光整，两面刃，磨制锋利，长方形，长 8.4 厘米，宽 4.6 厘米，厚 0.7 厘米，中部靠背处钻三孔，为两面钻制，比大地湾一期文化之石刀单面钻制的技术大大先进一步。陶刀选用硬度较高的陶器残片制作，先打成规整器形，然后磨出刃部，两面刃甚利，平刃弧背，中间钻一孔，长 9 厘米，宽 4.5 厘米。

窖穴，一般笼统认为是藏东西的建筑，通过大地湾一期文化 F 374 号房子中窖穴的发现，足以证明窖穴主要用于储藏粮食，这一点在晚期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中更为明确，所以认为窖穴是杂货库，不如说是家庭粮仓更合适。仰韶文化遗存中发现不少窖穴，均建筑在房子外附近或屋内，如 H2，圆形圜底，直壁口微敛，口径 1.3 米，残深 45 厘米，一次可容 60 多公斤粮食。

(三)马家窑文化

初步统计共发现四百多处遗址,分布地域很广,东起天水,西至武威。由于地域的差异,所以出土物中除部分接近于庙底沟类型外,大都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根据地层叠压和年代测定又可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型,有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四个类型,主要遗存有房子、墓葬、窖穴、制陶窑址等,出土遗物六万余件,直接与农业相关者有生产工具、粮食作物、窖穴以及反映农业生产的彩陶绘画。

1.石岭下类型

1978 年以来在秦安大地湾正式发掘了该类型遗址④,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刀、石铲。石斧分平刃、舌状刃两种,通体磨光,长条形;石刀扁平,单刃稍弧,有打制、磨制二种,磨制者较锋利;石铲用石片做成,有圆肩宽平刃和窄肩宽平刃二种,器身扁平,磨制光滑。以上三种工具是石岭下类型的主要生产器具,其次还发现了窖穴和粮食,如 H219,袋状,内壁平整,口径 1.3 米,深 1.1 米,出土石磨盘,底部存有一层炭化粟粒。

2.马家窑类型

经正式发掘的遗址十多处⑤,遗存有房子、墓地、窖穴等,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骨两类。石器有斧、锛、刀、磨盘、棒;骨器有刀。其中石刀和骨梗刀很有特色,石刀背部呈凹弧形,刃部呈凸弧形,穿孔多位于刀背处。骨梗刀,先在选好的骨棒的一面刻凸槽,然后镶嵌锋利的燧石片,比石刀较锋利。

窖穴均筑于房子附近,有袋状和长方形数种,窖内往往储有粮食。如 1978 年大地湾发掘的一窖内出土炭化粟粒、穗⑥,又 1978 年在临夏东乡林家遗址 F20 号房子内出土的陶罐里发现炭化粟粒、大麻籽、稷,H19 和 H21 号窖穴内发现带有细长芒的稷穗捆扎成束堆放一起⑦。除外,诸类遗址中均发现了不少牛、羊、猪、狗、鸡等家畜残骨,说明畜牧业也较发达。

3.半山类型

经正式发掘的遗址有 5 处,遗存有房子、墓地、窖穴、窖址等。出土

的生产工具有石斧、锛、凿、刀和骨柄石刃刀等。石斧形体较小、双面磨刃，有长条和长方体两种，一般长 14 厘米，刃宽 4 厘米，石刀最为常见，有一种很有特色，长方形，凹刃，近背部钻两孔，刀身一侧做锯齿状；骨柄石刃刀，选用较好的骨料，挖成槽，然后镶嵌长条状水晶石片做为刃，比马家窑类型同类刀稍为进步。同时也有粮食出土，如兰州青岗岔遗址 F1 号房子内发现糜籽颗粒[8]。

4.马厂类型

经正式发掘的遗址有七处之多，遗存有房子、墓葬、窖穴等。出土物以生产工具为最多，分石器、骨器两类；石器有斧、刀、凿、锛、杵、磨盘等，均选用较坚硬的石料制作，器形与上述各类型文化中所发现者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就是刃部和柄部较宽、较长。骨器仅骨柄石刃刀一种，形状与制法和半山型的骨柄石刃刀相同。此外，普遍发现粮食标本，如临夏马家湾的房子中发现炭化谷粒[9]，这些粮食多发现于房子和窖穴内，也有用粮食随葬的事例，如同一文化的青海柳湾墓地，普遍用粮食随葬，颗粒饱满的粟装于陶瓮，每墓少者一个，多者达四个，可见马厂时期的社会粮食是较为宽裕的[10]。

（四）齐家文化

齐家文化分布地域很广，东起泾、渭流域，西至湟水流域及武威地区，南达白龙江流域[11]，北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12]，几乎遍布全省，遗址达三百余处，经正式发掘者 13 处。由于分布地域广阔，所以文化内涵复杂，通过长期的比较研究和碳 14 的科学测定，使我们认识到东部地区的年代比西部地区要早[13]，东部早期的某些器物接近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基于目前这种认识，我们推测齐家文化是起源于客省庄二期文化，经过东部地区的发展传播，逐渐遍及全省。通过研究，以大何庄、秦魏家遗址地层和墓葬的叠压关系以及陶器的组合等，可将齐家文化分为早晚四个时期：一期以大何庄下层为代表；二期以大何庄上层为代表；三期以秦魏家下层为代表；四期以秦魏家上层为代表[14]。虽然可分四期，但主要遗存都是共同的，有房子、墓地、窖穴三大类，出土器物有铜、石、骨、陶四

大类，铜器始见于二期文化，主要是装饰物，也有生产工具。石器和骨器大都是生产工具，陶器大宗为生活用具。另外，往往发现粮食作物，墓葬中每每用在家畜殉葬，所以反映农业生产情况的资料最为丰富。

1.生产工具

有铜、石、木、骨四类。铜器有刀、斧、凿，刀长条形，长 17 厘米；斧刃宽 4.2 厘米。经化学鉴定，这些铜器含锡量均在 10%左右，已接近青铜；石器有斧、刀、镰、锄、铲等，均选用硬度较高的石料制作，刀和镰多穿孔磨光。这些石器比早期文化发现的较进步，如石斧，形体扁平，带肩可以安柄，延长手臂，减轻劳动强度；石铲用砾石打成的石片制作，有的向一边弯曲成柄，有的两侧带肩，刃呈半圆形，石刀数量最多，大何庄一处就发现 80 余件，呈长方形，平刃、单孔和双孔都有；石镰和锄具一种新工具，用板岩或砂岩制作，过去少见，齐家文化普遍使用；木器因时代久远不易保存，但在齐家坪遗址的一个窖穴之内壁上给我们留下了当时使用木质工具的信息，这种工具遗痕深刻在土壁上，有三个齿尖，齿宽约 10 厘米，单面斜刃，入土深度达 20 厘米，可能是木耒之类工具[15]；骨器有铲、锄，用动物肩胛骨或下颌骨制成，形状有长条状带肩或三角形，经使用光滑锋利[16]。所有这些质料不同形状纷繁的生产工具标志着齐家文化生产力的新发展。

2.农作物

除众多的生产工具外，各期遗址中普遍发现粮食，种类有粟、麻。如大何庄 F7 号房子中出土的 10 号罐和 M73 号墓葬陶罐内均出土了粟粒[17]第 M25、M27、M57 号墓尸骨和 M34、M55、M75 号墓随葬陶器上均残存布纹遗迹，这些布纹很可能是麻类作物纺织制作者，从而使我们认识到，齐家文化时期的农作物，除了种植粟外，还种麻，麻籽可做油料，麻皮可做衣料，也易种植，是很理想的农业经济作物。

3.粮仓——窖穴

随着粮食产量的不断增加和度过寒冷的冬季生活，相应出现了储藏粮食的仓库，即窖穴。[18]这时期的窖穴均建筑在居室的周围。有长方、圆

形直壁、圆形尖底、椭圆、袋状等种类。建筑工艺细致规整，有的内壁涂抹草拌泥或红胶泥[19]；有的在窖穴上搭棚为室、如武威皇娘娘台和广河齐家坪遗址的窖穴；上部用圆木搭盖屋顶，向北开门修筑斜坡门道，门口两侧相对立圆木构成门框，形成一座半地穴式的很正规的仓房。室内放置若干陶罐，罐内装粟。这些现象不仅证明窖穴是粮仓，而且告诉我们远古时人们储粮的方法：即先将粟装入陶罐内，然后再将粮罐安放一定的位置，这样亦可保持干燥，不易变质霉烂，又便于随时取食。以广河齐家坪第1号窖穴为例计算，重叠放置，可容70多个粮罐，每罐以装15斤粟计，一次可储粟1000斤左右，这仅是一个家庭的储粮情况，大何庄遗址共发现12座房子，15个窖穴，平均每座仓储粮以1000斤计，共约储粮15000斤左右，这万余斤粮食以居住单元为单位，实约为12个家庭的口粮，每家的人口，从大何庄82座墓，每墓平均二人计，共有164口人，平均每家12口人左右。众所周知，储粮主要是备冬食用，那么上述一座仓内1000多斤粮食是一个12口之家一个冬季的口粮，平均每人84斤左右，冬季以三月计，平均每人每月的大致口粮为28斤左右。可见广河齐家坪齐家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处于较发达的阶段，加上畜牧业保证副食品的供给，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比较富裕的，也只有保持这个生活水平，才能保证农业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前进。[20]

4.畜牧业

各处遗址中普遍发现猪、牛、羊、马、鸡、狗骨骼，六畜具备，以猪、牛、羊为最多，证明人们已能很好利用家畜对人的极大作用、考虑齐家文化出现过木质工具，可以推测，当时人们养牛除了食用之外，可能还肩负生产的任务，即运输和耕作及其他。

综上所述，甘肃上古时期的农业生产状况，从距今七千多年，近八千年前就已产生。最早使用的工具，以石斧的斧、刀、铲、镰为主，到了较先进的齐家文化阶段，除继续保留早期的工具外，出现了红铜和青铜制造的金属工具，同时也出现了很容易利用和制造的木质工具，并有机地利用了家畜对生产的极大作用。农作物的种植种类，从最早粟一种，逐

渐出现了稷，油菜、麻、大麻等多种经营。家畜训养从最早养猪、羊开始，逐渐发展到养牛、马、鸡、狗六畜并举。[21]所有这些资料展现了古代甘肃农业社会的基本面貌。

**二、商周时代**

商周时期，甘肃境内各种文化很复杂，有与同中原地区完全相同的文化类型，也有根本不相同的地方文化类型。根据分布地域的不同，依时代为序有火烧沟类型、辛店文化、沙井和寺洼文化，庆阳等地两周墓葬等，这些各类遗存中有关农业的资料也不少。

（一）火烧沟类型

1976 年在玉门市清泉公社火烧沟发掘墓葬三百余座，同一类型的遗存主要分布在山丹、民乐、酒泉、玉门一带，酒泉以北已达内蒙古额济纳旗地区；年代经碳 14 测定为公元前 1500±90 年，相当二里头文化的早中期。随葬器物铜、石、陶、金、银、骨器共存，是全国早期金属器物发现最多的一个地点。[22]

1.生产工具

有石器、铜器、骨器三类。石器有刀、锄、磨盘三种，以石刀为最多，长方、平刃、单孔，刃部两面磨制，大量使用绿叶岩。石锄用石片制作，圆肩弧刃，打制而成。磨盘呈长方形，较厚，表面磨制凹面。铜器除装饰品和兵器外，生产工具有斧、刀、凿、镢、镰，经化学鉴定均为青铜。骨器主要是匕首和刀，均用动物骨骼磨制而成。

2.农作物

有粟和麻二种，粟均放在随葬的陶器内，与石刀或陶纺轮同一位置。麻未发现直接标本，从尸骨和铜器以及陶器表面遗留的布纹痕迹观察，其质料为麻类纺织品。

3.畜牧业

畜牧业是该文化中的重要特点之一，差不多每座墓中都用家畜骨骼随葬，种类有猪、羊、牛、马、狗、鸡等，以羊为最多，如 M277 号墓中随葬羊多达 44 只，可见当时的畜牧业是非常发达的。

（二）辛店文化

已知遗址、墓葬130多处[23]，分布在渭河、洮河、大夏河、庄浪河流域以及黄河沿岸。经正式发掘的有张家嘴[24]、姬家川[25]、莲花台[26]、东乡崖头等[27]。主要遗存有房子、窖穴、墓葬。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石器有斧、刀、铲、锛、杵、臼、磨盘等，打制、磨制均有。石斧有长方体、梯形、带肩等式，有肩石斧器形扁平，顶端和柄部有突棱或斜肩，便于手握或安柄。石铲形体较大，刃部亦较宽。石刀有长方形或椭圆形，有的刀在刃部两旁各打一小缺口，有的在刀身两侧打缺口。骨质工具有铲、凿，用动物肩胛骨或下颌骨制作。刃部经磨锋利。

储藏粮食的窖穴有袋状、长方直壁两种，以袋状者居多，粮食作物至今未发现实物标本，但从陶器彩绘图案中似植物形状的纹饰看[28]，辛店文化的居民仍过着以种植农作物为主的生活。

畜牧业情况，从出土骨骼看，曾饲养有牛、羊、猪、狗、马等，以养羊为主。

（三）沙井文化

分布于河西走廊的古浪、民勤、武威、永昌、张掖等县市，遗址和墓葬都有发现，出土物石、铜、陶器共存，最近还发现有铁器，如永昌出土铁铧犁，有少量彩陶。生产工具有石斧、环形斧、石刀等。由于未经大面积发掘，很难确知文化全貌，仅所见的生产工具看，亦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社会经济来源[29]。

（四）寺洼文化

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平凉、庆阳、天水、武山、临洮、岷县、庄浪县以及白龙江流域[30]，出土物以陶器为主，兼有青铜兵器。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有石斧、石刀。做法以打制为主，磨制者少见。墓葬中往往用羊角或羊头随葬，反映出农牧并举的生产活动，就文化的全貌来看，有可能是古代羌族文化。

（五）两周时代

分布在灵台、泾川、平凉、武山、天水、陇西、西和、礼县等地，调查确

知的遗址一百余处，经正式发掘者有陇西西河滩西周遗址，灵台白草坡墓葬[31]，平凉四十里铺墓葬[32]，灵台洞山墓葬等[33]，出土物以青铜礼器、陶器、玉器、兵器为主。生产工具有石刀、石斧、石铲、骨铲、蚌镰等。这些出土物与中原地区同时代器物亦相同。从文献考察，当时的西方（今甘肃东部）是周民族的发祥地，武王克商后，占居中原，除有直接的辖地外，也建立了封国，西方成了巩固的后方，所以社会生产、文化内涵与中原地区完全一致，社会生产仍以发展农业为主。《诗·周颂·噫嘻》写到："嘻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可见当时的生产规模是很大的，种植农作物的种类也很多。

**注释：**

①④⑥《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文物》1981 年第 4 期。

②③《一九八〇年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2 期。

⑤《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07~109 页。

⑦《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发掘》《考古辑刊》4，1984 年版。

⑧《甘肃兰州青岗岔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2 年第 3 期。

⑨《甘肃临夏马家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 年第 11 期。

⑩《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第 66 页。

⑪《白龙江流域调查简报》《文物资料丛刊》2，1978 年版。

⑫《内蒙古白音浩特发现的齐家文化遗物》《考古》1962 年第 1 期。

⑬《试论齐家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的关系》《文物》1979 年第 10 期。

⑭《论大何庄与秦魏家齐家文化分期》《考古》1980 年第 8 期。

⑮1976 年在广河县齐家坪的发掘资料正在整理中。

⑯⑲⑳《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 年第 2 期。

⑰《临夏大何庄、秦魏家两处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 年第 8 期。

⑱《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 年第 2 期。

㉑《文物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42~143 页

㉒《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2 页。

㉓《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考古》1956 年 6 卷第 2 期;《甘肃古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60 年 2 卷第 3 期;《黄河上游盐锅峡与八盘峡考古调查记》《考古》1965 年,第 7 期。

㉔㉕《甘肃永靖张家嘴与姬家川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 年,第 2 期。

㉖㉘《甘肃永靖莲花台辛店文化遗址》《考古》1980 年,第 4 期。

㉗《甘肃东乡崖头辛店文化墓葬清理记》《文物》1981 年,第 4 期。

㉙《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第 231~233 页。《文物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第 144 页。

㉚夏鼐《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 年版;《甘肃庄浪县柳家村寺洼墓葬》,《考古》1963 年,第 1 期。

㉛《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 年版,第 2 期;《甘肃灵台县两周墓葬》《考古》1976 年版,第 1 期。

㉜㉝《文物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32 页。

作者:何双全,1952 年出生,男,甘肃天水人,甘肃省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 瓜沙曹氏节度尚书曹仁贵史事钩沉

马 德

## 一

曹仁贵是瓜沙归义军历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早在1943年,日本学者藤枝晃先生发表《沙州归义军始末》提出曹仁贵为曹氏归义军第一任节度使问题[①]。1980年,日本出版由众多敦煌学家共同编写的敦煌巨著《敦煌讲座》,在第二卷《敦煌历史》中,这一观点被认可,特别是由当时的青年学者森安孝夫所写《回鹘与敦煌》一章,对此有较详细的论述和肯定[②]。

尽管这一问题早为中国国内多数敦煌学者所熟知,但在学术界并未进行过大的争议。到1987年,唐耕耦发表《曹仁贵节度瓜沙始末》一文,指出了曹仁贵是瓜沙曹氏归义军第一任节度使,其主要根据是P.3929《甲戌年(914)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授官牒》文末的签名,经张政烺先生确认为"仁贵"二字。唐文还特别声明,他只是听说过、但没有看到过藤枝晃论点及其相关的文章[③]。

敦煌研究院一批从事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的老专家们,如贺世哲、孙修身先生等,一直认为曹仁贵与曹议金是同一人;1990年,贺世哲先生发表《试论曹仁贵即曹议金》,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论述[④]。1993年,荣新江先生根据自己在敦煌考察所得新资料,撰写并发表《关于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的几个问题》,对贺世哲先生的论断作进一步论证[⑤]。至此,曹仁贵即曹议金,这一看法在学术界似已定论。

敦煌文献中明确反映曹仁贵的资料,只有P.4638长卷正面粘接的曹仁贵献物状和上令公状,两份文献均无年代题记,有人将其比定在公元

916~918 年间，盖因先限定曹仁贵为“首任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的年代，或认为仁贵（名）在启用议金（字）之前，即公元 914~920 年间的前提下，所得之先入为主之论[6]。而唐耕耦文所谓经张政烺先生确认为“仁贵”签署的 P.3929《甲戌年（914）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授官牒》，是否能成立，尚待进一步探究。

有学者认为，曹氏首任节度使在前期先后使用过“尚书”和“太保”称号，称尚书者即为仁贵时，称太保者即为议金时。因为曹仁贵的两份文件上都有“尚书”署衔。而敦煌文献中有关这一时期“尚书”活动的记载还有一些，但并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特别是 S.6417 中《国母天公主为故男尚书诸郎君百日追念祈福文》，在笔者目前所见有关曹氏归义军研究的论文、论著中均未论及；1995 年，黄征、吴先生辑《敦煌愿文集》中对此文献作了录文、标点并校注，但对“故男尚书”也未作解释；笔者自己虽然以前也曾多次在缩微胶卷和有关书刊上看到这份文献，但也未曾细究。1997 年 11 月，笔者在英国国家图书馆阅读了 S.6417 原件，下意识地感到必须对此有一个解释，为此不揣冒昧，将自己掌握的有关曹仁贵问题的资料一并理出，草就此文。

## 二

前文已及，敦煌文献中明确反映曹仁贵的资料，只有 P.4638 长卷背面粘接的曹仁贵《献物状》和《上令公状》。两份文献均不长，这里全文移录：

（一）献物状

1.玉壹团重壹斤壹两，羚羊角伍对，硇砂伍斤

2.伏以碛西遐塞，戎境

3.枯荒，地不产珍，献无

4.奇玩。前物等并是殊方

5.所出，透狼山远届敦煌

6.异域通仪，沙瀚海来

7.还。沙府辄将陈

8.献，用表轻怀，干黩

9.鸿私。伏乞

10.检纳。谨状

11.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守沙州长史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曹仁贵状上

（二）上令公状

1.仲秋渐凉，伏惟

2.令公尊体起居万福。即日仁贵

3.蒙恩，未由拜伏下情，倍增

4.瞻恋。伏惟

5.鉴察。谨因

6.朝贡使往，奉状不宣。谨状。

7.八月十五日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守沙州长史

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曹仁贵状上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件文书都写于敦煌，而受礼物者及令公，均为从中原来的官吏。

P.4638 正、反两面抄写和粘接有多份文献。其中，有据可查的最早者为公元 931 年（抄写年代更晚），晚者为公元 937 年，包括曹良才赞、有关海晏和龙鼻的文书等。因此仁贵这两件文书亦当写于此间。

敦煌文书 P.2942V2 为《长兴二年（931）净土寺诸色人破历》，有云：

果叁斗，送路令公及回迎尚书用。

这里所记，与 P.4638 二件所记为同一事，即由敦煌的尚书接待中原的令公。五代时，曹氏政权在敦煌接待中原使者，这样的事并不太多，而且职务又相吻合。由此可以推定，曹仁贵献物状与上令公状两文件，均写于公元 931 年。文中所记曹仁贵“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守沙州长史”，是他担任的实际职务。曹议金时期，议金频频亲率大军征讨或出使而多不在敦煌，故有曹仁贵的留后一职；也正是因为曹仁贵此时充留

后之任，便有了 P.4638《献物状》与《上令公状》的产生。

我们在 P.3461《岁首窟上燃灯文》所见，有列“刺史”之后的“留后”：

次为使主厶官延佑，皇□以佛荫而加新；国母天公主长年，宠泽共仙岩而转秀；牧黧刺史、留后，□固无乘；娘子郎君，永祧之业方大。

此文献写于 936 年正月十五日⑦，此时，元德（列于天公主之前的“使主某官”）已任节度使，并因而列于留后之前的“刺史”则为曹元深，时为瓜州刺史；所以，这里的留后只能是曹仁贵。另外，仁贵列于刺史之后，也透露了他与曹氏家族的关系。

我们再看 P.3239，被许多专家认为是“仁贵”的字样，实际上并不是“仁贵”二字，而是在中国很早就存在的一种押署符号。这种符号在九世纪后期，逐渐由简单变得复杂起来。这一点在敦煌文献中例子很多，也有学者专门研究过此事。再仔细看这个签署，与正文中的行楷虽似出自一人之手，但书法完全不同，按中国书法的常识，同一个字的行书笔画只能比楷书笔画少，而这一签署，笔画明显多于“仁贵”二字。因此，笔者以为很可能就是曹议金初掌归义军政权时代的押署符号。

## 三

曹仁贵的实际职务是“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守沙州长史”。沙州长史实际上是归义军节度使的办事机构，按唐旧制，节镇（节度使府）所在州的（都督府）长史，一般都由节度使本人担任；这种情况到晚唐时期有所改，但是长史职务还是由与节使度使最亲近者担任。而曹仁贵担任归义军节镇沙州的长史，即说明仁贵在曹氏家庭中的身份、地位非常特殊。而且，“尚书”这一高贵称号，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⑧

早在曹议金执政时期，文献中就出现了列于“刺史”之后的“尚书”。S.663《某官佛事斋文》云：

又持是福，伏用庄严：我太保贵位，伏愿福如海岳，承虎节而延祥；禄极江淮，治河西而世代；国太（泰）吉庆，比日月而渐圆。公主夫人恒昌，保

芳颜而永洁。刺史、尚书等固受(寿),愿接踵而绍隆。诸小娘子延长,寿贞兰而皎皎。

这里的太保即曹议金;公主、夫人即议金夫人天公主李氏与广平宋氏,刺史即沙州刺史曹元德、瓜州刺史曹元深;而这位列于刺史之后的尚书,当即曹仁贵。曹议金称太保之年,一般认为是926~928年,但议金的一些称号一直是混用的,特别是像太保之类的高级称号,况且使用这些称号者都是其下属在敦煌地区范围内用,书写上并不十分严格,亦无明确的年代限制。如大王称号,一般认为在公元931年后才用,但实际上在公元922年前后就已经在使用了,不过仅仅限于瓜沙地区。所以,S.663也可能是曹议金晚年的文献。

关于这位尚书的活动年代,最晚的记载大概是P.4046《天福七年(942)十一月二十二日曹元深回向疏》称:

司徒宝位,宠禄日新,同石劫而长荣,并江淮面不竭;尚书民俊,抱文武之宏才。

这里的司徒为曹元深,尚书即曹仁贵。

P.3763《净土寺诸色入破历》被认为也是公元942年的文献,其中有记:

立机一匹、官布一匹,尚书小郎君患念诵人。

可能是说公元942年时曹仁贵已经有了自己的儿子,被称为"尚书小郎君"。

## 四

因资料有限,我们这里先将S.6417V《国母天公主为故男尚书百日追福文》全文录出:

1.盖闻浮华不久,显(鲜)花落于芳园;梦世凋残,似春林变

2.孚(乎)枯谢。况生因福善,果感百年,灭同终身,魂归永夜,由

3.是霞光曜彩,颢渺无垠,倏忽去留,因依有尽,今古有

4.此，谁能免斯?唯佛世尊，早超生死者也。厥今悲含
5.千圣，抱泣三尊，焚一瓣之旃檀，邀四衣之真俗，从
6.良舍施，启嘉愿者，有谁施作?时则有我国母天公主奉
7.为故男尚书诸郎君百日追念之福会也。伏惟故尚
8.书，天资直气，岳降英灵，怀济物之深仁，蕴调元之
9.盛业，故得分苻千里，建节百城，常彰龚遂之风，户
10.叹吴忠之化；长史乃文星曜质，豹变资神；司马书
11.剑辟才，英猷独步；诸郎君俊哲，皆含梦锦之能；
12.雅量超群，武备由基之略。理应棣萼相映，玉树莲芳；
13.何图一日千秋，杳然冥寞。所恨孔怀恚重，天轮俄逝于重
14.泉，同气情深，手足顿倾于厚夜。潺溪绿水，幽壹增涕泗
15.之悲；苍翠青松，萧飒助凄凉之韵。日驰月驰，渺透冥露(路)
16.之人；福往资来，大展馨香之会。其从良乃比詧有德；乳哺
17.代亲，奉孝尊堂，并谷愆过，念慈仁孝，有彼成生，抽放从良，广无
18.构钩。幻愿使人天等秀，贵贱齐闻，断怨烦恼之根，厥使菩提之萼，
19.政使国母悲深丧目，庭亏问礼之踪；痛切肝肠，尝绝献甘之
20.迹。空遣书剑，有苗不实芳兰；更想形仪，泣断趋庭之
21.诲。阳升阴谢，昧去明来，斋为钦仪，俄临百日。其从男
22.云云。于是清吟梵匣，供备重喰，命真子于鹿园，构
23.纯陀于鹫岭。

此国母天公主者，即曹议金之回鹘夫人陇西李氏，议金死后为曹氏后人称为国母。既如此，则证明此故男尚书死于议金之后、天公主之前，故在其死后百日由国母天公主为其主办追念福会；在曹议金死后，被还健在的“国母天公主”称为“故男尚书”者，应是仁贵。因为其他几位公子如元德、元深均已不用此过时之称号，而年纪尚轻的曹元忠为议金之另一夫人广平宋氏所生，在天公主离世 30 多年后才死去；文中之“长史”“司马”当为仁贵担任过的职务。由此可以断定，此尚书为议金与李氏所生之子；能让国母天公主急瞎双眼者，除非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这位

官居尚书的李氏亲生子，当非仁贵莫属。

曹议金最少有四个儿子，即元德、元深、仁贵、元忠。元德、元深均为曹议金之结发妻钜鹿索氏所生，议金执掌归义时，索氏可能已去世。议金时代的各类斋文中，往往将“公主夫人”前后并列，说明李氏长于宋氏，因之仁贵长于宋氏之子元忠。既如此，议金与李氏结婚当在公元 914 年执掌归义政权后不久，而仁贵则于此后一两年出生。最近有学者考订，曹议金与李氏结亲的时间可能在天复四年（904 年）之前[9]；若此说成立，则仁贵出生又早此十年，到公元 931 年时完全可担当重任。在目前所见曹氏归义军时代的文献中，李氏一直占据议金第一夫人之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因为当时甘州回鹘十分强大，曹氏归义军初期还要代已灭亡的“西汉金山国”履践与甘州回鹘的父子之盟；曹氏归义军的发展和强大也与甘州回鹘关系重大。李氏之子仁贵也就被安排为掌管节度府衙的沙州长史，并在节度使外出时代行其职，称“节度兵马留后”；而安排其长子元德、次子元深分别为沙州和瓜州刺史。而当后来元德、元深先后继任节度使时，仁贵仍官居“尚书”，一直到死。

综上，被“国母天公主”李氏在这里为其作“百日追念之福会”的“故男尚书”就是仁贵。李氏几年内先后遭受丧夫、丧子之痛，自己也在丧子百日之内，有了“丧目”（双目失明）之疾，并于爱子百日之忌举办追念之福会，而有此“追福文”传世。

仁贵一行死因不明，在《追福文》中，描述仁贵死后只有天公主急瞎双目，但没有出现作为同胞兄弟的节度使、刺史等人及其态度，说明仁贵之死，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值得注意的是，在“追福文”中一同被追念者，还不止“尚书”一人，而是“尚书诸郎君”；这就是说，与曹仁贵同死的还有天公主的其他儿子；天公主为曹议金所生并不止仁贵一子。而且，既然是数人同死，则无疑是一同死于非命。

S.6981Dv《请法奖讲经文》[10]开首云：

伏惟司徒、司空、仆射、尚书等，并是龙胎间气，风骨天然，碧天白月，赤水古殄；文化妙备于陈思，武略全生于韩信；故得祥风逐驾，瑞兽随轩，

忠孝常纳于福慈，每敬幽宗于佛理者，则司徒、司空、仆射、尚书等之德。

这里的司徒为节度使曹元深，仆射系曹元忠，尚书即曹仁贵，唯司空不知所指。这份文书写于曹元深称司徒时期，即公元 942 年后。但在这里将仁贵与元忠的位置调换了一下，而且本来尚书一职要高于仆射。这一现象也反映出某种迹象。

早在记述曹元德和李氏建成莫高窟今第 100 窟的功德赞文 S.4245（写于公元 935~939 年）中，就不再出现尚书一名；不过，此文中除司空元德、天公主李氏之外，其余曹氏男女均以“诸幼郎君昆季”一笔带过。与 S.4245 同时代的 P.3550《都衙镌大龛发愿文》（即曹议金妹夫张怀庆营造莫高窟今第 108 窟的发愿文）中，有司空元德、天公主李氏、刺史元深而无尚书。曹元深执政、建窟时期的斋愿文 P.3457 中（写于公元 942 年）也有国母天公主而无尚书[11]；而与 P.3457 同时的 P.3269《司徒（曹元深）作佛会发愿文》中也是在司徒、天公主之后写刺史与小娘子，而此时的刺史是瓜州刺史曹元忠。尚书、留后等似已退出曹氏政坛。

曹元德执掌归义时期，经过曹氏政权二十多年的经营，瓜沙地区已由初期的内忧外患逐步走上了强盛和繁荣，这样就使曹氏与回鹘的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善。这种改善主要表现在曹氏对甘州回鹘态度方面。因为天公主在世时是归义军的一枝花，不时可摆出来让人看看；她死后却一次也没有在曹氏大窟中再现过，这一点就连一般的敦煌贵族也不如；而议金父子们一直到三四十年后还被作为已故的供养人画在窟上。另一方面，议金子孙辈中再未发现有娶甘州回鹘公主为妻者。从这一历史现象中可以窥探曹仁贵兄弟们的死因，应该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对此，希望日后更有新资料或新成果。

仁贵诸郎君可能死于曹元深时期，前述 P.4046《曹元深回向疏》所记最晚者公元 942 年。这时作为仁贵之弟的曹元忠已羽翼丰满，两年后便继元深任节度使，执政 30 余年，开创了曹氏归义军历史上的极盛时期，而且在这一时期完全摆脱了甘州回鹘的羁绊。根据种种现象分析，曹仁贵的死与雄才大略的曹元忠不无关系。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曹议金之子均为“元”字辈，仁贵与此相悖，为议金子似不可信。根据现有资料，只能作如下解释：议金与天公主李氏所生之子，在取名上与其他诸子有别；而且，议金与天公主所生非仁贵一子，尚有其他“诸郎君”，亦应有与仁贵相应之名，只是有待新资料的发现及进一步的探讨。

## 五

曹氏权贵们均热衷于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处大兴土木营造佛窟。但在莫高窟的曹氏大窟中，一直没有发现关于曹仁贵的只言片语。当然，这并不等于没有，只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做仔细的考察。仁贵在世时期，曹氏及其幕僚们在莫高窟所建大窟依次有：98、108、232、256、100、454 等窟。这些洞窟中，除 232 和 256 窟甬道的原曹氏供养像被全部覆盖外，其余诸窟都保存有曹氏官吏供养像，只是其题榜多已泯灭。只有保存较好的 454 窟，甬道南壁绘曹议金至曹延禄六任节度使的供养像，作于公元 976 年，与曹仁贵无涉。

莫高窟第 98 窟是曹议金的功德窟，建成于公元 925 年，俗称“大王窟”[12]；该窟甬道南壁是曹氏家族的男士们的供养像，共十二身，其中最后四身是列成两排、共用一题榜的小像。即使不计后面四身，单就前面八身而论，第一身曹议金，题榜存；第二身至第八身题榜均不存；同 100 窟相较，可知第二身为曹元德；加上元深、元忠，一共才四身。后面看不清题名榜者还有四身。笔者认为，第三至第八身中，必有一位是曹仁贵；而且，曹议金的儿子不是三个，也不是四个，而最少是七个（这里将最后的四身小像看做议金孙辈）。

与 98 窟相邻的莫高窟第 100 窟，建成于公元 939 年，俗号“天公主窟”；甬道南壁绘曹议金为首的曹氏家族男士十一身，分四组：第一组一、二身议金（已故）、元德题榜均存；第二组三、四、五身同样大小，但又小于第一、二身，题榜不存，但无疑是曹议金的三个儿子、元德的三个弟弟；

第三组六、七、八、九身同样大小但又小于第二组，现无题榜；第四组十、十一身更小。这里只从第二组就可以认定有曹仁贵。

第 108 窟为曹议金的妹夫张怀庆的功德窟，建于公元 939 年，俗号张都衙窟。甬道南壁虽东部有塌毁，但仍尚存曹氏家族男供养像七身。与 100 窟一样，第一、二身为议金、元德，题榜存；第三至第七身属一组，题榜无存，当为议金子辈，其中必有仁贵。

曹氏时期，每一位节度使都在莫高窟建造有自己为窟主的大窟。作为尚书的曹仁贵看来也不甘落后。P.3763《净土寺诸色人破历》记：

粟二斗，沽酒，尚书安窟檐时将用。

粟二斗，尚书上梁时窟上来日迎和尚用。

在莫高窟崖面上，曹氏诸节度使所建大窟多已确认。但位于北大像 96 窟北侧二层的大窟第 233 窟，也为曹氏大窟，只是因被后代重装已非原貌，但原建时的痕迹，包括窟檐痕迹至今仍历历在目。推测可能为曹仁贵所建。

## 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可知曹仁贵的一些情况：

曹仁贵是曹议金的第三子，其生母即议金之回鹘夫人天公主陇西李氏，议金时，元德、元深等分别担任沙、瓜诸州刺史，元忠尚幼；而仁贵较元忠年长，以议金与李氏之子身份为尚书事其左右，为节度使府所在地的沙州长史，并于议金出兵或出使不在敦煌时充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守沙州，故有接待中原使臣之上令公状和献物状；平时，仁贵也曾参与敦煌石窟的营造，或有自己的功德窟；但仁贵一直排名于元德、元深之后，盖因曹氏立长不立幼、兄终弟及之制度所致；仁贵未曾经中原王朝任命和未曾担任过节度使一职，故一直被称为“尚书”。仁贵在曹元深时期（942 年）死于非命。

**注释：**

①《东方学报》，京都 1943 年第 13 册。

②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③《敦煌研究》1987 年第 2 期。

④《西北师大学报》1990 年第 3 期。

⑤《敦煌研究》1993 年第 3 期。

⑥参见荣新江的《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6 页。

⑦参见《敦煌文书莫高窟岁首燃灯文辑识》《敦煌研究》1997 年版，第 3 期。

⑧王惠民：《曹议金执政前期若干史事考辨》《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96 年版。

⑨徐晓丽：《曹议金与甘州回鹘天公主结亲时间考》《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7~162 页。

⑩此文书定名从荣新江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4 年版。

⑪S.#4245、P.#3550,P.#3457 等文书录文，参见《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⑫“大王窟”“天公主窟”“张都衙窟”等窟名，据敦煌文书 Dy.0322《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

作者：马德，1955 年出生，男，甘肃会宁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 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研究

陈尚敏

家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社会基本单位。家族成员出于同一个男性祖先，在同一地域中生息劳作，世代相聚在一起，按照一定的规范和习俗生活。清代“科举家族”的概念最早由张杰先生提出，它是指那些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其中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在全国或地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家族。他认为科举家族有三个缺一不可的条件：世代聚族而居，凭借家族组织支持族人应试，是界定科举家族的第一个条件；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而且世代应举，是界定科举家族的第二个条件，并构成科举家族和其他家族的根本区别；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的家族，是界定科举家族的第三个条件。将科举家族的最低功名界定为贡生，原因在于，清代官员铨选，除了进士、举人外，贡生也有资格进入仕途，这样拥有进士、举人、贡生功名的家族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即由功名获取权利，由权利获取金钱，再由金钱支持族人读书应试而获取功名[①]。

本文以张杰先生对“科举家族”概念的界定为准，对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情况予以考述，并对其出现的原因作一分析。因本文所使用的资料除了常见的地方志、文集等之外，还有一种并不为大家所熟知的科举文献—硃卷，故此有必要对其作简要介绍。

## 一、硃卷说明

清代乡、会试后，为了防止考官因认识考生字迹而作弊，遂将举子用墨笔作答的试卷弥封，交誊录生用硃笔重新抄写，然后再交考官评阅。应该说，誊录生用硃笔誊写的卷子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硃卷”。这里所说

的“硃卷”，是指新科举人、进士刊刻的自己当科试卷，用来分送亲友及地方官，旨在扩大自身的知名度。虽系墨印，亦以“硃卷”称之。商衍鎏说：“新科举人进士自刊其闱艺分送亲友者，谓之乡试会试硃卷。因闱中誊录用硃，卷为主考所阅取中，是即闱卷之意，虽以硃卷称之，实为墨印而非硃耳。”②

随着举人、进士自刊其闱艺的盛行，拔贡、优贡和副贡也参与其中，因而就有了选贡硃卷。在清代科举人才结构中，除举人、进士外，还有一个重要群体——五贡。五贡包括拔贡、优贡、副贡、恩贡和岁贡，其地位高于生员而低于举人。拔贡，清初每六年选拔地方儒学中优秀生员入国子监肄业。自乾隆七年(1742 年)始，改为十二年一次，每逢酉年举行。考试时间在科考之后，学政随棚录取。优贡亦从地方儒学生员中选拔，各省学政三年任满，根据府、州、县学官上报，会同总督、巡抚选取文行俱优者，最后由学政考定保送。各省乡试因名额限制，一些文理优长的考生不能在正榜中录取，而是以副榜出之，是为副贡，即乡试副榜。上述三类贡生其名额按大、中、小省分配，数量很少。在地方儒学中，廪生食饩十年后挨次升贡，叫岁贡。府学每年一贡，州学三年二贡，县学两年一贡。如遇国家庆典，可依资历在廪生中再行升贡者为恩贡，亦即朝廷恩赏的贡生。上述可见，五贡当中，岁贡和恩贡是论资历而非考选，因此这两类贡生就不会有硃卷刊刻。

硃卷依次由履历、科份页和考生的文章三部分组成。科份页包括考生本科科份、中式名次、考官姓氏官阶以及该房原荐批语；考生的文章包括考题和答卷，文章多刊刻首场三篇《四书》文和一首五言八韵诗。本文所用即是硃卷履历部分，潘光旦就说：“硃卷必具履历；履历的一大部分是先世本支和旁支的一个题名，等于一本简略的家谱。”③履历包括考生本人履历、家族谱系和师承关系。考生履历记录考生姓名、字号、行第、生年、籍贯、户籍、住址、功名等。家族谱系包括考生的亲属源流，分上下两格，上格登直系始祖及高、曾、祖、父以上祖妣至本人父母；下格登同族尊长直到本人兄弟子侄、孙、侄孙及妻子姓氏与子女，凡有功名、官阶、

封典、著述者，均在其名下附载。母系及妻子的父祖兄弟若有功名为官者，也附注于其姓氏之下。师承关系指考生的学业源流，一般分受业师和受知师两种。“亲受指示讲读者为受业师，入学及中举、中进士、复试、殿试、朝考阅卷者为受知师。”④

据笔者统计，今甘肃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公藏机构收藏的有关甘肃士人刊刻的硃卷共124份。其中会试硃卷30份；乡试硃卷87份；选贡硃卷7份。在这些硃卷中，河西地区士人刊印的硃卷占有相当的比例，这对了解河西地区的科举家族有很大帮助。

**二、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考**

从硃卷所载家族谱系来看，详于本支，旁支一般限在五服亲族，当然亦有例外。五服之说源于先秦的丧服制度，古人认为同姓亲族，以自己为本位，上推至四世高祖，下推至四世玄孙，皆为五代；旁及亲，则横推至三从兄弟，即以族兄弟、堂兄弟、兄弟，同为高祖四世之孙，亦为五代。为避文繁，本文涉及旁支时限定在五服亲族。

（一）永昌南氏家族

永昌南氏家族的科第状况存于南棠、南有兰父子二人的乡试硃卷。南棠为嘉庆三年（1798年）戊午科举人、南有兰为道光八年（1828年）戊子科举人。南有兰的乡试硃卷记录更为详尽，故据此考释其家族源流状况。

南氏始祖贵均为直隶香河县人，明洪武年间充伍为试百户，赠武德将军，晋赠明威将军；三世祖才，承袭前职，正统七年，改调永昌卫，任指挥佥事，实始迁永。四世祖至七世祖皆“承袭前职”，自八世祖朝楷，始有文名。

太高祖：煌，康熙末太学生，敕赠文林郎，陕西凤翔府教授。

高祖：之玺，雍正朝太学生，貤赠文林郎，湖南安福县知县。

曾祖：宫鼎，乾隆庚午经元、辛未进士，任凤翔府教授，敕赠文林郎，湖南安福县知县。宣统《甘肃新通志》卷六九《人物志·群材四》载：南宫鼎，字德宇，永昌人。明世袭指挥魁四世孙。读书有异慧，举乡试第四，遂

登乾隆辛未进士，教授岐阳，勤于训课，士咸尊之。性耿介，与郿令某为同年友，极善谋生者，郿富室也。与人讼弗直，持三百金，至乞一言，宫鼎遽怒，挥其金于门外，叱使去。生平行事类如此。

祖：济汉，乾隆己亥举人、庚子进士，任湖南安福县知县，加四级，历署慈利县知县、直隶沣州知州。壬子科湖南同考试官。著有《永昌县志》《南氏族谱》《依山堂时文杂著稿》。民国《续修永昌县志》卷六《人物》载：南济汉，乾隆庚子进士，历任湖南安福、慈利知县、直隶沣州知州。致仕归里后，主讲云川书院，诲人不倦，造就后进良多；兴起文社；秉笔纂修县志，文体简洁；重建魁星楼，亦汉之力。

父：棠，嘉庆戊午举人，陕西榆林府葭州学正。

五服亲族：

高伯叔祖有六，其中之经，廪生；之俊，太学生。

胞叔祖：济楫，乾隆己酉副榜。

族伯叔祖有三，其中国栋，太学生；国栻，拔贡，山东临朐县知县。

亲堂伯叔、从堂伯叔、从堂兄弟、嫡堂兄弟、再堂兄弟众多，间有功名，大多业儒。

（二）镇番（今民勤）卢氏家族

镇番卢氏家族的科第情况系见于卢宝伦乡试硃卷。卢宝伦，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己酉科举人，其乡试硃卷记录了卢氏家族的功名情况。

高祖：讳生华，字文锦，号丽滨，康熙戊寅拔贡、庚子举人。诰赠文林郎，长阳县知县。

曾祖：讳燮，字杲如，号墨峰，乾隆辛酉科举人，历任湖北宜昌府长阳县知县。诰授文林郎。

祖：讳涵甲，字能容，太学生。例赠文林郎。

父：讳进润，字双南，号浑斋，嘉庆辛酉举人，拣选知县。例赠文林郎。

胞叔高祖：生莲，字文洁，号园西，康熙甲午举人、雍正癸丑科进士，原任山西弋阳县知县；生薰，字文馥，号月湄，康熙甲午副元、雍正癸卯举人、联捷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敕授文林郎；生荚，字文历，号豹岩，雍

正癸卯举人。

自堂伯叔高祖以降，至亲堂兄弟，人数近 60 人，除少数尚在业儒外，拥有功名者不下 20 人。

镇番卢氏家族在康雍时期科第达到巅峰，同时期的岷州（今岷县）进士巩建丰就说："近科如河西卢生薰昆弟诸墨，按之沉实，扬之高华。笔力才藻，在南人亦不可多得。"[5] 道光《镇番县志》卷九《人物列传上》有卢氏家族部分族人较为详尽的记录。

卢全昌，字熙，明骠骑将军矿裔，幼聪颖，工属文，而酷嗜学。平生以传经课子为切务，虽诸子文望日隆，全昌益鞭策不少懈。后以子生薰贵，赠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生华，举人；生莲、生薰，进士；生荚，举人。

卢生华，字文锦，康熙三十七年（1698 年）拔贡，五十一年（1712 年）举于乡，工时艺。适川陕总督某观风全秦，生华同弟生莲、生薰、生荚俱列高等，倾动河西。总督特加奖赏，会题开大学。生华平生善启后学，诸弟联翩科甲，子侄接踵入泮，皆其陶甄。郡邑之士闻风而至者，咸执经请益，以故多所造就焉。按："会题开大学"是指镇番县学额由小学升为大学。清代，以各地文风盛衰状况为依据，为当地儒学规定一个较为固定的学额，三年一个轮回，进行岁、科二考以取录生员。据民国《续修镇番县志》卷一一《补录拾遗杂记》"卢生薰"条载："镇番学额向隶小学，岁、科各八名。雍正二年川陕制府观风全秦，卢氏生华兄弟俱列高等，主司叹赏文声彪襮，遂复奏开大学。"《清会典事例》卷三七七《学校·甘肃学额》亦载："雍正二年，镇番卫向系小学，今人文最盛，改为大学，取十五名。"也就是说，总督因为卢氏兄弟才华出众，认为镇番文风兴盛，其县学学额过少，限制了当地士人的登进，需要扩大学额。总督的题请最后得到清廷的议准。

卢生莲，字文洁，天性纯笃，博学工文。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破额中式，士咸钦仰之。雍正十一年（1733 年）成进士，后官江西弋阳县知县，与兄生华同辑县志。

卢生薰，字文馥，生而颖异，八岁能文，康熙五十三年，兄生莲领乡

荐，生薰以“聿”额见抑，中副榜。雍正元年，与地生荚同举于乡，同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性纯淡，每值史馆公集，讷讷善下，未尝以义气自豪，若尹望山、陈榕门、帅兰皋、张晚楼、王罕皆诸钜公，胥推重之。另据民国《续修镇番县志》卷一一《补录拾遗杂记》，卢生薰于雍正二年（1724年）殁于京邸，当在翰林院研修期间。并称“国朝秦陇翰苑开先，自公始”，这点并不属实。

卢生荚，字文衡，品优学富，诸昆齐名，雍正元年，与兄生薰同登乡榜，以家学教授生徒，士无远近，皆宗之如山斗，其藉所传以达者，犹不胜数。子：荣，恩贡生。

另据《甘肃人物辞典》载：“卢毓莱，字蓬洲，号文楼。清光绪丙子举人。因其八世祖芦生薰为雍正元年翰林，故他有‘小翰林’之称。因其才华出众，在当时河西地区很有影响。”⑥

（三）镇番谢氏家族

镇番谢氏家族科第情况系见谢葆初、谢集成、谢集梧和谢炳硃卷。谢葆初，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甲寅恩科举人、谢集成为嘉庆三年（1798年）戊午科举人、谢集梧为嘉庆十二年（1807年）丁卯举人、谢炳为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甲辰科副榜。谢炳硃卷详尽地记录了谢氏家族的源流谱系和功名状况，移录如下。

始祖：天眷，岁贡生，宁夏府训导。

二世祖：奇学，万历丙子由文生中式武举，任山西大同守备。

三世祖：魁，顺治庚子武举任湖南长沙千总。

四世祖：黄中，庠生。

本生高祖：宗孔，庠生，晋赠奉政大夫。

曾祖：鏊，字文山，号云峰，岁贡生，任平凉府儒学训导，诰封文林郎，晋封奉政大夫，行宜载入邑志孝友传。按：邑志系指道光五年修成的《镇番县志》，该志卷九《人物列传上·孝友》载：谢鏊曾主讲永昌云川书院数十载，士弭弭信从，执经问难者几于舍不能容，得其指授，类能擢魏科以去。时，同里则有若李宗泌，由举人官教谕，聂子烈由恩贡官教谕，本族

则有若登科，由进士官知县。子：葆澍、葆初，孙：集成、集梧，皆先后膺乡荐以振家声。生平仗义疏财，为诸生时，同社戚友供给弗少吝。有称贷者悉焚券，不责尝，士林钦之。

祖：葆澍，字雨甘，号莲湖，乾隆辛卯举人，历任山东青州府临朐、益都、安邱县知县，卓异，升己酉恩科乡试同考官，敕授文林郎，敕赠儒林郎，行宜载入邑志事功传。按：道光《镇番县志》卷九《人物列传上·事功》载：谢葆澍未仕之前，设帐授徒，成就甚多，排纷解难，见义勇为，镇番有苏山书院，旋兴旋废，偕同志谋诸邑宰，募金营息以资膏火。

父：集成，字振之，号柳西，嘉庆戊午顺天举人，历任陕西鄜州黄龙山州同、砖坪厅通判。民国《续修镇番县志》卷九《人物列传上·事功》载：谢集成，字振之，号柳西，嘉庆戊午举人，历任陕西鄜州黄龙山州同、砖坪厅通判。曾主讲本籍苏山书院，与诸生说经论文，勤勤恳恳，若父兄之诲子弟，文风于是丕变。时学宫倾圮，倡捐修葺，亲督工作，规制重新。又偕同人捐立文社，助乡、会试川资，复以盈余主修邑志，事赅文简，镇于是始有专志。

五服亲族：

胞伯、叔曾祖：锭，庠生；铤，庠生。

堂伯、叔祖：葆瑛，庠生；葆兰，庠生；葆初，乾隆己酉科选拔，甲寅恩科举人；葆谦，庠生。

胞叔祖：葆训，增广生；葆春，庠生。

堂叔：集庆，岁贡生；集灏，廪膳生；集址、集祐、集美、集统，皆庠生。

胞叔：集梧，嘉庆丁卯举人，原任陕西西安府渭南县儒学教谕。

从堂伯叔、从堂兄弟、嫡堂兄弟、再堂兄弟众多，间有功名，大多业儒。

（四）镇番张氏家族

镇番张氏家族的家族谱系见张尔周会试硃卷和张金寿乡试硃卷。张尔周为道光三十年（1850年）庚戌科进士，张金寿为光绪十七年（1891年）辛卯科举人。张尔周、张金寿为祖孙关系。这里以张金寿乡试硃卷为

准分述其家族的谱系及科举状况。

祖:尔周,字筱庄,号竹如,道光庚戌进士,四川即用知县,历署夹江、长寿等县事,题补人寿县知县,因井研解围出力,保奏以同知升用,居忧后改官陕西,历署西乡、紫阳、甘泉三县事,实授蒲城县知县,以营缮西乡城葳事,保荐升用直隶州知州,诰授奉政大夫,例敕赠儒林郎。张尔周传另见《甘肃新通志》卷六九《人物志·群才四》。

父:从诚,字朴卿,号南麓,附贡生,候选同知,诰授奉政大夫,例敕赠文林郎。

五服亲族:

胞伯、叔曾祖:尚达,岁贡生;尚儒,庠生。

胞叔祖:尔产,太学生。

胞叔:淦济,贡生。

嫡堂伯、叔从仁,癸酉优贡,乙亥举人;从贵,太学生。民国《续修镇番县志》卷九《人物列传上·孝义》载:张从仁,字元甫,清同志癸酉优贡,光绪乙亥举人,事继母数十年,始终承顺间言,待兄弟友爱笃挚,尤善赈贫济苦,后官中卫教谕,勤于训迪,孜孜不倦。子锡寿,举人,官新疆兴平县知事。

从堂兄弟、嫡堂兄弟、再堂兄弟众多,间有功名,大多业儒。

(五)镇番马氏家族

镇番的马氏家族,见于上揭张金寿乡试硃卷,马氏为其母氏家族。"母氏马,嘉庆戊辰举人起凤公侄孙女;泾州镇原县教谕劻义公从堂侄女;同治壬戌进士、湖北即用知县明义公族侄女;庠生修义公、监生陈义公、博义公侄女。"马氏家族部分族人见于民国《续修镇番县志》卷九《人物列传上·事功》。

马起凤,字栖梧,嘉庆丁卯举人,勤学好义,凡遇整理孔庙,振兴学校诸大端,慨以巨资倡,毫无吝容,平居敬老恤贫,崇儒重道。朴茂之行,一时学士尤莫能及者。道光五年续修县志,汇集采访,不遗余力。后官陕西岐山教谕,振拔寒畯无异桑梓,岐山文教大兴,佥以马公为导线云。

马劻义，字葸臣，举人起凤子。幼聪颖，豁达好施，而奋志于学，由廪贡官隆德教谕。任满回籍，适值回变，倡捐万金助饷，筑城并设局防守，勤劳卓著，地方赖之，尤热心学校，鼎力栽培，口碑啧啧，至今犹载道焉。

马明义，字境台，同治壬戌进士。官湖北知县，署枝江县，时旱蝗交集，哀鸿遍野，明义用意抚绥，民赖以安，喜接见士民，于胥役则严加约束，不肯稍假，有铁面冰心之颂，去任时，父老攀辕而送者数百人。马明义传另见《甘肃新通志》卷六九《人物志·群才四》。

（六）武威孙氏家族

武威翰林李于楷说："吾乡衣冠阀阅之盛，首推城河沿孙氏。自元朴先生以淳德至行，崇祀乡贤；凤书方伯、仲山大令，仍世登进士第。勋绩行义文章，坊表乡里者百年。""孙氏自方伯以降，甲乙科前后相望。""经乙丑之乱，第宅废为瓦砾，子姓虽繁，无读书者。仁义之不修，诗礼之日捐，世远泽竭。"[7]引言所及的元朴先生、凤书方伯和仲山大令，即孙文炳，孙诏和孙俌。潘挹奎《武威耆旧传》有孙氏家族成员更为详尽的传列，据此分述如下。

孙文炳，字元朴，武威人，庠生，恂谨持礼法，嗜读书，教授邑中子弟[8]。

孙诏为孙文炳子，字凤书，号友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壬辰科进士，并获馆选，为清代武威第一个进士中试者，历官至湖北布政使。其子孙璘为举人[9]。明清"布政使"向有表率一省府州县官之义，故尊称为"方伯"。

孙俌，字仲山，乾隆十六年（1751年）辛未科进士，曾官广东翁源知县，其子揆叙、揆泰、揆亮、揆章皆名诸生[10]。

孙诏、孙俌为祖孙进士。

孙氏家族在乙丑之年经历变故，家道遂衰落。"乙丑之年"为嘉庆十年（1805年），"乙丑之乱"系指青海"番族反叛"事件，嘉庆十二年（1807年），清廷曾委派那彦成前去征讨。

（七）武威尹氏家族

武威尹氏家族的科第情况系见于尹世清其乡试硃卷。尹世清，道光

五年(1825年)乙酉科举人,其乡试硃卷记录了尹氏家族的功名情况,移录如下。

曾祖:讳诰,康熙辛卯举人,原任四川渠县知县。

祖:讳思任,乾隆丁卯拔贡。貤赠中宪大夫。

父:讳绾,廪膳生,诰封中宪大夫。

胞兄:世阿,乾隆乙卯举人,嘉庆戊辰大挑一等,分发江西,借补藩库厅。历署广昌、宜黄县事,致仕回籍;世衡,嘉庆庚午举人,辛未进士,现任江苏分部考功司掌印郎中,翰林院庶吉士。过继胞伯。

侄辈俱业儒。

另据潘挹奎《武威耆旧传》卷一《尹氏三传》称:"武威有君子曰:'尹铁堂先生善于为吏,其嗣思任善于为子,其孙绾善于为师。'"铁堂先生名诰,字紫来,号铁堂。康熙辛卯举人,官四川渠县知县。思任,拔贡生,从父之官渠县。绾,诸生,教授乡里。子三人:世阿,乾隆乙卯举人,官江西库大使;世衡,嘉庆辛未进士,官吏部考功郎中;世清,官蒲城训导,今年乙酉中式举人。

(八)张掖曹氏族家族

民国《新修张掖县志·选举志·文学》"曹毓瑞"条。曹毓瑞,博学能文,嗜古不倦,乾隆丁卯发贤书,由陕西高陵县教谕升巩昌府教授,为一时师表,执经闻业者幸多显。侄:德元,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戊戌科进士;子:德恒,举人;孙:柏龄,十五入泮。足证家学渊源。德元通籍后,不乐仕进,主南华书院讲席近二十年,文雄健,人多颂之。

**三、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养成**

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多重因素共致的结果。从河西进士的时间分布看,康熙中后期为萌芽之始,镇番孙克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庚辰科进士。"为国朝河西甲第之首。"[11] 孙诏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壬辰科进士,为清代武威第一个进士中试者。雍正朝时间短暂,只进行过五科会试,镇番就产生4位进士,其中卢生莲、卢生薰为兄弟进士。清代甘肃进士的地理分布,皋兰独占鳌头,因其为省会

兰州府郭，乃全省首善之区，自然拥有着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优越条件。次则武威，李于锴就说，武威“自乾嘉以降，彬彬多文学士矣”[12]。嘉庆十三年（1808年）戊辰科乡试，姚元之典试陕西，他认为：“甘省文风，初为宁夏最盛，今则莫盛于凉州之武威。”[13]

河西地区科第兴盛，首先在于政局的稳定。明代河西为边疆地区，明沿长城一线设置九边以抵御蒙古骑兵南下，河西当属甘肃镇，行政建制上实行带有军事性质的卫所制。顺治、康熙两朝，基于蒙古和西藏问题的解决，甘肃南北两翼民族冲突得以缓和，军事性质的卫所建置已无存在的现实基础，雍正三年（1725年），卫所应时改制，与腹地行政建置划一。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准噶尔部叛乱被平定，新疆统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甘肃的边疆地位。加之自康熙朝始，清廷在西北实行了一系列防范与扶助相结合的民族政策，使甘肃迎来了一个较长时间的政局稳定。“盖自乾隆以来，重熙累洽，关陇腹地不睹兵革者近百年。”[14]陇右“乾嘉数十年较太平”[15]。永昌南氏、镇番卢氏两家族皆由军功起家，入清后文名鹊起。两个家族的转型是与清代西北边疆态势的变化分不开的。因此，政局的稳定是河西地区出现科第兴盛局面的现实背景。

清代九位皇帝大都有自己的科举政策。康熙、乾隆是有清一代进士平均取额最少的两朝，窥其原委有二：其一顺治、雍正两朝进士取额较高，其二康熙、乾隆向称盛世，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两个因素对仕途造成挤压。进士取额自然要考虑体制的承受能力。在进士取额收紧的背景下，武威的孙氏家族、永昌的南氏家族成员获取进士功名尤应注意。

其次，教育机构的创建。张澍曾说：“我朝文教覃覆，玉关以西，黉序莘莘，凉州甲科鳞次不断，人文蒸上。”[16]“玉关以西”自然是指新疆地区，满清王朝自恢复对新疆的统治之后，在北疆地区实施府县制，同时建学校、设学额，重视这一地区的文教。张澍所言自然是在歌颂盛世王朝对文教的重视，就是向称荒蛮之地的新疆尚且如此，那么靠近腹地的河西就毋庸辞费了。

清代地方教育场所主要包括府州县官学、书院和蒙养教育机构。清

代读书人七、八岁始入蒙学，约需五、六年时间，识字两千左右，然后就开始学写八股文，准备应童试。童试为最初级的科举考试，其中式叫进学，也就是进入到地方官学，获得的功名叫生员，俗称“秀才”。“官学制度中一般不包括蒙养教学，此项教育任务多由民间私学承担。”[17] 传统蒙养教育机构名目繁多，但统称私塾，由民间承办。生员意味着完成了蒙养阶段的教育，在名义上是地方官学的学生，但因科举的导向作用，地方官学重考试而轻教学，后来基本演化成地方科举考试的中心，其育才功能式微。民国教育史家陈青之就直言：“学校教育之在清朝可说完全是一个具文。”[18] 缘此，清代“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19]。书院在清代士人的教育养成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疆收复，意味着西北边防线大大向西推进，这对甘肃来讲，安全压力减轻。作为地方官施政，文治也会很自然地提上其议事日程。肃州（治今酒泉）酒泉书院，乾隆间知州黄文炜创建，其记曰：“今天人和同，西戎款服，一时敌忾同仇之辈，皆相与安土绩业。余用是慨然曰：‘是真可以洗兵戎之气，而谋弦诵之乐矣。’”[20] 甘州府甘泉书院，在府郭张掖县城南，乾隆间知府冯祖悦创建，其碑记曰：“甘镇地处极边，代为用武地。我皇上德化覃敷，四夷宾服，自嘉峪关外拓新疆二万余里，皆得偃武修文。”[21] 云川书院在永昌城西，清乾隆间知县郭昌泰建，黄时的《创建云川书院记》：“永地处边陲，近百余年来，登科第者仅三人，士气抑塞，风教颇未光，其需书院最急。”[22] 有清一代，河西地区共建书院 24 所，遍及每个府州县。

乾隆朝武威的刘作垣和王化南，二人先后主讲本籍书院，奠定了该地区的教育基础，武威“自乾嘉以降，彬彬多文学士矣”[23]。刘作垣，字星五，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辛巳科进士。性耿介，不合于上官，辞职归里后，被延聘为书院山长。“山长教尚严，从之学者，作止语默，罔不绳以礼法，偶逾其闲，诃责立至。”“一时从学之士，文章皆有程式可观。”“以实心启迪后生，吾乡所以文教日上，不乏绩学之士者，由山长诱掖之力实多。”[24] 王化南，字荫棠，乾隆四十年（1775 年）乙未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知县，后辞官归里，当道“延主书院讲席，教法即淳且备。”“矻矻孜孜，俾不

得斯须嬉，士风为之一变。”[25] 刘开第，字梦惺，同治元年（1862 年）壬戌科进士，曾官陕西知县。既归，主讲雍凉书院，成就后进不少[26]。李铭汉，同治副榜，“盖晚清西北一醇儒也”[27]，也曾长期主讲本籍书院，培植人才甚众。武威“人文之盛，向为河西之冠”[28]。当是渊源有自。

镇番的谢氏家族、永昌的南氏家族成员中，多人曾任当地书院的山长，势必推动了当地教育的发展，两地进士中式人数较多，与此密不可分。

再次，科举政策的调适。清代科举制度设计非常重视区域平衡原则，像乡、会试，实行分省取士政策，其实是将这两级的科举竞争限定在省区范围，自然保护了文教落后地区考生的利益。除此之外，为了保证边隅士子中式，清代科举在乡试一级有另编字号政策。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将凉州、西宁五学编为聿左号，甘州、肃州五学编成聿右号，各中一名；乾隆七年（1742 年）对入场卷数的统计，聿右仅是聿左的三分之一，此后一科同编聿字凭文取中，一科分编左、右各中一名；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凉州归通省卷内，甘州、西宁编聿左，肃州、安西、乌鲁木齐等处编聿右，各取中一名。这一政策在光绪元年（1875 年）陕甘分闱后废止[29]。

最后，科举家族的内部教育。科举家族中，幼承庭训、兄弟切磋，其教育环境有助于其子弟学业增进是显然的。如南有兰，字沣生，进士济汉孙，举人棠子，道光戊子登贤书，树品端洁。承受家学，博览群书[30]。镇番卢氏家族，卢生华四兄弟，其中二人举人、一人进士、一人翰林。卢生华为长兄，“平生善启后学，诸弟联翩科甲，子侄接踵入泮，皆其陶甄”。

传统婚姻并不反映当事人的意愿，而是表达家族利益，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门当户对是其基本模式。因此，科第家族之间的联姻在士人养成中也会产生一定影响，诸如提供经济支持、学业指导以及激励他们的向学热情等，婚姻缔结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一个人社会交往面的扩大。清代镇番的谢氏家族、卢氏家族，永昌的南氏家族，在硃卷中就能见到这三个家族之间的通婚情况。谢树森，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丙午科举人，其硃卷载：“母氏卢，康熙庚子科举人生华公曾孙女；雍正癸丑科进士、江西弋阳县知县生莲公，雍正癸卯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生薰

公、雍正癸卯科举人生荚公侄曾孙女；乾隆辛酉科举人、湖北长阳县知县贾公孙女；例赠文林郎、太学生涵申公次女；嘉庆辛酉科举人金润公胞妹；优廪生宝伦公胞姑。”谢炳的乡试硃卷记录了谢氏和南氏两个家族的婚姻关系。“妻原配南氏：乾隆辛未进士，原任陕西凤翔府教授宫鼎公曾孙女；乾隆庚子进士，原任湖南府衡山县知县济汉公三孙女；庠生乐公长女；嘉庆戊午举人，原任陕西葭州学正棠公胞侄女；道光戊子举人有兰公堂妹；庠生有山公胞姊；廪膳生有光公堂妹。”永昌的南有兰为道光八年（1828年）戊子科举人，其乡试硃卷记录了南氏家族和谢氏两个家族婚姻关系。“母氏谢：乾隆辛卯举人，山东安邱县知县，讳葆霖公孙女；嘉庆戊午科举人，陕西鄜州黄龙山州同，现署砖坪厅通判，名集成公女；丁卯科举人，名集梧公胞侄女。”

**四、余论**

在对科举家族进行考述时，涉及这些家族在地方社会的事功情况，表现在诸如教化、捍患、赈济、修志等方面。他们之所以活跃于地方社会，实与其在科举上的成功密不可分。中国传统政治权力，囿于制度设计及其运行成本的缘故，国家政权很少落实到县以下的乡村社会，乡里社会实是一个自治色彩很浓的有机体，为此，有学者将此表述为“小政府、大社会”。自汉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聚落中的主导力量是父老阶层，他们的身份和权威系基于社会敬老的传统。”“王道的根本在于孝悌，举凡同里邑之年轻人都视同子或弟，于是有孝悌，于是有敬老，这是古代聚落一体感和认同意识促成的。”[91] 但是，伴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完善，父老阶层在乡里社会的权力空间不断受到来自士绅群体的挤压，并逐渐被取代，科举最终成为建构地方社会望族的基本途径。基于此，对科举家族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传统地方政治的认识，揭示国家与社会的内在联系。

**注释：**

①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页。

②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87页。

③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142页。

④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87页。

⑤巩建丰:《朱圉山人集》卷三《答胡静菴贡生书》,乾隆刊本。

⑥罗康泰:《甘肃人物辞典》,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⑦李鼎文校点:《李于锴遗稿辑存》《孙揆章》,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⑧潘挹奎:《武威耆旧传》卷一《孙文学文炳周明经子兰王孝廉曰慎合传》《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99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

⑨潘挹奎:《武威耆旧传》卷一《孙方伯传》。

⑩潘挹奎:《武威耆旧传》卷三《孙韦西先生传》。

⑪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卷六五《人物志·乡贤下》。

⑫李鼎文校点:《李于锴遗稿辑存》《潘挹奎传》,第18页。

⑬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页。

⑭白寿彝:《回民起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48页。

⑮张维著,王希隆主编:《还读我书楼文存》《陇右经学传授》,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13页。

⑯张澍:《养素堂文集》卷四《五凉旧闻序》《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67册。

⑰毛礼锐:《中国教育史简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

⑱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375页。

⑲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119页。

⑳黄文炜:《酒泉书院记》,宣统《甘肃新通志》卷三五《学校志·书院》。

㉑冯祖悦:《甘泉书院碑记》,宣统《甘肃新通志》卷三五《学校志·书院》。

㉒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卷三五《学校志·书院》《潘挹奎传》。

㉓李鼎文校点:《李于锴遗稿辑存》。

㉔潘挹奎:《武威耆旧传》卷三《刘山长传》。

㉕潘挹奎:《武威耆旧传》卷二《王荫棠传》。

㉖宣统《甘肃新通志》卷六九《人物志·群才四》。

㉗汪辟疆:《李云章父子学术》,李鼎文校点:《李于锴遗稿辑存·附录》。

㉘《甘肃省乡土志稿》,第22章《重要都市》。

㉙商衍鎏:《清代考试述录》,第78~79页。

㉚民国《续修永昌县志》卷六《人物》。

㉛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227页。

作者:陈尚敏,1969年出生,男,甘肃会宁人,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 北朝时期瓜州建置及其所属郡县考略

李并成

公元442年，北魏拓跋氏占领敦煌，自此始迄隋开皇初年(581年)，敦煌地区历经北魏、西魏、北周的统治，凡139年。这一时期敦煌地区建置沿革若何，置有哪些郡、县，郡县嬗递演替状况如何，郡县城址又位于何处?这些都是敦煌学研究中的重要论题，前人所做工作较少，且多有空白，笔者不揣浅陋，拟作一系统考证，以求教益。

## 一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沙州条："后魏太武帝于郡置敦煌镇，明帝罢镇立瓜州，以地为名也，寻又改为义州，庄帝又改为瓜州。"《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肃州条："后魏太武平沮渠茂虔，乃以酒泉改为军，隶敦煌，后改镇为瓜州。"据《魏书·官氏志》，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与刺史同。敦煌镇即其西北边陲所立的重镇，其"介远西北，寇贼路冲……进断北狄之觇途，退塞西夷之窥路"[①]，居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故镇守敦煌者皆官秩甚高，不仅有镇将，如太武时尉眷[②]、王景仁[③]、献文时尉多侯眷子[④]、乐洛生、孝文时元倪[⑤]等，而且还有都大将，如孝文时穆亮[⑥]、阎提[⑦]等。

见于史料，北魏敦煌镇下属一军二戍，即酒泉军、乐涫戍、晋昌戍。《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后魏太武帝平沮渠氏，以酒泉为军，属敦煌镇。""福禄县，本汉乐涫县，属酒泉郡。后魏太武帝平沮渠茂虔，改县为戍，隶敦煌镇，孝文帝改为乐涫县。"《魏书·灵徵志》："肃宗熙平二

年(517年)十二月,敦煌镇上言,晋昌戍木连理。"酒泉军置于汉酒泉郡治禄福县地无疑,乐涫戍置于汉乐涫县(唐福禄县)地,上述二地笔者曾撰文考得,分别为今酒泉市城和酒泉市东南50公里的下河清乡皇城遗址[8]。《元和郡县图志》与《太平寰宇记》均载,汉乐涫古城在肃州(酒泉)东百里,恰为今皇城遗址。至于晋昌戍,当源于西晋元康五年(295年)所置的晋昌郡。《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瓜州:"晋昌县,本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因县界冥水为名也。晋元康中改属晋昌郡,周武帝省入凉兴郡(县)。隋开皇四年改为常乐县,属瓜州,武德七年为晋昌县。"笔者亦考得,西晋晋昌郡暨郡治冥安县、隋常乐县、唐晋昌县即今安西县桥子乡南8公里的锁阳城[9],北魏晋昌戍亦当在此。

迨及北魏孝明帝之世(516~528年),敦煌罢镇置瓜州。何年罢镇置州?史籍语焉不详。由上引《灵徵志》知当为熙平二年(517年)十二月以后事,清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认为当在孝昌二年(526年)。瓜州统有哪些郡县?《魏书·地形志》厥载。清汪士铎《南北史补志》考为北魏瓜州领郡五,即敦煌、寿皇(昌)、常乐、会稽、玉门。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认为北魏瓜州领敦煌、效谷、寿皇(昌)、常乐、玉门、会稽六郡。徐文范则认为应领敦煌、酒泉、常乐、会稽、玉门五郡,永熙二年(533年)又增晋昌郡,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年)分敦煌置效谷、寿昌二郡。笔者反复考证有关史料,认为北魏瓜州应领九郡,即敦煌、效谷、寿昌、晋昌、会稽、广夏、玉门、酒泉、常乐,诸郡计辖敦煌等18县,州治敦煌郡敦煌县。兹分考于下:

《隋书·地理志》:"敦煌,旧置敦煌郡,后周并效谷、寿皇(昌)二郡入焉。又并敦煌、鸣沙、平康、效谷、东乡、龙勒六县为鸣沙县。"《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阳关,在(寿昌)县西六里。……后魏尝于此置阳关县,周废。"阳关县和上述六县,计七县,在北魏时当分属敦煌、效谷、寿昌三郡领辖。七县位置如下:学界业已公认敦煌、龙勒二县城址分别为今敦煌市城西党河西岸的汉唐沙州故城和敦煌市南湖乡的寿昌故城。笔者又考得汉魏效谷县城即今敦煌市城东北17公里的墩墩湾古城[10],鸣沙县城

为今敦煌市城东南 4 公里的杨家桥乡鸣山村城隍庙湾古城[11],(平康县)城为今敦煌市城西北 3.6 公里处的三号桥古城[12],东乡县城为今敦煌市城东北 60 公里处的五棵树井古城[13]。至于阳关县城,上引《元和志》记载位于寿昌县西六里,其位置当为汉唐阳关之所在,即今敦煌市南湖乡之古董滩。《新唐书·地理志》与敦煌遗书 P.#5034《沙州地志》皆记有"阳关故城",云其 在寿昌县西十里,所记与《元和郡县志》位置近之。P.#5034 还云,该城"今见毁坏,基址见存"。今已荡然无存。其地被新月形沙丘覆盖,可见到部分房宅、窑址和农田渠道遗迹,并散落大量遗物。1972 年发现上万平方米房基残址和断续延伸的宽厚城堡垣基。由上考见,鸣沙、平康、敦煌三县相距甚近,均位于敦煌绿洲腹地,当属敦煌郡辖。效谷、东乡二县均位于敦煌绿洲东部,当为效谷郡辖。陈国灿认为东乡县原为效谷县的东乡,北魏时升格为县[14]。寿昌郡当领龙勒、阳关 二县,均位处敦煌西南约 70 公里的南湖绿洲,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

晋昌郡的设置,最早见于西晋元康五年(295 年)。是年"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冥安、深泉、广至等五县,分酒泉之沙头县,又别立会稽、新乡,凡八县为晋昌郡"。《文选》注引王隐《晋书》称,惠帝以敦煌土界阔远,分立晋昌郡。

北魏初曾废晋昌郡为戍,至西魏大统中复见该郡之名。《周书·令狐整传》:瓜州城民张保"杀刺史成庆,与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构逆。规据河西。晋昌人吕兴 等复害郡守郭肆,以郡应保。……整至玉门郡,召集豪杰,说保罪逆,驰还袭之。先定晋昌,斩吕兴。进军击保。……保遂奔吐谷浑"。王仲荦据之认为晋昌郡盖后魏末复置,位于敦煌郡之东,玉门郡之西[15]。当即原晋昌戍之地,治今锁阳城。至于晋昌郡的领县,显然已较西晋时所领八县大为蹙缩。原会稽县已单独立郡,新乡县应归玉门郡辖,沙头县已废,宜禾县归常乐郡辖(皆详后考);伊吾县据《通典》其故城在晋昌北。北魏始置伊吾郡,则其已移治今哈密市,非属晋昌郡 辖域。唯余冥安、深泉、广至三县当为北魏晋昌郡领县。《隋书·地理志》:"后周并凉兴、大至、冥安、闰泉合为凉兴县。"知北魏时此四县尚存。冥安无疑仍为晋昌

郡治。闰泉即深泉，汉渊泉，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闰泉即渊泉，史家避唐讳改。"其城址笔者考得即今安西县三道沟镇四道沟古城[16]。大至即广至，王仲荦《北周地理志》："避隋炀帝讳改。"其城址笔者考得即今安西县踏实乡西北破城子[17]。凉兴县则属常乐郡辖。

会稽郡之设始于西凉时期。《通典》卷一七四瓜州条："苻坚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凉武昭王遂以南人置会稽郡，以中州人置广夏郡。后周因旧名置晋昌郡。"《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瓜州条亦如是记载，并云后周初并会稽、广夏二郡"复为晋昌郡，至武帝改晋昌为永兴郡"。西凉凉武昭王安置南人的会稽郡，应是由西晋会稽县升格而来，置于会稽县原址，北魏此郡犹存，北周初并入晋昌县地。《隋书·地理志》亦云："后魏置会稽郡，后周废郡。"会稽郡的领县，清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认为领会稽一县；汪士铎《南北史补志》认为领会稽、新乡、延兴三县。笔者赞同徐文范的看法。汪士铎三县之说可能是从《隋书·地理志》所记后周"并会稽、新乡、延兴为会稽县，开皇中改为玉门，并得后魏玉门郡地"中推测而来的。事实上会稽距新乡、延兴较远（详后），且中间又隔着闰泉县，如何并得新、延二县？此为殆无可能之事。徐文范认为会稽县并得二县实已"移治玉门故县，而省玉门郡及县"。王仲荦《北周地理志》亦云："北周并会稽延兴等县为会稽县时，会稽县额虽未废，而县治实已东移。盖唯有东移，始能并得后魏玉门郡地也。……吾故疑周之会稽县实移治于后魏之玉门郡玉门废县也。"笔者赞成上述看法，即北周会稽县之所以能并得新、延二县及玉门郡、县，当已移治于原玉门之地。新、延二县距玉门较近，分别位于今玉门市昌马乡和花海乡[18]，在北魏时当为玉门郡辖县，而并非会稽郡所属。北魏会稽郡仅领会稽一县。会稽郡、县城笔者考得位于今安西县城东18公里的小宛破城[19]。

广夏郡，由前引《通典》《太平寰宇记》所记，知始置于西凉李暠暠之世，后周并入晋昌郡，则北魏世犹存。其位置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四，即汉广至县地。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西凉》亦将广至归广夏郡。

这可能都是依据名称的相近做出的判断。由上考知广至系晋昌郡辖县，非广夏郡地。《通典》云北周并会稽、广夏郡入晋昌郡；《隋书·地理志》云北周并凉兴、大至、冥安、闰泉为凉兴县，此凉兴县隶北周常乐郡，与晋昌郡无涉。可见广夏、广至（大至）是完全不同的二地，不可混二为一。又广夏郡系西凉安置中州有田畴不辟者七千余户新设的郡，当另辟新地而设，不可能立于汉广至县故地。北魏广夏郡似应位于今安西县东部肖家地古城之南城[20]，其领县无考，可能仅领广夏一县。

玉门郡为孝明帝时改置。《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肃州条："玉门县，本汉旧县……后魏孝明帝改为玉门郡，周武帝省入会川县，隋开皇十年（590年）复改为玉门县。皇朝因之。""会川县"不见于他书记载，对照上引《隋书·地理志》所记北周会稽县"并得后魏玉门郡地"事，知当为会稽县之讹。北魏玉门郡因袭汉玉门县改置，当仍置于汉玉门县故地，笔者曾考得其县址即今玉门市赤金镇赤金堡古城[21]。玉门郡领县除玉门县外，还当领距其较近的并与其在北周被一同并入会稽县的新乡、延兴二县。

酒泉郡，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北魏明帝孝昌中改敦煌镇立瓜州，同时将其所属酒泉军改置为酒泉郡，当仍属瓜州辖。其位置应仍在酒泉军、亦即汉酒泉郡故地。北魏酒泉郡当领禄福、乐涫二县。禄福系自汉以来的旧县，又是郡治所在。乐涫，据《元和郡县图志》北魏孝文帝改乐涫戍置县。

常乐郡北魏明帝置。《隋书·地理志》敦煌郡条："后魏置常乐郡。……开皇初郡废，改县为常乐。"《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常乐县，本汉广至县地，属敦煌郡。魏分广至置宜禾县，后魏明帝改置常乐郡。隋于此置常乐镇，武德五年（622年）置常乐县也。"知北魏常乐郡即曹魏所置的宜禾县，亦即隋常乐镇，唐常乐县。笔者考得其城址即今安西县南岔乡六工破城，位于唐瓜州城（锁阳城）西北55公里[22]。北魏常乐郡当领凉兴一县。《隋书·地理志》敦煌郡常乐县条："后周并凉兴、大至、冥安、闰泉、合为凉兴县。"则北魏时即应有凉兴县之置，其地在隋常乐县界。凉兴之名始

见于西凉之前，西凉时改县建郡。《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瓜州常乐县条："《十六国春秋》云，凉武昭王元年（400年）分敦煌之凉兴、乌泽、晋昌之宜禾三县置凉兴郡。隋废，于三危山东置常乐镇。唐武德五年改镇为常乐县也。"《旧唐书·地理志》记得更为明确，西凉凉兴郡，即是北魏常乐郡、隋常乐镇、唐常乐县。可见北魏常乐郡确领有凉兴县，亦当位于今安西县六工破城。

综上所考，北魏瓜州辖9郡18县。即：敦煌郡、领敦煌、鸣沙、平康3县；效谷郡，领效谷、东乡2县；寿昌郡，领龙勒、阳关2县；晋昌郡，领冥安、深泉、广至3县；会稽郡，领会稽1县；广夏郡，可能领广夏1县；玉门郡，领玉门、新乡、延兴3县；酒泉郡，领禄福、乐涫2县；常乐郡，领凉兴1县。

## 二

西魏时期仍置瓜州。据清谢启昆《西魏书·地域》，瓜州领敦煌、效谷、寿皇（昌）、常乐、会稽五郡。但据有关史料，晋昌、玉门、广夏三郡仍存，一如北魏，前引《周书·令狐整传》记西魏大统中瓜州城民张保等构逆事，即提及晋昌郡和玉门郡。前引《通典》《太平寰宇记》皆记，广夏郡后周并入晋昌郡，则知该二郡西魏时当存。至于酒泉郡，亦在大统十年（544年）以前归属瓜州，以后属甘州。《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后魏太武平沮渠茂虔，乃以酒泉改为军，隶敦煌，后改镇为瓜州，复立郡于此。大统十年以酒泉郡属甘州。"可见西魏大统十年以前的瓜州仍置有9郡，此后酒泉郡划出，领8郡。

西魏瓜州诸郡领县，除酒泉郡及其属县禄福、乐涫大统十年后改属甘州外，余皆一仍北魏之旧，未见有废弃省并者。《西魏书》列有13县，漏阳关、广夏、玉门3县，且部分县应归属的郡亦有误断，误将大至、冥安、闰泉入常乐郡，新乡、延兴入会稽郡。

敦煌遗书中对西魏瓜州一些郡、县亦有记载。S.#0613《西魏大统十

三年(547 年)敦煌计账文书》提及有中女出嫁受昌郡、中女出嫁效□县。出嫁地点当分别为寿昌郡、效谷县。《寿昌县地境》:"本汉龙勒县,魏正光六年(525 年)改为寿昌郡,属瓜州。……宇文保定四年(564 年)省入敦煌县。"可知寿昌郡之置在北朝存在了 39 年。S.#0788《沙州图经》亦云寿昌郡置于正光六年。

西魏瓜州仍为其西北边境要地,颇得统治者重视。首任瓜州刺史为北魏明元帝第三子乐安王范曾孙东阳王元荣(亦名元太荣),其出刺瓜州的时间向达《莫高、榆林二窟杂考》考为西魏永安二年(529 年)至大统十年(544 年)间;宿白据新出史料进一步考证为北魏明帝孝昌元年(525 年)九月以前至西魏文帝大统八年(542 年)十一月以前[29]。在此期间于永安二年元荣被封为东阳王。元荣之后,元康、邓彦、成庆、申徽、王子直、韦璜等相继出刺瓜州[30]。此外,张道义亦曾于大统十二年(546 年)行州事[31]。

## 三

后周初郡县大省并,瓜州仅存敦煌、常乐、永兴 3 郡及其所领鸣沙、凉兴、会稽 3 县,州治鸣沙。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对此考论精详,笔者亦有若干心得,简要论之:依《隋书·地理志》,后周并效谷、寿皇(昌)二郡入敦煌郡,"又并敦煌、鸣沙、平康、效谷、东乡、龙勒六县为鸣沙县。开皇初郡废。大业置敦煌郡,改鸣沙为敦煌"。前已述及寿昌郡并入敦煌的时间是宇文保定四年(564 年);并六县为鸣沙应为并七县为鸣沙,阳关县亦周时省入。鸣沙为北周敦煌郡唯一属县,隋大业又改鸣沙为敦煌,是故北周鸣沙县当已移治于西魏敦煌县城,即今敦煌市城西的沙州故城。又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会稽、广夏二郡"至后周初并之复为晋昌郡。至武帝改晋昌为永兴郡"。北周并入晋昌郡者虽为广夏、会稽二郡之地,但会稽一名未废,已移治于玉门郡地。《隋书·地理志》:"后魏置常乐郡。后周并凉兴、大至、冥安、闰泉合为凉兴县。开皇初郡废,改县为常乐。"知北周将原常乐郡所属凉兴县与原晋昌郡所属大至等 3 县并为凉兴县。晋昌郡属县

全部并入凉兴县，自然也就意味着该郡亦被凉兴、即常乐郡省并，省并的时间为北周武帝之世（561~578 年）。《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晋昌县，本汉冥安县，……晋元康中改属晋昌郡，周武帝省入凉兴郡（县）。隋开皇四年（584 年）改为常乐县，属瓜州，武德七年（624 年）为晋昌县。"究竟周武帝何年将晋昌郡并入凉兴县？史无明载。莫高窟北周 428 窟见"晋昌郡沙门比丘庆仙供养""晋昌郡沙门比丘吉供养""晋昌郡沙门比丘道宾供养"的题记[26]。据施萍亭、宿白先生的研究 428 窟为建平公于义出任瓜州刺史时所修"一大窟"。于义出刺瓜州的时间施萍亭考为大概是保定五年至建德五年（565~576 年）[27]；宿白进一步考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在 558 至 560 年间，一是在 564 至 574 年间[28]。上述题记中的晋昌郡沙门比丘庆仙其人，敦煌遗书中记有其明确的活动年代：S.#2935《大比丘尼羯磨经》题记："天和四年（569 年）岁次己丑六月八日写竟，永晕（晖）寺尼智琏受持供养，比丘庆仙抄讫。"综上可见，至迟在建德三年（574 年）晋昌郡建置犹存，至早在 565 年该郡不会省并。由此观之，北周初先是晋昌郡将广夏、会稽二郡之地并入（会稽一名东移），迨武帝时常乐郡凉兴县又将晋昌郡及其属县悉数并入，即北周武帝以后的常乐郡凉兴县实际拥有西魏常乐、会稽、广夏、晋昌四郡之地。该常乐郡治之凉兴县，隋开皇初改为常乐县、唐武德七年改为晋昌县者，即汉之冥安县地，这又表明北周凉兴县实已移治，并不在原北魏、西魏凉兴县原址、今安西县六工破城，而是已移治于晋昌郡冥安县原址、即今安西县锁阳城址。

北魏、西魏玉门郡及其属县玉门、新乡、延兴，北周时并为一县—会稽，隶永兴郡。《隋书·地理志》："后周废（会稽）郡，并会稽、新乡、延兴为会稽县。开皇中改为玉门，并得后魏玉门郡地。"前已考出，北周会稽县并得新乡、延兴二县以及玉门郡、县，当已移治于原玉门之地，即今玉门市赤金堡古城，而非在北魏、西魏会稽故地，会稽故地已并入晋昌郡、北周武帝时又并入凉兴县地。《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瓜州条云，晋惠帝所置晋昌郡，"周武帝改为永兴郡"。《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瓜州条云，西凉会稽、广夏二郡"至后周初并之复为晋昌郡，至武帝改晋昌为永兴郡"。

以上均言周武帝改晋昌为永兴郡，但实际上改为永兴的晋昌当非北魏、西魏晋昌郡地，由上引《元和志》晋昌县条及考证知，后魏晋昌郡地周武帝时已省入常乐郡凉兴县。《太平寰宇记》将后周初的晋昌郡当作武帝改置的永兴郡，误。周武帝的永兴郡实为原西晋晋昌郡的一部分，即原晋昌郡东部新乡等县地，亦即北魏、西魏玉门郡、北周会稽县地，治今玉门赤金堡北周永兴郡辖会稽一县。

见于记载，北周出任瓜州刺史者有韦瑱、尔绵永（段永）、李贤[⑧]。又《隋书·于义传》载，于义在北周明、武世"历西兖、瓜、邵三州刺史"。其事迹亦附于《北史·于栗磾传》和《周书·于谨传》。于义出刺瓜州的时间上已述及。于氏家族贵盛于周隋间，堪称西魏、北周政权的支柱之一，其后裔仍煊赫于唐世。于义出刺瓜州亦表明瓜州地位的重要。又于有关敦煌文献见，张缌曾任北周敦煌郡主簿、鸣沙县丞，李穆曾任敦煌郡司马、永兴郡大中正。莫高窟北周442窟供养人题记："……主薄鸣沙县丞张缌供养佛时。""弟□□将军□（帅）都督前敦煌郡主簿张□……"据《隋书·百官志》，北周时郡置太守、主簿，县置令、丞《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曾祖穆，周敦煌郡司马，使持节张掖郡诸军事、张掖太守兼河右道诸军事、检校永兴、酒泉二郡大中正、荡寇将军。"

**注释：**

①《魏书·韩秀传》。

②《魏书·尉古真传》。

③《北史·王世良传》。

④《魏书·尉古真传》。

⑤《魏书·高祖纪》《洛阳新出元倪墓志》。

⑥《魏书·穆崇传》。

⑦《周书·阎庆传》。

⑧李并成著：《西汉酒泉郡若干县城的调查与考证》，《西北史地》1991年第3期。

⑨李并成著:《唐代瓜州(晋昌郡)治所及其有关城址的调查与考证》,《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

⑩李并成著:《汉敦煌郡效谷县城考》《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期。

⑪李并成著:《北魏瓜州敦煌郡鸣沙、平康、东乡三县城址考》,见本书。

⑫ 李并成著:《北魏瓜州敦煌郡鸣沙、平康、东乡三县城址考》,见本书。

⑬李并成著:《北魏瓜州敦煌郡鸣沙、平康、东乡三县城址考》,见本书。

⑭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

⑮王仲荦:《北周地理志》,中华书局1980年第8期。

⑯李并成著:《汉敦煌郡冥安、渊泉二县城址考》《社科纵横》1991年第2期。

⑰ 李并成著:《汉敦煌郡广至县城及其相关问题考》,《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

⑱李并成著:《玉门、安西境内几座古城址的考察》,待刊。

⑲李并成著:《归义军会稽镇考》,待刊。

⑳李并成著:《玉门、安西境内几座古城址的考察》,待刊。

㉑李并成著:《西汉酒泉郡若干县城的调查与考证》《西北史地》1991年第3期。

㉒李并成著:《唐代瓜州(晋昌郡)治所及其有关城址的调查与考证》,《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

㉓宿白:《东阳王与建平公》《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㉔《周书》之《申徽传》《令狐整传》《王子直传》《韦瑱传》。

㉕《周书·令狐整传》。

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㉗施萍亭:《建平公与莫高窟》《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㉘宿白:《东阳王与建平公》《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㉙《周书·韦瑱传》《北史·段永传》《周书·李贤传》。

作者：李并茂，1953年出生，男，山西浑源人，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豳地望考

汪受宽

殷商时期，周人先祖不窋由关中北行，定居于戎狄之间，其孙公刘建立豳国[①]，积聚实力，争取民心，历经十余代，前后三百余年，到古公亶父时才迁往周原，最后成就王业。豳国是周族由一个西方小部族变成文明礼仪之邦的关键时期。古人说豳为“周家立国之本”，“周之王业由于此，所以传世历年之永也”[②]。弄清豳国的正确位置，对于先秦史和中国文化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在讨论豳的地望之前必须先给豳的概念定位。《史记·周本纪》言：

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

……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

这段历史记载告诉我们，豳，既指不窋至古公亶父的诸位周先公所居“戎狄之间”的大范围的豳地区，又特指公刘、庆节至古公亶父所居的豳国、甚至其都城之豳邑。豳的概念之所以从大到小，是因为周人既居于戎狄之间，又要从事农业生产，还在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其所活动的范围必然较大，甚至有多次迁徙。本文所要考证的，是公刘豳国都城豳

邑的地望。

历代关于豳国的地望，有多种说法。

最早为汉栒邑县境说。班固《汉书·地理志上》右扶风栒邑县下，自注言："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邑。"

第二种是稍迟于班固的东汉文字学者许慎的汉美阳（今陕西武功境）说。《说文解字》邑部载："邠，周太王国，在右扶风美阳，从邑分声。豳，美阳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美阳，在今陕西武功西北。此说当与汉宣帝时发现的一尊周鼎有关。《汉书·郊祀志下》记载，宣帝时，右扶风美阳县发现一尊有铭文的鼎，京兆尹张敞释读鼎上文字为："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旂鸾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共32字，因汉人多有"栒邑，即豳地是也"的共识，可能许慎遂称豳在美阳。然而，鼎是可以移动之物。张敞已经明言，过去就有过鼎之出土处并不是原铸鼎处的事例，故将此鼎之出土处视为是周栒邑即豳国之所在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况且，美阳在岐山东南，而先秦文献称豳在岐山之北，将美阳释为古之豳国，与史书所记方位不符。许慎此说不为历代学者认同，惟齐思和先生以该说为是，言："以豳在渭上（即今武功东北）最可信据，而从无敢从之者。习非成是，积重难返，可慨也已。"③

第三是汾城（今山西新绛）说。钱穆先生在《周初地理考》中首先提出此说，认为："周人盖起于冀州，在大河之东。后稷之封邰，公刘之居豳，皆今晋地，及太王避狄居岐山，始渡河而西。"④到他1939年成书的《国史大纲》中更明言："窃疑邠在山西汾城，踰梁山乃西避，非东迁。周人祖先之活动区域，亦在大河西部一隈之四圈，稍后乃误以凤翔岐山说之。"⑤汾城，在今山西绛。近代史学，好新奇，倡独创。钱穆先生山西汾城说一出，就为不少治先秦史的先生信奉。考钱穆先生此说，恐受汉晋人《汉书》注的启发。《汉书·地理志上》右扶风栒邑县下注有：

应劭曰："《左氏传》曰：'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郇侯、贾伯伐晋是也。"臣瓒曰《汲郡古文》：'晋武公灭荀，以赐大夫原氏黯，是为荀叔。'

又云：‘文公城荀。’然则荀当在晋之境内，不得在扶风界也。今河东有荀城，古荀国。”师古曰：“瓒说是也。此‘栒’读与‘荀’同，自别邑耳，非伐晋者。”

按，应劭、臣瓒所言之郇或荀，实为二地，颜师古已言明，《通志·氏族略》辨之甚详。其《氏族略二》云：“郇氏，周文王之子封郇侯，或言第十七子。郇国故城在邠州三水东，其后以国为氏。郇音荀，一音环，今有环音之氏，而未闻荀者。”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僖公二十四注：“解县西北有郇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22页言：“郇，地当在今山西临猗县西南不远之地。”则《左传》所述春秋之郇邑在今山西临猗一带。《氏族略三》言：“荀氏，晋之公族也，隰叔之后。荀邑在绛州正平西十五里。荀本侯国，姬姓，晋灭之，以为邑。荀侯之裔，亦以国为氏。”则荀在今山西新绛东北，与郇为另一封邑，在另一地。显然，不能因为春秋时在今晋南有郇或荀，就断定西周初之郇邑不在今陕西省境。上引汉宣帝时美阳出周鼎，证明此鼎所言郇邑应在关中及其附近，不可能在远至千里之外的晋南。况且，古代地名随封（邑）君迁徙而移动的现象屡见不鲜。原在今陕西华县的郑，东周初迁至今河南新郑是一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所言文王子十六封国中的毛，“毛公鼎、毛伯敦盖并出扶风，似可推知毛公采邑西周时在扶风，东迁后在洛阳附近”[6]，也是一例。钱穆先生以晋南新绛释邠（豳）国地望，无法圆满地解释《诗经·公刘》及《史记·周本纪》所言与豳相关的溥原、隰原、皇涧、百泉、巘、南岗、漆、沮、渭、梁山、岐等地名，实难成立。

班固去古未远，其豳在西汉栒邑县境的说法为历代经史学者所认同。东汉郑玄《诗谱》笺说：“豳者，后稷之曾孙也公刘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属右扶风栒邑。”[7]西晋张华《博物志》言：“扶风郇邑豳乡，公刘所都。”[8]隋陆德明《经典释文》卷六说：“豳者，戎狄之地名也。夏道衰，后稷之曾孙公刘自邰而出居焉。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于汉属右扶风郇邑。”

后来，由于地名的演化及认识的差误，《汉书》豳在西汉栒邑县之说，析变出豳在今陕西旬邑县、今陕西彬县以及今甘肃宁县的三种说法。第

一今陕西旬邑境说，如《元和郡县图志》卷三邠州云："豳国城在今州理东北三十九里三水县界，古豳城是也。"第二今陕西彬县境说，其实来自于后代学者的误解。西晋初杜预云："豳，周之旧国，在新平漆县东北。"《史记集解》引晋徐广曰："新平漆县之东北有豳亭。"新平郡治漆县，即今陕西彬县，为旬邑的西边邻县。杜、徐二氏之所以称豳在晋朝时漆县的东北，是因为曹魏至晋初，栒邑县被撤，并入漆县，言豳在漆县东北，实际上还是指汉栒邑县境。而唐《括地志》不加区别，沿袭杜说，称："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诗》豳国，公刘所邑之地也。"[9]称新平就是汉代的漆县，亦即公刘豳邑之所在，将豳说成在唐朝新平县境，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汉漆县与栒邑为邻县，汉漆县境无豳。只有晋时才并栒邑入漆县，以至将豳亦一起并入。后来有的学者不加考察，以讹传讹，遂有了豳在今陕西彬县的误说。第三今甘肃庆阳市宁县说[10]，如《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宁州云："当夏之衰，公刘邑焉。按今州理城，即公刘邑也。"唐宁州治定安县，在今甘肃宁县。当代学者多从陕西旬邑或彬县说，有的则笼统地称豳在今陕西彬县、旬邑境，极少赞同甘肃宁县说的。

《汉书·地理志》之豳在西汉右扶风栒邑县的说法无可怀疑。但是，西汉之栒邑县治今何处？豳乡又在西汉栒邑县境的何方位？却是辨析豳国今地的关键问题。

可供分析西汉之栒邑县治方位的早期文献，是《史记·酈商列传》，文云："项羽灭秦，立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商爵信成君，以将军为陇西都尉。别将定北地、上郡。破雍将军焉氏，周类罕栒邑，苏驵军于泥阳。赐食邑武成六千户。"在楚汉相争的初期，担任陇西都尉的酈商，先后夺取了北地（治义渠，今甘肃庆阳市宁县北）、上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二郡，又在焉氏（今甘肃泾川东南）、栒邑、泥阳（今甘肃正宁县西南之罗川镇）三地打败了章邯的三位将军，由此赐其食邑武成六千户。古代史书中将领军功的记载多是依据其报告战功的军书而来，而军书记载的军功则往往是按照战役的先后顺序叙述。焉氏、泥阳在北纬 35° 20′ 自西向东一线，在两战中间的栒邑之战的战场当亦大致在同一纬线。唐《元和

郡县图志》卷三，关内道邠州三水县（旧栒邑）条言："栒邑故城，在（三水）县东二十五里，即汉栒邑县，属右扶风。"《资治通鉴》卷四〇胡三省注引："宋白曰：三水县东北二十五里邠邑原上有栒邑故城。"按北魏时改栒邑县名为三水县，其治所一直在今旬邑县城关镇，则汉之栒邑县治在今旬邑县城关镇东北 25 里（或说 30 里）处。查《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将西汉栒邑县治定于今旬邑县东北约 20 公里之与北地郡泥阳县（治在今甘肃庆阳市宁县西）交界处，即北纬 35°20′ 线上。查《陕西省地图册》[11]，旬邑县城关镇向东北至县边界的直线距离不足 20 公里，为子午岭西延段之山脊，山脊之北今属甘肃省庆阳市之正宁县和宁县。如果我们没有分析错的话，汉代之栒邑县治不在子午岭南麓的今旬邑县马栏镇，就在今甘肃省正宁县后坡、林家坡一带。总之，西汉之栒邑县治所在今陕西旬邑与甘肃正宁两县交界线附近，是为史料所证明了的。

《汉书·地理志》所言之豳乡究竟在西汉栒邑县境内何方位？要考定此，我以为最可依据的是班固之父班彪的《北征赋》。《文选注》引《流别论》介绍该赋写作背景，说："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也。"此赋是历史学家班彪北行的实录，对考定沿途地名地望，有极高价值。《赋》言：

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厄灾。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历云门而反顾，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岗以登降，息郁邠之邑乡。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登须之长阪，入义渠之旧城。……

这一段说的是，班彪因社会动乱无法继续在关中居住，遂离开长安（长都）向西北远游。他早晨从长安出发，傍晚投宿长安北边瓠谷的玄宫（北方之宫）。经过云门（即云阳县门，在今陕西淳化西北），远望甘泉宫通天台，高耸入云。登上大山又走下山坡，歇息在邠邑的邠乡。在这里班彪联想到先周公刘的遗德，哀叹自己命运的不济。接着前行登上了赤须阪[12]，终于进入了义渠的旧城（今甘肃宁县北）。

《赋》中班氏在邠乡联想到公刘的遗德，可见此邠乡即先周之豳邑，是我们考证豳之地望的最要紧处，而最早言及豳之地望的《汉书·地理志上》，也是以豳乡认定为先周之豳邑的。就是说，确定了豳乡旳位置，公刘所居之豳邑的地望就清楚了。《赋》中明确说道，公刘之豳的方位，是在甘泉宫的北边，义渠城的东南方，而且先要翻过一个“陵岗”才能到达豳乡。我们查阅汉代文献，知陵岗不是专有名词，故而在此应是一指代词。《尔雅·释地》言：“大阜曰陵。”《说文解字》卷九下言：“冈，山骨也，从山，网声。”由此，陵岗者，大山之脊也。查陕西省地形，由今淳化县往北至旬邑县马栏镇附近，大体是黄土塬梁沟壑区，并无太大的山梁。而在旬邑县与甘肃正宁县交界的子午岭秦直道的这一段却颇为高耸。曾考察过秦直道的王开先生著文说：“沿子午岭主脉北行……下凤子梁过马栏河（又名三水河），即上杨家胡同梁。这座山梁很高，现为旬邑县杨家店林场所在地。由杨家胡同稍转西北不远，即到刘家店子，现为甘肃省正宁县刘家店子林杨。……刘家店子林场位于子午岭正脊……”[13]则此“陵岗”只能是位于今旬邑县与甘肃正宁县交界的子午岭。看来，班彪是沿着直道北行，再翻越子午岭，转向西，到达公刘所居之豳国的。由此可以确定的是，西汉之豳乡在汉代栒邑县境内的子午岭之北，今甘肃宁县、正宁县境。

总之，由班彪《北征赋》所记其行踪分析，公刘所居之豳邑地望，在西汉栒邑县北境，今甘肃省庆阳市宁县至正宁县一带，并不在今陕西省旬邑县辖境内。《三辅黄图》卷一云：“王莽分三辅为六尉郡。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义渠十县，属京尉大夫，府居故长安寺。”此言王莽时曾将栒邑、义渠皆隶三辅下之京尉大夫所辖，即今陕西旬邑县与甘肃正宁、宁县其时皆属一尉郡，并非决然异域。

东汉大儒郑玄还说到过豳的具体方位。在《诗经·大雅·緜》答张逸问笺语中说：“豳地今为栒邑县，在广山北、沮水西，有泾水从此西南行，正东乃得周，故言东西。”还言：“岐山在长安西北四百里，豳又有（或云作“在”）岐山西北四百里。”[14]广山也不是专有名词，应为群山之意，就豳

地而言，当指子午岭。沮水，为洛水支流，源于陕西黄陵县与甘肃宁县交界的子午岭东侧。泾水源于六盘山东侧，东流经泾阳（今甘肃平凉西）、安定（今甘肃泾川），在今甘肃宁县南与泥水（今马莲河）汇合后西南流入今陕西彬县。则郑玄所言，豳邑的方位在子午岭西和北（该岭在今甘肃正宁县与陕西旬邑县交界一带呈北南、东西走向），泾水由西东流转向西南流之转角处附近，即今甘肃宁县南境，就是古豳邑所在。又以郑玄所云岐山东至长安、北至豳的距离（此四百里当是以路程计，与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差别甚大）计算，在今地图上测量岐山县城东至西安、北至甘肃宁县的直线距离正好相当，这只能证明，郑玄所言不虚，他说的豳邑在今甘肃宁县境。

豳邑在今甘肃宁县在汉唐间是学者和皇朝的共识，并因之在今甘肃庆阳市境设置以豳命名的行政区域。《魏书·地形志下》言："豳州，皇兴二年为华州，延兴二年为三县镇，太和十一年改为班州，十四年为邠州，二十年改焉。领郡三，县十。"《隋书·地理志上》北地郡言："后魏置豳州，西魏改为宁州。大业初夏曰豳州。……新平，旧曰白土，西魏置豳州。开皇四年改县为新平，大业初州废。"元初史家胡三省考订了北魏豳州设置的沿革，言："皇兴二年，置华州于北地，太和十一年，改为班州，十四年为豳州，领北地、赵兴、襄乐郡。"[15]北魏及隋大业初两设的豳州，治今甘肃宁县，盖因此地古有豳国。而西魏在新平（今陕西彬县）所设豳州，后称南豳州。相对于此，以治今宁县之豳州称为北豳州。近年，在宁县县医院工地发现巨碑一方，碑额题"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颂"，铭文云："大代正始元年（504年）岁在甲申，七月丙午朔，十五日庚申……持节都豳州诸军事、冠军将军、豳州刺史山累率州府纲佐，仰为孝文皇帝立追献寺三级"云云[16]。该碑为北魏豳州治在今甘肃宁县之物证。隋唐之际的陆德明言："豳者，戎狄之地名也。夏道衰，后稷之曾孙公劉自邰而出居焉。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於漢属右扶風郇邑。"[17]原隰之野，即周之大原，今甘肃庆阳市境的董志塬，该塬是黄土高原上最大的一块塬面，面积达910平方公里。宁县在董志塬东南境。故陆氏亦以为豳在

今庆阳市境，不在今陕西旬邑。

豳为公刘之豳国的本字。但因豳与邠通用，故亦有以邠代豳者。唐开元十三年，“以豳字与幽字相涉，诏曰：鱼鲁变文，荆并误听，欲求辩惑，必也正名。改豳字为邠”[18]。从此，人们多以邠替豳，导致二字更难区分。

以上据历史文献考证，不窋、公刘活动之豳地，在今甘肃庆阳市董志塬上，而公刘所居之豳邑，则在今（董志塬南境的）宁县境，西汉时属栒邑县。但唐颜师古（581~645 年）注释《汉书·地理志下》“公刘处豳”句时，将班固原话照搬至唐，言：“即今豳州栒邑。”从而在不经意间犯了大错误。第一，唐朝并无栒邑县，北魏时已改栒邑为三水县。第二，唐时三水县治与西汉栒邑县治不在一处，三水县治在西汉栒邑县治西南二十五里。第三，三水县疆域比起西汉栒邑已大大缩小，古豳邑不再为唐三水县属境。所以公刘之豳邑虽属西汉之栒邑，却绝不等于在唐之三水县（栒邑）境，何况唐并无栒邑县名。颜师古《汉书注》影响极大，其说为历代学者征引，而唐以后旬邑县治及其疆域并无大的变化，人们却随颜师古误以古之豳国在今之陕西旬邑县了。

颜氏的误说，迄今未见有学者挑明。但历代甘肃庆阳地方的官员、学者却从来没有忘记本地曾是周文明兴起之地的光辉历史，每当朝廷征集地方图志时，庆阳地方官员都要将本地的先周历史遗迹详细上报，而为历代全国一统志所采用，从而保存了豳在甘肃庆阳市境的真史。地方志如，明《嘉靖庆阳府志》卷一[19]《建置沿革》称：“庆阳（府治今庆城县）乃古唐虞雍州之地，周之先后稷子不窋所居。”“宁州（今宁县），本公刘故属邑。”卷一七《古迹》称：“不窋城，即府治。夏政衰，不窋失官，自窜于斯，所居成聚，故建城而居焉。”“公刘邑，在（宁）州治西一里许，周之先公刘居此。”卷一七《陵墓》“不窋墓，在府城东三里许巉畔。碑刻剥落，止有片石，大书‘周祖不窋氏陵’，殿宇基址犹存。嘉靖十九年，御史周南知府何岩，立碑表墓。”全国一统志如，《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在宁州彭原县（治今宁县西北）条下言：“当夏之衰，公刘邑焉。周时为义渠国，其后戎翟攻太王，亶父避于岐山而作周。按今州理城，即公刘邑地也。”在庆州

顺化县(今庆阳市庆城县)条下言:“《周本纪》曰,夏后政衰,后稷子不窋奔戎翟之间,今州理东南三里有不窋故城是也。”[20]《太平寰宇记》在卷三三庆州条下言:“夏衰,后稷子不窋奔戎翟之间,今州理东南三里有不窋故城。”在卷三四宁州条下言:“公刘邑也。”《明一统志》卷三六言:“旧志,庆州,不窋、公刘所居之地。”庆阳府建置言“周之先不窋所居,号北豳。”宁州条下言:“本公刘邑。”祠庙有:“不窋庙,在(庆阳)府城内。不窋,后稷子,周先祖也。庙有塑像,东西两壁绘文王以下三十七王像。”“公刘庙,在廉城西南八十里。公刘,后稷之曾孙,有宋守王庶所撰碑。”其陵墓有“不窋冢,在府城东三里,碑久剥落,上有片石,大书‘周祖不窋氏陵’”。古迹有“不窋城,在府境内,夏政衰,后稷子不窋奔戎翟之间,建邑而居,即此城”。清《嘉庆一统志》卷二六二,庆阳府古迹有“公刘庄,在安化县北三十里,其地有腴田数亩,号天子掌,人不敢垦,相传为公刘庄”。其陵墓有“夏,不窋墓,在府城东三里。”祠庙有“不窋庙,在安化县南”“公刘庙,在安化县西南八十里”。可以说,甘肃庆阳地区的官员、学者古往今来,都没有承认过所谓“豳在今旬邑”的误说。

现代考古资料为先周豳国在今甘肃庆阳市境提供了佐证。周先祖不窋至古公亶父十余代的居住中心在子午岭西麓今庆城、合水至宁县一线,时间大体为三百多年,约为公元前1500年至前1150年间。庆阳市境考古文化分期基本明晰,先是仰韶文化,后是齐家文化,接着是寺洼文化和周文化。1984年,甘肃省、地、县文物部门和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在合水县蒿铺乡石桥村九站遗址区域内进行考古发掘。遗址属于寺洼文化,在寺洼文化层的上部叠压着早周文化层。在清理的八十座寺洼文化土坑竖穴墓葬中,出土了近千件陶器和一件铜刀、一件铜饰。此处出土的陶器羼料粗糙,器壁钝厚,质地较松散,器表呈橙黄色。典型器物为马鞍形口橙陶双耳罐。经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距今3370±110年[21]。这个年代与周先祖在庆阳生活的时代大体同时,应断定为先周文化遗迹。九站文化出土的马鞍形口橙陶双耳罐,近二十年,在庆城县东山周祖陵、宁县庙

咀坪等地都有出土，证明三县的先周文化一脉相承，时间相近，都是周先祖生活过的遗留物。

**注释：**

①豳字，在历代文献中或写作邠；旬邑，或写作栒邑、郇邑；本文一仍其旧，以加区别。

②（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③《西周地理考》，《燕京学报》，1946年第30期。

④《燕京学报》，1931年第10期。

⑤《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6页。

⑥杨伯峻：《春秋左氏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1页。

⑦《毛诗注疏·豳七月训诂传》，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387页。

⑧见《太平御览》卷一五五所引。

⑨《史记正义》引。

⑩近年，甘肃撤地建市，原庆阳地区改称庆阳市，原庆阳县改称庆城县，原西峰市改称区。本文所言即依新地名。

⑪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版。

⑫《文选》李善注："赤须坂在北地郡。《水经注》曰：'赤须水出赤须谷，西南流注罗水。'"是知赤须阪应在今甘肃宁县境内。

⑬《秦直道新探》《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

⑭《毛诗注疏·绵篇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510页。

⑮宁县博物馆于祖培同志提供该碑照片。

⑯《经典释文》卷六，四部丛刊本。

⑰《唐会要》卷七〇"邠州"，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⑱（明）傅学礼撰：《庆阳府志》整理点校本，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⑲《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6~67页。

⑳参见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合水九站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㉑本文原系为于俊德、于祖培所著的《先周历史文化新探》一书所撰序言的一部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汪受宽,1943年出生,男,江苏东台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育。

# 酒泉昆仑说的由来及其评价

顾颉刚

昆仑，在中国古书中最早见于《山海经》，是一个神话传说的神秘区域。究竟在哪儿？虚无缥缈，难以琢磨。汉武帝开拓西疆后，根据出使西域回来的使臣写的报告，并查考古图书，把于阗南山定为昆仑，可是却为司马迁所否定，认为这里根本不是《山海经》《禹本纪》里所说的昆仑。过了四百多年，前凉张骏又依从酒泉太守马岌的提议，定酒泉南山为昆仑。这是昆仑的第二次实定。这次实定是怎样形成的？它的价值又怎样？这是需要探索和评定的。

汉武帝开拓边疆，置立初郡，把文、景以来的积蓄都用光了，只得和兴利之臣桑弘羊等计划经济政策，吸收民间财富，弄得许多商民都破了产。从此人们怨恨汉朝，诅咒它早亡，造出种种灾异的现象和说法，想把王室逼倒。平帝之世，王莽当政，他想攫取汉朝的天下，就反其道而行之，尽量替自己找祥瑞来买服人心。他既北化匈奴，南怀黄支，于是想到了西边。《汉书·王莽传》说：

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宪等奏言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自居险阻处为藩蔽。问良愿降意，对曰："太皇太后圣明，安汉公至仁，天下太平，五谷成熟，或禾长丈余，或一粟三米，或不种自生，或玺（茧）不蚕自成，甘露从天降，醴泉自地出，凤凰来仪，神爵降集，从四岁以来，羌人无所疾苦，故思乐内属。……"莽复奏……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卷九九上）

这是元始四年立西海郡的由来。鲜水海，即青海。允谷，在今青海兴

海县，即大河坝。青海境内最大的盐池是柴达木盆地里的达布逊湖；这里所谓盐池，当指都兰以东的茶卡（茶卡，藏语盐池）。羌人受了王莽的笼络，把青海一带的平地美草完全献给中央。因为汉朝早有了东海、南海、北海郡，所以把这块新地方唤作“西海郡”。所谓“西海”，无疑地就是青海。醴泉，本为昆仑所有。“禾长丈余”和昆仑上长五寻的“木禾”也相近。“不种自生”，又与《海内经》说稷葬处“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一样。这不是把《山海经》中的想象做一次具体的表现吗？

王莽自从立了这西海郡，居然从那里获得了有名的瑞应。居摄四年（7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讨莽，莽于是模仿了《尚书》里的《大诰》作成一篇新的《大诰》，历述自己维护汉室的苦心，其中说：“太皇太后……配元生成，以兴我天下之符，遂获西王母之应，神灵之征。”（《汉书·翟方进传》）孟康《注》：“民传祀西王母之应也。”他所谓民传祀西王母事见于《汉书·哀帝纪》：“（建平）四年（前3年）春，大旱，关中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传行西王母筹”恐即近日“幸福连锁”的意思，得到人家送来一筹时就自写十筹分送。为祠西王母而持火上屋，击鼓号呼，又大类义和团的祠黄莲圣母。可见汉代民间对于西王母崇拜是何等的热烈。不过太皇太后（元后）所得的“神灵之征”一定是极贵重的，远非民间的福应可比，只恨《汉书》没有说出，后人也无从想象。下面又说：“太皇太后临政，有龟、龙、麟、凤之应，五德嘉符相因而备，《河图》《雒书》远自昆仑，出于重壄。古谶著言，肆今享实。此乃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同上）这是说自从平帝即位，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王莽秉政之后，各种祥瑞都来了。《河图》《雒书》从前但有传闻，现在竟从昆仑和重野实现了。颜师古《注》：“昆仑，河所出；重壄，洛所出，皆有图书，故本言之：壄，古野字。”可见这个《河图》是由昆仑山下的黄河里出来的。这真是第一等的瑞应，是皇天上帝要王莽成就大功业的最亲切的表示。可惜《汉书》里对于这个宝贝东西也没有详细记载，任它作了一现的昙花！

东汉初年，王充作《论衡》，在《恢国篇》里说：“孝平元始……四年，

金城塞外羌……良愿等献其鱼盐之地，愿内属。汉遂得西王母石室，因为西海郡。周时戎狄攻王，至汉内属，献其宝地，西王母国在绝极之外，而汉属之，德孰大?壤孰广?”这是“西王母石室”一名的初见，这西王母石室是西海郡里的一个奇迹，所以王充虽是东南人，也觉其值得夸炫，就取它来量度周、汉两代的短长了。

第二个记载这事的是班固，他虽然跟着司马迁，不信于阗南山为昆仑，在《汉书·西域传》里绝不提起这一名，可是他在《地理志》中却又两次说着。他道：“金城郡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这里所说的，除了湟水以外都是临羌县“塞外”的山川景物。临羌的塞外，西北有西王母石室，正西有弱水祠和昆仑山祠，当然是《山海经》里的神话区域。这些地方，王莽时本在西海郡里面，但王莽一失败，羌人就夺回去了。汉临羌故城在今青海西宁县西。允吾亦金城郡属县，在今甘肃皋兰县西北。湟水流经临羌北，东南行到今永登县境东南近皋兰处入黄河，故云“东至允吾入河”。仙海，即鲜水海，“仙”与“鲜”是同音字，“青”也是一声之转。须抵池，不详所在；按今布尔汗布达山之南，巴颜喀喇山之北，有阿兰泉、托索湖等湖泊，恐即在此。弱水，按《大荒西经》所说，本是环绕昆仑的，两地所去必近。但《地理志》不说是“弱水”和“昆仑山”，而说“弱水、昆仑山祠”，见得只是两所祭祀山川的庙宇，那么，真的山川在哪里呢?临羌的西北是祁连山脉，其正西偏南是巴颜喀喇山脉，是不是西王母所在或其神话中心在祁连山，而弱水和昆仑所在或其神话中心在巴颜喀喇山呢?这都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地理志》又说：“敦煌郡广至：宜禾都尉治昆仑障。”汉广至故城在今甘肃安西县之西，疏勒河之南。“障”，有壅塞阻隔之义。《史记·酷吏列传》：“居一障间。”《正义》：“障谓塞上要险之处，别筑城置吏士守之，以扞寇盗也。”又通作“鄣”，《匈奴列传》：“筑城鄣列亭。”《正义》引顾胤云：“鄣，山中小城亭，候望所居也。”这可以知道昆仑障是一个堡寨之名。这个堡寨为什么要以昆仑为名?想来不出三种原因：一是筑在昆仑山上；一是山上有昆仑祠；再则或因它有如昆仑的特

高，所以取这个嘉名来形容它。究竟哪一个说法最有可能性，因为本条文字既少，又没有别的材料可以证明，所以现在无法断定。《后汉书·明帝记》说："（永平）十六年（73年），伐北匈奴，窦固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伊吾庐城。"李贤《注》："既破呼衍，即其地置宜禾都尉以为屯田，今伊州细职县伊吾故城是也。"唐伊吾即汉广至，这文说明了所以设置宜禾都尉的原因。《汉书·地理志》里本来有很多东汉材料的。

晋高阳王睦的长子司马彪，武帝泰始中任秘书郎，他笃学不倦，接受了班固的规模，起于光武，终于献帝，作成《续汉书》八十篇。后人因为他的书有志，范晔的《后汉书》有纪、传，拿来并做一部书。他的《郡国志》里说："金城郡临羌：有昆仑山。"这是确定昆仑在临羌县境内的，只怕他误读了《汉书》。昆仑即使在那边，也只会在临羌的塞外而不会在临羌的县境啊！

其后郦道元作《水经注》，在《河水篇》说："（河水）又东过金城允吾县北……〔南〕（北）有湟水，出塞外，东径西王母石室、石釜、西海、盐池北。故阚骃曰：'其西即湟水之源也。'"这条文字当由《汉书·地理志》抄来。但《汉书》只说"临羌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他却安排在湟水流域，正同《郡国志》一样，把塞外地方拉进了内地。可是，青海哪会在湟源之东？湟源东又哪里有盐池？所以清董祐诚《水经注图说残稿》驳他道：

仙海，即西海，今日青海，蒙古曰库克诺尔。盐池在其西南，蒙古曰达布逊诺尔。"库克"谓青，"达布逊"谓盐，"诺尔"则积水之名也。今湟水出青海东北，实不径青海、盐池之北。《汉书·地理志》："北则湟水所出"，盖指县北言之，与上"西北"一例，非蒙上"仙海、盐池"也。郦氏偶失检耳。（卷二）读古书真难，一不小心就弄错。不过《水经注》总是一部古代地理材料的总汇书，这里既在"石室"之外多出了"石釜"，又在白土川水下说，河水又东北会两川，右合二水。……河北有层山，山甚灵秀。山峰之上立石数百丈，亭亭桀竖，竞势争高。……其下层岩峭举，壁岸无阶。悬岩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因谓之"积书岩"。岩堂之内，每时见神人往还矣。……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谓之神鬼。彼光目鬼曰"唐述"，复

因名之曰“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谓之“唐述窟”。……《秦州记》曰：“河峡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藏古书五笥。”

这些地方是在甘肃临夏以西，青海循化、化隆一带。《晋书·地理志》金城郡有白土县，即此。那边悬崖上洞窟特多，称为石室，神人往还及积书等传说由此而起。羌人只知有神和鬼（这正与《山海经》合），而不知有仙，所以称之为鬼山和鬼窟。这种鬼窟有极高大的，《汉书·地理志》里的“西王母石室”大概就属于这一类，《大荒西经》说西王母“穴处”也因于此。《汉书·地理志》于临羌的西北塞外，先言西王母石室，再说仙海，再说盐池，分明顺了由东往西的次序而写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西王母石室是在青海之东，湟与河二水之间。按着现在疆域，当在海晏县和辉特旗附近。

祁连山虽然在汉分划了河西四郡和金城郡，在今分划了甘肃、青海两省，但山南、山北的居民都是羌人，从种族的眼光看来只是一区。这一区里，看《汉书·地理志》所记，该是有昆仑的。所以到了公元四世纪，就有马岌起来，把昆仑实定在祁连山。

自从汉武帝实定于阗南山为昆仑之后，历四百余年，在五胡乱中，河西为晋凉州牧张轨所据，传子及孙，俨然世袭的大国，后人称之为前凉。张轨的孙张骏即位，被众推为凉王。崔鸿《十六国春秋》道：

魏昭成帝建国十年，凉张骏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又“删丹西河名曰弱水，《禹贡》昆仑在临羌之西，即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裨国家无穷之福”。骏从之。（《〈史记·秦本纪、司马相如列传〉正义》所引，其辞未完；自“宜立西王母祠”下，以《晋书·张轨传》文补足。）

按这里所记年代有些错误。张骏即位于晋明帝太宁二年，三二四年。卒于晋穆帝永和元年，三四五年。代什翼犍建国十年为晋永和三年，三四七年。那已是骏子重华二年；故此事如发生在张骏的世里，必当在

建国八年以前，不能在十年。酒泉南山即祁连山的一部，在这山上也有西王母的石室，称为“王母堂”，装饰得非常美丽，又有弱水在附近，又离临羌的昆仑祠和广至的昆仑障都不太远，所以马岌以为这山显然是古书里的昆仑。他既提出这实际的证据，可和《汉书·地理志》相互证明，所以张骏也就依从了它，立了西王母祠在那边，定这山的名称为“昆仑”。

这是昆仑的第二次实定。隔了三百年光景，唐李泰作《括地志》，就写道：“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凡书中提到昆仑的必引马岌、李泰之言，于是这一说因为有了经典的根据，它的力量竟超过了汉武帝所定的。不过张氏也觉得有一点不妥当的地方，就是昆仑必和黄河发生关系，而这里竟找不到河源，所以他只定它为“小昆仑”。他在《史记·秦本纪》注中说：“按肃州在京（长安）西北二千九百六十里，即小昆仑也，非河源出处者。”他替酒泉昆仑谦居于“小”，隐然以河源所出的为大昆仑，似乎过得去了。可是这“小昆仑”一名，从前已给人用过。《博物志》道：“汉使张骞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滨有小昆仑，高万仞，方八百里。”（卷一）。张骞是否到过大秦不必论，大秦即罗马，大秦的小昆仑是欧洲第一高峰阿尔卑斯山的勃朗峰（mt.Blanc）吗？是纵贯希腊的班都斯山（Pindusmts）吗？这也不可知，但这个小昆仑和那两个大小昆仑实在隔得太远了，究竟能不能发生关系？到了清代，毕沅作《山海经新校正》，说：

张守节云，“肃州即小昆仑，非河源出者”，后世皆仍其误。考《博物志》云：“汉使张骞度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滨有小昆仑。”则古以“小昆仑”为是大秦国之山。肃州之山为《夏书》《山海经》“昆仑”亡疑也。

他虽不信酒泉昆仑是“小昆仑”，但确信它是《禹贡》和《山海经》里的“昆仑”，所以他说：

（昆仑之丘），山在今甘肃肃州南八十里。……古言昆仑皆是西北，去中国亦止数千里耳。《海内西经》云：“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郑君注《尚书》引《禹所受地说》书云：“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日神州。”《说文》云：“丘字从北一，中邦之居在昆仑东南。”《汉书》云：“黄帝使泠伦自大

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解谷。”大夏者，《春秋传》所言实沈之迁，在山西境：“昆仑之阴。”《吕氏春秋》作“阮隃之阴”。案阮即代郡五阮关，隃即西隃雁门，见《说文》，亦在今山西。山西西接陕西以至甘肃，皆在西北，以知此之昆仑在肃州。……自《十洲记》、《遁甲开山图》以下多有异说，故《水经》亦云“去嵩高五万里”。无稽之谈，盖不取云。

他要在域内寻昆仑，使得《禹贡》雍州和《山经》西山和昆仑都可以在甘肃境内得到实证，在势只有酒泉这一个最为近情，所以他对马岌之说十分愿意接受。又“小昆仑”一名，在张守节前，郭璞也已用了。《海内西经》郭《注》：“言海内者，明海外复有昆仑山。”又道：“此自别有‘小昆仑’也。”

郭意以海内的昆仑为小昆仑，海外的昆仑为大昆仑。毕氏辩之，云：“郭以此为小昆仑，非。《博物志》云：‘汉使张骞度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滨有小昆仑。’则是肃州之山乃古之昆仑，小昆仑在海外，郭说正相反。”又《大荒西经》“昆仑之丘”下，毕氏也说：“此肃州昆仑也。”他把《西次三经》《海内西经》《大荒西经》里的昆仑都极肯定地放在肃州；至于小昆仑，则他以为《山海经》所未记，仅见于《博物志》。对于昆仑下的四水，他说河水道：“今水出于积石，当肃州昆仑之南。《海内西经》曰‘出东北隅’，盖其伏流也。”（卷二）用“盖其伏流”一语作掩护，出于积石的河水居然也跟酒泉昆仑发生了关系。赤水呢，他说：“疑即浩亹水也。”（同上）按浩亹水即今大通河，出酒泉南山的东南，这自与《西次三经》所说的赤水方向完全密合。洋水，他说：“《水经注》云：阚骃说：‘汉或为漾。漾水出昆仑西北隅，至氐道，重源显发而为漾水。’据此则即甘肃秦州南之汉水也。《海内西经》云‘出西北隅’，或其潜源欤？”（同上）这又用了“潜源”说把天水、酒泉两地的山川打通了。黑水，他无说。这四条大水，他总算安排了一下，虽则并未熨帖。

毕氏固然没有在《西次三经》提及实际的黑水，而肃州昆仑附近毕竟有条黑水，所以他在《海内西经》里又根据了《括地志》而注黑水。按《括地志》云：

黑水源出伊州伊[吴](吾)县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十里而绝。三危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四十里。(《《史记·夏本纪》正义》引)

张守节又为加上说明道:

其黑水源在伊州,从伊州东南三千余里至鄯州,鄯州东南四百余里至河州入黄河。……然黄河源从西南下出大混仑东北隅,东北流,经于阗,入盐泽,即东南潜行入吐谷浑界大积石山。又东北流,至小积石山。又东北流,来处极远。其黑水当洪水时,合从黄河而行,何得入于南海。他称汉武所定的昆仑为"大昆仑",张骏所定的昆仑为"小昆仑",称吐谷浑界内的积石为"大积石山",今永靖县的积石为"小积石山",这可说是地理学上的一次名词整理。他以为黑水不能入南海,只能入黄河,也是一个正确的看法。毕沅对他的名词整理虽然不认为满意,而对于他所说的黑水路线则表示容纳,所以他注《海内西经》时即取此说,云:

黑水源在伊州,从伊州东南三千余里至鄯州,鄯州东南四百余里至河州入黄河……黑水合河入海也。

按唐伊吾故城在今甘肃安西县北,水道经安西而流至敦煌的只有现今的疏勒河,一名布隆吉尔河,古名籍端水,源出玉门县南山,西北流至安西县城北,又西至敦煌县城北,会合南来的党河,潴为哈拉湖。《括地志》这样说,是确指这条河为黑水。可是这条河是由东向西北流的,到了中哈拉湖就停止了。或者李泰从地图上看来,误认它是由哈拉湖向东南流的,又认疏勒河的南端即是大通河的北头,所以《括地志》说从伊吾东南流至鄯州(今青海乐都县),入于湟水,又至河州入黄河。这大通河即是蒋廷锡所说的"雍州黑水",可惜已被毕沅在《西次三经》里派作赤水了。想不到他到了校注《海内西经》的时候竟又沿用了蒋廷锡之说而把它重定为黑水!它究竟是黑是赤?这问题可不闷死人!

除此之外,酒泉南山可以定为昆仑的条件,它和弱水相近是一个绝大的理由。弱水的最早记载,是《海内西经》说的:"弱水……出(昆仑之虚)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鸟东。"出西南而东北,又西南,即是把昆仑环绕一周,所以《大荒西经》说:"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

渊环之。”《禹贡》则说:“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淮南·地形》也说:“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南海。”

从这几条文字看来,可知弱水发源穷石,经过合黎,进入流沙,流成一条圆线。在这几个条件下,给汉朝人寻出了。《汉书·地理志》说:“张掖郡删丹:桑钦以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合黎是山名,同时也是水名。这个分别,《括地志》说得清楚:“兰门山,一名合黎,一名穷石山,在甘州删丹县西南七里。”“合黎,一名羌谷水,一名鲜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副投河,亦名张掖河,南自吐谷浑界流入甘州张掖县。”(同上)删丹,今甘肃山丹县。穷石山,即祁连山的一部分。山丹河和洪水河都出山丹西南的祁连山,即穷石山。汇合西北行,至张掖县,与张掖河合,俗称黑河,蒙古人叫做额济纳河;西北流经临泽、高台两县,出边墙到鼎新县,与白河相会,北流歧出为二,分入二泊,就是古代的居延海,经书里唤作流沙的。这白河古名呼蚕水,又名洮赍河,一作讨来河,发源青海西北的洮赍山,也写做托赖山。西北流入甘肃界,至酒泉后东北行,经金塔至鼎新,入黑河。黑、白二河异流同趋,把酒泉南山包围了起来,正应着《大荒经》中的弱水之渊环绕昆仑之丘的一句话。所以它在酒泉昆仑中,根据的坚强实在远出其他诸水之上。

足以证成马岌这一说的证据还有。《〈汉书·地理志〉注》云:“(酒泉郡)应邵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师古曰:“旧俗传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这不是《禹本纪》所说的昆仑的醴泉吗!又段国《沙州记》云:“羊髑岭东北二百里有大山,遥望甚似东岳岱山,极高大险峻,嵯峨崔嵬,颇有灵验。羌胡父老传云:是西王母樗蒲山。”沙州即今敦煌。看《西次三经》,西王母所居在昆仑西,而敦煌在酒泉西,不是恰恰相应吗!又《西次三经》的近末尾处有三危山,《括地志》云:“三危山有三峰,故日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三危的西面是天山,《括地志》又云:“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罗漫山,在伊吾县北百二十里。”这又不是和实际的山很符合吗!怪不得张守节和毕沅要竭力拥护这一说!

可是我们终有一点遗憾,不敢作圆满的肯定,其故有二。其一,酒泉

南山如为昆仑，何以班固在《地理志》里不把昆仑放在酒泉而偏记在金城临羌？临羌离酒泉固然不算太远，究竟要翻过一座祁连山。又酒泉有西王母石室，临羌之西也有西王母石室，所以临羌的昆仑不见得就是酒泉的昆仑。其二，昆仑和四水是分不开的，尤其是黄河，汉武帝因河源的确定而才有昆仑的确定。酒泉昆仑说摆脱了河源问题不谈，虽有弱水的合拍，黑水的近似，究竟避重就轻，逃不过明眼人的指摘。《水经》作者说："河水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这是酒泉昆仑说的极大要求。可惜终是一个想象，不能提出实证替这一说张目。毕沅模仿张骞，说是伏流，这又是一个巧妙的方法，可是西域有广袤三百里的蒲昌海，酒泉昆仑又有什么大量蓄积的水池可以做河水伏流的源泉？所以这种想法不过纸上谈兵而已，实际不但不能解决这问题，反而增加了这问题的纠纷性。

作者：顾颉刚，（1893~1980），男，字铭坚，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教授。

# 玉门关阳关杂考

向 达

汉武帝通西域，于是列四郡据两关。两关者《汉书·西域传》所谓“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是也。据《汉书·地理志》，敦煌龙勒县有玉门、阳关，皆治以都尉，其地俱在今甘肃敦煌县境内。汉以来中国与西域之交通无不取道于此。唐人于役西陲者，尤喜以之入于吟咏。是故两关不仅在中外交通历史上有其地位，即在文学上亦弥足以增人伤离惜别之情。晋魏以后渐就湮废，遗址所在，久无定说。清光绪季叶，英国人斯坦因（Sir M.A.Stein）考古于我西陲，在敦煌北古长城废塞发现汉代简牍千余枚，经法国沙畹（E.Chavannes）及中国罗叔言与王静安先生先后为之刊布遗文，予以考释。不仅汉代西陲史事因而重光，即汉玉门关故址亦复显于世，诚近代中国史学及考古学上一盛事也。余幸得读诸老先书，三十一年冬至三十二年夏又获旅居斯土。其间曾再游两关，驰驱于大漠之间，游心于千载以上，摩挲残垒，我思古人。归来以后，以见闻所及，与友朋讨论，证之前人所说，亦有未能尽合者。

## 一、两关遗址

《汉书·地理志》谓玉门、阳关俱在敦煌郡龙勒县境内，龙勒至唐为寿昌县，隶沙州。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沙州条，寿昌在州西南 150 里，伯希和、羽田亨合编《敦煌遗书》收巴黎藏石室本 P.2691 号残沙州地志及敦煌某氏藏晋天福十年州学翟博士写本《寿昌县地境》，俱作去州东北 120 里。友人夏君作铭谓《元和郡县志》寿昌县东至州一百五里，其里数又不同。案寿昌距沙州里数诸书无作一百五里者，《元和郡县志》“五”字下必脱一“十”字，《太平寰宇记》多据《元和郡县志》作一百五十

里，不作一百五里，可证也。今敦煌西南 140 里有小腴壤曰南湖，居民百余户，居地东北约 3 里有古城，东、西、北三面周垣犹存，相传即唐寿昌故城。罗叔言刊《鸣沙石室佚书》收巴黎藏石室本残《沙州都督府图经》及前举《寿昌县地境》，俱谓寿昌因县南十里寿昌海得名。今古城南十里为大泽，南湖水源出于是，所谓寿昌海舍斯莫属，则泽北古城，即唐寿昌城故址，盖无可疑矣。《寿昌县地境》又谓有西寿昌城，在寿昌城西 5 里。案今南湖西北隅有地名古董滩，流沙壅塞，而版筑遗迹以及陶片遍地皆是，且时得古器物如玉器陶片古钱之属，其时代自汉以迄唐宋皆具。古董滩遗迹，迤逦而北以迄于南湖北面龙首山俗名红山口下，南北可三四里，东西流沙湮没，广阔不甚可考。自此而西或西北更无其他古城遗址，颇疑唐人书中之西寿昌城即在今古董滩一带也。残《沙州地志》亦著录西寿昌城，惟谓在县西 25 里，今古董滩西或西北既无古城遗址，则县西 25 里者或系县西北 5 里之伪误耳。

至于阳关故址，据《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正义引《括地志》，谓阳关在沙州寿昌县西 6 里，《元和郡县志》卷四〇、《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及《舆地广记》卷一七俱同。《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记边州入四夷道第 5 安西入西域道云，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

巴黎藏石室本又一残《沙州图经》亦纪及阳关，其文云：右在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迹见存。西通石门涧□□□□，在玉门关南，因号阳关。

这是唐人记阳关故址距寿昌城道里有 6 里与 10 里二说。顾寿昌城西除今名古董滩之西寿昌城外，更无其他遗址，则所谓阳关故城，当即是西寿昌城。作书者或称之为阳关故城，或称之为西寿昌城，其实一也。夏君作铭曰，《畿辅丛书》本《元和郡县志》云，魏尝于此置阳关县，因废。疑称为阳关故城者谓阳关县之故城也，而县废已久，名称罕闻，故后人或就当地仍存在之寿昌城而称之为西寿昌城。又按《晋书·地理志》，敦煌郡下龙勒与阳关并存，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遂以为立于曹魏，而不始于元魏，未知孰是。按：阳关县之置当即由于阳关，而县治或即在阳关故址，残《沙州图经》文可为证明也。里程所纪参差，则或由计算起点微

异，因有出入耳。今自此出红山口，西北行过水尾入碛，140 里至小方盘，是为汉玉门关故址；西行经安南坝诸地以至于婼羌，则汉唐以来之南道也。红山口两山中合，一水北流，往来于两关者，在所必经，阳关适在口内，可以控制西北两路。口西山峰上一汉墩翼然高耸，自敦煌赴南湖未至 40 里，即见此墩。阳关设于口内，而以此墩为其眼目，盖可想而知也。

玉门关亦在龙勒县界。沙畹及王静安先生据斯坦因所得简牍，谓斯氏地图上东经 94°稍西、北纬 40°30 ' 稍南之古城地图上记号作 TXIV(《流沙坠简》作敦 14)者，即汉玉门关故址。此东经 94 稍西、北纬 40°30' 稍南之古城，今名小方盘。斯氏所得汉代玉门都尉诸版籍皆出于此，汉玉门、阳关治以都尉，则小方盘之即汉代玉门关故址，可以无疑。《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括地志》谓玉门关在汉龙勒县西北 118 里，《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俱承其说。巴黎藏石室本残《沙州都督府图经》及《寿昌县地境》谓在寿昌北 160 里，所记各异。今自南湖出红山口，西北行过水尾入碛，经卷槽、芦草井子以至小方盘，为程约 140 里，与唐代之 160 里不甚相远，方位亦近。疑《括地志》所纪为别道也。巴黎藏石室本又一残《沙州图经》亦纪及玉门关，其下文字全泐，唯存“周回一百廿步，高三丈”诸语，所纪为玉门关城垣之周回及高度。今小方盘城垣尚完整，俱属版筑，北西二面有门。城为正方形，每面约长 30 公尺，高约 10 公尺。疑残《沙州图经》所云之步，乃步测之步，非计里开方之步也。今 1 步约合 1 公尺，120 公尺与 120 步，大致相合。是亦可为小方盘即古玉门关故城之一证也。

自阳关至玉门关，两关之间无长城遗址，唯每隔十里即有一墩，自水尾北迤逦不绝以至于小方盘南。墩作六棱形，构以土墼，每三层间以芦苇一层，与小方盘附近所见诸汉墩同。以西皆是长碛，敌骑入侵，殊为不易。汉代之所以于此仅置烽燧以为戍逻者，其故或在斯欤？斯坦因考古敦煌，自红山口西北行过水尾至卷槽，即取西北向至俗称为南大湖、西湖一带，未自卷槽直趋小方盘。故其地图只记小方盘南及红山口西北数墩，自小方盘南至卷槽，为程约 80 里，阙略尚多也。又案陶保廉《辛卯

侍行记》卷五汉玉门阳关路所记北道云，北道出敦煌西门，渡党河，西北行戈壁，七十里碱泉，五十里大泉，四十里大方盘城，废垣无人，汉玉门关故地也。四十里小方盘城。废垣高丈余，长四五十丈，无居民。

陶氏以大方盘城为即汉玉门关故地。当时汉简尚未复显，陶氏失考，未可深责。静安先生《流沙坠简·序》以东经94°稍西之古城为即陶氏之大方盘城，盖涉陶氏之说而误。不知斯氏地图上TXIV所谓汉玉门故关者，乃陶氏之小方盘城，大方盘城尚在其东40里也。静安先生所以致误之故，夏君作铭谓由于先生著书时，未及见斯坦因之Serindia及Innermost Asia二书所附地图，仅据斯氏著行纪（Ruins of Desert Cathay）后附略图摹绘，漏略甚多，致有此失。夏君之言是也。斯氏详图东经93°54′左右、北纬40°22′一古城遗址图上注明为古玉门关者是为小方盘城，大方盘城尚在其东，正当东经94 北纬40°25′处，斯氏详图注曰古代仓库。至于东经93°30′处，斯氏并未发现古城，亦未见录于地图。静安先生所云出于误会，可以不论。

**二、太初二年以前玉门关在敦煌以东说质疑**

汉武帝使张骞凿空通西域以后，遂开河西四郡。太初元年（前104年）复命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伐大宛，《史记·大宛列传》纪此云，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是岁太初元年也。……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

《汉书》卷六一《李广利传》文与《史记》同，唯"而使使遮玉门曰"作"而使使遮玉门关曰"，增一关字。沙畹据《史记·大宛列传》文，因在其所著《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所获中国文书考释》（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al Stein dans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一书绪论第六至第七页主张汉武帝太初以前之玉门关应在敦煌之东，是以武帝使使遮玉门，贰师将军乃留敦煌，不敢东向以入关也。敦煌西北之玉

门关，则是太初以后所改置者。王静安先生《流沙坠简·序》亦赞成沙畹之说。30年来言玉门关者，大都奉二先生之论无异辞。夏君作铭独送疑难，以为汉代玉门一关并无改置之事。细案《史记》《汉书》文字，验之新近发现之汉简，夏君致疑不为无见，因考故书，申成其说如次。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浑邪、休屠王降汉以后，汉始夷河西为郡县，建置河西四郡。据《汉书》卷六《武帝纪》，武威、酒泉二郡之置即在元狩二年，元鼎六年（前111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则谓张掖、酒泉二郡之置俱在太初元年，武威在太初四年，敦煌在后元元年（前88年），与《本纪》异。依《地理志》，四郡之开，与贰师西征盖相先后。然《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云，乌维单于立十岁而死，子乌师庐立为单于，年少，号为儿单于。是岁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

又《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记征和二年（前91年）巫蛊事，有云，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

《史记》《汉书》所记，皆在后元元年前若干年，其时敦煌已称郡矣。故河西四郡建置年岁，《本纪》所志疑得其实，不必待至贰师伐大宛始开边设郡也。清儒以及近代学人讨论四郡建置之文甚多，大多未从《本纪》，读者可以一一覆按，兹不赘。

《史记·大宛列传》又纪赵破奴、王恢击破楼兰事，文云，于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汉书·楼兰传》作"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

据《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赵破奴之封浞野侯在元封三年，王恢封浩侯在元封四年正月甲申，以故中郎将将兵捕得车师王侯。自是自酒泉至玉门始列亭障。此皆在太初二年以前。河西郡县之建置完成于

元鼎六年，而酒泉至玉门列亭障即在元封三四年之间，政治军事盖几于同时并进矣。如依沙畹王静安二先生说，此处所云之玉门亦当在敦煌以东，今玉门县附近。然《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效谷县下班氏本注云，本鱼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

鱼泽尉，石室本残《沙州都督府图经》作鱼泽都尉。依桑钦说，鱼泽障之立，最迟亦当在元封六年，与《史记》大宛列传所纪合。如太初二年以前之玉门关在敦煌以东今玉门县附近，而《史记·大宛列传》所云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门一语，为指敦煌以东之玉门关而言，则班氏本注引桑钦说元封六年崔不意为鱼泽障都尉之辞，将无从索解矣。

又太初三年贰师将军二次伐大宛，四年斩其王而还。贰师之行也，汉以李陵将五校尉随后行，军正任文则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将军后距。李陵事见《汉书》卷五四《李陵传》，任文事见《汉书》卷九六《西域传·楼兰传》《楼兰传》云，楼兰既降服贡献，匈奴闻，发兵击之。于是楼兰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后贰师将军击大宛，匈奴欲遮之，贰师兵盛不敢当。即遣骑因楼兰候汉师后过者，欲绝勿通。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捕得生口，知状以闻。上诏文便道引兵捕楼兰王，将诣阙，簿责。王对曰，“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入居汉地”。上直其言，遣归国。亦因使候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亲信楼兰。

如任文所屯之玉门关在敦煌以东今玉门县附近，则自此至楼兰为程二千余里，岂得云便道？又自敦煌以东并属汉地，匈奴生口岂能自投敌境，束手受缚，以泄其欲遮击汉使之状？唯以任文所屯之玉门关在今敦煌西北小方盘地，逻骑入碛游弋，是以截断匈奴与楼兰之往来，故能捕得往还于匈奴楼兰之生口也。

说者又曰：“即令任文所屯之玉门关为在今敦煌西北，亦无害于太初二年以前玉门关在敦煌以东之说也。玉门关之西迁，或者即在太初三年贰师将军二次伐大宛之时，故任文得而屯之耳。”案之史文，亦有不然。《汉书·武帝纪》太初三年下云，夏四月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

城，西北至庐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秋，匈奴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行坏光禄诸亭障。又入张掖酒泉，杀都尉。

《史记·匈奴传》纪此云：其秋，匈奴大入定襄云中，杀略教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障。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会任文击救，尽复失所得而去。

《史记·大宛列传》述居延休屠诸塞之筑云，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适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

盖太初三年贰师将军二次伐大宛，汉因筑五原塞外列城至庐朐，并筑居延、休屠诸塞，以固张掖、酒泉北边，保持通西域门户。匈奴之于是年秋大入定襄、云中、张掖、酒泉，坏光禄诸亭障，正为破坏汉武帝防边之策。不谓挫败于任文之击救。以在张掖、酒泉之攻略未成，匈奴乃转而谋因楼兰以绝汉师后过者，又以任文之进屯玉门关，引兵捕楼兰王，而完全失败。此为太初三年贰师将军二次伐大宛，汉与匈奴在河西诸郡攻守之形势，据《史记》《汉书》之文可以推知者也。若云玉门关之西迁即在是时，则光禄诸亭障以及居延、休屠诸塞之筑，班氏以及史公尚为之大书特书，而谓于玉门关之迁徙，其重要倍蓰于张掖、酒泉北诸障塞者，反不着一字，马、班虽疏，恐亦不至如是之甚也！

河西列四郡，为时俱在太初以前。《史记·大宛列传》使使遮玉门一语，其玉门当即指玉门县而言。太初二年贰师将军自大宛败归，已入玉门关抵敦煌，将自此东归酒泉。汉玉门县在今玉门县属赤金附近，适扼入酒泉之要道，故武帝使使遮之，使不得入酒泉耳。《后汉书》卷七七《班超传》纪超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上疏乞归，有云："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此二语正可作《史记·大宛列传》注脚。《汉书》于玉门下增一关字，恐有未谛。

敦煌为通西域门户，汉有事于西域，皆于敦煌集结士卒，囤积粮草，然后出发。贰师将军两次伐大宛，即可为此说证明。匈奴欲绝汉通西域之道，必西击鄯善，东攻敦煌。汉欲教西域屯戍，亦以发敦煌兵为最近且

便。敦煌之形势如斯，故汉于元鼎六年析酒泉另置敦煌郡也。石室本《寿昌县地境》玉门关下注云，汉武帝元鼎九年置，并有都尉。

《地境》以玉门关之置在元鼎九年，然元鼎无九年，《地境》传写，或有讹误。三十二年十一月，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夏作铭、阎文儒二君在敦煌西北斯坦因地图上 TXVII 处。发现汉简数十枚，其中一枚，存字两行，首作酒泉玉门都尉云云。玉门都尉隶于酒泉，是玉门关之建置，尚在敦煌未自酒泉析出开郡以前。敦煌未开郡时之玉门都尉版籍既发见于敦煌西北玉门关故址附近，则太初以前玉门关并未在敦煌以东，因有此新发现而更无可疑矣。元鼎六年河西四郡先后建置蒇事；元封时自酒泉至玉门列亭障；太初三年复增筑张掖、酒泉以北诸障塞。政治上军事上之建置既次第告竣，而后贰师将军二次伐大宛遂无后顾之忧。太初四年贰师胜利凯旋，西域城郭诸国相率慑服，故汉乃进一步经营西域。《汉书·西域传》所云“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之语，盖谓自是以后，自敦煌西至盐泽亦列亭障，如元封时酒泉至玉门之所为耳。静安先生乃据此以为敦煌西北之玉门关置于太初四年贰师将军二次伐大宛归来以后之证，盖未深考也。

**三、六朝以迄隋唐之玉门关**

汉代玉门关，自始置以至终汉之世俱在敦煌。唯至隋唐，则玉门关已徙至敦煌以东瓜州之晋昌县境。隋炀帝大业七年西突厥处罗可汗为射匮所败，走高昌，炀帝因遣裴矩将处罗可汗母向氏往谕之。《隋书》卷八四《西突厥传》云，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教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高昌王麹伯雅上状。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驰至玉门关晋昌城。矩遣向氏使诣处罗所，论朝廷弘养之义，丁宁晓谕之，遂入朝。

《元和郡县志》卷四〇瓜州晋昌县云，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

《隋书》亦云玉门关晋昌城，是自长安西去，必先至玉门关而后抵晋昌，与《元和郡县志》所记合。元和志县东 20 步一语，清王琦注《李太白集·胡无人》诗引《地理志》作 20 里，疑通行本《元和志》或有讹误也。隋

于玉门关并置有关官。《隋书》卷二九《地理志》敦煌郡常乐县下注云，后魏置常乐郡。后周并凉兴、大至、冥安、闰泉合为凉兴县。开皇初郡废，县改为常乐。有关官。

据《隋书》卷二八《百官志》关置令丞，上关令、中关令为从八品，下关令、上关丞、中关丞为从九品。唐制略同。隋常乐县属瓜州，唐于敦煌置沙州，别于晋昌郡置瓜州，治晋昌，即在隋常乐县，而于旧广至则立常乐县。隋常乐有关官，其治所为玉门关无疑也。

唐贞观初玄奘法师西行，亦取道瓜州之玉门关出伊吾以至西域。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纪法师过凉州至瓜州出玉门关云，乃昼伏夜行，遂至瓜州。时刺史独孤达闻法师至，甚欢喜，供事般厚。法师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芦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

《大慈恩师三藏法师传》云玉门关在瓜州北，出关西北行过五烽凡五百里，即入莫贺延碛伊吾国境。唐冥详《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则谓五烽在玉门关西。唐瓜州治晋昌县，今人考证谓约在今安西县双塔堡附近。瓠芦河，冥详《行状》作胡卢河，即今窟窿河，经乱山子以入疏勒河。私意以为唐瓜州治晋昌县当即俗称为锁阳城之苦峪城，玉门关则在其北。据岑嘉州《玉门关盖将军歌》，唐时守关戍卒数达五千，规模之大可想而知。唯今双塔堡乱山子一带仅余古烽墩二，其他遗迹悉化云烟，关址所在，疑莫能决也！

隋唐时代之玉门关关址应无所更动。惟《元和志》谓关在州东，《大慈恩师三藏法师传》谓在州北；奘师自瓜州抵玉门关后，经五烽涉大碛以达伊吾。五烽，《大慈恩师三藏法师传》谓在关西北；《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则谓在关西，《大慈思师三藏法师传》《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互异，未知孰是。斯坦因据《慈恩传》，因谓奘师至伊吾，所取者即沿今安西经星星峡以至哈密之大道，其言甚辨。唯斯氏不知唐代瓜州治晋昌县在今安西县东，必以今安西西南 70 里之瓜州故城为即唐代瓜州

治所，则不无千虑之失耳。

至于汉以来原在敦煌西北之玉门关，何时始迁至敦煌以东瓜州境内，史无明文，不甚可考。唯按《三国志·魏志》一六《仓慈传》云，仓慈……太和中迁敦煌太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

自太和中上推 20 年，当汉献帝建安十五六年之际，其时马超败走凉州，陇右氐、羌继叛。延康元年（220 年）酒泉、张掖复大乱。敦煌太守马艾卒官，府又无丞，郡人遂推功曹张恭推行长史事。中枢失政，边陲云扰，西域因而阻隔。黄初三年（222 年）鄯善、龟兹、王阗王来献，西域复通，因置戊己校尉，即拜行敦煌长史张恭为西域戊己校尉。典午继起，敦煌以僻在边裔，仍多篡乱。《晋书》卷三《武帝纪》咸宁二年二月甲午下云，初敦煌太守尹璩卒，州以敦煌令梁澄领太守事。议郎令狐丰废澄，自领郡事。丰死，弟宏代之。至是，凉州刺史杨欣斩宏，传首洛阳。

唯其时地方虽多变乱，边防似未尽废弛。伦敦藏石室本 S.5448《敦煌录》有云，河仓城，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古时军储在彼。

《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沙州四至八到云：

西北至河仓烽二百四十二里，与废寿昌县分界。

此所谓河仓烽即敦煌录之河仓城，以今地考之，即在古玉门关故址之小方盘城东 40 里，俗名为大方盘城者是也。三十二年十一月夏作铭、阎文儒二君于大方盘城东面土台内掘得晋泰始十一年石碣一，石刻文曰，泰始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甲辰造，乐生。

晋武帝泰始只十年，十一年乃咸宁元年（275 年），其时敦煌正令狐氏窃据一隅，又以与中枢迥隔，是以改元逾岁，而石刻犹作泰始也。“泰始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甲辰造”，当是指河仓城之建置而言。泰始十一年筑河仓城既葳事，因立石以纪之耳。乐生为何人，无可考。泰始十一年上距黄初三年凡 53 载，犹从事于筑河仓城以为囤积军储之需，则玉门关之尚未废弃，经营西域仍自未懈，可以推知也。其后五凉鼎沸，四郡鱼烂，割据独立，有如弈棋。然自前凉以至后凉，时有西征之举。前凉张骏曾以兵力慑服西域，以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

郡三营为沙州。晋孝武帝太元七年(382年)苻坚遣吕光伐龟兹,龟兹既平,坚以光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太元十年(385年)光据姑臧,又以其子覆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高昌。西域校尉,当即指戊已校尉而言。而西域都护、戊已校尉、玉门护军三营,疑俱承魏晋之旧而加以恢弘扩大耳。

玉门关之东徙与伊吾路之开通当有关系。《周书》卷五四《高昌传》末云,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道里不可准记,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类为验。又有魍魉怪异。故商旅来往,多取伊吾路云。

又《北史》卷九七《高昌传》云,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

据此是伊吾路之开通盖始于六朝也。《晋书》卷一二《吕光载记》纪太元十年光自龟兹东归,苻坚高昌太守杨翰说其凉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关,熙不从。……及至玉门,梁熙传檄责光,擅命还师,遣子胤与振威姚皓、别驾卫翰率众五万距光于酒泉。

杨翰劝梁熙守高桐、伊吾二关,二关今地无可考。然既以伊吾名关,必在伊吾,则吕光东归或已取伊吾路矣。又《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暠传》记景于庚子元年(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又道宋繇东伐凉兴,并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

此处之玉门已西以及屯玉门、阳关诸语中之玉门,皆当指玉门关而言,且疑已在敦煌以东。而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以及玉门大护军营屯戍之所,亦当求之于唐代瓜州境内,而不尽如静安先生所云在敦煌西北之玉门关。玉门关之东徙,或者即在典午末叶,五凉鼎盛,伊吾路开通之际,亦未可知也。

作者:向达,(1900~1966),男,湖南溆浦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 敦煌史地杂考

阎文儒

## 一、敦煌故城

敦煌县城在党河东，故城在党河西，相隔约半里。城垣已圮，遗址尚存，东西长近二里，南北仅见残垣数段。至于新城，据清常钧《敦煌杂抄》卷二沙州卫条云："沙州之西，本有故城，即汉敦煌郡治。经党水北冲，圮其东西。雍正三年（1725年），故城东，另筑卫城，周围三里三分，开东西南三门。"

道光时，知敦煌县事苏履吉纂修《敦煌县志》卷三《建置志》云："县城周围三里三分零，计长六百丈。……雍正三年建。"

是卫城与县城，即今日之敦煌城。至河西故城建于何时，则不可考。常钧所记之故城，应为旧敦煌城。《敦煌杂抄》卷二沙州卫条云，明永乐初，置沙州卫，以酋长困即来为指挥使，赐诰印。正德十年，为哈密瓦剌二部侵，逼走附塞下。正统中，沙州久为罕东指挥班麻思结驻牧，因即来子喃哥，谋奔瓦剌，甘肃镇将任礼帅兵收其全部，入塞居之甘州。时吐鲁番侵据哈密，班麻思结孙只克，请自立一卫与相抗，迷于沙州故城，立罕东左卫。

又《肃州志·沙州卫志》云："今按沙州旧城，即古敦煌郡治也。今在沙州之西，墙垣基址犹存。以党水北冲，城垣东圮；故今敦煌县城，筑于旧城之东。"

据以上诸记，知旧城废毁，距今不远。明正统中，沙州为罕东指挥班麻思结所占，唯以吐鲁番作乱，其孙只克，乃自请别立罕东左卫于沙州故城，以与相抗。是班麻思结虽居沙州境内，罕东左卫，则居沙州故城。

沙州地域，因明时曾长久放弃，清初又改建新城，因而沿革关系，模糊不清。于是论汉之敦煌城，唐之沙州故城者，莫衷一是。说者多依旧志，距三危山里数而臆测之。《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俱载沙州距三危山三十里。《敦煌录》及莫高窟第156号窟外北壁之《莫高窟记》，俱载莫高窟去州城二十五里。予意汉之敦煌郡城，即唐之沙州城，宜依旧志所说，在今废城内。今城为雍正三年所建，汉唐间之敦煌城，虽未明记在党河以西，然以石室本《沙州图经》所记之山川言之，似在党河之西。其所记沙州城，党河条云，其水（指甘泉，甘泉即党河）东北流四十里，至沙州城，分派灌溉：北流者名北府；东流者名东河水；东南流者二道，一名神农渠，一名阳开渠；州西北，又分渠名都乡渠；又从马圈口分一渠，于州西北流，名宜秋渠。州城四面，水渠侧，流觞曲水，花草果园，豪族土流，家家自足。

可见党河入敦煌，由马圈口以下，大分渠道，如以沮渠蒙逊攻李恂事观之，敦煌似应在党河之西，《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传》云，郡人（敦煌郡人）宋承、张弘，以恂（李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数十骑，入于敦煌。元绪奔凉兴，宋承等推恂为冠军大将军凉州刺史。蒙逊遣世子德政，率众攻恂，恂闭门不战。蒙逊自率众二万攻之，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遣壮士一千，连板为桥，潜欲决提，蒙逊勒兵逆战，屠其城。

《十六国春秋》与此同。又《沙州图经》云，一所故堤高三丈，阔三丈五尺，右州东北一百二十步。按《十六国春秋》……五年（嘉兴）春，蒙逊率众二万攻敦煌，遗恂书，谕以兴亡之运，恂不答。二月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使壮士千人，连板为桥，潜欲决提，悉为蒙逊所擒。将佐等劝恂曰：今日水弥盛，东军来者相继，虽有熊武之士，决战无所，宜遣使降，因以击之。恂遣使请降，逊不许。左长史宋承义、武卫将军张弘等开门降逊，恂自杀。其堤多毁灭，唯东面北面，其址步存。

沮渠蒙逊由东来，作三面堤以灌城，若非大水何以为功，堤既在州东北一百二十步，则此水必在州城东。如按《沙州图经》所记之七所渠推之，甘泉主流，亦在州东，《图经》云，宜秋渠，右源在州西南二十里，引甘泉水两岸修堰。孟授渠，右据《西凉录》，敦煌太守赵郡孟敏于州西南

十八里，于甘泉都乡斗门上开渠溉田，百娃蒙赖，因以为号。阳开渠，右源在州南十里引甘泉。都乡渠，右源在州西南一十八里，甘泉水马圈堰下流，造堰拥水。北府渠，右源在州东三里，甘泉上中河，斗门为其渠，北地下。三丈渠，右源在州东三里甘泉水上。阴安渠，右在州西南六里甘泉水上。

以七渠之源观之，宜秋、孟授、都乡三渠，俱源于州城西南二十里左右。阳开渠源在州南十里，阴安渠源在州西南六里，北府、三丈二渠，最下流，则源于州东三里。可知甘泉水，系由马圈口而下向北流，偏东，距州城之半，开斗门分出三渠，至城南十里又分出一渠，再北六里又分一渠；然后东北流，运州城东更分二渠。是甘泉之正流，应从西南来至州城南，向东北流。故《沙州图经》一所壕堑水条云："阔四十五尺，深九尺，壕绕城四面。右其壕西南角，有一大泉，分为两道，一流绕城四面周匝，至东北隅合流出，去城七里，投入大河。"

大河即党河。一所壕堑水，由城东北，流入大河，则大河应在敦煌城东。至高居诲《使于阗记》所云"刺史曹元深郊迎，问使者天子起居后，即西渡都乡河至阳关"者，乃因当时沙州城西，以都乡渠为最大，故只记过都乡至阳关也。都乡河非党河，向师觉明《西征小记》已辨之矣。

唐以前敦煌城位置，似俱在党河西，已如上述。而唐之沙州城，即汉之敦煌郡城，亦可于《沙州图经》中证之。《图经》云："嘉纳堂。图赞所志，其堂毁除，其阶尚存。其地在子城东北罗城中，今为效谷府。谦德堂。右按《西凉录》，王李暠建以听政，其堂在子城中，恭德殿南，今并除毁。"

是西凉时敦煌城之子城，唐时仍未拆毁，则唐沙州城址与西凉时敦煌郡城址，必为一也。

尤有进者，鸣沙山在今敦煌城南五里，中有月牙泉，五月五日敦煌士女，俱在此处滑沙，云可去灾。古地志所记距州城里数，有七里、十里之别。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敦煌县条云："鸣沙山一名神沙山，在县南七里。……有一泉水，名曰沙井，绵历古今，沙填不满。水极甘美。"

又石室本《沙州城土镜》云："鸣沙山州南七里。"

高居诲《使于阗记》云："瓜州南十里鸣沙山，云冬夏殷殷，有声如雷，云禹贡流沙也。"

今敦煌城距鸣沙山，约五里，如以废城址计之，应有七里之数。则石室本及《元和郡县志》所说较可靠。至高居诲十里之说，或系指月牙泉南之大沙山而言，因《敦煌录》所记鸣沙山之里数，亦云十里；然其下云："其山东西八十里，南北四十里。"今日鸣沙山南之大沙山，西至党河口，其间距离，恰相符合。

宋皇佑以后，沙州没入西夏，汉人记载遂甚少。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复置瓜州，属沙州路，虽入版图，而无事迹。明置沙州卫，则有文献可据，其后设罕东卫，及罕东左卫。

罕东卫游牧敦煌境内，左卫则驻于今日敦煌废城中，于是对敦煌城址，遂约略可考。

按明罕东左卫所驻之沙州故城，即今之废城。因自正德十年，为哈密、瓦剌二部所侵，沙州指挥使入塞后，沙州久为罕东指挥班麻思结所驻牧，然班麻思结并未驻沙州城中。常钧《敦煌杂抄》云："罕东卫在赤斤蒙古西南，本汉敦煌郡地。"《大清一统志》安西直隶州条云："罕东卫在敦煌县东南"，是罕东卫不在沙州城中也明矣。及班麻思结之孙只克，欲与吐鲁番相抗，乃请别立为罕东左卫于沙州城中，即今日之废城。及清雍正元年立沙州所，后遂正式入版图。三年因水圮东面，乃于故城东，另筑卫城，即今敦煌城也。

以上推论，系按文献记载，与敦煌旧城址而言，若求最后结论，唯有俟异日之发掘。

**二、西千佛洞**

过旧城西南行二十里，至新岷州村（按敦煌自明正德后，为吐鲁番占领，汉人内徙。及清世宗雍正三年设卫建城，乃移民实边，从某州徙来者即名其村曰某州）。村中王家有道光中知县事苏履吉离县时所书对联云："八载宦情如作客，六隅民命总归农。"苏君自道光甲申（1824年）作牧敦煌，辛卯（1831年）卸职，前后八载，故曰"八载宦情"也。"六隅"

据《敦煌县志》卷二《地理志》田赋条云，东南隅田五百三十分。……分配户民一十三坊：清远坊、真宁坊……中南隅田三百一分五厘。……配户民六坊：古浪坊、武威坊……西南隅田三百六十一分五厘。……配户民七坊：平番坊、肃州坊……东北隅田二百八十八分。……配户民六坊：岷州坊、伏羌坊……中北隅田五百一十一分五厘。……配户民一十三坊：陇西坊、阶州坊……西北隅田四百五十五分五厘。……配户民一十二坊：狄道坊、平凉坊……

六隅共户2448，每隅设农长1名，乡约1名，各管一隅之事。隅内每一坊设坊长1名，每十户立甲长1名，各司其事，如古代之乡官。至六隅主人，则为农民，故曰"六隅民命总归农"也。

下午由王家乘骑西南行，十余里近沙山山麓。党河经而东流，逾通渭渠，入戈壁。戈壁高于地面者十余丈。由此西行，北望沙枣墩，历历在目，南遥瞩沙山，峰峦危峭，脊背如利刃，乘骑狂奔，驰驱于浩瀚无垠之沙碛中亦不觉天地之大也。行近30里，至石俄博，遂稍憩，与夏先生作铭，下骑观览。所谓石俄博者，即以石累成之石堆，高数十尺，东面有阶级可登，顶则无物。"俄博"为蒙古语，盖亦丛社之类。陶葆廉《辛卯侍行记》卷五，记由敦煌至阳关路云："汉阳关路，敦煌西南行七十里至石俄卡，七十里南湖，即阳关。"

清时为卡汛，《敦煌县志》卷三《建置志》塘汛条云："沙州营属西路，墩汛四处：沙枣墩汛，距本城三十里；石峨博卡汛，距本城五十里；党河口卡汛，距本城八十里；巴彦布喇墩汛，距本城一百二十里。"

夏作铭先生云：此地或即汉之破羌亭。石室本《寿昌县地境》云："破羌亭，县东六十五里，前汉破羌将军辛武贤败破羌戎讫，于此筑亭，故号破羌亭。"

又石室本后汉乾祐六年《沙州城土镜》云："破羌亭，县（寿昌县）东六十五里。"

又石室本斯坦因编号788《沙州残志》云："破羌亭县东六十五里，云汉破羌将军辛武贤，破羌戎于此，筑亭故曰破羌。"

按羌人居南山中，出谷与汉人斗，辛武贤破之，为彰其功，故建破羌亭。诸志俱云：在寿昌县东六十五里，县城东去州一百二十里，至此六十五里，尚余五十五里。今《教煌县志》云，石俄博去城五十里，似与此相近，则石俄博可能即汉破羌亭遗址。

过此不及五里腰店子，凡由敦煌城去南湖，俱于此为休息站，或止宿，或人马进中餐。至此即近党河，河床在地面下数丈，水流淙淙，声彻于耳。再行三里至西千佛洞，洞凿于党河河道之北崖，崖上即戈壁，上有二塔，若莫高窟大泉东三危山下之塔形，今已圮毁。沙崖为风雨所剥蚀，沟壑累累，予等遂下骑牵马，由便道下崖，至西千佛洞。

西千佛洞创凿年月，已无从考知，唯有北魏所凿数洞可据。巴黎藏石室本，又一《沙州都督府图经》有记佛龛之文，或即指此，文云："右在县(寿昌县)东六十里，耆旧图云：汉(阙)佛龛，百姓渐更修营。"

以西千佛洞，距石俄博之里数较之，则距寿昌城亦应近六十里。若然，则西千佛洞之创凿，最晚应与莫高窟同时。

西千佛洞所凿石窟，今存者不及二十，张大千编号仅及十六。

第 1 窟、第 2 窟因无长梯，未能攀登。

第 3 窟：洞形格式若唐时造，佛像为近代所塑。壁画则系宋画，门内楣上有发愿文，朱底墨书，已不可辨。门外楣上之画，有初唐风，东西二耳洞，亦有宋画，唯无塑像。

第 4 窟：魏造，洞内有中心方柱，上连窟顶，四面作龛，内各塑一佛像，及二菩萨像。四壁画贤劫千佛图，佛座下有男女供养人像，题记已不可辨。

第 5 窟：魏造，中有佛龛，龛下画供养人，四壁画贤劫千佛，西壁中有涅槃图。北壁有多宝佛与释迦对坐图。向师云：中心座，东面座下有发愿文，匆匆昏黑未及见。

第 6 窟：魏造，门已圮，佛龛前窟顶上凸起，若起脊之屋。莫高窟魏隋洞，作此形者颇多。后壁画有佛涅槃图，四壁画贤劫千佛。佛龛东西二面，亦画千佛，惟东面近北边缘画佛像一，似为元人画。东壁下供养人，

有着长衫者，有被披巾者，有着斗篷者。又画有车马诸形象。车辕颇长，上有支柱，想系为围席而蔽日者，北朝车服制度，由此可见一斑。又南壁东半壁，画有一佛二菩萨像，下画九供养人，俱冠折角幞头，唐人装束。左边有题记云："如意元年五[illegible]十……"（以下文字为人剥落）中有发愿文不可辨识。

第 7 窟：魏造，有中心方柱，窟前部已崩颓，尚有残余之千佛画像及供养人画像。

第 8 窟：魏造，塑像已毁，中心柱尚在，龛前顶上凸起，若起脊之房屋。四壁画贤劫千佛及供养人，门左右画二菩萨。

第 9 窟：洞顶形与第 8 窟同，中心柱作佛龛，龛内塑一佛像，二菩萨像。东壁一佛像，尚完整。后壁宋人画七佛图，南壁画佛本生故事，尚有题文可辨，匆匆未及纪录。

第 10 窟、第 11 窟：窟门及前部均崩圮，与其他诸窟不通，又无阁道，非用长梯扶上不能登览；而 11 窟下，为党河急注下转弯处，水流湍急，即有长梯，亦难于攀登。

第 12 窟、第 13 窟：俱完整，有小门可入。唯在崖腹中，与 10 窟、11 窟同，亦难攀登。

第 14 窟：完全崩圮。

第 15 窟：前半已圮，中塑佛像，两壁绘经变画。莲座后，壁画作条幅形，与莫高窟晚唐壁画作风同。

第 16 窟：两壁下小平台上塑多数小佛。壁上画千佛，亦晚唐洞。再东近里许，有小洞，若莫高窟最北元洞附近之崖墓，惟门已堵塞，无暇一掘。

**三、唐寿昌县遗址及南湖**

由西千佛洞，西行五里党河口，党河由南来，至沙山，冲一阙口，由此流出，河床入地近 20 公尺。两岸削崖壁立，西千佛洞即沿河崖凿成之洞窟。由此山脊，南望党河，行戈壁中，屈曲如白练，如衣带，诚塞外之奇观。阙口之西，山脊有烽墩，以石筑成，中有柱，每层以苇隔之，高六七公

尺。墩西有小废屋，为居人遗迹。《沙州图经》记甘泉水，有过山阙烽之文云，（上缺）多野马（中缺）狼虫豹窟穴，其（中缺）里至子亭镇西三（中缺约九字）烽，又西北流六十里至山阙烽，水东即是鸣沙山（中略）其水西有石山，亦无草木。又东北流八十里，百姓造大堰，号为马圈口。

山阙烽既在鸣沙山西，则此墩必即唐烽，清时亦于此设卡汛。《敦煌县志》亦载有党河口卡汛之文。党河出口，沿山麓东行，至马圈口始北流。阙口以东，山被流沙，脊如利刃，阙口以西，山上无流沙，危石耸立，不育草木，与《沙州图经》所记正同。

由党河口而西，有以沙石堆成，高不及二三尺，宽不及丈之长墙一道。西迄北工墩，近三十里，土人所谓风墙子者是也。沿墙而行，戈壁中流沙累累，红柳丛生沙上，若小丘然。北工墩，墩高 8 公尺 7 公寸，墩底四周各 12 公尺，墩顶宽长各 8 公尺 2 公寸。墩为版筑，中间杂以苇草，旁露椽头，残毁处有以土坯补筑者。其东北 14 公尺 4 公寸处，有塔形之佛堂 1 所，南半已圮，仅余北半。围墙尚存壁画，惜模糊不可辨。顶之四隅俱凹入，各画天王像，若千佛洞中曹氏时代所凿之洞窟。外垣毁败，只余断壁而已。垣外东南角，地下马粪，积累颇厚，或系当年之马圈。佛堂之构造形式，系晚唐五代时建筑。墩之形式及构造，与汉烽墩相同，因汉长城烽墩，多为版筑，中杂以苇草者（按：唐代烽墩，若双塔堡以西沿南山之墩台，俱以纯土堆成，不杂以苇）。此或系汉代所筑烽墩，历代俱有补修，因有人居，故有马粪，可为驻军之确证。

西行一里余山水沟，沟水清澈，两岸红柳丛生，由此而南十余里，可至山水沟下沟。由敦煌城赴南湖，有南北二路，北路至北工墩，南路至山水沟下沟南工墩。南工墩亦称双墩子，因有二墩故名双墩子，并非烽墩，乃墓道前之双阙（按：以在敦煌沙山所发掘之唐墓经验，茔地前，围墙之门，有土墩二，立于左右侧，即土阙是也。此双墩两侧，有低不及一尺之石围墙，形式与沙山者同，当系双阙，而非烽墩），即茔地门也。内有二墓，墓直径 30 余英尺，墓道长 70 余英尺。英人斯坦因氏，曾于墓顶两侧掘二沟，及戈壁石而止。盖未由墓道掘入，当无法掘及墓室。下沟今已无水，

仅有河床遗迹，惟山水沟在北工墩以北，沟水颇大，两岸水草丰美，芦苇畅茂，或即各沙州地志所记之大泽。按敦煌某氏藏石室本《寿昌县地境》云："大泽县东七里，水草滋茂，牧放六畜，并在其中。"

又石室本后汉乾祐六年《沙州地志》残卷云："大泽县东七里。"

又巴黎藏残《沙州都督府图经》云："大泽东西十里，南北十五里，右在县南七里，水草滋茂，百姓牧放，并在其中。"

今南湖寿昌废城之南七里至十里处，为营盘村，村南有大湖为黄水坝，想系各志中所记之寿昌海。

再由山水沟西行，沙丘累累，七八里至寿昌废城，里数与地志同，故予意山水沟，即唐之大泽。由山水沟而西，入平地，间有沙丘，地面时有陶片碎木等遗物，或系寿昌县附近居民之遗址，乡人亦称古董滩。七八里至寿昌残城，老乡称之曰："阳关城"，东西北三面城垣尚未尽圮，城中北面沙丘堆积，高与城齐，其中成数沙岭。东北角有被掘之痕迹，并有碎砖瓦，散掷地上，传为英人斯坦因氏所掘者。西南角有倒置石碑一，碑高1公尺8公寸7分，宽8公寸8分，厚2公分。上刻有"古阳关"3个大字，右刻"钦命二品顶戴甘肃兵备道嘉峪关监督和尔买额书"，左刻"赐进士出身花翎同知衔，知敦煌县事前吏部主政汪宗瀚敬立"，上额刻"光绪乙巳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按寿昌县，唐置，隶沙州敦煌郡。《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四〇沙州条云，寿昌县（中下东至州一百五里），本汉龙勒县，因山为名，属敦煌郡。周武帝省入鸣沙县，大业十一年于城内置龙勒府。武德二年，改置寿昌，因县南寿昌泽为名也。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沙州敦煌郡条云，沙州敦煌郡下都督府县二有府三曰：龙勒、效谷、悬泉。敦煌寿昌。下武德二年析敦煌置，永徽元年省，乾封二年复置。开元二十六年又省，后复置，治汉龙勒城。西有阳关，西北有玉门关，有云雨山。

汪宗瀚立石刻书曰"古阳关"，因未细加考订，只以俗称阳关，故铭之曰"古阳关"。实则汉阳关在此城之西。至去州里数，《元和郡县志》云："东至州一百五里。"《太平寰宇记》云："寿昌距敦煌一百五十里。"《大清

一统志》云:“古阳关在敦煌县西南一百三十里。”陶葆廉的《辛卯侍行记》云:“汉阳关路,敦煌西南行七十里石俄卜,七十里南湖即阳关。”各书所记里数俱不同。劳干的《两关遗址考》云:“南湖的破城相传是寿昌城。按《寰宇记》寿昌距敦煌 150 里。徐松的《西域水道记》认为南湖距敦煌 150 里,故南湖废址,即是寿昌城。《清一统志》和《辛卯侍行记》的说法也一样。”

各书记载之里数不同,劳干先生更认为元和志脱一“十”字,应按《寰宇记》所记之 150 里为标准。则南湖破城应当为寿昌城无疑。惟劳干先生之说,似可商榷者,即寿昌县去州里数,除《太平寰宇记》外,多数地志,俱记为 120 里。石室本《寿昌县地境》云:“西北去州一百二十里。”

又英京藏石室本残《沙州地志》(斯氏编号 788)云:“寿昌县下东北去州一百二十里,公廨一百九十五千,户三百五十九,[乡一]。”

又后汉乾祐六年《沙州地志》残卷亦云:“寿昌县西北去州一百廿里。”

石室本地志所记里数俱同。乡人云:由敦煌城至南湖 140 里。陶葆廉所记,即据此也。若以予经历言之,由敦煌至新岷州村 20 里,再十里入戈壁,由戈壁起始处,至石俄博,应有 35 里。石俄博若为破羌亭,各地志俱云,去寿昌县 65 里,则寿昌去州,应为 130 里上下。今乡人云,南湖去城 140 里,今由寿昌城至南湖村,尚有六七里之路程,则石室本诸志之说 120 里,似觉可靠。惟戈壁上无一定路线,远近之差,百里中岂止十数里,故地志互有出入也。若必确言其里数,想石室本为沙州人所记,《寿昌县地境》即州学博士翟奉达撰,则居斯食斯,自较传闻者为确也。又《寿昌县地境》云:“龙堆泉县南五里。”

《沙州城土镜》及《沙州都督府图经》,俱从此说。今南湖破城南之新工坝、大沟等湖水,距城近五里,或即龙堆泉也。营盘庄南之黄水坝,湖水汪洋,距破城近十里,或即石室本各地志中之寿昌海也。

至汪宗瀚所立之古阳关碑,予第二次与夏先生至阳关时,曾将该石碑掀起,背面刻水波纹,其下之横栏,有丁字纹。左右周边刻花纹,内中文字镌去,仅第 2 行有“沙州事微”4 字,尚可辨,不知是否为唐代之石刻。

寿昌旧城之西南，地势陷落，内有湖水，南北长里余，中隔以堤，分成四湖，东北湖引出之水，沿湖东北岸西流，曰北工坝，亦曰上工坝。次者引出之水，沿西南岸流出，曰南工坝，亦曰下工坝。再次者引出之水，亦沿西南岸流出，曰新工坝。极西南之湖水西流，曰大沟，西流出红山口，至水尾而没。其南近七八里，有大泽，今日草湖流出之水，东北行，曰黄水坝。西又有西头沟坝，由西山流出，亦可溉田。据乡人云：北工坝可溉田 900 亩，南工坝亦溉田 900 亩，新工坝可溉田 200 亩，大沟出红山口至水尾，亦可溉田 200 亩，西头沟可溉田 600 亩，黄水坝可溉田 1200 亩。共可溉田 4000 亩。惟黄水坝由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筑堤，堤成即可溉田 4000 亩。南湖四周俱沙漠，惟此地湖水汪洋，渠道四出，每庄门前，渠水清澈，可称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

村西有古铜滩，亦曰古董滩。四周俱为流沙，中有沙梁数起。沙梁之间，为风所吹，时有铜铁碎片、五铢钱、陶片等物发现。游人至此偶有所拾，故曰古董滩。十一月十二日，予第二次至南湖，再游古董滩，除拾碎铁片外，又得绳纹及刀削纹碎陶片，半五铢钱，及若敦煌戈壁所发掘六朝翟宗盈墓顶掘出之小剪轮五铢钱。又于滩中距阳关堡西向约 70 公尺处，露一头骨，遂下掘，距地面约 3 公寸，即得一完整人骨架。骨架长 1 公尺 8 公寸，惜无一殉葬物。其南又露一人架，因无殉葬物，故未继续发掘。西有巨石一块，乡人呼之曰石棺，长 2 公尺、宽 8 公寸、高露地面者 3 公寸。乡人云：地面下高与人齐，若系石棺，当为倒置者。西去二里许，为西头沟，沟深数丈，水由沟中流，北至水尾而止。

由古董滩而北，里余至红山口，红山口左右皆山，并皆红崖，故曰红山。山口有大沟水流出，西南至水尾而没。西有庙曰佛爷庙，庙中有木匾，记重建事云："光绪十七年岁次辛卯季秋月中浣告白：龙头山阳关口旧有大佛殿一座，庙貌庄严，神灵赫耀。于光绪十四年八月间，兴工建修娘娘庙土地祠二处，厢房二间。庄塑神像，十七年九月将工告竣。"庙中有钟二，一道光六年造，一嘉庆十七年造。由光绪十七年之木匾记事，知此山又名龙头山也。又山口西半里，山巅有土墩一，墩高 5 公尺 5 公寸，墩

底东西长6公尺5公寸，南北长8公尺9寸。以土坯筑成，每5公寸5分，杂以苇草，并有木椽，土坯颜色较红，与北工墩大致相似，或为汉时之烽墩，后代补建者。至阳关遗址，有云，在古董滩，又有云，在红山口者。

**四、渥洼水**

渥洼水即今南湖之黄水坝，相传汉武帝时出天马处。《汉书·孝武本纪》元鼎四年条云，秋，马生渥洼水中。注云："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电田敦煌界，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利长先作土人，持勒鞍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骅，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

又《礼乐志·郊祀歌》19章之《天马》，即为马生渥洼水中而作。

渥洼水在南湖，古地志已有记载。据《寿昌县地境》云："寿昌海源出县南十里，方圆一里，深浅不测，即渥洼水也，利长得天马之所。"

由此可知，握洼池即寿昌海，在寿昌县南十里。又一巴黎藏石室本《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云："寿昌海右在寿昌县东南十里，去州一百二十里。方圆可一里，深浅不测，地多芦花。其水分流二道：一道入寿昌县南溉田，一道向寿昌东溉田，旧名渥洼水。"

又光启元年之《沙州都督府图经》云："……浊（按：此残字，应是"洼"字）水，屈曲周回一里余，深浅不测，汉得天马处也。"

《沙州城土镜》云："寿昌县……寿昌海，县南十里，方圆一里。"

可知渥洼水即寿昌海，在寿昌县之南，寿昌县即今南湖之破城子。黄水坝之位置，距破城子近十里，当即古地志中之寿昌海，亦即汉之渥洼水也。今敦煌城南，鸣沙山下月牙泉，寺院廊庑下，嵌有木碑，刻"汉渥洼池"四字者误也。

**五、党河与三危山**

党河即汉之氐置水。《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云："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

唐时改名甘泉。据《敦煌录》云："近南有甘泉自沙山南，其上源出大雪山，于西南寿昌县入敦煌，以其有沃润之功，俗号甘泉。"

又《沙州图经》记党河条云，……其（缺）里至子亭镇西三（缺）烽。又西北流六十里至山阙烽，水东即是鸣沙流山……又东北流八十里，百姓造大堰，号为马圈口。其堰南北一百五十步，阔二十步，高二丈，总开五门，分水以灌田园。荷锸成云，决渠降雨，其腴如泾，其浊如河。加以节气少雨，山谷多雪。立夏之后，山暖雪消，雪水入河，朝减夕涨。其水又东北流四十里，至沙州城，分派溉灌：北流者名北府；东流者名东河水；东南流者二道，一名神农渠，一名阳开渠；州西北，又分一渠，名都乡渠；又从马圈口分一渠于州西北流，名宜秋渠。州城四面，水渠侧，流觞曲水，花草果园，豪族土流，家家自足。土不生棘，鸟则无鹊，五谷皆饶，唯无稻黍。其水溉田即尽，更无流派。

党河源流，清乾隆五年，安西观察副使常钧氏，曾委安西同知李治邦，穷源溯流，细加勘察，往返五十余日。据常氏《敦煌随笔》，记查勘党河源流条云，党河远源在希喇尔津之东南雪山内，分注三沟，汇成一处，至八汗撒喇汗津沟之下，即入沙石。中隔郭壁，约长三十余里，至茇茇台之东，从平地沙碛中渗出，极其微细，应以茇茇台为党河之近源。由西下流，至额儿得尼布喇大泉，汇合独山子一带泉水，及南北两岸海子、擦汗洮河、清水沟、腊牌沟等水，愈流愈大，俱入党河。至沙州七百三十里，分为五渠，浇灌户民地亩，此党河源流之大概也。

予至敦煌，有永宁乡人雷仁者，告予曰：彼曾去青海金厂淘金，过马连河，即见黄河。河水于戈壁中忽渗入地下，顺其方向，行一日程，又见黄河由戈壁中流出。其水淙淙，声如牛吼；然后汪洋直下，不知与李同知所勘查者，是否为一。唯河水出昆仑，“重源潜发”，《山海经》《汉书·西域传》《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等书俱云：河自蒲昌潜行地下，南出积石。昔颇疑之，今履其地，方识戈壁中确有此种漏隙处，先贤所云不诬也。

三危山在敦煌城东南三十里，系玉门系老年期山，风雨剥蚀，撼之即可颓下，故曰危也。

《括地志》云：“三危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

煌县东南三十里。”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云：“三危山在县（敦煌县）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尚书》窜三苗于三危，即此山也。”

又《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云：“三危山其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曰升雨山，在县东南二十里。”

按三危山是否为窜三苗之地，今姑不论，要其为敦煌望山，当属无疑此山系由安西双塔堡而西，蜿蜒数百里，经小湾，瓜州口，直至莫高窟东。其山无草木，远望之有黯红色者，有黝黑色者，俱成碎块。如以手攀之，则立即颓下。去岁，向师觉明，夏公作铭与予由莫高窟东登三危山。予因幼长山中，习于登高，勇敢猛进，手为碎石切破者数处，无怪乎古人以三危名之也。

**六、鸣沙山与流沙**

鸣沙山指敦煌城南五里之沙山而言，其南有大沙山，东起教煌之莫高窟，西至教煌西南党河口。此一段中，远逾百里，其基即三危山。上被流沙，随风移动。亦有纯为流沙者，为陵为谷，如孤松耸立，如虬龙蜿蜒；而其山脊则供如刀削之峭壁。《沙州图经》记云：

其山流动无定（缺）山不恒，微然深谷为陵，高崖为谷，或峰危似削，孤岫如画，夕疑无地，朝已干霄。至党河口之西，莫高窟之东，虽有流沙，不被于山上。

之所以称鸣沙山者，以其沙能鸣，《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敦煌县条云：鸣沙山一名神沙山，在县南七里。今按其山积沙为之，峰峦危峭，逾于石山，四面皆为沙垅，背有如刀刃，人登之即鸣，随足颓落，经宿吹风，辄复如旧。有一泉水，名曰沙井，绵历古今，沙填不满，水极甘美。

又《敦煌录》云，鸣沙山去州十里，其山东西八十里，南北四十里，高处五百尺，悉纯沙聚起。此山神异，峰如削成，其间有井，沙不能蔽，盛夏自鸣，人马践之，声振数十里。风俗，端午日，城中子女皆跻高峰，一齐蹙下，其沙声吼如雷。至晓看之，峭嵘等如旧。古号鸣沙神沙而祠焉。

又《沙州城土镜》云，“鸣沙山，州南七里。”

今日由敦煌城出南门，南行四里入戈壁，里许至沙山诸庄，再行入鸣沙山，有泉水清冽而甘，广约十亩，形如残月，故曰“月牙泉”。若党河西废城为唐沙州城，则所距离七里较为正确。十里之说，当指大沙山而言。今月牙泉有道人住持，院宇辉煌，梵刹多栋，更有庑廊临泉侧，专供游人休息饮茶。端午节游人麇集，尚沿旧俗滑沙，惟蹙沙有声，并未闻如雷鸣。乡人云：端午滑沙，可去百病。予特试之，沙随足颓落，然千百年中，泉水亦未为所掩。盖滑下之沙，随风浮流，终不至填满泉水，非有何神异。至所谓盛夏自鸣，声振数十里者，无稽之谈也。

流沙乃戈壁中极细之沙，塞外多风，随之浮荡，遇有障碍，则停而不流，积多即成沙山。

《禹贡》云：“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人于流沙。”

又《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张掖县条云：“居延海在县东北一千六百里，即居延泽。古文以为流沙者，风吹流行，故曰流沙。”

又后《周书·西域传》云，鄯善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气，为行旅之患。风之欲至，惟老驼知之，即鸣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每以为候，亦即将毡拥蔽鼻口。其风迅驶，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至危毙。

玄类《大唐西域记》末云，从此（尼攘）东行，入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

予居塞外半载，亦曾经飓风至，迷漫天日，上下昏黑；顷刻即过，日光如旧。风至时，帐篷人物，俱可飘去，甚至危毙。《周书》所言，并非虚妄。则所谓流沙者，即戈壁中随风浮荡之细沙也。

**七、玉门关与汉长城**

玉门关者，指汉玉门关而言，即今敦煌城西北三日程，哈拉淖尔西之小方盘城也。《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寿昌县条云：“玉门故关，在县西北百一十八里，谓之北道。西趣车师前庭及疏勒，此西域之门户也。”

又《舆地广记》陕西路化外州寿昌县条云：“玉门关在西北一百十八里。”而石室本《沙州城土镜》及《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俱云，玉门关

去寿昌县一百六十里。然以予此次由南湖至小方盘城路程计之，由红山口北行至卷槽庙 22 公里，4 公里山水沟下流处，4 公里沙梁子，5 公里芦草井子，12 公里胡桐树林，十公里小方盘城。总计 62 公里，折合华里 124 里，则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者略同，与石室本二地志所记者，相差 30 余里。

玉门关距哈拉淖尔二日程，中有大方盘城。由哈拉淖尔以西，仍有河水西流，惟时续时断。夏秋水涨，充满河床内，春冬水消，仍有余潦，故芦草丛生其中，敦煌人称之曰“西湖”。

小方盘城城垣，高 7 公尺半，每壁长 24 公尺 8 公寸，有西北二门，今城中无营房遗迹，仅充满马粪垃圾。城外北有土台，英人斯坦因氏于土台西北角掘得汉简多片，予等亦于此发掘得汉简数片，其一较完整，文字清晰，为与“玉门都尉”之公文书，更可证此城确为玉门关。土台下即湖水，芦草丛生，水含盐分颇多，故极咸，不可饮。食用水须至东南近十里之河中汲取。小方盘城北越河即北山，汉时匈奴可由西北入侵，故于此置都尉，驻重兵，成防守之要塞也。

玉门关西 4 公里有烽，斯氏编为 XII 号烽，东北数十公尺处，汉长城遗迹宛然。据《沙州图经》云，古长城高八尺，基阔一丈，上阔四尺。右在州北六十三里，东至阶亭烽一百八十里，入瓜州常乐县界，西至曲泽烽二百一十二里，正西入碛，接石城界。按《匈奴传》汉武帝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于乌孙北为塞以益广。因汉元帝竟宁元年，只应对词曰：孝武出军往伐，建塞起亭，遂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即此长城也。

今长城遗址之高者 2 公尺 4 公寸，宽 1 公尺 8 公寸，每 2 公寸间隔以苇，然后版筑。由此而东，至玉门关，遗址间断间续。40 里大方盘城，此城为长方形，内隔成 3 段，四壁尚完好，北壁上下俱有小洞，因系仓库，用以通风。石室本《沙州城土镜》云：“河仓城州西北二百四十里。”

又《敦煌录》云：“河仓城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古时军储在彼。”

按玉门关距敦煌三日程，乡人云：二百七十里。大方盘城距玉门关

四十里，则距城亦相当二百三四十里之数也。予等于此处掘得晋泰始二年石碣一，足证此城晋时仍为仓城，唐时始废。长城由此而东，至哈拉淖尔（亦名黑海子）疏勒河水流入处，水面颇宽，周围近五六十里。其北即北山，南即戈壁。冬春水消，始克至其滨，滨岸之水，苦咸不能食。予等至此，驼未带水，取池中水，既咸且苦，以之和面，面俱成碎块，应手落；故予等曾一夜未食，仅烧野羊肉以充饥。池水汪洋，平静无波，晚霞照入，如浮光，如耀金。长城则在其南。池旁有烽燧五六处，敦煌人称此地曰"北湖"，在城北故也。由此而东，至碱墩子，长城基址不可见，然再东入安西境，仍有基址。东入酒泉，至居延泽，俱有汉长城遗址。长城每四五里即有一烽墩，高者不逾 8 公尺，低者亦至 3 公尺余，俱筑四方形。墩旁有破土屋，为昔驻军之所。英人斯坦因氏曾掘得许多汉简，予等亦掘得数十片及汉绢、草鞋、织鞋，各种小器物颇多。此区域经斯坦因氏及斯文赫定组成之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汉简多片后，对汉代七边郡制度，及御匈奴方策，汉代兵制，补苴于史者颇多。

**八、由肃州至安西**

由肃州出西门，北行二里余讨来河，又名北大河，公路局于此筑桥通车马。西北行 27 公里嘉峪关（旧云 70 里），为汉酒泉郡之天陬县，后汉时之延寿县境。《十三州志》云："延寿县在酒泉郡西，山在其东，至玉石障，是亦汉遮虏障也。"

今之嘉峪关，或即汉玉石障附近地域。关设于明代，《敦煌杂抄》云，明洪武五年冯胜下河西，以嘉峪关为中外巨防，西域入贡必由此，筑土城周二百二十丈。……嘉靖十八年，尚书翟銮行边，言嘉峪关最临边境，为河西第一隘口，墙壕淤损，宜加修葺。仍于濠内奏立边墙。每五里设墩台一座，以为保障。因使兵备道李涵监筑，起于卯来泉之南，讫于野麻湾之东北，版筑甚坚，粗耧不能入。

及隆庆二年设守备，清驻游击及巡检。今者公路筑于关南、仁寿、风脉诸山旁。车行至此，须停息。关城二重，内城正方，只容衙署。有东西二门，东内门曰光化，外门曰朝宗，西内门曰柔远，外门曰会极。边墙起自

外城西南隅，北边墙起自外城东北隅。今多倾记，间有烽墩遗址。明边墙之在河西者，以永登岔口驿附近起，及山丹县东之残存遗迹最多。会极门外，遍地沙漠，登楼远望，杳无村树，戈壁卵石聚结成阜。陶保廉云："如叠浪，如涸波"者，信然。行人出关，俱以石回击关墙，云有回声者可归，无回声者则郁死塞外。故门右砖墙凹入处颇多，俱出关人所击者。关外近一里，道左有碑，题"天下雄关"四字。嘉庆十四年，肃州镇总兵李廷臣等立。

由嘉峪关而西，入大碛中，荒沙迷漫，风日苍凉，悄然有乡国之感。40余公里惠回堡，昔有军塘设于堡东，尚存遗址。公路由堡中穿过，住民户20余家，皆清时退伍士兵，及谪戍流落者。惠回堡，本名回回墓，因字音相近易今名，墓地实不知在何处。

十余公里火烧沟，由酒泉至此，公路记里碑题曰"七七"公里。昔日大道由酒泉，70里至嘉峪关，90里惠回堡，30里火烧沟，共190里，今日公路仅77公里，折合华里154，与旧记相差30里。

由火烧沟入南山中，为老君庙，有石油矿。石油后汉时称之为石漆。《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玉门县条云，石脂水在县东南一百八十里。泉有苔，如肥肉，燃之极明。水上有黑脂，人以草盉取用涂鸱夷酒囊，及膏车。周武帝宣政中，突厥围酒泉，取此脂燃火，焚其攻具，得水逾明，酒泉赖以获济。

后《太平寰宇记》亦有石漆之记载。清常钧抄《赤金志》云："赤金东南一百五十里，有石油泉。油生水面，色黑气臭，土人取以燃灯，可以治疮癣。"

过火烧沟，十余公里，赤金湖，塞外呼下隰多草者日草湖，赤金湖亦不过有水草而已。赤金堡距湖颇近，清时有驿站及军塘，今公路由堡北经过，仅可望见疏稀之村落。12公里赤金河，河由祁连山流出，东北入阿拉克鄂模（即花海子）。又西北小山纡绕，清涧流出，2公里余赤金峡，清时设军塘。赤金峡两山重叠，层峦蜿蜒，路由山中行，颇为险要。《十三州志》云："玉门县置长三百里，石门周匝，山间裁径二十里，众泉流入延兴。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故曰玉门县。"

高居海《使于阗记》云："自肃州西百里天门关，又百里出玉门关。"此地恰在距肃州二百里上下，或者可能即汉时之玉门县，唐天宝以后东徙之玉门关。

赤金峡西行15公里巩昌河。过河遥望村树，渠水四流，至此又有人烟。5公里玉门县。玉门县城长方形，只二门，南门在东南隅，北门在西北隅，周三里三分。按玉门县即汉酒泉郡之玉门、池头、乾齐三县地。北魏为玉门郡，隋曰玉门县，属敦煌。唐属肃州。元分属肃州、沙州二路，名赤斤站。明设赤斤蒙古千户所，后改为卫。清设靖逆卫及赤金卫，乾隆二十四年，并靖逆、赤金二卫为玉门县，至今沿之。

由玉门县出北门入庄村，十余公里上坡，行戈壁中，十余公里莫古滩驿站。20余公里桥湾，驿站不设于桥湾堡内。清时桥湾驻都司，今有永宁寺在堡西，番僧居之，闻有鼓为人皮作成，惜未及一见。由此而西，20余公里，布隆吉尔，公路由山中穿过，荒凉无人迹。

由玉门县至布隆吉尔，有沟十道，水流其中，或源于泉，或出于山，人民因得利用而溉灌之，故安西柳沟乡为富庶之区。尤以三道沟之酒，著称于关外三县。

布隆吉尔城，筑于清雍正二年，初驻安西镇总兵，及安西卫同知；五年建新城于大湾，六年迁移，徙柳沟卫于此。乾隆二十四年废卫改驻游击，后改都司。布隆吉汉言即水泉多。其地当为唐瓜州晋昌县东境，汉之冥安县地。明史作卜隆吉尔川，为哈密、赤斤二蒙古地。清时哈密人与蒙古杂处，雍正二年筑城后，遂驻兵，今仍为安西至玉门中途重镇。

布隆吉西行15公里余双塔堡。堡东为胡卢河。河自南来，源于土胡卢村南六七里余之诸泉，北流至土胡卢村，住民十余家，半耕半牧。河经村东北流，十余里至双塔堡。东折而北，入疏勒河。唐岑参有《苜蓿烽寄家人》诗云，苜蓿烽边逢立春，胡卢河上泪沾巾，闺中只是空相忆，不见沙场愁煞人。注云：玉门关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胡卢河上狭下广，回波甚急，上置玉门关，西域襟喉也。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瓜州晋昌县条云："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

以岑参所记，玉门关及苜蓿烽，俱置于胡卢河上，则晋昌县亦必在双塔堡附近。今胡卢河至双塔堡城北，西北流入疏勒河，沿河南西行三里余，入乱山。山中有双塔，塔建于河南岸小山上，东西相距近200公尺，下方上圆，高约5公尺。双塔堡或因此命名。塔下为河，两岸俱山，河由山中流出，形成隘口，唐时玉门关之设，此处或近之。双塔西二里余处，有清时卡汛，大墩一，小墩五。由此而西五里处，于河南岸有小土墩，高不逾5公尺。其对面河北，有大烽二，一在河畔，一在北山口，望之颇高，非以土坯筑成，想系唐代所筑。或玉门关外之苜蓿烽欤？

双塔堡城四方形，四面各长159公尺，有门东向，额曰“迎赐”。堡中无居人，仅余龙王庙、昭忠祠、关帝庙、三官庙等祠宇。清时驻千总，今居民尽于堡外筑房舍，灌溉田亩，水源则以胡卢河及疏勒河为主。

按疏勒河即《汉书·地理志》之南籍端水，亦即《元和郡县图志》晋昌县条所记之冥水，《水道提纲》所云之布隆几勒河也。《大清一统志》云：

南籍端水在今安西府渊泉县北。按舆图及新志，今有苏赖河，亦名布隆吉尔河，发源靖逆卫南山，曰昌马河。北流转而西，经旧柳沟卫北，会十道沟水，为苏赖河。又西迳渊泉县北三十里，又西迳敦煌县西北，党河自南来注之，又西流三十里许入哈喇淖尔。其流长七百余里，池方数十里，即古南籍端水也，今州县屯田，俱借此水灌溉。

汪士铎、钱玷、徐松等人，亦俱以南籍端水为今疏勒河，入泽即入哈拉淖尔。

由双塔堡西十里余5公尺高烽墩处上坡，西九里，有清筑土墩一，四周小墩五，即乱山子卡汛也。清代烽墩俱系一大土墩，附近五小土墩，河西一带莫不如此。下坡沙枣园，废屋十余椽，人树俱无。河北岸远望有破城，即由双塔堡北行，经猩猩峡入新疆之路。由此西行草滩中，5公里南山下，有大墩，高10公尺2公寸，方形，为版筑而无芦草。非汉烽，亦非清烽，或系唐代所建筑。又5公里至小湾。

小湾者，所以别大湾（安西城）而言。疏勒河过桥湾，直趋而西，至此北折，故名小湾。又西流回抱大湾之北，以达瓜州。小湾居民20余户，有

小土堡，内有龙王宫。宫中铁炉一，道光二十三年造。钟一，嘉庆己卯年（1819年）铸。又有关帝庙，1922年筑成。堡有东西二门，颇为萧索。乾隆三年瓜州扎萨克公额敏和卓，请于小湾建筑回民土堡，就近耕作，部令准行，后督院批缓，田垅未能尽开，否则已杂遝喧阗矣。

小湾而西十里南工渠，过此车谷坝。其北有戈壁中所生之胡桐树林。30里北工渠，居民四五家。由此而西，土屋渐多，三十里安西城。

按安西即汉敦煌郡渊泉、冥安、广至等县地。唐置瓜州，领晋昌、常乐二县。中唐入吐蕃。晚唐张议潮复瓜州，属归义军。历五代至宋初，俱通中国。景佑初入西夏，元立沙州路，领瓜州。明设沙州卫。正德后土鲁番据沙州，其民徙肃州塞内，土鲁番及赤斤蒙古遂散处焉。清初属准噶尔。康熙三十五年后，经营西边，设哨于都尔博勒津，即大湾。雍正二年设安西同知，驻布隆吉尔，为安西卫，领沙州所。三年设总兵，为安西镇。五年筑城于都尔博勒津，周六里七分，开四门，移安西镇及同知驻此。十一年设安西道。就隆六年设提督，嘉给关以西，哈密以东，悉辖之。二十四年设安西府及渊泉县。三十七年复徙安西府来治，属肃州道，故曰安肃道。以安西道治巴里坤。三十八年裁府及渊泉县，故曰安西直隶州。

**九、破城子与苦峪城**

破城子在安西县治南70里。出西门，沿安敦公路南行一里许，路东有破土城，安西之新城也。乾隆三十三年筑，徙安西府治之。因南门屡灾，三十九年复还旧城，此城遂废。南行多草地，无居民。三十里十工，有村落错杂，田畴井然，其南为南山山麓。安西四周居民，俱以某工作村名，由一工至十工，此外居民则寥寥。取名之意，据云：即当年开辟时，初治者曰一工，由此依次，直至十工。工即工程之义，未知是否？由此入山，曲行三十里，山属三危山系，无草木，多堰岩，攀登则山石易颓，盖老年期山之普通景象。出山为安西南湖，草滩辽阔，红柳稀疏，水草丰美，游牧之佳处也。十里温家庄，土屋数家，半耕半牧，其东南即破城子，城垣尚在，而雉堞已圮，南北二门尚有遗迹可寻。城垣东西126公尺，南北234公尺，内无居民，仅有一破庙，庙中设有学校，附近儿童至此就学。陶保

廉《辛卯侍行记》谓:“今踏实西北二十里,有破城子,殆即汉广至县。”

近人张锡祺著《安西新志稿》古迹条亦云:“广至故城,在县治西南,即今踏实破城子。”

吾等在城内,并未采得任何遗物,仅城垣杂有芦苇层,与汉烽墩建筑用材相同。

踏实堡西距破城子二十里,堡中无居民,堡城每面俱长 252 公尺,有东南二门,城垣高约七八公尺,堡城内,仅有残庙 4 处。南门瓮城东垣下,有小屋,前壁嵌石碑二,一为大清雍正六年岁次戊申孟秋月建筑踏实城记,内云:“雍正五年奉命建造安西镇城,并各堡城。”

踏实堡亦于是年兴筑。其一为连接上碑钦差筑安西城堡之人名录。

由踏实堡西南行四十里入山,十余里水峡口,两山夹立,溪水中流,沿溪而上,十里蘑菇台子,再十余里即榆林窟。窟之兴建时代,约与莫高窟相同。

苦峪城即锁阳城,由踏实堡东行入戈壁,四十里平头树,十里桥子,南行十五里苦峪城。城垣已断,风穴颇多,城西沙丘累累,高与垣齐。城有西、北二门,东垣内距 200 公尺处,有长垣,用隔内外,城内稍南有土屋,建于土丘上,当系后人所筑造。

苦峪城各书记载,仅及于明,然其创建,必不始于明。予在踏实堡,有乡人韩多禄,曾于城中得“熙宁元宝”及“皇宋通宝”二制钱,用以相赠。在桥子时,经张某携大陶瓮来,外有绳纹,底已残破,以其形制及绳纹,应为唐以前物,亦于城中拾得。又城南戈壁南山有双墩,形式与敦煌沙山下唐墓双阙相同。城东三十里戈壁上,亦有如敦煌戈壁上之古墓。城西二十里戈壁上,有“四墩子”。据云:每二墩成一对,有四方形之小围墙,内有小沙丘。亦与敦煌之唐墓形制相同。

《敦煌杂抄》记于苦峪城附近得半截碑,首尾残缺,仅存中段,一面有张议潮归唐授爵,大兴屯田,水利疏通,称功颂德等语;一面字体流入五代,似称颂曹议金等语。

今以出土器物钱币及戈壁上墓葬形制,前人得半截碑文句等推论,

此苦峪城当系明以前所筑，即非唐时之瓜州，亦必瓜州所辖之一县。

**十、安敦路上之遗迹**

安西敦煌间，行程二百八十里，驿站有四。由安西西行五里余五营墩。二十五里瓜州废城，城有东西二门，东西长 740 余公尺，南北较短，据《敦煌随笔》云，由安西城西南三十里至瓜州，俗呼兵城。雍正十一年筑。开东西二门，有安西同知，瓜州参将，与照看回民之部郎笔帖式驻此。……瓜州除回民五堡，及蒙古包三十里井子回屯之外，皆系地方官营汛所辖，并无回民分定界址。此地田土肥饶，泉水充裕，宜麦稞。

今虽呼瓜州，然为清初所筑，非古瓜州也。张锡祺《安西县新志稿·舆地志》云："瓜州古城，在今县治西南八十里，遗址尚存。"

是可知唐之瓜州，在县治西南，若非苦峪城，亦必在安西南湖一带。

由瓜州西南行三十里瓜州口。其东北有废城，城中有废垣，及今仍有渠水流入。城有内外之别，安西张锡祺先生告予云："瓜州口即回民五堡之头堡，不知是否？"

瓜州口为通南山之路，山顶有烽墩一；山麓则有如莫高窟天王堂式之一塔婆，高约 5 公尺，四壁各约 3 公尺，外为尖顶，内为穹庐顶。塑像已圮，东壁尚余残画，为法华经见宝塔品。画风如五代至宋作品。构造形式如五代曹氏时建筑物。塔婆北下坡半里许，有以沙堆成东西方向二土冈，若西千佛洞至阳关之风墙子。其东半里山麓下，有古坟三，其一已塌下，予曾援索而下，封土高近 4 公尺，内为方形墓室，由正顶塌下；惟墓门前已有被盗掘之小洞。以形制言，似系唐代墓葬。

由瓜州口西南行入戈壁，三十里芦草沟。沟南通南山，清时于此设防，建堡城及卡汛。其南有清代大墩一，小墩五。芦草沟有炭矿，安西敦煌人多至此采炭。再行三十里至悬泉山，中有悬泉。泉亦名吊吊水，西北距甜水井子 3 公里半。泉自山腰流出，若峨眉山中之瀑布。《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沙州条云，悬泉水在县东百三十里，出悬泉山。汉将李广利伐大宛还，士众渴乏，引佩刀刺山，飞泉涌出，即此也。水有灵，车马多至即大出，少至即小出。

其他敦煌石室中所出之各种地志，均有相同记载。实一平常无奇之瀑布，惟泉水极甘洌。两岸多胡桐红柳，亦戈壁中一胜地也。

甜水井子为驿站，有敦煌县政府官办旅舍，然不过土屋二三椽，一人主持，供客饮茶而已。饭食须自备糗粮。虽名甜水，实则苦涩。此地清设卡汛，有大墩及小墩等。由此西南行十余里，有土墩遗址六。过此十余里空心墩，墩六面形，高近 9 公尺，墩西有五小墩，内俱空若小屋。40 里疙瘩井子。昏夜行车，朔风袭人，而车轧流沙，透人耳鼓，精神为之震撼，无怪《河海昆仑录》作者裴景福云：若砻空磅者然。

疙瘩井子西行有二路通新店子：南路沿山行较平坦，北路经盐池较颠簸。盐池东西近三十里，《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沙州条云："盐池在县东四十七里，池中盐常自生，百姓仰给焉。"

至今敦煌盐价仍廉，即有此池之故。过此新店子，清时曾设军塘，有旅舍，行人多憩息。此段路俗云"连三旱"，由安西至哈密则云"穷八栈"。塞外荒凉，于此可见。新店子以西，无戈壁，村庄错落，渠水分流，田畴肥沃，无丝毫荒凉气象。二十五里老爷庙，清设卡汛，再十五里即至敦煌城。

作者：阎文儒，(1912~1994)，男，满族，辽宁锦州人，北京大学教授。

# 敦煌地理及历史沿革

褚良才

敦煌，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象征，是人类创造精神文明的一朵奇葩。在敦煌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它的先民是谁?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下，为了什么而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光辉灿烂的遗产?为此，我们首先必须了解敦煌的地理及它的历史文化背景。

## 一、敦煌的地理位置

敦煌位于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甘、青、新三省区的交界地带，北纬45°10'，东经94°40'。敦煌自古以来夹在西域、青藏高原和河西走廊三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之间，是丝绸之路河西道、羌中道和西域南、北道交汇处的一大边关要塞。从敦煌东北行过安西，为通向中原的河西大道；西出阳关，沿丝绸南道与新疆的若羌县相连；西北行出玉门关，沿丝绸北道可通往哈密和罗布泊；敦煌南行经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逾阿尔金山，则直达青海省的格尔木。

敦煌是丝绸古道上最大的交通枢纽，在宋代新开海外贸易之前，它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文化上联络中原和西域、中亚以及欧洲的“咽喉之地”，当时被誉为“华戎所交一都会”。敦煌也就成为“北中国保存汉族文化最多又是接触西方文化最先进的地区”。

丝绸之路，在人类文明史上被誉为“人类文化运河”“欧洲大动脉”，为中西文化交流之路，处以国际商道的重要地位并发挥着枢纽作用，曾把太平洋文化和印度文化甚至地中海文化联为一体，开发、集散首当其冲。而敦煌则成为丝绸贸易繁忙的补给站和中转站。

公元前14世纪到13世纪，新疆与内地之间，就有了稳定的交通路

线，可以西通西域，东达中原。在战国时期，新疆玉石，经常运往内地。先秦文献中对玉的记载好多，《管子》《山海经》《穆天子传》中，都有关于昆仑玉的记载。至于汉代张骞凿空”通西域之前丝路进入西域地区的事实，不仅有文字记载，而且还有大量实物证。

《山海经》中多次提到昆仑、流沙及三危山等。如“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有大山曰昆仑之丘”。昆仑即西域南山，今之昆仑山；流沙即今塔克拉玛干沙漠。皆为途径敦煌到达之地。尽管古籍中对这些记载较为简单，并杂有不少神话，但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古代新疆地区与内地之间早有交通往来，而敦煌则是必经之路。古代，这里是一个沙漠绿洲区，水草丰茂，有众多诸如三苗、火烧沟人、羌戎、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徙居这里，从而使华夏民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和亚洲、欧洲各国人民的友好交流关系通过敦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季羡林教授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好、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即：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在敦煌和新疆地区吐鲁番等地区的建筑、石窟艺术中，到处看到外国文化的影响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痕迹。如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大量的梵文佛经写本；莫高窟壁画上画着的玻璃器皿，有的表现出萨珊的艺术风格；在新发现的丝织品上也有伊朗风格的图案等等。从许多方面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四种文化的交会及其产生的影响。

关于“敦煌”二字的解释，历代学者们众说纷纭。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考证说，敦煌可能是都货罗 Tokhara 的译音，而都货罗即当时居住在敦煌、祁连山的月氏族。也有人认为敦煌可能是古代吐火罗人的简译，说是吐火罗人在《山海经》中被译为“敦薨”。也有学者据“祁连”是匈奴语中“天”的译音，判断与“祁连”相提并用的“敦煌”也应该是少数民族语等等。

“敦煌”一名的最早来源尚难确定。东汉应劭曾解释道：“敦，大也。煌，盛也。”唐代李吉甫亦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认为

这个地方对开发广大的西域地区有很重要的作用，故名之曰敦煌。尽管应劭或李吉甫的解释可能异于敦煌的原意，但这一解释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东汉人和唐代人就是这样理解“敦煌”一词的。在敦煌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中，人们对“敦煌”一词的理解就是“大也”“盛也”，也就是开拓、兴旺、发达。确切地说，就是“开放性”和“兼容性”。“敦，大也”即指其开放性；“煌，盛也”即指其“兼容性”。我们应该重视“敦煌”一词的这些基本含义。

敦煌与丝绸之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汉朝通西域的道路，出河西走廊后，沿沙漠分为南北两路。南路经楼兰（今若羌东北）、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一带，西达阿拉伯半岛上的条支和地中海一带的大秦（今意大利罗马）；北道经车师前（今吐鲁番）、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越葱岭到大宛、康居，直抵安息、大秦。南北两道的起点均在敦煌。在这条遥远的通道上，中国的商品不断运往西方，而其中以丝绸最为有名，古希腊人把中国称为“塞里斯”，意为“丝国”，所以，后来欧洲历史学家就把这条联系东西文化交流的通道称为“丝绸之路”。

这条古路曾经联接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埃及和巴比伦，在这条古道上也传播了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敦煌正是因此而将古代四大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交汇融合在一起，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张骞“凿空”后，中国使者西去和西域商人东来，中国的许多珍贵产品流向西域，而西域的许多珍贵产品也源源不断输入中国，丰富了各个国家与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

丝绸之路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而敦煌就是这一通道上旋转了几千年的中轴枢纽，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二、敦煌的历史兴衰**

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夏代时，敦煌地区已有人类的活动。据文献记

载，约在商周时代，这里居住着羌人、乌孙人和月氏人，战国时，月氏强大，吞并了羌人。秦末，月氏逐走乌孙，独占了敦煌与整个河西走廊。汉初，匈奴打败月氏，并将其残部逐出河西，从此，匈奴单于驻在敦煌一带。

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大军击败西匈奴，河西走廊归入中原王朝版图。汉廷在河西置武威、酒泉二郡。敦煌地区隶属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年），汉廷析酒泉郡地置敦煌郡，领敦煌、冥安等六县。又阳关、玉门关两个军事关隘为通西域的门户，敦煌成为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和边防军事重镇。为充实敦煌郡，汉武帝几次从内地移民于此。《汉书·西域传》云："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甘肃永登）以西，初值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

敦煌郡的建立及防务的强化，是中国中西交通史上的重大事件。敦煌既是中国历史上外通世界各国的窗口，又是内联中原的枢纽，古丝路三道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从此，确立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成为汉魏、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管辖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中原王朝向西进发，西部少数民族东进关陇，华夏文化由此地转向西方，西方文明也通过这里转入内地，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关键枢纽，也是出塞、出关的必经之路。在东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上起着促进、保护、维护、开发、畅通的重要作用。

西域文化科技（包括西域的音乐、乐器、乐舞及舞蹈艺术）的传入中国，尤其是佛教哲学、艺术的传入，对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产生了至今仍然存在的深远影响。同时，中国的丝织品也大规模地向西方输出，中国的蚕丝技术、冶炼技术、凿井技术以及思想文化也传到了西方，对西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亦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东汉永初元年（107年）汉廷罢西域都护。元初六年（119年）又置护西域副校尉，代替西域都护主管西域事务，治所设在敦煌。经过两百多年的经营，从中原迁来的大族望门在敦煌逐渐扎稳了脚跟。同时，中原文化也在这个地区扎下了根。以儒家经典为主的许多汉文典籍开始在这里传播。曾在长安师以名儒朱

宠的张奂，晚年隐居在乡里，传授儒学，有门徒一千多人，推动了儒学在敦煌的传播。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混战，敦煌虽有近 20 年没有太守，但在当地大族望门的控制下，保持了相对平静。

经过曹魏时期几任太守的努力，敦煌发展成为丝绸路上重要的商业城市和粮食基地。敦煌这种繁荣一直保持到西晋。敦煌的中原文化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曹魏时，敦煌人在周生烈名儒身份参加了当时官府组织的注释经传工作。西晋时，敦煌出现了索靖等一批名儒，他们或著书立说，或隐居讲学，各显其能。20 世纪初，在敦煌附近的一处遗址中还出土发现了晋代早期天师道的符箓，表明至迟在晋代，道教已开始在敦煌流行了。1944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佛爷庙发掘了魏晋时期的翟宗盈墓，发现在墓门楼上有浮雕门阙和彩饰的壁画，其内容、形式、风格技法和内地汉慕出土的壁画一脉相承。这表明中原艺术在这一时期已传入了敦煌。

与中原文化在敦煌扎根成长的同时，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敦煌。据《高僧传》记载，约在公元 244 年前后，外国僧人竺高座在敦煌收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护为徒。晋武帝时，竺法护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学会了 36 国语言和文字，携大量胡本佛教东归。他以后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传教译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译经大师。竺法护的弟子乘先随师至长安，后又返回敦煌，建立寺院，广收门徒，宣讲佛法，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十六国时期，前凉、前秦、后凉、北凉曾先后统治河西。五凉政权统治下的河西，在中原扰攘不堪时，局势相对比较稳定。在这种形势下，伴随着中原文化的西迁和五凉统治者对学术文化的重视，在继承汉晋传统的基础上，以敦煌为中心的五凉文化大放异彩，呈现出了繁荣兴盛的局面。

占据敦煌、河西的统治者都能注意起用儒士，提倡儒学，为当地的和外来的士人著书立说、设管授徒提供便利。如李暠还在敦煌设立官学，使敦煌产生了郭瑀、祁嘉、刘昞、索敞、张湛、宋繇、阴兴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一些在中原因战乱而失传的典籍、学说有许多在这里得以保存、延续。后来，这些在敦煌、河西学者的一些著作流传到了南朝，有些学者如

索敞、江强等由北凉入北魏任官，对北魏乃至隋朝时期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除儒家学说之外，道教也继续在敦煌流传。在敦煌三危山下的十六国墓葬中出土的五谷罐上，发现了与道教有关的铭文。此期中原地区佛教发展迅速，西行求法，东来传教的僧人不断往来于敦煌，大大促进了敦煌地区的佛教发展。据藏经洞出土的S.797号写卷记载，公元406年在敦煌城南一次受具足戒僧人就有20人。至北凉时，这里已是"道俗交得，多有塔寺"了。受内地禅业盛行的影响，敦煌地区也出现了单道开、释道法、昙摩蜜多等修习禅定的高僧。修习禅定需要安定的环境，因而禅僧多离开城市选择人迹罕至之处去开窟建寺。前秦建元二年(366年)，禅僧乐僔在距离敦煌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岩上，开凿了莫高窟第一个洞窟。稍后，又有法良禅师，在乐僔师窟侧建窟。此后，在莫高窟开窟造像的人逐渐增多。

北朝时期的敦煌经历了北魏、西魏、北周三个朝代，北魏控制敦煌后，在此设镇，仍把它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正光五年(524年)，敦煌镇改为瓜州，以宗室东阳王元荣任瓜州刺史，元荣任刺史历北魏、西魏两代。北周时期敦煌是宇文王朝的西部重镇，武帝灭佛虽曾波及瓜州，但未影响敦煌佛教的发展。

北朝时期，敦煌的佛教继续发展。孝文帝时任敦煌镇都大将的穆亮和后来任瓜州刺史的元荣、于义等几位来自中原的敦煌地方长官，都尊奉佛教。元荣、于义不但大信佛事，还亲自出资在敦煌开窟造像，莫高窟在北魏和西魏时期可考的洞窟有18个之多，多数是人字坡前顶、中心塔柱窟和部分覆斗顶形窟。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渐趋兴盛，使这里逐渐发展成为佛教徒传授教义、举行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

在元荣时期开凿的洞窟中，融入了他从中原带来的文化艺术。元荣还广写佛经，以做功德。北周时期，建平公于义再次带来了中原的文化艺术。此时的敦煌石窟艺术已经突破了西域佛教艺术的规范，开始形成具有敦煌特色的中国式佛教艺术体系。

隋初，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控制了西域的中部和北部，另一支游牧

民族吐谷浑则占据着青海和西域南部。隋炀帝继位后，国势日益强盛，于是出兵击破吐谷浑，西突厥也被迫投降，从而使敦煌得到了安宁，丝绸之路也再度被打通。随着使团和商队的出入，西域的佛典和音乐等经由敦煌传入内地，内地的丝绸、瓷器和文化典籍也经由敦煌传人西域乃至更远的地方。隋文帝和炀帝笃信佛教，使用行政手段大兴佛事，促使敦煌的佛教迅速发展。仁寿元年(601 年)，文帝命各州建舍利塔，瓜州也在崇教寺(莫高窟)起塔。如在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一些由都城和其他地区送至敦煌“流通供养”的隋宗室成员的写经，反映出了这一地区的佛教在全国已占用重要地位。受内地影响，大乘佛教思想也开始在敦煌流行。与佛教的迅速发展相适应，莫高窟的修窟造塔活动也十分兴盛。隋代教煌石窟艺术进一步接受中原佛教艺术的影响，为以后新的佛教艺术繁荣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敦煌两千年历史上的全盛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强，敦煌这颗丝路明珠，此时更加璀璨夺目。敦煌的社会经济更是高度发展。据藏经洞所出《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记载，唐前期敦煌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绿洲罐溉体系，使敦煌的耕地面积扩大，农业进一步发展，粮食生产自给自足。经过一百多年发展，天宝时成为敦煌有史以来户口最多的时期。

政局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为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唐前期，西域诸国的使者，中原的戍卒和民夫，西行求法和东来弘道的僧侣，内地和西域、中亚的商人等，不断通过敦煌往来与中原与西域、中国与印度、西亚之间。中原的丝绸、瓷器、汉文典籍等继续经过敦煌源源而去。同时，西域、中亚等地的珍珠和特产，以及宗教、文化艺术等，也继续由敦煌传往内地。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敦煌这个自曹魏以来形成的商业城市十分繁荣。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还给敦煌带来了各种不同系统的文化。除了汉文化和佛教以外，当时在敦煌城东一里处有粟特人信奉的祆教神祠。敦煌艺术中保存的景教

和摩尼教的经典，反映了中亚、西亚宗教在敦煌流行的情况。在这个交汇着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文化的都会中，汉文化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与李唐王朝奉老子为先祖，大力提倡道教相关，敦煌不仅在开元、天宝年间设立了道学，道经写本也大量涌现，道观增多，反映道教盛极一时。佛教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敦煌佛教在民间广泛信仰的基础上，在信佛的世家大家族的倡导下，一直缓慢而平稳的向前发展。见于记载的佛寺比前代增多，莫高窟的开窟活动也一直在持续。大量宫廷写经不断从长安、洛阳传入，不少高僧从内地前来弘法，敦煌不断地受到内地佛教文化的影响。东来弘道和西行求法返回路经敦煌僧人的增多，又使敦煌得以不断汲取西域、印度佛教文化的营养。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的佛教和石窟艺术发展到了全盛时期。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虚而入。建中二年(781年)，敦煌被吐蕃占领。吐蕃奴隶主贵族笃信佛教，并借用宗教的力量来稳定局势。他们提高了僧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一些高级僧侣可以参与政事。他们不断向寺院布施财物、田产以及依附人口等。在吐蕃统治的倡导下，当地民众信仰佛教者日益增多，使沙州佛教势力迅速膨胀。寺院由13所增加到17所，僧尼由311人增加到近千人。

沙州的僧官起初沿用唐制，首领为僧统，后改称教授。寺院的经济势力日益强大，拥有田地、果园、粮仓、油坊、牲畜、车辆以及依附人口—寺户，并通过放高利贷盘剥老百姓。译经活动也频繁进行，他们不断向唐廷求取佛经，然后进行翻译。写经和讲经亦较过去益盛。每所寺院都有专门从事抄写经书的“经坊”，开展了大规模的写经活动。各寺院都定期开展讲经活动，向当地僧俗宣讲佛法。寺院学校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加强了世俗学问的内容，吸引了不少世俗子弟到寺院求学，成为兼收僧俗弟子并授佛学和儒家典籍的新型寺院学校，这对于延续中原文化在敦煌的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沙州佛教势力的膨胀推动了莫高窟的兴建，这一时期敦煌莫高窟仍开窟不止，除继续完成了前代开凿的9个窟和重修了28个洞窟外，又新建了55个洞窟。若按每年平均数计，

其开窟镌龛速度超越了初唐和盛唐。

由于吐蕃奴隶主贵族的暴虐统治和奴役，唐大中二年（848年），敦煌人张议潮率领沙州汉人起义，逐走吐蕃统治者，占据了沙州和瓜州，并遣使归顺唐朝。张议潮又陆续攻占了肃、甘、伊等州。大中五年，唐廷在沙洲设归义军节度，授张议潮节度使、河西陇右十一州观察使。当时在归义军张氏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对佛教寺院利用各种方式继续向社会各个阶层发展的势力，未加干预。归义军统治者还亲自参加设斋、造窟等佛事活动，并公开宣布保护寺院的财产和依附人口，致使僧尼人数进一步增加到1100人以上，在17所寺院之外，又出现了兰若和私家佛堂。由于佛教势力在政治上已依附于归义军政权，所以其社会势力的发展对归义军有益无害。在沙州僧官的倡导下，沙州寺院和当地居民在举行佛教仪式、佛教活动时，大多要为归义军首领及其下属祈福或歌功颂德，这种情况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也有反映。由归义军节度出资兴建的洞窟，窟中的供养人像往往不是一人一家，而是祖宗三代、姻亲眷属都依次排列在一起，简直成了他们的列序家谱、光耀门庭的家庙了。在第156窟还出现了与佛教没有直接关系的规模宏大的张议潮夫妇的出行图。

后梁乾化四年（914年），沙州的另一个大族曹氏家族中的曹议金执掌政权，恢复了归义军的称号，此后归义军政权一直把持在曹氏家族手中。曹氏家族采取了一些有效地措施维持其在瓜、沙的统治，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也努力搞好关系，并奉中原为正朔。这些措施使其在五代、宋初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得以生存、发展。而且，河西西部与西域各个绿洲王国的友好往来及由此带来的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也为密切中原王朝与他们的联系和中西交流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北宋建立后，有很多僧人经由河西、敦煌前往天竺（印度）去求法，他们在往返途中常在敦煌暂居。很多敦煌僧人或者随同这些返回的内地僧人，或者随同东行的西域僧人，甚至混杂在西域各个商队和使团中频繁出入中原。那些往来于敦煌的僧人也不断把中原僧人写的佛教著作和从印度、西域带来的佛典在敦煌传布，同时也将一些敦煌独有的佛教典籍带到了中原、西域。敦

煌与中原、西域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为曹氏归义军时期佛教的继续兴盛提供了良好地外部条件，而曹氏历任节度使对佛教的支持和尊重则为保持其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他们不仅把发展佛教、争取佛教势力的支持作为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而且还试图凭借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来提高归义军政权在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地位。当然，曹氏归义军政权也不是听凭佛教势力自由发展，他们不仅继续将沙州僧官牢牢控制在手中，而且还控制着佛教发展的导向。这一方面表现在几乎一切佛教活动仍要为节度使及其家属的文治武功大唱赞歌，并为他们祈福；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们着重支持发展敦煌的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努力把敦煌建设成为西北地区汉族佛教的中心。在他们的支持下，敦煌的佛教无论在藏经方面还是在佛学研究方面都代表了当时西北地区的汉化佛教的最高水平。在发展佛教艺术方面，他们也是不遗余力。从曹议金到曹廷禄，历任节度使都在莫高窟或榆林窟从事过新建或重修佛窟的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归义军的各级官吏和很多百姓都参与了上述活动，从而把莫高窟建设成为西北地区佛教徒仰慕的圣地。由于受曹氏归义军政权控制佛教发展导向措施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寺院经济继续衰落。寺院依附人口对寺院的依附关系也日益松弛。寺院经济的进一步衰落迫使佛教势力更加依赖于世俗政权的扶持。

在瓜、沙归义军曹氏统治的时期，沙洲回鹘崛起了，一跃而成为瓜州地区的主宰，控制了沙洲地区的局势。处于中西交通咽喉之地的回鹘，由于长时期接受“善国神乡”观念的熏陶，“奉释氏为最盛”在敦煌不仅遗留有回鹘文佛经、佛画以及在窟中大量的回鹘文题记，并在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大量修窟造像。

公元 1036 年，西夏占领瓜、沙二州，从这年起直至西夏失国，共统治敦煌 191 年，是敦煌建郡以来历时最久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西夏统治者既信奉巫术和多神教，也笃信佛教，作为佛教圣地的敦煌自然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莫高窟以及榆林窟、西千佛洞都曾招致无数善男信女顶礼膜拜，在这些地方修建寺庙，新建重建石窟等活动盛行不止。

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军队攻占敦煌。在蒙古军队和元朝统治时期,敦煌在中西交通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经由敦煌,河西的交通路线再度成为联结西域和中原的通道。东西交通再度大开,丝绸之路又繁荣起来。西方的波斯、大食、印度、伊尔汗等国的商队经由敦煌络绎不绝往来与中国与中亚。但此时敦煌的地位已远不如汉、唐时期相比,加上蒙古帝国和元朝疆域的扩大,敦煌失去了经营西域的战略基地的作用只成为在河西通道上的一个补给站,并不像汉唐时期那样是对整个西北地区甚至是国都的安危都有着重大影响的军事重镇。

元朝统治者对佛教也非常崇信,采取儒释道并重的政策,十分注意扶持和利用佛教。莫高窟现存的蒙、汉、藏、梵、西夏、八思巴六种文字的《六子真言碣》,就是镇守沙洲的西宁王速来蛮及其妃子、太子、公主、猎马等出资于至正八年(1348年)刻立的。至正十一年,继速来蛮镇守沙州的牙罕沙则对皇庆寺(莫高窟)进行了重修。

在统治者的倡导和带领下,佛教在这一时期受到敦煌各族人民的信奉,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依然在继续进行。元朝,是沙州的最后一次兴盛时期。汉族和蒙古、回鹘等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敦煌文化。

明朝在洪武五年(1372年)攻占了河西,沙州归于明朝。此时自宋元以来日渐发达的海上丝绸之路已成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而经由河西的陆路通道在中西交通的地位则进一步下降。再加上明朝的边防重点在北方,敦煌的战略地位和元代一样,其得失对全国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所以,明军并未在沙州设防,很快收兵东还,在肃州西筑嘉峪关以为国门。以后,嘉峪关通哈密之路成为中原与西城往来的干线。敦煌失去了屏蔽河西和中原陆路交通中转站的地位,到嘉靖十八年(1539年)则完全关闭了嘉峪关,断绝了与西域的联系,敦煌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在此期间,敦煌曾一度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吐鲁番占领,在敦煌流行了一千多年的佛教终归绝迹。被佛教徒视作圣地、曾盛极一时的莫高窟,呈现出满目凄凉的景象。直到清雍正三年(1725年)才重新设置敦煌县,从关内移民屯垦,荒芜了两个世纪的敦煌又重新复苏。

清朝雍正、乾隆时，清廷注意对敦煌的开发，敦煌的经济有所复苏，人口也迅速增长。移民中不少人信奉佛教，使莫高窟的香火渐盛。在嘉庆和道光年间，敦煌的佛教徒对莫高窟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这次整修除新开了第 11 窟、228 窟以外，还重修了前代二百多个洞窟。但由于此时内地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已成为无源之水。更因为此时敦煌的文化远远落后于内地，使得清代新开和重修的洞窟的艺术水平无法和前代相比。同治年间，陕、甘、新等地先后爆发了回民起义，敦煌一带也曾成为战场，在战乱中，由白彦虎率领的回民起义军在被清军追赶至敦煌时，尽毁莫高窟联结上下层窟的行廊。

19 世纪末，道士王圆箓来到莫高窟。此时莫高窟十分荒凉。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后，香火渐盛，他用信徒们施舍的钱，开始按照自己对道教的理解来重修和改造莫高窟。他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清除底层洞窟中的积沙。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 16 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但敦煌当地的官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古物的价值，腐败的清王朝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藏经洞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英、法、日等国“探险队”盗劫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被清廷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也遭到了重大劫夺和破坏。

1914 年至 1915 年，俄国奥登堡率考察队到敦煌莫高窟，不仅仅劫掠了大批敦煌写本，还割走了第 263 窟的多块壁画。1921 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被打败的数百名白俄官兵逃窜到了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甚至在洞窟内挖坑烧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破坏严重。1924 年，美国人华尔纳曾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精美彩塑。敦煌遗书和艺术品的散失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在客观上也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他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 20 世纪形成了一门新的世界性学科——敦煌学。

作者：褚良才，1956 年出生，男，山东潍坊人，浙江大学教授。

# 锁阳城的历史演变

王北辰

废墟既然原名苦峪城，那么锁阳城之名又起自何时？查道光十一年（1831年）成书的《敦煌县志》“古迹门”内记：“苦峪城，废瓜州东，东至肃州四百里。”苦峪城即今锁阳城，但书中并未记它另有锁阳之名。光绪十七年（1891年），陶保廉随父西行曾过瓜州，后来他在其《辛卯侍行记》卷5中记到了苦峪城，文云：“上达里图，即前明苦峪城也，今废，亦称碱泉子。”也不记它另有锁阳城之称。从这两种对当地地名记载较详的书里可以知道，此城直到清末尚无锁阳城之名。1925年，北京大学研究所的陈万里西去敦煌考察，1926年，发表了《西行日记》。他在记布隆吉城的一段里提到了锁阳城即苦峪城，这表明了锁阳城之名起自民国初年。

苦峪这个地名，最早出现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明实录》“永乐三年十二月”条：“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言，哈密归附头目买住察罕不花等二百七十八户，居苦峪里，告饥，乞以预备仓赈之，从之。”《明实录》称苦峪为里，可知它是县级之下的一个小行政区，在哈密人来附之前，苦峪已有村落。但仅从字面上看，还不能肯定当时当地是否有城。明永乐以后，史书里陆续出现有关苦峪的记载，兹将《明史·西域传》之记载摘引如下：

宣德十年（1435年），蒙古一部为哈密人所侵，“乃率部众二百余人走附塞下……诏边臣发粟济之，目令议所处置。边臣请移之苦峪，从之”。

正统六年（1441年），“初，困即来（蒙古首领名）之去沙州也，朝廷命边将缮治苦峪城，率戍卒助之。六年冬，城成，入朝谢恩，贡驼马，宴赐遣还”。这是第一次出现苦峪城的记载，记的是“缮治苦峪城”。可见，苦峪

原已有城，这次不过是再加缮治，原城建自何时则不明。

成化十年（1474年），“吐鲁番久据哈密，朝命边臣筑苦峪城，移哈密卫于其地”。这次当然仍是修治旧有的苦峪城，值得注意的是，从此苦峪就不再是一个里级的最小行政区，而是升格成了哈密卫的治所。

弘治七年（1499年），兵部右侍郎张海等，遵朝廷的保守政策，闭嘉峪关，弃哈密，修缮苦峪城。

正德九年（1514年），哈密及吐鲁番叛乱部落，袭掠苦峪及沙州。

《明史·西域传》还概括地记载，明朝以嘉峪关之外为西域，正德以后，对关外进一步采取了弃置政策，不复经营，从而，关外诸城反复被吐鲁番、哈密、蒙古等各族各部所争夺、破坏，其后各城（包括苦峪城）的情况也就不再见于记载了。对于这种情况，乾隆三年（1738年）的《重修肃州新志》“安西卫建置沿革”条概括记云：“正德中，（安西卫）徙肃州塞内，嘉靖三年闭嘉峪关，其地遂为吐鲁番所有。”同书“柳沟卫、苦峪城”条下又记：“正德后，吐鲁番益张，苦峪诸城皆为所残破。”清人修志时，距明不远，而且其书又以明朝万历年的《肃州志》为基础，所以上记概括是可信的。

上举各条史实表明，从永乐初年至嘉靖三年（1403~1524年）的120多年间，苦峪城或者作为蒙古部落的临时驻牧之地，或者作为哈密人的避难居留之所，一直是各族、各部混居的地方。在此期间的苦峪城也一再得到修治，遗憾的是明代史书不曾记其建自何时。

苦峪城在明代还是哈密—肃州（今酒泉）之间的交通必经之地，事见下列各记：

经略过哈密的马文升（1426~1510年），撰有《兴复哈密记》，其记哈密通中国的路程云：“吐鲁番至哈密十数程，中经黑风川。哈密至苦峪又数程，皆绝水草，贡使往返必驮水草然后行也。”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34册“九边四夷”部，引明代某人之《西域土地人物略》云：“赤金（今玉门市西之赤金乡）西百五十里为苦峪城，即我皇明所设苦峪卫处也。东有河，城中有三塾，迤北五十里为王子庄。

苦峪西二十里为古墊子，墊西有塔……”

《明史·西域传》“沙州卫”条下记：“自赤斤蒙古西行二百里曰苦峪。自苦峪南折而西百九十里曰瓜州。自瓜州而西四百四十里始达沙州。”

以上三种记载一致表明，明代嘉峪关外的东西交通路是要经过苦峪的，这和后来清代这个地区的东西交通道路显然不同。关于清代，《重修肃州新志》所收“西陲记略”载，出嘉峪关西去安西，途经卜（布）隆吉、双塔、小湾等地，也即基本沿疏勒河直走，并不折经苦峪。其后如洪亮吉的《伊犁日记》、林则徐的《荷戈纪程》、陶保廉的《辛卯待行记》等，所记西行道路也都如此。明、清两代嘉峪关外道路之不同，反映了关外各地开发的先后不同。在明代，苦峪地区农牧业混交，各族居民集中，因而成了荒漠中的交通必由之处。到了清代，苦峪城已经残破，而疏勒河沿岸村镇兴起，所以东西道路也就改为沿河直走，不再折向苦峪城了。

关于苦峪城更早的历史情况，清代乾隆初年的一篇考察报告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研究资料。

乾隆二年（1737 年），安西地方官黄文炜主编了《重修肃州新志》，其“柳沟卫分册”内有“苦峪城”专条，文章的前半部是建置沿革及史事，后半部则是对城内外景象的记叙，兹录其后半部原文于下，按，关外俗称达儿兔即苦峪之谓，所以靖逆本名苦峪，人谓之达儿兔。兹苦峪城，人称上达尔兔，以别于靖逆也。今遗有空城，规模颇为雄壮，关厢亦大。城内荆榛、颓垣、败墙相望，井尚有水并木栏。又有一道干河，极阔，两岸丛树，映带颇胜。城壁佛像甚多，大抵番僧所为。城外北面多红柳黄茆，耕地尚少；西、南二面则平畴千顷，沃野弥望，沟塍遗迹，绣错纷然。穷其渠道所由，在西北几二百里，于靖逆之上龙王庙疏勒、昌马二河会合处引来，今俱干涸无水，渠身砂砾，所以此城遂废。城东半里有大寺遗基一所，墙址稍存，中间大塔一座，基高丈余，塔高数丈；前有小塔五座，亦尚高三四丈。土中寻得半截断碑，见后。

唐朝断碑，在寺基内，字画不甚剥落。一面逼真唐体，虽未为唐人之极佳者，亦断非唐后之书，因首尾残缺，仅存中段，文义不能联贯，而总

系大中时复河湟，张议潮归唐授爵，大兴屯垦，水利疏通，荷锸如云，万亿京抵，称功颂德等语。其一面字体流入五代、宋初，文意与前略相仿，似颂曹议金之语。夫张、曹二公，本治沙州，而瓜州亦其兼统。此处总系瓜州地方，但当日此处地名，碑文缺落无考。

这篇文字显然是修志当时一位很有观察力的人经过实地考察后写成的。乾隆七年（1742 年），安西地方官常钧撰《敦煌杂抄》收录了此文。

依记，苦峪城的残破，大致在明代嘉靖三年（1524 年）之后不久。按此粗略推算，作者访古登临所看到的乃是城废之后 200 多年的景象；而他所描述的那幅景象，距离我们现在却又相隔 250 年了。

作者记，城外有河，城东半里有寺。参照前引明某人的《西域土地人物略》所记“城东有河”一句，可证其河在城之东，而寺则在河之畔。按寺内残碑所记，其河是唐代张议潮为兴农而开，其后又经曹议金修浚。查张议潮驱逐吐蕃，收复河、湟，受命为沙州归义军节度使，事在唐大中五年（851 年），河渠之开，即在其时。张氏之后，当政者历经更替，曹议金上台事在贞明五、六年（919~920 年），河渠之修浚应在其时。至于这条渠道的湮废年代，则难以推断，但从作者见到的迹象“极阔，两岸丛树，映带颇胜”而论，可以推测其湮废与苦峪城的残破略在同时。

关于渠道的大小，作者说它“极阔”，并说它引自靖逆卫是昌马、疏勒两河会合之地，流长二百里。按，当时的靖逆卫，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被改为玉门县，其地即今玉门市西的玉门镇。所记昌马、疏勒两河会合之地，从现代地形图看，指的应是布隆吉东北的九道沟，亦即昌马河最西的支流与疏勒河相汇之处。这条引水工程的遗迹有待于实地考察，但从现代地形图看，河道选择的是鹰咀山前、昌马河洪积扇的边缘地带，它不但是从布隆吉向锁阳城缓和倾斜的地带，而且沿途又是山前的泉水溢出带，其选择科学合理。至于这条古渠道是否有重开的价值，还有待于从现代经济地理观点进行研究评价。

关于渠和城的存亡关系，作者认为是由于渠道被砂砾所湮而城亦废，这当然是他的一种推测。但更可信的推测，则是渠道一直沿用到了明代

嘉靖年间(1522~1566年),因为作者见到的干河床,形迹明显且两岸有树,它的干涸、被湮应该不会比200年更久。正是由于这里有灌溉之利,所以早在永乐之前即有苦峪里,直到嘉靖年间,常被当做安置各部族驻牧生活的地方,且是东西交通的必经之处。嘉靖三年(1524年)闭嘉峪关,苦峪城屡遭破坏,终于废弃。或者在城被破坏之时渠亦被毁,或者城既废弃,渠道也陷于无人管理,所以它才日益湮没。

作者对唐代残碑的摘要很有价值,他所见到的唐碑,今已不存,碑文大意全靠他的摘记才为后人所知。碑文的记载,把苦峪城的历史推到了唐大中五年(851),它反映出早在唐大中年间(859~860年),当地就已有了聚落以至城镇,否则的话,张议潮也不会把灌渠引向人烟稀少的戈壁滩。

250年前,作者在苦峪城上眺望到的景象,和我们今天眺望到的景象又是迥乎不同的。他所描述的景象,为我们留下了一幅足以与现在锁阳城地理景象作对比的1737年的历史地理横截面。当时,"城外北面多红柳、黄茆,耕地尚少;西南二面则平畴千顷,沃野弥望,沟塍遗迹,绣错纷然"。而现今古城的西、南两面是"登古城南望,戈壁浩瀚,祁连山白雪皑皑;北、西两面碧草如菌,与蓝天相接;东面沙丘、沙梁起伏,如黄龙出没"(据《中国名胜词典》"锁阳城"条)。又,西北师范大学的李并成先生曾到锁阳城做过考察,承他告我:西、南两面城外,地表为盐渍土结壳,平坦辽阔,有风蚀现象,灰白色的地面上散布着一二米高的红柳沙堆或自刺沙维;城东是一片粗砂戈壁,渠道只有依稀可辨的遗迹,不见树本;城北是盐碱土的干草地,耐旱的植被稀疏,景象荒凉,几十里外的桥子乡,土地才较湿润,才有农场。上述自然地理的变化,发生在250年间,250年来的地理演化,是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个地区自然环境演化的线索和依据。

关于苦峪城更早的历史,如作者所记:"此处总系瓜州地方,但当时此处地名,碑文缺落无考。"那么,在唐代地理书的瓜州部分里,能否找到一点有关它的记载?为此,首先要弄清唐瓜州治所晋昌县城的地址。

据乾隆三年(1738年)《重修肃州新志》安西卫建置沿革记:“本朝经理关西,始建安西镇城。原在布隆吉,至雍正五年,始于今大湾地方,杜尔柏津西北,建筑新城,于雍正六年告峻,遂移旧安西文武,驻扎本城,屹为重镇。”可见清之安西城(今之老城)先建于布隆吉,又移建于大湾地方,它并非唐瓜州之故址。

关于唐瓜州城址,陶保廉在其《辛卯侍行记》里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陶保廉提出,要根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记瓜州与肃州、沙州间的距离去推求它。按《元和郡县志》瓜州(治晋昌县)的“四至八到”记载,瓜州东南至肃州480唐里(下同),西至沙州三百里,也即其东南至今酒泉、西至今敦煌的距离比例为8∶5。按这个比例推求,则唐之瓜州城应在今疏勒河中游的双塔村附近。陶保廉此说取自俞浩的《西域考古录》,看来此说很有道理,值得重视。

仅凭瓜、沙、肃三州间的距离,以推定瓜州城的位置,根据当然不够充分。为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还必须考核一下双塔村附近的地理形势,是否可以相当。《西域水道记》卷三“疏勒河”条下记:“疏勒河自月牙湖墊西流十里,迳双塔堡北。又西流里许,南岸有二沙阜,相去半里,阜巅各有小白塔,是即堡所由命名也。《肃州新志》云,双塔不知创于何代。其地峰回路转,河水湾环,林木葱茜,徘徊瞻跳,顿涤尘襟。”如所描述的双塔一带的地理环境,与唐瓜州城是可以相称的。

除上举论证根据外,还可以举出另一项历史记载,以为推求唐瓜州城位置的佐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玄奘法师西行求经,于贞观三年(629年)九十月间抵达瓜州晋昌城,在当地询问西行路程,“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葫芦河,上广下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当地人所介绍的当然是个大致的地理轮廓。于是玄奘法师在瓜州城找到了一位向导,“于是装束,与(向导)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遥见玉门关。去关上流十里许,两岸可阔丈余,傍有梧桐树丛,胡人乃斩木为桥,布沙填草,驱马而过”。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记之葫芦河，显然是指今之疏勒河，而葫芦河之名至今仍保留在它的一支小支流上，它就是流经今双塔村的兔（土）葫芦河。《西域水道记》卷三记之为："札噶尔乌珠水，……土葫芦沟，有水自沟发，是为札噶尔乌珠水，谚日窟窿河，北流二十余里，经双塔堡东半里。……《肃州新志》言，窟窿河，多大穴，上小下宽，盘涡湍急，深邃不测……引唐岑嘉州诗为证……苜蓿烽边逢立春，葫芦河上泪沾巾……"

唐瓜州城，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记，应求之于疏勒河南约50里某地。陶保廉所举之双塔村，就其与沙、肃二州的距离而论，虽可当于瓜州，但其北距疏勒河则不过30里，又嫌其过近。欲求兼备上述两方面条件的地点，则只有双塔村南的桥子乡。其地东距酒泉、西距敦煌的里数，略合于《元和郡县志》所记，北距疏勒河的里数，也近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载，且位在平地，宜于耕牧，可以相当。从地名上看，它原名堡子城，反映了当地原有城堡，这也是瓜州古址的一个反映。从种种条件看，桥子乡恰可当于唐瓜州城址。

唐玉门关并非汉玉门关，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关在葫芦河沿岸，玄奘午夜到河南岸即能遥见。然则玄奘所到的河南岸又是何处？按，玄奘自瓜州出发，是趋向疏勒河，其所选道路当是循土葫芦沟向北，从而他所到的地点大致应在今双塔村北的双塔水库南岸。从地形看，疏勒河自双塔向西，两岸为山地所夹，今之双塔水库正是利用两岸山地所夹的一段盆地而建。已被淹没了的这段山谷，形势险要易守，唐玉门关就选建在今双塔一带，故址极可能就在水库的东口某地。但《元和郡县志》"瓜州、晋昌从县"条下又记："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对此，贺次君辑校引清人张贤驹的考证云："二十步或作二十里。""二十里"虽然比"二十步"合理，但仍不可信，因为本文已经论证了瓜州在今桥子乡，然则桥子乡以东20里，地势平坦，岂有足以置关扼守之处？唐人又岂能弃河谷不守而在平地置关？把《元和郡县志》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一加对照，再从地理上加以审度，我们就会相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记当时情况，而不采用《元和郡县志》的记录。

在上述各地址考定的基础上，可以复原玄奘法师在瓜州的行径，他在夜幕降下时离开今桥子乡，取道土葫芦沟北行约 50 里，到达今双塔村北、水库南岸某地，玉门关即在其附近。其处疏勒河面甚阔，法师在少胡导引下，向上游又行十多里，找到了较窄的河面，于是斩木架桥，渡到北岸，处理了向导问题后，西去求经。

是否可以把锁阳城比定为唐之瓜州城？否，因为这样比定将会遇到两个难以解决的地理问题，一是锁阳城北距疏勒河约 80 多里，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记 50 里远得多；二是《元和郡志》记："雪山，在（晋昌）县南一百六十里，积雪夏不消。"今锁阳城南距最高峰鹰咀山，水平直线距离也不过 90 里，也不合《元和郡志》所证，所以不能把锁阳城比定为瓜州。

《通典》卷一七四《晋昌郡》下记："南至新乡镇一百八十里。"这个里数肯定是误记，因为《元和郡县志》明记，晋昌城南 160 里即是雪山，然则在雪山深处又 20 里，岂能有一个新镇？从现在地理看，桥子乡南，可以相当于镇的地方惟有锁阳城废墟。既然《通典》所记的距离显然不合理，我们就有理由怀疑，锁阳城所在地就是瓜州晋昌县下的新乡镇。这样的话，张议潮于大中五年（851 年）下令开渠引水以利农垦一事也就更易于理解了，因为早在此之前，其地已有新乡镇。

作者：王北辰，（1921~1996），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北京大学教授。

# 汉代河西与西域之间的相互关系

王宗维

“河西”和“西域”，现在说来，是两个概念，两个不同的地理区域，河西是指河西走廊及其两侧，西域指玉门关、阳关以西，但原来并非如此。随着郡、县设置的增加，中原王朝疆土的不断扩大，西域的范围也不断向西转移。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西域，是《汉书·西域传》首先明确提出来的。“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从此才把河西地区和西域明确分开。但是在历史上由于河西与西域地界相连，地貌、土壤、气候、雨量和植物生长等情况有许多相同之处，河西地区又是东西南北民族迁移、流徙活动的场所，这样，河西和西域之间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就是汉朝政府把河西和西域分别区划，实行不同形式的行政管辖之后，其相互关系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研究河西与西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全面了解西北地区民族史，无疑是一个重要内容。

**一、河西原来也称西域**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云：“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犇。”《汉书·霍去病传》：“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师征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犇于率。”浑邪王的驻地在汉代张掖县，张掖县属武威郡，可见从今武威以西，当时就称为西域。

又《史记·大宛列传》记：“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昆莫生，弃于野，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域。”王充《论衡·吉验篇》据此亦作“西域”。但“西城”实为“西域”之讹。《大宛

列传》在此前数行记一事云："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域数万人，至祁连山。"此即上引《卫将军骠骑列传》《霍去病传》所记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朝击败休屠、浑邪诸王事。传中都说"西域王浑邪"，而《大宛列传》作"西城"，显然是传说中的错误。乌孙在浑邪王部西，又非城邦国，应以西域为是。

汉武帝在位时，河西四郡已建成三郡，敦煌郡辖境达玉门、阳关，昭帝时成书的《盐铁论》就把西域的范围向西推移了。其《西域篇》记："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属，南与群羌通，先帝推攘，斥夺广饶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国皆内，据匈奴，断其右臂。"这里所说的西域，已经不包括河西走廊。至宣帝设置西域都护，领南北二道，西域的范围进一步明确了，但是此时也并非仅指玉门、阳关以西。《汉书·赵充国传》记赵充国上书云："治湟峡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治西域，威信千里。"此"西域"的概念，无疑指鲜水（今青海湖）及其以西地区，当时尚未在此设郡领县，所以称为西域。再证之《汉书·王莽传》，王莽奏议云："今西域良愿等复举地方臣妾……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王莽所设西海郡在今青海海晏县，郡领五县分布于青海湖周围，羌豪良愿部必当在此，可见西域也指湟水上游、青海湖周围地区。

根据上述，西域一词在西汉时广泛指汉郡县辖区以西汉朝力所能及之地，并没用严格界限。东汉班固撰《汉书》，才把范围分开了。置郡以前的河西，曾包括在西域的范围内。

**二、河西和西域民族迁移、交往极为频繁**

河西是亚洲东部和中部交通的咽喉，东西南北的民族迁徙，各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大都需要经过这里。从汉文资料的记载看，西域的许多民族是从河西迁往的，或者是经过河西迁往西域的，河西民族对西域的发展有过很大的贡献。兹分述于后：

（一）月氏人

《史记·大宛列传》记："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随蓄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

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汉书·张骞传》记：“乌孙王号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敦煌、祁连间。”又据《资治通鉴》建武十二年条姑臧县引刘昫注：“姑臧县，秦月氏戎所居。”月氏东起武威，西至敦煌，分布地区与《括地志》所记“凉、甘、瓜、沙等州地，本月氏国”的记载完全相符。

月氏从秦代以前就居于河西。汉文帝三年（前177年）以后陆续向西方迁徙。其迁徙原因是匈奴右贤王的攻击。《匈奴列传》记：“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败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从此月氏人的大多数迁往西域，称大月氏。大月氏人到达葱岭以西后，降服大夏，重建政权，但他们与昆仑南山、河西地区的月氏关系仍然密切。

（二）乌孙人

《张骞传》记，乌孙王“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敦煌、祁连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大宛列传》记：昆莫及壮，单于“使兵将，数有功，单于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城（域）。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乌孙与大月氏共居于敦煌、祁连间，约在秦至汉初。汉初，月氏强盛，图吞乌孙，乌孙人逃往匈奴。当时匈奴西部的势力仅仅到达河西东端，乌孙逃往匈奴也只能是向东北部迁移。冒顿单于在位36年（前174年）死，匈奴右贤王灭月氏在汉文帝三年（前177年）或次年，昆莫配合右贤王击败月氏后，曾一度成为匈奴在西域的掌兵者，此西域实指河西西部地区。数年，冒顿单于死，乌孙王乘机率众远徙，击败月氏，占领准噶尔盆地和伊犁、纳林河地区。《汉书·西域传》所指乌孙国，是指乌孙最后在赤谷城建立政权以后的状况。由此可知，乌孙在汉文帝初年以前，一直是在河西居住的民族，冒顿单于死后，才最后离开河西。

（三）塞种人

《广弘明集》梁荀济的《论佛教表》引《汉书·西域传》云：“塞种，本允

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所迫，遂往葱岭南奔。”今本《汉书·西域传》记：“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又同传罽宾国条记：“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根据上述，塞种原与乌孙、大月氏俱在敦煌一带。大约在秦汉之交，月氏第一次败塞种，其人或远走葱岭，或附于月氏、乌孙。西汉文帝时，月氏西迁，再次击败塞王，从此塞王南君罽宾，其人民散处于西域诸国。塞种人初居敦煌的时间无考，但他们至少在秦代是河西西部的居民，后因月氏夺其地，才迁往西域的。

（四）大夏人

《大宛列传》记：“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王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

“大夏”一词，《左传》昭公元年即有“迁石沉于大夏”的记载。此大夏在晋地，可能与夏禹的后代有关。《管子·封禅篇》记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认为此大夏在河州、凉州间，今甘肃临夏大夏河一带似为大夏人居住之所。《山海经·海内东经》记：“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等国。”此四国中，月支即月氏，居于河西；居繇且即居延，为西戎八国之一朐衍之戎的一部迁于河西者；竖沙待考，大夏即由临夏迁居于河西的大夏人。流沙并非如有人所说，一指居延海之流沙，一指罗布泊流沙，实即指大沙漠，这里是指大河以西之腾格里大沙漠。流沙外即腾格里大沙漠以西，大夏、竖沙、居繇、月支等国当时分布于此。战国后期，大夏人已不在河西，可能向西迁移了。大夏人居住有城屋，与漠北匈奴不同，这在原居于临夏时已流行这种居住方式。

月氏西迁后能够迅速击败大夏，迫使其臣服，这与大夏“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有关。大夏人西迁后未能建立统一的政权，所以被它原来的邻居轻易制服。

（五）羌人

《史记·匈奴列传》叙述冒顿单于初继位时匈奴的辖地云："西接月氏、氐、羌。"当时匈奴的西部势力尚未深入河西，与其为邻的月氏还占有今武威地区。此氐、羌是指今兰州附近的氐羌部落。

秦代以前，羌人在河西的势力相当强大，走廊南侧主要是羌人的势力范围。《汉书·地理志》：张掖郡羌谷水，酒泉郡呼蚕水，敦煌郡的南籍端水和氐置水均出自羌中，这虽然是汉代的情况，但也可以看出羌人分布地区之广，西部一直与婼羌相连。

婼羌是西域最大的羌人部落群。《汉书·西域传》记："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畜牧水草，不田作。"又记，小宛，东接婼羌；卢戎，南邻婼羌；渠勒，要连婼羌；于阗，南界婼羌；难兜，北有婼羌；"西夜、蒲类、依耐、无雷，其种类氐羌行国"，纵横数千里，可见其分布之广。又据《三国志·魏志》裴注引《魏略·西戎传》云："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近来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塔什库尔干发掘的古墓葬，经分析有大量羌人遗骨，就可以证实史书记载之不误。

羌人为什么不分布于绿洲，而分布在西域南山？这里面原因固然很多，其主要原因是他们西迁的时间较晚，当时城邦诸国已经占有了肥沃绿洲，羌人又是"不立君臣，无相长一"的部落群，没有力量战胜他们的对手，所以是分散迁移，各有酋豪。这些羌人是何时、从什么地方迁来的呢？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婼羌的"婼"，从若，若与弱并而灼切，若音同弱，婼羌，实即弱羌。《禹贡》："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山海经·大荒西经》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环之"。合黎即今张按北的合黎山，昆仑之丘即张掖、酒泉南之昆仑山，后称祁连山。根据以上记载，秦代以前的弱水，指祁连山北、合黎山南所有诸水，尚不包括合黎山北诸水汇合后的一段。为什么称"弱水"，古人曾有解释。郭璞注："其水不胜毛。"《玄中记》说是言其水弱，鸿毛不能载。这都是从汉文弱字的意思妄加穿凿。试问弱水之名在

前，至少在战国时已有，而中原华夏文化进入河西在后，实为汉武帝时期，如何能用数百年以后汉字的意思解释前者！可见弱水的弱，应是汉字的音译，从当地居民语言中音译而来。当时称弱羌所居之地为弱，称其水为弱水，婼羌原居地就在祁连山以北、合黎山以南的诸水流域。弱羌人大批西迁，大约在秦统一六国时期。当时月氏强盛，兼并河西诸部，弱羌人在月氏人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住地，向西域南山迁徙。婼羌西迁后羌人在河西的势力大为削弱，但是弱羌的影响依然存在。《汉书·韦元成传》记："起酒泉、张掖以隔婼羌，断匈奴之右臂。"此时酒泉、张掖久已没有婼羌，但仍以婼羌称之，说明汉代人仍认为张掖、酒泉的诸羌，可以弱羌为代表。反过来又证明了婼羌的原居地就在张掖、酒泉间。

（六）敦薨人

《山海经·北山经》记："大咸之山，无草木，其下多玉。是山也，四方，不可以上。……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证之《水经注》，敦薨之水出焉耆北敦薨之山，经焉耆，流入敦薨之渚、之浦、之薮，流注于泑泽。据董佑诚、黄文弼等考证，此敦薨之山水包括的范围，北起天山，从山上流出的裕勒都斯河，一直到达罗布泊。这么大的一片地方山名、水名都以敦薨称之，说明当时有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居住在这里。以族名命名地名，这是古代的常例。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回来，带来"敦煌"这个地名，后来汉朝又在河西西部置敦煌县、敦煌郡。敦煌一名在张骞的报告中是指一个地方的名。然而应劭注云"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元和郡县图志》又说是"敦者，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这都属无稽之谈。敦煌之名在前，置郡开西域在后，何能言大、盛。

今敦煌县东之安西县东有名"兔葫芦"的地方，出土的文物很多，孙修身先生考察后认为"兔葫芦"为吐火罗的别异，此说极为确切。张骞报告中的敦煌或即指此地，至少包括这个地方。这样，我就可以还原敦煌一名的来源，就是吐火罗，初期译为敦薨，汉代译为敦煌，后来译为吐火罗，今有遗址兔葫芦，上下两千多年，线索明显，敦煌就是因吐火罗人曾

居于此而得名。

吐火罗人原在西域，战国时曾以焉耆为中心活动于开都河、孔雀河流域广大地区，其中一部分东迁，进入河西，在今安西以西活动。西汉初年复西迁，离开河西，可能有少数遗民流在这里，保留着敦煌这个地名。这样，敦薨（敦煌、吐火罗）族就是活动于玉门、阳关内外的一个民族。

（七）居延人

《山海经》记流沙外有居繇之国，汉霍去病西征经过居延，汉以其地置居延县，名其水为居延水，其泽为居延泽，可见居繇国人应是一个较大的部落。

居延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与义渠戎相邻的朐衍之戎。秦穆公时，西戎八国服于秦。后来，义渠复叛，攻秦，秦多次出兵反击，直至秦昭王时才彻底消灭义渠。但是，自春秋以后，再不见朐衍戎之名，汉代北地郡有义渠道，而朐衍称县不称道，“县主蛮夷曰道”，说明秦、汉在北地郡设县时，朐衍仅存地名，而无朐衍人，义渠人还有。朐衍戎大约在战国时畏秦之威，向西迁移，进入腾格里沙漠地区。《山海经》所记之居繇，正是朐衍之戎的别异，他们又在流沙外建立了政权。

汉开河西时，霍去病、李陵都先后到达居延地，此居延即因居繇人所居而来，汉居延县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代设县时，居延人又离开这个生活多年的地方，向西迁移了。西汉昭帝末年，匈奴进攻乌孙，企图夺取乌孙车延、恶师地。车延地实即车延人居住地区，车延应是居延之别异。从当时汉朝与匈奴战争的地理看，车延地似在今哈密西北。此地在居延海以西，相距不远，说明居延人又从河西迁到新疆北部。

（八）单桓人

《汉书·霍去病传》：元狩二年夏，霍去病“涉钧耆，济居延，逐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解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注引张晏曰：“单桓、酋涂，皆胡王也。”祁连山即今酒泉南山，解得为汉解得县地，在今张掖县西，说明当时这一带地区有个民族称单桓。自此以后，单桓族在河西地区不见出现，而在西域出现了。《汉书·西域传》记：“单桓国，户二十

七，口百九十四，胜兵四十五。”又记“其国西与乌贪訾离国相邻”。单桓国实际上只是一个小的部落政权，元狩二年原来的首领被汉军俘获后，部落遭到很大损失，余部向西迁移，后来在天山以北定居下来，建立了部落政权。

（九）龙勒人

汉代敦煌县西是龙勒县，著名的玉门、阳关就在该县境内。龙勒县是在原来龙勒人居住的地方设置的。但汉代置县以后，这里就不见龙勒人，而在《汉书·西域传》中记有楼兰国，云：“鄯善，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驼，能作兵，与婼羌同。”

楼兰离阳关千六百里，合今九百华里，距离不远。地沙卤少田，与龙勒县的地理条件相近。畜牧，有驴马、橐驼，《匈奴传》记匈奴“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两者有相似之处。根据这些记载分析，汉龙勒县不见龙勒人，而在其西 900 里出现了楼兰人，又称其海为牢兰海，可见牢兰、楼兰都是同音异译。楼兰又与龙勒音近，也应是同名异译。由此可见龙勒、楼兰，就是一个民族，原在阳关东，当地人称龙勒，后西迁至阳关西，汉称其国为楼兰。楼兰国是龙勒人西迁后征服当地土著居民建立的政权，其西迁年代似在汉初。楼兰人的原居地还在漠北。《汉书·李陵传》记：天汉二年，汉武帝诏李陵由居延出兵北上，至浚稽山南龙勒水上。龙勒水在居延北千余里，距汉龙勒县二千余里，龙勒水大概就是龙勒人的原居地。他们由龙勒水南迁，先到敦煌一带游牧，汉初西迁至阳关西，征服当地土著居民，建立起楼兰国。现在发掘的楼兰遗址，是原土著居民的文化遗址，并非楼兰人的遗物。

（十）焉耆人

《卫将军骠骑列传》记：骠骑将军“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又记：“封其裨王鹰庇为辉渠侯。”焉支山，《前汉记》作“鄢耆山”，《汉书·匈奴传》作“焉耆山”，可见焉支亦称焉耆。“鹰庇”，《汉书·霍去病传》作“雁疵”，《史记》《汉书》表分别作“应庀”“应疵”。焉、雁、鄢、鹰，古音相近。庇，《索隐》

“必二反”“疋履反”;《汉书》师古注:“疋履反”,云:“其字从广,非庇荫之庇。”可见本音为疵,庇、庀皆为误写。因此,雁疵音同焉耆,霍去病传记,春季译为焉支(耆),秋季又译作雁疵,焉支山实即雁疵王部落所居之地。至于有人把焉支作“胭脂”、“阏氏”解释,都是附会,并非本意。

焉支(耆)为汉兵击败,雁疵王降汉得封侯爵,河西从此再不见焉耆人的活动,而后来在西域出现了焉耆国。如前所述,今焉耆地方战国时为敦薨人活动之所,西汉时又出现了焉耆国,令人难解。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战国时的敦薨人,至后期至少有一大批人迁居于敦煌一带。而焉耆人原居于焉支山(今大黄山),被汉军击败,首领降汉后,部众大量西迁,至今焉耆地区,征服当地土著,建立政权,仍称为焉耆。焉耆是河西焉支山的焉耆人建立的政权。

(十一)匈奴人

《匈奴列传》记,汉文帝三、四年间,冒顿单于命右贤王向河西击月氏,“灭夷月氏”,“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这是匈奴占领西域的开始。右贤王攻击月氏,自然带着原先已进入河西东部地区的匈奴兵,并在河西地区广泛裹胁其他民族的精壮,一并进入西域。以后,匈奴统治西方的王将是右贤王、西边目逐王等,范围从上郡以西至乌孙;又于焉耆、危须、尉犁问置僮仆都尉,以统西域,所以不断从河西强迁的匈奴人自然不少。

除上述外,还有几种民族可供进一步研究。

《逸周书·王会解》载《伊尹献令》:“正北著大夏、莎车、月氏。”此书是战国时的传说记录,大夏、月氏在战国时居于河西,与其并列之莎车当在同地。此莎车与《西域传》中的莎车国如不是偶合,可能有一定关系。

《汉书·地理志》:上郡有龟兹县,本注:“属国都尉治。”师古注:“龟兹国人来降服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龟兹属国为秦代设置,汉因之。如龟兹与《西域传》中的龟兹国为一事,则龟兹国距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秦西界不过黄河,龟兹国人跋涉如此遥远之路程来降秦,恐不可能。此龟兹是否原居于河西,后来一部分降秦,秦置属国以处之;大部分人西

迁，在西域又建立龟兹国，龟兹属国居民不会是从库车来降秦的。

又《北史·西域传》："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安国，汉时安息国也。王姓昭武氏，与康国王同族。""钱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里，古渠搜国也，王姓昭武。"还有米国、史国、何国、乌那遏国、穆国、曹国诸王皆姓昭武。大月氏西迁后击败大夏立国，至南北朝世袭不衰，而昭武诸姓国主若不是大月氏人，亦是与大月氏同时西迁之河西昭武人。

以上各族，有的是从河西迁往西域的，有的是从西域迁入河西再返回西域的，有的是从河西南北两侧先进入河西生活若干年之后又迁入西域的，不管迁徙的原因如何，这种迁徙趋向在秦汉之际是十分明显的。在迁徙过程中，有的是举族迁移，有的是分批部分迁徙，但都在河西地区留下了影响，有的留下了遗民。这些遗民虽然离开了自己的同族，但仍有自己的民族感情，他们千方百计与同族人联系。

汉武帝为了反击匈奴，派张骞先使月氏，后使乌孙。汉朝政府不仅同数千里外的月氏、乌孙建立起关系，还通过他们掌握了河西、西域的情况，霍去病两次出兵成功，与月氏人提供情况是分不开的。张骞出使返汉，西域各国派使臣同来，以后汉朝同西域各国的来往更是与日俱增，络绎不绝。汉宣帝神爵初年，汉朝解除了匈奴对西域的威胁，在西域设立都护，更加方便了西域各国来京城的条件。这成批成批的世子、使臣、商旅途经河西，得到同族人的接待，因而留居于河西者为数一定不少。

《梁书·康绚传》记："康绚，字长明，华山蓝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子入侍，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以康为姓。晋时陇右乱，康氏迁于蓝田。"康绚的祖先待诏河西的具体年代虽不可知，其在汉初置都护后不久，大概没有问题。这里还提出待诏的问题，当时从西域各国来的使臣、商旅，不能直至京城，需先在河西待诏，等汉朝诏令下达后，一批一批放行，则河西经常有一批西域人留

居。其中有的得到入京的许可，有的则长期待诏，康绚先世即属于此。还有，允许进京有人数限制，不少随行人员只能停留在河西，其中无力返回或有其他原因不能返回本国的，人数也不会太少。这些人住在河西，有的参与汉朝军政，有的自谋生计，因他们兼通语言，就成了汉王朝与西域各国进行联系的纽带和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中介。

又据《高僧传·竺昙摩罗刹传》云："竺昙摩罗刹，此云法护。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敦煌郡。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此云月支人，应是大月氏。"世居敦煌"，虽不能判定其具体年代，至少不会晚于东汉，而其师"外国沙门竺高座"当为天竺人。《资治通鉴》记：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冬，"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明帝遣使求佛，在永平八年前，此年为佛书和沙门到达洛阳的时间，使者往返必经敦煌，所以佛教在敦煌得到合法传播，不会晚于此时。竺高座虽非东汉时人，但其同族到敦煌者当会很早。《西域传》记宣帝时"遣谒者竺次"使乌孙，竺次应是天竺人。

《后汉书·窦融传》记：更始时窦融出任张掖属国都尉，当时的敦煌都尉辛肜，酒泉都尉为竺曾。辛肜大概是辛武贤的同乡，而竺曾确为天竺人无疑。竺曾在新莽时能担任都尉，可见其汉化程度很深，则其先世居于河西至晚在西汉中期。天竺人到河西，又可能通过月氏人以为媒介。

《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骊轩县，注释家公认是西域黎轩人来此居住，因以为县。骊轩人善幻术（魔术），当时西域诸国争求骊轩幻人献于汉朝。骊轩县之骊轩人恐非举族迁徙，而是诸国贡使所带来的骊轩幻人在河西待诏期间留居于此，因而得名。骊轩人以幻术知名，所以诸国贡使虽是主人，没有留下国名，而其所带骊轩人却留下了族名。晋朝时凉州张氏曾攻骊轩戎，可见其人不少。

不仅西域葱岭以西诸国有留居河西者，其东也有。《汉书·赵充国传》记：酒泉有婼、月氏兵四千。此婼即婼羌，当然来自阳关以西。东汉末年凉州胡王有白虎文，此白姓为龟兹国姓。《晋书·沮渠蒙逊载记》：蒙逊之

母为车氏。车为车师国之姓。沮渠蒙逊之父仅仅是一小吏，不可能到车师国中求亲。东汉初年匈奴胁车师等国人攻河西，河西城门昼闭，因而车师人留居河西不会晚于此时。至魏晋间车师人久已汉化，才能和汉化之卢水胡人结成婚姻。

另外，居延汉简中有许多安氏，在居延服役。安姓在汉代并非大姓，何以在居延如此多见？有人以安氏为安息国人，也不见妥当。实际上楼兰、乌孙、月氏中都有安姓，居延汉简中的安姓，可能与此有关。

《后汉书·西域传》论及汉朝与西域的关系时云，汉朝“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这种情况，不仅仅是西域，恐怕河西也是如此，河西是胡商贸易的重要地区。《三国志·魏志·仓慈传》记太和中仓慈任敦煌太守时所经情形云：“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此虽为三国时事，但敦煌等郡与西域诸国的往来已有很久的历史，仓慈正是纠正以前地方豪族苛待西域诸胡人的行为，并为西域胡人提供方便而著名西域的。从汉武帝开河西、通西域之路，直到东汉灭亡，不少西域人走过这条路，也有不少人留在河西。魏晋十六国时期出现在黄河流域的所谓“杂胡”，大多数是先与河西诸族融合，后来迁居中原的。

**三、河西是汉朝经营西域的通道、基地，又代表朝廷兼管西域**

汉武帝最初开拓河西的目的，是为了通西域，联络月氏、乌孙反击匈奴，后来发展到隔绝羌胡，断匈奴之右臂。但事情的发展大大超过原来的预料，河西不仅仅成为汉朝建设和经营西域的通道，而且成为重要的后方战略基地和物资供应仓库。

元封后期，汉朝在河西路上的交通设施大体完成，亭障已延伸至玉门，每年有大批使臣、商旅行走在这条路上，羌、匈威胁已基本解除，但是此时河西人烟稀少，物资供应仍然困难。太初元年（前104年）李广利

西征大宛，中途败退敦煌。次年，汉王朝增调大批军队继续西征，为了保证军事行动的胜利，另派数十万人为军事服役，太初三年屯驻河西的戍卒、负私从者猛增至20余万人，河西居民的民族成分顿时起了根本变化。这批移民，绝大多数是中原各地的农民和手工业生产者，他们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高超的生产技术，这种迁徙是劳动力、生产技术同时输入。他们又是秦、汉王朝封建制统治下的农民，本身已习惯了汉族封建文化和社会制度，一进入河西，就以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者迅速发挥作用。十余年间，河西地区形成了强大的以农业为主、农牧结合的经济力量，彻底改变了过去落后的经济状况。太初以后，河西屯田已西进至仑头（轮台），汉朝在这里置田卒数百，护田积粟，供应使者。

至征和四年（前89年），桑弘羊就提出从河西迁民于西域，扩大西域屯耕的意见。《资治通鉴·汉记》记其事云："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轮台东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护，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司马为斥侯，募民壮健敢徙者诣田所，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这一奏言的本身说明河西人口经济初步发展起来以后，农产品不仅供给来往于河西的军队、使臣、商旅等，而且还要抽调人力在西域广开屯田，支援西域发展生产。此事因汉武帝已到暮年，无力扩大对西域的经营，下诏停止，但他的后继者仍在进行。

宣帝继位以后，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战争加剧，匈奴欲夺乌孙车延、恶师地，乌孙要求汉朝出兵合击。本始二年（前72年）汉朝五将军率20余万人并出塞击匈奴，其中有两路分别从酒泉、张掖出发，这六七万兵力的军粮无疑由河西供给。地节二年（前68年），汉朝攻匈奴车师地，郑吉由西域发兵北上，又命张掖、酒泉各出骑兵至车师北以为声势。河西地区从人力、物力上一直支援经营西域的事业。神爵初年，汉置西域都护以后，西域诸国每年来中原的使臣增多，河西地区承担的供应任务更加繁重。

在汉代简文中保留着供应使臣的账单。《流沙坠简·廪给类》收有这样的简文："出粟一斗二升，以食使莎车续相如上书良家子二人。""出粟五石三斗二升，以食使车师□君卒八十七人。"这仅仅是敦煌的情况，由令居至玉门二千余里，沿路亭站都有供应，其总量是很大的。至于长期居住在河西各地待诏的世子、使臣、商旅及其随行人员，数量更为可观。

河西四郡不仅从人力物力上支持两汉经营西域的伟大事业，保证交通路线畅通无阻，起到了前沿基地的作用，而且河西郡守有时兼管西域。东汉后期，敦煌郡守实际上兼行着西域都护的职权。

早在汉宣帝时期，敦煌已开始起着联络西域的作用。《汉书·西域传》记：元康二年（前 64 年），乌孙昆弥上书，愿复尚汉公主，汉以相夫为公主，"使长罗候光禄大夫惠为副，凡持节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会乌孙昆弥死，泥靡代立，常惠遂上书"留少主敦煌"。汉朝为了防止乌孙勾结匈奴制造事端，遂"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常惠驰至乌孙，屯赤谷城，解决乌孙内讧，辛武贤留敦煌以为声援，结果匈奴未敢出兵，乌孙的问题得以解决。

东汉初年，刘秀尚未统一西北，窦融以张掖属国都尉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统辖河西。时莎车王康联合诸国，共抗匈奴。他为了得到中原王朝的支持，檄书河西，问其动静。《后汉书·西域传》记："建武五年（29 年）河西大将军窦融乃承制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时窦融尚未为刘秀所统一，他以河西大将军的名义承制封莎车王，加西域大都尉，比西汉都护，使西域各国得以安宁。这件事情首开了河西兼领西域的先例，从建武五年到永平十六年（73 年）40 多年间，汉王朝无力向西域派出都护，而西域各国或派世子，或遣使臣请求诣洛阳入奏，但是他们不能到达京师，只能在河西待命。当时长期在敦煌候诏者人数不少，所有书函都由河西郡守代为转达。

永平十六年，汉王朝为了解除匈奴对西域的奴役和给河西四郡带来的危害，派窦固、耿秉等带领酒泉、敦煌、张掖、武威等郡的甲卒和卢水羌胡分别出酒泉和居延塞，在天山、蒲类等地击败匈奴呼衍王，在伊吾

置宜禾都尉，恢复屯田。东汉王朝这次恢复对西域的管辖，河西四郡兵民做出了巨大贡献。

匈奴不甘心其失败，卷土重来，在永平十八年（75年）汉朝诏回窦固撤出军队以后，单于派右谷蠡王将兵二万骑攻车师，又唆使焉耆、龟兹攻西域都护陈睦。陈睦全军战没，戊己校尉耿恭被围于金满城（今吉木萨尔）。汉军在城中食尽穷困，乃煮铠弩、筋革以为食。当时正值汉明帝刘庄死，朝中大丧，无法派出援军，于是从司徒鲍昱议，遣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派酒泉太守段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兵驰往解救。这是河西郡守直接带兵至西域的开始。段彭等七千余众至柳中，击匈奴车师兵，迎还戊己校尉。汉朝不能在西域驻兵镇守，置都护、戊己校尉等职。在西域诸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汉朝留班固以为假司马驻守于田，统领各国。汉王朝不能在人力、物力上继续支持班超，班超依靠西域各国人民和河西诸郡的支持，治理西域，西域50余国皆遣使臣属。

永元十四年（102年），班超年老体衰，请求回朝，汉朝派任尚为西域都护代超。但是任尚不听从班超的嘱托，把班超的谆谆劝解视为“平平”，结果接任不久，即激起西域各国人民的反对。延平元年（106年），任尚上书求救，诏梁慬将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骑往救，并以段禧代任尚为都护。次年，西羌大起义爆发，汉朝通西域的道路断绝，诏还都护、校尉，撤出西域屯田吏卒，敦煌太守就成了兼管西域的边官。

元初六年（114年），东汉王朝从敦煌太守曹宗的请求，派行长吏索班将兵千余人屯伊吾，招抚诸国。到任不久，北匈奴与车师王共攻索班，索班等阵亡。曹宗请求朝廷继续出兵，收复西域，邓太后不许，但令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领兵三百人。还有人主张关闭玉门、阳关，放弃西域。当时朝臣中有一批爱国之士，在关键时刻据理力争，提出救援西域的良策。《后汉书·班勇传》记：永宁元年（120年）班勇上书曰：“会闻者羌乱，西域复绝，北虏遂谴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鄯善、车师皆怀愤怨，思乐事汉，其路无从。前所以时有叛者，皆由牧养失宜，还为

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于前负，欲报雪匈奴，而不寻出兵故事，未度当时之宜也。夫要功荒外，万无一成，若兵连祸结，悔无及矣。况今府藏未充，师无后继，是示弱远夷，暴短于海内，臣愚以为不可许也。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田心胆，北扞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

同书《西域传》又记：“延光二年（123年），敦煌太守张挡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辗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如又不能，则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人塞，此下策也’。朝廷下其议。尚书陈忠上疏曰：‘……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赂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则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赀之费发矣。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先世苦心勤劳之意也。方今边境守御之具不精，内郡武卫之备不修，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内无以慰劳吏民，外无以威示百蛮，蹙国减土，经有明诫。臣以为敦煌宜置校尉，案旧增四郡屯兵，以西抚诸国，庶足折冲万里，震怖匈奴。’”

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特别是班勇提出西域绝望，“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四郡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又说“虏并力以寇并、凉，则中国之费不止千亿”。在这种形势面前迫使汉安帝作出决定，复敦煌营兵三百人，又置西域副校尉于敦煌，联系西域。又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班勇在河西四郡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得到河西援兵近万人，与敦煌太守张朗安辑西域诸国。

从永建二年（127年）班勇免官后，敦煌太守一直行使着领护西域的职责。《西域传》记：永建四年（129年）于田王与拘弥王斗，于田王放前杀

拘弥王兴，教煌太守徐由从诏解决之。阳嘉元年（132年），敦煌太守徐由奉命出兵讨于田。四年（135年），北匈奴呼衍王侵车师后部，诏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候、伊吾司马合六千骑救之。元嘉元年（151年）北匈奴呼衍王攻伊吾，“伊吾司马毛恺遣吏兵五百人于蒲类海东与呼衍王战，悉为所没”。诏令“敦煌太守司马达将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吏士四千人救之”。永兴元年（153年）宋亮代司马达为敦煌太守，继续协助西域长史、校尉，管辖西域。

延光二年（123年）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敦煌恢复营兵以支援西域决定执行后，直至东汉灭亡（220年）这近一百年的时间内，西域虽有长史、司马、校尉之设置，但主要掌领西域各国、接纳使臣和维持治安的重责，多由敦煌太守担当。东汉王朝无力在人力、物力方面援助西域，河西四郡不断从兵力、物力上保证供应，使西域各国一直接受汉王朝的管辖，免于匈奴的奴役，河西四郡人民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河西地区为什么一直承担援助西域的任务，其原因三：

（一）河西与西域地界相连，利害相关

西汉王朝开发河西与经营西域是同时进行的。但河西移民较多，设郡置县较早，生产发展比西域快。汉王朝曾以河西为基地大力经营西域，河西人民为此曾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汉王朝与西域各国的往来日益密切以后，经济文化的交往频繁起来，不论中原运往西域的各种物资，还是西域传入中原的物资都要经过河西走廊，中途流散在河西的为数不少。如史书所载的西域特产葡萄、苜蓿、瓜果、胡豆等等，都先在河西种植成功，然后推广到中原；中原地区传入西域的生产工具、手工业品也先在河西使用，然后进入西域。因此，西汉中后期，河西地区生产发展非常迅速，与西域各族人民的支援是分不开的。可以这样说，汉朝经营西域保卫了河西地区的安全，西域各族人民为建设河西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王莽执政时，破坏了西域与中原的关系，西域和河西同样遭受其害。东汉明帝时，北匈奴侵扰河西，迫使河西郡县城门昼闭，居民不得安宁。东汉时河西经济发展缓慢，除其他原因外，与汉朝对西域的经营不时中

断有直接关系。所以在永宁年间，东汉王朝为是否恢复派遣西域官吏问题，曾发生了一场争论。《后汉书·班勇传》记班勇的一段对话云："今置校尉以扞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绝望。绝望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西域传》记尚书陈忠的话说："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赂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则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赀之费发矣。"班勇和陈忠的话，已经充分说明了河西与西域唇齿相依的利害关系，救西域也就是保卫了河西地方的安全。

（二）河西与西域各族人民交往密切，安危与共

前面说过，从历史上看，河西各族人民和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许多民族曾经活动于这两个地区。汉开河西、西域以后，又大大方便了民族之间的交往，河西各族人民包括汉族，移居西域者不少，西域各族人民留居河西者也很多。当时对两地区人民的安危威胁最大的是漠北匈奴。在这个共同命运基础上，各族人民有一种共同的安危感，为了反抗和防止匈奴贵族的奴役，他们随时进行并肩战斗。从西汉到东汉三百年间，每当匈奴威胁西域时，河西各族人民都积极参加战斗。汉朝从河西调动的兵力有汉人，也有不少"羌、胡"兵，胡包括许多民族。河西各族人民在每一次战斗中都奋勇争先，多次保卫西域战争的胜利，都和河西各族人民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不仅仅是在战争中，为了在西域开辟屯田，汉朝曾多次从河西抽调人力、农具、籽种送往西域；河西郡守长史等也曾从郡境抽调劳动力支援西域屯垦，河西各族人民无不积极参加。这种积极性，不是单靠的行政命令全能奏效的，还要靠各族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

（三）河西地方官员把保卫和建设西域始终当做自己的神圣职责

西汉时，汉朝派任西域的官员，都要经过河西四郡之地，他们对河西比较了解，其中有的人是先在河西任职，后出任西域，有的先在西域

任职，复调至河西。不管怎样，他们深知河西与西域之间的密切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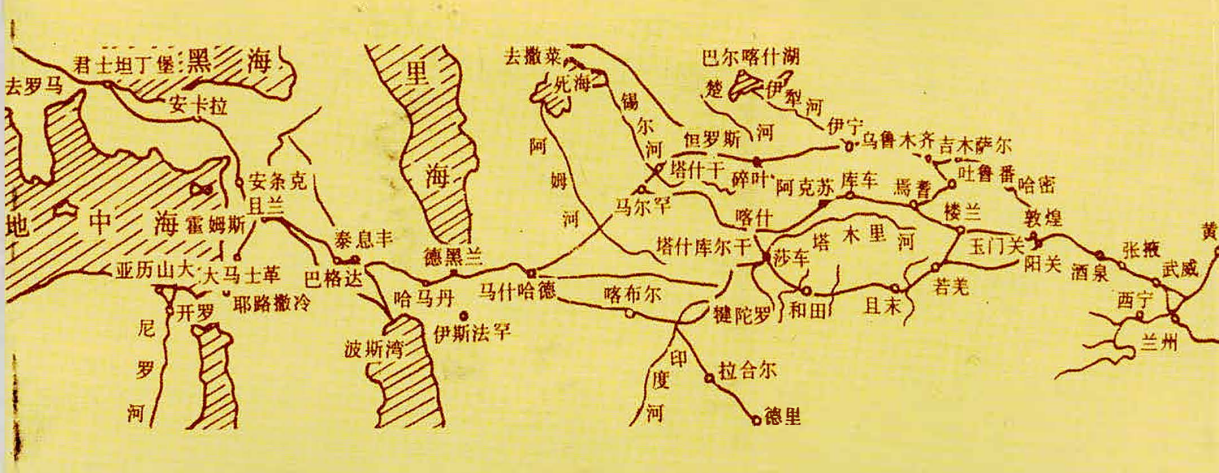
东汉初年，中原王朝还不能统一西域时，割据河西的大将军窦融接受莎车王的使臣，“承制”立康为莎车王、西域大都尉，统领西域55国。所谓“承制”是承袭汉朝的典章制度，代表汉朝行使册封权的。当时窦融尚未统一于刘秀，但他就代表汉朝册封，结果使西域各国得到安宁，起到了东汉王朝暂时起不到的作用。

东汉王朝与西域的交通时通时断，但西域与东汉王朝的从属关系始终持续，主要是通过河西郡守代为转达。河西郡守接待西域诸国使臣，护送商旅，传达王朝的命令，使东汉王朝在停派西域官吏的时候仍能管辖西域。敦煌太守张珰等在关键时刻提出治理西域的建议，态度明朗，为东汉王朝作出抉择提供了依据和力量。至于汉朝王朝多次从河西调兵、运粮，甚至抽调牲畜、农具支援西域，河西郡守都尉无不积极响应。酒泉太守段彭率郡兵解车师之围，敦煌长史索班等战死于车师后部，敦煌太守助班勇以讨焉耆、尉犁、危须，徐由奉诏救拘弥王，司马达发六千人救伊吾，他们都把保卫西域的安宁当做自己的使命。他们在危难的条件下，顾全大局，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作者：王宗维，1934年出生，男，甘肃民勤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门　辉

**装帧设计**　王小英




ISBN 978-7-5528-0610-6

9 787552 806106 >

定价：162.00元/套